

反右派斗争的

回顾与反思

汪国训 著



责任编辑 张克伟

书籍装帧 王晓勇

ISBN 988-97080-7-4



9 789889 7080

定价：35 元

书
当代思想政治史的

知于

代
所发生的反右

行
二二式
式的回顾和反

图
反右派斗争的
体再现并深刻剖析那

回顾与反思

汪国训 著

实的史料与

对五十年世



前言

1957年反右派斗争或反右派运动是由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是以思想领域内阶级斗争为指导思想，以知识分子为批斗对象，以大鸣大放、“引蛇出洞”、“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一棍子打死与戴帽子为策略、方式和方法，以防止或避免中国出现类似“匈牙利事件”为目标，以期达到从思想意识领域内夺回或收回党的部分领导权为目的的一场思想政治运动。这场运动是新中国成立后针对知识分子的一系列思想政治运动的继续和发展，是毛泽东犯“左”倾错误的开始。邓小平也承认：“1957年开始有一点问题了，问题出在一个‘左’字上”，后又承认：“从1957年下半年开始，实际上违背了八大路线，这一‘左’，直到1976年，时间之长，差不多整整20年。”¹这就是说，自1957年开始，毛泽东就犯了“左”倾错误、违背了八大路线，直到他去世。“四人帮”垮台后，于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才从基本上纠正了“左”倾错误。

自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在恢复国民经济和社会建设中发动了一系列政治运动，在意识形态领域发动了一系列思想政治批判运动。我们这一代人（当时二十岁左右）就是在这些运动中渡过的。当时还不理解这些运动的作用，后来才慢慢懂得它的作用。这些运动对新生政权起到了巩固的作用，对共产党、毛泽东起到了巩固和绝对领导地位的作用。政治运动对被镇压的对象起到了个威慑和被专政的作用。思想政治批判运动对被批判的人来说起到了充当反面教员的作用，对知识分子来说起到了夹着尾巴做人和做驯服工具的作用。政治运动也好，思想批判运动也罢，对广大人民群众来说起到了思想上服服帖帖，党说什么就说什么，党叫干什么就干什么，党指派到那儿就到那儿起作用。但是，由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取得成绩的同时，也出现一些问题，尤其是苏联东欧出现一些问题，直接影响了中国人民，更影响了毛泽东和知识分子。于是，毛泽东开始探索解决问题的方法，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采用整风。在这次整风中，毛泽东开始发扬民主，广开言路，主动邀请知识分子帮助党整风，请他们鸣放，待鸣

¹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36、253—254页

放出一些毛泽东认为是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时，立即进行反击，于是发动一场反右派运动，给近百万人戴上右派分子帽子，把他们送去劳改、劳教、监督劳动、劳动观察等处分，让他们充当反面教员长达二十多年。

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给1957年反右派斗争做出了政治结论，决议指出：1957年“在全党开展整风运动，发动群众向党提出批评建议，是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正常步骤，在整风过程中，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乘机鼓吹所谓‘大鸣大放’，向党和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放肆地发动进攻，妄图取代共产党的领导，对这种进攻进行坚决的反击是完全正确和必要的，但是反右派斗争被严重地扩大化了，把一批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和党内干部错划为‘右派分子’造成了不幸的后果”。¹这是二十多年前做出的政治结论，现在作为一庄“冤假错案”有必要做进一步的探讨与研究。

众所周知，反右派斗争是建国后继胡风冤案又制造的一起重大冤假错案，是国史中的一个重大事件，人们当然不会忘记，亲身受害者更加难以忘怀。所以，社会上不少有识之士、学者、专家、受反右派斗争之害的幸存者、右派的后代对反右派斗争进行了一些资料收集、整理、研究与探讨，国内学术界出版了不少专著、文集汇编，报刊上还发表了大量文章和报道。境外也出版和发表了具有较多数量和较高质量的反右派斗争专著和文章。所有这些，对探讨反右派斗争都是十分有益的。

笔者试图在上述研究反右派斗争成果的基础上进行一些探讨。邓小平指出：“‘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中国吃了苦头，中国吃苦头不只这十年，这以前，从1957年下半年开始，我们就犯了‘左’的错误，总的来说，就是对外封闭，对内以阶级斗争为纲，忽视发展生产力，制定的政策超越了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²笔者认为这段讲话切中反右派斗争要害，将遵照这一指导思想，着重探讨1957年整风的性质，探讨右派与反右派的是非对错问题，探讨反右派斗争犯错误的原因及其根源、严重后果等。

探索按照历史唯物主义原则，辩证唯物主义的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方法，力求遵守观点与史料一致的准则，恪守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力争做到客观、公正、理性的学风。在资料使用上，尽量较

¹《三中全会以来》下册，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805页

²《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69页

多引用毛泽东及当时或后来主要领导人著作、文章、讲话、指示、回忆录等，以及受害者的回忆，也吸取和引用近些年来许多专家学者对反右派斗争的研究成果。总之，以翔实的史料再现和反思那段历史。

全书贯穿着一条基本主线，那就是毛泽东恩赐有限民主、自由和改革开放的观点，仍具有反封建专制残余的作用，而知识分子则是反封建专制残余的主力军。然而他发动反击右派运动，实际上是收回有限民主、自由和改革开放的思想，为个人专制独裁扫清了障碍。毛泽东及其追随者、风派人物和反右积极分子则是反击右派，维护封建专制残余的主要力量。

全书除前言、结束语外，共分五章。

第一章反右派斗争的前奏。探讨了毛泽东以“左”的面目出现来批评党内高层的“右倾”思想，由此给党内高层留下了祸根，以后爆发出来。毛泽东发动的批判运动培养了秉承上级旨意，专靠大批判过日子的一批“理论”骨干，造就了一批察言观色、投其所好，见风使舵的投机分子和两面派人物，还训练了一批素质低下，盲目听指挥，敢于冲锋陷阵，抱有各种政治私心杂念的积极分子和爆破手。毛泽东在这一系列思想政治批判运动中犯下了程度不同的“左”倾教条主义、“左”倾空想社会主义和民粹主义倾向的错误，反右派斗争只不过是这些错误的继续和发展。

第二章反右派斗争的背景和由来。叙述了苏共二十大的改革思想、斯大林的错误、波匈事件以及国内出现不安定的因素，毛泽东为斯大林罪行进行辩护和片面地吸取“匈牙利事件”的教训。毛泽东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大张旗鼓宣传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讲话的精神，采用整风办法来纠正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以此避免中国出现类似“匈牙利事件”。毛泽东主动邀请党外人士帮助整风，决心用“引蛇出洞”的策略，让党外人士大鸣大放，待鸣放到超过规定的底线，便发动一场反击右派的运动。

第三、四章反右派斗争。描述反右派斗争的全过程，探讨了毛泽东发出反击右派的动员令，指示公开发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当作反右的思想武器，亲自撰写社论，动员、授意左派人士写表态文章、答记者问，亲自撰文指挥主攻右派头目及其骨干，发出深入挖掘右派的指示，提出反右补课，建议处理右派的一整套方针、政策和策略。要求各级党委坚决贯彻，否则，轻者扣上思想右倾、立场不稳，重者戴上右派帽子，同时授意、发动左派

民主人士、积极分子对右派进行“残酷斗争、无限打击”的手段贯彻全过程，然后对右派分子进行组织处理。这样，上有“左”的指导思想、“左”的政策，中有各级党委坚决贯彻执行，下有基层党支部发动群众积极分子的冲锋陷阵，上中下三结合使反右派斗争犯了“左”倾错误，造成建国后又一起冤假错案。

第五章反右派斗争所犯错误及其后果与根源。描述对右派定性、定量、组织处分等一系列过“左”的错误表现，探讨了反右派斗争的后果和影响，毛泽东违背八大路线，改变了国内主要矛盾重新回到以阶级斗争为主的老路上去。反右派斗争总结出的一整套错误经验对以后的政治生活产生深远影响，最后酿成文化大革命的浩劫。探讨犯反右派错误的原因与根源。讲到犯反右派错误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最主要的是毛泽东个人专制独裁的作风和行为起决定性作用，其次是党的各级大小领导人的盲目紧跟、家长制式人物的一言堂和素质低下的报复意识起了很大作用等。谈到犯反右派斗争错误的根源更是复杂的，其中最主要是受皇权专制主义遗毒和宗法思想的严重影响，其次是受斯大林模式及其教条主义的重大影响等。

探讨过去是为了面向未来。希望未来领导人继续发扬社会主义民主，以发展社会生产力为主要任务，使我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国防等综合国力得到长足进步和提高，维护国家的安定与团结，让人民过上幸福的生活。只有这样才能不辜负历史的重托，全国人民的期盼，同时也可以告慰冤假错案中受害者的心灵和冤死者的亡灵。

目录

前言 (1)

第一章 反右派斗争的前奏 (1)

第一节 批判党内的“右倾”观点 (1)

- 一、批判刘少奇的“右倾”观点 (1)
- 二、批判农业合作化的“右倾”观点 (11)
- 三、批判其他战线上的“右倾”思想 (19)

第二节 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一】 (27)

- 一、电影《武训传》批判 (27)
- 二、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批判 (36)
- 三 对胡适思想批判 (45)

第三节 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二】 (59)

- 一、批判梁漱溟的“反动思想” (59)
- 二、批判胡风的文艺思想 (71)
- 三、揭露胡风“反革命集团” (80)

第二章 反右派斗争的背景和由来 (92)

第一节 苏联、东欧和我国出现的新情况 (92)

- 一、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召开 (92)
- 二、波、匈事件的产生及其影响 (103)
- 三、国内出现不安定的因素 (111)

第二节 毛泽东的两类矛盾学说 (125)

- 一、两类矛盾学说的酝酿与形成 (125)
- 二、宣传《讲话》精神 (141)
- 三、“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口号 (158)

第三节 整风运动 (178)

- 一、整风运动的提出 (179)
- 二、鸣放的形式 (190)
- 三、鸣放中的各种意见与建议 (198)

第四节 从整风到准备反右 (217)

- 一、准备反右 (218)
- 二、“引蛇出洞”的策略 (237)
- 三、反击右派的信号和导火线 (246)

第三章 反右派斗争【上】 (257)

第一节 开始反右 (257)

- 一、部署反右 (257)
- 二、揭批右派言论初步 (264)
- 三、反击右派的思想武器 (282)

第二节 “歼灭性打击”右派头目及骨干【一】 (293)

- 一、毛泽东部署打击、孤立右派的重大举措 (293)
- 二、主攻“章罗同盟” (305)
- 三、打击章罗为首的右派集团 (316)

第三节 “歼灭性打击”右派头目及骨干【二】 (331)

- 一、打击与“章罗同盟”有关的右派骨干 (331)
- 二、打击民革中的右派骨干 (340)
- 三、狠揭猛批民建、工商联中的右派头目 (349)

第四章 反右派斗争【下】 (363)

第一节 深入反右 (363)

- 一、毛泽东部署深入反右 (363)
- 二、深挖文艺界的“反党集团” (378)
- 三、深挖省部级“反党集团” (384)

第二节 反右接近尾声 (396)

- 一、迟到的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 (396)
- 二、毛泽东部署全民整风和处理右派 (402)
- 三、“反右补课” (417)

第三节 反右结局 (427)

- 一、右派改正的背景 (428)
- 二、落实右派改正工作 (440)
- 三、评价反右派斗争 (462)

第五章 反右派斗争所犯错误及其后果、原因和根源 (475)

第一节 反右派斗争所犯严重错误 (475)

- 一、右派定性上的严重错误 (475)
- 二、右派定量上的严重错误 (483)
- 三、右派摘帽、甄别上的“左”倾错误 (494)

第二节 反右派斗争的深远影响 (507)

- 一、遏制积极因素的发挥 (507)
- 二、党的优良作风开始下滑 (522)
- 三、理论上形成的失误 (529)

第三节 反右派斗争犯错误的原因 (542)

一、直接现实原因 (543)

二、间接深层原因 (564)

三、理论认识上的原因 (582)

第四节 反右派斗争所犯严重错误的根源 (592)

一、放松对党史上犯“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的警惕性 (592)

二、受国外教条主义的影响 (602)

三、受封建主义的影响 (627)

结束语 (640)

后记

第一章 反右派斗争的前奏

建国初期，在中央人民政府和全国人民的努力下，仅仅三年时间，国民经济得到迅速恢复，财政经济状况有了根本好转，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土改”、“镇反”、“三反五反”，思想改造等政治运动都相继完成。在这样的情况下，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考虑如何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问题，于是提出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要在10—15年或更长时间内，基本上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本来预计10—15年完成的社会主义改造任务只用了三年多一点时间提前完成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人运用政权力量过早地结束新民主主义，过急地步入社会主义社会。毛泽东等领导人认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是当时的主要矛盾，提出让资本主义、小生产绝种，认定知识分子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同时，配合完成过渡时期总路线的任务，先在党内批判“右倾”观点，接着批判资产阶级唯心论，发动肃清“反革命集团”运动。1957年所进行的反右派斗争是这些思想政治批判运动的继续、延伸和发展。

第一节 批判党内的“右倾”观点

随着国民经济的迅速恢复和民主革命遗留问题的基本解决，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提到议事日程上来。毛泽东开始考虑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的问题，同时开始批判党内所谓离开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右倾”观点，清算党内高层持不同意见的人。

一、批判刘少奇的“右倾”观点

毛泽东首先批判了刘少奇等人提出的“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等右倾机会主义观点。

1953年6月15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中提出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他说：“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10年到15年或者更多一些时间内，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条总路线是照耀我们各项工作的灯塔。不要脱离这条总路线，脱离了就发生‘左’倾和右倾的错误。”并批评说：“有人在民主革命成功以后，仍然停留在原来的地方。他们没有懂得革命性质的转变，还在继续

搞他们的‘新民主主义’，不去搞社会主义改造。这就要犯右倾的错误。”¹

他还用以下三句话来指出了右倾的表现：其一，“‘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这种提法是有害的。”“所谓‘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怎样‘确立’？要‘确立’是很难的哩！比如私营工商业，正在改造，今年下半年要‘立’一种秩序，明年就不‘确’了。农业互助合作也年年在变……。‘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的想法，是不符合实际斗争情况的，是妨碍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的。”其二，“‘由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这种提法不明确。走向而已，年年走向……走向就是没有达到。这种提法，看起来可以，过细分析，是不妥当的。”其三，“‘确保私有财产’。因为中农怕‘冒尖’，怕‘共产’，就有人提出这一口号去安定他们。其实，这是不对的。”²

8月12日毛泽东在《反对党内的资产阶级思想》一文中说：“为了保证社会主义事业的成功，必须在全党，首先在中央、大区和省市这三级党政军民领导机关中，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倾向，即反对党内的资产阶级思想。”同年10月、11月毛泽东批评说：“‘确保私有财产’、‘四大自由’，都是有利于富农和富裕中农的。”“‘确保私有’是资产阶级观念。”又说：“批评薄一波就是批评他离开总路线的错误。”³1955年10月、11月，他批评“四大自由”，“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是资产阶级的纲领，是反二中全会决议的，提出这样的口号，是纲领性的错误。⁴

毛泽东指责“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由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确保私有财产”等为“右倾”观点是没有经过集体讨论，由他“个人拍板决断是非，并对不同意见无端上纲的做法，既有悖于党的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又使党内怀有个人野心的人有隙可钻。”⁵可见毛泽东个人专断党内重大原则问题从1953年就开始了。

¹ 《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81-82页

²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81-82页

³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94、117、120、122页

⁴ 参见《毛泽东思想万岁》1949年10月—1957年卷，第76页

⁵ 参见郭德宏主编《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第2卷，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01页

关于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含义，时任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秘书长杜润生回忆说“‘巩固论’据说是批刘少奇，这种说法确有人有这种主张，主席当时是借题做文章，教育大家，没有明确是针对谁说的。这以后，毛主席又召我们见了一面，把问题讲得更明白了。他说：现在我们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总路线含义是什么？总路线就是过渡到社会主义。什么叫新民主主义？新民主主义就是在桥上，就是过桥，不是跳出去，要一步一步走过去。说由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这个提法不准确。意思是说新民主主义就是过渡时期，我们原来认为，新民主主义是一个‘阶段’，是五种经济并存的一种相对稳定的社会形态。因而不是在民主革命成功后立即就开始对非国营经济成分加以削弱。”¹从毛泽东会见杜润生的谈话看出，总路线是对生产资料私有制实行社会主义改造，过渡到社会主义。这个社会主义是以苏联为榜样的，生产资料单一公有制和统一的计划经济为基本特征的社会主义。但在贯彻总路线中，党内出现不同意见，毛泽东首先不点名的批评上述三种观点。当时只限于党内高层，影响范围不大，但潜伏着严重隐患，后来逐渐爆发出来。

毛泽东批判刘少奇等人的“右倾”观点的思想，来源于他自己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论人民民主专政》，以及由他主持下通过的《共同纲领》等著作、报告中的论点。现在援引毛泽东著作中有关的论点如下：

1939年12月，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关于“中国革命的前途”一节中指出，“在革命胜利之后，因为肃清了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上的障碍物，资本主义经济在中国社会中会有一个相当程度的发展，是可以想象得到的，也是不足为怪的。资本主义会有一个相当程度的发展，这是经济落后的中国在民主革命胜利之后不可避免的结果。……中国革命的全部结果是：一方面有资本主义因素的发展，又一方面有社会主义因素的发展。”²在这里，毛泽东允许、肯定民主革命胜利后，资本主义因素、资本主义经济有一个相当程度的发展，而且还认为是可以想象得到的，是不足为怪的，也是符合中国国情的认识。

¹ 摘自杜润生《忆50年代初期我与毛泽东主席的几次会面》，见韩泰华主编《中南海开始决策》1949-1956》，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178页

²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版，第621页

1940年1月，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演讲中说：“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国营经济是社会主义的性质，是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力量，但这个共和国并不没收其他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并不禁止‘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这是因为中国经济还是十分落后的缘故。”¹在这里，毛泽东明确规定，“不没收其他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不禁止‘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这就是说，保护私有财产和允许“不操纵国民生计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其原因是中国经济还十分落后，这是完全正确的认识。

1945年4月24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即《论联合政府》报告指出：“有些人怀疑中国共产党人不赞成发展私人资本主义，不赞成保护私有财产，其实是不对的。我们主张的则正是能够自由发展那些不是‘操纵国民生计’而是有益于‘国民生计’的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保障一切正当的私有财产。”接着指出：“只有经过民主主义，才能达到社会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天经地义，而在中国，为民主主义奋斗的时间还是长期的。”²这里，毛泽东在政治报告中一再肯定让有益于国民生计的私人资本主义的发展，保护一切正当的私有财产，并且认为，为民主主义奋斗是长期的。

1947年10月26日，毛泽东在《对待自由资产阶级防止过左倾向》中认为，自由资产阶级“还将有他们的代表参加政府，以便使群众从经验中认识他们特别是其右翼的反动性，而一步一步地抛弃他们。在经济上，则将在长时间内容许他们存在，并使他们的经济在政府法令许可下有一个一定程度的发展，以利经济恢复与发展。对于在平分土地后生长出来的新富农也是如此。在这个问题上的过左性急，是错误的”。³

12月，毛泽东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报告中认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所要消灭的对象，只是封建主义和垄断资本主义，只是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大资产阶级），而不是一般地消灭资本主义，不是消灭上层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由于中国经济的落后性，广大的上层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所代表的资本主义

¹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49页

²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1081-1083页

³ 《毛泽东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312页

经济，即使革命在全国胜利以后，在一个长时期内，还是必须允许它们存在；并且按照国民经济的分工，还需要它们中一切有益于国民经济的部分有一个发展；它们在整个国民经济中，还是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对于上层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的经济成分采取过左的错误的政策……是绝对不许重复的。”¹在这里，毛泽东认为，即使在取得革命胜利后，在一个长时期内，允许上层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所代表的资本主义经济的存在与发展。

1949年3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重申：“由于中国经济现在还处在落后状态，在革命胜利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还需要尽可能地利用城乡私人资本主义的积极性，以利于国民经济的向前发展。在这个时期内，一切不是于国民经济危害而是于国民经济有利的城乡资本主义成分，都应当容许其存在和发展。”接着指出：“对于资本主义采取恰如其分的有伸缩性的限制政策……。”认为“限制和反限制，将是新民主主义国家内部阶级斗争的主要形式。”²在这里，毛泽东重复允许资本主义经济存在和发展之外，还增加了“在革命胜利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利用“城乡资本主义的积极性”和“对于资本主义采取恰如其分的有伸缩性的限制政策”。³

6月，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指出：“为了对付帝国主义的压迫，为了使落后的经济地位提高一步，中国必须利用一切于国计民生有利而不是有害城乡资本主义因素，团结民族资产阶级，共同奋斗。我们现在的方针是节制资本主义，而不是消灭资本主义。”⁴在这里，他强调民族资产阶级的重要性，团结他们，利用他们有利于国计民生的资本主义因素。

1949年新中国成立的前夕，9月21日新政协召开时，通过起到临时宪法的《共同纲领》中的《总纲》规定：“……保护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经济利益及其私有财产，发展新民主主义的人民经济，稳步地变农业国为工业国。”在《共同纲领》有关《经济政策》中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建设的根本方针，是以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政策，达到发展

¹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254-1255页

²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32-1433页

³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33页

⁴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84页

生产、繁荣经济之目的。国家应在经营范围、原料供给、销售市场、劳动条件、技术设备、财政政策、金融政策等方面，调剂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农民和手工业者的个体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使各种社会经济成分在国营经济领导之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以促进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¹这是根据毛泽东的建国思想而制定的建设新民主主义社会的纲领，它允许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存在和发展，但必须在国营经济领导之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以促进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

1950年6月6日，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的书面报告写道：“我们对待富农的政策应有所改变，即由征收富农多余土地财产的政策改变为保存富农经济的政策，以利于早日恢复农村生产，又利于孤立地主，保护中农和保护小土地出租者。”接着又批评：“有些人认为可以提早消灭资本主义实行社会主义，这种思想是错误的，是不适合我们国家的情况的。”他在书面报告中作了说明：“民族资产阶级将来是要消灭的，但是现在要把他们团结在我们身边，不要把他们推开。”²

6月23日，毛泽东《在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的讲话》的《闭幕词》中说：“我们的国家就是这样地稳步前进，经过战争，经过新民主主义的改革，而在将来，在国家经济事业和文化事业大为兴盛后，在各种条件具备了以后，在全国人民考虑成熟并在大家同意了以后，就可以从容地和妥善地走进社会主义的新时期。”³

以上所引证的都是毛泽东有关新民主主义理论、新民主主义制度体系等中的观点。也就是说，刘少奇的新民主主义的观点，继续搞新民主主义社会是来源于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刘少奇的解释和发挥，从基本原则问题没有背离毛泽东的理论、方针和政策。而在非原则问题上存在某些不一致，或存在某些分歧，这也是很正常的。根本不是什么“右倾”观点。只能说五十年代的毛泽东违背或抛弃了四十年代和五十年代开始时自己的思想。从过渡时期总路线开始，毛泽东在指导思想，开始犯“左”倾教条主义、“左”倾空想社会主义的错误，同时也犯了不经过资本主义发展而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的民粹主义倾向，这是毛泽东犯

¹ 《世界宪法全书》，青岛出版社1997年版，第70-71页

² 《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18-19、23页

³ 《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80页

左倾错误的总根源。

1948年9月8日至13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西柏坡召开，刘少奇在会上作了《关于新民主主义的建设问题》的报告，12月25日，他又在华北财经委员会的会议上作了《新中国经济建设的方针与问题》的报告。这两个报告的中心思想是，民主革命胜利后，不能马上直接采取社会主义的实际步骤，提出关于巩固新民主主义的构想。他说：“过早地采取社会主义的政策是要不得的。”“过早地消灭资本主义的办法，则要犯‘左倾’的错误。”¹毛泽东表示赞同他的观点。

为什么不能过早采取社会主义的政策呢？其理由是：

第一，条件不成熟。刘少奇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认为，从五种经济成分看，国营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比重是很少的，顶多占10-20%。毛主席插话认为，连资本主义工业在内，整个近代机器工业的生产量顶多占10-20%，光是国营经济还不会有这么多。刘少奇认为正因为这一部分数量很小，困难就来了，为什么不能实行社会主义革命即由于此。

第二，搞社会主义就意味着实行公有制。刘少奇认为我们不要去套书本子，要从中国的实际的阶级关系出发。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和我们联合进行了反帝反封建的斗争，感情一直没有破裂。革命胜利后，我们的政权性质是新民主主义的，还要请民族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参加。因此，我们没有必要采取立即推翻资产阶级、取消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做法。

第三，还要利用资本主义工商业来发展经济。刘少奇认为，资本主义工商业在目前整个国民经济中，是一个不可缺少的部分，它的适当发展，对于国民经济也是有利的。对那些不危害国计民生的资本主义工商业还要允许其发展。为了建设新民主主义经济，我们与民族资产阶级至少可搭伙10至15年，如果过早消灭了，消灭了以后你还要把他请来的。

民主革命胜利后，需要一个过渡阶段。这个过渡性的特点，充满着矛盾和斗争，对资产阶级有限制和反限制的斗争；有过渡到社会主义还是过渡到资本主义的斗争。新民主主义经济既有社会主义因素，又有资本主义因素，“这是一种特殊的历史状态”，在新民

¹ 转引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47页

主义经济中，基本矛盾是资本主义经济成分与社会主义经济成分的矛盾。刘少奇主张通过“经济竞争”来解决，他认为，在这个竞争中，无产阶级手中有领导权，并且掌握了国家的主要经济命脉，是一定可以取得胜利的。但对小生产者必须采取最谨慎的政策。要通过合作社的形式去团结他们。合作社是劳动人民的集体经济，与国家经济相结合，建立同盟，走向社会主义。毛泽东对刘少奇的这些分析是基本肯定的，毛泽东还在总结发言里认为，新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问题，少奇同志的提纲分析很具体，很好，两个阶段的过渡也讲得很好，各同志回中央局后，对这点可作宣传。¹

1949年4、5月间，刘少奇在天津进行了一次调查研究，同干部、工人、职员、资本家座谈，发表了多次讲话。第一，强调在执行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制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过程中，最容易发生模糊的是，把民族资产阶级当作斗争对象，搞乱敌我阵线。民族资产阶级还不是我们今天斗争的对象，如果当作斗争对象，则是犯了错误。保护他们实际上就是保护生产。第二，批评在对待民族资产阶级的问题上出现的“左”倾情绪和行为时说，总之，只强调斗争的一面；不强调联合和利用，以利于发展生产的一面。这是一种只顾眼前利益，不顾长远利益的行为。第三，强调私营工商业在一定范围、一定时期内的发展，是新民主主义经济政策所允许的。他说，因为我们国家生产不发达，不是工厂太多，而是太少。对有益于国计民生的私营工商业要加以保护和允许其发展，对危害国计民生的投机、垄断行为一定要制止，要把商业投机资本引向生产型的工业企业。第四，设想经过一段新民主主义时期，工业逐步发展起来了，就非走社会主义的道路不可。

刘少奇天津讲话的基本精神是符合七届二中全会决议，是力图贯彻毛泽东的思想的。他的本意是要稳住民族资产阶级，保护和发 展民族工商业，迅速恢复和发展生产，建立新民主主义经济秩序。当时，华北局派人到各地择要传达刘少奇在天津所讲解的各个问题（毛主席同意的了）。²

毛泽东在过渡时期总路线中批判刘少奇（虽然没点名，实际上是批评刘少奇等人）的“右倾观点”三种表现，都需要重新认识，重新评估。

¹ 参见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第47-49页

² 参见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第49-54页

毛泽东批评“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这种提法是有害的；“由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这种提法不明确；“确保私有财产”这种提法不对。其实这些观点，或者说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新民主主义阶段、继续搞新民主主义这些提法都来源于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理论等一系列思想之中。毛泽东和刘少奇两人在原则的、大的问题上并没有根本的分歧，基本上是一致的。

但自从过渡时期总路线公布后，刘少奇等人放弃了新民主主义的构想，接受了过渡时期总路线的观点，接受了毛泽东的批评，同毛泽东一道为实现过渡时期总路线而斗争。仅用三年多的时间，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和私人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从此，中国步入了社会主义社会。

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上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评价三大改造时说：“到1956年，全国绝大部分地区基本上完成了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这项工作中也有缺点和偏差。在1955年夏季以后，农业合作化以及对手工业和个体商业的改造要求过急，工作过粗，改变过快，形式也过于简单划一，以致在长期间遗留了一些问题。1956年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基本完成后，对于一部分原工商业者的使用和处理也不很适当。”¹《决议》承认了三大改造中存在的偏差和问题，但真正问题是指导思想上的严重失误，具体说来，就是过早地抛弃新民主主义社会，过急进入社会主义社会。

于光远说：“在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的过程中，毛泽东把刘少奇作为主要对象进行批评。这种批评的实质是批评了毛泽东自己创立和在多年中有所发展的‘新民主主义社会论’。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标志着‘新民主主义社会论’正式放弃。”²薛暮桥说：“现在看来，社会主义改造总路线似乎提得太早。在经济十分落后的中国应当有一个较长的新民主主义时期，不宜匆匆忙忙消灭个体经济和私营企业。”³吴江说：“过早结束新民主主义阶段的弊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时，“当时中国共产党主动承诺中国目前不搞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还是长远未来的事，目前不宜提，目前还应

¹ 《三中全会以来》下册，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800—801页

² 于光远《从“新民主主义社会论”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85页

³ 《求实》，1989年第1期

当使民族资本主义有一个较大的发展，以帮助发展社会生产力。这无疑是一个正确的方针。”可惜，“不久即风云突变。1953年，中国共产党单方面宣布结束新民主主义阶段而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将私营企业经过公私合营收为国有，将原说的中国应使私人资本主义有一个较大的发展的诺言收回。同时内部通知：‘我们的人民民主专政即无产阶级专政。’就从这时起，由苏联搬来了计划经济体制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治体制。至此，所谓‘多党合作’也就名存实亡。这样做不仅搁置了民主革命和民主建设的历史任务，而且遏制了社会主义新因素在民主体制内生长。”¹

过早放弃新民主主义社会论之后，在毛泽东领导下进行了20多年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和达到预想的目的。中国仍然是个贫穷、落后的社会主义国家，其根本原因在于毛泽东对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指导思想上的严重失误，运用政权力量只抓生产关系中所有制的变革，只抓意识形态领域中的阶级斗争，忘记或认识不到社会主义的基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发展经济。实践证明，放弃新民主主义理论，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以及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是完全行不通的。待毛泽东逝世后的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恢复党的实事求是的传统，吸取犯“左”倾错误的经验教训，确定“一个中心（以发展经济为中心）两个基本点（改革开放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作为党的基本路线。这条党的“基本路线要管100年，动摇不得”。²这条基本路线实际上是新民主主义理论的继续和发展。

历史证明，刘少奇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的观点是正确的。比如，他说，“过早地采取社会主义政策是要不得的”。“过早地消灭资本主义，则要犯‘左’倾的错误”。毛泽东当时同意这些观点，可是毛泽东还是放弃了新民主主义社会，过早地采取社会主义政策，过早地消灭资本主义，结果，毛泽东犯了“左”倾错误。刘少奇还说，我们和民族资产阶级至少“可搭伙10年至15年”，如果过早地消灭了，“消灭了以后你还要把他请来的”。毛泽东提前12年就不同民族资产阶级搭伙，提前消灭了。而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领导集体把发展资本主义经济作为一项重要政策，并把民族资产阶级

¹ 参见吴江《社会主义前途与马克思主义的命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66-267页

²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0-371页

代表人物请回来，当经济顾问，参加政府，并担任国家领导人，为社会主义建设出谋献策。这表明刘少奇“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思想的远见卓识。可惜，刘少奇并没有坚持他的观点，受到批评后就放弃了，这是时代的局限，不能苛求前人。

毛泽东对刘少奇观点的批评，错误在于脱离当时中国的实际，片面强调阶级斗争，受空想社会主义的影响。出于政治需要，接受列宁过渡时期的理论，照搬斯大林的模式，想早日使苏联的今天成为我们的明天，迫切希望使中国真正独立、富强和现代化，所以急于求快，急于求成，急于求纯。毛泽东批评刘少奇的新民主主义制度观点是错误的，抛弃新民主主义社会，过早进入社会主义则是更错。刘少奇挨批评后放弃新民主主义也是错误的，真正受损害的是中国人民，知识分子首当其冲，右派分子最为不幸，成为“左”倾错误的牺牲品。毛泽东批评刘少奇，是建国后他犯一系列错误的开端，最终不仅使刘少奇，也使自己落得悲惨的结局。总之，毛泽东、刘少奇两人都没有解决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实践相结合的问题，而这一重任最后落到邓小平等第二代领导人的肩上。

二、批判农业合作化的“右倾”观点

毛泽东一向关心农民、农业生产和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用很大的精力去抓总路线中的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同时与背离农业互助合作化运动各种错误思想进行斗争，也就是说，在农业互助合作化过程中批判“右”的思想，其中主要是批判邓子恢等人的“右倾”观点。

首先，在关于整顿与巩固农业生产合作社问题上，作为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的邓子恢，坚决贯彻执行1955年1月10日，经过政治局通过，由刘少奇签署发出的《关于整顿和巩固农业生产合作社的通知》精神，他主要负责整顿、巩固浙江的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工作。3月下旬，邓子恢和中共中央副秘书长、中央书记处第二办公室主任谭震林，邀请浙江省委书记江华共同研究了关于整顿和巩固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具体意见，于25日以中央农村工作部的名义，用电报发给浙江省委。电报摘要如下：

“据已知材料，……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发展过猛，步子迈得过大过急”。“据此，特建议你们对合作社数量分别地区实行压缩，有条件巩固的必须加以巩固，无条件巩固的，应主动有领导地转回互助组或单干经营，能够巩固多少算多少，不要勉强维持虚假成

绩”。“正确的方针只能是：有条件办好的一定争取办好，不可冒进；没有条件办好的，应打通基层骨干办社积极分子的思想，……一道领导好退社的农民进行生产，无论他们是退回互助组或个体经营，都应该把他们的生产搞好，保持良好关系，不伤感情，为将来办好合作社而努力”。“估计你们在加强了领导的条件下，能巩固好三万个社，保持百分之十以上的农户在自愿基础上继续合作下去，虽然走了一段曲折的道路，但应承认是很大的收获，而不是什么是失败”。

电报发出后，派农村工作部秘书长杜润生等去浙江解释电报精神，向浙江整顿和巩固合作社的工作提出：“除全面端正自愿、互利政策外，需要实行一个全力巩固，坚决收缩的方针。”¹经过一个多月的工作，浙江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压缩到一万多个，而其中的大部分转成互助组。

其次，关于农业合作化发展速度问题。1955年6月14日，刘少奇主持政治局会议，听取邓子恢关于第三次全国农村工作会议情况的报告，研究下年度发展农业合作社的控制指标和指导方针。会议认为，我们的方针是：“要把现有的社巩固起来，……预期在1956年秋收前全国达到100万个农业合作社，在合作化的工作中必须坚持贯彻自愿和互利的原则。”²100万个合作社指标是中央农村工作部的建议，刘少奇说，发展到100万个以后就关一下门。这个指标是政治局同意的。

邓子恢在第三次全国农村工作会议上表述的观点是：“社会主义革命是一个长期的斗争，像中国这样一个没有工业基础的国家，按原计划做到15年实现农业合作化就不错了”，搞合作化，“农民入了社，生产资料虽仍属他所有，可以取得报酬，但他已不能自由支配，他把赖以生计的全家财产交给你，你不能把社办好，至少当家的农民会睡不着觉，这是唯物主义。农民的社会主义觉悟主要靠眼睛看，不是光靠耳朵听，不从物质基础上去看农民的社会主义觉悟，就有点唯心主义了”。“办合作社要发展一段，巩固一段，不要连滚带爬地往前进；连滚带爬地往前进，就会要擦屁股，而且越擦越多。当前一个时期只宜大量的兴办初级形式的合作社，维持土地所有权和土地分红”。

¹ 转引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第332-335页

² 转引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第342页

6月下旬，毛泽东从外地回京，约邓子恢谈话，毛泽东提出，下年度农业生产合作社发展到达一百万个，同现有的65万个比较，似乎少了一些，应增加到130万个左右合作社。邓子恢坚持认为还是维持100万个比较好。其四点理由有，第一，整个合作化运动应与工业化进度相适应。第二，现有的65万个社的问题很多，巩固工作很繁重，如果发展过快，可能使发展和巩固两方面都受影响，还影响农业生产。第三，1955年至1956年，主要是打好基础，为1957年实现三分之一的农户入社和以后全盘合作化打好基础。第四，他还向毛泽东谈到苏、匈两国农业合作化过急的教训。

由于邓子恢对浙江农业生产合作社采取“坚决收缩”的方针，以及他在会议上发表的观点，尽管这些观点和做法经过中共中央政治局同意，刘少奇批准，但仍然受到毛主席的严厉批评。¹

1953年6月15日，毛泽东在《批判离开总路线的右倾观点》的讲话中，批判右倾表现，其中批判了“确保私有财产”。“因为中农怕‘冒尖’，怕‘共产’，就有人提出这一口号去安定他们。其实，这是不对的”。10月、11月，毛泽东在《关于农业互助合作的两次谈话》中再次批评“确保私有财产”、“四大自由”，认为这两个口号“都是有利于富农和富裕中农”，都“是资产阶级观念”。²毛泽东的批判虽然没有点名，但主要是针对刘少奇等人“还在继续搞他们的‘新民主主义’，不去搞社会主义改造”的观点而发的。

据时任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秘书长杜润生回忆：“批评‘四大自由’（即雇佣、借贷、租佃和贸易的自由）是指邓子恢”。毛泽东对农村工作部的负责人说，“农民是小资产阶级，富裕农民走上社会主义不一定是自愿的。我们国家叫人民民主专政，实际是无产阶级专政，这里面就有改造农民的任务。”“共产党必须一贯坚持搞好工农联盟，但建立联盟的基础，过去靠民主革命土地革命，今后要建立在新的基础上，这个新基础，就是社会主义，就是合作化。”³在这时，已经蕴含着对富裕农民要实行强制性的改造手段。

1955年7月31日，毛泽东在《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

¹ 转引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第342-345页

² 《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82, 117, 120页

³ 杜润生《忆50年代初期我与毛泽东主席的几次会面》，载韩泰华主编《中海开始决策1949年-1956年》，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178页

中，批评了邓子恢关于农业合作化的观点。他说：“在全国农村中，新的社会主义群众运动的高潮就要到来。我们的某些同志却象一个小脚女人，东摇西摆地在那里走路，老是埋怨旁人说：走快了，走快了。过多的评头品足，不适当的埋怨，无穷的忧虑，数不清的清规和戒律，以为这是指导农村中社会主义群众运动的正确方针。否，这不是正确的方针，这是错误的方针。”

他严厉地批评“坚决收缩”的方针时说：“浙江由于采取所谓‘坚决收缩’的方针（不是浙江省委决定的），一下子就从五万三千个合作社中解散了一万五千个包括四十万农户的合作社，引起群众和干部的很大不满，这是很不妥当的。这种‘坚决收缩’的方针，是在一种惊慌失措的情绪支配下定出来的。这样一件大事不得中央同意就去做，也是不妥当的。”在批评这个“坚决收缩”方针错误立场时说：“他们老是站在资产阶级、富农、或者具有资本主义自发倾向的富裕中农的立场上替较少的人打主意，而没有站在工人阶级的立场上替整个国家和全体人民打主意。”他把“下马”、“上马”之争提高到两条路线的分歧的高度：“有些同志，从资产阶级、富农、或者具有资本主义自发倾向的富裕中农的立场出发，错误地观察了工农联盟这样一个极端重要的问题。他们认为目前合作化运动的情况很危险，他们劝我们从目前合作化的道路上‘赶快下马’。他们向我们提出了警告：‘如果不赶快下马，就有破坏工农联盟的危险’。我们认为恰好相反，如果不赶快上马，就有破坏工农联盟的危险。这里看来只有一字之差，一个要下马，一个要上马，却是表现了两条路线的分歧。”¹

10月11日，毛泽东在中共七届六中全会上的结论中，提出：“就是要使……资本主义绝种，小生产也绝种。在这方面，良心少一点好。……使资产阶级、资本主义在六亿人口的中国绝种，这是一个很好的事情。”并点邓子恢的名说，¹“首先是邓子恢同志犯了错误。他这一次所犯的错误，性质属于右倾的错误，属于经验主义性质的错误。”“过去邓子恢同志有过依靠商人（就是依靠资产阶级）和‘四大自由’这种纲领性的提法，那是错误的，确实是资产阶级性质的纲领，资本主义性质的纲领，不是无产阶级性质的纲领，

¹《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168、174、183、186-187页

是违背七届二中全会限制资产阶级的决定的。”¹看来毛泽东是把邓子恢的问题与刘少奇的“右倾”观点联系在一起的，这次批邓子恢，实际上是批判刘少奇等人的“右倾”观点的继续和发展。

毛泽东和邓子恢在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发展和整顿方向、趋势的看法是一致的。两人主要分歧在于发展速度上。

早在1953年，邓子恢就提出互助合作运动要根据生产需要，逐步前进，决不能单凭主观要求，否则就达不到增产的目的。1955年又认为，农业合作化的目的是发展农业生产，保证国家和人民的需要，这是主要目的。邓子恢等对浙江省委的建议，采取‘坚决收缩’的方针也好；对全国农业合作化发展速度问题，即控制在100万个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数字，主张小发展也好，其着眼点都是保障农业生产合作社切实增加生产。所谓这些“坚决收缩”的方针，旨在控制发展速度。从当时和后来事实证明，他的这些意见和观点都是正确的，并没有犯原则性、方向性的错误。即使有错误，也是工作中的某些提法不妥而已，根本不是什么“右倾”错误。

毛泽东批评邓子恢等人犯了“右倾”错误，把邓子恢对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指导方针“称为右倾机会主义的方针”。历史证明毛泽东是错误的。

1981年3月9日，中共中央办公厅转发了国家农委党组《关于为邓子恢同志平反问题的请示报告》指出：经查实，浙江省1955年整顿、巩固农业生产合作社工作，收到了较好的效果，实践证明，这种处理是符合群众要求的。对不该收缩的也收缩了一些，这是在具体执行中的缺点错误。同月党中央批准了国家农委党组的报告，肯定邓子恢坚持按政治局1955年6月14日会议批准的（100万个）计划是对的。²事实证明，毛泽东批判邓子恢的观点是错误的。

1955年11月11日，毛泽东在党的七届六中全会上的结论中指出：“农业合作化使我们在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基础上”“巩固了同农民的联盟。这就会使资产阶级最后地孤立起来，便于最后地消灭资本主义”。“要使资本主义绝种”，“要使小生产也绝种”。毛泽东以阶级斗争的观点来看待和处理问题，他说，“拿过去一年的国内阶级斗争来说，我们主要‘进行反唯心论的斗争’，‘解决农业合作化的问题’”。这些问题，“都带着对资产阶级作斗争的性质，

¹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198、208页

² 转引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第355页

对资产阶级以严重的打击，并且在继续给他们以粉碎性的打击”。接着又说，“反唯心论的斗争……已经搞了一年，我们要把唯心论切实地反一下，准备搞三个五年计划”。¹上述这些观点，已经犯了“左”倾错误，特别是“要使资本主义绝种”、“要使小生产也绝种”、反唯心论的斗争要搞三个五年计划，以后真的“给他们以粉碎性的打击”。这些做法和提法则更是错误的，后遗症特别大。主要是埋下了工商业者、农民对执政党不满，使中国的商品经济、粮食生产上不去、发展不起来。致使农民生活水平原地踏步了二十多年，甚至倒退。

毛泽东在农业合作化运动中所犯错误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第一，急于求成，强行过渡。按照过渡时期总路线的要求，大约用15年左右时间完成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任务。邓子恢等按照总路线的要求。部署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工作，他强调客观条件，提出三条标准：生产需要；群众觉悟，即群众根据自己的切身体验，认识到合作社的优越性；干部的领导能力，因此，主张稳步前进和发展。

毛泽东则强调群众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性，认为这是加快农业合作化发展步伐的最大可能性，由此主张加快发展。因而他批评邓子恢不去利用群众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性，批评邓子恢强调的那些客观条件是清规和戒律。其实，我国是一个经济落后的农业大国，小生产像汪洋大海。在1955年，毛泽东提出“要使资本主义绝种，小生产也绝种”，这种急于消灭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急于将小生产者的个人所有制过渡到生产资料社会主义所有制，这种求急、求纯（公有制）的心情，反映广大劳动人民急于摆脱贫困，走富裕的生活道路的愿望，不过，这只是一个的愿望，实际生活是不可能做到的。可是，毛泽东不顾客观现实，严厉地批判邓子恢，使得各级党委和政府在规定合作化进度指标方面层层加码，任务下达到农村后，给暂时不愿入社的农民，在客观上形成一种很大的政治压力，不自愿也得“自愿”。所以，农民迫于政治压力，只好勉强加入合作社。同时还采用经济手段进行强制，像入股土地分红利不够交纳农业税，这就使得土地较多，土地质量好的上中农不得不交出土地，入社耕畜说是合理作价，分期偿还，实际上没有执行。这种严重违反自愿互利原则的政策，引起农民的不满，于是一次又一次进行所谓社会主义教育，从思想上教育农民，以平息农民的不

¹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198-199页

满情绪。原来设想用15年左右时间完成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任务，只用三年左右的时间就提前完成了。这种急于求成，急于求纯，强行过渡，使社会主义优越性在农业合作化后始终没有发挥出来。农业的社会主义合作化过程，实为农民的贫困化、灾难性和倒退开始的过程。

第二，无限上纲。邓子恢主张稳步发展、小发展是正确的，发展数字为100万个社，这是政治局批准同意的，邓子恢没有错误。毛泽东批判邓子恢的稳步前进、小发展速度是右倾保守思想，像小脚女人走路。由毛泽东主持七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农业合作化的决议》，把邓子恢对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指导方针定为“右倾机会主义的方针”。当时，只要与“右倾机会主义”挂上钩，就会联想到党内民主革命时期犯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人的结局，但邓子恢并没有错，而毛泽东认为稳步前进、小发展、100万个社不是他批准的就无限上纲为“右倾机会主义路线”，这是拿大帽子压人，压制不同的意见，是专制独裁的表现。

不仅如此，毛泽东还指责邓子恢总是站在资产阶级、富农、或者具有资本主义自发倾向的富裕中农的立场，替少数人打主意。这就是说把邓子恢从全体农民，首先是从贫农利益着眼考虑问题，说成是资产阶级利益，首先是富裕中农的利益在党内的代表人。这些做法都是无限上纲的表现。

第三，背离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原理。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原理，毛泽东是清楚的。为什么在实践中却背离了这个原理呢？关键在于他夸大了生产关系的反作用，而否定了生产力的决定作用。早1937年8月，毛泽东在《矛盾论》一文中说：“诚然，生产力、实践、经济基础，一般地表现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谁不承认这一点，谁就不是唯物论者。然而，生产关系、理论，上层建筑这些方面，在一定条件之下，又转过来表现其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这也是必须承认的。当着不变更生产关系，生产力就不能发展的时候，生产关系的变更就起了主要的决定的作用。”¹这个观点是他以后出现失误的总根源之一。

实际上，1955年，我国工业化刚刚开始，整个国民经济还很落后，人均国民收入只有129元（薄一波语）。毛泽东决定通过加快生产关系的改造，“要使资本主义绝种，小生产也绝种”，也就是把

¹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792页

生产资料私有制、生产资料个人所有制改变为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希望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实践结果，农业的生产力没有多大发展，农民生活没有多大改善，挫伤了农民的社会主义积极性，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总是发挥不出来。这是生产关系阻碍生产力发展的一种表现。

邓子恢遵照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原理，强调生产关系的改造一定要同生产力发展需要相适应，有利达到增加生产，提高农民生活水平为目的。他注意照顾中农包括富裕中农的利益，并不是从中农、富裕中农着眼，而是从全体农民，首先是从贫农的利益着眼。农业合作社生产搞得好不好，主要靠中贫农的团结，使贫农的劳动力和中农的生产资料以及他们的经营管理经验结合起来。邓子恢照顾和保护的是适合生产力发展水平的生产关系，他主张稳步前进、小发展，也是使生产关系的改造适应生产力发展水平。可是，毛泽东批评他站在“有资本主义自发倾向的富裕中农立场上”，进而引起批判富裕中农。这种批判，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劳动农民致富的积极性，许多农民怕变成富裕中农挨批判，这对发展生产力是不利的，不良后果相当严重。

第四，主观、片面的思想方法。“延安整风时，确立了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并在组织上也赋予毛泽东以最后决策权：1943年3月20日，推定他为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处主席时，同时规定：‘会议中所讨论的问题，主席有最后决定之权。’”¹这在当时，或许是必要的、合乎特定情况的。可是，国家进入和平建设时期，这种个人决断之权，应该说，已失去必要性。但是，毛泽东仍然习惯于使用这种个人最后决定之权。比如：1955年1月，《关于整顿和巩固农业生产合作社的通知》经政治局讨论后决定，由刘少奇签署发出；6月14日，由刘少奇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会议认为：“今后的一年内还是应当大发展。方针是：要把现有的合作社巩固起来，同时注意发展新社的工作，预期在1956年秋收前全国达到100万个农业合作社。”²在讨论时，刘少奇说，发展到100万个就关一下门。这就是100万个社的经过。毛泽东因事外出，回来后就约邓子恢等人谈话，两人发生争论。由于邓子恢坚持政治局的决定，不同意毛泽东的意见，于是毛泽东就批判邓，这不仅是批邓个人，

¹ 转引李锐《毛泽东的早年与晚年》，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89页

² 转引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第342页

同时也是推翻两次政治局会议的决定，实行他个人最后决定之权。毛泽东在《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讲话中，批评邓子恢等人执行中央的正确方针“是错误的方针”，“是在一种惊慌失措的情绪支配下定出来的”。他还提醒人们，“我们应当相信群众，我们应当相信党，这是两条根本的原理”。¹这就是要全国人民、全体党员只相信毛泽东，只相信毛泽东所依靠的“群众”，不要相信刘少奇主持下，经过政治局讨论决定的农业合作化的方针、政策。

1955年4-5月，毛泽东外出视察。从5月开始，他对农村形势的估计发生了重要变化，认为“农民生产消极，那时是少部分的。我沿途看见，麦子长得半人深，生产消极吗？”“所谓缺粮，大部分是虚假的，是地主、富农以及富裕中农的叫嚣”，是“资产阶级借口粮食问题向我们进攻”，农村工作部反映部分合作社办不下去，是“发谣风”。²

可见在《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和《农业合作化的一场辩论和当前的阶级斗争》两篇报告中，存在着不少主观专断、片面夸大的思想方法和作风。实践的结果，农民越来越穷，越来越不自由，合作化的优越性始终发挥不出来。

上述四方面的错误，不仅对当时的合作化工作产生了负面影响，而且对以后的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带来消极作用，产生深远的负面影响。

三、批判其他战线上的“右倾”思想

1955年农业合作化高潮中，毛泽东不辞劳苦，精心指导主编《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待该书出版时，他对田家英说“他非常高兴，1949年全国解放时，他都没有这么高兴过。”³这部书被称为推动中国农民跑步进入社会主义和指导农业合作化运动的“百科全书”。在这本书中，毛泽东继续批判邓子恢等人的观点，同时又批判其他战线上存在的“右倾保守思想”。

毛泽东在《高潮》一书“序言”中对邓子恢等人的批判更上了一个台阶。他批评说，“在我们党内，对于这个总路线的提法和时间的规定，从表面上看，大家都是同意的，但是在实际上是有不同意见的。这种不同意见，在目前，主要表现在关于农业的社会主义

¹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173、174页

² 转引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第371-372页

³ 程波《中共“八大”决策内幕》，中国档案出版社1999年版，第97页

改造即农业合作化的问题上”。“因为他们受了一些中农的影响”，“特别是有严重的资本主义倾向的富裕中农，在合作化的初期，对于社会主义改造这件事是有抵触情绪的”。“我们的一些同志不去从党的政策和工作方法上解决问题，听了富裕中农一叫，工作中又有一些偏差，就惊慌失措起来，大反其‘冒进’，动不动就要‘砍掉’合作社，好像如果不赶快割去这个毒瘤，人就会要死了似的”。

在《书记动手，全党办社》“按语”中，毛泽东批评又升级了，他说：“我们现在有理由向人们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这个地方可以这样做，别的地方就不可以这样做呢？如果说不可以，你们的理由在什么地方呢？我看只有一条理由，就是怕麻烦，或者爽直一点，叫做右倾机会主义。因此就是‘绕开社走’”。“所谓‘坚决收缩’，下命令大批地解散合作社的做法，也是‘绕开社走’的一种表现。”²在《这个乡两年就合作化了》一文按语中，毛泽东批评“右倾机会主义者”是瞎子，他说，“晚解放区，走到许多老解放区的前面去了……难道可以把他们拉回来吗？当然不能，机会主义者只有认输一法。群众中蕴藏了一种极大的社会主义积极性。那些在革命时期还只会按照常规走路的人们，对于这种积极性一概看不见。他们是瞎子，在他们面前出现的只是一片黑暗。他们有时简直要闹到颠倒是非、混淆黑白的程度。”³在《机会主义的邪气垮下去，社会主义的正气升上来》一文按语中，毛泽东批评“右倾机会主义者”是妖魔鬼怪。他说，1955年下半年几千万户的农民群众“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实行合作化……这是大海的怒涛，一切妖魔鬼怪都被冲走了。社会上各种人物的嘴脸，被区别得清清楚楚。党内也是这样”。《在合作化运动中，工人家属的积极性非常高》一文按语中，毛泽东批判“右倾机会主义者”是绊脚石，他说，“想要阻挡潮流的机会主义者虽然几乎到处都有，潮流总是挡不住的，社会主义到处都在胜利地前进，把一切绊脚石抛在自己的后头。”⁴在《长沙县高山乡武塘农业生产合作社是怎样从中农占优势转变为贫农占优势的》一文按语中，毛泽东提出谁最穷谁就是依靠的对象，他说：

¹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18-219页

²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26，225页

³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29页

⁴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33页

“合作社的领导机关必须建立现有的贫农和新下中农在领导机关中的优势……才能按照党的政策实现贫农和中农的团结，巩固合作社，发展生产，正确地整个农村的社会主义改造。”“这些同志认为，现在不应当提出依靠贫农或者建立贫农优势的口号，认为这种口号不利于合作化。我们认为这种意见是错误的。”同时，还提出了所谓“不是重新划分阶级成份”的阶级划分，毛泽东说，“在合作化过程中，我们必须注意：（一）现在还处于困难地位的贫农，（二）新中农中间的下中农，（三）老中农中间的下中农，这样三部分比较容易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人们，首先分批分期引导他们加入合作社……特别要注意从现有贫农和新下中农里面选择这种骨干分子。这不是在农村中重新来一次划分阶级成份的工作，而是在合作化的过程中，应当注意掌握的一种方针。”¹

上引诸“序言”和“按语”表明，毛泽东的批评逐步加温、升级，认为邓子恢等人是具有资本主义自发倾向的富裕中农的代言人，认为“在富裕中农的后面站着地主富农”。²这就是说，他把富裕中农推到富农、地主一边，那么，邓子恢等人就成为地主富农的代言人，成了“机会主义”瞎子，成了妖魔鬼怪，成了合作化的绊脚石。这些不是批评讲道理，而是谩骂、扣大帽子。这种批评太过分、太出格，远远超过党内斗争的范围，完全违反“与人为善”、“治病救人”的原则，邓子恢等人似乎成了“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对象。

同时看出，毛泽东不接受别人的意见，单纯按照农民对合作化的态度和经济富裕程度的差别，把农民划分三六九等，谁最穷就把谁当成依靠力量。在《报告》和《高潮》两著作中，毛泽东强调依靠贫下中农，树立贫下中农的优势。这实际上变动了原来“依靠贫农和中农的巩固联盟”口号，也为农村干部的选拔和结构规定了一条新原则（薄一波语）。这种划分和变动产生了负面影响和消极作用。

1955年9月、12月，毛泽东在《高潮》一书序言中第一次使用“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的提法，这不仅改变了“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³的提法，而且也改变了1953年12月总路线《宣传提纲》中

¹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39页

²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31页

³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89页

提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革命第一阶段基本结束和中国革命第二阶段开始。”“中国革命第二阶段的任务。就是要在 中国建立社会主义的社会，完全消灭城乡资本主义成分”¹的提法。依 1955 年《高潮》序言中的提法，过渡时期的起点是资本主义，这样就事实上否定了新民主主义这个相对独立的社会形态，或者说，毛泽东抛弃了自己的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这样就完全忽视了中国是经济文化相当落后的农业大国这个客观事实。这反映了毛泽东在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起点问题上的失误，可以这样说，这个失误是以后一切失误的总源头、总根源。

这一失误，在认识上夸大了中国是资本主义社会，不是新民主主义社会，既然起点是资本主义，搞社会主义就势必“要使资本主义绝种，小生产也绝种”，这样导致实践上要加快社会主义改造的步伐，首先要加快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步伐。这是失误的开始。

《序言二》中，毛泽东要求农业合作化急于过渡，要求其他战线加快速度和加快发展，他认为 1955 年的下半年中国的情况起了一个根本的变化。“几个月的时间，就有五千几百万农户加入了合作社。这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这件事告诉我们，只需要 1956 年一个年头，就可以基本上完成农业方面的半社会主义的合作化。再有三年到四年”，“就可以基本上完成合作社由半社会主义到全社会主义的转变。这件事告诉我们，中国的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也应当争取提早一些时候去完成，才能适应农业发展的需要。这件事告诉我们，中国的工业化的规模和速度，科学、文化、教育、卫生等项事业的发展的规模和速度，已经不能完全按照原来所想的那个样子去做了，这些都应当适当地扩大和加快。”²

接着，毛泽东对其他战线上的“右倾保守思想”的批判，他说：“现在提到全党和全国人民面前的问题，已经不是批判在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速度方面的右倾保守思想的问题。也不是在资本主义工商业按行业实行全面公私合营的速度方面的问题，这个问题也已经解决了。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速度问题，在 1956 年上半年应当谈一谈，这个问题也会容易解决的。现在的问题，不是在这些方面，而是在其他方面。这里有农业的生产、工业和手工业的生产、工业

¹ 《社会主义教育课程的阅读文件彙编》第一编上，人民出版社 1957 年，第 341-342 页

² 《毛泽东选集》第 5 卷，第 222-223 页

和交通运输的基本建设的规模和速度，商业同其他经济部门的配合，科学、文化、教育、卫生等工作同各种经济事业的配合等等。在这些方面，都是存在着对于情况估计不足的缺点的。都应当加以批判和克服，使之适应整个情况的发展……但是现在的问题，还是右倾保守思想在许多方面做怪……因此，不断地批判那些确实存在的右倾保守思想，就有完全的必要了。”¹这里表明，既然社会主义改造已经或正在发生根本性变化，那么，其他各行各业都需要与之适当扩大规模和加快速度，否则，就要批判各行各业的“右倾保守思想”。这里已经孕育着冒进的思想。

据薄一波回顾，《高潮》一书的出版，“就为正在召开或即将召开的全国计划会议、财政会议、基本建设会议等加了温，使1956年的经济建设中出现了冒进的偏向。”²主要是基建投资过多，生产指标过高，产品质量下降，经济比例出现不平衡。周恩来、陈云及时发现了问题，指出要稳步前进。党中央根据周恩来、陈云的建议，召开会议，提出在经济建设中既要反对右倾保守倾向，又要反对急躁冒进的倾向，确定了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方针。1956年6月，刘少奇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研究了统一全党思想，贯彻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方针的问题。会后，根据政治局会议精神，中宣部起草了《既要反对右倾保守，也要反对急躁冒进》的社论，经周恩来审定，于1956年6月20日在《人民日报》上发表。

《社论》指出：“在反对保守主义和急躁冒进的问题上要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什么是右倾保守，什么是急躁冒进，这里是有有一个客观标准的，这个标准就是客观实际的可能性。正确的工作方法，就是要使我们的方针、步骤符合于客观实际的可能性。凡是落后于客观实际的可能性的，就是右倾保守；凡是超过了实际的可能性的，就是急躁冒进。”最后指出：“总之，做任何工作，都要善于把上面的方针、要求与本地区、本单位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从实际情况出发去考虑和确定自己的工作步骤。只有这样，才不致于犯右倾保守或急躁冒进的错误。”³

这篇《社论》是一篇反“冒进”的著名的、纠正左倾的文章。可是，毛泽东对这篇《社论》却耿耿于怀。在1958年月1月南宁会

¹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23-224页

²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第398页

³ 《人民日报》1956年6月20日

议上，他说：“我批了‘不看’二字，骂我的我为什么看？”“那篇社论，既要反右倾保守，又要反急躁冒进，好像有理三扁担，无理扁担三，实际重点是反冒进的。”接着又说：“冒进是马克思主义的，反冒进是非马克思主义的。反冒进离右派还有50米。在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只能提反右倾，不能提反冒进。实际上等于说只能反右，不能反左”¹这是一次对刘少奇、周恩来、陈云极端不满的讲话，他仍然坚持只能反右倾保守，不反急躁冒进的观点。由此看出，毛泽东的专断作风多么厉害。

毛泽东在《高潮》一书序言中指出：“这本书是给在农村工作的同志们看的。城市里的人是不是也可以看看呢？不但可以看，而且应当看。”“这是一部称为合作化运动百科全书”的材料书，它的出版，对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产生了重大影响。

1958年1月在南宁会议上，毛泽东说，1955年12月，我写了《农村社会主义高潮》一书序言，对全国发生了很大影响。由于出版《高潮》一书主要目的，是批判农业合作化中的“右倾保守思想”，因此，产生消极影响。

产生消极影响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第一，对邓子恢等人的批判，不断加温升级，激化这种批判，不仅超出了当时所谓路线斗争的范围，而且使毛泽东一步步走向“左”倾错误。本来1955年夏季在农业合作化方面的争论和分歧，并不是什么路线之争，更不是什么阶级斗争，实践证明，邓子恢等人的意见是正确的，发动这样的批判是错误的，真正犯错误的是发动者犯了“左”倾错误。正因为如此，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鉴于历史上多次发生滥用机会主义这一概念的错误，在《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不再使用“机会主义”、“路线斗争”一类的概念。

第二，批判各行各业的“右倾保守思想”。要求各行各业结合自身批判“右倾保守”，克服“右倾保守”的同时，要求各行各业加快速度、扩大规模以适应农业合作化高速发展的需要。这种加快速度、扩大规模导致了各行各业急躁冒进。这种做法，与中央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稳步前进的方针相违背，于是，中央发表《既要反右倾保守，也要反急躁冒进》的社论，但收效甚微。毛泽东更加反对

¹ 引自张伟瑄、刘五一、肖星主编《共和国风云四十年》上册，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10页

反冒进，加大火力批判“右倾保守思想”，这样，给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带来不良后果，为1958年“大跃进”准备了思想理论前提。

第三，毛泽东强调“依靠贫下中农，树立贫下中农优势”的思想，放弃了“依靠贫农和中农的巩固联盟”的口号，认为“在富裕中农的后面站着地主和富农。”¹这样就意味着农村阶级政策变动，让贫农充当社的主要干部，把富裕中农推向地主、富农那一边。于是，产生了这样的后果：一方面是不利于农业生产的发展和农民积极性的发挥，认为越穷越光荣。另一方面，对党政机关和企事业单位选拔干部、使用干部方面产生唯成份论的偏向，这种偏向贻害无穷。《高潮》一书，总起来说，序言按语的基本倾向是错误的，不仅加快了农业合作化的冒进进程，而且加速了各行各业的人急躁冒进，因而对“左”倾倾向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正如《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在1955年夏季以后，农业合作化以及手工业和个体商业的改造要求过急，工作过粗，改变过快，形式也过于简单划一，以致在长期间遗留了一些问题。”²决议指出这些做法，本身就是“左”倾的表现，这些表现是毛泽东的主观意志的结果，促成主观意志的因素大致如下：

(1) 不切实际的愿望，1953年10月18日，毛泽东《在接见西藏国庆观礼团时的讲话》指出“我们建设起来比苏联还要快些。”³ (2) 大胆设想，“大约五十年到七十五年左右”，“可以争取赶上或超过美国”，“五十年以后会出现一个共产主义的中国”。⁴ (3) 过高评估：“五亿多农村人口大规模的社会主义革命运动，带有极其伟大的世界意义”⁵对“农业合作化，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等领导艺术都是有所发展的”，“我们在理论上也应有所贡献，把前人讲过的进一步发展。但十月革命到现在还没有显著的东西”。⁶ (4) 不切实际的承诺：“你搞了五、六十年还不能超过美国，你象个什么样子呢？那就要从地球上开除你的球籍！所以，超过美国，不仅有可能，而是完全必要，完全应该。如果不是这样，那我们中华民族

¹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31页

² 《三中全会以来》下，第800-801页

³ 《毛泽东思想万岁》1949.10—1957卷，第42页

⁴ 《毛泽东思想万岁》1949.10—19577卷，第78页

⁵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168页

⁶ 《毛泽东思想万岁》1949.10—1957卷，第84页

就对不起全世界各民族，我们对人类的贡献就不大”。¹所有这些“左倾”、“左”的倾向（即左倾空想社会主义倾向）。为以后“左”倾错误埋下了一条毒根（于光远语）。

最后中央对邓子恢同志关于农业合作化工作作出了正确的结论。1980年12月8日，国家农委党组向中央报告：邓子恢同志于1953年初由原中南局调入中央主持中央农村工作部的工作，共历十年，主要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先后三次受到批判，说他是“右倾机会主义”，是“站在一个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的立场上”，“大批解散农业生产合作社”“提倡包产到户”，“犯了反对建立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错误”。他所主持的中央农村工作部，也被说成是“十年没有办一件好事”而被撤销。……调查结果表明：邓子恢同志和中央农村工作部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没有什么方向路线性的错误，过去对他的批判是不正确，是不实事求是的，邓子恢同志是含冤而死的，应予以重新评价，恢复名誉。1981年3月9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向全党发出通知：中央认为，邓子恢同志是闽西革命根据地主要创始人之一，是我党领导农民运动的卓越领导者，在创造闽西革命根据地、在农村工作方面有过巨大贡献，他主持的中央农村工作部，是坚持社会主义方向，是坚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工作成绩是显著的，过去党内对他和农村工作部的批判、处理是错误的，应当予以平反，强加的一切不实之词，应与以推倒，恢复名誉。²

总之，50年代初期，毛泽东与刘少奇等人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上存在着分歧，主要从过渡时期总路线的认识中表现出来，总路线的实质是改变生产关系，是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改造，毛泽东认为实行总路线应从改造生产关系入手，刘少奇、邓子恢等人坚持从发展生产力，提高生产力入手，就是说，实施总路线各自侧重点不同，办法各异，提出的方针政策也不一样。而以毛泽东批评党内“右倾”观点形式表现出来。从那时起，毛泽东不断批评刘少奇、邓子恢等人，而被批评者只有被迫接受，只能被调离工作或被撤职。这似乎表明，毛泽东是最正确、最革命的。实际上，毛泽东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在从理论上、实际上放弃了新民主主义社会，过急过快迈进社会主义社会，必然批评坚持新民主主义观点，批评为新民主主义制度而奋斗的人，必然错误的对待资产阶级及其知识

¹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96页

² 参见蒋伯英《邓子恢传》，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603-604页

分子和小生产者。只要回到原来新民主主义理论和方针政策，就不会犯“左”的教条主义和“左”的空想社会主义错误，因此，过早抛弃新民主主义社会，过急过早进入社会主义是毛泽东等人犯“左”倾错误的总根源，也是我国长期停滞不前，落后的总根源。

第二节 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一】

民主革命胜利前夕的1949年3月，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指出：“中国革命在全国胜利，并且解决了土地问题以后，中国还存在两种基本的矛盾。第一种是国内的，即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第二种是国外的，即中国和帝国主义国家的矛盾。”¹1952年6月，他在一个文件批语中指出：“在打倒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以后，中国内部的主要矛盾即工人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²由于民主革命遗留下的问题已经被完全解决，阶级力量的对比发生了有利于工人阶级的变化，在总路线实施过程中，一方面实行制度的改造，即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改造，另一方面改造人，即改造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发动了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一系列运动。从此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成为革命对象，成为挨批挨斗的对象，成为被消灭的对象。首先对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进行批斗。

一、电影《武训传》批判

批判电影《武训传》是开国后为配合全国进行的政治运动在思想文化领域中以讨论的形式对知识分子进行的一次批判运动。这次批判运动是由毛泽东亲自抓的，化名李进的江青参与批判过程中的武训历史的调查工作。这次以讨论形式开展的批判运动成为以后一系列以知识分子为对象的批判运动的开端，拉开了知识分子灾难的序幕。

武训（1838-1896）原名武七，山东堂邑县（今冠县柳林镇）武庄人，出身于一个贫苦卑微的农民家庭，年幼丧父，以行乞为生。因为饱受了没有文化的痛苦，决心以行乞兴办义学来帮助穷人摆脱苦难。历经艰辛之后，终于办起了三所义学。十九世纪下半时，南方的太平天国农民运动基本结束，北方的捻军活动接近尾声，清朝

¹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434页

²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65页

统治者已经镇压了农民起义运动，同时也在尝试变法、废科举、办学堂。在当时办学堂的人很多，武训办学堂是符合当时潮流的，他的乞讨办学精神是值得肯定的。由于他的行乞兴义学德行，感动了地主、绅士和官僚，得到乡野的称颂，受到了封建最高统治者的嘉奖。死后被称颂为“义乞”、“乞圣”。陶行知非常推崇武训，常以“武训精神”激励自己。根据这样的素材，孙瑜先生编导《武训传》电影。电影《武训传》公映后，受到当时中央领导人和文化知识界的好评，颂扬电影《武训传》是富有教育意义的好电影。有的文章说武训是为人民服务的革命者，是永垂不朽而值得学习的榜样。有的文章说武训兴办义学是和太平天国那样的革命意义有某种相同处——都是为了劳苦人民的解放，不过，一重在革命武装，一重在普及文化教育而已等，像这样的颂扬的文章和评论大概有40篇之多。电影《武训传》列为1951年度最佳国产影片之一。同时，还出版了关于赞扬武训的书画：孙瑜的电影小说《武训传》、李士钊编、孙之隽绘《武训传》、柏水编《千古奇丐（章回小说）》。在这一片颂扬声中，也有极少数的文章认为“武训精神”没有任何意义，也不是我们的优秀传统。像1951年《文艺报》第四卷第二期发表了杨耳质问《陶行知先生表扬“武训精神”有积极意义吗？》文章。杨耳认为，“武训的道路是错误的”。“陶行知先生表扬‘武训精神’有积极作用，是不对的，至少是完全可怀疑的”。杨耳强调说：“不管是今天或是昨天，‘武训精神’都是不值得表扬的，也不应当表扬的。”¹1951年5月16日，《人民日报》转载了这篇有其深刻背景的文章。

双方的争论，引起了毛泽东极大的关注，并且特意调来影片观看，并在1951年5月20日《人民日报》上撰写《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的社论性文章。毛泽东指出，“在发表杨耳同志《陶行知先生表扬‘武训精神’有积极意义吗？》一文时，我们说希望因此引起对于电影《武训传》的进一步的讨论。”为什么应当重视这个讨论呢？其直接原因是“《武训传》所提出的问题带有根本的性质。像武训那样的人，处在清朝末年中国人民反对外国侵略者和反对国内的反动封建统治者的伟大斗争的时代，根本不去触动封建经济基础及其上层建筑的一根毫毛，反而狂热地宣传封建文化，并

¹ 杨耳《陶行知先生表扬“武训精神”有积极意义吗？》，1951年《文艺报》第四卷第二期

为了取得所没有的宣传封建文化的地位，就对反动的封建统治者竭尽奴颜婢膝的能事，这种丑恶的行为，难道是我们所应当歌颂的吗？向人民群众歌颂这种丑恶的行为，甚至打出‘为人民服务’的革命旗号来歌颂，甚至用革命的农民斗争的失败作为反衬来歌颂，这难道是我们能够容忍的吗？承认或者容忍污蔑农民革命斗争，污蔑中国历史，污蔑中国民族的反动宣传为正当的宣传。”接着写道，“电影《武训传》的出现，特别是对武训和电影《武训传》的歌颂竟至如此之多，说明了我国文化界的思想混乱达到了何等的程度！”“在许多作者看来，历史的发展不是以新事物代替旧事物，而是以种种努力保持旧事物使它得免于死亡；不是以阶级斗争去推翻应当推翻的反动的封建统治者，而是像武训那样否定被压迫人民的阶级斗争，向反动的封建统治者投降。”他最后严厉地批评一些党员作者写道：“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号称学得了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员。他们学得了社会发展史——历史唯物论，但是一遇到具体的历史事件，具体的历史人物（如武训），具体的反历史的思想（如像电影《武训传》及其他关于武训的著作），就丧失了批判的能力，有些人则竟至向这种反动思想投降。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侵入了战斗的共产党，这难道不是事实吗？一些共产党员自称已经学得的马克思主义，究竟跑到什么地方去了呢？”¹在这里，毛泽东将一场关于电影《武训传》的学术评介而引起的一些争论，拔高到革命与改良、进步与反动的政治高度，而且要以阶级斗争的观点观察这场争论。并且严厉地批评了一些共产党员丧失了对武训、电影《武训传》的识别能力，一些人向反动思想投降。他提出如此严肃尖锐的政治问题、阶级斗争问题，使得全党闻风而动，于是，全国各主要报刊都转载了这篇社论。

同一天，即5月20日，《人民日报》“党的生活”专栏发表了《共产党员应当参加关于〈武训传〉的批判》的评论文章，指出：“每个看过这部电影或者看过歌颂武训的论文的共产党员都不应对于这样重要的思想政治问题保持沉默，都应当积极起来自觉地同错误思想进行斗争。如果自己犯过歌颂武训的错误，就应当作严肃的公开的自我批评，担任文艺工作、教育工作和宣传工作的党员干部，特别是与武训、《武训传》及其评论有关的北京、上海、天津、山东、平原等地文化界的干部，尤其应当自觉地、热烈地参加这一场原则

¹《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6-47页

性的思想斗争。” 文章要求：“通过这一场原则性的讨论，将使每个党员懂得了革命者与封建统治拥护者的原则区别，人民民主主义和改良主义的区别，民族传统中落后的、消极的、反动的东西和进步的、积极的、革命的东西的区别。”¹

《人民日报》社论和《人民日报》“党的生活”专栏评论的公开发表，这是以党报的权威要求共产党员积极参加战斗，就这样揭开了对电影《武训传》批判的序幕。

从中央到地方的文化、宣传、教育部门，各民主党派中央机关都发出通知，号召文艺界、理论界、教育工作者、共产党员、民主人士都参加讨论、撰写批判文章，不到三个月，掀起了群众性的思想批判高潮。

有的说，“《武训传》是一部反动的电影，这部电影的编者孙瑜先生，还写了一篇和影片的内容基本上一样的小说，也叫《武训传》，这本书也是一本反动的书”。孙瑜先生“把一个投降了反动统治的奴颜婢膝的小丑——武训，描写成革命者……这完全是颠倒是非，是把反动鼓吹为‘革命’，是绝对荒谬的反动思想”。孙先生把武训这样一个丑恶的人“称颂‘典型地表现了我们中华民族勤劳、勇敢和智慧的崇高品质’，而要人们承继武训的传统，这是对于我们的极大污蔑”。“《武训传》把一个由山东巡抚支持的武训，一个反对农民战争的武训，却被描写成为代表农民阶级利益的人……这是极其反动的思想。孙先生把那个代表了历史上落后、消极与反动东西的武训，颂扬为‘至勇至仁’、‘千古一人’”。也有的说：“《武训传》电影上映以来，曾经在许多人中间引起了思想上的混乱，有些人看不出问题，有些人做了反动宣传的尾巴，对反动思想大加赞扬。”“作者是完全站在了反动的立场。”²还有的说：“武训的‘事业’和‘精神’，已经因为《武训传》电影、《武训画传》、《千古奇丐》这些书籍的出现，重新向广大人民放出无数只毒箭。”“许多对武训和《武训传》的歌颂与赞扬的思想实质”，是在“‘马克思主义’的美丽外衣下掩盖着非无产阶级思想甚至反动思想”，“他们挥舞着‘为人民服务’的大旗，散布着‘似是而非’的假‘马克思主义’，可是他们无法不让资产阶级思想、其他

¹ 《人民日报》，1951年5月20日

² 《学习》第四卷第四期，1951年6月1日

非无产阶级的思想甚至是反动的思想尾巴若隐若现。”¹

6月，由《人民日报》和文化部组织一个“武训历史调查团”，前往武训家乡进行实地调查。化名李进的江青参加了这个调查团。临行前，传达了毛主席的指示：“武训本人是不重要的，他已经死了几十年了；武训办的义学也不重要，它已经几经变迁，现在成了人民的学校。重要的是我们共产党人怎么看这件事——对武训的改良主义道路，是应该歌颂？还是应该反对？”²《武训历史调查记》的调查报告写成后，由毛泽东修改，于7月23-28日，在《人民日报》上发表。调查的结论：“武训是一个以‘兴义学为手段，被当时反动政府赋予特权而为整个地主阶级和反动政府服务的大流氓，大债主和大地主。”³

8月27日，《人民日报》刊登《从讨论武训问题我们学到些什么？》文章来批判歌颂武训的人，文章说，武训是个什么样子的人，《武训历史调查记》，已经彻底解决了。首先，武训是个“十分凶恶的大流氓、大债主和大地主”；第二，武训实际上“是实行西太后反革命路线的最忠实最驯服的走狗”；第三，武训在背离劳动人民之后的一切所谓‘苦行’都不过是要成为更大的地主和债主，更加有效地为封建阶级服务的精巧的伪装和恶毒的手段而已。由此，武训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拥护旧经济、旧政治、旧文化的渺小和下贱的旧人物，在中国历史上只起着消极的反动作用，而丝毫没有起过任何积极作用。“陶先生歌颂武训的真实原因就在于他的教育思想基本上还是小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思想。”⁴

8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周扬批判电影《武训传》的总结性长文，题为《反人民、反历史的思想和反现实主义的艺术》。现摘录几段如下：孙瑜在电影《武训传》中就是用艺术的手段巧妙地宣传了这种思想：即“历史不是由阶级和阶级斗争造成的，而是由少数所谓先知先觉者造成的；社会的黑暗不是由于不合理制度的存在，而是由于人民自己没有教育，没有文化，因此要改造社会，可以无需经过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推翻旧制度，建立新制度，只需给人民以教育和文化，就可以达到新的光明的世界。因此历史的创造者

¹ 《学习》第四卷第五期，1951年6月16日

² 转引《文学评论》1957年第4期

³ 《人民日报》，1951年7月

⁴ 《人民日报》，1951年8月27日

和推动者，主要地不是劳动人民，而是有文化教养的人们以及热心于在人民群众传播‘教育’、‘文化’的人们。这是一种反人民、反科学的历史观点。”“《武训传》电影主题的反动性主要也就在这里：第一，武训所走的并不是什么改良主义和个人英雄主义，而是十足的投降主义和奴才主义的道路；第二，作者在影片中并没有批评改良主义和个人英雄主义，而是恰恰相反借武训的所谓‘行乞兴学’的事迹大大地鼓吹了落后的、反动的社会改良主义和个人英雄主义。”“电影借武训的所谓‘行乞兴学’的事迹用艺术的力量宣传了这样的改良主义的思想：不能触动旧的社会经济基础，不破坏旧的政治制度，只要在人民中普及文化教育，就可以根本改变人民的被压迫的地位。既然人民只要有了文化就能解放，那自然就用不着群众的革命武装斗争了。电影《武训传》就是资产阶级的反动的改良主义思想在艺术上的表现之一。”“武训本来是封建社会中最丑恶、最虚伪、最反动的奴才之一，电影却要把他描写成为‘典型地表现了我们中华民族勤劳、勇敢和智慧的崇高品质’的人物，这就需要艺术上的粉饰和欺骗。”但“艺术的力量主要就在于它的真实性，因此，不管作者费劲不少心机，仍然掩盖不住武训形象的虚伪和丑恶”。周扬文章最后结论说：“电影《武训传》污蔑了中国人民历史的道路，宣传了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用改良主义来代替革命，用个人奋斗来代替群众斗争，用卑躬屈节的投降主义来代替革命的英雄主义。电影中武训的形象是丑恶的、虚伪的，在他身上反映了我国封建社会的黑暗和卑鄙，歌颂他就是歌颂黑暗和卑鄙，就是反人民、反爱国主义的。”¹

批评者们对电影《武训传》歌颂者的批判外，还对歌颂《武训画传》、《武训》连环画、《千古奇丐》小说进行批判。认为《武训画传》是一种歪曲历史、侮辱革命、麻醉人民的毒物；《武训》连环画是拥护封建主义思想的作品；《千古奇丐》小说是一本极端反动小说。

在批判电影《武训传》的同时，也批判陶行知，因电影《武训传》直接源于陶行知。是陶行知将《武训先生画传》送给电影导演孙瑜，由孙瑜写的《武训传》电影剧本。1950年电影《武训传》摄制完毕并公映，可见，电影《武训传》的根子在于陶行知，所以要将两者捆绑在一起进行批判。周扬说：“陶行知晚年成了一个革命的民主派，但在提倡武训这件事上面却表现了他早年的改良思想的

¹《人民日报》，1951年8月8日

影响，表明他在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中的脆弱性的一面。”郭沫若说：“陶行知先生生前，我认为也是犯了很大的错误，有好些武训的歌颂者和崇拜者，事实上是受了陶行知表扬武训的影响而盲目附和的。……不仅武训不足为训，就是陶行知的表扬武训也同样不足为训，我们今天是决不能‘为贤者讳’了。”¹

教育部的机关刊物《人民教育》给对陶行知的批判上了一个台阶，即上纲上线：第一，陶行知违背了毛泽东“认为改造社会、建立自由平等世界、必须经过阶级斗争，采取革命手段才成”的暴力论观点，而陶行知是想绕开阶级斗争、暴力革命，用资产阶级改良主义道路来改造社会，建立自由平等世界的主张，这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南辕北辙的。第二，陶行知被誉为“伟大的人民教育家”、“万世师表”只不过徒有其名。第三，陶行知的世界观、方法论是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其思想根源是实用主义思想。第四，晚年陶行知对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和前途问题都仍然保留着社会改良思想。²

为什么陶行知遭到如此严厉地批判？陶行知的教育思想具有强烈的主体人格精神，他把争取民主当作人生的主题，他的民主思想是坚持民主目的与民主手段的统一，民主理论与民主实践的统一，并以个人自由为民主基石。晚年陶行知推行民主教育，认为民主教育是教人做主人，做自己的主人，做国家的主人，做世界的主人。他认为教育的主要职能是人格的铸造，教师的职务是教人求真，学生的任务是学做真人，这个真人是指真实的自我，主体的自我，只有这样，才能造就“人人都是主体”，使民主生生不息。陶行知还提出，“出头处要自由”的观点，认为教育是人出头的关键环节，认为没有自由不是主人，不是主人的教育，而学生的基本自由问题是构成中国教育的核心问题。陶行知在此基础上提出把学习的基本自由还给学生。陶行知至死不渝地追求人的彻底解放、人的自由发展。

陶行知的教育思想曾得到中共的充分肯定，他逝世后，中共的悼词就称赞他“以唤起人民自己解放自己为目的的教育”，“他把人民看做人，而不是看做奴隶和顺民，他主张人民的解放，他又相

¹ 《人民日报》，1951年8月4日

² 参见笑蜀《“民主魂”陶行知在新中国成立后的际遇》，载《炎黄春秋》1999年第1期，第25页

信人民的力量，人民的智慧。”毛泽东、朱德署名的唁电：誉陶行知“先生为人民教育家”。胡乔木说：“陶行知的死是叫我们一下子损失三个有独创性的传人——一个政治家、一个教育家和一个文学家。”为什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不久，毛泽东、中共对被誉为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呢？

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建国后，我国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文化制度基本上按照苏联模式建立起来，也就是“全盘苏化”，外交上实行“一边倒”的政策，在这样的背景下，苏联教育模式全盘移植到了中国，由它来改造中国的教育制度，首先将全国所有的高校收归国家所有，其次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来改造教师的思想。第三，苏联派出专家给高校的教师学生授课。总之，教育思想、教育制度、教学管理等一切有关教育方面的事情都照抄苏联的教育模式。为更顺利推行“全盘苏化”，必然要排除推行过程中的障碍，以陶行知为代表的所谓“民主个人主义”思想，就成为被批判对象。通过批判电影《武训传》和深入清算表扬“武训精神”的陶行知，才能为中国思想领域的“社会主义改造”扫清了道路。¹

慑于压力，1951年5月26日，《人民日报》刊登了孙瑜对《武训传》所犯错误的初步认识，孙瑜说，“《武训传》犯了绝大的思想上和艺术上的错误。无论编导者的主观愿望如何，客观的实践却证明了《武训传》对观众起了模糊革命的反作用，是一部于人民有害的电影”。²这个检查是不够的。在1952年6月3日，《解放日报》发表了孙瑜对编导电影《武训传》的检讨：孙瑜说：“我是电影《武训传》的编导者。这一作品在思想和艺术上的严重错误突出地暴露了潜存在我个人灵魂深处的资产阶级思想的毒素，使我站在地主、资产阶级立场，在实际上做了他们的代言人！”“‘改良主义’和‘个人奋斗’就是电影《武训传》表现资产阶级反动思想的两个最严重的而最含有迷惑毒素的错误”。孙瑜检讨犯错误的根源说：“首先必然是一个立场的问题，立场错误了，加上自己的主观主义、改良主义、艺术至上、脱离群众等非无产阶级的思想和缺点。”³

电影《武训传》批判，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由毛泽东亲自发动的群众性的思想批判运动。通过这场思想批判运动，为广大知识

¹ 参见《炎黄春秋》1999年第1期，第26-28页

² 《人民日报》，1951年5月26日

³ 《解放日报》，1952年6月3日

分子灌输了一次唯物史观的教育，即灌输了一次阶级、阶级分析和阶级斗争的教育，破除社会改良主义思想，清算“民主个人主义”思想的影响。使他们初步树立起阶级分析、阶级斗争的观点，学会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来观察问题和处理问题。这次思想批判运动直接引发了1951年秋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实际上成为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

这场思想批判运动其副作用是不可低估的。电影《武训传》的讨论，本来是一次学术讨论，对电影评价有分歧，完全是正常的。由于政治的介入，开始出现用政治批判、政治声讨取代学术争论、思想批评；用贴资产阶级反动思想标签取代持不同观点的文艺工作者，用主观片面、歪曲历史，编织罪名取代客观全面、具体历史的实事求是的调查研究方法等种种不正常现象。这次批判，不仅否定电影《武训传》，而且全盘否定著名教育家、作家。1953年9月24日，第二次全国文代会上，周扬报告中也承认，电影《武训传》批判后，报刊上发表了“一些粗暴的、武断的批评，以及在这种批评影响下所煽起的一部分读者的偏激意见，”，“使不少作家在精神上感到压抑和苦恼”。¹

相隔34年后的1985年9月6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胡乔木在中国陶行知研究会和中国陶行知基金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承认：

“我可以负责地说，当时这场批判，是非常片面的，非常极端的，也可以说是非常粗暴的。因此，尽管这个批判有他特定的历史原因，但是由于批判所采取的方法，我们不但不能说它是完全正确的，甚至也不能说它是基本正确的，这部影片内容不能说没有缺点和错误，但后来加在这部影片上的罪名，却过分夸大了，达到简直不能令人置信的程度。从批判这部影片开始，后来发展到批判一切对武训这个人物表示过程度不同的肯定的人，以及包括连环画在内的各种作品，这就使原来的错误大大扩大了。这种错误的批判方法，以后还继续了很长时间，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才得到纠正。”²胡乔木

¹《周扬文集》第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246页

²《人民日报》，1985年9月6日。在胡乔木评价中提到“这个批判有它特定的历史原因”。现在可以用《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来说明电影《武训传》批判的特定的历史原因：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1951年，它开始一个运动，在从生物学研究到艺术创作的所有领域中，要他们摒弃大多数人曾经接受过的西方的理论和学术而转向苏联的理论和学术。它的目的是要洗净西方自由主义的价值，再给知识分子灌输马克思列宁主义。这种努力的

代表党中央评价这场批判运动：“甚至也不能说它是基本正确的。”这是以非常委婉的口气否定这场批判运动，是对遭到批判的人们的公开平反。从胡乔木的讲话中，可以看出这不仅是对电影《武训传》批判的评价，而且也可以看做是对毛泽东领导和发动的历次思想批判运动的评价。1986年4月，国务院办公厅在《关于为武训恢复名誉问题的批复》中，肯定了武训的办学精神。1989年山东冠县为重修武训墓揭幕，修建武训纪念馆，1993年纪念馆落成，诗人臧克家为纪念馆题诗：破钵百衲度春秋，心铁情痴为众谋。今古完人究多少，何于一丐作苛求。¹

总之，毛泽东亲自所写的《社论》，所修改的调查报告某些观点和结论，其中某些提法，以及批判过于上纲上线，语调也过于尖锐，都违背了“共同纲领”和毛泽东当时对待资产阶级思想体系和知识分子的政策，同时也背离了他自己一贯倡导的实事求是的原则。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思想批判，实际上是混淆学术讨论与政治批判，是真正的思想政治讨伐，是文化专制主义和历史虚无主义的表现，是一场人整人（包括整武训、陶行知两个死者和一个活人）的尝试，是行政干预学术、艺术讨论的结果。这为后来的思想政治领域内的批判开创了一个不好的先例。

二、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批判

俞平伯，早年在胡适的影响下研究《红楼梦》，是研究“红学”的权威作家。1951年，俞平伯响应毛泽东提出的“百花齐放，推陈出新”，改造旧文化，建设新文化的号召下，将30年前写的《红楼梦辨》进行加工修改，新增五篇文章，于1952年9月，以《红楼梦研究》书名重新出版。第二年5月第9号《文艺报》推荐《红楼梦研究》一书，认为该书“做了细密的考证、校勘，扫除了过去“红学”的一切梦呓，这是很大的功绩”。称“《红楼梦研究》是我们研究《红楼梦》时值得参考的”。²由此看出，《文艺报》肯定作者对红楼梦研究的成绩和权威地位。以后，俞平伯又发表了《红楼梦简

一部分表现为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这个故事告诉人们，19世纪的一位教育家怎样从一个乞丐最终变成了地主并且用他的钱创办了一些学校。党说武训是一个消极的象征，因为他想通过教育和改良而不是通过革命来改造中国。”（《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第247页）

¹ 参见夏杏珍主编《五十年国事纪要·文化卷》，湖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96页

² 《文艺报》第9号，1953年5月

论》等一系列论文，结果受到严厉的批评。

《红楼梦研究》的批判肇始于两名刚从事文学研究的青年作者李希凡、蓝翎。他们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观点分析研究俞平伯的论著，合写了《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的批评文章。李、蓝认为，“俞平伯先生离开了现实主义的批评原则，离开了明确的阶级观点。对他所谓的红楼梦的“怨而不怒”的风格大肆赞扬，实质上是企图减低红楼梦反封建的现实意义”。“总之，俞平伯先生是以反现实主义的唯心论的观点分析和批判了红楼梦”，“俞平伯先生关于传统性问题的荒谬解释，是建立在反现实的唯心主义的基础上”。《红楼梦研究》一书、《红楼梦简论》一文对于旧红学家和近些年来把红楼梦完全看做是家事的新考证学派进行了批评，这些批评自然都有一定的价值。但“俞平伯先生研究红楼梦的观点和方法基本上仍旧没有脱离旧红学家们的窠臼，并且与新考证学派在某种程度上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并“继承和发展了旧红学家们形式主义的考证方法，把考证方法运用到艺术形象的分析上来”。“用它（考证方法）代替了文艺批评的原则，其结果，就是在反现实主义和形式主义的泥潭中愈陷愈深”。¹

1954年10月10日，《光明日报》的《文学遗产》第22期发表李希凡、蓝翎合写评《红楼梦研究》一文，作者首先肯定俞著考证学的成绩，认为这是“俞平伯先生30年来最可珍贵的劳动成果，对于红楼梦的读者是有很大帮助的”。但“造成《红楼梦研究》这些错误的根本原因，是俞平伯先生对于红楼梦所持的自然主义的主观主义见解。但是，这种把红楼梦作为一部自然主义来评价，而抽调了它的丰富的社会内容的见解无非是重复了胡适的滥调”。“俞平伯先生评价红楼梦也许和胡适的目的不同，但其效果却是一致的。即都是否定红楼梦是一部伟大的现实主义杰作，否认红楼梦所反映的是典型的社会的人的悲剧，进而否定红楼梦是个别家庭和个人的悲剧，把红楼梦歪曲成为一部自然主义的写生的作品。这就是新索引派所企图达到的共同目标。《红楼梦研究》就是这种新索引派的典型代表作品”。²

李希凡、蓝翎既肯定俞平伯对旧红学家的批评有一定的价值和红楼梦读者有帮助，又批评俞平伯贬低红楼梦反封建的现实意义，

¹ 参见《文史哲》1954年第9期，第22-25页

² 《光明日报》《文学遗产》第22期，1954年10月10日

认为俞平伯以反现实主义文学论观点和形式主义的考证方法来研究与分析红楼梦，而且还批评俞平伯研究红楼梦是重复胡适的陈词滥调。

这本来是一场学术界不同意见的争论，却引起了毛泽东的关注。1954年10月16日，毛泽东《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是写给政治局和其他有关同志的。信中说：“驳俞平伯的两篇文章（《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评论《红楼梦研究》——引者）附上，请一阅。这是30多年以来向所谓红楼梦研究权威作家的错误观点的第一次认真的开火。”接着又说：“作者是两个青年团员。他们起初写信给《文艺报》，请问可以不可以批评俞平伯，被置之不理。他们不得已写信给他们的母校——山东大学的老师，获得了支持，并在该校刊物《文史哲》上登上了他们的文章驳《红楼梦简论》。后“被允许在《文艺报》转载此文。嗣后，《光明日报》的《文化遗产》栏又发表了这两个青年的驳斥俞平伯《红楼梦研究》一书的文章。”信中说：“看样子，这个反对在古典文学领域毒害青年30余年的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也许可以开展起来了。事情是两个‘小人物’做起来的，而‘大人物’往往不注意，并往往加以阻拦，他们同资产阶级作家在唯心论方面讲统一战线，甘心作资产阶级的俘虏，这同影片《清宫秘史》和《武训传》放映时候的情形几乎是相同的。”“《武训传》虽然批判了，却至今没有引出教训，又出现了容忍俞平伯唯心论和阻拦‘小人物’的很有生气的批判文章的奇怪事情，这是值得我们注意的。”最后指出：“俞平伯这一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当然是应当对他们采取团结态度的，但应当批判他们的毒害青年的错误思想，不应当对他们投降。”¹

这封信肯定了两位青年驳斥俞平伯的文章；尖锐地批评了《文艺报》、《人民日报》的某些“大人物”压制“小人物”的错误；指出“应当批判毒害青年的错误思想”，“不应当对他们投降”；号召展开反对在古典文学领域的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关于《红楼梦》研究出现各种分歧和不同的看法，本来是很正常的事，由于毛泽东以此为突破口，向资产阶级唯心论又一次发动进攻，于是一场思想批判运动开展起来了。中央和文艺界的领导立即传达毛泽东《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积极组织动员批判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观点方法。除上述李希凡、蓝翎的批判文章之外，1954

¹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134-135页

年10月23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经周扬审阅的钟洛(袁鹰)《应该重视对〈红楼梦〉研究中的错误观点的批判》文章。文章肯定李希凡、蓝翎合写的文章对俞平伯研究《红楼梦》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的批判“是正确的,也是必要的”。认为俞平伯研究《红楼梦》的基本论点是“胡适之派的资产阶级反动的实验主义对待古典文学作品的观点和方法的继续”,是“胡适之所标榜是‘只认识事实,只跟着证据走’的实验主义考据方法”,是“胡适之力图否认红楼梦的社会政治意义……从根本上贬低了这部伟大现实主义巨著的历史的和文学的价值”。“而把胡适之的观点却全部作为俞先生自己的观点保留下来。”“俞平伯先生研究《红楼梦》的方法,也是唯心主义、主观主义的方法。”钟文再次肯定,李、蓝文章“是30多年来向古典文学研究工作中胡适之派的资产阶级立场、观点、方法进行反击的第一枪,可贵的第一枪!”“对这个问题应该展开讨论。这个问题,按其思想实质来说,是工人阶级对资产阶级在思想战线上的又一次严重的斗争。这个斗争的目的,应该是辨清是非黑白以清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主观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正确地学习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的、科学的立场、观点和方法。”¹

10月24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李希凡、蓝翎合写的《走什么样的路?——再论俞平伯先生关于〈红楼梦研究〉的错误观点》的文章。文章指出,“有许多研究著作是把马克思主义当作一件时髦的外衣,骨子里仍然贩卖着旧货色,不触及作品的实际内容,割裂作品中的艺术形象,通过极其隐蔽的方式,抹煞优秀的古典文学作品的社会作用,向广大青年群众传播有毒的东西。这实际上是30年前曾经发生过的一次资产阶级反动思潮的再现”。“是过渡时期复杂的阶级斗争在文学研究领域中的反映。一切旧有的反动的思想观点绝不甘心退出这一阵地,而是顽强地反抗着的”。“代表买办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胡适之,为了抵抗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在政治上提出了‘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口号,在学术上提出了反动的实验主义的‘考据学’。胡适之所提倡的学术路线,其反动目的就是阻挠马克思主义在青年中的传播,把他们蒙着眼睛牵着鼻子走向‘国故’堆里去,脱离现实,避开当时尖锐的阶级斗争。在文学研究上,俞平伯先生的《红楼梦辨》就是这条路线的忠实的追随

¹《人民日报》1954年10月23日

者和实践者。”文章揭露新红学的实质，“就在于它是士大夫阶级意识和买办思想的混血儿，是反动的实验主义在古典文学研究领域中的具体体现”。俞先生的《红楼梦研究》“除了提出了一些新的考证材料并将个别的字句和表面结论稍加修正之外，而骨子里的立场、观点和方法都毫无改变地保留下来”。“以隐蔽的方式，向学术界和广大的青年读者公开地贩卖胡适之的实验主义，使他在中国学术界中间借尸还魂”。文章最后指出，“俞平伯先生所继承的胡适之的反动思想的流毒，在过渡时期复杂的阶级斗争的环境里，是怎样在挣扎着的”。¹

《人民日报》对《红楼梦研究》中错误观点的批判极为重视，10月28日刊载了袁水拍《质问〈文艺报〉编者》的政治批判文章。²文章首先指出文艺界长期以来“对胡适之派资产阶级唯心论曾经表示了容忍麻痹的态度”，并就《文艺报》在发表有关《红楼梦》研究文章时所表现的“对古典文学研究中的资产阶级唯心论观点的容忍依从，甚至赞扬歌颂，以及对待生气勃勃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摆出老爷态度”，作了严厉地批评。接着质问《文艺报》编者对李希凡、蓝翎《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一文转载时的编者所加的按语，³“大概是为了引起读者对于这个讨论的注意。但奇怪的是编者说了这样一大堆话，却没有提到这个讨论的实质，即反对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中的唯心论观点，反对文艺界对于这种唯心论观点的容忍依从甚至赞扬歌颂。”同时批评《文艺报》编者在转载李希凡、蓝翎合写《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一文所加的按语，即“却赶紧向读者表明‘作者的意见显然还有不够周密和不够全面的地方’”，是“对名人、老人，不管他宣扬的是不是资产阶级的东西，一概加以点头，并认为‘应毋庸置疑’；对无名的人、青年，因为他们宣扬

¹ 《人民日报》1954年10月24日

² 《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的作者之一蓝翎回忆：“其实，袁水拍只起草了一个初稿，排出样子送审。毛泽东主席对送审稿作了重大修改，连现在的题目也是他加的，并写了袁水拍的名字。袁水拍为此甚感不安，也不好说什么。”（蓝翎《龙卷风》，第41页）

³ 按语：“在转载时，曾由作者改正了一些错字和由编者改动了一二字句，但完全保存作者原来的意见。作者的意见显然还有不够周密和不够全面的地方，但他们这样地去认识《红楼梦》，在基本上是正确的。只有大家来继续深入地研究，才能使我们的了解更加深刻和周密，认识也更全面；而且不仅关于《红楼梦》，同时也关于我国一切优秀的古典文学作品。”

了马克思主义，于是编者就要一概加以冷淡，要求全面，将其价值尽量贬低。我们只能说，这在基本上是一种资产阶级贵族老爷式的态度。”文章最后提出严厉批评：“应该指出，这决不单是《文艺报》的问题，许多报刊、机关有喜欢‘大名气’、忽视‘小人物’、不依靠群众、看轻新生力量的错误作风。文化界、文艺界对新作家的培养、鼓励不够，少数刊物和批评家好像是碰不得的‘权威’，不能被批评，好像他们永远是‘正确’的，而许多正确的新鲜的思想、力量，则受到各种各样的阻拦和压制，冒不出头；万一冒出头来，也必挨打，受到这个不够那个不够的老爷式的‘挑剔’。这是资产阶级‘名位观念’、‘身份主义’、‘权威迷信’、‘卖老资格’等等腐朽观念在这里作怪。”¹

袁文发表后，批判矛头同时也指向《文艺报》，而且事态正在扩大，批判运动全面深入展开。10月30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周汝昌题为《我对俞平伯研究红楼梦的错误观点的看法》的文章。周文对胡适之、俞平伯的资产阶级的错误观点进行了批判。指出“胡适之、俞平伯一派的‘红学’家，却竭力企图把红楼梦化为一个小把戏，引导读者钻向琐碎趣味中去，模糊这一伟大古典现实主义名著的深刻意义”。周文接着批评“研究红楼梦足足30年的俞平伯，对红楼梦的认识是什么呢？我以为是三个字的回答：‘不可知’。俞平伯在《红楼梦研究》自序中说：至于红楼梦本身底疑问，使我每每发生误解的，更无从说起。我尝谓此书在中国文坛上是个‘梦魔’，你越研究便越觉得糊涂。这就是俞平伯对红楼梦研究了整整30年以后的心得和总结”。²

为配合当时的政治需要。10月31日到12月8日，全国文联主席团和全国作协主席团召开扩大联席会议讨论这个问题。在联席会议上，郭沫若批判“俞平伯先生不仅没有摆脱资产阶级唯心论的影响，而且还有浓厚的封建思想残余”。同时承认，“我们所犯的错误和电影《武训传》放映当时所谓的错误没有两样”。“错误不仅没有改正，反而有新的滋长。这不就证明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思想是有它的根深蒂固的潜在势力，我们有不少的人事实上不外是这种错误思想的俘虏吗？”³在联席会议上通过《关于〈文艺报〉的决议》，

¹ 《人民日报》1954年10月28日

² 《人民日报》1954年10月30日

³ 《文艺报》1954年第23、24号，第7页

指出《文艺报》的主要错误是：“对于文艺上的资产阶级错误思想的容忍和投降；对于马克思主义新生力量的轻视和压制；在文艺批评上的粗暴、武断和压制自由讨论的恶劣作风。这些错误的性质是严重的，是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党的文艺方针的。”¹

在这次会议上，周扬作了《我们必须战斗》的总结性发言。他说，“我们正在进行对俞平伯在《红楼梦研究》及其他著作中所表现的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观点的批判，是又一次反对资产阶级思想的严重斗争，同时也是反对对资产阶级思想的可耻的投降主义的斗争。”“文艺上的思想倾向的斗争总是反映阶级斗争的过程”。电影《武训传》“宣传了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和个人苦行主义，实际就是宣传了对封建统治者的卑躬屈节的投降主义，而对人民斗争的正确的历史道路则作了不能容忍的歪曲和污蔑”。“假如说电影《武训传》的批判涉及到如何正确地对待中国人民的革命传统的问题，那么，对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的批判涉及到如何正确地对待中国人民的文化遗产的问题”。“俞平伯先生是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在《红楼梦》研究方面的一个代表者”。通过“这个批判，一方面为《红楼梦》的真正科学的、客观的研究扫清了道路，另一方面将斗争的锋芒指向胡适的反动哲学思想和文学思想”。“在整个学术界开始了对胡适思想，特别是他的实用主义哲学的批判”。“实用主义哲学则是他的思想根本……它在人民和知识分子的头脑中还占有很大的地盘……因此，全面地、彻底地揭露和批判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就是当前马克思主义者十分重要的战斗的任务”。²

冯雪峰在《检讨我在〈文艺报〉所犯的错误》中说：“我对于资产阶级的错误思想失去了敏锐的感觉，把自己麻痹起来，事实上做了资产阶级的错误思想的俘虏”。“我在处理李、蓝文章问题上，第一个错误……表现了我对于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投降。第二个错误，是我贬低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新生力量——也就是文艺界的新生力量”。“我深深地感到我有负于党和人民。这是立场上的错误，是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错误，是不可容忍的”。³

1955年2月第五号《文艺报》刊登俞平伯《坚决与反动的胡适

¹ 《文艺报》1954年第23、24号，第4页

² 《文艺报》1954年第23、24号，第13-15页

³ 《文艺报》1954年第20号，第4-5页

思想划清界线——关于有关个人〈红楼梦〉研究的初步检讨》。首先，检讨认识到，通过对《红楼梦》研究的批判，展开反对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这是社会主义思想体系对非社会主义思想体系的斗争”。其次，承认自己进行红楼梦研究“前后断续地经过30年，主要的错误在于沿用了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思想方法”。“我研究《红楼梦》，最严重的错误，自其基本性质来说，便是不能掌握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方法全面地分析作品，相反地以资产阶级唯心论的观点方法来追求作者的企图”。最后，“这些错误的根源当然应从立场观点方法去找。我虽在政治上认识了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时期的总路线，而在学术上并没有建立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对于一般文学研究，论作品的思想性，每不能从历史的、社会的因素去估计；评论作品的艺术性，又不能用正确的美学观点去衡量”。“我不仅不曾彻底批判胡适，不仅继续走了胡适研究《红楼梦》的道路，而且还扩展了它，在社会上替胡适的反动思想散布毒素，这个错误是十分严重的”。¹

1956年5月26日，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的陆定一在代表官方立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讲话中说：“在这场批判，在这个斗争中，中共中央指出，必须坚持这样的原则：在学术批评和讨论中，任何人都不能有什么特权；以‘权威’自居，压制批评，或者对资产阶级错误思想熟视无睹，采取自由主义甚至投降主义的态度，都是不对的。同时，中共中央又指出，批评应该是说理的，实事求是的。这就是说，应当提倡建立在科学基础上的尖锐的学术论争。应当采取自由讨论的方法，反对采取行政命令的方法。应当容许被批评者进行反批评，而不是压制这种反批评。应当容许持有不同意见的少数人保留自己的意见，而不是实行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中共中央又指示：在进行对资产阶级错误思想的批判和学术问题的批评和讨论时，应当坚持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和团结改造知识分子的政策。应当把在思想上坚持资产阶级错误观点的人，和虽有这种错误观点但是倾向于唯物主义的人区别开来，分别对待。应当分清政治上的反革命分子和学术思想上犯错误的人。学术思想上有严重的资产阶级错误观点的学术工作者，只要政治上不是反革命分子，都应当保障他们获得适合于他们的工作岗位，保障他们有可能继续

¹《坚决与反动的胡适思想划清界线——关于有关个人〈红楼梦〉研究的初步检讨》，《文艺报》1955年2月第五号

进行对于社会有用的研究，尊重和发挥他们对社会有用的专长，并将这种专长传授给青年，同时鼓励他们积极参加学术的批评和讨论，实行自我改造。”¹

陆定一当时对这场批判作了评估：“现在检查起来，这个斗争基本上是做对的，在分寸的掌握上也大体是对的。但错误和缺点还是有的。例如俞平伯先生，他在政治上是好人，只是犯了在文艺工作中学术思想上的错误”。“批判是必要的”。“但是有一些文章写得差一些，缺乏充分的说服力量，语调也过分激烈了一些”。²陆定一认为批判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观点是必要的，肯定俞平伯先生在政治上是好人；但承认有些批判文章缺乏充分的说服力量，语调也过分激烈。对俞平伯先生批判两年后，能有如此的评价，总算承认这点缺点，在当时也是有点难能可贵。当时毛泽东有意识缓和同知识分子的紧张关系，其原因是利用广大知识分子参加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

1986年8月20日，胡绳《在庆贺俞平伯先生从事学术活动6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³中指出：“早在20年代初，俞平伯先生已开始对《红楼梦》进行研究，他在这个领域里的研究具有开拓性的意义。对于他研究的方法和观点，其他研究者提出不同的意见或批评本来是正常的事情。但是1954年下半年因《红楼梦》研究而对他进行政治性的围攻，是不正确的。这种做法不符合党对学术和艺术所应采取的‘双百方针’。”“按照四项基本原则中的人民民主专政原则，党对这类属于人民民主范围内的学术问题不需要，也不应该做出任一裁决。”“1954年的那种做法既在精神上伤害了俞平伯先生，也不利于学术和艺术的发展。”“接受这一类历史教训，我们要在学术界认真实行‘双百方针’，提倡在正常的气氛下进行各种学术问题的自由讨论和辩论，团结一切爱国的、努力从事有益于人民的创造性工作的学术工作者，共同前进，共同追求真理。”⁴胡绳首先肯定俞平伯先生对红楼梦研究具有开拓性的意义；承认对俞平伯先生的批判是政治性的围攻，是不正确的；对俞平伯先生的这种做法不符合党对学术艺术的“双百方针”；承认1954年的那种做法

¹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人民日报》1956年6月13日

² 《人民日报》1956年6月13日

³ 此文经当时中共中央主管意识形态的书记胡乔木审阅

⁴ 胡绳《先贤和故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50-151页

的直接后果，在精神上伤害了俞平伯先生，间接后果，也不利于学术艺术的发展。胡绳也曾积极参加批判俞平伯的运动，改革开放后他代表中央对俞平伯先生做出这样的评价，是公正的，也算是顺应历史。

总之，毛泽东发动“这个反对在古典文学领域毒害青年 30 年的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之后，理论界、文艺界文艺闻风而动，很快形成批判高潮。批判者响应毛泽东的号召，紧紧跟上，使这场批判比电影《武训传》批判更带有政治围剿的性质。会上的发言、刊登的批判文章都形成了一边倒的局面，而被批判者没有任何申辩的权利和机会，实际上只有缴枪投降，哪里谈得上学术争论和讨论。这些做法是违背当时党中央关于对资产阶级唯心论批判的指示精神的（参见上述引用陆定一的文章），暴露出对知识分子“左”的错误。无论批判俞平伯的唯心论思想也好，还是批判资产阶级错误思想也好，其真正的主要斗争锋芒是指向胡适、胡适派的唯心主义思想。

三、对胡适思想批判

1954 年 10 月 16 日，毛泽东在《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中指出，发表两个青年“驳俞平伯《红楼梦研究》一书的文章，看样子，这个反对在古典文学领域毒害青年 30 余年的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也许可以开展起来了”。¹这封信传达后，理论界、文艺界立即行动起来，向俞平伯红楼梦研究中的唯心论观点进行猛烈开火。经过一段时间，将对唯心论观点的批判引向深入和扩大，那时朝鲜战争或抗美援朝战争刚结束，毛泽东借此机会肃清实用主义在中国知识分子中的影响，便把批判矛头指向亲美派，胡适派的资产阶级唯心论思想首当其冲，于是围剿胡适派的批判运动就掀起来了。

1954 年 11 月 8 日，中国科学院院长、全国文联主席郭沫若就关于文化学术界应当开展反对资产阶级错误思想的斗争对《光明日报》记者发表谈话，认为对俞平伯研究《红楼梦》的错误观点所引起的讨论，是当前文化学术界的一个重大事件。他说：“这不仅仅对于俞平伯本人、或者对于有关《红楼梦》研究进行讨论和批判的问题，而应当看做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与资产阶级唯心论思想的斗争，这是一场严重的思想斗争。”“胡适的资产阶级唯心论学术

¹ 《毛泽东选集》第 5 卷，第 134 页

观点在中国学术界是根深蒂固的，在不少的一部分高等知识分子当中还有着很大的潜在势力”。“在某些人心目中胡适还是学术界的‘孔子’。这个‘孔子’我们还没有把他打倒，甚至可以说还很少去碰过他”。“胡适的所谓‘大胆假设，小心求证’，说穿了就是彻头彻尾的主观唯心论。按照胡适的‘理论’，人们就可以任意地来‘大胆假设’；所谓‘大胆假设、小心求证’，不过是用来证实他主观地假设出来的东西而已”。¹

相距一个月，即12月8日，郭沫若在全国文联主席团、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扩大会议上作了题为《三点建议》的发言，其中最重要的第一条建议：“我们应该坚决地展开对于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思想斗争。”理由是“中国近30年来，资产阶级唯心论的代表人物就是胡适……解放前曾经被人称为‘圣人’、称为‘当今孔子’。他受着美帝国主义的扶植，成为买办资产阶级第一号的代言人。”“胡适这个头等战争罪犯的政治生命是死亡了，但他的思想在学术界和教育界……仍然有不容忽视的潜在势力。”“胡适的所谓‘大胆假设，小心求证’，他自己吹嘘，这就是科学的方法。”“我的回答是这样：这是把科学的研究方法根本歪曲了。科学是允许假设的，科学当然更注重实证……假设是从不充分的证据所归纳出来的初步意见。它还不能成为定论，但假如积累了更多的证据和经得起反证，它有成为定论的可能。所以真正的科学家倒是采取着相反的态度，便是‘小心的假设，大胆的反证’。”“杜威所说的‘有效即真理’。我认为，那不外就是‘强权即公道’。因为对资产阶级统治者，对帝国主义好战分子，被认为最‘有效’的就是横行霸道……此所以实验主义最反动的哲学思想，能够在美国吃香。所以宣扬实验主义的胡适，不外是美帝国主义的文化走狗。”“我们拟定了九项内容，分别批判胡适的哲学思想、政治思想、历史观点、文学思想和其他有关的问题。每项问题由主要研究人写成文章，公开报告，并进行讨论。我们用这样的办法，把胡适的反动思想在文艺界和学术界的遗毒，加以彻底的清除。”²

同一天，周扬作了题为《我们必须战斗》的发言，他发言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开展对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说，“胡适对《红楼梦》及其他中国古典作品的研究，都是完全从美国资产阶

¹ 《光明日报》1954年11月8日

² 《人民日报》1954年12月9日

级主观唯心论——实用主义的观点出发的，因而也就没有可能作出正确的真正科学的评价。首先，他对古典作品的考证和评价，完全是为了反对革命的目的。其次，他对古典作品又单纯地只从它的语言形式，即白话来着眼，不去注重作品的思想内容和艺术价值。如果他对作品的思想内容和艺术价值做出什么判断，那几乎是完全错误的。”“我们知道，实用主义是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哲学家为了反对现代唯物论，挽救垂死的资产阶级而制造出来的一种反动哲学。它片面地强调主观‘经验’，曲解‘实践’；它根本否认外部物质世界及其客观规律性的存在；它认为凡是对于一个人有用的事情就是真理；引申来说，剥削、侵略对于帝国主义资产阶级有利，剥削、侵略也就是真理。”“胡适在1919年发表了一篇明目张胆地攻击开始传播到中国来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题名为《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文章；在这篇臭名昭著文章中，就表明了他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的最早的、最坚决的、不可调和的敌人。”

周扬最后指出，“胡适在政治上是反动的，是人人皆知的。从‘五四’以来他所长期宣传的实用主义的哲学思想在知识界还有它的影响。中国资产阶级思想的代表人物当然不止胡适一人，但他却是中国资产阶级思想的最主要的、集中的代表者。他涉猎的方面包括文学、哲学、历史、语言各个方面，而且他从美国资产阶级贩来的唯心论实用主义哲学则是他的思想根本。资产阶级唯心论是有各式各样表现的，它在人民和知识分子的头脑中还占有很大的地盘……因此，全面地、彻底地揭露和批判胡适派资产阶级的唯心论，就是当前马克思主义的十分重要的战斗的任务。”¹

由此可以看出，批判胡适的思想是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早在新文化运动时期，胡适作为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者、发挥者、运用者，对中国知识界，尤其在思想界、文化界产生很大的影响，这种影响还根深蒂固。领导者发动这次批判胡适资产阶级唯心论思想目的，是通过批判，使人们，主要是思想文化界的人们，从思想上分清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界线，借此树立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革命人生观；在政治上认清胡适的反动政治面貌，让胡适派的著名知识分子同胡适划清界线，这完全是为当时的政治、思想的需要，即为树立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全盘学习苏联，批判或搞臭

¹ 《文艺报》1954年第23-24号，第13-15页

西方资产阶级反动思想，主要是批臭或肃清亲美、崇美、恐美的西方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

根据中央部署，集中力量开始对胡适思想展开全方位的批判。

首先批判胡适的实用主义哲学。1955年1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艾思奇题为《胡适实用主义哲学的反革命性和反科学性》文章。艾文开头指出，“实用主义是美国资本主义土壤里生长起来的一种最反动最腐朽的唯心论哲学”。“胡适这个美国的文化买办，把实用主义拿到中国来贩卖”，“就是用实用主义来帮着反动派坚决反对开始送来的马克思主义这个科学的思想”。“实用主义反科学性反革命性的真面目是：主观唯心论、不可知论、庸俗进化论”。主要观点如下：

第一，实用主义就是主观唯心论。“实用主义的世界观，否认了物质世界的客观实在性，而把周围世界看做仅是人的感觉和感觉的复合”。“实用主义既然否认了物质世界的客观实在性，而把‘实在’看做感觉等主观要素的复合，它就不能不由此作出荒谬绝伦的结论，认为‘实在’是完全依靠着人的意志而变化的”。“胡适说，‘实在’是我们自己改造过的‘实在’。这个‘实在’里面含有无数人造的分子。‘实在’是一个很服从的女孩子，她百依百顺的由我们涂抹起来，装扮起来”。“在这里，实用主义的主观唯心论的面目已十分露骨地表现出来，它的荒谬可笑，也是非常明白”。

第二，实用主义认识论是主观唯心论的——不可知的认识论。实用主义的认识论“是一种不可知论的、主观唯心论的认识论”。“实用主义者既然否认了物质世界的客观实在性，也就否认了任何能够反映客观事物及其变化发展规律的知识”。“实用主义者认为人的认识不能反映感觉以外的任何客观事物及其内部规律性……即使科学规律的知识，也被实用主义者看作主观的虚构，而不是客观事物发展规律的反映。胡适说：‘科学律例是人造的，是假定的’。口头上经常挂着科学两字的实用主义者，却这样无羞耻地来污蔑科学”。

第三，实用主义的真理观是抹杀真伪标准的‘真理’观。“实用主义把真理看做是纯粹主观的东西，实用主义者否认了任何可能反映客观事物及其发展规律的知识，把人的认识看做仅仅是人的主观地虚构出来的‘应付环境的工具’。他们所关心的只是一种知识、思想能否帮助他们达到按照他们的主观要求来‘应付环境’的目的”。所以“胡适说：‘真理是对付这个境地的方法，所以它若不

能对付，便不是真理，它能对付，便是真理’。‘科学律例不过是一些最适用的假设，不过是现在公认为解释自然现象最方便的假设’。所以，在实用主义者看来，一种思想是否科学真理，是决定于它是否被人们‘现在公认’为‘最方便的假设’一个主观的标准”。“实用主义者捏造这种抹杀客观真伪标准的‘真理’观，原来也正是为着要使它成为反动派用来抹杀革命真理，任意‘涂抹’现实，任意捏造谎言这样一种‘应付环境’的工具”。

第四，实用主义的进化论不是科学的进化论，而是庸俗的进化论。“实用主义者用生物进化论学说的名义作为自己的反科学思想的假面具”，“用进化论的原理来解释人类的生活。谁都知道人类社会生活有自己的特殊的发展规律，决不能简单地归结到生物界的进化论规律之内，实用主义者这样做，是既曲解了人类生活，也曲解了生物进化论学说”。“胡适散布‘一点一滴的进化’，‘一点一滴的改造’的谬论，否认‘根本的解决’，并把这也假装作科学的进化论的思想，人们知道，胡适这种臭名昭著的谬论，是在五四运动以后不久，中国先进人物开始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思想，开始反封、反帝高涨时候散布出来的”。胡适“散布这种胡说的作用，无非是想借此否认自然和社会发展过程中必然规律的存在，否认阶级矛盾、新旧事物矛盾及其诸方面的斗争是自然和社会发展的根本内容和源泉，也就是妄想借此来反对科学规律知识，反对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想和广大人民的革命运动”。

第五，艾文指出，实用主义的方法不是科学方法，是主观唯心论者“应付环境”的方法。“实用主义者以‘实验室的态度’作为科学的方法，其实，这种方法根本不能帮助我们发现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性，它实际上是主观唯心论的虚构事实的方法，是帮助反动派‘应付环境’进行垂死挣扎的方法。”“实用主义的方法仅仅在形式方面好像是科学的。”胡适把这形式简称是“细心搜求事实，大胆提出假设，再细心求证实”。“要揭露实用主义的方法的反科学性，必须把它的形式和它的主观唯心论的内容联系起来进行批判。”“‘细心搜求事实’。实用主义者所标榜要搜集的‘事实’，并不是真正科学研究开始时所要求的事实”。“他们是依照主观的‘兴趣和意志下选择的目标’，依照偶然的‘疑难的境地来提出问题和着手研究’。“凭着自己主观的‘兴趣和意志’把一些次要事实和问题作为研究的重点。所以胡适把古典文学的作者、本事的考据作为研究的主要目标，而把作品的社会背景和阶级内容根本撇开

不谈。”“大胆提出假设”。主观唯心论者——实用主义者在研究问题时，“他们的目的是在于要依着主观的‘兴趣和意志定下’的‘选择的目标’，来找到某种‘应付环境的工具’，他们本来不敢面对客观真理，所以就不得不做出种种‘大胆的假设’，也不怕这些‘大胆的假设’终归要成为骗人的‘大胆’的虚构和‘大胆’的武断。胡适为了帮助反动派满足‘应付’人民革命运动的目的，不惜武断地说帝国主义者也希望中国的统一与和平，并没有侵略中国”。“在这里，‘大胆的假设’与科学研究的方法根本没有关系，它只是帮助反动派虚构了一些无知的谎言”。“再‘细心求证实’。实用主义只是说要‘细心’地按照自己的主观需要，拉扯一些表面现象，来掩饰自己的谎言”。“胡适可以拉一篇帝国主义者的表面上冠冕堂皇的宣言，来‘证实’帝国主义者也希望中国和平与统一，可以把美国在中国办的利用来欺骗和侵略工具的教会、学校、医院等等，作为帝国主义不要侵略中国的‘证据’。这里，实用主义者的主观唯心论又起了方法的作用”。“实用主义者所谓的‘细心求证实’，原来又可以解释为用表面现象来掩盖事情的本质的意思！很显然，真正科学方法对于认识的客观真理性所要求的实践的检验，决不是这种骗人的东西！”¹

胡绳、孙定国、李达等专家学者写文章、著书、开会批判胡适的哲学思想、政治思想，基本上都缺乏说服力，帽子棍子一大堆。就不一一引用了。

其次，批判胡适的历史观。1955年1月6日《光明日报》刊登北京大学历史系教师座谈会上《批判胡适主观唯心论的历史观和方法论》。著名史学家翦伯赞作了总结发言：“各位的发言中，都认为胡适的历史知识很浅薄，有些蔑视他的思想。关于这一点，想略加补充，他还是有他的一套，否则他就不能哗众取宠、欺世盗名，横行中国学术界达三十几年之久，把许多人变成他的俘虏，甚至在解放以后，他的影响还没有消灭。因此，对胡适要有一个恰如其分的估计。否则就会贬低反对胡适资产阶级唯心论这场斗争的严重意义。”他一方面指出，“胡适已经是一条死狗，我们现在还打死狗”，“理由很简单，因为这条死狗和其他死狗不同，他的阴魂未散，还在新中国做怪，他还企图在新中国借尸还魂”。另一方面要求大家反思“身上有没有胡适的阴魂，如果有就把他赶走，因此，打这条

¹ 《人民日报》1955年1月22日

死狗比打活狗更要困难，所以必须投些力量”。¹

1955年《历史研究》第四期发表了嵇文甫《批判胡适的多元历史观》文章。嵇文指出，“我反复推究胡适这个多元历史观，觉得他始终只是在唯心论、偶然论、个人主义里面转圈子。他所看到的‘人’不是社会历史的范畴，而是生物学上的范畴”。“他所看到的社会历史，不是在一定物质基础上、合规律地、不随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而只是许许多多孤立的个人，一个一个的自然人的偶然聚集，茫荡荡的社会，孤单单的个人，这就是胡适的人生观、社会观、历史观”。嵇文指出，“胡适的多元历史观完全是欺骗人民，为帝国主义和反动统治者服务的一种思想工具。说是历史多元论，实际上乃是彻头彻尾的一种历史唯心论。他处处回避根本问题，不承认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性”。²

再次，批判胡适的文学观点。1955年5月号《人民文学》发表了何其芳撰写的《胡适文学史观点批判》一文，指出：“关于我国的古典文学和文学史，胡适的主要谬论观点：他最喜欢鼓吹他的‘历史进化的文学观念’，这个观念是反历史反科学的，是他借以宣传主观唯心论和唯心论历史观的一种形式；他把这个观念应用到对于整个文学史上的看法上，也是很悖谬很混乱的，其中又暴露出来了他的文学工具至上的形式主义观点；他污蔑我们的文学史为‘一部文字形式（工具）新陈代谢的历史’，并妄称‘白话文学史就是中国文学史的中心部分，从而否定我国文艺学的异常丰富的思想内容，异常长久的现实主义传统；最后，胡适以他可耻的世界主义的观点，污蔑我国的文学‘不如人’，从而鼓吹民族自卑心理，代替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做前驱。所有他这些观点的谬论和反动，都充分表现了实用主义哲学上唯心主义本质，在政治上的直接为帝国主义服务的目的。”³

对胡适教育思想批判。1955年1月号《人民教育》刊登北京师范大学陈友松批判《胡适在教育方面的反动影响》文章。他指出：“总起来说，胡适的资产阶级思想在中国的毒害是多方面的。他对教育界的影响是通过他的一般著作，在教育的方向以及对研究教育的方法上发生了反动作用。他坚持主观唯心论的实验主义观点，反

¹ 《光明日报》1955年1月6日

² 《历史研究》1955年第4期

³ 《人民文学》1955年5月号

人民、反社会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以及伪科学的方法，欺骗了一般青年和教师们，作了美帝国主义的代言人。”¹

上述所有的批判文章几乎都是奉命写的，真正出于自愿批判的个别人也是有其别的动机和目的，有的是为了交差，有的是为了与胡适划清界线，有的是为了表白进步等等不一而足，也有极个别的是出于所谓的公心，维护革命利益，但是那些批判不能说服人，甚至连胡适的书籍也没有看，即使读了也没有读懂，真是无知批有知，根本谈不上什么批判，无非就是戴上政治大帽子，喊些政治口号，再者就是人身攻击，以便达到从政治上搞臭一个人。企望使亲胡适、受胡适影响的人解脱出来，肃清胡适在中国的政治影响。这就是批判发动者和批判者的愿望。

在这种大批判背景下，与胡适同过事的、有过交往的、受其影响的专家、学者也联系自己的思想来批判胡适，这是批判运动的主要目的之一。

1955年第一期《哲学研究》刊登了冯友兰撰写《哲学史与政治——论胡适哲学史和他的反动的政治路线的联系》文章。冯文指出：“实用主义者的胡适，本来认为历史是可以随便摆弄的。历史像一个‘千依百顺的女孩子’，是可以随便装扮涂抹的。他的中国哲学史工作，就是随便装扮涂抹中国哲学史，以反抗中国革命形势的发展，为帝国主义服务。”“根据胡适在四个时期的关于哲学史的有代表性的著作以揭露他的哲学史工作的反动本质：（1）‘五四’运动时期——《中国哲学史大纲》，（2）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戴东原的哲学》，（3）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中古哲学史》，（4）抗日战争时期——《说儒》。他的这些著作的主要锋芒，都是针对着这些时期革命形势的发展，都是与当时的革命形势相对抗的。”冯友兰在文章结尾联系自己检查说：“在‘五四’以后，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在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大资产阶级与地主阶级联盟，反抗革命。他们底搞中国哲学史的反动知识分子，都用各种方法，把中国哲学史的某些方面加以夸张，为国民党反动派的复古运动服务，以反抗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胡适和我都在其中扮演重要的角色。本来无所谓‘为学术而学术的’历史学，历史是过去的事，但是历史家是现在属于一定阶级的人。历史学跟任何科学一样，都有它的阶级的烙印，都有现实意义的……但是我们

¹《人民教育》1955年1月号

的思想中，如果有资产阶级思想的残余，我们就不能认识哲学史的真相，而我们的工作还是为资产阶级服务。俞平伯先生的《红楼梦》研究工作就是具体的例证。这是从事古典文化研究工作的人，尤其是像我过去是与胡适“殊途同归”的人，所应该深自警惕的。”¹

1955年1月19日，《人民日报》刊登贺麟的《两点批判，一点反省》文章。文中说，“胡适所传播的是西方帝国主义的反动资产阶级唯心论思想，特别是美国詹姆士和杜威那一派的反动实用主义或实验主义哲学；胡适的反动思想是旧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突出的反映，它是有代表性、典型性的意识形态；胡适的资产阶级唯心论思想并不是他一个人，或仅只他的少数门徒和俞平伯先生等孤立的独特的思想，而是广泛存在着的现象”。贺麟自我批判说：“简言之，我曾经宣扬神秘化的直觉和直觉化的唯心辩证法以对抗唯物辩证法，我曾经要求把儒家思想更宗教化，更其与西方资产阶级唯心论相结合，以便更好为蒋介石所御用的旧三民主义作‘哲学基础’，以抵制马克思主义哲学”。“尤其反动的是因为蒋介石也喜欢一种很神秘唯心的辩证法，我还很无耻地迎合他的意旨，企图用唯心辩证法正反合的公式来阐述旧三民主义以反抗共产主义”。

“总之，我自己检查一下（虽说还揭露得很不够），我宣扬唯心论比胡适更公开、更放肆，我提倡直觉比梁漱溟先生更极端、更神秘。我用唯心论和唯心论辩证法直接去为旧三民主义辩护，直接为蒋匪的法西斯统治服务，也到了公开无耻、亵渎哲学和辩证法的程度”最后文章表示，“我希望通过这次对胡适批判广泛而深入的无产阶级思想对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在许多人，特别在旧知识分子中，在思想上、生活上、学术研究工作上可以引起一个根本的改造”。²

1955年2月28日，《文汇报》刊登了陈鹤琴《我控诉杜威这个大骗子》为题的发言：从杜威反动实用主义教育思想上的教育目的论、儿童中心课程论、儿童中心教育方法论等几个方面联系自己，批判杜威教育思想的反动本质。他说，“让我检查一下我在解放以前怎样配合杜威的几个基本的反动思想而在中国麻醉青年、毒害儿童的。我曾提倡过一种反动教育体系，叫做活教育。活教育名义上是反对当时‘读死书、死读书、读书死’的形式主义教育，但实际上却是一种杜威个人主义的狭隘的实用主义教育思想的翻版”。他

¹ 《哲学研究》1955年第1期

² 《人民日报》1955年1月19日

最后检讨说，“解放前，我是这样一个中了杜威反动实用主义教育思想毒枪而受了重伤的人”，党和毛泽东“挽救了我，医治了我，解放了我，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照亮了我光明的前途，指示了我前进的方向”。¹

除上述几位知名学者联系自己的思想检查外，还有罗尔纲、罗根泽、周汝昌，李长之、吴景超、向达等专家、学者都联系自己的思想，同时批判胡适的思想。他们的自我批判完全是迫于形势，表明政治态度，做出违心的检查，到头来并没有真正解决思想问题。1955年5月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胡适思想批判运动的情况和今后工作的报告》中承认“旧学者”有消极不满情绪，报告说：“这次思想斗争，大部分旧学者都参加了进来，受到了一定的教育，少数并开始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对胡适思想进行了认真的批判，而且联系到自己的唯心主义思想，作了自我批评。但是，还有很多旧学者仍然带着消极、被动情绪，他们虽然表示了态度，批评了胡适，但批评不少是浮浅枝节，轻描淡写，口气缓和，并且不愿联系自己的唯心主义思想。有的甚至表面一套，背后一套，文章上表示反对唯心主义，而在谈话时坚持自己唯心主义的观点。还有不少则仍然在一旁观望，不表示态度。许多旧学者害怕批评到自己头上，影响自己的名誉、地位、薪金，等等。一般旧学者，对这一批判运动普遍不满的有两点：一是迷惑于胡适的‘历史功绩’和‘学术权威’，认为胡适是‘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五四启蒙运动的重要人物’，认为胡适‘治学是严谨的’、‘值得学习’，主张‘还胡适以真面目’、‘去伪留真，不要一笔抹煞’，才算‘公平’（对杜威也是如此，认为杜威是‘美国的哲学权威，他的话几乎没人敢驳’，认为实用主义是‘美国科学与工业的产物’，‘就是斯大林所称赞的美国人的求实精神’，认为杜威帮助中国改革学制，功劳很大），对批评者完全否定胡适、杜威，表示不满。一是认为批评者对胡适、杜威的著作没有好好研究。‘引来引去只是那几句话’，‘外行看来还可以，内行看来是无的放矢’，认为批评文章的质量不高，说服不了人。但是，这些不满，一般都是背后在少数人面前表示的。个别人，如中山大学容庚，则在去年十二月的讨论会上公开发言为胡适的‘学术成绩’辩护，并要求中大校刊发表他的发言稿（该刊发表了他的发言稿，并发表了批评文章）。中山大学教授陈寅恪则更

¹ 《文汇报》1955年2月28日

恶毒地诬蔑这次批判运动，骂别人做了‘共产党的应声虫’，是‘一犬吠影，百犬吠声’。”¹这些著名学者的不满在后来“鸣放”时期就释放出来，最后被整肃。

1955年5月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胡适思想批判运动的情况和今后工作的报告》就有评估，其中承认：许多论文在批判方法上还有许多缺点，有时个别论点还有错误。批判方法方面的缺点是许多作者不善于从根本上抓住胡适思想的实质，不善于揭露胡适思想内部的自我矛盾混乱，不善于揭露胡适骗人的手法，常常摘引胡适的几句话就大做文章，用驳斥胡适每一句话的方法来进行战斗，甚至还不符合原意地加以引申，连同胡适用来伪装自己的、本意正确的话也加以否定。有的文章论证不多，说理不够，结论武断。有的作者过多地注意胡适的家世与私德，而对胡适思想却分析不够。论点方面的错误是有些作者在驳斥胡适的错误观点时，走到另外一个极端，如在反胡适的改良主义时认为“革命是革命阶级实行的，改良是反革命阶级实行的”；认为马克思主义只是代表群众的最高利益，而没有正确地说明群众的长远利益和目前利益的统一，似乎马克思主义者可以不重视群众的个人利益与目前利益。如有些作者在揭发胡适的思想的本质是买办思想的时候，却武断地说胡适提倡白话文，是反映了美国对中国进行经济侵略需要“统一的语言”的要求，反映了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的矛盾；认为胡适的“所谓‘文学改良’的大旗是一面反革命的旗子”。此外，还有个别作者在写批判文章时，粗枝大叶，发生个别事实的错误，如把实用主义头子约翰·杜威和美国共和党头子托马斯·杜威弄成一个人，说约翰·杜威“竞选过美国总统”。²中央宣传部承认有缺点、错误。

毛泽东在1955年10月11日《在中共七届六中扩大全会的结论》中指出：“在阶级斗争中，我们已经取得了许多的胜利，并且将要继续取得胜利。拿过去一年国内阶级斗争来说，我们主要做了四件事：一个是进行反唯心论的斗争，一个是镇压反革命，一个是解决粮食问题，一个是解决农业合作化的问题。在这四个问题上的斗争，都带着对资产阶级斗争的性质，给了资产阶级严重的打击，并且在继续给他们以粉碎性的打击。反唯心论的斗争，从研究《红楼梦》那个问题上开始，还批评了《文艺报》，以后又批判胡适，批判梁漱

¹ 国防大学《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20册，第563页

² 国防大学《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20册，第564页

溟，已经搞了一年。我们要把唯心论切实地反一下，准备搞三个五年计划。”¹在这里预示着毛泽东继续给资产阶级以粉碎性打击，还要准备同唯心论斗下去。

1957年2月16日，毛泽东《在颐年堂的讲话》中指出：“过去批判胡适取得很大的成功，开头我们说，不能全抹煞胡适，他对中国的启蒙运动起了作用。”“胡适说，我是他的学生。他当教授，我当小职员，工资不一样，但我不是他的学生。现在不必恢复胡适的名誉，到二十一世纪再研究这个问题吧。过去因为斗争，所以讲缺点，今天也不必平反。今天他是帝国主义走狗。到二十一世纪，历史上还是要讲清楚的。”²这意思是说，毛泽东发动批判胡适已“取得很大成功”；肯定胡适“对中国的启蒙运动起了作用”，有缺点也不必平反，恢复名誉；到二十一世纪再讲清楚，这是把问题和矛盾往下交，让后人去解决。这个讲话后来公开发表时作了技术处理。毛泽东承认，“我们开始批判胡适的时候很好，但后来就有点片面性了，把胡适全部抹煞了，以后要写一两篇文章补救一下。”³这个“补救”并没有落实，只是一句空话。实际上，毛泽东预计到，对胡适要作出公正、客观的评价。可是，没等到二十一世纪，就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后，就对胡适作出较为客观、公正的评价。

1979年，在纪念“五四”六十周年，胡适作为新文化运动的著名领袖的历史地位被充分肯定。任继愈先生评价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时指出：“五四前夕，胡适出版了《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这本书得到了当时提倡新文化的进步人士蔡元培的赏识，随后又得到社会上的广泛重视。胡适打破了封建学者不敢触及的禁区，即经学。‘经’是圣贤垂训的典籍，封建社会的一切成员，只能宣传它、解释它、信奉它，不能怀疑它，不准议论它，更不能批判它。”“据当时人的印象，读了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使人耳目一新。……当时人认为‘新’的地方，主要在于它不同于封建时代哲学史书代圣贤立言为经传作注释，而敢于打破封建时代沿袭下来的不准议论古代圣贤的禁例。他把孔丘和其他哲学家摆在同样的地位，供人们评论，这是一个大变革。”⁴任继愈先生曾是批判胡适

¹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199页

² 《毛泽东思想万岁》1949-57卷144页

³ 引自《党的文献》，2002年第4期第18页

⁴ 《哲学研究》1979年第9期

的参与者，拨乱反正后，在《学习中国哲学史的三十年》一文中对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作出破旧创新的公正评价。

1986年10月至11月3日，《光明日报》连续刊登白吉庵撰写《胡适传》，共28章，该书于1993年12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白吉庵指出：“纵观胡适一生，他是我国近代史上资产阶级在学术方面的权威人物，其著作极富，桃李遍天下，对我国的新文化运动和教育事业做过巨大贡献。在哲学、文学，考证学等领域都有开创的功绩，称得起是一代宗匠。但在政治上由于脱离实际，顽固坚持其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立场，结果由反动而走上反共的道路，因此违背潮流被时代所抛弃，这是他一生悲剧之所在。”¹

李泽厚评价胡适时指出：胡适首倡白话文学，积极参加和领导了当时的新文化运动，这是胡适第一大贡献。胡适在中国现代思想史上的第二大主要贡献，是给当时学术界以破旧创新的空前冲击。胡适在中国现代思想史上的第三个但并不成功的贡献，是他企图在哲学上介绍和提倡一种认为能普遍适用的方法论，这就是杜威的实用主义。胡适由一个主张西方民主的自由主义者，因为批评国民党的统治遭到国民党的文字围攻和文章查禁，最后倒向蒋政权，成为官方和半官方的学者了。²

90年代李振霞撰写《中国现代哲学人物评传》对胡适作了这样的评估：胡适作为学者，“他一生的贡献是多方面的。他学贯中西，博古通今，从事文学革命，提倡与撰写白话诗文，考证中国古代历史与古典文学，研究整理中国哲学史，评论中国社会的现实问题，等等。贡献杰出，博得中外承认，一生获取了美国、英国、加拿大及香港等国家和地区一些大学授予的荣誉博士学位35个”。“作为哲学家的胡适，他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是复杂的，也像他的一生一样，有功有过，成功与失败、悲剧和喜剧。对于任何一方面的夸张和否定，都将带来对这位复杂人物评价的失真”。“他一生‘挚着’地追求改良，否定革命，最后一再失败，不得不在晚年作为流亡寓公，居留美国，客死台湾”。³

1991年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书中对胡适派批判作出的评价：“1954年，毛泽东从支持两位青年

¹ 《光明日报》1986年10月至11月3日

² 参见《中国现代思想史论》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88-99页

³ 引自《中国现代哲学人物评传》下，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60-63页

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批评文章开始，有领导发动了一场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广泛批判。胡适是五四运动以后思想文化领域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中影响最大的一位”。“党发动这两次批判，提出的问题是重大的，进行这样的工作是必要的”。“但是，思想问题和学术问题是属于精神世界的很复杂的问题，采取批判运动的方法来解决，容易流于简单和片面，学术上的不同意见难以展开争论。这两次批判已经有把学术文化问题当作政治斗争并加以尖锐化的倾向，因而有其消极的方面”。¹

胡绳也积极参加胡适思想批判，晚年有所醒悟，有所忏悔，敢于说真话、实话。他对吴江评价胡适给予高度肯定。“1998年在他病榻上读了吴江在《炎黄春秋》发表的《平心论胡适》一文后，因吴江文章对胡适的评价中肯公允，远比解放以来大陆所有评胡适的文章实事求是，便立即给吴江写信，除赞同吴文外，还动情地作了一些极不平常的表示。吴江文中称：‘胡适是现代中国文化界学术界最有成就具有影响力的人物之一，堪称一代宗师，桃李满天下’；‘胡适对于中国文化最杰出的贡献，在于他首创文学革命，成功地推行了白话文运动，这对于提高整个国民文化水平乃至解放国民思想都有重大的意义’；‘这种贡献实要超过‘文起八代之衰’的韩退之，亦不逊于西方……文艺复兴的但丁和马丁·路德等人。’特别是吴江文中对胡适倡导自由主义的前前后后，有很公允的一段议论，主要是，一为自由主义正名，说它‘是人类历史上争取自由、崇尚自由、推广自由的大运动’；二为胡适说公道话，说胡适是民国初年出现的‘一批自由主义战士和民主主义战士’之一，只不过后来走向了这一运动的右翼，但也因在台湾提倡言论自由得罪了国民党而遭到围攻，终在抑郁中以心脏病突发去世，从而完成了这位‘自由主义和民主主义战士’的‘悲剧’。这样写胡适论胡适，是很多年来以历史唯物主义为世界观的中国共产党人应做到而从未有人做到的。所以，胡绳在给吴江信中写道：‘今天读了《平心论胡适》文，甚快。……胡适在近代史上地位确实应大大提高。我从30年代始写过评论他和自由主义的文章数篇，但未能尽意。今得足下文，稍可顶50年代之数百万言。’”²

这两次批判，名为批判，实为政治声讨和围剿。胡适远在境外，

¹《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312—313页

²《胡绳病中来信和他最后关注的一个问题》，载《炎黄春秋》2001年第1期

是缺席被批、被声讨和围剿，国内的胡适派的代理人，像俞平伯、冯友兰、贺麟等迫于强大的政治压力，在自我检查、自我批判时，采取违心的、自责、自毁、自我抹黑、无限上纲上线的办法来表明态度，否则难以过关。

这两次批判，都是毛泽东发动的，批判的问题已经定了调子，划了框框，一经发动，很快形成运动，批判者的批判比发动者更胜一筹，政治上无限上纲，方式方法上简单、片面、粗暴、武断，言辞上过分激烈尖刻，发言，写文章的内容上出自同一个腔、同一个调，都是奉命行事。被批判者完全处于被动的地位，完全没有申辩的权利，只能听取、接受批判者的批评、批判、指责和裁决，处于被审判的境地。胡适被当作“死老虎”、“落水狗”去打，来个缺席批判、审判，这完全是出于政治需要。

实践证明，这两次批判运动的后果，对思想学术文化的争论形成一家独鸣、形而上学开始盛行的局面，对整个思想学术文化的发展起了消极作用。对胡适思想批判运动实为一场人为的阶级斗争演习，为以后的阶级斗争提供的思想理论、干部队伍上的准备。涌现出一批政治批判的爆破手或打手，这批人后来专门靠写政治大批判文章吃饭、升官，这对意识形态领域起到了相当恶劣的消极作用，至今还未完全消失。

第三节 批判资产阶级唯心论思想【二】

一、批判梁漱溟的“反动思想”

毛泽东批梁漱溟的原因及其内容。1953年9月9日，梁漱溟在全国政协分组会上讨论总路线时，谈了一点感想，他说：“这一总路线原是人人意中所有的，章伯钧先生更发挥了周总理所讲的话，我于此深表赞同，没有什么新的意见可说。路线既不成问题，那么就看怎样去做了。要把事情做好，全靠人人关心这一事业，发现不论大小问题，随时反映给负责方面，以求减少工作上的错误。例如《人民日报》读者来信栏，时常有人把他们见到的问题写信提出来，而党报收到来信亦马上能注意检查或交给主管机关部门去检查纠正，这就是最好的……这种精神，在贯彻执行过渡时期总路线是应该继续发扬。只有自始至终发扬民主，领导党又能认真听取意见，这建

国运动才能变成人民群众的自觉行动，其效率就能倍增。”¹

梁漱溟发言后，周总理要他在明天大会上发言，梁说，好，回到家中思考准备发言稿，他想，现在是领导党的负责人要我在大会讲话，我应该说了些对领导有所贡献的话。9月10日，准备发言的人多，改为9月11日。

9月11日，梁漱溟在政协会议上作大会发言，其要点如下：第一，几十年来我一直怀抱计划建国的理想，虽然不晓得新民主主义之说，但其理想和目标却大体相合。由于建国的计划必须方方面面相配合和合，我推想政府除了已经给我们讲过的建设重工业和改造私营工商业两方面之外，像轻工业、交通运输业等等如何相应地发展，亦必有计划，希望亦讲给我们知道。第二，由于建国运动必须发动群众、依靠群众来完成我们的计划，就使我想到群众工作问题。在建设工业上，我推想有工会组织可依靠就可以了；在改造私营工商业上，亦有店员会、工商联和民主建国会；在发展农业上，推想或者是要靠农会。然而农会虽在土改中起了主要作用，土改后似已作用渐微。那么，现在只有依靠乡村的党政干部了。据我所闻，乡村干部的作风，很有强迫命令，包办代替的，其质量似乎都不大够，依我的理想，对于乡村的群众，尤其必须多下教育功夫，单单传达政令是不行的。我多年曾有纳社会运动于教育制度之中的想法，这里不必细说，但希望政府注意有更好的安排。第三，是我想着重点出的，那就是农民问题或乡村问题。特别是近几年来，城里的工人生活提高的快，而乡村的农民生活却依然很苦，所以各地乡下人都向城里（包括北京）跑，城里不能容，又赶他们回去，形成矛盾。有人说，如今工人的生活在地，农民的生活在九地，有“九天九地”之差，这话值得引起注意。我们的建国运动如果忽略或遗漏了中国人民的大多数——农民，那是不相宜的，尤其中共之成为领导党，主要亦在过去依靠了农民，今天要忽视他们，人家会说你们进了城，抛弃他们了。这一问题，望政府引起重视。²

9月12日，毛泽东不点名的批判梁漱溟的发言，说：“有人不同意我们的总路线，认为农民生活苦，要求照顾农民……有人竟班门弄斧，似乎我们共产党搞了几十年的农民运动，还不了解农民。笑话！我们今天的政权基础是工农联盟，工人农民在根本利益上是

¹ 汪东林《梁漱溟问答录》，湖南出版社1992年版，第130页

² 转引汪东林《梁漱溟问答录》，湖南出版社1992年版，第131-132页

一致的，这一基础是不容分裂，不容破坏的！”¹

梁漱溟听了不点名的批评后，当晚写信：“听了主席的一番话，明白实为我昨日的讲话而发。但我不能领会主席的批评，我不仅不反对总路线，而且是拥护总路线的。主席在这样的场合，说这样的话，是不妥当的。不仅我本人受屈，而且会波及他人，谁还敢对领导党贡献肺腑之言呢？”9月13日上午将信件面交毛泽东，毛泽东当晚约梁漱溟谈话，谈话时间十分匆促，梁要求毛解除误会，而毛则坚谓梁漱溟是反对经济建设总路线之人，只是不得自明或不承认而已。梁漱溟甚感失望，言语间频频冲突，结果不欢而散。²

9月16日，梁漱溟经过毛泽东同意，在大会上发言，一是复述9日的发言，二是复述11日的发言，上述的发言再三陈述自己并不反对总路线，而是热烈拥护总路线的。

由于梁漱溟的发言和给主席的信，不甘蒙屈和好强逞能，结果招致毛泽东和其他领导对他进行了严厉的批判。9月16日-18日，毛泽东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27次会议期间，做了题为《批判梁漱溟的反动思想》的发言，分16个部分，现摘要其中最主要部分：

第一，“梁漱溟先生是不是‘有骨气的人’，他在和平谈判中演了什么角色？”“如果你是一个有‘骨气’的人，那就把你的历史，过去怎样反共反人民，怎样用笔杆子杀人，跟韩复榘、张东荪、陈立夫、张群究竟是什么关系，向大家交代交代嘛！”“他们那样高兴你，骂我是‘土匪’，称你是先生！我就怀疑，你这个人是一党那一派！不仅我怀疑，还有许多人怀疑。”“梁先生的立场是完全帮助蒋介石的。蒋介石同意和平谈判是假的。”“讲老实话，蒋介石用枪杆子杀人，梁漱溟用笔杆子杀人……伪装得最巧妙，杀人不见血的，是用笔杀人。你就是这样一个杀人犯。”“梁漱溟反动透顶，他就是不承认，他说他美得很……你梁漱溟的功在哪里？一丝也没有，一毫也没有。”

第二，“梁漱溟提出所谓‘九天九地’，‘工人在九天之上，农民在九地之下’，工人有工会可靠，农会却靠不住，党、团、妇联等也靠不住，质、量都不行，比工商联也差，因此无信心。这是‘赞成总路线’吗？否！完全的彻底的反动思想，这是反动化的建议，不是合理化建议，人民政府是否采纳这种建议呢？我认为是不可能的。”

¹ 汪东林《梁漱溟问答录》，湖南出版社1992年版，第132-133页

² 转引汪东林《梁漱溟问答录》湖南出版社1992年版，第133页

第三，“梁先生‘要求多知道一些计划内容’。我不赞成。这个人是不可信任的。”“梁先生把他自己的像画得很美。果然这样美吗？不见得。”“我对他说过：中国的特点是半殖民地半封建，你不承认这点，你就帮助了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所以，什么人也不相信你那一套，人民都相信了共产党，你的书没有人看，你的话没有人听，除非反动分子，或者头脑糊涂的人们。”

第四，“梁先生又提出要求，要我们把他划入进步派和革命派一类，而不要把他划入不进步派，或者反动派一类。这是一个‘划成分’的问题，怎样处理呢？这个要求也不宜轻易答应，看一看再讲。”

“我认为梁漱溟应该交代清楚他的反人民的反动思想的历史发展过程。他过去是怎样代表地主反共反人民的，现在又如何由代表地主的立场转到‘代表农民’的立场上来了，他能说明这个变化过程，并使人们信服，那时方能确定究竟应当把他归入哪一类。他给我的印象是：他是从来不考虑改变他的反动立场的。”

第五，“‘羞恶之心，人皆有之’，人不害羞，事情就难办了。说梁先生对于农民问题的见解比共产党还高明，有谁相信呢？班门弄斧……他说他比共产党更能代表农民，难道还不滑稽吗？”“他们是代表地主阶级的，是帮地主阶级忙的。其中最突出的，花言巧语的，实际上帮助敌人的，是梁漱溟。”“梁漱溟是野心家，是伪君子。他不问政治是假的，不想做官也是假的。他搞所谓‘乡村建设’，有什么‘乡村建设’呀？是地主建设，是乡村破坏，是国家灭亡。”

第六，“梁漱溟没有一点功劳，没有一点好处”。“为什么他又能当上政协全国委员会的委员呢？中共为什么提他做这个委员呢？就是因为他还能欺骗一部分人，还有一点欺骗的作用。他就是凭这个骗人的资格，他就是有这个骗人的资格。”“我们这一点‘雅量’还是有的：你梁漱溟的政协委员还可以继续当下去。”“关于孔夫子的缺点，我认为就是不民主，没有自我批评的精神，有点像梁先生。孔夫子‘三月而诛少正卯’，很有些恶霸作风，法西斯气味。我愿朋友们，尤其是梁先生，不要学孔夫子这一套。”

第七，“照梁先生提高的纲，中国不但不能建成社会主义，而且还要亡党（共产党及其他）亡国。他的路线是资产阶级路线。”“梁漱溟说，工人在‘九天之上’，农民在‘九地之下’。事实如何呢？差别是有的。”“你梁漱溟有办法吗？你的意思是‘不患寡而患不均’。如果照你的办法去做，不是依靠农民自己劳动生产来增加他们的收

入，而是把工人的工资同农民的收入平均一下，拿一部分给农民，那不是要毁灭中国的工业吗？这样一拿，就要亡国亡党。”“你说工人在‘九天之上’，那你梁漱溟在哪一天之上呢？……因为你的薪水比工人的工资多得多嘛！……要是讲公道，那要首先降低你的薪水，因为你不仅是在‘九天之上’嘛！”“梁漱溟说，工农联盟破坏了，国家建设没有希望了。就是说，如果不采纳梁漱溟的意见，就没有希望搞好工农联盟，就办不好国家建设，社会主义也就没有希望了！梁漱溟所说的那种‘工农联盟’，确是没有希望的。你的路线是资产阶级路线。实行你的，结果就要亡国，中国就要回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老路，北京就要开会欢迎蒋介石、艾森豪威尔。我再说一遍，我们绝不采纳你的路线！”“梁漱溟说，我们进了城市，‘忘掉’了农村，农村‘空虚’了。这是挑拨。”“梁漱溟又攻击我们的农村工作‘落后’，下级干部‘违法乱纪’。现在乡村里面，所谓落后乡确是有的……在全国，好的和比较好的乡……是百分之九十。对于这种情况，我们要心中有数，不要上梁漱溟的当。”

第八，如果梁漱溟的“这类意见也可以称作‘谏’，我声明：确是‘拒谏’。饰非则不是。我们是坚持无产阶级对于一切问题的领导权，又团结，又斗争。如果想摸底，这又是一个底，这是一个带根本性的底。”

第九，“他的问题带有全国性……在全党和全国去讨论。找典型，批评和自我批评。在全国讨论总路线。”“梁漱溟，不是对他这一个人的问题，而是借他这个人揭露他代表的这种反动思想。梁漱溟是反动的，但我们还是把他的问题放在思想改造的范畴里头。”¹

这是一篇带有嬉笑怒骂、冷嘲热讽、无限上纲上线、不计后果、使人无地自容的毁灭性的批评。居然出自伟大领袖毛泽东之口，由此看出，毛泽东听不得党外人士不合他心意的意见，表露出了帝王思想和独断专行的大家长作风的残余。

理论界批判梁漱溟。1953年9月，毛泽东批判梁漱溟的“反动思想”后，为什么没有继续呢？因为毛泽东要处理“高饶事件”而暂时放弃了对梁漱溟思想的批判，待1954年解决“高饶事件”后，毛泽东的注意力又转移到思想文化领域内的阶级斗争，梁漱溟的问题又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先是批判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思想，接着批判胡风的文艺思想，与此同时从理论上批判梁漱溟的思想。由

¹ 《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107-115页

于领导上有步骤，有计划组织、动员理论界的学者、专家从文化理论、哲学观点和乡村建设理论等方面对梁漱溟进行总批判，很快形成批判运动高潮，到1955年年底基本结束。

1955年5月11日，人民日报首先刊登了冯友兰《批判梁漱溟先生的文化观和“村治”理论》文章。文章首先指出：“在过去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里，有反映帝国主义统治的帝国主义奴化思想，也有反映封建主义统治的封建主义复古思想，这两种思想都是马克思主义的敌人。”“在解放了的中国，帝国主义已被赶走了；封建主义作为一种社会制度已被消灭了。但是这两种反动的思想，在人们的头脑中的流毒，还是很严重的。近来对于胡适思想的批判，严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奴化思想。为了扫除走向社会主义道路上的障碍，封建主义复古思想也还是有待肃清的。”“梁漱溟先生所宣传的文化观和‘村治’理论就是典型的封建复古主义思想。”“梁先生于1921年发表了他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为封建主义抵挡一阵，由此成为当时封建主义复古思想的代表。”“梁先生所谓‘东方文化’、‘西方文化’，其实就是封建社会文化和资产阶级文化。”“可是梁先生把他们平列起来，认为这两种社会的文化是两种‘哲学’的表现。”冯友兰批判说，“为了反抗革命形势的发展，梁先生发展了‘村治’的理论和办法，在理论上和行动上直接保护封建主义。在这个斗争中，梁先生在他的《乡村建设理论》一书中把《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的空泛抽象的理论实际化具体化，最后归结为他的《中国文化要义》一书。”

照梁先生的意见，“中国文化的特点是所谓‘调和’‘持中’。所以，梁先生认为中国是伦理本位的社会，伦理的社会就是重情谊的社会。”“梁先生又认为在中国封建社会中，根本没有‘阶级对立’，只有‘职业分途’。”“梁先生就把这些歪曲事实的见解，作为他的‘村治’的理论基础。他费了很大的气力证明他的‘乡村建设理论’是符合于中国封建文化的传统的。其实这倒是无需证明的，因为它本来就是中国封建地主阶级麻醉农民的所谓‘调和哲学’，继续麻醉农民，企图使他们不要反抗，不要革命。”

冯友兰最后揭露说：“梁先生就提出了《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这就是他的‘村治’的办法和理论，其本质就是在乡村中建立地主武装，保护封建秩序，又企图用一套所谓教育和合作制度，麻醉农民，以对抗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农民运动，反对共产主义，反对革命。”“梁先生的‘村治’的主要目的，就是同中国共产党争

夺在农民中的领导权，企图以他的拥护地主阶级的反动的‘农民运动’替代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反抗地主阶级的革命的农民运动。”¹

1955年8月《新建设》杂志发表了贺麟《批判梁漱溟的直觉主义》文章。首先指出：“直觉主义是一种以公开反对科学和理智为主要特征的主观唯心论。由于反对理智、理性和科学，注重模糊混沌的直觉，因此它又是一种反理性主义和神秘主义。直觉主义，一方面把自我放在第一性的地位，一切从自我出发，所谓‘万物皆备于我’，‘吾心即是宇宙’、‘六经皆我注脚’等语，就是直觉主义的主观唯心主义者的口号。……另一方面，直觉主义主张破除人我界限，向往人我一体、人我不分、天人合一的神秘境界。”又指出，“梁漱溟所讲的直觉主义，也有这两方面。”“梁漱溟是一个妄自尊大的个人主义者，一贯以教主、救世主自居。代表直觉主义者梁漱溟‘万物皆备于我’、‘囊括宇宙’、‘自我陶醉’、‘唯我独尊’的一面。揭穿了这一面则他的直觉主义的另一面，如教人谦让克己，抑制个性，人我一体那一套，其虚伪性，其麻痹人的自觉和斗争意志的反动作用，便一看就更清楚了。”“简单讲来，梁漱溟思想中有两面：一面自己的妄自尊大，另一面叫人克己让人；一面培养少数特权阶级的个性伸张、自我扩张，直至发展到惟我独尊的发狂的个人主义，另一面叫人‘尊重对方，忘了自己’，‘舍自己的立场而以对方的立场为立场’，这就叫做‘人我一体’的情绪。在这种教育下，人可以不要个性，不要自我，放弃任何方式的斗争，特别是阶级斗争。这正反映了直觉主义的两面，也反映了封建统治阶级所要求的两面。”

贺麟对梁漱溟这种极端反动思想的哲学根据，作进一步的批判与揭露：“直觉主义是唯意志或生命为第一性的主观唯心论的世界观”；“直觉主义在认识论上的反科学性，其表现：认宗教为一切文化的源泉，直觉主义利用不可知论以反对唯物论，为宗教、封建伦理留地位，直觉主义是唯识论和柏格森思想的杂种”；“梁漱溟所谓‘理性’和直觉同一的东西及其反动内容，其表现：当他（梁漱溟）宣扬直觉主义时，他是公开地反对以理智为基础的科学和民主，而潜在地反对阶级斗争，当他在‘理性’的掩盖下，仍旧提倡直觉主义时，他已由反科学和民主进而以公开反对共产主义和阶级斗争为主要对象了，他提出‘职业殊途’代替了‘阶级对立’，固

¹ 冯友兰《批判梁漱溟先生的文化观和“村治”理论》，《人民日报》1955年5月11日

然在反对阶级斗争，而他宣扬‘理性’即‘直觉’的‘物我一体、人我一体’的神秘境界时，亦在从认识论上、从世界观上模糊人的阶级意识，根本取消阶级斗争，以稳定封建政权的统治”。“亦即维护帝国主义和买办资产阶级的利益”。可见。“梁漱溟所谓‘理性’是封建统治阶级的专利品，是反人民、反阶级斗争的东西。”¹

1956年4月，《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艾思奇《批判梁漱溟的哲学思想》小册子，对梁漱溟的哲学思想进行全面、系统的批判，摘要如下：

首先指出梁漱溟哲学思想的来源：“梁漱溟和胡适同样地在中国人民中间散布了最腐朽最反动的主观唯心主义哲学思想……作为中国封建地主阶级的代表，梁漱溟的主要努力，是力图把五四新文化运动所打倒的‘孔家店’再建起来，所以他要贩卖一些以所谓‘东方精神’为商标的货色，要歌颂儒家的封建伦理道德，歌颂佛家的宗教思想和唯识哲学，但同时也对法国的柏格森，德国的杜里奇，英国的罗素以至于美国的杜威等等所谓‘西方’的主观唯心主义者表示了倾慕之忱，这在形式上好像只是由于他在这些‘西方’的哲学中找到了与自己思想相似的某些共同点，而在实际上却应该看做是这样一种阶级内容的反映，即：现代中国的封建地方不但肯在君主面前下跪，而且也是愿意对帝国主义称臣的。”梁漱溟“搬运一些‘西方’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哲学来武装自己的封建复古主义。梁漱溟的哲学思想就是在这样的情形下形成了一锅东西方各种反动唯心主义的大杂烩。”

指出梁漱溟哲学是什么样的哲学，他说，“所谓生命派哲学，就是利用‘生命’、‘生活’之类的名词上的极端繁琐的概念游戏，来掩盖唯心主义和反对唯物主义”。“梁漱溟的唯心主义思想仍是非常露骨的，他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里，公开地否认世界的物质的实在性，叫喊着要‘把适才化为物质的宇宙复化为精神的宇宙’”。这里充分表现出梁漱溟的露骨的主观唯心主义（唯我论）的本质。

指出梁漱溟在认识论上的错误，他说，“梁漱溟的认识论（他自己叫做‘知识论’）观点，研究知识所用的方法，就是根据‘唯识学’。‘唯识学’就是佛教哲学里的‘不可知论’。‘唯识学’的特点，就在于它自有一套关于认识论的术语，而这一套术语把‘不可知论’的繁琐性表现得特别鲜明。比如，用‘现量’这个名词来代替感觉

¹ 贺麟《批判梁漱溟的直觉主义》，《新建设》1955年8月

的概念，‘性境’、‘意味’，用‘比量’这个名词来代替理性知识，‘独影境’、‘带质境’等名词术语的宣传，由不可知论的诡辩引到虚无主义。”

批判了梁漱溟的方法论，他说，“梁漱溟的‘形而上学’，就是他企图用来引诱人们走进他这一套关于‘大生命’、‘大意欲’的谎言网罗——主观唯心主义的梦呓——里面去的方法论”。“梁漱溟认为宇宙本体——他所谓的不断‘变化流行’的‘大生命’、‘大意欲’，就只能看做‘中庸’、‘平衡’、‘调和’的东西。因此他把‘中庸’、‘平衡’、‘调和’等观点看做他的‘形而上学’的最基本的观点”。梁漱溟的形而上学的方法论在本质上是反辩证法的。

最后批判“开倒车的历史观”，他说，“梁漱溟的历史观，一如他的世界观一样，也是唯心主义的。他露骨地主张个别天才人物是历史的决定力量，否认‘客观的道理’，也就是从根本上抹杀了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梁漱溟公开表明他不承认历史发展过程有任何客观的物质的东西，他自称是‘释迦慈氏之徒，不认客观’而‘只认主观原因’”。他“首先是把历史唯物主义一番曲解，把它说成好像是一种机械决定论的样子，然后就向着这个自己主观上幻想出来的妖魔开火”。“梁漱溟的主观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以及建立在主观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基础上的他的历史观点和有关中国社会问题一切谬论——首先是否认中国社会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的事实。”“抹煞阶级和阶级斗争这些荒谬的思想，是他的历史观点的主要内容。”¹

批判梁漱溟的文化理想论、哲学观点、政治思想、乡村建设理论和教育思想的还有任继愈、孙定国、葛力、沙英、吴景超、千家驹、王若水等。李达从政治思想方面全面系统进行了批判。这里不一一介绍了，这些批评纯系政治大批判，帽子、棍子一大堆，把历史问题当做现实问题来讨伐，很难说服人，其批判的价值就可想而知了。

梁漱溟在1956年的一次政协学习会上谈及1955年对他的思想批判时说，“去年一年对我的思想批判……我没有做过任何表示，只在一次座谈会上，我曾表示我拥护这一批判运动。当时郭沫若先生说，他对我说的话是否‘由衷之言’要打个问号……郭沫若先生要打问号那就是说：你心里真是这样吗？怕不见得！对的，我心里并

¹ 摘自艾思奇《批判梁漱溟的哲学思想》，人民出版社1956年4月版

不像口里那样简单直接。内心是有矛盾有斗争的。……古人有闻过则喜的话，我在去年看到的各篇批判文章，还不能说对每一篇的每一处心悦诚服。……有没有抗拒心呢？有的，不过终于克服了它。”

1987年，梁漱溟说，由于我的狂妄，他们狠批我的态度，是可以理解的。“毛泽东主席当时何以严厉批判我？我至今觉得还是个谜。我的狂妄顶撞固然使他生气，因而在气头上他同我一样，说了若干过头的话，极端的话，把事情拔高、扩大了许多。问题是我一开头的所谓‘九天九地之差’的发言，何以一下子成为出于恶意的反动言论呢？我以为可能是毛主席从国家建设大局不容怀疑的准则出发，而且以阶级的眼光分析之，联系我几年来常有站在政府之外说话的种种表现，便断定我的话别有用心，实则代表地主阶级反对新政权的大政方针是也！毛主席作为最高领导人，当然一经敲定，便不容更改。而我又不自量力，一而再、再而三的反驳、顶撞，致使出现几乎不可收拾的场面。如果这一推断可以成立，那么我的发言其立场不对，错误很大等等暂且不论，或者说即便的确是错了，作为一个领导的主要负责人，应当持什么态度；采取什么办法对待更好、更妥当呢？我认为几十年来客观事实的发展、变化证明，毛主席在1953年对待我在政协会上的发言，采取那种办法，是不妥当的。他十分不利于广开言路，特别是不利于领导党听取党外各方面的不同意见，包括反对的意见。我以为，我当时的发言，仅仅是有一点点不同的意见，还谈不上是反对的意见。”²作为受批判的梁漱溟来说，他对毛泽东批判的看法，应该说是适当的，有分寸的，有雅量的。这是对待错误批评的正确态度，表明了被批评者的宽容忍让的高姿态的作风。

80年代，批评过梁漱溟思想的一些知名学者对批梁的思想运动进行反思与检讨。冯友兰是1955年率先批判梁漱溟思想的人，1988年9月7日，《群言》第九期发表了冯友兰《悼念梁漱溟先生》题为《以发扬儒学为己任，为同情农夫而执言》文章。根据文章的标题认识，冯友兰给梁漱溟先生撰了一副挽联：

钩玄决疑，百年尽瘁，以发扬儒学为己任；

¹ 马勇《梁漱溟评传》，安徽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410页

² 汪东林：《梁漱溟问答录》，湖南出版社1992年版，第446页

廷争面折，一代直声，为同情农夫而执言。¹

这副挽联实际上否定了毛泽东对梁漱溟的批评。实践证明，毛泽东的批评确实错了，这是从政治上给梁漱溟予以肯定。

冯友兰说：“我在我的《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七册的腹稿中，已经初步给梁漱溟先生安排了一个位置。我认为，他是新文化运动的右翼。新文化运动的口号是‘打倒孔家店’，梁先生是维护‘孔家店’的。但是他的维护并不是用抱残守缺那样的办法，他给孔子的思想以全新的解释。这个全新的解释正确与否，姑且不论，但也是新文化的一部分，而不是旧文化了。所以他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在当时也发生了相当大的影响。这就使他在新文化运动中取得一定的地位。”²这是冯友兰对梁漱溟在学术上予以肯定。

千家驹在《悼念梁漱溟先生》一文中说，“听说他犯了‘错误’，挨了毛主席的一顿臭骂。他说解放后工人生活提高了，但农民生活还是很苦，一‘在九天之上’，一‘在九天之下’。这话虽然说得有些过头，但如果执政党有容人之量的话，置之不理可也，何必火冒三丈，把梁臭骂一通呢！但仔细一想，这也毫不足怪。因为共产党是一向以代表农民利益自居的，毛主席是中国农民的领袖，是‘六亿农民的大救星’。你梁漱溟居然说农民生活还是很苦，‘在九天之下’，你置共产党于何地，置伟大领袖毛主席于何地呢？梁先生究竟是一个书生，不懂得政治行情，他的碰壁是理所当然的。……毛主席对梁先生破口大骂。到了《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出版，才拜读了毛泽东那次讲话的摘要部分，有人说这不大像一个伟大领袖说的话，甚至也不像一个政治家说的话，而像‘一个披头散发用菜刀砍砧板骂大街的三姑六婆的话’。我当然不能同意这种看法。也有人认为毛主席著作出版编辑委员会根本就不应该把这篇讲话选进去，这太有失毛主席政治领袖的身份了。我认为观察一个人，就要观察他的全面，像毛泽东批梁这样绝妙的好文章，如果不发表出来，那我们对‘伟大领袖’的了解就太不全面了。可惜像毛泽东这一类谈话、文章、批示经毛著作编委会过滤后大多已被筛去。幸而留下这篇，一饱我们的眼福，使我们在不加伪

¹ 《辞言》杂志第九期，1988年9月7日

² 《梁漱溟先生纪念文集》中国工人出版社，1993年版，第201页。

装的条件下一个革命领袖的真面目。”

千家驹最后说，“梁先生不屈服于任何人的淫威，不屈于全国人民有领导组织‘口诛笔伐’，不屈于任何暴力，铮铮铁骨，屹立如山，在当今中国，并无第二人！这才是中国真正的儒家，中国真正的知识分子！我向他膜拜，我向他顶礼！”¹

叶笃义在《哀悼梁漱溟先生》一文说，“1953年他遭受不实事求是的批判，但他淡然处之，没有做唯心之论的自我检讨。”²

一些学者也对批梁运动提出自己的看法：

耿云志为马勇著《梁漱溟评传》作序中说：“我想最主要的有两点：第一，梁氏过去很长一个时期受到很严厉的批判，现在人们发现，在过去那种背景下所进行的批判，往往不很客观，不很公道。第二，梁氏是本世纪，特别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第一个系统的提出自己的中西文化观的学者和思想家。”³

《中国当代哲学》（1949—1990）一书作者在评述1955年批判梁漱溟思想运动时指出：“对于梁漱溟哲学思想的批判，是作为对胡适哲学批判的补充而展开的。当时，人们都普遍认为，对胡适和梁漱溟的批判，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批判西方资产阶级哲学和中国封建哲学的两个主战场。50年代对梁漱溟哲学思想进行分析和批判，作为清除旧哲学旧思想影响的一个环节，是必要的。然而，在批判中，抓住他早期发表一些不成熟思想，而且是后来已经抛弃了的观点不放而大加挞伐，则是大可不必的。而且后来发展到把学术问题，思想认识问题上纲到思想政治问题，用政治批判代替学术批判，甚至不允许梁漱溟有反对意见发表，学术批判变成了政治的无限上纲，则严重混淆了学术争论和政治斗争的界限，造成了极其有害的影响。”⁴

1988年7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新华社题为《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的报道，报道称赞梁漱溟先生是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是国内外享有盛誉的学者，是著名的哲学家、

¹ 《梁漱溟先生纪念文集》中国工人出版社，1993年版，140—141页

² 《梁漱溟先生纪念文集》中国工人出版社，1993年版，第121页

³ 马勇《梁漱溟评传》安徽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⁴ 樊瑞平等著，北京石油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28页

教育家。梁先生为弘扬民族文化，扩展中外文化交流，贡献了毕生的精力。”¹同一天的《人民日报》发表了新华社题为《一代宗师诲人不倦，一生磊落宁折不弯》的报道，高度赞誉梁先生说，“一代宗师，诲人不倦；一生磊落，宁折不弯”的挽联，表达了人们对梁漱溟的敬重和思念。报道赞誉：“作为中国文化书院院务委员会主席，梁漱溟一生致力于研究儒家学说和中国传统文化，造诣颇深，著述甚多，在国内外享有盛誉。然而，人们之所以敬重他，不仅因为他是一位文化名人，更重要的是由于他一生刚直不阿，敢于仗义执言。……当受到围攻时，他傲然宣称‘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表现了一位爱国知识分子敢于坚持真理的高风亮节。”²

以上的评价是客观公正的、实事求是的，把梁漱溟错误的定为“伪君子”、“用笔杆子杀人的杀人犯”、“反面教员”恢复为“一代宗师”、“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这才是还梁漱溟先生历史本来的面目，还梁先生一生的清白。

二、批判胡风的文艺思想

胡风文艺思想挨批的原因。1954年2月1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中共七届四中全会公报和社论。公报中说：“我们党的一部分干部甚至某些高级干部对于党的团结的重要性还认识不足，对于集体领导的重要性还认识不足；特别是由于在新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后，党内一部分干部滋长着一种极端危险的骄傲情绪，……夸大个人作用，强调个人的威信，自以为天下第一，只能听人奉承赞扬，不能受人批评监督，对批评者实行了压制和报复，甚至把自己所领导的地区和部门看做是个人的资本和独立王国。”³这个公报当时主要是针对高、饶事件来说的，胡风自认为周扬等人在文艺界也有类似情况。《人民日报》的社论题为《学习四中全会决议，正确地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

胡风在《公报》和《社论》的影响下，受到鼓舞，认为文艺界存在着一些问题，有的人是出于过去的思想来批评他，自己的文艺思想是正确的。胡风早就想上书中央，这次就变为现

¹ 《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人民日报》，1988年7月8日

² 《一代宗师诲人不倦，一生磊落宁折不弯》《人民日报》，1988年7月8日

³ 《人民日报》，1954年2月18日。

实，决定上书中央。胡风等人从1954年3月开始，到7月写成总题目为《关于解放以来的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全文约27万字，故称为《三十万言书》，报告共分四个部分：第一部分，《几年来的经过简况》。胡风详细陈述了自己自1949年以来遇到的种种打击和遭遇，指责文艺界某些领导人将他视为文艺界“唯一的罪人或敌人”。第二部分，《关于几个理论性问题的说明材料》。胡风就林默涵、何其芳发表于《文艺报》这两篇文章中关于现实主义问题的六个论点进行了讨论，并提出“五把刀子”（提倡共产主义世界观，提倡和工农兵相结合，提倡思想改造，提倡民族形式，提倡为政治服务）理论。第三部分，《事实举例和关于党性》。胡风就这几年一些涉及自己的重要问题加以辩解和说明。共有九个问题，其中主要有：小宗派——小集团问题、关于舒芜问题、关于陈亦门（阿垅）问题、关于路翎问题、关于党性等。第四部分，《作为参考的建议》。胡风草拟出类似文艺大纲的材料，提出诸如作家协会的组成、工作程序、刊物存在方式、戏剧组织等业务上的安排办法。

1954年7月22日，胡风亲手将《三十万言书》交给当时的中宣部部长兼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副主任任仲勋，请他代转呈党中央，并致毛泽东、刘少奇、周总理的一封长信，信中写道：“革命胜利后，阶级斗争展开了规模巨大的内容复杂的激烈变化的情势，但在文艺学实践情况反而出现萎缩和混乱。这个反常的现象是早已引起党和群众的普遍的关心的。许多使人痛苦的事实说明了这里面包含有严重的问题。我，把阶级事业作为第一生命走了过来的文艺工作者，应该有责任正视这个事实，研究这个事实上，向党提出我的意见。使党中央更多地掌握情况转入到主动的地位上面检查问题。过去我也曾希图这样做，但一次一次都没有坚持到底。我自己的错误和努力不够应该负责任。但到了今天，客观情况已经发展到了再也不应该忍受下去的地步，而阶级斗争又在向着更艰巨更复杂曲折的深入的思想斗争上发展，不会容许这个应该担负起专门任务的战线继续瘫痪下去；如果我再不正视问题，就更不能有任何借口原谅自己了……”¹胡风想通过上《万言书》和《写信》来改变他的处境。

¹ 转引戴光中《胡风传》宁夏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04页

1954年10月16日，毛泽东就《红楼梦》研究问题写给中央政治局信中批评文艺界的“大人物”阻拦生气勃勃的“小人物”，“同资产阶级作家在唯心论方面讲统一战线，甘心作资产阶级的俘虏”，这些“奇怪事情”，“值得我们注意”。¹10月2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由袁水拍执笔，经毛泽东修改、定名《质问〈文艺报〉编者》的文章，严厉的批评了“他们的任务似乎不是怎样千方百计地吸引新的力量来壮大、更新自己的队伍，反而是横躺在路上，挡住新生力量的前进。”²

胡风受到了上述的信和文章的鼓舞，也向《文艺报》提出批评，1954年第22号《文艺报》刊登了他对《文艺报》的批评发言。第一，向资产阶级思想投降的倾向，具体的例子是向胡适派思想投降，《文艺报》对胡适派表示投降态度，五年前在美学问题上向朱光潜表示了投降，甚至求饶的态度，五年后，在文学遗产问题上颂扬了俞平伯，压制对俞平伯的批评，表示了对俞平伯的投降。第二，从对于进步的作家、对于小人物的态度上看一看《文艺报》的编辑立场。《质问〈文艺报〉编者》这篇批评是符合党的精神的，我是完全拥护的，那里面提到铜墙铁壁，提到资产阶级贵族老爷式的态度，提到忽视小人物，这是完全对的。但不知道袁水拍同志在署名的时候是怎样想的？《文艺报》在忽视以至压制小人物这一点上，是凸出的，但这也是和其他文艺部门有联系，这就更可以看出来《文艺报》的编辑立场包含有严重的问题。第三，《文艺报》在批评工作上对于具体作品的态度，是用的什么武器呢？我觉得，在那些批评里面，庸俗社会学的观点占着支配的地位。基本上是用庸俗社会学作武器的。什么是庸俗社会学？那基本特征是不从实际出发，不是凭着原则引导去理解实际，而是用原则代替了实际，从固定的观点出发，甚至是从零乱的观念出发，用马克思主义的词句或者政策的词句去审判作品。第四，庸俗社会学表现在美学上的特征之一是形式主义。胡风的发言强调：这四个特征是值得严重注意的。这里面，庸俗社会学是基本的东西、理论的东西不能反映历史的东西，当然就破碎、干枯了，碰到资产阶级的思想既无力抵抗，对于新生的力量又没有感受，不

¹ 《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134-135页

² 《质问〈文艺报〉编者》，《人民日报》1954年10月28日

能认识，因为碰伤了他那个理论习惯和权威感，甚至表现了狂暴的敌视态度。至于向形式主义求救，那不过是必然的结果之一罢了。¹

同一期《文艺报》刊登了11月17日袁水拍的发言。袁水拍说，“由于胡风先生在批评《文艺报》的时候，以莫须有的严重的指摘，攻击了我，《人民日报》编辑部决定要我来作个发言。”“首先声明，10月28日《人民日报》批评《文艺报》的编辑思想、作风那篇文章，是我受党的指示而写的。……我是《人民日报》文艺组的工作人员，报纸编辑负责同志指定我写那篇《质问〈文艺报〉编者》的文章。因此，这是很容易了解的，我的文章决不是代表我个人的见解”。“在这里绝没有个人私事”。²接着，袁水拍进行反击，逐条反驳胡风11月7日在扩大联席大会上发言，于是反击胡风就开始了。

1954年12月8日，在中国文联主席团和中国作协主席团扩大联席会议上，周扬作了题为《我们必须战斗》的总结性的发言，发言第三部分谈到了“胡风先生的观点和我们的观点之间的分歧”，指出：“胡风先生在会上积极地发了言。我们欢迎他参加对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也欢迎他对《文艺报》错误的批评。但是从他的发言中，我们必须指出：他的许多观点和我们的观点是有根本的分歧的，不管是在对《红楼梦》评价上，在对马克思主义的看法或在对《文艺报》的批评上。胡风先生是以‘马克思主义者’自命的，有些人也是这样地看他，因此，就有特别的必要来说明他和我们之间的分歧。”“胡风先生在会上给了《红楼梦》一个在他说来是很高的评价，这是一个值得欢迎的进步。我们知道胡风先生对于民族文化遗产历来也是采取虚无主义态度的。”“胡风先生集中力量攻击《文艺报》宣传了庸俗的社会学，他认为这就是《文艺报》的思想基础和错误根源。……我们对于庸俗社会学的这个流派，同对于庸俗社会学的其他流派一样，都没有进行坚决的斗争，这当然也是错误的，必须纠正的。”“现在的问题是在：胡风先生假批评《文艺报》和批评庸俗社会学之名而把关于文学的许多真正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一律称之为庸俗社会学而加以否定。”

¹ 参见《文艺报》1954年第22号

² 《文艺报》1954年22号

周扬批驳说，“表面来看，在反对资产阶级的投降主义的问题上，在反对新生力量的压制态度的问题上，胡风先生是和我们是一致的，而且特别地激昂慷慨，但是谁要看看这个外表的背后，谁就可以看到，胡风先生的计划确是借此解除马克思主义武装！”¹这是批判胡风的重型炮弹。

周扬的总结性发言稿，是经过毛泽东亲自审阅的。据康濯1989年回忆：毛泽东交下胡风的《三十万言书》，让《文艺报》发表并组织批判时，周扬口头传达过毛泽东的指示：“毛泽东说，胡风是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文艺思想。又说，胡风的文章很不好看，大概是由于他的观点有很多矛盾，他标榜的是马克思主义，实际上又是宣传唯心主义，这就不能不把文章写得晦难懂。”²

12月9日，《文艺报》全文刊登了周扬的《我们必须战斗》讲话全文。从此，对胡风的思想批判全面展开。

批判胡风的文艺思想。1955年1月，中共中央宣传部给党中央写了关于批判胡风思想的报告，对胡风的意见书作了以下结论：“他的意见书系统宣传了他的反党反人民的文艺思想，必须进行彻底批判，肃清他的影响。”³

1月26日，党中央指示：“胡风的文艺思想是资产阶级唯心论的错误思想，他披着马克思主义的外衣，在长时期内进行着反党反人民的活动，对一部分作家和读者发生欺骗作用，因此必须加以彻底批判。各级党委必须重视这一思想斗争，把它作为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一个重大斗争来看待，把它作为在党内外宣传唯物论、反对唯心论的一项工作来看待。”⁴

周扬的《我们必须战斗》文章发表，党中央批判胡风思想的批示传达后，没有几天工夫，在报刊上、在社会上掀起了批判了胡风思想的热潮。

1955年第3号《文艺报》刊登蔡仪《批判胡风的资产阶级唯心论文艺思想》一文，指出，胡风的《关于几个理论性问题

¹《周扬文集》第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316、317、320、323页

²转引戴光中《胡风传》宁夏人民出版社，1994年片，第308-309页

³转引文聿著《中国‘左’祸》朝华出版社，1993年版，第165页

⁴转引董宝训、丁龙嘉著《沉冤昭雪》安徽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52-253页

的说明材料》，是资产阶级唯心论文艺思想在马克思主义词句的伪装下，对马克思主义的歪曲，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的篡改，对当前文艺运动的污蔑；是过渡时期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对社会主义思想的进攻在文艺领域的反映。“胡风从来以‘马克思主义者’自命”。“他引证马克思列宁主义诸导师的言论，不是为了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原则来解决实际问题，而是为了装饰他的文章以掩护他的唯心论观点，企图依照他的面貌来‘改造’社会主义的文艺事业。”接着指出：胡风不要求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家具有工人阶级立场和马克思主义观点；胡风“篡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基本理论，就是为了反对我们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首先就是反对知识分子出身的作家的思想改造；”胡风的理论体系，“是主观唯心论的，反人民，反现实主义的理论”。最后指出：胡风这种资产阶级反动的文艺思想，“披着马克思主义词句的外衣，歪曲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原则，疯狂地反对党的文艺政策，企图篡窃无产阶级思想对文艺的领导，改变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使社会主义的文艺变为反社会主义的文艺。”¹

1955年第5号《文艺报》发表了茅盾撰写《必须彻底地全面地展开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文章。摘录如下：“胡风文艺思想上的基本的一点就是所谓‘主观战斗精神’。胡风‘创造’了这样一个‘公式’：文艺创作是‘主观精神’和‘客观真理’的‘综合’或‘融合’；文艺创作过程就是作家以其‘主观精神’去‘拥抱’世界，而达成作家的‘自我扩张’。他自称这就是现实主义。然而这是胡风捏造的现实主义，和我们所理解现实主义是根本不同的。”茅盾指出，“胡风的所谓‘主观精神’，恰恰是抹煞的作家的立场问题。……顽强地坚持他那种超阶级的主观精神的理论，来反对作家应该取得共产主义的世界观，反对作家应该进行思想改造。”茅盾最后指出：“胡风的‘理论’是披了马克思主义外衣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思想，他的文艺路线是反对毛主席文艺方向的路线；而它的活动则是

¹ 蔡仪《批判胡风的资产阶级唯心论文艺思想》，《文艺报》1955年第3号

宗派主义的小集团活动。”¹

1955年第7号《文艺报》刊登了郭沫若撰写的《反社会主义的胡风纲领》的批判文章。他说：“胡风《对文艺问题的意见》洋洋十几万言，全面地攻击了革命文艺事业和它的领导工作，表现了对马克思主义的极深刻的仇恨，可以说是胡风小集团的一个纲领性的总结。他巧妙地披着马克思主义外衣来反对马克思主义，披着现实主义外衣来反对现实主义。”在意见书上，胡风以肉搏战的姿态向当前的文艺政策进行猛打猛攻并端出了他自己的反党、反人民的文艺纲领。这个纲领共有六条：第一，反对作家掌握共产主义世界观。“胡风所以要反对作家掌握共产主义世界观，正是企图解除我们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武器。”第二，“胡风反对作家和工农兵相结合，实际上也就是反对文艺为工农兵服务。胡风反对深入工农兵的主张，正是企图使革命作家、革命工作者割断和工农兵的血肉联系，正是取消文艺工作和其他工作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第三，胡风反对作家改造思想。“胡风借口反对思想改造，正是企图使错误的反动的资产阶级思想继续统治知识分子和人民群众的头脑。”第四，胡风反对文艺的民族形式。“盲目鼓吹外国形式，正是企图削弱和毁灭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以便拉着人们和他一道滚进世界主义的泥坑里去。”第五，胡风反对写题材有重要与否之分。“胡风反对写重要题材，反对创造正面人物，其必然结果不能不掉进否定文艺为政治服务，主张为艺术而艺术的理论泥坑中去。”“胡风提出了以上五条纲领来抗拒所谓五把刀子（胡风认为提倡共产主义世界观，提倡和工农兵相结合，提倡思想改造，提倡民族形式，提倡为政治服务，是放在作家和读者头上的五把刀子）之后，他……按照他自己的资产阶级面貌来改造革命文艺运动的‘建议’。”第六，建议解散文艺界统一组织，实际是取消党的领导。“其内容实际上是解散文艺界统一的组织，分裂作家的团结，取消集体领导，停办现在的文艺刊物，代之……个人办的刊物，进行资本主义市场式的自由竞争。其结果……让资产阶级思想随便去占领和统治。”²这

¹ 茅盾《必须彻底地全面地展开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文艺报》1955年第5号

² 郭沫若《反社会主义的胡风纲领》《文艺报》1955年第7号

是一篇无限上纲的批判文章。

1955年1月开始，胡风写《我的自我批评》，一稿、二稿均未通过，三易其稿，在自我批判中，胡风检讨说承认自己在有些根本问题上违背了马克思主义、违背了毛泽东的文艺方针。其“错误的根源是，把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性和立场当作工人阶级的革命性和立场，混淆了他们中间的原则和区别。”“长期以来，我以自以为是的态度坚持错误，忽视了同志们的批评和期待，以至这些错误不但得不到改正，反而继续有了恶性的发展。”并在《附记》中说，“我也认识到这个批判是必要的、适时的，而且更明确地认识到了我的错误对于我们社会主义改造时期的文艺事业是有极大的危害性的。”最后表示：进一步的检查，“用实际行动来弥补我的过失”。¹

批判胡风思想的升级。胡风的自我批评写完后，1月15日，毛泽东在周扬关于胡风谈话情况的报告上的批语：“应对胡风的资产阶级唯心论，反党反人民的文艺思想，进行彻底的批判，不要让他逃到‘小资产阶级观点’里躲藏起来。”²这里将胡风思想定性为反党反人民的文艺思想。

2月5日至7日，中国作协主席团举行扩大会议，全国各地的作协负责人到会，决定对胡风文艺思想展开全面的彻底批判，这样很快形成全国性的批判运动。

4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胡风的旧友舒芜的题为《胡风文艺思想反党反人民的实质》一文，对胡风实行致命的反戈一击，接着，舒芜又写了一篇题为《关于胡风的宗派主义》一文，送给《人民日报》编辑部，编辑部发现其中引用了不少胡风给舒芜信中的话，便派人去采访，是否将胡风的原信借给我们看一看。舒芜把历年来胡风给他的100多封信件装订成册交给来访者。三四天后，林默涵对舒芜说，“你的文章和胡风的信，都看了，你的文章可以不必发表了。现在大家不是要看舒芜怎么说，而是要看胡风怎么说了。”林默涵将原信上划了记号和打了杠杠的信还给舒芜时说，“可否把这些重要的摘抄出

¹ 参见《文艺报》1955年第9、10号

²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5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第9页

来，按内容分成四类。一，胡风十年来怎样一贯反对和抵制我们党对文艺运动的领导；二，胡风十多年来怎样一贯地反对和抵制我们党所领导的由党和非党进步作家所组成的革命文艺队伍；三，胡风十多年来为了反对我们党对文艺运动的领导，为了反对我们党所领导的革命文艺队伍，怎样进行了一系列的宗派活动；四，胡风十多年来在文艺界所进行的这一切反党的宗派活动，究竟是以怎样的一种思想、怎样一种世界观作基础的。”¹

林默涵又告诉舒芜：“现在胡风的问题，已不仅仅是一般宗派主义的问题了。当然不是说胡风是反革命，但是，是对党、对党所领导的革命文艺运动，对党的文艺政策，对党的文艺界的领导人的态度问题了。”最后，还要舒芜对胡风原信中一些不容易懂的词句如“两个马褂”、“豪绅们”、“跳加官”、“抬头的市侩”等作些注释。舒芜简明地记下了林默涵的指示和要点，取回稿子和信件，花了两天两夜的时间整理完后，第三天就把《关于胡风小集团的一些材料》交给《人民日报》编辑部。²

舒芜整理的这份材料，最后送到周扬手中，周扬决定把它和胡风的《我的自我批评》一起在《文艺报》上发表，然后由《人民日报》全文转载。据康濯回忆，周扬“考虑批判胡风是毛主席交下来的任务，因此我想，胡风的检讨和舒芜的材料还是要送主席看一看才好。”毛泽东看过后，将舒芜写的《胡风小集团的一些材料》改为《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一些材料》，又亲笔写了编者按语，并批示道：“可登人民日报，然后在文艺报转载，按语要用较大型的字。”³

5月13日《人民日报》一同发表了毛泽东亲笔写的《人民日报》编者按、胡风的《我的自我批判》和舒芜写的《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一些材料》。

毛泽东亲笔写的《人民日报》编者按：一同发表的理由，“就是不让胡风利用我们的报纸继续欺骗读者。从舒芜文章所揭露的材料，读者可以看出，胡风和他所领导的反党反人民的文艺集团是怎样老早就有敌对、仇视和痛恨中国共产党和非党

¹ 转引戴光中《胡风传》宁夏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13页

² 转引戴光中《胡风传》宁夏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14页

³ 转引戴光中《胡风传》宁夏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14、315页

的进步作家。读者从胡风写给舒芜那些信上，难道可以嗅得出一丝一毫的革命气味来吗？从这些信上发散出来的气味，难道不是同我们曾经从国民党特务机关出版的‘社会新闻’、‘新闻天地’一类刊物上嗅到过的一模一样吗？甚至‘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性和立场’，什么‘在民主要求的观点上，和封建传统反抗的各种倾向的现实主义文艺’，什么‘和人民共命运的立场’，什么‘革命的人道主义精神’，什么‘反帝反封建的人民解放的革命思想’，什么‘符合党的政策纲领’，什么‘如果不是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我个人 20 多年来是找不到安身立命之地的’，这种种话，能够使人相信吗？如果不是打着假招牌，是一个真正有‘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性和立场’的知识分子（这种人在中国成千百上万，他们是中国共产党合作并愿意接受党领导的），会对党和进步作家采取那样敌对、仇视和痛恨的态度吗？假的就是假的，伪装应当剥去。”“检讨要像舒芜那样检讨，假检讨是不行的。……胡风应当做剥去假面的工作，而不是骗人的检讨。剥去假面，揭露真相，帮助党彻底弄清胡风及其反党集团的全部情况，从此做个真正的人，是胡风及其胡风派每一个人的惟一出路。”¹

由此看来，胡风和胡风派的问题升级了。由“小集团”的文艺流派，一下子变成了“反党集团”，由学术问题变成政治问题。

三、揭露胡风“反党集团”

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评上升为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对胡风文艺流派小集团的批判一下子变成了对胡风“反党集团”的揭露和批判，对胡风“反党集团”的揭发、批判上纲为对胡风“反革命集团”声讨。这样，将胡风小集团定性为胡风“反革命集团。”

政治声讨代替思想批判。周扬从毛泽东那里回来说对大家说，“主席说，……胡风都成了反革命了”，周扬对康濯说，“主席讲，胡风是要逮捕的，不过他是全国人大代表，必须经过人大常委会批准以后才能逮捕，这件事已经同少奇同志和总理商量了，还得几天才能办妥。因此，主席认为：这几天还要派人

¹《人民日报》编者按，1955年5月13日

去看看胡风，稳定他一下。”¹

林默涵在《胡风事件的前前后后》一文写道：“5月16日，公安部拘捕了胡风。拘捕前，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会议，通过了取消胡风人大代表资格的决议。”实际上，人大常委会是在5月18日，是在拘捕后，而不是在“拘捕前”。²

就在拘捕胡风的同时，全国各地所谓的“胡风分子”，也纷纷失去自由和被逮捕了。像路翎、绿原、牛汉、谢韬、彭柏山、王元化、贾植芳、何满子、阿垅、方熙等等。

由于5月13日毛泽东写的《人民日报》编者按语指出：“路翎应当得到胡风更多的密信，我们希望他交出来。一切和胡风混在一起而得有密信的也应当交出来，交出比保存或销毁更好些。”³路翎等人交出与胡风来往的信，中宣部指定专人配合公安部，负责整理这些密信。

5月24日，《人民日报》公布了中宣部和公安部整理、注释的《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第二批资料》。

《人民日报》编者按：“自从舒芜《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一些材料》发表以后，人们被胡风反党反人民反革命的罪恶所激怒了。”但是有些同情胡风、或者口头上反对胡风但内心是同情胡风的人们在说，那些资料大都是解放以前，不能据此定罪。那么，好吧，现在请看第二批材料。”“这些密信都是胡风在全国解放以后写的。这些信里，胡风恶毒地污蔑党、污蔑党的文艺方针、污蔑党的负责同志、咒骂文艺界的党员作家和党外作家；在这些信里，胡风指挥他的反动集团的人们进行反党、反人民的罪恶活动，秘密地有计划地组织他们向党和党所领导的文艺战线猖狂进攻；在这些信里，胡风唆使他的党羽们打进党内，打进革命团体内建立据点。扩充‘实力’，探听情况和盗窃党内文件。在这些信里，……胡风更加施展了他的两面派手法：公开的是‘不要去碰’，‘可能的地方还要顺着’党和人民；而暗中却更加紧地‘磨我们的剑，窥测方向’，‘用孙行者钻进肚皮的战术’，来进行反革命活动。当他向党举行猖狂进攻失败以后，他就赶紧指挥他的党羽布置退却，‘在忍受求得

¹ 转引戴光中《胡风传》宁夏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18页

² 转引戴光中《胡风传》宁夏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21-322页

³ 《人民日报》1955年5月13日

重生’，准备好每人一套假检讨，以便潜伏下来，伺机再起。”
“胡风和胡风集团分子的通信，大部分采取了鬼鬼祟祟的、隐蔽的方法。胡风和他们相约，在信中使用各种代号和隐语。”¹

这些材料发表后，立即激起人们的极大愤怒和谴责。

5月25日，全国文联主席团和全国作协主席团举行扩大联席会议，到会的有七百多人，一致以极端愤怒的情绪揭露和谴责了胡风反党集团的罪行，并一致通过决议：“开除胡风的中国作家协会会籍，撤销胡风所担任的中国文联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作家协会理事会理事、《人民文学》编辑委员等职务；建议有关机构撤销胡风的全国人大代表职务，对胡风的反革命罪行进行必要的处理。”²

由郭沫若等人在大会上发言。郭沫若发言的题目为《严厉镇压胡风反革命集团》，他说，“像胡风这样的人，他二十年来，一贯地站在革命的内部进行反革命的破坏工作，这是明知故犯，怙恶不悛的最顽恶的反革命分子，……我个人认为，应该严厉地镇压，比几年前镇压反革命的时候要更加严厉地镇压！”
“胡风及其反革命集团是中国人民的凶恶的敌人，他二十年来隐藏在革命队伍里，破坏革命事业，破坏革命文艺运动，向党向人民进行恶毒的进攻，企图推翻人民政权，使反动势力在中国复辟，这是中国人民决不能容忍的，必须坚决彻底粉碎胡风反革命集团。”³

《人民日报》于5月13日、24日先后发表了两批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材料，并在编者按语中指出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罪恶本质后，胡风及其反革命的反动面目大白于天下，因而激起了全国各地广大群众的愤怒和声讨。

6月10日，《人民日报》又公布了《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第三批材料》，《人民日报》编者按，首先指出：“胡风反革命集团第一、第二两批材料的公布，激起了全国广大人民群众对对反革命分子的极大愤怒。人们要求追究胡风集团的政治背景。他们问，胡风的主子究竟是谁？关于这个问题，……我们把它放在这个《第三批材料》中发表出来。胡风和胡风集团中

¹ 《人民日报》1955年5月24日

² 《文艺报》1955年11号

³ 《文艺报》1955年11号

的许多骨干分子很早以来就是蒋介石国民党的忠实走狗，他们和帝国主义国民党特务机关有密切联系，长期地伪装革命，潜藏在进步人民内部，干着反革命勾当。”“阿垅，即陈亦门、陈守梅，浙江人。原是国民党的军官，抗日初期混入延安抗日军政大学读了几个月，不上前线，却到胡宗南的‘战干四团’作少校军事教官去了。”“胡风，即张光人，又名谷非，湖北人。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他曾经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1925年他在北京，当时段祺瑞统治下的白色恐怖把他吓昏了头脑，坚决要求党允许他退出了团。后在江西‘剿共’军做过反共的政治工作，又去日本混了一个时候，干了一些不可告人的勾当。回国以后，他在上海混进了左翼文化团体，从内部进行了种种分裂破坏活动。在武汉和重庆时期，他和国民党的许多特务头子有联系。”“胡风的这篇简单的历史是最近才查明。因为他隐瞒得很巧妙，大家被他骗过了。”

编者按接着指出，胡风“他们对解放后的新社会、对人民革命政权，表现了刻骨仇恨，他们说‘对这个社会秩序，我憎恨’，他们诅咒人民革命政权的‘灭亡’‘完蛋’。”最后号召，“现在，已到了彻底弄清胡风这一批反革命黑帮的面目的时候了，中国人民再也不容许他们继续玩弄欺骗手段！全国人民必须提高警惕！一切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必须揭露！他们的反革命罪行必须受到应有的惩处！”¹

事隔34年后的1989年，林默涵在《胡风事件的前前后后》一文中指出，1955年6月6日，毛泽东在收到《第三批材料》和《人民日报》社论《必须从胡风事件吸取教训》的清样后批示道：

定一、周扬同志：

“社论尚未看，对《第三批材料》的注文修改了一点，增加了几段，请你们两位或再邀请几位别的同志……共同商量一下，看是否妥当。我以为应当借此机会做一点文章进去。”²

毛泽东在第二批和《第三批材料》的注文中修改或增加了那些按语，现引用几个按语：

¹ 《人民日报》，1955年6月10日

² 摘自《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5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第108-109页

①“宗派，我们的祖宗叫做‘朋党’，现在人也叫‘圈子’，又叫‘摊子’，我们听得很熟的。干这种事情的人们，为了达到他们的政治目的，往往说别人有宗派，有宗派的人是不正派的，而自己则是正派的，正派的人是没有宗派的。”胡风这批人，“过去说是‘小集团’，不对了，他们的人很不少。过去说是一批单纯的文化人，不对了，它们的人钻进了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教育各个部门里。过去说他们好像是一批明火执仗的革命党，不对了，他们的人大都有严重问题的。他们的基本队伍，或者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特务，或是托洛茨基分子，或是反动军官，或是共产党叛徒，由这些人做骨干组成了一个暗藏在革命阵营的反革命派别，一个地下的独立王国。这个反革命派别和地下王国，是以推翻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恢复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统治为任务的。”¹

②芦甸“以攻为守的策略。后来胡风果然实行了，这就是胡风到北京来请求派工作，请求讨论他的问题，三十万字的上书言事，最后是抓住《文艺报》问题放大炮。……他们往往采取以攻为守的策略。或者无中生有，当面造谣，或者抓住若干表现现象，攻击事物的本质；或者吹捧一部分人，攻击一部分人；或者借题发挥，‘冲破一些缺口’，使我们处于困难地位。总之，他们老是在研究对付我们的策略，‘窥测方向’以求一逞。有时他们会‘装死躺下，等待时机’，‘反攻过去’。他们有长期的阶级斗争经验，他们会做各种形式的斗争——合法的斗争和非法的斗争。”²

③“反革命分子的攻击少数人不过是他们的借口、他们的一种策略。他们的本意是‘几乎滑一块干净的土地’。由于这种情况，他们‘就规定了战斗的艰苦性和长期性’。自从汉朝的吴王刘濞发明了请诛晁错（汉景帝的主要谋划人物）以清君侧的著名策略以来，不少的野心家奉为至宝，胡风集团也继承了衣钵。他们在三十万字上书中只攻击林默涵、何其芳、周扬同志等几个人，说这几个人弄坏了一切事。……我们在肃清胡风分子和其他反革命分子斗争中，这一点也是应该注意的。”³

¹《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162-163页

²《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163-164页

³《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115页

1955年6月10日公布《第三批材料》，同天《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必须从胡风事件吸取教训》的社论。指出：“今天本报发表了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第三批材料，进一步证明胡风和他的一伙是同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匪帮有密切联系的一群反革命分子。这一严重事件，应当引起全国人民的警惕，并从这个事件吸取教训。”“根据现在已有的材料，胡风分子已经混进我们的某些政府机关、某些军事机关、某些教育机关、某些文化出版机关和报馆以及某些经济机关，他们还混进了某些工会、青年团等群众团体的领导机关。他们也混进了中国共产党，有的还担任了相当重要的职务。”“我们还要这样提出问题：如果胡风反革命集团能够混到我们的队伍中来，甚至混到共产党的队伍中来，为什么别的反革命分子不能用类似胡风的两面派手法，暗藏在我们的机关、部队、学校、工矿、人民团体和民主党派中呢？应该说，他们必然会混进来，而且已有材料证明在许多地方已经混进来了。”“因此，我们革命队伍中的每个单位、每一个人都要提高警惕，不要上反革命分子的当、并且都要学到一项本领，要善于辨别反革命分子，以便把一切反革命的阴谋揭露出来。”最后号召：“必须注意清查一切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必须坚决地有分别地对于清查出来的这些分子给以适当的处理。”¹

这就是毛泽东“借此机会做一点文章进去”的真实内容，即清查一切暗藏的反革命分子。以后就转入到了全国性的肃反运动中去了。

关于胡风案件的处理。胡风于1955年5月16日被捕入狱，在监狱里反省、交待、被审问，整整十年有余，到1965年11月26日，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判“胡风反革命罪行”。最后，法庭宣布，判处胡风有期徒刑14年，剥夺政治权利6年，在押一天算一天，尚余徒刑4年，准予监外执行。一桩预审长达10年六个月的特大“反革命”案，终于结案了。

1966年2月15日，胡风在梅志的陪伴下，发配四川成都，四川省公安厅安排一所独立小院，派三名专职监护人员，还宣布：不要和陌生人谈话，不要见外国人，不要随便外出，每月一次书面思想汇报。后来押送到江西芦山县苗溪茶场，以后日

¹ 《人民日报》，1955年6月10日

子在劳动、种地、背诵语录和老三篇中度过的。

1967年11月7日，又把胡风押回成都，被取消监外执行的权利，关进看守所单身牢房。胡风服刑期快满了，于1969年向军管会提出要求释放的报告。报告上报中央文革，江青、姚文元批示：“改判无期，关死为止，判决不给本人看，也不许上诉。”送到大竹县的四川省第三监狱去劳动改造。直到1979年1月14日，胡风出狱，终于自由了。整整过了24年的囚徒生活。

胡风案件“在全国清查中，共触及2000多人。正式定为胡风集团分子的78人，其中给予撤销职务、劳动教养、下放劳动等处理的61人。”¹

据当时作协负责人之一康濯回忆录：“全国被清查、揪斗的达十余万人，被捕入狱的一万多人。有的人仅是读过胡风的一篇文章，听过胡风的某次报告。”²

胡风集团中的骨干分子的结局：

路翎入狱、出狱、重新入狱，等到平反昭雪时，简直成了一段呆木头。绿原，他从来没有去过中美合作所，也没有当过一天特务，却过了整整7年铁窗生活，只有以自学德语打发岁月和排解忧伤，后来成为出色的德国文学翻译家。阿垅，所谓“国民党反动军官，其实倒是踏实为共产党干工作的革命者，曾通过胡风送过许多有用的军事情报。这条宁折不屈的血性汉子，坚持否认那些罗织的罪名，逐一反驳、申辩，被起诉判刑。于1967年临终时，连唯一的儿子都没能见上一面，病死在监狱。

1980年9月29日，中共中央批转公安部、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党组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案件的复查报告的通知中，宣布给“胡风反革命集团”平反。通知说：“胡风反革命集团”一案，是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将有错误言论、宗派活动的一些同志定为反革命分子、反革命集团的一件错案。中央决定，予以平反。凡定为胡风反革命分子，一律改正，恢复名誉。凡经过法律程序判决的，建议由原经办的法院依法撤销原判。凡因胡风问题受到株

¹ 见《党史研究材料》1982年第59期15页

² 《新文学史料》1989年第3期

连的，要彻底纠正。

1981年，胡风被补选为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作家协会顾问。

1985年5月，公安部对胡风政治历史中遗留几个问题进行了复查，予以平反撤销，并经中共中央书记处同意，向有关部门发了通报。

1988年6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又发出《关于胡风同志进一步平反的补充通知》，通报了经过中央政治局常委讨论同意的有关胡风文艺思想等方面的几个问题的复查意见。关于“五把刀子”问题，补充通知说，“经复查，这个论断与胡风同志的原意有出入，应予撤销。关于‘宗派行动’问题，补充通知说：“本着历史问题宜粗不宜细和团结起来向前看的精神，可不在中央文件对这类问题作出政治性结论。这个问题应从《通知》中撤销。”关于胡风的文艺思想和主张，补充通知说，应由“文艺界和广大读者通过科学的正常的文艺批评和讨论，求得正确解决，不必在中央文件中作出决断。这个问题也从《通知》中撤销。”¹

至此，胡风案件得到全面平反，得到彻底纠正。

胡风“反革命集团”产生的影响。批判胡风的文艺思想上升为政治声讨、揭露胡风“反革命集团”，其政治影响是深远的，至少有如下两方面的影响：

直接影响：由于清查胡风“反革命集团”引起了肃清一切暗藏的反革命分子运动，即“肃反运动”。

1955年7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展开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指示》中，指出这场运动的目的：第一，教育全党全国人民，首先是教育五百万知识分子和干部，提高对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警惕性，第二，利用胡风事件，在全国各工作部门和各个战线上，经过坦白检举、查出一批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并取得另一批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线索，为今后的镇压反革命的工作和干部的审查与清理工作做好准备。肃反运动一开始，毛泽东注意纠正两种偏向：部分领导干部中存在的右倾麻痹思想和淡漠态度；部分领导干部不敢积极发动群众和不敢让

¹ 引自《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5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第114-115页

群众展开斗争。

这场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运动，不仅在中央机关、省、市、地、县干部中进行，而且也在各高等院校师生中与中专学校师生中进行；不仅在军队的知识分子干部中进行，而且也在大中型工矿、企业的工程技术知识分子中进行。各大专院校的师生利用暑假考试完毕后，留校七至十天，组织报告、学习、讨论、检举、坦白、揭发，然后进行清理。这是毛泽东对肃反的部署，在肃反期间，批示中央机关、省、市、部队、作协、外贸等党委：要克服右倾麻痹思想和右倾思想就有九次之多，可见，毛泽东是非常重视领导干部中出现的右倾思想。在运动中出现“左”的偏向。1955年10月23日，毛泽东指出，“同必须克服右的偏向一样，我们必须认真地克服‘左’的偏向，才能使肃反运动自始至终得到健康的发展。”¹

从1955年7月初开始，中央机关、省、市、自治区和部队以及地、县、工矿企业工程技术人员，大中专院校师生，医药卫生机关的医务人员为主要对象的人数，约1430多万人参加。肃反运动作为一次群众性运动，发生了一些“左”的偏差。例如，洛阳拖拉机厂，参加坦白、检举运动的工程技术人员48人，其中重点斗争对象13人，这个比例很大，达到24%。北京大学1955年哲学系毕业班毕业生有34人，重点斗争有5人，这5位被斗的毕业生，经过党组织近半年的审查，根本没有什么问题，最后还是分配工作，但分配的工作是学非所用，影响一生。

1956年9月，肃反运动的领导人、公安部部长罗瑞卿也承认：“在1955年下半年开始的肃反运动中，也发生了一些缺点和错误，在社会上捕了一些本来可以争取投案自首的反革命分子，甚至错捕了个别的好人。在机关内部，某些单位也有斗争面过宽的缺点，斗了少数不该斗的人。”²

间接影响：在胡风案件中被审查、挨批斗的重点对象，在运动结束后，并不是胡风分子，没有什么重大问题；还有些刚

¹《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5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第426页

²《社会主义教育课程的阅读文件汇编（第一编）》上，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555-556页

刚出狱“胡风分子”。他们这些人在1957年整风鸣放中，为“胡风反革命集团”鸣冤叫屈，说胡风不是反革命分子，像聂绀弩夫妇，双双划为“右派”，聂绀弩被开除党籍，遣送到北大荒去劳动改造。刚刚出狱“胡风分子”，有些又被定为“右派分子”，上海的王皓，因受不了冤屈，跳黄浦江自杀了。北京大学哲学系中哲史研究生，在鸣放期间说，认为“胡风反革命集团”是用形式逻辑的三段论推论出来，没有真凭实据的反革命罪证材料，认为肃反运动所采用的方法是用的刚批判过的胡适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方法。这位研究生被划分“右派分子”。还有一位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生，在胡风事件中被斗，因没有什么问题分配了学非所用的工作，后又调到武汉大学，1957年鸣放期间，因散播“胡风不是反革命分子”的大字报，被划为“右派分子”。

北京大学学生刘奇弟写出大字报：“胡风绝不是反革命”，全文如下：

“反胡风运动已过3年了，胡风及其‘集团’被当作反革命分子遭到镇压，今日旧案重翻，我要为胡风说话，更精确地说，我要为真理说话。胡风绝不是反革命，我要求政府释放胡风。作为一个公民，我来过问法律，这是正常。我的行动有宪法支持。

胡风是怎么一个人？

凡是正视事实的人都会清楚，在解放前胡风是一位进步的作家，是民主战士。他辛勤地追随着鲁迅；在那万恶的社会里，他向人们揭露黑暗指出光明，他为青年所爱戴，尊敬。正因为这样，正凭着这点，在解放后他才被选为人民代表。解放后他更不懈惰，带头高龄跑这跑那去乡下参加土地改革；在朝鲜抗美援朝，勤勤恳恳体验生活，从事创作。他们（胡风分子）写的作品有血有肉，最为读者所喜爱。这类人不是为人民服务，是因为什么？世上还会找到这样一种逻辑，把他们说成反革命。

看！这种控告和判决到底有没有理？

关于对于控告胡风的内容，不外就是那三次反胡风文件，大家都熟悉。今天我们再来看一看，它到底有没有理由？回答是：‘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完全是一本断章取义，牵强附会，毫无法律根据的书。反把闲人聊天、侯宝林说相声的逻辑和推理搬进了法庭。像这样的办法，只要他们说过话写

过东西，都可以按这种断章取义牵强附会的办法，用说相声的逻辑推演成反革命。

请问，这能当作控告吗？

因此，自勉为要做个正义的维护真理的人的我是不能不大声疾呼！

胡风不是反革命，我要求（政府释放）胡风！

同学们，你们认为怎样？让我们彻底搞清楚吧，假如你们也认为胡风被冤枉，那么让我们一道来要求释放胡风吧！

要知道救人命不但胜造七级浮屠，而更是为了支持正义，维护真理。”¹刘奇弟等人支持正义，维护真理，通通被打成右派分子。

总之，从批评、批判胡风的文艺思想发展到胡风“反革命集团”“进而发动肃反运动，这里有一个演变过程：胡风从三十年代以来对党的文艺理论有不同的看法，四十年代末，有人提出批评。解放后受到三次批评，1955年又批判胡风的文艺理论或文艺思想，发展到批判胡风的“反党集团”，揭发声讨上升到胡风“反革命集团”；由学术问题变成思想问题，由思想问题上升为政治问题。也就是说，由人民内部问题无限上纲为敌我问题。这是由于当时国际、国内的政治的气候、领袖和某些领导者以及胡风及其某些成员等综合因素促成的，当然起决定性作用还是同毛泽东“左”的倾向越来越向“左”的方向发展有关，是“左”倾错误的产物，也是毛泽东偏听偏信，独断专行的表现，是不讲民主，践踏法制的恶果。

众所周知，胡风“反革命集团”是一起严重的将真正的革命者推向敌人一边、混淆敌我的错误事件，是开国以来最重大的一起冤、假、错案。这次错误的批判、声讨为后来肃反运动，特别是为反右派斗争准备了干部队伍、大批判的理论骨干以及斗争的策略、方式和方法，是反右派斗争前的一次大练兵和大演习，为日后犯更大错误埋下严重的祸根。

综上所述，从建国初期开始，在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前提下，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指引下，把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当作社会主义革命和改造对象的情况下，毛泽东在党

¹ 牛汉、邓九平主编《原上草》经济日报出版社，1998年版，113-114页

内批判“右倾”观点、“右倾”错误，其矛头针对党内知识分子出身的干部；在党外其矛头对准党外知识分子，展开一系列思想政治批判运动。采取争论、讨论形式，发动所谓新生力量来整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和在校大学生，完全人为地伤害新旧知识分子，还制造一起胡风事件大冤案，领导者、发动者的意图是企图消灭或肃清西方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反动思想的影响，初步树立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向苏联学习，让无产阶级世界观、人生观占领知识分子的头脑，试图达到改造知识分子和巩固新政权在意识形态领域中的阵地。毛泽东亲自发动的一系列思想政治批判运动，犯了“左”的倾向、“左”倾错误，反右派斗争不过是这些“左”的东西的继续和发展。所以历次思想政治批评运动就构成了反右派斗争的前奏。

第二章 反右派斗争的背景和由来

1957年1月，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指出：“去年（1956年）这一年是多事之秋，国际上赫鲁晓夫、哥穆尔卡闹风潮的一年，国内是社会主义改造很激烈的一年。现在还是多事之秋，各种思想还要继续暴露出来，希望同志们注意。”¹在这里，毛泽东担心苏联、东欧出现的各种问题会不会在我国重演，国内出现的不安定因素会不会还进一步发展，他提醒人们，1957年还是多事之秋，对正出现的、还未出现的问题要进行反思和注意，要研究新情况，解决新矛盾。如何吸取苏联、东欧所发生事件的教训，如何正确处理国内的矛盾，是接下来的几节所要探讨的主要内容。

第一节 苏联、东欧和我国出现的新情况

苏联是列宁缔造的社会主义国家，斯大林统治了30多年。二战后出现的几个社会主义国家，包括中国在内，都是按斯大林模式建立起来的。1953年3月5日，斯大林逝世，不仅对苏联产生重大影响，而且对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和共产主义运动都产生重大影响。尤其是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上揭发斯大林的问题和提出改革要求，波兹南事件、匈牙利事件的发生，这些都暴露了社会主义国家的阴暗面。同时，在新中国成立头几年出现大好形势，在过早提出，过急完成过渡时期总路线后，遗留一些问题和不安定因素，所有这些都需当权者和人民认真考虑和应对的。

一、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召开

斯大林于1953年3月5日逝世，其后继者赫鲁晓夫上台之后，对斯大林统治时期的许多弊端进行了反省和清算，试图通过批判和揭露斯大林的错误，为苏联社会主义事业、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进一步发展和壮大找出一条新路来。为此召开二十次代表大会，确定发展和改革的目标。这不仅对苏联，而且对中国以及全世界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1956年2月14日至25日，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在

¹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39页

莫斯科举行，赫鲁晓夫作了政治报告，其主要内容有三方面：第一，对国际政治和国际共运提出一系列新的论点：关于社会主义阵营和资本主义阵营和平共处的问题。这意味着不同的社会制度的国家，在经济、科学、文化领域中可以和平竞赛，但并不放弃思想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关于现代防止战争的可能性问题。提出“战争并不是注定不可避免的”论点；关于不同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形式问题。完全可以设想，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形式可以多样化，这些形式的实现，不一定同内战联系在一起，有条件的可以实行和平过渡。第二，制定第六个五年计划的主要任务和指导方针。第三，批判斯大林个人崇拜的错误，进一步解放思想。在大会上，米高扬在发言中首先批判了斯大林在理论上和实践中的错误。其他的领导人的发言，也都表示要反对个人崇拜。赫鲁晓夫在大会闭幕的当天，向二十大全体代表作了《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

秘密报告首先肯定了斯大林的功绩，但不是全面评价斯大林的功过。报告中揭露了斯大林以下几方面的错误：

第一，欣赏个人崇拜，采取各种方式抬高自己的威望，甚至把称赞自己的话写进自己的传记中；比如，1948年他的《传略》出版。这是一部无节制阿谀奉承的书，把斯大林写成了一个永不犯错误的圣人，历史上各民族“最伟大领袖”和“无与伦比的战略家”。总之，再也找不出可以把斯大林吹捧上天其他词汇了。

第二，违反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把自己居于党和人民之上，独断专行。谁要是提出反对意见，谁就会成为牺牲品，比如：“斯大林做了许多专横的事，他经常个人决定党和政府极其重要的事务，连政治局委员也不通知。”“1941年10月曾想召开中央全会，中央委员们特地从全国各地赶到莫斯科。他们等全会开会等了两天，但没有等到。斯大林甚至不愿和中央委员会委员们见面谈话。这一事实说明……斯大林对待中央委员又是怎样的傲慢和轻侮。”“经查明，在第十七次党代表大会选出的139名正式和候补委员被逮捕和遭枪决的有98人，即70%。”

第三，在肃反斗争中，把党内思想斗争的是非界限同社会上阶级斗争的敌我界限混为一谈，制造了大量冤、假、错案，使成千上万无辜者被监禁、拷打和处决。比如：“企图给大规模恐怖政策予以理论根据，所用的借口是，随着我们的社会主义的进展，阶级斗争应当愈来愈尖锐。”“这种恐怖手段事实上不只用来被击败的剥削阶级残余，而是反对党和苏维埃国家的正直干部。他们被加上了

虚假、诬陷、荒唐的‘两面派’、‘特务分子’、‘破坏分子’等帽子，说他们策划某种臆想的‘阴谋’活动。”“在调查了某些所谓‘特务’和‘破坏者’案件后，现已查明，这些案件全系伪造。许多被捕者的供词以及从事敌对活动的指控都是用惨无人道的折磨方法取得的。”

第四，在反法西斯战争前夜缺乏必要的警惕，导致红军在战争初期的严重失利。报告揭露说：“在希特勒军队侵犯苏联领土前夕，有一个德国人逃奔到我国境线上来，说希特勒部队接到命令将在6月22日夜晚3时发动对苏联的进攻。当时立即把这件事报告了斯大林，但是，这一切仍然没有引起注意。你们看，忽视了一切，既忽视了个别军事首长的警告，也忽视了逃兵的报告，甚至忽视了敌军的明显行动。在这历史上千钧一发的时刻，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警惕性难道就是这样吗？……结果就是在最初数小时，在最初几天里，敌人在我国边境地区摧毁了我们大量的空军、炮兵和其他军事设施，消灭了我们大量干部，瓦解了部队的指挥，接着，我们也无法阻挡敌军深入我国。”

第五，在南斯拉夫问题上作出了错误的决定，断绝了同南斯拉夫的友好关系。赫鲁晓夫揭发说：“我想起当初苏联和南斯拉夫的纠纷被人为地扩大的最初时候的情况。有一次，我从基辅来到莫斯科，斯大林请我到他那去，他把不久前写给铁托信件抄本给我看并问，‘你看过吗？’没有等我的回答就又说道，‘只要我动一下小手指，铁托就不存在了，他就垮了。’”“‘动一下小手指’，对我们的代价是非常大。这种说法表现了斯大林的自大狂，但他确是这样做的……但对铁托不起作用。不管斯大林怎样动小手指，而且动了他所能动的一切，铁托并未垮掉……因为……铁托身后有个国家，有经过为自己的独立和自由而斗争的人民，支持其领导者的人民。”

第六，对于农业的发展和农民的物质福利缺乏应有的注意。报告说：“斯大林只是从电影上知道国内情况和农业的，这些影片把农业状况大大美化了。……斯大林一向同人民隔绝，他一直没有下去过，几十年都是如此。他在1928年西伯利亚解决粮食采购问题，是他去农村的最后一次。”“当斯大林一次在会上听到我们的农业状况很严重，肉类及其他畜产品的生产情况更糟，……我们起草了决议草案，我们起草的决议草案未被通过，在1953年2月终于完全被抛在一旁。”

第七，违背列宁主义的民族政策。“关于据说在格鲁吉亚存在民族主义组织的案件……对于这个问题苏共中央在1951年11月和1952年3月通过了决议。这些决议未经政治局事前讨论，是斯大林亲自写的。这些决议包含了对许多正直的共产党员的诬告。根据这些伪造的材料断定在格鲁吉亚似乎存在着民族主义组织，目的是要依靠帝国主义的帮助，消灭共和国的苏维埃政权。事实是在格鲁吉亚并没有什么民族主义组织，成千上万无辜的苏联人，成了专横不法的牺牲品。”¹

随后，1956年6月30日，苏共中央作出《关于克服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决议》。这样系统的揭露和纠正斯大林的严重错误，尤其是个人崇拜、个人专断和严重破坏民主与法制的错误，这是苏联人民的要求，这本来是合理的、正常的要求，因而得到人民的拥护。

问题在于，这个秘密报告在西方报刊抢先予以公布，造成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的极大被动和混乱，在全世界引起了轰动效应，因而产生极大的影响。斯大林问题，不单是苏共一个党的问题，而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重大问题。因此，引起了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极大的关注。毛泽东首先回击了赫鲁晓夫对斯大林问题采取突然袭击的做法，这种不给任何兄弟党打个招呼，采取秘密报告的做法，引起毛泽东极端不满。其实赫鲁晓夫在报告中并没有全盘否定斯大林，也没有对斯大林的功过进行全面评价，主要是揭发斯大林的个人崇拜问题。当然，这个秘密报告确实存在某些缺点，但是，秘密报告起到振聋发聩和揭盖子的积极作用，从决定调查斯大林个人崇拜到没有兄弟党参加的大会上作“秘密报告”，这是要承担政治风险和需要政治勇气的大胆行动，而且还要领导这场反个人崇拜的斗争，赫鲁晓夫的功不可没。从后果来看，秘密报告确实捅了漏子，但是，破除了斯大林一贯正确，不犯错误的神话，有利于对兄弟党反对教条主义，也具有打破苏联社会主义榜样的解放作用，而毛泽东对斯大林问题先喜后忧，从而既肯定斯大林功绩，又批评斯大林的错误。

1956年3月31日，毛泽东同当时驻苏联中国大使尤金谈话时，对斯大林作用作了总的评价。认为，斯大林无疑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优秀和真正的革命者。但是，他在长时间内犯了一系列重大错误，赫鲁晓夫报告中列举了其中主要的错误。把这些主要错误

¹ 摘自《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书林》杂志1988年第5期

可以归纳为七点：1、非法镇压；2、在战争中犯了错误，但主要是战争初期，不是在战争结束时期；3、给工人阶级和农民联盟造成严重损失的错误。……其中包括对农民的不正确政策；4、与非法迁移少数民族等有关的民族问题上的错误。毛泽东说，但总的来讲，民族政策还是正确的；5、放弃集体领导原则，自高自大，信奉阿谀奉承；6、独裁的领导方法和作风；7、在对外政策中的严重错误（南斯拉夫等）。¹批评了斯大林的错误，在《关于无产阶级的历史经验》一文中指出：“作为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的斯大林，在他后一个时期工作中所以犯了某些严重的错误……他骄傲了，不谨慎了，他的思想里产生了主观主义，产生了片面性，对于某些重大问题作出了错误的决定，造成了严重的不良后果。”“斯大林在他一生的后期，愈陷愈深地欣赏个人崇拜，违反党的民主集中制，违反集体领导和个人负责相结合的制度，因而发生了例如以下一些重大的错误：在肃反问题上扩大化；在反法西斯战争前夜缺乏必要的警惕性；对于农业的进一步发展和农民的物质福利缺乏应有的注意；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出了一些错误的主意，特别是在南斯拉夫问题上作出了错误的决定。斯大林在这些问题上，陷入了主观性和片面性，脱离了客观实际状况，脱离了群众。”“斯大林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但是也是一个犯了几个严重错误而不自觉其为错误的马克思主义者。我们应当用历史的观点看斯大林，对于他的正确的地方和错误地方作出全面的和适当的分析，从而吸取有益的教训。”²

毛泽东还在不同场合提出批评，4月25日在《论十大关系》讲话中对斯大林的错误提出评价：“苏联过去把斯大林捧得一万丈高的人，现在一下子把他贬到地下九千丈。我们国内也有人跟着转。中央认为斯大林是三分错误，七分成绩，总起来还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三七开的评价比较合适。斯大林对中国做了一些错事。……可是，我们还是认为他是三分错误，七分成绩。这是公正的。”³

8月30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大预备会议上讲话，谈到斯大林犯错误的原因时说：“斯大林为什么犯错误呢？就是在一部分问题上

¹ 参见飞舟等译《两个一把手——赫鲁晓夫与毛泽东》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7页

² 《人民日报》1956年4月5日

³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86页

他的主观跟客观实际不相符合。现在我们的工作中还经常有许多这样的事情。主观主义就是不从客观实际出发，不从现实可能性出发，而是从主观愿望出发。”¹

9月24日，毛泽东在接见南共联盟代表团谈话时，批评了斯大林的错误。他说：“斯大林提倡辩证唯物主义，有时也缺乏唯物主义，有点形而上学；写的是历史唯物主义，但做的常是历史唯心主义。他有些做法走极端，个人神化，使人难堪等等，都不是唯物主义的。”“对斯大林的批评，我们人民中有些人还不满意。但是这种批评是好的，它打破了神化主义，揭开了盖子，这是一种解放，是一场‘解放战争’，大家都敢讲话了，使人能想问题了。这也是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²

11月11日，铁托谈到斯大林犯错误的根子时说：“这些根子在哪里呢？在于官僚的机构，在于领导方法，在于忽视劳动群众的作用和愿望”。他批评阿尔巴尼亚和东西方一些党的领导人时说：“他们抗拒民主化和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决议，而且他们对斯大林制度的巩固出了不少力，他们今天正在努力恢复这个制度，并使它重新占上风。根子就在这些，这是需要纠正的。”³这是从制度上追究错误，在铁托等人的讲话之后，毛泽东和中共对斯大林问题发生了很大变化。

12月29日，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讨论，发表了由《人民日报》编辑部撰写的《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这是一篇回击铁托等人的论点，也是对斯大林社会主义理论和斯大林模式作了全面肯定的阐述，文中首先对斯大林的功过作了如下的评价：“斯大林对于苏联的发展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是有伟大功绩的……但是斯大林在苏联的内外政策方面都犯了一些严重的错误。”（在上面已叙述不再重复）文章又分析了斯大林犯错误的原因：“斯大林后期的一些错误之所以发展成为全国性的、长期性的、严重的错误，而不能得到及时的纠正，正是因为他一定范围内和一定程度上脱离了群众和集体，破坏了党和国家的民主集中制。党和国家的民主集中制之所以会受到某种破坏，有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这就是：党在领导国家方面还缺乏经验；新的制度还没有巩

¹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97页

² 《毛泽东文集》第7集，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25-127页

³ 《铁托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119-120页

固到足以抵抗一切旧时代影响的侵袭；国内外紧张斗争对于某些民主发展所起的限制作用；等等。”又“在这里，决定的因素是人们的思想状况。斯大林后期被一连串胜利和歌颂冲昏了头脑，他的思想方法部分地但是严重地离开了辩证唯物主义，而陷入了主观主义。他开始迷信个人的智慧和权威，不肯认真地调查和研究各种复杂的实际情况，不肯认真地倾听同志们的意见和群众的呼声，以致使自己的决定的一些政策和措施往往违反客观实际情况。而且，他往往在一个长时期内固执地要推行这些错误的东西，而不能及时地改正自己的错误。”要求人们正确对待斯大林“我们在总结斯大林的全部思想和活动的时候必须同时看到他的正面和反面，他的功绩和错误。只要我们是全面地观察问题，那么，如果一定要说什么‘斯大林主义’的话，就只能说，首先，它是共产主义，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这是主要的一面；其次，它包含一些极为严重的、必须彻底纠正的、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错误……我们认为，斯大林的错误同他的成绩比较起来，只居于第二位的地位。”纠正斯大林错误的办法，“再论”说，“斯大林的错误并不是由社会主义制度而来，为了纠正这些错误，当然不需要去‘纠正’社会主义制度。斯大林的错误不是由于实行了国家生活中的民主集中制，实行了党的领导，恰恰是由于他在一定范围内和一定程度上破坏了民主集中制和破坏了党的领导。”最后，提出反对修正主义的任务。“一部分共产主义者由于对斯大林采取了否定一切的态度，由于提出了反对‘斯大林主义’的错误口号，因而帮助了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修正主义思潮的发展。这种修正主义思潮无疑是有利于帝国主义对于共产主义运动的进攻的，而事实上，帝国主义也正积极地利用这种思潮”。¹

在“再论”讨论的常委会议上，毛泽东说：“所谓斯大林主义，基本上是正确的；所谓斯大林主义分子，基本上也是正确的，他们是有缺点有错误的共产党人，是犯错误的好人。必须把铁托的观点彻底驳倒……，斯大林主义非保持不可，纠正它的缺点和错误，就是好东西。这把刀子不能丢掉”²实际上，这是一篇为“斯大林模式”、斯大林的错误和产生错误的原因进行辩护的文章，客观地说，毛泽东及其支持者陷入了以斯大林的社会主义模式来评价斯大林的

¹ 《人民日报》1956年12月29日

² 吴冷西《忆毛泽东——我亲自经历的若干重大历史事件片断》，新华出版社1995年版，第18—19页

错误，只能抓住了表面现象，不能对斯大林的错误根源进行深入挖掘。而后来对揭示斯大林错误根源的人扣上修正主义大帽子加以批判，又回到斯大林模式上去。

苏共二十大的召开，特别是揭露斯大林的错误，为解放思想、摆脱教条主义的束缚，为各国共产党根据本国实际情况创造性运用马克思主义进行新的探索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同时为突破斯大林式的社会主义模式，寻求本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道路提供了有力的借鉴。

在苏共二十大召开后的两个月，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即《论十大关系》中，既批评了斯大林的错误，又指出了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中存在的弊端，从而吸取了有益的教训，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进行了探索。毛泽东说：“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过去我们就是鉴于他们的经验教训，少走了一些弯路，现在当然更要引以为戒。”¹毛泽东在批判中进行以下探索：

第一，“在处理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我们没有犯原则性的错误……象苏联的粮食产量长期达不到革命前最高水平的问题，象一些东欧国家由于轻重工业发展太不平衡而产生严重问题……他们片面地注重重工业，忽视农业和轻工业，因而市场上货物不够，货币不稳定。”“我们现在的问题，就是还要适当调整重工业和农业、轻工业的投资比重，更多地发展农业、轻工业。”

第二，“我们同农民的关系历来都是好的，但是在粮食问题上曾犯过一个错误……调查不够，摸不清底，多购了七十亿斤，这就是缺点。”“苏联的办法把农民挖得很苦。他们采取所谓义务交售制等项办法，把农民生产的东西拿走太多，给的代价又极低。他们这样来积累资金，使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受到极大的损害”。“鉴于苏联在这个问题上犯了严重错误，我们必须更多地注意处理好国家同农民的关系。”²

第三，“我国宪法规定，地方没有立法权，立法权集中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这一条也是学苏联的。因为起草宪法的时候，我曾经问过一些同志：是不是应该这么写，据说苏联是这样，有些

¹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67页

²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68页、273-274页

资本主义国家也是这样，但美国似乎不是这样。美国的州可以立法，州的立法甚至可以和联邦宪法打架……美国这个国家很发展，它只有一百多年就发展起来了，这个问题很值得注意。”“它的政治制度是可以研究的。看起来，我们也要扩大一点地方的权力。地方的权力过小，对社会主义建设是不利的。”¹

第四，“究竟是一个党好，还是几个党好？现在看来，恐怕是几个党好。不但过去如此，而且将来也可以如此，就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在我国国内，在抗日反蒋斗争中形成的以民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为主的许多民主党派，现在还继续存在。在这一点上，我们和苏联不同。”“他们是反对派，又不是反对派”。²

第五，“应该肯定，还有反革命，但是已经大为减少”。“今后社会上的镇反，要少捉少杀”，“机关、学校、部队里清查反革命”，“就是一个不杀，大部不捉”。“真凭实据的反革命，由机关清查，但是公安局不捉，检察机关不起诉，法院不审判，一百个反革命里面，九十九个这样处理。这就是所谓大部不捉。至于杀呢，就是一个不杀。”³这条看似宽大，实际上把清查、处理交给机关、学校、部队党委，这既违反宪法又出现以党代法。但据李慎之回忆：“赫鲁晓夫秘密报告传出不久，就听胡乔木讲述毛泽东的心情说‘苏联揭露的斯大林统治，其黑暗不下于历史上任何最专制暴虐的统治，毛主席日夜想走出一条比苏联好的路子来’。这话，我们听了都很感动。”⁴“这是个良好愿望。”

第六，“我们提出向外国学习的口号，我想是提得对的。现在有些国家的领导人就不愿意提，甚至不敢提这个口号。”“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但是，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运。”“对于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也应当采取这样的态度。……社会科学，马克思列宁主义，斯大林讲得对的那些方面，我们一定要继续努力学习。我们要学的是属于普遍真理的东西，并且学习一定要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自然科学方面，我们比较落后，特别要

¹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第488页

²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78—279页

³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81—282页

⁴ 《求索中国——文革前十年史》，红旗出版社1999年版，第52—53页

努力向外国学习。”¹

上述是毛泽东企图摆脱苏联模式，走自己的路的尝试，这种尝试是在维护苏联模式、肯定斯大林功大于过的前提下，提出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方法、方式，当然也隐藏着某些错误的东西。后来因众所周知的原因，毛泽东所批评斯大林的错误东西和苏联体制的弊端在实际生活中并没有完全坚持和执行，反而犯了比斯大林更严重的错误。

1956年4月5日，《人民日报》在《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中，评价了二十大的功绩。文章指出：“反对个人崇拜问题，在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二十次代表大会非常尖锐地揭露了个人崇拜的流行，这种现象曾经在一个长时期内的苏联生活中，造成了许多工作上的错误和不良的后果。苏联共产党对于自己有过的错误所进行的这一个勇敢的自我批评，表现了党内生活的高度原则性和马克思主义的伟大生命力。”又指出：“苏联共产党二十次代表大会展开的反对个人崇拜的斗争，正是苏联共产党人和苏联人民在前进的道路上扫清障碍物的一个伟大的、勇敢的斗争。”²毛泽东在八大开幕词中说：“苏联共产党在不久前召开的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又制定了许多正确的方针，批判了党内存在的缺点。可以断定，他们的工作，在今后将有极其伟大的发展。”³

待波匈事件发生后，世界上的反共势力猖獗时，毛泽东对赫鲁晓夫和苏共二十大的态度发生了巨大变化。1956年11月15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对苏共二十大提出不满：他说，“关于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我想讲一点，我看有两把‘刀子’；一把是列宁，一把是斯大林。现在，斯大林这把刀子，俄国人丢了。哥穆尔卡、匈牙利的一些人就拿起这把刀子杀苏联，反所谓斯大林主义。欧洲许多国家的共产党也批评苏联，这个领袖就是陶里亚蒂。帝国主义也拿起这把刀子杀人，杜勒斯就拿出来耍了一顿。这把刀子不是借出去的，是丢出去的。我们中国没有丢。我们第一条是保护斯大林，第二条也批评斯大林的错误，写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那篇文章，我们不像有些人那样，丑化斯大林，毁灭斯大林，而是按照实际情

¹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85-286页

² 《人民日报》1956年4月5日

³ 《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献》，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5页

况办事。”“列宁这把刀子现在是不是也被苏联一些领导人丢掉一些呢？我看也丢掉相当多了。十月革命还灵不灵？还可不可以作为各国的模范？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赫鲁晓夫的报告说，可以经过议会道路去取得政权，这就是说，各国可以不学十月革命了。这个门一开，列宁主义就基本上丢掉了。”¹在这里，毛泽东严厉地批评了赫鲁晓夫、陶里亚蒂，还批评了东欧党的领导人等抛弃了列宁主义、十月革命道路。

1957年1月，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中说：“对苏共二十大，我们党内绝大多数干部是不满意的，认为整斯大林整得太过了。这是一种正常的情绪，正常的反应，但是，也有少数人起了波动。每逢台风一来，下雨之前，蚂蚁就要出洞，他们鼻子很灵，懂得气象学。苏共二十大的台风一刮，中国也有那么一些蚂蚁出洞，这是党内的动摇分子，一有机会他们就动摇。他们听了把斯大林一棍子打死，舒服得很，就动摇过去，喊万岁，说赫鲁晓夫一切都对，老子以前就是这个主张。后来帝国主义几棍子，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几棍子，连赫鲁晓夫的腔调都不得不有所改变，他们又摇过来了，大势所趋，不摇过来不行。墙上一莛草，风吹两边倒。摇过来不是本心，摇过去才是本心。”²

2月17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11次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说：“批评斯大林有两方面的性质，一方面实在有好处，一方面是不好。揭破对斯大林的迷信，揭掉盖子使人家解放，这是一个解放运动。但是因为他（指赫鲁晓夫——引者）揭露的方法不对，没有做过好好的分析，一棍子打死，这么一个方面引起全世界去年下半年的几次大风潮，后来又引起匈牙利、波兰事件。”³

总的看法，毛泽东是在肯定斯大林的前提下，认为斯大林是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并不一贯正确，在功过方面，认为斯大林是功大于过，即七分功绩，三分错误。毛泽东在肯定二十大前题下，提出了“和平过渡”等不同看法。毛泽东对秘密报告评述说揭了盖子，又捅了漏子。这是在维护斯大林，维护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又不断批评反斯大林反苏联的兄弟党及其领导人，这在客观上造成了

¹《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21-322页

²《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34页

³《在最高国务会议第11次扩大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思想万岁》1949、10-1957卷，第162页

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等在维护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自己。苏共二十大提出的路线有着民主自由和改革倾向，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批判了斯大林，揭露斯大林的错误，这也暴露了苏联社会主义体制的弊端，提出克服弊端的改革措施，比如让内行、专家担任工业、农业的领导，释放、平反受斯大林迫害的政治犯，批判个人崇拜，揭发斯大林的罪行，提出和平共处、和平过渡、和平竞赛，改善同南斯拉夫的关系等，这些无疑给国际共运和中国共产党人产生巨大影响。毛泽东提出探索社会主义新路子，广大知识分子深受启发。这些重大影响都成为后来整风、鸣放的内容来源之一。

改革开放后，关于斯大林和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问题，邓小平有几次重要谈话。1980年1月说，“苏联搞社会主义，从1917年10月革命算起，已经63年了，但是怎么搞社会主义，它也吹不起牛皮”。¹1985年8月说，“社会主义究竟是个什么样子，苏联搞了很多年，也并没有完全搞清楚，可能列宁的思路比较好，搞了个新经济政策，但是后来苏联的模式僵化了。”1986年9月说，“看来（斯大林）这个模式在苏联，也不是很成功的”²这三次讲话是邓小平在苏联解体前对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最权威”的评价。

当今国内学术界对斯大林，对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有各种各样的评价。最新的评价是“作为苏联社会主义和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最高领导人，斯大林模式是不是就是一个好得东的东西呢？完全不是。在这一点上评价斯大林的功与过，完全是‘过大于功’的”。³这是在苏联解体后对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和对斯大林的评价，这个评价是客观地实事求是的。至于对斯大林全面评价恐怕还得持续下去。

二、波、匈事件的产生及其影响

苏共二十大的召开，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在西方世界抢先公布后，给整个共产主义运动带来困难和被动，给中、东欧几个社会主义国家带来混乱和动荡。然而，这些国家的党及其领导下的人民，特别是被斯大林整过的前领导人，本来对苏联、苏共和斯大林早已不满。在斯大林逝世后和斯大林问题被揭露后，这些国家的人民要求摆脱苏联的控制，废除不平等关系，要求独立自主，建立平等自

¹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50页

²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39、178页

³ 陆南泉、姜长斌、徐葵、李静杰《苏联兴亡史论》，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8页

由的关系。当时的苏联领导人并没有满足这些兄弟党、兄弟国家人民的正当、合理的要求，仍然以老子党自居，还是大国沙文主义那一套。这些兄弟党、兄弟国家的人民，纷纷举行反苏游行。苏联军警对兄弟国家的人民行动直接出兵干涉，甚至镇压，于是便出现了许多重大事件，以波兹南、匈牙利事件最为严重。直接原因是苏联长期干涉，最根本的是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危机。这些事件的产生对中国产生影响，其中“匈牙利事件”“对中国的影响最为严重和深远。

“波兹南事件”。50年代初期，波兰社会主义体制建立后，各种弊端不断地暴露出来，在政治上，由于40年代末进行党内大清洗，制造了大量的冤、假、错案，这些事件并没有得到纠正或平反；党内缺乏民主，领导人日益脱离群众，滋长官僚主义作风，压制不同的意见；在经济上，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人民必需的日用品匮乏，物价不断上涨，工资日益减少，实际生活水平不断下降；在对外关系上，波苏两党关系不正常、气氛很紧张，在苏共影响下无端地解散了波兰共产党并处决了波共驻莫斯科的领导人。40年代末在清党中，对波共主要领导人哥穆尔卡进行了批判和迫害，二战后，苏联对波兰领土的变动使波兰的领土蒙受损失，波苏的贸易处于不平等的地位。这是波兰的国内情况。

基于上述情况，波兰人民对波兰现任领导人产生严重不满。在这样的背景下，波兰统一共产党总书记贝鲁特1956年2月听过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闭幕后的秘密报告，这给“波兰的斯大林”一个很沉重的打击，由于剧烈的精神刺激，贝鲁特病死在莫斯科，由亲苏的爱德华·奥哈布继任党的总书记。在此期间，波兰陷入一片混乱之中。奥哈布顺应人民的呼声，吸取苏联体制模式的教训，提出独立自主的路线。他在4月党的积极分子会议上，公开承认党在过去犯了错误，并宣布释放哥穆尔卡，大赦政治犯和国外流亡者，开始进行平反纠左工作。但是，由于过去的政治、经济、外事等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积重难返，现在解决起来难度较大，效率不高，效果不理想，而人民群众对改变现状要求又很迫切，领导人对人民的要求估计不足，并没有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甚至对人民群众采取官僚主义态度，这样又激化和加剧了矛盾，因而导致波兹南事件的发生。

6月下旬在波兰西部重要工业城市波兹南的斯大林机车车辆制造厂，工人向波兹南市政当局提出增加工资和减税的要求，当局无

权决定这些要求。工人们选派 30 人代表团去华沙向机械工业部部长提出请求。这位部长说，减税可以考虑，增加工资不可能。当工人代表告诉部长，如果不增加工资，工人将于 6 月 28 日举行罢工时，这位部长勃然大怒，并警告工人：“如果你们上街，将会遇到坦克。”厂里工人获悉工人代表请愿失败后，情绪激昂，决定不等去华沙的工人代表团回厂，先去波兹南市政当局再次请愿。6 月 28 日清晨，一万多工人走上街头，高举“要面包和自由”的标语，向市政府进发，沿途得到群众的支持，有数万的群众加入游行队伍，到达市中心自由广场，工人代表要求市政当局接见，可他们拒绝接见，并传出谣言，说赴华沙请愿代表团已被逮捕，此时游行情绪激烈，秩序大乱，示威者高喊“到监狱去”，“释放囚犯”、“打倒秘密警察”、“俄国佬滚回去”等口号，部分示威者甚至冲进公、检、法、电台和政府部门，夺取枪支，打开监狱，释放政治犯，并向保安警察总部开火。事件发生后，波兰部长会议主席西伦凯维兹和国防部长罗科勃夫斯基前去波兹南。次日，国防部长根据莫斯科的命令，动用军队平息这场骚乱，据正式宣布有 53 人被打死，300 多人受伤，300 多人被逮捕。这就是“波兹南事件”。

“匈牙利事件”。1948 年以后，匈牙利劳动人民党的拉科西领导集团，推行斯大林的模式。思想路线上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原则，实行教条主义；组织路线上推行宗派主义，个人专断，压制不同意见，要求知识分子在思想上与政府保持一致；在政治上，民主遭受到破坏，对不同政见的人进行清洗和逮捕，制造大批冤、假、错案；经济上照搬苏联经济体制，实行国有化，强迫工业化，实行农业集体化，因而工农业生产上不去，效益不高，人民生活水平下降。这些做法必然引起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的不满，而拉科西集团仍然坚持己见，不肯承认错误，拒绝人民的要求，到 50 年代初期，危机早已潜伏。

1953 年 3 月 5 日斯大林逝世，对于国际共运产生重大影响。此时，苏共对东欧国家的控制有所放松，鉴于 1953 年 6 月发生东柏林暴动，因害怕此事件影响危机起伏的匈牙利产生连锁反应。6 月下旬，苏共邀请匈牙利党政领导代表团赴莫斯科举行会议，提醒拉科西集团吸取东柏林事件的教训，苏共领导人对推行斯大林政策的拉科西等人大大加指责，迫使他们从各方面纠正错误，并提议拉科西只担任党的总书记，让出部长会议主席给纳吉担任，即由两人共同掌权。

1953年6月末，在党的中央扩大会议上，拉科西被迫做了检讨，承认领导机关犯了一系列错误，并承担主要责任。会议决定：批判拉科西等人的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的错误，给纳吉恢复名誉，肯定纳吉在1949年反对强制合作化的意见是正确的。

1953年7月初，匈牙利国民议会选举纳吉为部长会议主席，纳吉向会议报告新的施政纲领，提出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体制改革，具体措施主要有以下几点：按照本国实际情况，调整农、轻、重比例，使国民经济平衡发展；稳定农业生产，放慢合作化速度，扶持个体农户，减轻农民负担，不许歧视中农；暂缓发展重工业，整顿工矿企业，提高工人工资，改善人民生活；提高知识分子地位，允许宗教信仰和自由；加强法制，关闭集中营，实行大赦。这些措施得到人民普遍的欢迎，在实践中取得成效。

纳吉的观点在1954年10月中央全会上获得与会者的支持，会后，纳吉设想在此基础上把改革引向深入，纳吉的观点和做法得到大多数人拥护，但拉科西等少数人不支持，分歧日益激化。纳吉的改革观点，对苏联模式有多处触痛，使苏联感到不安。因此，苏共领导再次邀请拉科西、纳吉等人赴莫斯科，在会谈中，苏共对纳吉的观点提出了批评，要纳吉接受拉科西的领导。回国后，1955年3月，拉科西主持中央全会，将纳吉在1953—1955年所实行的改革斥为“右倾机会主义”，先后撤销党内外的一切职务，并开除出党。对纳吉的这样处理，孕育着另一次危机。

苏共二十大的召开和波兰事件的影响，直接导致了匈牙利事件的爆发。1956年2月，苏共二十大的召开，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迅速传到了匈牙利。3月17日，匈牙利的一些党员和知识分子组成裴多菲俱乐部，讨论学术和政治问题，向党中央提出：要求改正错误，走自己建设道路，要求改革，指责拉科西是匈牙利的斯大林。在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冲击下，拉科西已控制不了局势，于是，苏共派米高扬到匈牙利，要求拉科西辞职，1956年7月，匈党召开中央全会，解除了拉科西的职务，格罗接任第一书记，主持党中央工作，试图克服经济、政治困难，但未能解决问题。同时苏共也开始同纳吉接触，希望他与匈牙利党合作。10月4日，纳吉写信给匈党中央，要求恢复党籍和分配工作。

10月6日，在人民群众和苏共双重压力下，匈牙利党政当局为40年代末迫害致死的拉伊克等四位原党政领导人的遗骸举行国葬，布达佩斯30万人参加送葬，拉伊克的妻子和纳吉走在送葬队伍的前

列。这一行动引起连锁反应，全国各地为大清洗遇害者平反昭雪，恢复名誉。14日，匈党中央决定恢复纳吉的党籍。10月21日，传来波兰党中央八中全会和哥穆尔卡担任领导工作的消息。匈牙利人民深受鼓舞，要求匈牙利党中央效法波兰，重新启用纳吉。

10月22日，裴多菲俱乐部和首都大专院校学生团体向党中央提出以下要求：恢复纳吉的党政领导工作，调整国民经济，改革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清算过去的错误，改善匈苏关系，走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10月23日上午，他们组织市民和学生举行和平示威游行，有10多万人参加。刚从南斯拉夫访问回国的匈牙利劳动人民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格罗，面对示威游行队伍，不去了解民意，也不进行疏导，而是简单粗暴地要内务部下令禁止游行。被这个禁令激怒了的群众纷纷加入游行队伍行列，内务部被迫取消了禁令。游行队伍集中在裴多菲广场，举行仪式，推倒了斯大林的铸像后，唱着歌和高呼口号“要格罗下台”、“要纳吉上台”、“实现民主”等口号进行游行，抵达议会广场，游行者增加到30多万人，游行者在议会大厦前齐声高喊“纳吉·伊雷姆，出来讲话”，纳吉作了即席讲话：要他们相信党，遵守宪法，于是，游行者开始离去。另一路示威游行到电台，要求广播他们的几点要求，遭到拒绝。

10月23日20时，电台广播格罗的讲话：他开始说，“自然，我们希望是社会主义民主，而不是资产阶级民主”，“敌人诽谤苏联，说是我国同它的贸易是不平等的，说是应该反对苏联以保卫我们的独立。这些全是谎话。”“我们是爱国主义者，不是民族主义者。因此，我们谴责在青年中散布沙文主义毒素，利用我们的国家给予劳动人民的民主自由来制造民族主义性质的示威的人们。”

格罗最后说：“应该加强团结，让党能够反击民族主义骚动和挑拨的任何企图。”这个广播讲话，起到了火上浇油的作用，群众的和平示威游行发展成为骚乱，进而演变成武装流血冲突，示威者占领军事仓库、电台、报社等，当晚，匈党中央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纳吉再次出任部长会议主席，通过戒严令，请苏联出兵前来制止事端。第二天，纳吉再次发表讲话，呼吁停止暴力，恢复秩序。

10月24日，苏联开始插手，驻在城外的苏军坦克向市区进发，下午，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扬和苏斯洛夫抵匈，指责格罗夸大和歪曲事态，致使莫斯科当局作出把军队进入布达佩斯的决定。匈党解除了格罗的职务，由卡达尔接任第一书记，纳吉主持政府工作。纳吉一方面宣布施政纲领，恢复改革措施。另一方面着手恢复秩序，

稳定局势，争取苏军撤退。这些措施，苏军起初是同意的。

苏联准备从匈牙利撤退，10月30日，毛泽东电告我在莫斯科代表团，立即约见苏共中央主席团，声明受中共中央委托，反对苏军从匈牙利撤退。10月31日，刘少奇会见苏共中央主席团全体成员时指出：苏共中央决定从匈牙利撤军决定是对匈牙利人民的背叛。苏共中央如果抛弃社会主义匈牙利，将成为历史的罪人。¹由于中国共产党反对苏军撤出匈牙利，苏军再次进入匈牙利。纳吉通知驻苏大使：要求苏军立即撤出，立即废除华沙条约，并于11月1日宣布匈牙利中立，转向联合国和四大国帮助维护这种中立。

与此同时，苏军警对游行示威者实行镇压，终于将动乱镇压下去。匈党政领导陷于分裂瓦解，苏联为了控制局势，一方面帮助纳吉稳定局势，另一方面把卡达尔、明尼赫接到外地。在此期间，赫鲁晓夫在莫斯科召开中央主席团会议，确定匈牙利事件的性质为叛乱，是反革命性质的，他说：“纳吉虽然是个共产党人，但是他的话已不再代表匈牙利共产党，他仅仅代表他自己和一小部分回来帮助反革命势力的逃亡者。”这样的讲话，“匈牙利事件”的性质就是反革命暴乱。

11月4日，在苏联的精心安排下，卡达尔宣布成立匈牙利工农革命政府，邀请苏联再度出兵，进攻布达佩斯，平定城里的骚乱，并逮捕纳吉（纳吉藏在南斯拉夫大使馆，后由大使馆交出，于1958年6月被法庭判决，处以绞刑）。11月6日，卡达尔乘苏军坦克回到布达佩斯，成立以卡达尔为首的临时党中央，着手重建党的组织。持续了13天的骚乱得以平息。这场骚乱直接经济损失达220亿福林，造成几万人伤亡，给国家带来极大的灾难。这就是“匈牙利事件”。

波匈事件对我国的影响。波匈事件引起我党的极大的关注，毛泽东在匈牙利事件发生后几天，就在1956年11月15日党的八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了乱子的两重性，他说，“波兰、匈牙利出了乱子（指波兹南事件，匈牙利事件）……我看这些坏事也都是好事。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坏事有两重性，一重是坏，一重是好。”“波兰也好，匈牙利也好，既然有火，总是要燃烧的。”“现在烧起来了，烧起来就好了。匈牙利有那么多反革命，这一下暴露出来了。匈牙利事件教育了匈牙利人民，同时教育了苏联的一些同

¹ 参见王素莉《波匈事件后毛泽东对国内阶级斗争局势判断变化的历史线索》，《当代中国史研究》1999年第1期，第35-36页

志，也教育了我们中国的同志。”他批评东欧的一些国家没有抓好阶级斗争说，“东欧一些国家的基本问题就是阶级斗争没有搞好，那么多反革命没有搞掉，没有在阶级斗争中训练无产阶级队伍，分清敌我，分清是非，分清唯心论和唯物论。现在呢，自食其果，烧到自己头上来了。”并总结教训说，“不依靠群众进行阶级斗争，不清分敌我，这很危险。”¹毛泽东在这里错误地总结和吸取波匈事件的教训，强调阶级斗争，加强无产阶级专政。

据薄一波提供的情况，可以看出毛泽东关注的程度。薄一波说：“仅仅从1956年10月21日到11月9日的20天时间内，中央常委和中央政治局连续召开十三四次扩大会议讨论波匈事件有关问题。11月10日至15日召开的八届二中全会，其中心议题之一就是讨论波匈事件及其教训。全会后，仍多次召开常委扩大会议、政治局扩大会议继续讨论波匈问题，并根据讨论的意见以《人民日报》编辑部的名义撰写和发表了《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²毛泽东审阅和修改此文。1956年12月29日，《人民日报》发表此文。

《再论》论及匈牙利事件的严重性及其产生原因时写道：“帝国主义在1956年10月匈牙利事件中的活动，是帝国主义在侵朝战争以后对于社会主义阵营一次最严重的进攻，正如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临时中央委员会会议的决议所说，匈牙利事件是由内部和外部的几方面原因造成的，……国际帝国主义起了主要的决定性的作用。”《再论》批评了匈牙利领导人没有建立起无产阶级专政错误时指出：“无产阶级专政必须把对于反革命力量的专政同最广泛的人民民主紧密结合在一起，这是不能有任何怀疑的。”“但是有些人并不是这样认识问题的。对于匈牙利事件的反应，最显著地暴露了这一点。在过去时期的匈牙利，劳动人民的民主权利和革命积极性受到破坏，而反革命分子却没有受到应有的打击，以致反革命分子在1956年10月间能够很容易地利用群众的不满情绪，组织武装叛乱。这就说明了过去时期的匈牙利还没有认真地建立起无产阶级专政。”³在这里可以看出《再论》对“匈牙利事件”产生的原因作出片面的、非客观的总结。

1957年1月以后毛泽东在许多大型会议上谈到匈牙利事件。《在

¹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18，323页

²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第575页

³ 《人民日报》1956年12月29日

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波匈事件对中国的影响，他说：“苏共二十大的台风一刮，中国也有那么一些蚂蚁出洞。”“党内党外那些捧波、匈事件的人捧得好呀！开口波兹南，闭口匈牙利，这一下就露出头了，蚂蚁出洞了，乌龟王八都出来了。他们随着哥穆尔卡的棍子转，哥穆尔卡说大民主，他们也说大民主。”“匈牙利事件的一个好处，就是把中国的这些蚂蚁引出了洞。”他警告想搞匈牙利大民主的人说，“如果有人用什么大民主来反对社会主义制度，推翻共产党的领导，我们就对他们实行无产阶级专政。”¹

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作了《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的讲话中，谈到出现匈牙利事件的原因，他说肃反问题“我们做得比较好。比苏联好，比匈牙利好。苏联太左，匈牙利太右。”“匈牙利对于反革命根本没有肃，杀了拉伊克，他倒是把革命分子杀了几个，而反革命就杀得很少，所以就出现了匈牙利事件。”“匈牙利事件以后，中国有什么风浪呢？有那么一点小波浪，‘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那春水是皱了，但是七级台风引起那样大的波浪是没有。为什么道理，肃反把反革命分子根本上肃掉了。剩下的没有几个，还有一点少数，极少。”“匈牙利事件有两重性。你们说匈牙利这个事情好不好？我说又好又不好。当然不好，因为他闹事，但匈牙利做了一件很好的事，反革命帮了我们的大忙，我们肃清了反革命。匈牙利事件停下来，比过去巩固，现在的匈牙利比过去不闹事的匈牙利要好，社会主义阵营都取得了教训。”最后谈到匈牙利的领导究竟犯了什么错误？他说：“大概有这么几条，无非有官僚主义，教条主义、脱离群众、工业方针错误……工人的薪水降低百分之二十，资本家简单地打倒。”“知识分子没有改造，根本不谈知识分子改造，于是乎裴多菲俱乐部，记者协会，学生联合会就出来了。还有反革命分子没有镇压，没有群众跟反革命作斗争，而是少数人在那里斗，大批的真正的反革命分子没有受损伤。”1957年3月17日，毛泽东在天津市的党员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批评匈牙利前领导人没有抓好阶级斗争的教训，他说，“现在我们的建设，是不是也付那么大的代价？如匈牙利从前的领导人，它的阶级斗争是失败的，它的建设工作也是失败的，因为去年10月一闹，我说闹得很好，有些人很不高兴，我很高兴。坏事可以变好事，一闹，

¹ 《毛泽东思想万岁》1949.10-1957卷，第150-151，162页

一个脓疮就穿了喽！如果我们现在不重复以前的错误，在建设的时候，可以付出较少的代价，可以避免像匈牙利的那样的事情。”薄一波回顾说：“毛主席和党中央为什么这么关切波匈事件？因为这两个事件不仅关系着波匈两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命运，而且对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有影响，在我们国家也发生了一些罢工、罢课等闹事问题。波匈事件连同苏共二十大对斯大林的错误的揭露，极其尖锐地表明社会主义制度下仍存在着各种矛盾，如何对待和处理这些矛盾直接关系到社会主义事业的巩固和发展问题，是摆在各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人面前的重大课题。”¹

总之，从1953年斯大林逝世后，苏共召开二十大，会上赫鲁晓夫揭露斯大林的错误，引起国际共运的动荡和冲激，相继发生波匈事件，也影响了中国领导层和部分知识分子。毛泽东亦喜亦忧，喜是破除斯大林迷信，解放思想，忧是认为苏联东欧领导人抛弃丢掉十月革命道路和马克思列宁主义，更担忧中国是否出赫鲁晓夫，出匈牙利事件。由此出发，毛泽东认为他们没有抓好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毛泽东站在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的立场，以及肯定斯大林功大于过的前提下，片面吸取苏联和东欧出现问题的教训，在中国紧紧抓住阶级斗争不放，加强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致使我国社会主义革命走向以阶级斗争为中心的误区。苏共二十大以后，在毛泽东带头批评斯大林的错误影响下，部分知识分子解放了思想，破除了斯大林不犯错误的神话，认识到社会主义国家也有弊端，结合中国实际情况进行思考，待有机会就提出自己的观点。因此，苏共二十大揭露斯大林问题，波匈事件就成为整风和反右的外来背景和由来之一。

三、国内出现不安定的因素

自1953年我国国民经济根本好转，毛泽东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全国各族人民为实现这个总路线而奋斗，到1956年上半年，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社会主义制度基本建立起来，这是我国历史上发生最深刻变化的时期，在此期间，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取得了一定胜利和成绩。但同时“左”的指导思想下，产生某些缺点和失误，甚至在某些地区、部门出现一些不安定的因素，这些不安定因素表现在社员退社、学生罢课、工人罢工等等现象上，而许多领导则采取粗暴的办法来解决，这样就会加剧了不安定因素

¹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册，第577页

的发展。如何处理这些问题就成为亟待解决的新课题。

农民闹退社。我国是个贫穷落后、人口众多的农业大国，虽然建国后进行大量的革命和建设，取得一些成绩，但仍然存在某些失误。早在1955年4月24日彭一湖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黄炎培转给国务院一封信，信中反映湖南东部地区农村一些情况：“（1）留粮点过低，1954年办统购时候，由于给农民留下粮食数量过少，使农民吃不饱，体力不足，生产情绪低落，影响了生产，无力养猪，副业也受到打击。（2）定产量过高。……实际产量降低，规定产量与实际产量之间出现空额，使农民留粮进一步减少。（3）区乡干部作风问题。他们遇事情不深入群众了解实际情况，不接受群众的正确意见和要求，为了完成任务，往往用强迫命令方法进行，引起群众的反感。”这封信经毛泽东批示过，黄炎培谈了他的看法：“以我综合各方面报告，推想起来，到底有粮者叫是少数，无粮者叫是多数，而且前者是跟随着后者而发生的。要分别处理，但断不可不处理。”¹

1955年7月6日，《人民日报》刊登山西和顺、昔阳两县农民缺粮来信：缺粮情况十分严重，不少农民放弃生产，成群结队到处投亲或行乞，有的地方已经出卖子女、离婚等现象。由于粮食问题得不到解决，农民怨言很多，反动地主、富农和暗藏的反革命分子也趁机活动，各种谣言不断出现。²

1956年12月6日，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发出《关于退社和大社问题》的简报。简报说，最近在电话上与辽宁、安徽、浙江、江西、四川、陕西、河南、河北等省委农村工作部联系，各地反映了关于目前农业社方面的一些情况和问题。第一，退社问题。今年秋收分配前后，一部分农业合作社出现社员退社和要求退社的情况，退社户一般占社员户数的1%，多的达5%；思想动荡想退社的户占的比例更大一点。闹退社的户主要是富裕中农；其次是劳力少，人口多的户和手工业者、小商贩等。根据各地分析，社员退社的主要原因有：一、大多数是因为减少收入而引起的。二、农业社对社员劳动时间控制过死，社内劳动过分紧张，引起社员不满。三、社干部作风不民主，对社员的一些日常困难问题不照顾、不体贴，甚至还予以打击，社员肚里有气。四、对社员入社的生产资料处理不当，

¹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5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第119页

² 参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5册，第190页

特别是将社员的一些零星树木、果树和小块苇塘等也入了社，社员表示最为不满。五、在农村自由市场开放之后，有些社员特别是一部分富裕农民，认为单干是赚钱的门路了，不愿留在合作社内。第二，联村社大社问题。经过秋收分配工作，一般都感觉到办联村的大社确实有困难，有些联村社难以坚持下去。各地准备在冬季整社中加以合理解决，做法不同：一、四川省委坚决主张农业社的户数要少一些，一般以百户左右为宜。二、安徽省决定除 3500 户以上的大社可考虑适当划小，其余 1000 户左右的大社一律不动。该省认为，千户左右的大社，今年都增产，可以办下去。三、河北、河南、陕西等省主张将不能维持的联村社改为联社的形式，不主张分社。在对待联村社大社问题上，不仅各省之间看法和作法不同，而且一省之内各级领导之间和群众之间也是不同的。一般表现为，省委、地委主张划小或改为联社，县委、区委动摇，乡干、社干反对，社员表示拥护。动摇和反对者是因为怕说他们“右倾”，同时由合而分也有许多具体问题不好解决。¹

农民闹事诱发的不安定的苗头，毛泽东是如何看待的呢？1957 年 1 月，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中，批评了一些高干的错误思想，他说：“我们的部长、副部长、司局长和省一级的干部中相当一部分人，出身于地主、富农和富裕中农家庭，有些人的老太爷是地主，现在还没有选举权。这些干部回到家里去，家里人就讲那么一些坏话，无非是合作社不行，长不了。富裕中农是一个动摇的阶层，他们的单干思想现在又在抬头，有些人想退社。我们干部中的这股风，反映了这些阶级和阶层的思想。”接着批评了军内党内干部为农民叫苦的问题：“在我们军队的高级干部中间，有些人可能是自己回家，或者是接了亲属来，听到富裕中农、富农、地主的那些话，受了触动，于是就替农民叫苦。1955 年上半年，党内有相当多的人替农民叫苦，跟梁漱溟之流相呼应，好像只有他们这两部分人才代表农民，才知道农民的疾苦。……江苏做了一个调查，有的地区，县区乡三级干部中间，有百分之三十的人替农民叫苦。后头一查，这些替农民叫苦的人……到底代表谁呢？他们不是代表广大农民群众，而是代表少数富裕农民。”最后批评有些党员反对统购统销政策和合作化的错误说：“薛迅就是一个，她原来是

¹ 参见徐达深主编《共和国史记》第一卷，吉林人民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1295—1296 页

河北省的省委副书记、副省长。……统购统销是实行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步骤。她却坚决反对，无论如何要反对。还有一个，就是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副主任孟用潜。他上书言事，有信一封，也坚决反对统购统销。实行农业合作化，党内也有人起来反对。”¹

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在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中，再次批评某些干部为农民叫苦的错误，他说，“我们有些干部，也这么叫，有一些实际上是代表富裕中农。因为干部有了几个钱，寄点回去，今年寄一点，明年寄一点，几年之内他家里有钱了，就成了富裕中农。富裕中农叫得最厉害，就影响我们的干部。”²

上述引文表明，毛泽东批评了一些高干和党员。他们对党的政策有不同看法，应该说是很正常的，有许多意见是正确的，至少可以供制定政策时参考，而毛泽东则认为他们是为农民、富裕中农叫苦，是地富家庭的代言人。用阶级斗争观点来处理党内不同意见，必然导致人们的不服。尽管毛泽东严厉地批评了某些党员干部反对统购统销和合作化政策，批评某些高级干部和一般干部为农民叫苦、替少数富裕中农讲话，但自农业合作化以来，农民闹退社仍未减少。

各省发生退社风潮：广东发生退社、散社事件：1956年7月，广东陆丰县碣石区发生了大批合作社散伙和社员闹退社的严重现象。该区有二十个包括817户社员的初级社散了伙，社员同干部、中农同贫农、退社农民同不退社的农民之间的关系异常紧张，并严重影响了生产工作。发生退社现象的根本原因是合作社的生产搞得不好。丢荒田地，番薯不够吃，有时社员连买盐的钱也没有。干部把社员上山割草视为“自发势力”，社员在自留地种东西也遭到干部干涉，经营管理十分混乱。有93个社没有订生产计划，订了也不执行，计算劳动报酬也停留在死分死记的阶段，生产效率低到惊人的程度。中耕期间，竟有60%的社员不出勤。正因为如此，有些农民便动摇退社了。³

1956年10月起，广东、河南、安徽、浙江、江西、陕西、河北、辽宁等省先后出现农业合作社部分社员要求退社的情形。退社户达

¹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35-336页

² 《毛泽东思想万岁》，1949.10 - 1957卷，第153页

³ 参见程栋等主编《图文二十世纪中国史》第六卷，广东旅游出版社1999年版，第1810页

到1%至5%。闹退社的主要是富裕中农，其次是劳动力少、人口多的户和手工业者、小商贩等。主要原因有收入减少，对劳动时间控制得过死，劳动过分紧张，社干部作风不民主，对社员入社的生产资料处理不当，作价偏低。¹

像江苏，也有不少农民闹事，请愿。①闹退社。中农居多，占60-70%；②闹分社。在大社中，富村和产量高的队，因多余土地、农具、牲口、粮食感到吃亏；③闹粮食。缺粮户、困难户为主。④闹救济。因灾区中分配救济款不公；⑤闹干部作风。因帐目不公开，社员怀疑等。²

中央农村工作部向中央汇报材料表明，根据浙江省宁波专区的调查，在退社中，富裕中农占50%；安徽省的典型调查，在退社中，富裕中农占70%。浙江农村发生请愿、殴打、哄闹事件1100多起，广东农村先后闹退社的有11-12万户等等³

中央农村工作部分析闹退社、请愿、闹事的原因时指出：主要是：（1）大多数是因减少收入引起的。各省一般都有10%到20%的社员户减少收入，减少收入较多的户，多半是富裕中农、小商贩和有技术的手工工人等，他们的收入减少，而且一般社的生产水平，一、二年还将赶不上富裕中农的水平，他们便积极想出去单干。减少收入不多的户，情绪也有些动摇。特别是在成立社时有些干部的许愿落了空，社员很失望。（2）管理混乱。劳动管理过死，瞎指挥普遍，财务管理不清，帐目混乱。当时许多高级社不能按时间向社员公布账目，有的甚至一度没有会计，没有账目，社员没有时间搞家庭副业，零花钱困难等，引起社员不满。（3）干部作风不民主，甚至违法乱纪。在生产分配等重大问题上不与社员群众商量，命令行事，还有不少干部捆绑吊打社员。浙江仙居县自合作化高潮以来，251个乡干部中，有74个吊打过人，社队干部在他们影响下，打人更为严重，这样造成干群关系紧张。（4）执行经济政策时出现偏差。主要表现是农民的耕畜、大农具入社抵交股份基金时，折价偏低。象江苏省泰县塘湾区陈明社，入社耕牛29头，最多的付款28元，最少的只有9.9元。还有对社员入社的生产资料处理不当，特别是将社员的零星树木、果树和小块茸塘入了社，社员最为不满。（5）

¹ 参见程栋等主编《图文二十世纪中国史》第六卷，第1818页

² 参见从进《曲折发展岁月》，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69-70页

³ 参见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第569页

未能一贯地严格按照自愿互利原则办事。只有一年多的时间就实行了高级社，由于过快发展，工作粗糙，强迫命令，违背自愿互利原则，造成生产关系在某些环节上与生产力的发展不相适应，再加上工作跟不上，必然引起社员起来暴动。等等。¹

1957年4月23日新华社发出关于湖北农村人民内部矛盾存在问题主要有：“（1）农业合作社领导不民主、财务不公开、分配不合理，引起群众不满。（2）干部对民间的迷信活动和宗教问题处理不当，引起农民闹事。（3）在占用渔场、畜牧场、林场、茶场、小矿山及耕田等问题上，国家与当地群众发生利益纠纷。”²

总之，农民和代表农民利益的代言人，对党的农村政策不满、对农业合作化不满，问题出在下面，根子主要是在于上面，在于毛泽东把农业合作化搞早了、搞快了，离了农村生产力发展水平，步了斯大林对农民集体化的后尘；在于“用‘铁的手腕’对待老百姓，用专政手段办农业，这是许多干部犯过的错误，不少地方干过的蠢事。”³在于生产关系不适应生产力，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妨碍了社员发挥积极性；在于上层建筑不能很好地为经济基础服务，是生产关系阻碍生产力的发展、是上层建筑存在某些严重缺陷，这种缺陷既有“三害”（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作风，也有体制上的问题。毛泽东对农民利益代言人的批评，就像1953年错批梁漱溟为农民说了几句话一样。单纯用批判、斗争以及专政的办法是解决不了农民退社、闹事的问题的。说到底，农民退社是对党的农业社会主义合作化的不满的反映，是对农村干部强迫命令、简单粗暴作风的反抗。毛泽东指出的出路在于处理好干部的工作作风问题，这没有抓住农民退社的根本问题。解决这个根本问题的出路在于改变所有制行式，也就是后来邓小平提出的家庭承包责任制，这个家庭承包责任制是真正适合农村生产力发展水平的生产关系，是充分能够调动和发挥农民的积极性，因而极大的提高农村生产力的水平。

学生闹罢课。关于学生闹事的情况，掌握的材料很少，尽量多收集一些材料来说明学生闹事，由于当时形势较好，学生闹事也较少，就是学生闹事，多数都在中学和中等技术学校，现在介绍如下：

¹ 参见丛进《曲折发展岁月》，第69页；《当代中国史研究》1998年第3期，第10页

²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448页

³ 傅上伦等《告别饥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84页

1956年11月15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谈到学生闹事情况，他说：“成都有100多学生要到北京请愿，一个列车上的学生在四川省广元车站就被阻止了，另外一个列车上的学生到了洛阳，没有能到北京来。我的意见，周总理的意见，是应当放到北京来，到有关部门去拜访。要允许工人罢工，允许群众示威。游行示威在宪法上是有根据的。”“县委以上的干部有几十万，国家命运就掌握在他们手里。如果不搞好，脱离群众，不是艰苦奋斗，那末，工人、农民、学生就有理由不赞成他们。我们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长官僚主义作风，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层。谁犯了官僚主义，不去解决群众的问题，骂群众，压群众，总是不好，群众就有理由把他革掉。我说革掉很好，应当革掉。”¹在这里，毛泽东严厉地批评了犯官僚主义的干部。

1957年1月，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学生闹事的问题，他说：“在学校里头也出了问题，好些地方学生闹事。石家庄一个学校，有一部分毕业生暂时不能就业，学习要延长一年，引起学生不满。少数反革命分子乘机进行煽动，组织示威游行，说是要夺取石家庄广播电台，宣布来一个‘匈牙利’。他们贴了好多标语，其中有这样三个最突出的口号：‘打倒法西斯！’‘要战争不要和平！’‘社会主义没有优越性！’照他们讲来，共产党是法西斯，我们这些人人都要打倒。他们提出口号那样反动，工人不同情，农民不同情，各方面的群众都不同情。北京清华大学，有个学生公开提出：‘总有一天老子要杀几千几万人就是了！’……邓小平同志去这个大学讲了一次话，他说，你要杀几千几万人，我们就要专政。”邓小平后来果然动用了无产阶级专政。

接着毛泽东分析了叫嚣杀人以及与我们对立的原因，指出，“我们高等学校的学生，据北京市的调查，大多数是地主、富农、资产阶级以及富裕中农的子弟，工人阶级、贫下中农出身的还不到20%。全国恐怕也差不多。……在一部分大学生中间，哥穆尔卡很吃得开，铁托、卡德尔也很吃得开。倒是乡下的地主、富农、城里的资本家、民主党派，多数还比较守规矩，他们在波兰、匈牙利闹风潮的时候还没有闹乱子，没有跳出来说要杀几千几万人。对于他们的这个守规矩，应当有分析。因为他们没有本钱了……他们脚下是空的。

¹《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25-326页

如果天下有变……那就难说了。那时，地主，富农、资产阶级、民主党派，都要分化。他们老于世故。许多人现在隐藏着。他们的子弟，这些学生娃娃们，没有经验，把什么‘要杀几千几万人’、什么‘社会主义没有优越性’这些东西都端出来了。”“学生中间跟我们对立的人也不少。现在的大学生大多数是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其中有反对我们的人，毫不奇怪。这样的人北京有，石家庄有，其他地方也有。”

最后毛泽东提出了对闹事的大学生的处理办法：“凡有学生闹事的学校，不要放假，硬是来它一场赤壁鏖兵。这有什么好处呢？就是把问题充分暴露出来，把是非搞清楚，使大家得到锻炼，使那些没有道理的人，那些坏人闹输。”“清华大学那个要杀几千几万人的大学生，我们邓小平同志去讲话，就请他当教员。这样的人，又没有武装，又没有手枪，你怕他干什么？你一下子把他开除，你那里很干净了，但是不得人心。你这个地方开除了，但他就要在别的地方就业。所以，急于开除这些人不是好办法。这种人代表反动的阶级，不是个别人的问题，简单处理，爽快是爽快，但是反面教员的作用没有尽量利用……当然，对于搞匈牙利事件那样反革命暴乱的极少数人，就必须实行专政。”¹在这里，毛泽东从阶级斗争角度，警惕大学生闹事，主张让闹事的人充分表露出来，认为这些人代表反动阶级，处理时让这些充当反面教员，对敢于搞“匈牙利事件”的人，就必须实行专政。这套“引蛇出洞”的策略和处理闹事人的办法早已准备好了。

下面就是处理学生闹事的几个较典型的例子：

第一，“兰州林业学校建校于1955年秋季，学生绝大多数来自东北地区。这些学生入校后一直很关心‘三年能回家几次，发不发路费’的问题，而校方对此却一直未给予明确答复。1957年1月6日，学生中流传石油学校经过‘斗争’已领到28元路费的谣言，1月7日，10名学生（内有团支书等五名团员）秘密开会，准备煽动罢课。8日晨他们以‘罢课委员会’名义在校园内张贴标语，号召‘为回家而斗争’、‘直到车费拿到手才上课’，并向学校提出‘最后通牒’，声称学校在9日晨5时前若不给予答复即开始罢课。当天上午尚勉强上课，下午即有许多班自动停课。这时学校领导没有及时采取明确措施，校团总支也仅仅号召团员不要参加罢课，而一

¹《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32、333、351、353-355页

些团支部竟然号召团员起来‘斗争’，9日学生卧床不起，正式开始罢课。此时学校决定召开班会和学生代表会议，但因学生哄闹和抵制而未开成。9日省委农村工作部部长XXX率工作组及几十名民警到校，在与学校领导开会时发现学生在外偷听，这位部长当即命令民警扣留了其中四人，学生情绪更趋激动。当部长准备召集学生讲话时，学生提出以‘警察退出会场’为先决条件，部长拍桌大骂学生‘胡闹’，并命令把‘罢委会’委员XXX抓起来。这时部分学生已进入会场准备听报告，在整队时，有人喊‘打’，‘救XXX’，许多学生就蜂拥而上，在场民警和干部中有三人受伤，工作组成员、省农业厅厅长XXX也被挤倒并挨了几拳，省委农村工作部部长当场命令逮捕了四名学生。接着学生又涌进饭厅，打了在场的副校长，在此又有两名学生被捕。于是，大队学生集合入城赴省人民委员会请愿，沿途高呼‘共产党万岁’、‘宪法是保护我们的’口号。途中与省里派去截阻的徒手部队和公安人员遭遇，发生殴打，为首3人（内有一人手持一把菜刀）被捕。相持至深夜学生才返校。回校后，学生们顶门而睡。午夜，省里组织军、警和干部四五百人到校，围楼喊话，说‘坚决镇压坏分子，保护好同学’，要求学生出来听报告。后来团支部委员XXX等4人出来向工作组建议：‘不捕人，民警退出会场，学生就可以出来听报告。工作组接受了这个意见。在10日晨4时向学生们作了报告，学生们在听了报告并讨论之后，多数已认识到罢课闹事是不对的，也不该向政府要路费。‘罢委会’3位负责人向工作组具体承认错误。情况开始缓和下来。到11日下午，工作组又将XXX等七人逮捕。从18日到21日，学校接连开了几天的批评会、斗争会和全校性的控诉大会。在大会上，被批斗的学生一个个带着手铐，由民警押进会场，被指控犯了‘反党、反人民、反革命’的罪行，大会还呼喊‘镇压’‘严办’之类的口号¹。这是一起对学生闹事，采取武力处理的办法。“毛泽东说，对待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动不动就想‘武力解决’，这是非常危险的，必须坚决纠正的。”²

第二，昆明航空工业学校学生闹事。“1956年9月初，昆明市发生了由广东来昆明上中等技校的3000多名学生向省人民政府请愿，要求提高助学金和生活待遇的事件。但是，同期到达昆明航校

¹朱地《1957年，大转弯之迷》，山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9-70页

²薄一波著：《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回顾》下卷，第571页

的500名湖南学生，没有受影响，而且很少怨言。其实他们的学习、生活条件比其他学校还差。这是为什么呢？当时团省委写的材料说，其原因就在于‘这个学校的政治思想工作做得比较具体切实的’。校领导说老实话，把学校的困难情况如实地告诉学生，动员学生共同克服困难；校领导和师生同甘共苦。学校没有饭厅，师生都吃‘露天食堂’，每逢雨天，干饭成了稀饭。……就这样，‘困难重重的昆明航空学校办得生气勃勃’。毛主席十分称赞他们的做法，说，‘这是没有官僚主义的，如果办学校的人，都照这个办法办，那就好了，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办学校的办法。’¹

“1957年1月，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的讲话》指出闹事的原因，他说：‘发生人民闹事的原因有这么一些：有些是因为我们在政治上或在经济上犯的错误。犯错误的原因无非是主观主义、官僚主义这些东西。不要都讲是反革命。’稍后又指出，‘这些闹事不能够说主要是反革命，而主要是我们工作中的缺点，我们不会教育，我们不会领导。’”²

2月27日，毛泽东在《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的讲话中指出，要对青年学生加强思想政治工作，他说：“在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中间，最近一个时期，思想政治工作减弱了，出现了一些偏向。在一些人的眼中，好象什么政治，什么祖国的前途，人类理想，都没有关心的必要。好象马克思主义行时了一阵，现在就不那么行时了。针对这种情况，现在需要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没有灵魂。”³

3月8日，毛泽东《对〈中共中央关于处理罢工、罢课问题的指示〉（修正稿）的批语和修改》的注释说：“（修正稿）主要内容是：（一）在最近半年内，工人罢工、学生罢课、群众性游行、请愿和其他类似事件，比以前有了显著的增加，值得我们严重地注意。在社会主义社会，人民群众和他们的领导者之间是有矛盾的。但一般说来，这种矛盾属于人民内部非对抗性的矛盾。……用‘团结——批评——团结’的方式解决，不需要采取罢工、罢课，游行、请愿一类的方式。采取这种方式，一般是不符合人民利益的。因此，我们不但不提倡，而且应该力求防止这类事件。（二）为了防止罢工

¹ 转引薄一波著：《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回顾》下卷，第572-573页

² 薄一波著：《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第570页

³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85页

罢课类事件的发生，根本的办法就是随时注意调整社会主义社会内部关系中存在的问题，首先要克服官僚主义，扩大民主。……在学校方面，切实保障学生会、教职员工会、青年团和党的支委会能够充分地自由地对学校工作提意见。……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指出：“如果由于我们的工作做得不好，闹了事，那就应当把闹事的群众引向正确的道路，利用闹事来作为改善工作、教育干部和群众的一种特殊手段，解决平日所没有解决的问题。……对于闹事的带头人，除了那些违犯刑法的分子和现行反革命分子应当法办以外，不应当轻易开除。”¹

由上所述，关于学生闹事的态度，毛泽东的态度很明确，一般学生闹事作为人民内部矛盾问题来处理，尽量做好政治思想工作，说服教育工作，改善群众的物质生活条件，改进领导的工作作风和工作方法，反对用简单、粗暴、甚至用武力办法来解决矛盾。同时，向闹事的、想闹事的学生，特别是大学生提出警告，如果你们想搞大民主、想搞像“匈牙利事件”那样的大民主，对其中极少数人就必须实行专政。

工人闹罢工。关于工人闹罢工的材料，主要根据毛泽东的讲话、文稿注释以及老同志的回顾中的材料，现在摘录如下：

据薄一波回顾：“从1956年下半年起，我国一些地区接连出现了不安定的苗头。据不完全统计，从1956年9月到1957年3月半年时间内，全国发生数十起罢工、请愿事件，每起一般有十多人至数十人，多者有一二百人，甚至近千人，共约一万多人。”²

1956年11月15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谈到对大民主的态度时，他说：“现在再搞大民主，我也赞成。你们怕群众上街，我不怕，来他几十万也不怕。”“无产阶级发动的大民主是对付阶级敌人的……大民主也可以用来对付官僚主义者。”“如果脱离群众，不去解决群众的问题，农民就要打扁担，工人就要上街示威，学生就要闹事。凡是出了这类事。第一要说是好事，我就是这样看的。”接着又说：“学生上街，工人上街，凡是有那样的事情，同志们要看作好事……要允许工人罢工，允许群众示威。游行示威在宪法上是有根据的。以后修改宪法，我主张加一个罢工自由，要允许工人罢工，这样，有

¹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371-372页

²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第569页

利于解决国家、厂长同群众的矛盾。”¹

1957年1月，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中谈到对闹事的要学会一种领导艺术时，说：“要学会这么一种领导艺术，不要什么事情总是捂着。人家一发怪议论，一罢工，一请愿，你就把他一棍子打回去，总觉得这是世界上不应有之事。不应有之事为什么又有了呢？可见得是应有之事。你不许罢工，不许请愿，不许讲坏话，横直是压，压到一个时候就要变拉科西。党内、党外都是这样。各种怪议论，怪事，矛盾，以揭露为好。要揭露矛盾，解决矛盾。”²

2月27日，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中，分析工人学生闹事的原因时，他说：“一九五六年，在个别地方发生了少数工人学生罢工罢课事件。这些人闹事的直接原因，是有一些物质上的要求没有得到满足；而这些要求，有些是应当和可能解决的，有些是不适当的和要求过高，一时还不能解决的。但是发生闹事的更重要的因素，还是领导上的官僚主义。这种官僚主义的错误，有一些是要由上级机关负责，不能全怪下面。闹事的另一个原因是对于工人、学生缺乏思想政治教育。”对闹事的态度和应注意的事项，毛泽东说：“我们是不赞成闹事的，因为人民内部的矛盾可以用‘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去解决，而闹事总会要造成一些损失，不利于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应当注意的是：（一）为了从根本上消灭发生闹事的原因，必须坚决地克服官僚主义，很好地加强思想政治教育，恰当地处理各种矛盾。只有做到这一条，一般地就不会发生闹事问题。（二）如果由于我们的工作做得不好，闹了事，那就应当把闹事群众引向正确的道路，利用闹事来作为改善工作，教育干部和群众的一种特别手段，解决平日所没有解决的问题。”“对于闹事的带头人，除了那些违犯刑法的分子和现行反革命分子应当法办以外，不应当轻易开除。在我们这样大的国家里，有少数人闹事，并不值得大惊小怪，倒是足以帮助我们克服官僚主义。”³

以上可以看出，毛泽东是片面地吸取了“匈牙利事件”教训，只提出要反对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三大坏作风。

¹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24-325页

²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54页

³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95-396页

毛泽东、党中央非常注意工人闹事，并采取相应办法来处理这些事件，为此，1957年5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谈职工闹事》的社论。社论首先指出：“最近一个时期，在某些企业里，发生了一些职工请愿以至罢工之类的事件。这些事件虽然发生得极少，范围也很小，但是我们却应该加以重视，应该从中学习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正确方法。”“分析这类闹事的起因，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凡是闹事的地方，大都是官僚主义比较严重的地方；职工群众不能通过‘团结——批评——团结’的正常方法去解决问题的时候，才被迫走闹事这条路。职工闹事，大都是为了一些切身利益的问题，例如工资问题，工作安排问题、生活问题等等。”“这样那样的官僚主义错误，都是直接同群众的利益相冲突的。但是群众不满意领导上的官僚主义，并不是一下子就闹起来的，通常也还是先提意见，出墙报，写信上告，总之也还是希望通过‘团结——批评——团结’方法来解决的。”“但是遇到了官僚主义者，事情就不好办了。他们一听到反对自己的意见，就有一种‘条件反射’，总觉得提这种反对意见的人‘思想落后’，甚至存心不良，因而不愿意反躬自省，他们对于提意见的人不但不尊重、不感谢，而且采取种种方法加以打击。这样，就把用‘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解决问题的大门堵死了，群众就只好起来闹事了。”“很明显，禁止的办法是不正确的，因为禁止闹事并不能解决所以闹事的矛盾，反而会加剧这种矛盾。”“既然闹了事，就应该利用闹事来解决矛盾，来克服官僚主义，来教育领导者，来教育群众。”“既然群众闹了事，首先领导者总有错误。领导者除非故意要错误到底，否则必须勇敢地坦白地向群众承认自己的错误，并且提出认真改正错误，认真克服官僚主义的具体办法，这是解决问题的主要关键，当然，群众有错误，也应该指出来。事实证明，群众是讲道理的，对群众的错误，只要说得对，群众是愿意承认的。”

社论在分析如何克服官僚主义时指出：“克服官僚主义需要扩大企业中的民主管理，加强群众的监督。”“有了好的制度，也还需要好的工作作风：第一，要放下架子，到群众中去，和群众共甘苦，第二，要把工人群众看做自己人，第三，要谦虚谨慎，乐于听取反面意见。”“只要发扬民主，加强领导者与群众的联系，就可以克服官僚主义，有效地解决社会主义企业内部的矛盾。这样，职工群众的意见能够随时用‘团结——批评——团结’方法得到正确的解决，而不至由积压而爆发为闹事，职工群众的积极性就能够充

分发挥，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一定能够更迅速地发展。”¹

总之，国内出现社员闹退社、学生闹罢课、工人闹罢工等不安定因素，问题主要出自于领导干部的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这些领导干部一般都具有严重的“功臣”思想，以“解放者”、“救星”自居，认为你们农民、学生、工人在共产党领导下，各方面都比旧社会好多了，现在还不知足。在这样的思想支配下，领导干部对人民群众中出现的问题，往往熟视无睹，等问题出现了，往往不深入调查研究，了解情况，做细致的思想工作，动辄就训人、骂人、简单粗暴处理，甚至以各种名义抓人、捆人，采取对待敌人的办法来对待人民群众中闹事的社员、学生和工人。这样就会激化矛盾，混淆矛盾。毛泽东教导全党及其干部，要认真领会、理解、学习和执行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理论和方法，否则就要犯更大的错误。毛泽东还认为只要全体党员干部要认清形势，积极克服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学会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才能避免犯错误，才能保持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可是，闹事的原因，除三大坏作风外，还有深层次原因，不过毛泽东未能加以分析。其实，深层次原因在于：社会主义体制中存在某些弊端，抑制了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在于干部素质不高，又执行“左”的政策。只有进行各方面的改革才有可能缓解矛盾，克服和解决矛盾。

综上所述，毛泽东认为苏共二十大的召开，赫鲁晓夫揭发斯大林的错误是揭了盖子，破坏迷信，去掉压力，促使思想解放，让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本国实际相结合，探讨新的路子；但又捅了漏子，西方的敌对势力掀起了反苏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浪潮，诱发了波匈事件，对我国产生了极大影响。为此，我国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和讲话，反击敌对势力的攻击和诬蔑，同时批评某些兄弟党领导人的某些不正确的观点和言论，维护十月革命道路，对斯大林的功过进行评述，试图探讨分析斯大林犯错误、波匈事件出现的原因以及吸取什么样的教训等等。由于对时代看法的局限性和某些偏见，未能对上述错误和事件作出客观的、实事求是的总结，而是站在斯大林模式的立场上，认为斯大林犯错误的原因，只能是思想方法、工作作风问题，没能从制度上找原因（铁托提出过，毛泽东给予驳斥），认为匈牙利事件是帝国主义起了主要决定作用，匈牙利领导人犯错误也是思想方法、工作作风问题，认为他们没有抓好阶级斗争、无

¹ 《人民日报》1957年5月13日

产阶级专政才犯错误的，毛泽东认为国内出现不安定因素是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作风造成的。因此，毛泽东提出整风，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提出两类不同性质社会矛盾学说。实际上，斯大林的错误是斯大林专制独裁的结果，赫鲁晓夫揭露斯大林的错误是一个勇敢积极的行动，对苏联进行改革是要冒风险的。毛泽东害怕中国出现像赫鲁晓夫那样的人，所以对斯大林的功过评价限于三七开。对匈牙利事件的发生，应该说匈牙利人民对苏联大国沙文主义以及对匈牙利的斯大林，即对匈牙利拉科西的专制统治不满而诱发的。总之，苏共二十大具有民主自由倾向和改革开放措施也好，斯大林的错误也好，匈牙利事件也好，国内出现不安定因素也好，对中国领导人，对中国人民，对广大知识分子都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这些就成为整风、反右派斗争的国内外政治思想背景和由来。

第二节 毛泽东的两类矛盾学说

毛泽东在总结斯大林和东欧一些国家前领导人所犯的错误基础上，结合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从中吸取应有的教训，试图走出一条有别于斯大林模式的路子，从而提出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学说，这个问题集中在毛泽东《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的讲话和《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学说的提出，也有一个形成和发展过程。当时，宣传、贯彻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学说是全党全国的主要任务，通过内部传达和人民日报以社论的形式宣传讲话的精神和内容，为的是解除知识分子的顾虑，缓和知识分子的某些不满和为鸣放作准备；为的是全党干部学会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为的是让党政干部接受批评作准备。这两个“讲话”起到了发扬有限的民主，消除知识分子顾虑的启蒙作用，也是整风的理论武器。

一、两类矛盾学说的酝酿与形成

毛泽东从1956年4月以后，发表一系列讲话和文章，主要是《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论十大关系》、《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讲话》等，其中谈到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问题，同时也批评、纠正教条主义问题。

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思想，早在1948年9月中共中央政治

局会议上提出来了，即“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完成之后，中国内部的主要矛盾就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外部就是同帝国主义的矛盾，其次，内部还有民族矛盾”。“此外，在工农之间也有矛盾，但不是对抗性的矛盾。”对解决矛盾的办法也提出来了，“这可以在工农联盟内部通过供给机器，组织合作社，参加国家管理等予以解决。”¹这里孕育着人民内部矛盾的思想萌芽。

建国后，1950年4月23日毛泽东在《做一个完全的革命派》讲演中提出：解决敌我矛盾的方法和标准。他说：“人民民主专政有两个方法。对敌人来说是用专政的方法……强迫他们从事劳动并在劳动中改造他们成为新人。对人民说来则……是用民主的方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就是自我教育的基本方法”。“采用这种方法时所用的标准，主要是我们现时的根本大法即共同纲领。”²

1955年5月，毛泽东在《驳“舆论一律”》一文中明确提出人民内部和外部两个不同的范畴，说，“在内部，压制自由，压制人民对党和政府的错误和缺点的批评，压制学术界的自由讨论，是犯罪的行为，这是我们的制度。而这些在资本主义国家里，则是合法的行为。在外部，放纵反革命乱说乱动是犯罪的行为，而专政是合法的行为。这是我们的制度。”³可惜，提出者本人违反前者，将朋友、同志推向敌人，制造一起大冤案。所以说，从毛泽东的讲话、出版文集中来判断是非、正确与错误是存在难度的，只有实践检验才是惟一的标准。

1956年4月5日，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讨论，以人民日报编辑部的名义发表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的文章。表明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对苏共二十大、对斯大林、以及赫鲁晓夫《秘密报告》所持的立场。文中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着矛盾的观点。文章指出：“有一些天真烂漫的想法，仿佛认为社会主义社会中是不会再有矛盾存在了。否认矛盾存在，就是否认辩证法。各个社会的矛盾性质不同，解决矛盾的方式不同，但是社会的发展总是在不断的矛盾中进行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也是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中进行着的。”⁴由此看出，文章不指名批评了社会

¹ 《毛泽东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45—146页

²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8页

³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158页

⁴ 《人民日报》1956年4月5日

主义社会不存在矛盾的错误，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中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但没有说明是什么性质的矛盾。

4月25日，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讲话中提出了社会主义建设过程的十大矛盾，强调要正确处理这些矛盾。这十大矛盾就是十大关系：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党和非党的关系；革命和反革命的关系；是非关系；中国和外国关系。“这是十种关系，都是矛盾。世界是由矛盾组成的。没有矛盾就没有世界。我们的任务，是要正确处理这些矛盾。”¹这里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路子，批评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中存在的问题的同时，隐约地提出了如何正确处理两类矛盾的学说。

关于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毛泽东在12月4日在给黄炎培的回信中明确作了回答。他说：“社会总是充满着矛盾。即使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也是如此，不过矛盾的性质和阶级社会有所不同罢了。既有矛盾就要求揭露和解决。有两种揭露和解决的方法：一种是对敌我之间的，一种是对人民内部的。前者是用镇压的方法，后者是用说服的方法，即批评的方法。我们国家内部的阶级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了，所有人民应当团结起来。但是人民内部的问题仍将层出不穷，解决方法，就是从团结出发，经过批评和自我批评，达到团结这样一种方法。我很高兴地听到民建会这样开会法，我希望凡有问题的地方都用这种方法。”²在这里，毛泽东把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及其解决的方法提出来了。

12月9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经毛泽东审查和修改的《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这主要是针对南斯拉夫的。匈牙利事件后，为了回答和总结国际共运所出现的问题，又一次提出了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的问题。文章说：“在我们面前有两种性质不同的矛盾：第一种是敌我之间的矛盾。……这是根本的矛盾，它的基础是敌对阶级之间的利害冲突。第二种是人民内部的矛盾。……这是非根本的矛盾，它的发生不是由于阶级利益的根本冲突，而是由于正确意见和错误意见的矛盾，或者由于局部性质的利害矛盾。他的解决首先必须服

¹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88页

² 《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514-515页

从于对敌斗争的总的利益。人民内部的矛盾可以而且应该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者斗争获得解决，从而在新的条件下达到新的团结。”“在特定情况下，人民内部的某种矛盾，由于矛盾这一方逐步转到敌人方面，也可以逐步转化成为对抗性的矛盾。到了最后，这种矛盾也就完全变质，不再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范围，而成为敌我矛盾的一部分了。”这是毛泽东第一次公开表述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接着，毛泽东为辩护“斯大林的错误并不是由社会主义制度而来；为了纠正这些错误，当然不需要去‘纠正’社会主义制度”时，提出了“在基本制度适合需要的情况下，在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在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也仍然存在着一定的矛盾。这种矛盾表现成为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某些环节上的缺陷。”¹在这里毛泽东探索到了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某些环节上的缺陷，但毛泽东没有进一步分析犯错误的深层原因。

1957年1月，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如何处理两类矛盾是一门科学的命题，说：“怎样处理社会主义社会的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是一门科学，值得好好研究。就我国的情况来说，现在的阶级斗争，一部分是敌我矛盾，大量表现的是人民内部矛盾。当前的少数人闹事就反映了这种状况。”接着对如何处理闹事问题提出一些措施：“要加强我们的工作，改正我们的错误和缺点。加强什么工作呢？工、农、商、学、兵、政、党，都要加强政治思想工作。”“要精简机构”。“要到下面去研究问题”。“要密切联系群众。脱离群众，官僚主义，势必要挨打。”“中央的同志，各省市自治区、各部的主要负责同志，一年总要有一段时间到……基层单位去跑一跑，进行调查研究”，“做到心中有数。要依靠工人阶级，依靠贫下中农，依靠先进分子，总要有一个依靠。这样，才有可能避免出现匈牙利那样的事件。”²在这里，毛泽东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当作一门科学来研究，采取一些措施来缓解领导与被领导之间的矛盾，在当前是要避免中国出现类似的“匈牙利事件”。

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作了《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讲话（以下简称《讲话》），提出了十二个问题：第一，两类矛盾问题，第二，讲肃反问

¹ 《人民日报》1956年12月9日

²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57-358页

题，第三个问题是社会主义改造，第四关于资本主义改造，第五，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这个问题，第六，增产节约，反对铺张浪费，第七，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第八，讲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这个问题，第九，如何处理罢工、罢课、游行示威、请愿这些问题，第十，闹事出乱子是好事还是坏事，第十一，少数民族同汉族的关系问题，第十二，中国工业化的道路。这个讲话的内容非常丰富、全面。“讲话”的重点是批“左”防“左”，其中内容是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敌我矛盾用专政方法来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用民主方法即批评与自我批评方法来解决。毛泽东在这个共产党的高级干部和全国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的头面人物约1800人参加的会议上的讲话影响很大。现在将重点叙述一下：

首先，批“左”。第一，毛泽东在《讲话》中的重点是批“左”、防“左”。批评斯大林“在很长的时间内把这两类矛盾混淆起来了”。毛泽东举例说，“讲政府的坏话，不满意政府，不满意共产党，批评政府，批评共产党”。这里有敌人，有人民的批评，“斯大林在很长时期内，他是不加区别的。”“有一些在苏联作过很长时期工作的人给我说，那是不加区别的，只能讲好话，不能讲坏话；只能歌功颂德，不能批评。谁如果批评了，那么就怀疑你是敌人，就有坐班房的危险，就有杀头的危险。”接着批评苏联斯大林肃反有两面，“一面是真正反革命肃清了，……另一面杀错了许多人，重要的人，象共产党代表大会的代表，杀了百分之几十，中央委员杀了多少？第十七次党代表大会的代表抓起来跟杀掉的占百分之八十，而第十七次党代表大会上选出来的中央委员抓起来跟杀掉的占百分之五十。”又批评匈牙利说，“匈牙利对于反革命根本没有肃，杀了拉伊克，他倒是把革命分子杀了几个，而反革命就杀的很少，所以就出现了匈牙利事件。”批评拉科西的错误，“大概有这么几条，无非有官僚主义、教条主义、脱离群众，工业方面错误”。毛泽东结合我国肃反工作承认，“也曾经……把好人当坏人去整，把本来不是反革命，怀疑他是反革命去斗，有没有呢？有的，从前有，现在还有”。“八年来，有些斗错了，错了，我们就平反。”¹毛泽东接着说，“中共中央已经采取了步骤去纠正这些缺点。我们提议今年明年……来一次大的检查，全面来检查一次，总结经验。中央由人大常委跟政协常委主持，地方由省市人民委员会协同政协主

¹《毛泽东思想万岁》1949.10—1957卷，第150，151，169页

持，……由人大常委、政协常委主持，并且我们希望这些常委、人民代表、政协委员还可以参加。”“全面地检查一次，这对于我们的法制工作会有帮助的。”第二，批评斯大林的形而上学观点。毛泽东说：“斯大林在一个长的时期就是不承认社会主义社会有矛盾，但到他的晚年（他逝世于1953年）1952年的时候，他写了一本叫做《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书。在那本书里承认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是有矛盾的。两者处理得好，矛盾可以不发展为抗性矛盾，处理不好，那就发展为对抗，就发展为冲突，他已经看出来这一点了。”又批评《简明哲学辞典》，该书“是两个人写的，其中一个就是苏联大使尤金，这是在斯大林的影响下，在讲同一性的条件下，他有一个题目叫同一性，说了半天，驳了形式逻辑的同一性，根本没有分析清楚形式逻辑的同一性跟辩证法的同一性是不是一回事，然后就引用恩格斯说，恩格斯讲没有什么同一性，实际上什么都存在变化，客观实际上没有什么同一，然后他就来个形而上学，他说对立的東西相互排斥的对立物，不能说他有同一性，你比如说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这两个阶级在同一社会中，他们是没有同一性的，只有互相排斥，只有斗争。战争和和平没有同一性，生与死没有同一性。如果说这些东西有同一性就是错误的原理。斯大林死了以后，苏联哲学家，苏联在这个问题上开始有所变化。我看的東西不多，但是看到他们开始有变化。斯大林在哲学上有相当严重的形而上学的观点。所谓形而上学的观点，就是没有变化。”“但是斯大林在《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这本书上他说到社会主义存在矛盾的，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中间处理得不好，而且可能成为对抗的。这东西说得好，不过不彻底。我说他的辩证法是个含羞的辩证法，是个羞羞答答的辩证法，或者叫吞吞吐吐的辩证法。”毛泽东结合我国实际承认，“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矛盾，基本矛盾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政治法律、宗教、哲学这些意识形态）这些意识形态它是要为经济基础服务的。要符合于经济基础，如果不符合就发生矛盾。”第三，批斯大林的教条主义。毛泽东说，“所谓‘左派’是打括号的‘左’，不是真正的左，这些人过分强调敌我矛盾，比如斯大林就是这样的人”。¹毛泽东《在天津市党员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批评说，“斯大林，说他完全是教条主义者？也不能讲”，“但是他有教条主义，他这个教条主义影响中国，使得我们一个时

¹《毛泽东思想万岁》1949、10—1957卷，第149页

期革命就是失败，如果照他的办，后头的革命也办不成，现在我们就不在这里开会。”“而教条主义的来源就来自斯大林”，¹毛泽东结合中国实际批评中国的教条主义，他批评说：“教条主义是什么？教条主义是不是马克思主义？教条主义并不是马克思主义，教条主义也是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的东西。教条主义它的方法是形而上学的方法，片面性、孤立性，搞片面是不加分析的。”毛泽东具体批评了陈其通，马寒冰的文章，“社会主义国家很喜欢，”“教条主义就喜欢教条主义”，“教条主义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在另一次谈话中批评“马寒冰文章是教条的，钟惦棐则是右的，两派我们都要批评。”²毛泽东《和新闻出版界代表的谈话》中指出，“目前思想偏向有两种，一种是陈其通、马寒冰他们几个那一类的教条主义，一种是钟惦棐那一类的右倾机会主义”。“听说陈其通这人还好，马寒冰就很霸道”，“马寒冰的文章十分教条主义，我就看不下去，简直强迫受训”。“马寒冰他们几个人的文章，方针不对，方法也不对。他们的方针是反对党中央的方针，他们用的是压的方法，不能说服人。”《在天津市党员干部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说“陈其通、马寒冰，我说这些同志好心好意，忠心耿耿，追求正义，他们是保护党的。”“但是他们的方针同方法是错误的。”第四，评价共产国际，毛泽东指出，“我们要反对教条主义，中国革命也是这样。第三国际不灭亡，中国革命不会胜利。列宁在生的时候，第三国际是领导得好的。列宁死后，第三国际的领导是教条主义的领导，（领导人斯大林、布哈林就不大好），只有季米特洛夫那一段领导得好。季米特洛夫所作的报告，是很讲道理的。当然，第三国际也有功劳，就是帮助各国建设党，后来教条主义不顾各国的特点，一切照搬俄国，中国就吃了大亏”，“我们不要再搞国际了。情报局成立后，只做了一件事，就是批评了南斯拉夫。”³

以上引用大量毛泽东批评斯大林、党内教条主义的原文，为的是证明毛泽东吸取斯大林错误的教训，带头批评斯大林的教条主义、国内党内的教条主义。这对全党全国产生了巨大作用，成为以后整风运动的指导思想，提意见的榜样。

其次，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是“讲话”的中心内容。现摘

¹ 《毛泽东思想万岁》1949、10—1957卷，第190页

² 《毛泽东思想万岁》1949、10—1957卷，第158—159，172页

³ 《毛泽东思想万岁》1949、10—1957卷第179、180、182、189页

录一部分如下：

第一，谈到两类矛盾的性质问题，他说：“这两类问题性质不同，解决的方法也不同。过去我们都谈过的，叫做两个口号：分清敌我，分清是非，要分清敌我，多年来我们谈这个问题。要分清敌我，什么是敌人，什么是自己。要分清是非，这是讲人民内部的啦，人民内部的问题是是非问题，不是敌我问题，那么敌我是不是也是是非问题？也是是非问题。比如我们跟蒋介石，跟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究竟谁是谁非也是是非问题。但是，是性质不同的一类是非问题。我们普通说，就叫做敌我问题（我们普通说的习惯说法，两个比较更清楚）。这一类就是对抗性的矛盾，敌我矛盾。人民内部的矛盾就是非对抗性的矛盾。”“解决敌我之间的这个矛盾，就是压服别人，这里不完全是什么镇压了，比如讲不给选举权，比如讲他们不能自由出版报纸。敌对阶级，比如我们对地主阶级、帝国主义分子不能在我们这里出版报纸，台湾不能在我们这里出版报纸、地主阶级不让它出版报纸，剥夺他们这些言论自由，剥夺他们选举权，都属于这个范围之内。要行使专政，也要用民主集中制。谁人去行使专政呢？就是要人民啦。阶级专政，就是阶级对阶级的专政。你要去管制他，要去杀他，你要去捉他，当然要经过人民政府，要经过人民去作。现在我们讲民主集中制，这个制度只适用于人民内部范围的。只要不是敌人，那就是人民，在这个范围之内，就不是专政的问题，不是谁向谁专政的问题。人民自己不向自己专政，因为这些人有言论自由，集会自由，有结社自由，有游行示威自由，这些是宪法上写了的。这是民主的问题。”¹

第二，用大民主，小民主来解决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他说：“大民主，小民主。匈牙利事件、波兰事件出来，有些人很高兴；来一下大民主嘛，他们所谓大民主，几十万人到街上去，似乎高兴这个事件。这是少数人所谓的大民主。刚才说了，专政就是要人民去专政，要用阶级去专政，阶级对阶级的专政，自古以来的历史上，所谓大民主，群众的民主运动，都是对付敌对阶级的。我们有些党外的朋友，当然是少数人，他们也搞不清这个；另外有少数人，他是带着敌对情绪，他希望用大民主把人民政府怎么样整一下，那也有的。‘哪一天学波兰一样，学匈牙利一样，把共产党整一下，我就开心了。这个共产党实在使我们混不下去，专制的太厉害了。’

¹《毛泽东思想万岁》1949、10—1957卷，第147页

有一个大学生他发表声明，他要杀很多人，要杀几百人。几百人少了，要杀几千、几万、几百万、几千万。那当然，这也是有些过甚其词，真要他杀，也不会杀这么多吧！但是表示了他的一种心理状态。另外也有一些人是属于幼稚的，不懂得世界上的具体情况，以为欧洲的民主自由很好，以为我们这个也太少了。他喜欢议会民主，说人民代表大会跟西方议会民主比，要差。主张两党制，主张外国样的两党制，这一党在上，那一党在下，然后反过来。要有两个通讯社，唱对台戏。有人提出：早一点取消专政。有人说民主是目的。我们跟他们说，民主是手段。民主也可以说又是目的，又是手段。但是归根结底，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告诉我们说，归根结底，人类这上层建筑（民主是属于哪个范围呢？属于上层建筑，属于政治这个范畴），它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那么一说民主是手段，不是目的，那么就觉得不是那么舒服，一定要讲民主是目的就高兴一点。”“思想问题，人民内部的问题，不能够用粗暴的方法来解决。用粗暴的方法来解决思想问题，来解决精神世界的问题，解决人民内部的问题，这样一些思想是错误的。企图以行政命令的方法，压制的方法来解决思想问题，这样的方法是无效力的，是有害的。你比如宗教，不能以行政命令来消灭宗教，不能强制人家不信教，唯心主义也不能强制人家不相信。凡属思想方面的问题，应用讨论的办法、辩论的办法、批评的办法、教育的办法、说服的办法，使人家相信你。”¹

第三，提出民族资产阶级属于什么矛盾性质。他说：“民族资产阶级应该放在哪一类，放在第一类，还是放在第二类矛盾？我们中国这个问题，《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也没有谈到。但是大家知道，民族资产阶级是不放在第一类，不放在敌我矛盾哪一类的，是放在人民内部矛盾这一类的。因为民族资产阶级有两面性，民族资产阶级他愿意接受宪法，愿意接受社会主义改造，愿意走向社会主义。因为这样的理由，民族资产阶级跟帝国主义不同，跟官僚资本主义不同，跟封建主义不同。有这样的不同，民族资产阶级愿意接受社会主义改造。工人阶级跟资产阶级就是说跟民族资产阶级嘛，是一个对抗性的两个阶级，是对抗性的，两个阶级是对抗的，对抗性的矛盾如果处理得当，可以转变为不对抗，可以转变为非对抗性矛盾，由第一类矛盾转变为第二类矛盾；如果我们处理不当，

¹ 《毛泽东思想万岁》1949.10—1957卷，第148页

不是采取争取、团结、帮助、教育这样的方针，势必走向对抗。我们要把他放在第一类，那么就变成敌人了。不按这个实际情况办事，在中国这样的国家，民族资产阶级，是有反帝国主义思想的民族资产阶级。刚才提出这个问题，就是对人民内部的矛盾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如何处理，这个问题是一个新问题。我们在肃反工作中，也曾经并且常常容易把好人当坏人去整，把本来不是反革命，怀疑他是反革命，有没有呢？有的，从前有，现在还有。问题是，我们就是有一条了，分清敌我。八年来，有些斗争斗错了，错了，我们就平反。并且机关学校，在延安时期就有规定，机关、学校、部队、企业，人民团体的反革命，真正的反革命也不杀，小反革命不杀，大反革命也不杀，实际上执行这一条，虽然法律上不规定这一条。因为法律上有例外的，少数例外还是难说的。但是我们实际上不杀的，一个不杀。有了这一条，就保证万一错了的时候，有挽回的余地。容易混淆还表现在两派，左派，右派。由右倾思想的人，他们不分敌我，认敌为我。不分敌我，这样的人还有，我们现在这还有。在我们看来，在广大群众看来是敌人，在有些人看来那是朋友。”¹

第四，提出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方针，提出团结、批评、团结的口号，他说：“‘左’派，‘左’倾机会主义者。所谓‘左派’是打括号的‘左’，不是真正的左，这些人过分强调敌我矛盾，强调敌我矛盾过分。比如斯大林就是那样的人，我们也有这样的人，强调过分，有把这第二类矛盾，本来是人民内部的矛盾误认为第一类，误认为敌我。这是肃反中屡次出现。我已经说过，这是‘左’的。在延安时期，1942年我们提出过这样的口号，叫做团结、批评、团结，用这样的一条方针来解决人民内部矛盾。我们找出这么一个公式。讲详细一点，就叫做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者斗争，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后来的时候，我们为了解决党内的矛盾，共产党内部的矛盾，就是教条主义与广大党员群众之间的矛盾，教条主义同马克思主义之间的矛盾。鉴于以前所采纳的方针，这个方针是从西天取经取来的。那个‘西天’就是斯大林，就叫做‘残酷斗争，无情打击’。鉴于那个不妥，后来我们批评教条主义的时候，就不采用‘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办法，改用另外一种办法，另外一个方针，就是团结他们，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

¹ 《毛泽东思想万岁》1949.10—1957卷，第148—149页

批评或斗争，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这个方针，好像是1942年整风提出的，经过几年，到1945年，共产党开第七次代表大会的时候，达到了团结的目的，中间经过批评。为什么要有第一个团结，要有团结的愿望呢？如果没有第一个团结没有团结的愿望，一斗，势必把事情斗垮斗乱了，一斗就不可收拾。那还不是‘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吗？因为你就没有想，主观上没有想，没有准备去团结他们，所以要有第一个团结。经过批评、斗争，最后达到团结的结果。有这么一个过程，表明从这个过程里我们找到了一个公式：团结——批评——团结。后来推广到党外，逐步推广到北京。我们劝过民主党派也采用批评的办法，不是你死我活，——‘要么就是你，要么就是我’后来果然也就明白了，后来民主党派也明白了，工商界也明白了。”“犯错误的人，有各种小资产阶级思想的人，资产阶级思想的人，有唯心论的人，有形而上学思想的人，宗教界都可以用这个方法，来推广这种方法，发展到整个人民内部，学校、工厂、合作社、商店都可用这个方法。”¹

随后，2月28日整天和3月1日上午，出席最高国务会议扩大会议的全体人员分组讨论毛泽东的讲话。3月1日下午，大会发言。发言的有李济深、章伯钧、马叙伦、陈嘉庚、陈叔通、郭沫若、程潜、马寅初、许德珩、达浦生、刘文辉、车向忱、盛丕华、孙蔚如、黄琪翔等16人。会议结束时，毛泽东作了45分钟的总结讲话。有的是对27日讲话的补充，有的是对讨论中提出的问题的答复。

讨论中有人提出，马克思主义能不能批评？毛泽东回答：马克思主义是不怕批评的，马克思主义如果能够批评倒，能够证明马克思主义不是真理，那末这个东西就不行了。所以，不存在马克思主义可不可以批评的问题。

有人问：老干部可不可以批评？毛泽东说：老干部如果批评倒了，那就是该批评的。怕批评，总是有弱点就是了。我看老干部、新干部都有弱点，弱点方面都应该批评，并且要成为一种习惯。人民范围之内的事，人民是有批评的权利的。我们只是不把这个权利给反革命。批评对了当然很好，批评不对也没有事，这就是言者无罪。

有人提出，2月27日的讲话，对“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讲得不够。毛泽东说：这讲得对，这也是一种批评。前天没大讲这个问

¹ 《毛泽东思想万岁》1949.10—1957卷第149—150页

题。什么叫“长期”？就是共产党的寿命有多长，民主党派的使用寿命就有多长。如何监督？就是属于批评、建议。主要的方法就是批评，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达到团结，把工作改善。

毛泽东又讲到小民主和大民主的问题，他说：现在工作方法已经改了，是小民主。但有些地方不实行小民主，任何民主都没有，横直是官僚主义。这样逼出一个大民主来了，于是乎罢工、罢课。我们不提倡罢工、罢课，提倡在人民范围之内的问题使用批评的方法来解决。如果个别地方官僚主义十分严重，在这样一种范围内允许罢工、罢课。我们把罢工、罢课、游行、示威、请愿等看做是克服人民内部矛盾，调整社会秩序的一种补充方法。

他还谈到扩大《参考消息》的发行范围，准备从过去的2000份扩大到30万份，并且还赞成出蒋介石全集。他说：要见世面，要经风雨，不要藏在暖室里头，暖室里头长大的东西是不牢固的。

讨论中，有人提出了单纯技术观点抬头的问题。毛泽东说：技术观点是好的，就是要发展科学技术，要有科学技术观点，要发展到大家都热心。但是，不要搞单纯技术观点。希望我们的同志们关心新的政治，关心新的大局。我们有些所谓的思想工作、政治工作、教育工作使人不能接受，无非是一种教条主义的，没有说服力，引不起他们的兴趣。所以，应该改善我们这个政治工作。¹

以上讲的是两类不同性质矛盾、解决不同性质矛盾的方法，特别提出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方针、口号，这为以后的整风运动提供理论武器。

3月12日毛泽东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进一步深化和丰富了《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讲话》这个主题，也是整风运动的理论武器。现将要点摘录如下：

第一问题是我们现在处在一个什么时期。他认为：我们现在是处在一个社会大变动的时期。中国社会很久以来就处在大变动中间了。现在这个变动比过去的变动深刻得多，宽广得多。这样大的变动反映到了我们的思想上来、反映到了我们的意识上来。全国各个阶级的相互关系都发生了变化。小资产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在起变化，个体变为集体，私有变为公有。所以，各种不同意识在思想上有所反映，这种情况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第二个问题是知识分子。毛泽东对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以后知识

¹ 引自《党的文献》，2002年第4期，第23页

分子的状况作了一个估计。他说：我国知识分子大约有 500 万左右。其中有少数人对于社会主义制度不那么欢迎，不那么高兴，甚至抱有敌对的情绪，认为社会主义没有优越性，社会主义活不长，会失败。或者有那么一些人，希望社会主义总有一天要恢复到资本主义。这种人是很少数的，有百分之一、二或者更少一点。除此之外，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是爱国主义者，拥护社会主义。但是也有许多人对于社会主义制度之下如何工作，许多新问题如何解决，如何答复，不大清楚。拿对待马克思主义来说，大概有百分之十左右的知识分子，比较熟悉马克思主义，赞成和拥护马克思主义，他们是少数；多数人是想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并且也学了一点，就是不那么熟悉，有些人还有些怀疑。拿爱国主义这个标准来说就不同了。许多人不赞成马克思主义，不赞成社会主义，但是在外人面前他就表现为爱国主义者。不能强迫人家接受马克思主义，只能说服人家接受。

第三个问题，关于教育者首先要受教育（这个题目后来改为“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他说：我们的国家是一个文化不发达的国家，我们都是教育人民的人。不论办学校的，科学家，新闻记者，文学家，艺术家，都是人民的先生。这 500 万知识分子是我们国家的财产。我们没有这 500 万知识分子，就一样事情也做不好。国家只存在三部分人，就是：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知识分子的性质就是为工人、农民服务的。他们是脑力劳动的工人，是用脑子的工人。正因为他们是教育人民的，是人民的教员，因此他就有个任务，就是应该先受教育，尤其是在社会大变革的时期，知识分子是旧社会留给我们的遗产。这几百万知识分子要先接受教育。不是已经改造好了，不需要改造了。我看还要改造。大多数人是愿意学习的。要在他自己愿意的基础上，有别人的好心帮助，而不是强制地学习。

第四个问题是关于整风。他说共产党正准备整风。中央作出决定，准备今年就开始，先搞试验，明年比较普遍地进行。党外人士自愿参加。整风的目的，就是要批评几个东西：一个叫主观主义，主要的教条主义；第二是宗派主义；还有一个是官僚主义。现在的情况是官僚主义相当严重。在整风中间，要把马克思主义学习推进一步。马克思主义是一定要发展的，它不能停止的。停止了，老是那么一点，就没有生命力了。基本原则是不能违背的，违背基本原则就是修正主义。停止不前就变成教条主义。

第五个问题是关于为人民服务。毛泽东说：最近，有几个同志到农村去蹲了几个月，很有益处。走马看花是一种方法。还有一种

是下马看花。我们的作家、艺术家应该不应该去呢？我看是应该去的。科学技术人员都跑下去，那当然不要。在三个五年计划之内，要逐步地争取这些知识分子去跟生产者直接接触。现在有许多人下去跑一跑，说是体验生活。结果有些人有成绩，有些人就没有成绩。要看采取什么态度，这就跟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有关系。如果看了一点马克思主义的书，又在同工人、农民的接触中，在自己的工作中有所了解，那么我们很多人就有了共同的语言，不仅有爱国主义、社会主义制度这样一个共同语言，而且有马克思主义世界观这个方面的共同语言。

第六个问题，关于片面性问题。毛泽东认为，百家争鸣，其实只有两家，无产阶级一家，资产阶级一家，马克思主义里面也有几家，修正主义算一家，教条主义是一家。教条主义和机会主义（或者叫修正主义）肯定一切或者否定一切。教条主义是把马克思主义片面化，把马克思主义用形而上学来解释，对于自己的工作就是肯定一切，只能讲好，不能讲坏，只能赞扬，不批评。肯定一切，否定一切，都是形而上学，都要批评。但是，要以治病救人的态度去批评。我们要逐步地使用辩证法这个方法，就是对事物有分析，写文章有说服力，讲点道理，不靠摆官僚架子压服别人。当着自己写文章的时候，就要把自己作过多少年的官，现在是处长，是局长，还是部长，把这些东西丢到九霄云外，跟任何人平等。

第七个问题：“放”还是“收”？他说：这是个方针问题。中央的意见是不赞成“收”，而是要“放”。会不会乱？会不会变成匈牙利事件？变不了的。有两种领导中国的办法，就是“放”或者“收”。要是搞得一点民主也没有，官僚主义十足，大民主不许可，小民主也没有，甚至于小小民主都没有，横直是不能解决问题，那就要逼上梁山。我看在那种情况下，罢工、罢课是一种解决问题的手段，是调节社会生活的一种方法。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样的方针有利于我们国家的巩固。现在是放得不够，不是放得有余。不要怕放，不要怕批评，不要怕乱，不要怕牛鬼蛇神，也不要怕毒草。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只会发展真理，发展艺术，使我们少犯错误。这是发展的辩证法。我们希望用这样的方针团结几百万知识分子，团结几亿人民，改变现在这种面貌。那么，首先就要共产党改变态度，改变官僚主义态度，改变教条主义态度，改变宗派主义态度。

第八个问题是对各地党委的要求。毛泽东提出：希望各地也学

这次宣传会议，召开这样一个会议，请党外人士参加，把思想问题抓起来。他要求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抓思想问题，把这个问题提到议事日程上来，要研究。

毛泽东回答几个问题。共产党是否能够领导科学？有人说，共产党能够领导阶级斗争，搞政治这一套可以，但是搞科学不行。我说，这种说法讲对了一半。在现在这个时期，我看是能领导又不能领导。在自然科学的这门学科、那门学科的具体内容上不懂，没有法子领导。在这一点上，他们说对。但只有一半对，共产党领导阶级斗争，也就能领导向自然界作斗争。如果有这样一个党，叫共产党，它就只能作社会斗争，要率领整个社会向自然界作斗争就不行了，那么这样一个党就应该灭亡。共产党过去忙于阶级斗争，一直到现在，阶级斗争基本完结了，但还没有完全完结，许多政治问题要它来处理。中国共产党是领导阶级斗争胜利的党，现在的任务是要向自然界作斗争，就是要搞建设，搞建设就需要科学，要学会这个东西。

人民内部的斗争为主，还是阶级斗争为主？有好些同志提出这个问题，一定要讲个为主。似乎那个意思是，讲阶级斗争为主恐怕好一点，舒服一点。而我恰好换了个位：我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讲的就是这个题目，叫做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的斗争。这里面包括一部分阶级斗争，比如我们把民族资产阶级放在人民内部来处理。人民内部斗争现在很突出。八大作了结论的，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已经完结了，现在突出的是人民内部的斗争。小资产阶级思想，这是人民内部的问题。中国资产阶级的的问题，我们当作人民内部的问题处理。应该作具体分析，不要不适当地扣大帽子，似乎要扣一顶帽子就好办事了。¹

参加宣传工作会议的党外人士对宣传工作会议上讲话产生反响，著名作家和翻译家傅雷，在写给正在波兰留学的儿子傅聪的信里，十分动情地谈了他的感想：毛主席的讲话，那种口吻，音调，特别亲切平易，极富于幽默感；而且没有教训口气，速度恰当，间以适当的 pause（停顿），笔记无法传达。他的马克思主义是到了化境的，随手拈来，都成妙谛，出之以极自然的态度，无形中渗透听众的心。讲话的逻辑都是隐而不露，真是艺术高手。沪上文艺界半年来有些苦闷，地方领导抓得紧，仿佛一批评机关缺点，便会惊动

¹ 参见《党的文献》2002年第5期，第33-36页

群众；报纸上越来越强调“肯定”，老谈一套“成绩是主要的，缺点是次要的”等等（这话不错，可是老挂在嘴上，就成了八股）。毛主席大概早已嗅到这股味儿，所以从1月18日至27日就在全国家省市委书记大会上提到百家争鸣问题，2月底的最高国务会议更明确地提出，这次3月12日对我们的讲话，更为具体，可见他的思考也在逐渐往深处发展。他再三说人民内部矛盾如何处理对党也是一个新问题，需要与党外人士共同研究；党内党外合在一起谈，有好处；今后三五年内，每年要举行一次。他又嘱咐各省市市委也要召集党外人士共同商量党内的事。他的胸襟博大，思想自由，当然国家大事掌握得好了。毛主席是真正把古今中外的哲理融会贯通了的人。¹

毛泽东《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同《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讲话》一样，是一次很开明，开放自由的讲话，这就更有利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创造宽松、和谐民主的环境，让知识分子打消顾虑，敢于畅所欲言，为整风运动作出了思想舆论的准备。

可是，这篇讲话公开发表时，比原始讲话增添一些“左”的观点，（1）原讲话中说，希望恢复资本主义的知识分子，估计“有百分之一、二，或者更少一点。”公开发表讲话稿为“一些极端反动的人，这种人在五百万左右的人数中间，大约占百分之一、二、三”。在这里明显地夸大了百分比。（2）原始稿中说知识分子是“脑力劳动的工人，是用脑子的工人”。这样对知识分子定性，与1956年周恩来代表党中央在全国知识分子工作会议上讲话中说的“知识分子是劳动人民的一部分，或知识分子绝大多数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相类似。发表讲话稿说，知识分子的“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他们还是属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个论断比原始讲话稿倒退了一大步，这也成了后来知识分子受苦受难的根源。（3）原始稿中只讲批教条主义，“首先就要共产党改变态度，改变官僚主义态度，改变教条主义态度，改变宗派主义态度”。没有记录批修正主义的任务。发表稿说，“长时间以来，人们对于教条主义作过很多批判”。“人们往往忽略了对修正主义的批判”，“在现在的情况下，修正主义比教条主义更有害的东西。”因此，“我们现在思想战线上的一个很重要任务，就是要开展对于修正主义的批判。”²这个公开发

¹ 参见《党的文献》2002年第5期，第33—36页

² 均见《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69—282页

表的讲话是1964年发表的，那时毛泽东的思想及支持者已经“左”得很了，如果当时知识分子听了这样“左”的讲话那才不会去鸣去放去帮助整风呢！笔者希望还毛泽东著作以本来面目，更实在的、更客观地研究毛泽东思想。

二、宣传《讲话》精神

毛泽东在1957年2、3、4月份，先后在许多重要会议上发表的讲话，是当时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引起党内高干和党内外知识分子的强烈反响，因此，毛泽东亲自了解、调研和宣传讲话精神，主要是让党内高干理解、接受和贯彻，让党内外知识分子打消顾虑发表意见，以便使党内外干部和知识分子接受毛泽东的观点共同处理各种矛盾，同时也起到了从思想上发动整风的作用。

毛泽东3月17日在天津市党员干部会议上的讲话：“讲‘双百方针’吧，这是全党关心的问题。党内有赞成的，有不舒服的，有怀疑的”。接着他说：过去几十年，从有我们这个党以来，一直到去年上半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我们党的精力主要是放在阶级斗争上。现在阶级斗争这件工作基本上结束。所谓基本上结束，就不是完全结束。大规模的、群众性的阶级斗争基本上结束，党的八大上说了。我们全党要来搞建设，要学科学，要学会在大学里头当教授，在科学研究机关里头做实验、研究科学。要学会当工程师，当技术人员，当医生。要率领整个社会跟自然界作斗争，要把中国的面貌加以改变。为了改变中国的政治面貌，我们花了几十年时间。要大体改变经济面貌，也要有几十年时间。我们过去不会作阶级斗争，经过许多失败，经过许多变化，我们学会了，善于作阶级斗争了。现在我们搞建设也要几十年，是不是可以比我们在学习阶级斗争时所付的代价少一点？如果我们不重复从前的错误，那末，我们在建设的时候就可以付比较少的代价，可以避免匈牙利事件那样的事情。因为阶级斗争基本结束而显露出来的各种东西，各种不满意，许多议论，我们应该采取什么方针？我们应该采取“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在讨论中，在辩论中去解决。只有这个方法，别的方法都不妥。而现在党内有一种情绪，就是继续过去那种简单的方法，你不听话，就‘军法从事’。那是对付敌人的，那个办法不行了。凡是科学方面的问题，思想方面的问题，精神方面的问题，都不能用粗暴的方法。有两个方法，一个叫压服，一个叫说服。是采用压服的方法，还是采取说服的方法？现在我们有一些同志等不及了，大有要压一下的想法。压是压不服的人的，只会使我们处于不

利的地位。如果用压服的办法，我们就没有理，就站不住脚，我们就输了。我们要学会说理，学会写说理的文章，学会作说理的报告，曾经有个同志跟我讲：搞那么多道理，老子就搞不惯。老子就是一冲。我说你一冲呀，不能解决问题。要加以分析，要研究，写出有说服力的文章才行。至于各种错误的意见在报纸上、刊物上发表，开座谈会评论，会不会把我们的天下搞乱，把人民政府搞倒，我说完全不会。因为他们不是反革命，不是特务，他们中的大多数愿意跟我们合作，只有极少数是敌视我们的。如采取压服的方法，不让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那就会使我们的民族不活泼，简单化，不讲道理，使我们的党不去研究说理，不去学会说理。马克思主义要跟非马克思主义作斗争才能发展起来，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之所以需要，就是这个道理。”¹毛泽东的天津讲话，进一步阐述了“双百”方针，不仅把它当作发展科学和文艺的基本方针，而且也当作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基本方针。

3月18日在济南，毛泽东向省级机关处以上党员干部专讲思想问题。他说：“去年下半年以来，我们党里头，社会上，人们的思想有一些乱，比如批评共产党的人多了，党外人士敢于讲话了，敢于讲我们党的缺点了。有人说共产党能不能领导科学？对社会主义有没有优越性也发生怀疑了。有一些知识分子讲，美国比中国好，比苏联好。去年这一年，报纸上，小品文、讽刺文章多起来了，批评缺点、冷嘲热讽多起来了。在这种情况下，有些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就跟着资产阶级走，否定一切，不加分析，把情况看得比较坏。另外一些共产党员就不服气，说都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两条闹出来的。所以，我们党里头有两种人。一种人，外面讲什么，他们也跟着讲；另一种人就想收，谁不听话的时候就压一下子。这是现在的情况。”

“毛泽东分析了产生这种情况的国际国内原因。他说：外国的事情对我们有影响，比如苏共二十大把斯大林批评了，后头发生波兰、匈牙利的事件，国际上有反苏反共的风潮。还有我们工作中的错误，无论是肃反，土改，合作化，社会主义改造的工作中间，我们有主观主义的错误，有官僚主义的错误，也有宗派主义的错误。这些引起一些人的思想混乱。有外国的影响，但主要还是我们国内的原因。我们现在处在这么一个时代，就是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基本

¹引自《党的文献》2002年第5期第36-37页

上结束，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第八次代表大会作了结论的，这个结论是合乎情况的。我们过去反对蒋介石，解放战争，是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土改，镇压反革命，抗美援朝，是大规模的阶级斗争；社会主义改造，也是阶级斗争。这么一场大斗争到去年上半年基本上结束了，人民内部的问题就显出来了。基本的原因是这个原因。人民内部的问题多起来了，就暴露出来许多思想问题，就有一些乱了。过去是不是有思想问题呢？过去有的，实际上我们刚进城那几年更乱一些。但是，那些不同的意见，那些意见分歧，被大规模的阶级斗争所掩盖了。”

“在这里，毛泽东特地对什么叫‘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基本结束’作了一个解释：所谓基本结束，就是说还有阶级斗争，特别是表现在意识形态这一方面。只说基本结束，不说全部结束。这一点要讲清楚，不要误会。这个尾巴要吊很长时间。特别是意识形态这一方面的阶级斗争，就是无产阶级思想跟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所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这样一个问题，就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不是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刚才讲有阶级斗争，特别是表现在意识形态方面的，我们是把它当作内部矛盾来处理的。阶级斗争基本结束，我们的任务转到什么地方？就要转到搞建设，率领整个社会，率领六亿人口，同自然界作斗争，要把中国兴盛起来，变成一个工业国。

关于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种制度的斗争谁胜谁负的问题，他说：这个问题解决了没有呢？按照八次大会所说的，基本上分了胜负的，就是资本主义失败了，社会主义基本上胜利了。是不是最后胜利了呢？那还没有。最后胜利还要有一个时期，大概要三个五年计划。至于两种思想的斗争，资产阶级思想同无产阶级思想，马克思主义同非马克思主义的斗争，意识形态方面的谁胜谁负，那就要更长一点了。我今天讲的总题目叫做思想问题，这是有理由的。尽管社会制度起了变化，但是那个思想还相当顽固的保存着。特别是世界观这方面，是资产阶级世界观，还是无产阶级世界观；是唯心论，还是唯物论；是形而上学的唯物论或者是形而上学的唯心论，还是辩证唯物主义。这样两种思想方面的斗争，时间还要更长一些。

毛泽东在分析知识分子问题的时候说，在我们这个国家，知识分子是相当值钱的，我们一天也离不开他们，所以我们要争取他们，在世界观这个问题上，要使他们变成无产阶级知识分子。这大约需要经过三个五年计划的时间，到那个时候，马克思主义就可以取得

决定性胜利。最后，谈到整风。他说：我们党现在准备整风。我们要争取知识分子，要争取党外人士，先要做一件事情，就是先把自己的作风整顿一下。今年准备，明年一年，后年一年，下点毛毛雨，吹点微微风，把我们的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这些东西吹掉。我们是从保护同志出发，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适当的批评，达到新的团结。”¹

3月19日在南京，毛泽东向江苏、安徽及南京军区的党员干部会议上讲话，说：“我变成了一个游说先生，一路到处讲一点话。他讲的第一个问题，是关于当前阶段的基本特点。他说：现在我们处在一个转变的时期，就是过去的阶级斗争基本上结束了。这是我们几十年斗争的结果。拿共产党的历史来说，有三十几年；从鸦片战争反帝国主义算起，有100多年。我们仅仅做了一件事，就是搞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改变上层建筑和社会经济制度，这仅仅是为建设、为发展生产，为由农业国到工业国开辟道路，为人民生活的提高开辟道路。所以，现在是处在这么一个变革的时期：由阶级斗争到向自然界作斗争，由革命到建设，由过去我们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和后头的社会主义革命到技术革命，到文化革命。我们国家要建设，就要有技术，就要懂得科学，这是一个很大的革命。没有这样一个革命，单是政治改变了，社会制度改变了，我们国家还是一个穷国，还是一个农业国，还是一个手工业、手工技术的国家。为了这个，我们就要进行一个文化革命。现在似乎还有一些人不认识这么一种变化。

他说：有些人讲，到了社会主义，大概是要过好生活了。这就是不懂什么叫社会主义。现在，我们建立了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这种新的生产关系刚刚建立，还没有完全建立好。至于用主要力量搞生产，我们才刚刚开始。没有生产就没有生活，没有多的生产就没有好的生活。把我们的国家建设好要多少年呢？我看大概要100年吧。要分几步走：大概有十几年会稍微好一点；有个二三十年就更好一点；有个50年可以勉强像个样子；有100年那就了不起，就和现在大不相同了。要100年，我就不在这个世界上，就不能享福了。要进行艰苦奋斗、白手起家的教育。我们现在是白手起家，祖宗给我们的很少。让我们跟全国人民一道，跟国家一道，跟青年们一道，干他个几十年，这个世纪，上半个世纪搞革命，下半个世

¹ 引自《党的文献》2002年第5期，第38-39页

纪搞建设。现在的中心任务是建设。这是毛泽东对中国从 20 世纪到 21 世纪上半叶历史进程的一个总体描绘和宏伟构想。

他讲的第二个问题，是关于人民闹事如何处理。他说：对人民闹事，要采取完全新的方法。对犯了法的人，应该按照法律程序处理。其他的人，应该说服教育，不要开除。你这里开除，是以邻为壑。许多同志对于人民跟我们闹事没有精神准备。因为过去我们跟人民一道反对敌人，现在敌人不在了，看不见敌人了，就剩下我们跟人民，他有事情，不向你闹，向谁去闹呢？对于人民闹事，有主张用老办法对付的，就有几个地方叫警察抓人。我说，学生罢课叫警察抓人，这是国民党的办法。也有束手无策的，完全是没有办法。不怕帝国主义，不怕蒋介石，就是怕老百姓。过去那一套，他是好手。要讲对付人民闹事，他没有学好，这一课没有上过。要跟党内党外公开地提出这个问题，展开讨论，办法就出来了。

关于处理敌我矛盾问题，毛泽东说：现在存在的两种观点都不妥当。一种是右的观点，认为世界上太平无事了，对于一些应该依法处理的反动分子和坏人不依法处理。这方面，现在各省都有发生，应该注意。另一种是夸大的观点，‘左’的观点，说现在还有很多反革命。现在还有暗藏的反革命，这一点要肯定。但是过去肃反根本上是正确的，我们中国不会出匈牙利那样的事情，其中有一条原因，就是我们肃清了反革命。

第三个问题，是关于统筹兼顾，适当安排，加强思想教育的方针。毛泽东称这是一个战略方针。他在这里讲的“统筹兼顾，适当安排”，主要是指对于全国 6 亿人口和 500 万知识分子中处于左、中、右状态和各类人如何对待的问题，并且着重讲了对待知识分子的政策问题。他说：我们的任务，就是争取百分之七十到八十的动摇的中间派。他们一般的赞成社会主义制度，但是对于马克思主义作为世界观，还没有完全接受。我（毛泽东——引者）说，他们不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而是半心半意为人民服务。他有半条心想为人民服务，这是好的，但是还有半条心不晓得放在哪个地方。他不拥护台湾，但是一讲到外国，他说恐怕还是美国好。对这几百万知识分子，我们如果看不起他们，如果以为可以不要他们，这种观点是不妥当的。我们离不开他们。我们离开这几百万知识分子，可以说一步都不能走。这几百万知识分子，是有用之人，是我们的财产，是人民的教员。对这些人不能搞唯成分论，对他们的进步应该肯定。

毛泽东讲的第四个问题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他说：现在党外人士深怕我们‘收’，说我们‘放’的不够。我们的同志有一点想‘收’。中央的意见是应该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应该‘放’，而不是‘收’。他特别强调：‘高压政策不能解决问题，人民内部的问题不能采取高压政策。’这样做会不会‘天下大乱’？会不会像匈牙利事件那样把人民政府打倒？毛泽东的回答是：不会。中国的情况跟匈牙利不同，共产党有很高的威信，人民政府有很高的威信。马克思主义是真理，这是批评不倒的。

最后，毛泽东在讲整风问题的时候提出：我们要保持过去革命战争时期的那么一股劲，那么一股革命热情，那么一种拼命精神，把革命工作做到底。有些同志缺乏这种热情，缺乏这种精神，停滞下来了。这种现象不好，应当对这些同志进行教育。全党都要加强政治思想工作。我今天讲的总题目就是思想工作，思想问题，因为这个问题近来比较突出。在这里毛泽东强调要加强对党员干部的思想工作，解决党员干部中的思想问题。”¹

3月20日在上海，毛泽东向上海党员干部会议上讲话比在南京讲话更为系统。讲话还是从转变时期的特点谈起。他说：“在我们面前的新的任务就是建设，建设也是一种革命，这就是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要团结整个社会的成员，向自然界作斗争。当然，在建设过程中还是离不开人与人之间的斗争，在目前的过渡时期中，人与人之间的斗争还包括着阶级斗争。我们说阶级斗争基本完结，就是说还有些没有完结，特别是在思想方面，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还要延长一个相当长久的时间。这样一种形势，我们党是看到了的。在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上，刘少奇同志的报告和大会决议都说到，大规模的群众性的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了。但是，至今还有许多同志对于这种形势不很清楚，还有讲清楚的必要。

他回顾了全党对这个问题的认识过程，说：在过去一个时期内，中央对于这个问题也没有作详细的说明，这是因为，这个变化还是在不久以前才成熟的。比如我在去年4月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了十条关系，其中有两条，一条是敌我问题，一条是是非问题。在那个时候，还没有说到阶级斗争基本上结束了，到了去年下半年党召开代表大会的时候，才可以肯定讲这一点。现在情况更明白了，就需要更加详细地告诉全党：不要使用老的方法来对待新的问题，要分

¹ 引自《党的文献》2002年第5期，第39-40页

清敌我之间的矛盾和人民内部的矛盾。必须承认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矛盾，我们今天应该公开讲这个问题，不但在内部，在党内，而且在报纸上讲清楚这个问题，作出适当的结论。

上海是知识分子特别是高级知识分子集中的地方，毛泽东在讲话中，着重谈到知识分子问题。他说：我们的任务就是争取他们，要在比如三个五年计划之内（还有11年），使整个知识分子在学习马克思主义，跟工人、农民结合这个问题上进一步。其中大概要有三分之一的知识分子或者入了党。或者是党外积极分子。然后再进一步，争取其余的知识分子。我们要这样分步骤地改变知识界的状况，改变他们的世界观。

毛泽东认为，文艺的工农兵方向在一部分知识分子中间还是一个问题，这是知识分子新的世界观还没有建立起来的一种表现。要向他们说明，知识分子是为工人、农民服务的，他们本身的性质还在变，要逐步地变为工人阶级的知识分子。文艺当然是工农兵方向，没有别的方向。那些怀疑工农兵方向的知识分子，是反映了资产阶级以及小资产阶级的富裕阶层的思想。我们要把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团结争取过来，条件是完全充分的。但是也还需要时间，不能快，不能忙。马克思主义只能逐渐地说服人，不能强迫灌进去，灌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毛泽东还分析了在知识分子中间流行的一种‘共产党不能领导科学’的议论。他再一次强调中央关于‘放’的方针。他说：不但在纯粹科学艺术的问题上，而且在涉及政治性的是非问题上，只要不属于反革命一类，也让他们自由讲话。一般人民说错了话，或者闹了事，不能对他们使用专政的方法，只能采取民主的方法。

谈到整风的时候，他又讲了这样一个意思：我们跟党外人士的关系应该比过去进一步。现在是隔着一层。党与非党，有一点界限是必要的，应该有区别，这是第一；第二，就是不要有一条深沟。现在的情况就是有许多地方党内党外这个沟太深了，应该把这个沟填起来。要跟他们讲真心话，这样，他们会进步得更快些。不要讲一半，还留一半在家里讲。

最后，毛泽东充满信心地说：我们采取上面所说的这些方针，我相信，我们的文化、科学、经济、政治、我们的整个国家，一定可以繁荣发展起来，我们国家就会变成一个有近代农业的、工业化的国家，人民的生活会要好起来，人民的政治情绪，人民跟政府的关系，领导者跟被领导者的关系，人民与人民中间的关系，将是一

种合理的、活泼的关系。我们希望造成这样一个中国，希望把我们国家变成这样一个活泼的国家，使人们敢于批评，敢于说话，有意见敢于说，不要使人不敢说。按照这样的方针，我们的希望就一定可以实现。”“采取现在的方针，文学艺术、科学技术会繁荣发达，党会经常保持活力，人民事业会欣欣向荣，中国会变成一个大强国而又使人可亲。”¹

关于毛泽东南下的讲话，汪澍白评道：“反复向干部阐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思想，指出我国正处在转变时期，并把这个转变概括为：由阶级斗争到向自然界斗争；由革命到建设；由过去的革命到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他南北奔波，谆谆讲解两类矛盾的问题，表现出一种希望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加速经济、技术和文化的发展，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繁荣富强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精神。至于其蕴含着诱导敌我矛盾充分暴露的谋略，当时却鲜为人们所察觉。”²就是说讲话从表面看创造了宽松和谐的环境，但实质上是放长线钓大鱼，后来所发生的事实证明了这一点。

毛泽东从4月4日到6日，连续三天在南屏游泳池召开会议听取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安徽一市四省关于思想动态汇报。从汇报中了解到，党内外总的情况是很兴奋，紧张空气的所缓和。但是，党内党外的反响仍然有一定的距离。在党外知识分子当中，有不少议论，部分知识分子还有疑惧。党内的反映更多地表现出某种担心和困惑。当前干部中“左”的情绪还是主要的。毛泽东一边听汇报，一边插话，对一些议论表达了自己的看法。

石西民（上海市委宣传部长）：少数人说，共产党放长线钓大鱼，要看看市委的态度。

毛泽东：要让人家批评，一点不生气，然后去分析。现在知识分子像惊弓之鸟，怕得厉害，他们要看一看，他们是一定要看的，可能看上上一二十年，20年以后也还是要看的。我们党内同志也是要看一看的。如“治病救人”一条，过去一些犯错误的同志也是不相信，经过七大到八大，做了许多具体工作才相信。“三反”反出那么多“老虎”，后来百分之八十都降下来了，100元以下的就不算贪污了，太多了嘛。一个人搞百把块钱，一世就完了。“五反”开始也到处是坏人，后来五类一分，打击面就小了。总之，共产党的

¹ 引自《党的文献》2002年第5期，第40-41页

² 《炎黄春秋》2003年第2期，第2页

政策要让大家来考验，领导者也要受被领导者考验。

石西民：党内有一些干部说，现在搞百家争鸣不是时候。有的认为百家争鸣与千百倍地加强政治思想工作相矛盾，重大政策的传达要求先党内后党外，一下推开感到难办。

毛泽东：八大已做了结论，大规模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正是时候。党与非党之间有堵墙，墙不拆，如何争取群众？什么叫政治思想工作？政治思想工作是为了争取群众嘛。不考虑争取群众，谈不上政治思想工作。现在党与非党之间有条沟，而且很深。我并不是说党与非党不要有界限，应该有条线，混起来不好，但是不应该变成鸿沟，脱离群众。党内党外一起来好，这样快，就把许多人推上政治斗争舞台，不然两三年也不得解决。现在党外传达很快，党内反而迟，报上也很少反映。回去就要批评《人民日报》，是什么人的报纸？

石西民：有人提出报上开展百家争鸣要有五个条件：必须有领导，有选择，有准备，有说服力，有利。有人不同意这种说法。

毛泽东：这么多条件，叫我也难办。领导要有，搞方向就叫领导了，但不要干涉过多。有领导是肯定的，但毛病一点不出，难。有选择，也会选错，准备它有错。有准备是对的，也不能准备得那样周到。有说服力很对，这条比较具体。有利，看怎样讲，什么叫有利？百花齐放有利，还是一家独放有利？这几个条件都很难办，但是不要教条主义。

石西民：有人说电影要“力争香花，避免毒草”。有人认为这个口号不妥当。

毛泽东：毒草怎么能够避免？我们是不怕毒草，而且也难得分辨香花毒草。人们不是以毒草面目出现的，谁会说自己是毒草？其实，毒草也不那么多，似毒非毒的多一些，这是中间人物占多数的缘故。对片面性问题，只能要求逐步有比较多的人使用辩证法，比较能全面一些看问题，少一些片面性，而不是立即要求党内党外人士都避免片面性。凡政策性问题，党内讲的都向他们讲，缺点也向他们讲。我们讲了自己，这样就好讲他们的缺点了。人总有懂得与不懂得的矛盾，马克思也是如此。已知与未知的矛盾，工作做好与做不好的矛盾，永远存在。我在上海是第四次讲，已经比较完整了，你们上海还提出这么多批评嘛，话也难讲啊！你们在省里，不要认为讲一下，人家就举双手。哪有这样简单！

李彬（安徽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有的干部听了传达后说，现在

事情难办了，不好好学习干不下去了。

毛泽东：不能靠历史吃饭，不能靠威势吃饭。要以理服人，不能以力服人。理不足，不能服人，势力大也不能解决问题。以力只能服敌。敌人是不和你讲理的，你跟他讲理他不听，他只讲力。对人民只有说理，只要没理，不管势力多大，资格多老，也输了。因此给我们一个任务，要研究，要学习，要教育我们的干部和党员靠道理、靠学问、别的都不靠。这一点要进行广泛的教育，干部靠资格、靠势力是很危险的。

李彬：现在民主党派在学校中发展成员很积极。机关中有的党外副厅长想参加共产党，民主党派拉得紧，自己不愿意参加，叫老婆参加应付应付。

毛泽东：知识分子应吸收一批进党内来训练。争取三分之一的知识分子入党。知识分子入党条件不能太高。现在指定谭震林、陆定一、安子文三个负责，最近开一个会，总结一下知识分子入党的经验，定出发展要求。这里有个政策问题。如不争取一批人入党，将来无人去做争取知识分子的工作，对我们党团结大多数知识分子为社会主义工作的总方针不利。“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是争取知识分子的政策，是开放的政策，而组织上是关门的，这不行，不协调。当然，也要稳步地吸收他们参加。

李彬：高等学校里传达了主席报告以后，有的党外教授反映，想向院里党员领导干部提一下意见，好改变一下过去的有些距离的情况。

毛泽东：要改善共产党与知识分子的关系。与知识分子不能共事，这是什么作风？不与知识分子接近是宗派主义的作风。主要原因不是他们，是我们，是第一书记。第一书记不仅要抓思想，而且要看各种文章，要看哲学、历史、经济、文学、逻辑、艺术方面的文章，自己这方面的知识要逐步增长起来，兴趣要养成。（有人插话：工作太忙。）忙，就应该把其他事情让旁人多搞一些，多抽出些时间抓思想工作，思想工作是灵魂嘛，这就抓起纲领来了。

刘子见：（江苏省委宣传部长）：扬州地委政法部长说，不久以前泰兴的人闹事，捕了6个人，开始准备分别判处半年到两年徒刑，现在看判得不当。

毛泽东：我的讲话有这么大的影响！你讲的这个材料很好，看来还是要讲一讲。一听到闹事，就想到敌人，就实行专政。阶级斗争搞惯了，将对付反革命的办法用到闹事的人民身上。过去在革命的

时候，我们和人民一起，向封建势力要民主。现在我们胜利了，自己掌握政权，很容易强调专政，强调守法的一面，忽略民主的一面。

刘子见：有些人听了人民内部有矛盾以后大吃一惊。

毛泽东：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不是讲过了吗？为什么要大吃一惊呢？贫农、下中农、中中农、富农不是有矛盾吗？

刘子见：总的看来，目前干部中“左”的情绪是主要的。

毛泽东：“左”的倾向是历史上留下来的影响。因为过去几十年来都是搞阶级斗争嘛。

刘子见：民主党派对“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很满意，认为这样加重了自己的责任。只是觉得共产党对他们提意见少，成了单方面的监督了。

毛泽东：对民主党派要讲真话，对民主人士要更积极一点。要说的就说，有缺点就向他们提出来。这样比若即若离的好。当民主人士也有一大苦楚，不是愿意当的。要看到的看不到，要听到的听不到，共产党的底摸不到，又要有职无权。所以说党与非党要有一条线，不要有一条沟，要打通它。6亿人口同舟共济嘛。开会让他们一起来听，他们就放心了，更加靠拢了。见了面也可以讲一点党内的缺点。打破党内宗派主义的状态，克服不学习的现象，克服不虚心现象，我看很有必要。

刘子见：在学习主席讲话中，有人反映，八大决议指出的主要矛盾是先进社会制度同落后生产力的矛盾，现在又讲人民内部的矛盾，对这几种矛盾的关系，不知怎样才是完整的认识？

毛泽东：八大决议关于先进生产关系与落后生产力之间的矛盾的说法，是犯了个错误，理论上是不正确的。有的同志说，所谓落后的生产力是与外国比较的，是与将来比较的。为什么要与外国比较呢？与外国比有什么意义呢？有矛盾，是指生产力本身由落后到先进。生产力怎能与外国比呢？我们的生产力与苏联、美国比是落后。比中国，怎么能说是落后呢？比蒋介石，比1950年，不是先进了吗？有些同志说这是与将来比的，将来有一万万吨钢。那是将来的事情嘛。如老柯（指柯庆施。——引者注）十几岁的时候衣服很小，现在穿就发生问题了，在当时穿起来是合身的。所以不能这样比。这样比在理论上是说不通的。这个错误如何纠正，请大家想办法。

刘子见：主席说的一千年、一万年以后还有革命，这如何解释？

毛泽东：这个问题我说过，但还没有肯定。

陆定一：有两种革命：一种是改变生产关系的革命，一种是一

个社会制度内部的革命，如中国封建制度内部多次革命，但生产关系并未根本变化。主席讲的将来的革命，可能是指后一种革命。

毛泽东：不。我讲的革命不是你讲的那种，是讲的改变生产关系的革命。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是有矛盾。现在的生产关系是集体所有制，是国家所有制。一万年后生产关系总要改变，最后要以地球为单位，不是国有化，而是“球有化”。当然，总不会回到剥削关系。剥削是生产不足的表现。

吕志先：（浙江省委宣传部长）：党外的人士听了主席的报告之后都很兴奋。

毛泽东：党外兴奋，党内呢？

吕志先：我们准备5月开宣传工作会议。

毛泽东：有没有党外人士参加？县里来不来人？（对陆定一）我们的宣传工作会议为什么不报道？最高国务会议一声不响，宣传工作会议还不响。《人民日报》对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一声不响。到底是《人民日报》，还是“国民日报”？

吕志先：我们检讨过去对陈其通等同志的文章有同感。

毛泽东：陈其通的思想，恐怕代表了党内大多数，百分之九十。所以，我这个报告毫无物质基础，与大多数同志的想法抵触嘛。

吕志先：我们思想上总想极力避免毒草。

毛泽东：这是不可能的。

柯庆施：毒草和错误的东西，批评不批评？

毛泽东：你们不是已经批评了吗？毒草要让它出来，批评要有说服力，看清楚了就驳，看不清楚就等一下，不要慌。但是不要等太久。

吕志先：党外人士对我们的肃反有意见。

毛泽东：领导要经得起考验。现在党外情绪高，党内大概先低后高。任何一个方针、政策，都不是哪个人一讲就行的，灵不灵，要经过考验。到解决了一些问题，取得了经验，看到这个方针灵了，情绪才能高起来。过去教条主义者说自己是百分之百的马克思主义，当时俘虏了一些人，经过考验就搞清楚了。应该让干部在工作中试验试验。党的任何一条方针都要拿到群众中去考验。

江华（浙江省委书记）：党外人士问，从最低干部到最高领袖，最高国策，能不能批评？

毛泽东：宪法有规定嘛，让他批评嘛。6亿人口中所有有缺点的人，不管官有多大，都可以批评。讲对了接受。讲得不对，如果

没有害处就算了。

许彘青(福建省委宣传宣传部长):报社组长以下要求“放”,编委会有顾虑。

毛泽东:我的讲话还是有群众嘛,组长以下还是主张“放”嘛。

许彘青:报纸工作,群众的要求与党委的要求有矛盾。

毛泽东:怕人家批评怎么能办好报纸?人家提提意见有什么不好?文教、报纸、报刊、戏剧,都是教育人民的工具,要经常教。不要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报纸、学校、戏剧,各地无人管,这种现象不能再继续下去。你们(书记)管得太少了。

许彘青:厦门大学校长王亚南批评我们的大学有三个缺点:(一)行政机构太大,工作效率太小;(二)用领导机关工作的办法来领导学校;(三)党员水平不高,党员的优越性在大学里看不出来。

毛泽东:是嘛,在大学里我们就是没有优越性嘛。要把接管大学的人调出来。要真正配备一个队伍,包括中学在内。我们有些同志靠摆架子,……吓唬人。大学中原来去的干部只能留下一部分,留下有用的部分,主要靠重新配备队伍,办法是把教授吸收入党,重新配备队伍。现在要早做准备,多吸收些教授入党,不然外行不能领导内行。这是陆定一的任务。你们搞个三人小组去招兵。王亚南这个人可以吸收入党的嘛。

叶飞(福建省委书记):大家对主席的报告反映很好,都觉得启发很大,但许多问题一接触实际就又不通了,如对人民闹事让他闹够,很多人就想不通。

毛泽东:对于党外党内人的意见都不能采取一下子顶回去的办法,要采取分析的态度,不然会犯错误。有人说,赵超构的《新民晚报》是黄色报纸,我在北京就看了一下,我看不能说是黄色报纸,我看还不错嘛。有人说我们不能领导科学,也不能一下子顶回去,要分析。不懂就是不懂,不要装懂。一装,人家就说你水平不高,进步不快了。自己不讲人家还是要讲的,自己主动讲不是更好。相当多的党外话是对的,他们讲话是考虑过的。有的讲得不对,是不了解情况。有一部分要分析,有一部分要接受,决不可一下子顶回去。如果采取一下子顶回去,就会处于被动。¹

通过南下讲话,特别是这次座谈会,毛泽东又了解到不少情况,使他更加坚定了以“正处”为主题,向党外人士敞开大门,认真搞

¹ 引自《党的文献》2002年第5期第42-46页

好整风的决心。这次南下，使他意识到党内党外对《正处》讲话的反响存在如此明显的反差，这种情况，在以前是很少见的。这可能对毛泽东决定提前发动全党整风，以扭转党内认识跟不上形势的状况，起了促进作用。¹

会后向国内外干部、知识分子传达了两个《讲话》的内容及其精神，而《人民日报》以社论形式大张旗鼓宣传“讲话”的精神。

1957年4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怎样对待人民内部的矛盾》的社论。社论首先回顾了“讲话”与会者进行热烈讨论后，各民主党派的中央机构和党的地方组织都相继召集会议讨论这个“讲话”。“因此，怎样正确地对待人民内部的矛盾，已经成为全国各界人士当前普遍关心的问题之一。关于这个问题的广泛讨论，无疑将促进我国目前人民内部的某些矛盾得到比较顺利的解决，使我国人民的伟大的团结更加巩固，从而使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更快地向前发展。”

其次，论述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某些环节上产生矛盾。“我们认为，矛盾是一切事物发展和进步的动力。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看来，事物内部存在着矛盾，这是一种普遍的、永恒的现象。”“在人类社会的发展中，由于社会制度的不同，社会内部矛盾的情况和矛盾的性质虽然有所不同，但是矛盾的存在这一点却是永远不变的。”“在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过程中，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在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在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各个环节上，仍然产生不完全相适应的情况，也就是说，仍然会产生矛盾。”

第三，论述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和具体措施。“人民群众和领导者之间为什么会发生矛盾呢？这是由于他们在国家生活中所处的不同的地位决定的。……但是，人民群众和领导者之间的矛盾，跟人民内部的其他矛盾一样，是在根本利益相一致的基础上发生的非对抗性的矛盾……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必须从原则上跟处理敌我矛盾的方法区别开来。为了正确处理这类矛盾，必须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者斗争，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在这里，从团结的愿望出发是有决定意义的，因为如果没有这个愿望，批评和斗争就难于达到新的团结。”“目前我国人民群众和领导者之间的矛盾，主要是由于领导者在工作中的官僚主义作风。……因此，为了解决人民群众和领导者之间的矛盾，必须首先

¹ 引自《党的文献》2002年第5期，第46页

严肃地认真地克服领导工作人员中的这种官僚主义现象。为了有效地克服官僚主义，必须依靠群众，扩大人民民主生活，以便加强群众对领导者的监督。”“为了完满地解决人民群众和领导者之间的矛盾，还需要不断地加强在群众中的思想政治工作，不断地提高人民群众的政治觉悟。”

社论最后说，“在今后，只要我们党能够继续戒骄戒躁，密切联系群众，坚决地同官僚主义和其他错误的思想作风作斗争，我们也一定能够领导群众共同地克服建设社会主义道路上的一切困难和障碍，并且采取正确的方法，顺利地解决各种人民内部的矛盾。”¹

4月17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的社论，指出：“1942年整风运动中，我们党提出了‘团结——批评——团结’这一进行党内斗争的公式，这就是说，为了解决同志间的意见分歧，应该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和斗争，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经过整风运动以后特别是最近几年实践证明，这一公式不但可以用于党内，而且可以用于党外，成为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基本方法。”

接着指出：“要使批评成为习惯。在党的生活中……在人民内部，任何人都可以批评别人，任何人任何机关团体也都要接受正确的批评。我们的任何党组织和国家机关，我们的任何工作人员，不论他的职位高低、年龄老少、功劳大小、资历深浅、工作成绩好坏，谁都没有任何特权任何理由可以抗拒批评。应该采取各种措施扩大民主生活，使人人都有机会对自己不满的事情提出批评。”“开展批评的目的是为了弄清是非、团结同志，而不是为了整哪一个人。因此，无论谁在批评别人的时候，都应该满怀治病救人、与人为善的精神”。“在人民内部同样应本着这种精神开展批评。在批评别人的时候，还要考虑到怎样为被批评者改正错误准备条件，而不要有意地整得别人下不了台，更不允许用一棍子打死的态度去批评人民内部的错误，对待人民内部的矛盾。”

社论最后指出：“我们提倡批评从团结的愿望出发，是为了正确地发展批评，是为了达到更好的团结的目的，并不是为了用来作限制批评的挡箭牌。由于种种原因，批评意见中总不免有一些偏激过火的部分，批评者有时也会态度粗暴，方式不好，看起来似乎不合乎从团结出发的标准。但是，只要不是宗派主义者或别有用心的人

¹《人民日报》1957年4月13日

坏分子利用批评进行挑拨和污蔑，领导者对批评者就应该明确地采取保护态度。”“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应当是我们的座右铭。”¹

4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工商业者要继续改造，积极工作》的社论，指出：“社会主义改造高潮以来，全国私营工商业者在工作和学习上，都出现了新气象。据不完全统计，在这一年里，全国的工商业者已经有120多万人参加了……政治理论学习，受到了破资本主义，立社会主义的启蒙教育。这对他们的思想改造和工作，都起了不同程度的促进作用。……这说明一年来，工商业者在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团结、教育和改造的政策影响下，又已在社会主义的道路上迈进了一大步。”

接着指出：“也要看到他们还有消极的、保守的一面。不少的人对资本主义还有留恋。”“这也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资产阶级两面性的具体表现。它反映了在合营企业里，工人和资本家之间仍然有阶级矛盾。这种阶级矛盾的存在是完全不奇怪的，合乎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的。”“在我国的具体条件下，这种阶级矛盾虽然是属于人民内部的非对抗性的矛盾，但是，决不能因为它是非对抗性的矛盾就忽视它。应该以推动工商业者继续改造的办法来克服这种矛盾。”“我们指出阶级关系的存在，指出工商业者改造的必要性，正是为了让他们更好地认识继续前进的方向，更好地发挥积极性。况且在我们国家里，思想改造对每一个人都是需要的。”“包括工人和我们共产党人在内，都需时时进行自我改造，才能使自己的思想认识，作风，适合于社会发展的要求。现在还拿着定息、思想作风跟自食其力的劳动者还有很大距离的工商业者，为什么就不进行改造了呢？”

社论最后指出：“工商业者必须明确认识：以企业为基地，通过工作的实践，是改造自己的主要方法。”“从一个资本家变为一个自食其力的劳动者，这不像孙悟空要变就变那样轻而易举，而是一个脱胎换骨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需要从实际和实践中学习，尤其需要向职工群众学习。”²

4月23日，《人民日报》发表《全党必须认真学习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极其重要的社论，社论首先指出：“认真地研究和执行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指示，这是当前党的每一

¹ 《人民日报》1957年4月17日

² 《人民日报》1957年4月22日

个组织，特别是党的高级组织和它的负责人员的迫切任务。”“自从毛泽东同志在最高国务会议和党中央宣传工作会议上作了报告，这些报告在党内外进行了传达以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已经成为现时全党和全国人民最关心的问题。”“尤其需要警惕的是，党的某些工作人员，在居于各种范围的领导地位以后，在不同程度上沾染了旧社会统治阶级的作风，沾染了国民党的脱离群众的作风，沾染了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的作风。他们开始忘记了党关于人民民主和群众路线的教导，开始忘记了党关于为人民服务、同群众打成一片，关心群众疾苦的教导。需要在全国范围内再一次大规模地、有系统地整顿党的作风，开展正确地批评和自我批评，才能达到使全党善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目的。……相反，如果采取简单的敷衍的做法，不去触动党内许多同志的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风上的严重问题，满足于表面的和局部的效果，就认为万事大吉，那么，对于事情是不会有有什么帮助的。”

其次，社论批评了“还有不少党组织的动作还很迟缓，劲头不足。党的报刊（从本报起）在这一方面也是落后的，现在也还有不少报刊没有重视关心这个问题的讨论。”“这是因为，我国现在正处在一个社会大变动的时期。我国内部的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刚刚开始，作为最近时期的阶级斗争发展的结果，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正在经历空前未有的物质变化和精神变化。国内阶级斗争的基本结束，本来就使人民内部的矛盾在历史舞台上上升到比较显著的地位，加上绝大多数人口所经历的这种深刻的历史性的变化，更使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带有特别严重的性质。而我们的许多同志还没有认识到这个社会大变动的全部意义，他们还没有觉悟到，时代已经变了。在国内，反革命势力的绝大部分已经被我们推翻了，扫除了，剩下的只是些残余；对于这些残余，虽然还需要保持警惕性和严肃性，还需要继续给以打击，但是大规模的阶级斗争是过去了。……问题是人民同我们中间也逐渐产生一些矛盾，产生一些我们所不熟悉的、我们所不大想到和不大愿意想到的矛盾，正是这种矛盾要求我们必须加以正视，必须谨慎地、妥善地加以处理。但是许多同志对于客观形势的这个根本变化熟视无睹，他们还习惯于用老眼光看新问题。这样，他们就有误用处理敌我矛盾的方法去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严重危险。因此，党必须向他们大喝一声，让他们注意这个社会大变动是当前国内生活的基本形势，人民内部矛盾是当前国内生活中的新的重大的现象，正确地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是当前国内生活中的新

的重大的课题。”

社论最后指出，“总之，只有及时地认识社会大变动的历史意义，及时地认识人民内部矛盾在新形势下发展的必然性，只有采取正确的方法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采取说服教育的方法引导不同的社会阶层继续前进，使社会主义制度日渐巩固，只有在领导工作人员中进行充分的工作，使他们坚持深入群众，同群众打成一片的优良作风，坚决纠正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的恶劣作风，我们才能调动一些积极因素，尽快地使我们国家建设成一个团结一致的、生动活泼的、先进的、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¹

三、“百花齐放 百家争鸣”和“长期共存 相互监督”的口号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即“双百”方针，“长期共存、相互监督”的方针，这两个口号或方针是毛泽东在《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讲话和《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讲话》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现在重点叙述这方面的内容和精神。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口号，1951年、1953年就提出来了，将这八个字连在一起完整的作为党的科学文化工作的政策方针，那是1956年以后的事情。“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讲话》中的一个重要部分，还有其他文章和讲话中重复这个方针、口号。

1956年4月28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总结讲话中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问题，他说：“艺术问题上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百家争鸣，我看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百花齐放’是群众中间提出来的，不晓得是谁提出来的。人们要我题词，我就写了‘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百家争鸣’，这是两千年以前就有的事，春秋战国时代，百家争鸣，讲学术，这种学术也可以讲，那种学术也可以讲，不要拿一种学术压倒一切。你讲的如果是真理，信的人势必就会越来越多。”²

1957年1月，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中批评不理解“双百方针”的人。他说：“百花齐放，我看还是要放，有些同志认为，只能放香花，不能放毒草。这种看法表明他们对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很不理解。一般说来，反革命的言论当然不让放。但是，它不用反革命的面貌出现，而用革命的面貌出现，那就只好让他放，这样才有利于对它进行鉴别和斗争。”“百

¹ 《人民日报》1957年4月23日

² 《毛泽东文集》第7集，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54-55页

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个方针，是在批判了胡风反革命集团之后提出来的，我看还是对的，是合乎辩证法的。”毛泽东还引用列宁关于对立统一学说定为辩证法的核心观点：“‘对立的统一（一致、同一、均势），是有条件的、一时的、暂存的、相对的。互相排斥的对立的斗争则是绝对的，正如发展、运动是绝对的一样’。从这种观念出发，我们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个方针。”¹

2月27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11次（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以很大篇幅谈到了“双百”方针，还是作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一种方式提出来的，批评教条主义的干扰。

首先，“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几个口号是怎样提出来的？就是承认社会上各种不同的矛盾，在艺术上，文学上它就是表现为百花齐放。这个百花齐放里头包括这些东西，就是各种不同的花，但是也包括一些性质不同的花。比如讲百家争鸣里头有唯心论”。

“一株香花，一株毒草，我说你当然是要香花。但是教条主义也并不是香花。教条主义是什么花？教条主义是不是马克思主义？教条主义并不是马克思主义，教条主义也是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的东西。教条主义它的方法是形而上学的方法，片面性、孤立性，搞片面是不加分析的。”

其次，毛泽东批评说：“教条主义就喜欢教条主义，机会主义就喜欢机会主义。教条主义并不是马克思主义，教条主义是反马克思主义的。机会主义也是反马克思主义的。”“我们许多干部中间，实际不赞成中央的方针——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这个方针。实际上是不赞成的。是不是我的话讲过了？我说高级干部中十个有九个不赞成或半赞成，或者不甚通。真正通的，真正为这个方针是正确的少数，所以很需要做工作，做说服工作。”²在这里，“双百”方针由学术性变成政治性的方针。

3月8日，毛泽东《同文艺界代表的谈话》指出：“我们主张百花齐放，有的人很怕百花，现在百花齐放的环境还没有造成”，“我们采取有领导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现在还没有造成放的环境，还是放得不够，是百花想放而不敢放，是百家想鸣而不敢鸣。陈其通他们四人的文章，我就读了两遍，他们无非是‘忧心如焚’，唯恐

¹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38、345-346页

² 《毛泽东思想万岁》1949，10-1957卷，第157-160页

天下大乱。”¹

3月12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发表出版时经过修改，在这个讲话中谈到“双百”方针。

首先谈到为什么要“放”。毛泽东说：“‘放’还是‘收’？这是方针问题。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是一个基本性的同时也是长期性的方针，不是一个暂时性的方针。同志们在讨论中间是不赞成收的，我看这个意见很对。党中央的意见就是不能收，只能放。”“放，就是放手让大家讲意见，使人们敢于说话，敢于批评，敢于争论；不怕错误的议论，不怕有毒素的东西；发展各种意见之间的相互争论和相互批评，既容许批评的自由，也容许批评批评者的自由；对于错误的意见，不是压服，而是说服，以理服人；收，就是不许人家说不同的意见，不许人家的发表错误的意见，发表了就‘一棍子打死’。这不是解决矛盾的办法，而是扩大矛盾的办法……我们采取放的方针，因为这是有利于我们国家巩固和文化发展的方针。”

其次，谈到“双百方针”的目的。毛泽东说：“我们准备用这个放的方针来团结几百万知识分子，改变他们现在的面貌。……知识分子的问题首先是思想问题，对于思想问题采取粗暴的办法、压制的办法，那是有害无益的……要人家服，只能说服，不能压服。压服的结果总是压而不服。以力服人是不行的。对付敌人可以这样，对付同志，说服朋友，绝不能用这个方法。”“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个方针不但是使科学和艺术发展的好方法，而且推而广之，也是我们进行一切工作的好方法。”接着“我们主张放的方针，现在还是放得不够，不是放得过多。不要怕放，不要怕批评，不要怕毒草……最近一个时期，有一些牛鬼蛇神被搬上舞台了。有些同志看到这个情况，心里很着急。我说，有一点也可以，过几十年，现在舞台上这样的牛鬼蛇神都没有了，想看也看不成了……当然我并不提倡发展牛鬼蛇神，我是说有一点也可以。某些错误东西存在是并不奇怪的，也用不着害怕的，这可以使人们更好地学会同它作斗争。”²以上是毛泽东提出“双百”方针的曲折过程，而且把“双百”方针视为长期性的一切工作的好方法。“双百”方针，实际上就是提倡创作与科研的自由，客观上具有反文化专制的民主性质，以后

¹ 《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50—253页

²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14—417页

将“双百”引入政治领域，为政治需要服务，逐渐政治化，成为阶级斗争的工具。

1956年6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陆定一5月26日在怀仁堂的讲话，即“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讲话。这个讲话着重解释“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政策，或者说，对这个政策的认识或学习。这是一次很权威、影响很大的讲话，现摘录其主要内容。

第一，为什么提出这样的政策？为什么现在才着重提出这样的政策？陆定一说：“我国要富强，除了必须巩固人民的政权，必须发展经济，发展教育事业，加强国防外，还必须使文学艺术和科学工作得到繁荣的发展，缺少这一条是不行的。要使文学艺术和科学工作得到繁荣的发展，必须采取‘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政策。”“我们所主张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提倡在文学艺术工作和科学研究工作中有独立思考的自由，有辩论的自由，有创作和批评的自由，有发展自己的意见、坚持自己的意见和保留自己的意见的自由。”

“总而言之，我们主张政治上必须分清敌我，我们又主张人民内部一定要有自由。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人民内部的自由在文艺工作和科学工作领域中的表现。我们现在已经完全有条件来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政策了。我们现在的情形是怎样呢？（1），社会主义改造在全国基本地区已在各方面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剥削制度将在今后几年内在这些地区被消灭。一切原有的剥削者将被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我国即将成为没有剥削阶级的社会主义国家。（2），知识界的思想状况已经有了根本的变化。（3），我们还有敌人，国内也还有阶级斗争，但是敌人，特别是国内的敌人，已经大大削弱了。（4），全国人民政治上思想上的一致性大大增强，而且还在继续增强之中。”

第二，加强团结。“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既是为了动员一切积极因素，所以又是一个加强团结的政策。在什么基础上的团结？在爱国主义的基础上，在社会主义的基础上。团结起来干什么？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中国，并且同内外敌人作斗争。”“在斗争过程中，摸索出了几条经验：①自然科学包括医学在内是没有阶级性的。它们有自己的发展规律。它们同社会制度的关系，仅仅在于：在不好的社会制度之下，这些科学要发展得慢些，较好的社会制度下就能发展得快些。②对于文学艺术工作，党只有一个要求，就是为‘工农兵服务’，今天来说，也就是为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一切劳动人

民服务。③在哲学和社会科学领域中，工作成绩是大的。但正因为如此，宗派主义的危险也就大了。”“据说，大家在等待中共中央编出一本党史教科书来，然后根据党史教科书来写各种近代史。现在请你们不要等待了。中共中央不准备编写党史教科书，只准备陆续出版党的大事记和文件汇编。我们的近代史学工作者，当独立地研究近代史中的各种问题。在近代史的研究中，也应该采取百家争鸣的政策，不应该采取别的政策。”

第三，批评问题和学习问题。“‘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对批评工作来说，就是批评的自由和反批评的自由。”“学习方面，要继续坚持自愿的基础之上组织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习，同时要广泛地学习知识，对古今中外，对朋友，对敌人，都要批判地学习。”“对我国文化遗产，我们建议采取这样的方针：要细心地选择、保护和发展它的一切有益成分，同时要老老实实在地批判它的错误和缺点。”“我们要有民族自尊心，我们决不能做民族虚无主义者。我们反对所谓‘全盘西化’的错误主张。但这绝不是说我们应该自大，拒绝学习外国的好东西。”“我们应该向苏联学习，向人民民主国家学习，向世界各国人民学习。”“除了朋友之外，我们也要向敌人学习，不是学习他们的反动的制度，而是学习他们的管理方法和科学技术中有价值的东西。”¹

1957年3月13日，陆定一强调“放”的方针时说，匈牙利：“犯了那么多的错误，群众上街游行，本来这矛盾是人民内部矛盾，不是对抗性的，可是他（指匈牙利党的第一书记格罗·埃米塔）要去压，结果变成了对抗性的了。中国虽然没有格罗，但是教条主义的思想则近乎格罗的办法，打击群众的情绪。”²

据于光远回忆：“在这里，我想指出1956年毛泽东对这一方针的积极支持。一个具体的事例是在青岛遗传学会议召开后，1957年4月29日《光明日报》上刊登了我国遗传学家李汝祺教授《从遗传学谈百家争鸣》的文章，毛泽东同志看到后即建议《人民日报》转载，并把标题改为《发展科学的必由之路》，还为《人民日报》编辑部代拟了按语。按语中写道：我们将原题改为副题，替作者换了一个肯定的题目，表示我们赞成这篇文章。我们欢迎对做了彻底的批判（一切真正错误的思想和措施都应该批判干净），同时提出恰当性

¹ 《人民日报》1956年6月13日

² 引自《陆定一文选》，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556页

的建设性意见来。”还有一件值得回忆的事情，就是在百家争鸣方针提出的那段时间，陆定一向我们中宣部的同志说，有个单位的同志向中宣部请示，要中宣部对某个学术问题先作一个结论再去进行学术批评，为此他向毛泽东请示，毛泽东说：让马克思来当你中宣部的部长，让恩格斯当你中宣部的副部长，再加上列宁当副部长，也解决不了那么多的学术问题。学术问题就是要百家争鸣。从1956年春天到1957年夏天，中国知识分子对于当时的形势和党的方针是很高兴的。在当时，中国的科学工作者和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中，有许多人在考虑如何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作出更好的贡献。”¹

综上所述，毛泽东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政策，陆定一系统地阐述解读了这个方针政策，特别“是提倡在文学艺术工作和科学研究工作中有独立思考的自由，有辩论的自由，有创作和批评的自由，有发表自己的意见、坚持自己意见和保留自己意见的自由。”这四个自由概括了“双百”方针的精神。使广大知识分子受到鼓舞，感到兴奋。这些都说明，当时出现比较宽松、和谐的环境和气氛。这就为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提供有利条件和促进作用。但也应该注意到陆定一理解的“双百”方针有别于毛泽东提出的“双百”方针。陆定一概括了四大自由是繁荣艺术、科学的政策，而毛泽东提出的“双百”方针，虽有繁荣艺术、科学之义，但更重要的是让毒草出笼、“引蛇出洞”，以便于消灭它们。

当然贯彻“双百”方针也受到阻碍。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讲话中，批评阻碍“双百”方针的人和单位。比如“陈其通、马寒冰几位同志，在1月7日的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一篇声明，四个人署名，实际上是怀疑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个方针，所谓自从这个方针提出来，就没有大作品了。这个结论作的过早了一点。……到现在这么久了，我们的人民日报是什么态度我也不清楚。”“你们发表这个东西是赞成还是反对？今天在座的有没有人民日报的？你总要处理一下嘛，或者是商量一下，自己没有主张，你们找中央同志研究一下嘛，看如何处理。我现在表示我的态度，我不赞成那篇文章，那篇文章是错误的。但世界上的东西各不同，各人喜欢各人的，钟惦斐的文章台湾就喜欢。陈其通、马寒冰的文章社会主义国家很喜欢，真理报登出来了，真

¹ 《人民日报》1986年5月16日

理报就不喜欢陆定一的那一篇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就喜欢陈其通、马寒冰四位同志的。”“是文学报？不是真理报？那还好一点。”“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各人喜欢各人的东西，气味相投。教条主义就喜欢教条主义，机会主义喜欢机会主义。”¹

毛泽东认为，“陈其通四人的文章，老干部十之八九是同情的：专员以上干部约一万多人，其中是否有一千人赞成‘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都很难说，其中9/10都还是不赞成；对‘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个问题，在我们同志中间意见不完全一致，有些同志觉得这个方针可以，赞成。有一些同志看样子还可以，但是心里总有那么一点不舒服，‘百花齐放’，那么多花，恐怕有不好的东西出来了怎么得了啊！‘百家争鸣’咱们共产党只能算一‘家’，99家包围我们，怎么得了啊！总之，是有比较了解这个问题的，有了解一些但是又不很多的，还有怀疑的，不赞成的。有各种意见在我们党内。对于‘双百方针’我们还需要在党内做许多宣传解释工作。”²

1957年4月9日，周扬就“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问题答《文汇报》记者问。现摘要如下：

第一，自从去年党中央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政策以来，在学术界、文艺界有什么重要收获？答：“这个方针提出以后所产生的积极效果都已经可以看出来。学术界自由讨论的风气浓厚起来了。”“学术和文艺刊物大为增多，颇有‘雨后春笋’之势。”“文艺创作的取材范围比以前广阔得多了，体裁和风格也更加多样化了。尖锐地揭露和批评生活中的消极现象的作品，愈来愈引起人们的注目。”“但是我们的环境中也还存在着一些不利于科学和艺术发展的东西，例如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和对待科学技术工作的官僚主义的行政命令的方法。”“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就把知识界的这种新的积极性鼓动起来了。大家开始重视独立思考 and 客观分析；不迷信，不盲从；敢于坚持自己正确意见和反驳任何人的不正确的意见；敢于批判和揭露生活中不合理的现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使科学家、艺术家的积极性大大提高了，这就是最重要的收获。”

第二，你以为什么阻碍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政策的贯彻执行？答：“‘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党的长期政策，根本不发

¹ 《毛泽东思想万岁》，1949.10-1957卷，第159页

² 引自《当代中国史研究》，1998年第3期，第49页

生是否放得够了和鸣得多了的问题，因为没有一天能够说是够的时候。”“目前是什么东西阻碍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政策的贯彻执行呢？从思想倾向的角度来看，我们认为主要是两种思想上的片面性：‘左’的教条主义和右倾机会主义的倾向。”“在教条主义者看来，似乎要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要工农兵方向，就不能同时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至多只能口头上讲一讲，点缀点缀门面，他们对于这个方针是实际上采取一种怀疑、否定的态度。”“机会主义者对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倒是表示欢迎的，但他们是抱着另外一种心情来‘欢迎’的。”“表面上看来似乎他们是在拥护这个方针，实际上他们是在葬送它，因为他们把这个方针的灵魂勾掉了。”“因此要贯彻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必须进行既反对‘左’的教条主义，又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两条路线的斗争。”

第三，你对陈其通等四同志合写的《我们对目前文艺工作的几点意见》一文有什么意见？对文艺报评论员的《电影的锣鼓》一文又有什么意见？批评这些文章，对开展‘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有什么意义？答：陈其通等四同志的文章，应该肯定，但有一些重要错误。（1）“他们对‘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提出以后的文艺界情况，作了不正确的估计，看不到积极现象（这是主导的方面），把一些次要的，个别的消极现象不适当地夸大了。”（2）“就以他们所指的消极现象而论，他们的批判也是缺乏分析的，而且有些现象并不是，至少不完全是消极现象。”（3）对待他们所认为错误的思想，不是采取说理的态度，而是采取简单化的，粗暴的态度。到现在正要求排除‘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障碍，鼓励大家来‘放’和‘鸣’的时候，这篇文章实际上起了一种障碍‘放’和‘鸣’的作用。”“造成这个主要错误的原因就在作者对当前文艺状况的考察是片面的，他们是教条主义的眼光，带着宗派主义情绪去观察事物的。”“如果说《我们对当前文艺工作的几点意见》一文反映一种‘左’的教条主义的倾向的话，那么《电影的锣鼓》一文则是右倾机会主义的表现。”“写《电影的锣鼓》的《文艺报》评论员，他是一个和电影工作有较多接触的同志，他如果能够站在正确的立场，实事求是地、恰当地来批评电影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那是有好处的。可惜他没有那样做。他的批评采取了抹煞一切的态度，把解放几年来电影事业的成就全部否定了。”“批评《我们对目前文艺工作的几点意见》和批评《电影的锣鼓》，就是批评两种思想上的片面

性，批评从‘左’和右两方面来对党的政策的歪曲，这种批评，对贯彻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和提高我们大家的思想都具有重大的意义。”¹

自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批评人民日报后，该报对双百方针和两次重要会议毫无反响。到4月1日，由胡乔木传达毛泽东对人民日报的极其尖锐批评：“党的报纸对党的政策要及时宣传。宣传工作会议未登消息，是个错误。这次会议是党内外人士合开的，为什么不登消息？最高国务会议为什么不发社论？为什么把党的政策秘密起来？这里有鬼，鬼在什么地方？过去说是书生办报，现在应当说是死人办报。你们多半是对中央的政策唱反调，是抵触的，反对中央的方针，不赞成中央的方针。”²

毛泽东还质问：“《人民日报》到底是谁家的报纸？是《人民日报》还是《国民日报》？（邓拓解释说：过去中央曾有规定，党的会议不发消息，主席讲话未公布前，也不引用。我对这个事没有抓紧）中央什么时候有这个规定？最高国务会议发了消息，为什么不发社论？消息也只有两行。为什么把党的政策秘密起来？宣传会议不发消息是个错误。这个会议有党外人士参加，为什么也不发消息？党的报纸对党的政策要及时宣传。最高国务会议以后，《人民日报》没有声音，非党报纸在起领导作用，党报被动，党的领导也被动。党报在非党报面前丢脸。我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目前还不能发表，但可以根据讲话的意思写文章。对党的政策的宣传，《人民日报》不是没有抓紧，而是没有抓。其实，《人民日报》当时对宣传《正处》讲话不热心，是事出有因的。据胡乔木回忆说：‘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中间有些复杂的过程。毛主席最初认为暂时不要宣传，怕别的国家接受不了。可是后来上海文汇、新民报这些非党的报纸大讲特讲，毛主席感到应该讲，对人民日报、解放日报不宣传作了严厉的批评。’”³

从此，人民日报立即改正，于1957年4月10日发表题为《继续放手，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社论。首先强调：“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并不是什么一时的，权宜的手段，而是为发展文化和科学所必要的长时期的方针。”“党的任务是要继续放手，

¹ 《文汇报》，1957年4月9日

² 《人民日报》，1968年9月1日

³ 参见《党的文献》2002年第5期，第46—47页

坚持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

其次批评有些人对于党的方针抱着不同的想法。“照他们看来，这样下去，思想界将会一团混乱，文化科学发展的方向将要模糊，资产阶级思想将要泛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将要动摇——总而言之，前途简直是不堪设想。”像“陈其通、陈亚丁、马寒冰、鲁勒等四位同志的文章‘我们对目前文艺工作的几点意见’，就是这种倾向的一个代表。他们文章说：‘在过去的一年中，为工农兵服务的文艺方向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越来越很少有人提倡了。’‘真正反映当前重大政治斗争的主题有些作家不敢写了。也很少有人再提倡了……因此，使文学艺术的战斗性减弱了，时代的面貌模糊了，时代的声音低沉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光辉在文学艺术这面镜子里光彩暗淡了。’”“很明显，这种估计是对于事实的一种极端的歪曲。……问题是何以会有这种极端歪曲的估计呢？这是由于，到现在为止，党内还有不少同志对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实际上是不同意的，因此他们就片面地收集了一些消极的现象，加以渲染和夸大，企图由此证明这一方针的‘危害’，由此来‘劝告’党赶快改自己的方针。但是，党不能接受他们的这种‘劝告’，因为他们的方针并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反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陈其通等四位同志在主观上虽然也要说服非马克思主义者，但是它们本身的态度就不是马克思主义的，而是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的。因此，他们的批评只能造成思想上的混乱，而事实上也已经造成了思想上的某种混乱。”

最后社论承认：“本报在发表了他们的文章以后，长期间没有加以评论，是造成这种混乱的重要原因之一。”¹

这时毛泽东刚从南方回北京后，看了4月10日这篇社论颇为赏识。当天中午，他召集陈伯达、胡乔木、周扬、邓拓、胡绩伟、王揖、林淡秋、黄操良、袁水拍、王若水等开会，肯定了当天报上的社论，并询问了写作的过程。以下是这次谈话的要点：

邓拓说：是王若水同志写的。

毛泽东对王若水说：我要请你吃饭。

王若水说：胡乔木同志作了不少修改。

毛泽东说：修改也总有个基础吧。接着。他又说：中央很多会议你们都参加了，参加了回去不写文章，这是白坐板凳，惟一的作

¹ 《人民日报》1957年4月10日

用就是增加板凳的折旧费。以后谁写文章，让谁来开会。

毛泽东对邓拓说，我看你很像汉元帝，优柔寡断，你当了皇帝非亡国不可！

邓拓说：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汉元帝，不过我实在是感到能力不够，难以胜任。希望主席考虑撤掉我的职务。我几次诚心诚意地提出过这个请求……

毛泽东又一次地打断他：我就不相信你那个诚心诚意！你只知道汽车出、汽车进，养尊处优。你不能占着茅坑不拉屎。

（胡乔木出来解围说。《人民日报》曾经搞了个计划，组织过几篇文章，他因为没有把握，压下来了。这事不能全怪报社，他也有责任。）

毛泽东的怒气渐渐平息，就双百方针、知识分子问题和编辑工作谈了不少意见。

毛泽东说，百家者，两家而已；资产阶级一家，无产阶级一家。知识分子百分之七八十是处在中间状态的。争鸣，就是两家争取这中间状态的知识分子。

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可不可以批评？可以。我考虑过，如说对马克思主义的个别原理和个别结论可以批评，而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不可以批评，这样说也不好，所以我在报告中笼统地说对马克思主义可以批评。

知识分子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有人说资本主义私有制正在变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哪里还会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不，知识分子的毛可以附在资产阶级的皮上，也可以附在无产阶级的皮上。无产阶级给他们钱，让他教书、办报、做文艺工作，这是赎买他们，要他们转到马克思主义方面来。伯达同志说对知识分子和对资本家一样，也是赎买政策。不过对资本家可以公开这样说，对知识分子不能公开这样说。

现在的知识分子是“身在曹营心在汉”。他们的灵魂依旧在资产阶级那方面。《三国演义》说曹操是奸雄；不要相信那些演义。其实，曹营不坏，当时曹操是代表进步一方的，汉是没落的。

争取知识分子，用什么办法？一种办法是压，这不会使人心服。1953年统购统销时，党和农民的关系很紧张。现在，党和知识分子的关系相当紧张，知识分子魂魂不安。党内也紧张。还要继续紧吗？我主张松，这样他们就靠拢我们了，有利于改造，不能紧，越紧他们就我们的距离越远。

谈到报纸，毛泽东排了一个这样的名次：《文汇报》、《中国青年报》、《新民晚报》或者《大公报》、《光明日报》，最后是《人民日报》和各地党报。

当有人提出杂文难写的时候，毛泽东说，杂文要有，整个报纸文风要改进。杂文也可以写得全面一些。鲁迅的杂文就写得很全面。我辞去国家主席职务以后，可以给你们写一些文章。

邓拓说，主席想写杂文，《人民日报》可以辟一个专栏。

毛泽东说，我用自己的名字不方便，用笔名人家也看得出来，不好办。

在谈话中，毛泽东几次批评《人民日报》改出八个版这件事，说纸张紧张，为什么出那么多。有人支支吾吾地说，出八个版的事是中央同意过的。毛泽东问：中央是谁呀？答：请示过主席。毛泽东说，如果是那样，那是我说了昏话。我的很多话你们都听不进去，这件事就听进去了。¹

毛泽东对邓拓等人的批评带有嬉笑怒骂、讽刺挖苦、训斥的性质，根本没有体现他所提倡的实事求是和与人为善的作风，也不像一位领袖人物对下级的批评。毛泽东对邓拓的痛斥，不过是对梁漱溟批评的延续和发展，是轻视、歧视、蔑视、仇视和敌视知识分子心态的又一次大暴露。实际上，毛泽东把自己同知识分子的关系当作一种君臣关系、皮毛关系、主奴关系、猫鼠关系、买卖关系、利用与被利用的关系。当作一种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工具。这次谈话再一次印证了这一点。

总之，自从毛泽东1956年4月提出“双百”方针后，经过一年来对宣传、贯彻，取得初步成绩，在此过程中遇到来自‘左’的、右的干扰，经过毛泽东排除各种干扰，终于在1957年4月扭转阻碍鸣放的混乱局面。在知识分子中大多数人很快打消顾虑，积极参加鸣、放，参加整风。《人民日报》报道摘要如下：“新民报一位党外朋友说：过去有个朋友把百家争鸣比作捕鼠机，老鼠看见肉，伸出头来，就被捕鼠机扣住。在未到北京开会前，我也同意这个看法，但现在我是信服百家争鸣的政策了。”“北京大学哲学系自从提出争鸣方针以后，活跃多了。开了几门新课，像罗素哲学、黑格尔哲学。前些时还开了一次讨论会。这个讨论会规模不小，武汉、天津都有

¹ 转引朱正《1957年的夏季：从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河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47-50页

人来，会上争议很热烈。朱谦之原来准备发言三次，结果因说话的人太多，自己只发了一次言。经过争论，一些问题有了结论，大家思想都提高了。在12日除了讨论胡绳的中国哲学史问题和冯友兰的反驳文章外，还打算讨论一些有趣的题目：如老子、庄子的哲学是唯物的？还是唯心的？我们对道教和佛教如何评价？对王阳明的思想怎样评价？对王道霸道如何解释等。”¹

但也有人存在疑虑，费孝通在《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一文中就说，“对百家争鸣的方针不明白的人当然还有，怕是个圈套，搜集些思想情况，等又来一个运动时可以好好整一整。”²结果真是上了毛泽东的当。鸣放初期的积极分子，受到毛泽东表扬的人，像王蒙等，表扬过的《文汇报》总编辑徐铸成、《光明日报》社长章伯钧、总编辑储安平，在反右派斗争中都被打成右派分子。而被毛泽东多次批评的《人民日报》及其总编辑邓拓虽没有被打成右派，后来还是被毛泽东整死。反右派斗争后，“双百”方针受到严重干扰，从百家争鸣到只有两家，实际上只有一家独鸣。只有在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进行拨乱反正，恢复党的实事求是的传统，重申“双百”方针仍然是繁荣科学、文化、艺术的正确方针，这样才逐步摆脱“左”的错误的影响。

“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口号，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口号一样，它有一个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不过比“双百”的口号要早些，它是根据中国的具体历史情况发生、形成和发展起来的。“长期共存、相互监督”的方针也是《讲话》中的一个重要部分。

中国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的出现不是偶然的，而是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性质和中国资本主义没能得到充分发展情况决定的。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主要是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我党和各个民主党派民主人士，基于反帝爱国和争取民主的共同要求，经过长期的合作，终于先后形成和建立起来。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在政治上主要反映民族资产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同这些阶级相联系的知识分子的动向和要求，是这些阶级、阶层的政治代表。

毛泽东非常重视统战工作，1939年10月4日他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说，十八年的经验，已使我们懂得：“统一战线，武装

¹ 《人民日报》1957年4月16日

² 《人民日报》1957年3月24日

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大法宝，三个主要的法宝。”¹在这里，毛泽东视统一战线为战胜敌人的主要法宝之一。

1941年11月21日，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上的演讲》中提出同党外同志合作的思想，他说：“共产党员必须倾听党外人士的意见，给别人以说话的机会。别人说得对的，我们应该欢迎，并要跟别人的长处学习，别人说得不对，也应该让别人说完，然后慢慢加以解释。”“共产党员只有对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的义务，而无排斥别人垄断一切的权利。”“共产党这个同党外人士实现民主合作的原则，是固定不移的，是永远不变的。”最后谈到内外夹攻的方法，他说，“共产党是真心实意想办好事的。但是我们的毛病还很多。我们不怕说出自己的毛病，我们一定要改正自己的毛病。我们要加强党内教育来清除这些毛病，我们还要经过和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来清除这些毛病，这样的内外夹攻，才能把我们的毛病治好，才能把国事真正办好起来。”²

1948年10月15日，中共中央对“右派”和反动分子作了区分，提出对于右派只要基本上同意中国共产党的原则，保证中国共产党和进步分子在新政协和政府中占绝对优势，则让若干右派而不是公开反动分子参加，在策略上是必要的。³

1949年3月，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进一步把与党外人士合作作为党的决议确定下来，规定：“我党同党外民主人士长期合作的政策，必须在全党思想上和工作上确定下来。我们必须把党外大多数民主人士看成和自己的干部一样，同他们诚恳地坦白商量和解决那些必须商量和解决的问题，给他们工作做，使他们在工作岗位上有职有权，使他们在工作上做出成绩来。”⁴

李维汉回忆说，1949年9月，各民主党派同我们党一道参加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为人民政协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同我们党和其他各界代表人物一道参与讨论制定了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参加选举产生了中央人民政府，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光荣诞生。各民主党派领导人分别

¹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版，第597页

²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631-632页

³ 《红色记要》，西苑出版社2000年版，第334页

⁴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438页

参加了中央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的工作，担任了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委员，政务院副总理、政协委员，一些部、委的部长、主任和许多部的副部长，以及省、市人民政府的重要领导职务。所有这些，标志着民主党派地位的根本变化。他们不再是旧中国反动政权下的在野党，而成为新中国人民民主专政政权的参加者，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和共产党一道担负起管理国家和建设国家的历史重任。从此，各民主党派走上了新的历史道路。

新中国成立后，共产党对民主党派的总的方针，是帮助他们团结、进步和发展，在国家政治生活和祖国建设事业中同他们真诚合作，充分发挥他们的积极作用。党对民主党派采取这样方针的依据主要是：（1）他们有一定的社会基础，主要的就是民族资产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同这些阶级相联系的知识分子；（2）有合作的历史。他们在民主革命时期同我党合作多年，对革命作出了贡献，在新中国成立后，他们宣布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共同制定了《共同纲领》；（3）有作用。在团结和改造民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以及其他爱国民主分子的工作中，他们发挥重要作用；（4）有人才。他们之中有许多知识分子，有不少专家、学者，是经济建设、文化建设事业不可缺少的人才；（5）具有国际影响。在共产党领导下实现多党合作，有利于国际统一战线的发展。¹

1950年6月23日，毛泽东《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的闭幕词》指出党和党外人士长期合作的方针，他说，“只要谁肯真正为人民效力，在人民还有困难的时期内确实帮了忙，做了好事，并且是一贯地做下去，并不半途而废，那么，人民和人民的政府是没有理由不要他的，是没有理由不给他以生活的机会和效力的机会的。”接着指出：要巩固和扩大统一战线和采取民主方法，他说：“我们必须团结各民族、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一切爱国民主人士，必须巩固我们这个已经建立的伟大的有威信的革命统一战线。不论什么人，凡是对这个革命统一战线的巩固工作有贡献者，我们就欢迎他，他就是正确的；凡对于这个革命统一战线的巩固工作有损害者，我们就反对他，他就是错误的。要达到巩固革命统一战线的目的，必须采取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毛泽东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方法，是推动大

¹ 参见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版，第693-694页

家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很好的方法，是人民国家内全体革命人民进行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的惟一正确的方法。”¹

1956年9月15日，毛泽东在八大开幕词中说：“我们还必须继续加强各民族、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团结，继续巩固和扩大我们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必须认真纠正任何工作环节上的任何一种妨害党同人民团结的不良现象。”²

以上说明了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极端重要性，在革命和建设中的重要地位。

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论十大关系》讲话，在党与非党的关系方面吸取苏共一党专政的教训，明确提出“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他说：“究竟是一个党好，还是几个党好？现在看来，恐怕是几个党好。不但过去如此，而且将来也可以如此，就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³

谈到为什么民主革命胜利后留下民主党派时，毛泽东说，“在我国内，在抗日反蒋斗争中形成的以民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为主的许多民主党派，现在还继续存在。在这一点上，我们和苏联不同。我们有意识地留下民主党派，让他们有发表意见的机会，对他们采取又团结又斗争的方针。一切善意地向我们提意见的民主人士，我们都要团结。”“就是那些骂我们的……我们也要养起来，让他们骂，骂得无理，我们反驳，骂得有理，我们接受。这对党，对人民，对社会主义比较有利。”⁴

说到民主党派，实际上是程度不同的反对派，毛泽东说：“中国现在虽然还有阶级和阶级斗争，就不会没有各种形式的反对派。所有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虽然都表示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但是他们中的许多人，实际上就是程度不同的反对派。”总之，“他们是反对派，又不是反对派，常常由反对走到不反对。”⁵显然，这种反对派与西方议会中的反对党，迥然不同。据李维汉回忆：“毛泽东在党与非党关系方面，提出‘两个万岁’的思想，他说我们的方针是要把民主党派、资产阶级都调动起来。要有两个万岁，一个

¹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7-28页

² 《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115页

³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78页

⁴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78-279页

⁵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第94-95页

是共产党万岁，另一个是民主党派万岁，资产阶级不要万岁，再有两、三岁就行了。”¹

上述的思想观点，就是后来概括的党同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这个方针既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的多党制，又不同于苏联的一党制，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以后毛泽东更系统更全面阐述了“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这个方针。

1956年9月25日，毛泽东同拉丁美洲一些党代表谈话中介绍，利用民族资产阶级的经验，他说，“民族资产阶级是我们的冤家。中国有句俗话：‘不是冤家不聚头’。中国革命有一条经验，对付民族资产阶级要谨慎。”“在反帝反封建的任务基本完成以后，在一定时期还要和他们保持联盟。这样做，有利于对付帝国主义的侵略，有利于发展生产、稳定市场，有利于争取和改造资产阶级知识分子。”²

11月15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资产阶级反对大民主时，他说：“现在，民主党派、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的大民主。再来一个‘五反’，他们是不赞成的。他们很害怕：如果搞大民主，民主党派就被消灭了，就不能长期共存了。教授是不是喜欢大民主？也难说，我看他们有所警惕，也怕无产阶级的大民主。你要搞资产阶级大民主，我就提出整风，就是改造思想。把学生们通通发动起来批评你，为各学校设一个关卡，你要过关，通过才算了事。所以，教授还是怕无产阶级大民主的。”³

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11次扩大会议上的《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讲话提纲）中系统的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问题，谈到：“统一战线，长期共存，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治病救人，反对形而上学、教条主义——联系起来。”⁴

在《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讲话中讲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这个问题时。他说：“这个人民内部的矛盾，列宁不是说过吗，人民内部是有矛盾的，社会主义社会对

¹ 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下，第813页

²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09-310页

³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26页

⁴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第313页

抗消失了，矛盾存在着……应该肯定。社会主义社会矛盾是存在的，基本的矛盾……就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这些矛盾都是表现为人民内部矛盾。”“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这几个口号是怎样提出来的？就是承认社会上各种不同的矛盾。”接着指出：“我们许多干部中间，实际上不赞成中央的方针——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这个方针。”¹

还指出：“戴着马克思主义帽子的花草，有时不见得是真正马克思主义者，斯大林是七分马克思主义者，三分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有三分资产阶级，七分马克思主义。这些基本的道理，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是跟不同的事物作斗争。在一块相互批评，在批评斗争中才能发展。现在我们的同志把这些观点联系不起来，不晓得讲了多少次，多少年。统一战线，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反对形而上学，反对教条主义这一套，一等到写文章、演说，开会作议论的时候统统忘记了，没有治病救人的意思，没有帮助别人的意思，一棍子打倒。”²

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结束语》中回答了“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问题。回答说：“有人说我讲的不 够。讲的这种也是一种批评，前天没大讲这个问题，今天有朋友讲到咯。什么叫长期？我想这个问题答复比较容易，长期就是你共产党有多长，他就有多长，就是照办了。共产党有多少寿命么，就是民主党派有多少寿命。”“如何监督？就是属于批评、建议，用这些方法监督嘛。我们有各种机会嘛，比如今天就是机会，还有各种机会进行批评，主要的方法就是批评，批评缺点，从团结的愿望出发，通过批评达到团结，把工作改善。”³以上简要谈到毛泽东的统一战线思想、“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方针的提出、形成和发展过程。

待到1957年6月19日，这正是反右派斗争走向高潮的时候，毛泽东在修改后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说：“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长期共存，这是我们的愿望，也是我们的方针。至于各民主党派是否能够长期存在下去，不是单由共产党一方面的愿望作决定，还要看各民主党派自己的表现，要看他们是否取

¹ 《毛泽东思想万岁》1949.10-1957卷，第157，160页

² 《毛泽东思想万岁》1949.10-1957卷，第160页

³ 《毛泽东思想万岁》1949.10-1957卷，第157，160、167页

得人民的信任。”接着指出：“所谓互相监督，当然不是单方面的，共产党可以监督民主党派，民主党派也可以监督共产党。为什么要让民主党派监督共产党呢？这是因为一个党同一个人一样，身边很需要听到不同的声音。……但是有了民主党派，对我们更为有益。”¹这段话是在反右派斗争期间说的，事实上已把各民主党派看成是民族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的政党。这样的‘互相监督’根本谈不上，实际上名存实亡。

1957年4月26日，《人民日报》根据毛泽东对“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方针的精神，撰写题为《从各民主党派的会议谈“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社论。社论说：“去年（1956年，引者）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巨大胜利，改变了我们国家的整个面貌，也加速了各民主党派的进步。在这种新的形势下面，我们的党提出了‘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这个方针对各民主党派给了极大的鼓舞，因而它们的工作更积极起来，作用更加显著起来。”接着说：“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这个方针既然已经得到各民主党派的热烈拥护，推动了各民主党派的进步，并且在我国的政治生活中发挥积极的影响，那么，这个方针毫无疑问地应该长期贯彻执行下去。为了贯彻执行这个方针，各党派都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让所有的共产党员，首先那些负责的共产党员，都懂得这个方针，都去积极地坚决地执行这个方针。”

社论继续指出：“‘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一样，是我们党在新的形势下提出的长期的根本方针，而不是什么权宜的手段。”“‘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就可以使我们更好地团结和帮助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发挥他们的积极作用，使我国的社会主义民主更加发展。”“为了及时地发现和克服我们的缺点和错误，我们就不能不要求人们对我们党监督。当然首先需要党内广大党员群众的监督，需要来自广大劳动群众的监督；但是在同时，我们也需要来自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监督，因为他们代表了社会上一个方面的意见和要求，并且他们有一定的政治经验和业务专长，往往能够提出中肯的意见和批评。”

最后说：“为了真正做到‘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我们更要充分尊重各民主党派的独立、自由和平等。凡是各民主党派内部的

¹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94-395页

事务，应该由各民主党派独立地自由地去处理，我们不应该加以任何干涉。当然，不应该把对各民主党派独立平等地位的尊重，同我们党在全国政治生活中的领导作用对立起来。我们党的许多重大方针政策，从制定到执行都同民主党派进行了协商。”“这样就可以做到既不妨碍工人阶级的领导，又能发挥各民主党的积极性。”“我们都愿意同各民主党派共勉，进一步贯彻‘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为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而努力。”¹

综上所述，“长期共存、相互监督”方针的提出、宣传、贯彻和执行是统一战线这个法宝的具体化、长期化，是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一项具体措施，从理论上说为实现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积极参政、议政提供较为宽松、和谐的政策环境，为实现“双百”方针提供便利条件，为实现团结、教育和改造知识分子创造宽松和谐的环境。但后来非但没有很好地落实，反而成为“引蛇出洞”的陷阱。

毛泽东自1956年4月25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以苏联的经验为借鉴，总结了我国的经验，论述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十大关系。称《论十大关系》到1957年初，在党的会议上发表许多讲话，特别在有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参加的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以及破例地邀请160多位党外人士参加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毛泽东在会上发表了讲话。在宣传工作会议期间，还同文化教育界人士座谈，发表了许多谈话，回答了各界人士提出的问题。这些讲话，谈话和调研一时为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创造开明、开放、宽松、和谐和民主的环境与气氛。

毛泽东还不辞劳苦亲自去天津、山东、上海、南京部队、江苏、安徽、杭州等省机关党员干部会议上深入细致阐述，宣传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的问题，解答各种问题，打通高级干部的思想，解除他们的顾虑。1957年4月19日，毛泽东以中共中央的名义起草了一个党内指示，要求限期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讨论和执行情况报告中央。指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各地正在讨论。请将党内外赞成、反对两方面的意见，你们自己的意见，你们对整个形势的估计，地、县两级态度如何，你们委员会和书记处或党组是否深刻地多次地讨论了这个问题；第一书记和中央一级党员部长或副部长（指党外人士当部长的那些部）是否自己将这个极

¹ 《人民日报》1957年4月26日

重要的思想政治工作问题认真抓起来了，还是依然委托二、三把手去管，自己仍和过去那样不大去动脑筋；第一书记和各书记和各党员部长或副部长将报纸刊物和学校管起来没有，看过报纸刊物上有关这类问题的文章没有，重要社论在发表之前你们看过没有，动笔修改过没有；党和党外人士（主要是知识界）间的不正确的紧张气氛是否有了一些缓和，你们对人民闹事采取了什么态度；党内某些人中存在的国民党作风（即把人民当敌人，采取打击压迫方法，所谓人民民主，所谓群众路线，所谓和群众打成一片，所谓关心群众疾苦，对于这些人说来，只是骗人的空话，即是说党内有一部分人存在着反动的反人民的思想作风）是否开始有所变化；你们向学校学生和工厂工人做过讲演没有，做过几次，效果如何，以上各项问题，请即写成报告，在接此电报以后十五天内用电报发来。北京各部门的报告，用书面送来。¹这样很快全国掀起了学习、贯彻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热潮。其目的是要高级干部们接受和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观点，即为贯彻“双百”方针、“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方针和整风大造舆论准备，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尽快地使我国建设成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这是全国人民所希望的。这就是整风、反右派斗争前，毛泽东所创造的舆论、思想理论的背景。

第三节 整风运动

毛泽东总结斯大林的错误、波匈事件和国内出现的某些不安定因素，对社会主义进行新的探索，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学说，以期用整风运动的形式来克服、解决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于是1957年5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整风运动的通知，那是整风运动的正式展开。实际上整风运动早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提出后就已经开始，那时叫做鸣放。鸣放是整风运动的初期阶段，整风运动开始，号召人们大鸣大放。在这种鸣放和大鸣大放过程中必然放出各种各样意见，也就是毛泽东所说的，香花和毒草同时并长。这样，党一方面要对正确的意见进行接受，即整改，另一方面要等待对当局来说是错误的东西，让它们出笼，然后进行反击。从而在这个鸣放过程中形成正确意见与错误东西两者交织的局面。这样就形成整风与反右因果互动的关系。这两件大事，对以后政治生活产生重大

¹ 转引《党的文献》2002年第6期，第19页

深远的影响。

一、整风运动的提出

早在延安时代党内就开始过整风运动，建国后也进行几次小整风，都取得不同的效果。1956年，毛泽东又提出整风，这是在新形势下出现新问题时所采取的措施。1957年2月27日，3月12日，他作了《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讲话、《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全国贯彻执行这两个《讲话》精神的时候，整风运动实际上已经开始，这不过是整风的准备阶段。5月1日，正式发出整风运动的指示，规定整风达到的目的，制定整风的策略和方法，于是，整风运动就逐步展开。

1957年的整风运动是毛泽东延安整风思想的继续和发展，它经历了一个酝酿、准备的过程。

1956年8月30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预备会议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这次大会应当继续发扬我们党在思想方面和作风方面的优良传统，把主观主义、宗派主义这两个东西切实反一下，此外，还要反对官僚主义。”谈到斯大林为什么犯错误时，他说，“就是在一部分问题上他的主观跟客观实际不相符合。现在我们的工作中还经常有许多这样的事情。主观主义就是不从客观实际出发，不从现实可能性出发，而是从主观愿望出发。”“要根据我们过去的经验，批评那些不符合实际的观点，批评这个主观主义，打击这个主观主义。这个任务，早几年我们就开始提出来了。现在，我们反对的是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主观主义。”“过去，在民主革命中，我们受主观主义的害时间很长，受到很大的惩罚……经过延安整风，着重调查研究，从实际出发，才把这个问题搞清楚。”¹在这里，提出要批评、打击主观主义。

11月15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首先提到反对官僚主义，他说，“大民主也可以用来对付官僚主义者”，“有些人如果活得不耐烦了，搞官僚主义，见了群众一句好话没有，就是骂人，群众有问题不去解决，那就一定要被打倒。”“现在，有这样一些人，好象得了天下，就高枕无忧，可以横行霸道。这样的人，群众反对他，打石头，打锄头，我看是该当，我最欢迎。而且有些时候，只有打才能解决问

¹ 《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296-297页

题。”“我们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长官僚主义作风，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谁犯了官僚主义，不去解决群众的问题，骂群众，压群众，总是不改，群众就有理由把他革掉。”“我们准备在明年开展整风运动。整顿三风：一整主观主义，二整宗派主义，三整官僚主义。”“预先出告示，到期进行整风，不是‘不教而诛’，这是一种小民主的方法。”“整风是在我们历史上行之有效的方法。以后凡是人民内部的事情，党内的事情，都要用整风的方法，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来解决，而不是用武力来解决。”¹在这里，提出用大民主来打倒官僚主义。

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11次（扩大）会议上的讲话（发表时作了若干修改补充）中谈到整风方法问题，他说：“在1942年，我们曾经把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这种民主的方法，具体化为一个公式，叫做‘团结——批评——团结’。……按照我们的经验，这是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一个正确的方法。1942年，我们采用了这个方法解决共产党内部的矛盾，就是教条主义者和广大党员群众之间的矛盾，教条主义思想和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之间的矛盾。‘左’倾教条主义者从前采用的党内斗争方法叫作‘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这是一个错误的方法。……从这个经验里，我们找到了一个公式：团结——批评——团结。或者说，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全国解放以后，我们对民主党派和工商界也采取了‘团结——批评——团结’这个方法。我们现在的任务，就是在整个人民内部继续推广和更好地运用这个方法，要求所有的工厂、合作社、商店、学校，团体，总之，六亿人口，都采用这个方法去解决他们内部的矛盾。”²这是将整风方法从党内推广到全民中去。

3月8日，毛泽东在《同文艺界代表的谈话》中提出“整风、整主观主义，重心放在教条主义；整宗派主义，他们总是想一家独霸……；整官僚主义，多得很。”³10日，毛泽东在《同新闻出版界代表的谈话》中说：“我们要反对教条主义。我们过去用整风方式搞了好几年，批判了教条主义，独立自主地按马克思主义精神实质办事，才取得中国革命的胜利。”⁴

¹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25-328页

²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69-370页

³ 《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49页

⁴ 《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62页

1957年3月12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中央做出决定，做试验，明年普遍推行。党外人士自愿参加。整风的时候是要批判主观主义（主要是教条主义）。其次是整宗派主义，不以六亿人口和500万知识分子为范围来帮助、团结这些人，不从这个现实情况出发，就是宗派主义；再一个是官僚主义，现在官僚主义相当严重。”整风方法是，“研究文件，看点东西，自己有错误，有缺点，批评一下，不管什么人（包括中央委员）有错误缺点讲一讲，不用大民主，只用小民主，小组会上用小民主也可以，和风细雨，治病救人，反对一棍子打死人的办法。也就在整风中间，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向前推进一步。”“马克思主义一定要发展，不能停滞，不发展就没有生命力。基本原理原则不能违背，违背基本原则就是修正主义。但是停滞不前是教条主义。”¹

此讲话1977年公开发表稿说：“整风就是整顿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现在共产党中央作出决定，准备党内在今年开始整风。党外人士可以自由参加，不愿意的就不参加。这一次整风，主要是要批评几种错误的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一个是主观主义，一个是官僚主义，还有一个是宗派主义。”“我们所以要整风，现在要整风，将来还要整风，要不断地把我们身上的错误东西整掉，就是为了使能够更好地担负起……把我们这个经济落后，文化落后的国家，建设成为富裕的、强盛的、具有高度文化的国家……这项任务，更好地同党外一切立志改革志士仁人共同工作。”²

1957年3月18日，毛泽东在《坚持艰苦奋斗，密切联系群众》讲话中重申整风运动，他说：“我们党现在准备开展一次整风运动。整风是用批评和自我批评解决党内矛盾的一种方法，也是解决党同人民之间的矛盾的一种方法。这次整风，就是整顿三风，整顿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要经过整风，把我们党艰苦奋斗的传统好好发扬起来。”“因为革命胜利了，有一部分同志，革命意志有些衰退，革命热情有些不足……闹地位，闹名誉，讲究吃，讲究穿，比薪水高低，争名夺利，这些东西多起来了。”“总而言之，争名誉，争地位，比较薪水，比较吃穿，比较享受，这么一种思想出来了。”“革命意志衰退的人，要经过整风重新振作起来。”³

¹ 《毛泽东思想万岁》1949.10—1957卷，第257—258页

²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10—412页

³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19—420页

4月30日上午，毛泽东在颐年堂召开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二次会议，议题就是关于全党的整风运动。出席会议的有党和国家领导人和各民主党派负责人、无党派民主人士共44人。毛泽东讲话说：“几年来都想整风，但找不到机会，现在找到了。凡是涉及到许多人的事情，不搞运动，搞不起来。需要造成空气，没有一种空气是不行的。现在已造成批评的空气，这种空气应继续下去。这时提整风比较自然。整风总的题目是要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反对三个主义。”

中共中央指示中有一条特别的规定，就是要参加生产劳动。这并不是提倡在座的人都去耕田，主要是表明一种态度，要砍掉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加上一个参加劳动的办法。总的要同工人农民混在一起，多少参加一点劳动。群众对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讲的话，不会全是真话。尤其我们都是知识分子，同劳动人民格格不入。有种办法可以同他们一起，即多少参加一些劳动。

整风会影响党外。规定非党员自愿参加，自由退出。最近两个月就是这个方式，就是整风的办法。我攻你，你攻我，有意见就说，党内外打成一片，此即整风。已经整了两个月。

统战工作中的矛盾，几年不得解决。过去不好解决的原因主要是思想不通。过去是共产党员有职有权有责，民主人士只有职而无权无责。现在应是大家有职有权有责。现在党内外应改变成平等关系，不是形式上的而是真正的有职有权。以后无论哪个地方，谁当长的就归他管。

教授治校恐怕有道理。是否分两个组织，一个校务委员会管行政，一个教授会议管教学。这些问题要研究。由邓小平同志负责找党外人士和民盟、九三学社等座谈会，对有职有权和学校党委制的问题征求意见。

整风指示说到唯物辩证法。现在要搞政治关系，反对三个主义，不要钻到世界观、思想方法里头去，那些问题放在将来搞，这个问题会影响到民主党派、民主人士。我们不能企图很多人一下子都接受唯物辩证法、马列主义世界观。解决世界观问题是一个长期的问题。

社会大变动时期使知识分子吃了苦头，主要是社会科学方面的，这里有个经济基础的问题。过去五百万知识分子所依附的经济基础，现在垮了。有人说，私有制没有了，还有什么两面性呢？这是不对的。‘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现在五百万知识分子是吃工农的饭，吃国家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的饭。现在知识分子有些不自觉，他们

的墙角(经济基础)早已挖空了,旧的经济基础没有了,但他们的头脑还没有变过来。毛已经附在新皮上,但思想还是认为平均主义不好。马列主义世界观不要强迫人家相信,要人家相信,要有过程。

北京是个好地方,又是不好的地方。共产党的负责人每年要有四个月在外,八个月在北京。他们也可以这样做。中央机关的特点,一是空,二是全面。缺点就是空,一离开北京就舒服了。

毛泽东最后表示:明年二届人大,一定辞去国家主席,减少部分工作,以便集中精力研究一些问题。瑞士有七人委员会,总统是轮流当的。我们几年轮一次总可以,采取逐步脱身政策。不赞成也没办法,不能强加于人。如赞成,要透点消息出去,否则老百姓不了解。”¹毛泽东的讲话得到与会者的欢迎。据李维汉回忆说:“4月30日,毛泽东同志在天安门城楼约集各民主党派负责人举行座谈会,毛泽东在会议上说现在是新时代和新任务,阶级斗争结束,向自然界宣战。也讲了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问题。他着重号召民主人士揭露教育,卫生等部门的官僚主义。对高等学校的领导体制,毛泽东同志提出由邓小平同志负责找党外人士和民盟、九三等开座谈会,对有职有权和学校党委制的问题征求意见。毛泽东同志的讲话,鼓舞了党外人士向党提批评意见,帮助党整风的政治积极性。”²

在这个讲话里,毛泽东提出“教授治校恐怕有道理”的观点,并指示邓小平“就有职有权和学校党委制”去找各民主党派征求意见的作法,还有“总统是轮流当的”诸提法,在后来鸣放期间,根据毛泽东的上述观点发表:“教授治校”、“学校党委退出学校”、“轮流做庄”等意见的人,大都被打成右派分子。

以上可以看出,这次整风是经过较长时间准备,预先给全党同志打了预防针,让同志们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同时,各民主党派,广大知识分子和大学生遵循或根据毛泽东《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讲话》和《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以及4月30日的讲话精神以及整风运动指示,诚心诚意,深思熟虑认真负责满腔热情,积极地帮助党整风。毛泽东的讲话和整风精神表明了党要扩大和发扬民主,让人们敢于讲话,这是建国后发起的一次有限的民主运动,而且是具有反封建专制主义成份的运动。

1957年4月初,中央根据毛泽东多次谈话起草了《关于整风运

¹ 引自《党的文献》2002年第6期,第20页

² 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下册,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版,第831页

动的决定(草案)》，后来，中央又根据毛泽东的指示重新起草了《中央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初稿)》。4月27日，毛泽东为中央起草了《关于即将发出整风、党政干部参加体力劳动的指示和请各地分析研究党与人民群众各项具体矛盾的通知》，指出：整风“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发扬正确的思想作风，纠正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的错误的思想作风。”“要求各级领导机关和干部，着重检查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情况，检查对于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方针和‘勤俭建国’方针的执行情况，检查那些脱离工人群众、农民群众、士兵群众，学生和知识分子的官僚主义现象，检查那些不从团结六亿人民出发，不从团结各民族、各党派的广大的党外群众出发，不从团结全党出发的宗派主义，检查那些不从实际情况出发的主观主义现象。”¹

1957年5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现将这个指示精神摘录如下：

第一，指示提出整风的必要性：“几年以来，在我们党内，脱离群众和脱离实际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有了新的滋长。”因此，“有必要按照‘从团结愿望出发，经过批评和自我批评，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的方针，在全国重新进行一次普遍的、深入的反官僚主义、反宗派主义、反主观主义的整风运动。”

第二，指示明确整风运动的主题：“这次整风运动应当以毛泽东同志今年2月在扩大的最高国务会议上和3月在中央召开的宣传会议上代表中央所作的两个报告为思想指导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作为当前整风的主题。”“这两个报告的传达引起了党内党外的热烈讨论，就我们党来说，实际上，这就是整风运动的开始。”

第三，指示规定了这次整风运动的方针和原则：“这次整风运动，应该是一次既严肃认真又和风细雨的思想教育运动，应该是一个恰如其分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的运动。”“坚决实行‘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原则。达到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目的。”还规定：“非党员愿意参加整风运动，应该欢迎。但是必须完全出于自愿，不得强迫，并且允许随时自由退出。”

第四，指示提出领导干部参加体力劳动：“为了加强党同广大

¹ 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下册，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版，第830—831页

劳动人民的联系，彻底改变许多领导人员脱离群众的现象，在进行整风运动的同时，应该在全党提倡各级党政军有劳动力的主要领导干部以一部分时间同工人农民一起参加体力劳动的办法，并且使这个办法逐步地行成为一种永久的制度。”

第五，指示提出要贯彻整风工作两不误的原则：“整风计划应该贯彻整风和工作两不误的原则，并且必须使整风的进行同工作的改进结合起来，同人民内部矛盾的具体解决结合起来，防止关门整风，妨害工作”。¹

“5月3日，毛泽东在接见保加利亚军事代表团谈到整风运动时说，对党的缺点和错误，要公开在报纸上批评。要党内党外一块来，大多数知识分子和党外人士是和党一道的。共产党的缺点可以公开批评，人民政府的缺点也可以公开批评，要使公开批评成为习惯，言者无罪”。²

5月4日，《中央关于请党外人士帮助整风的指示》，指示主要精神如下：“最近两个月以来，在各种有党外人士参加的会议上和报纸刊物上所展开的，关于人民内部矛盾的分析对于党政所犯错误缺点的批评，对于党与人民政府改正错误，提高威信，极为有益，应当继续展开，深入批判，不要停顿或间断。”“现在整风开始，中央已同各民主党派及无党派领导人士商好，他们暂时（至少几个月内）不要表示态度，不要在各民主党派内和社会上号召整风，而要继续展开对我党缺点错误的批判，以利于我党整风，否则对于我党整风是不利的（没有社会压力，整风不易收效）。”“党外人士参加我党整风座谈会和整风小组，是请他们向我们提意见，作批评，而不是要他们批评自己。”³

5月10日，中共中央关于各级领导人员参加体力劳动的指示：主要精神：第一，有利于克服错误和改变轻视体力劳动的观念：“由于领导者参加生产劳动，同群众打成一片，有利于及时地、具体地发现和解决问题，有利于改进领导工作，从而可以比较容易地避免和克服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的许多错误，并且有利于改变社会上所存在那种轻视体力劳动的观念。”第二，发扬党的优良

¹ 《人民日报》1957年5月1日

² 李剑主编《关键会议亲历实录》上，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8年版，第251页

³ 参见叶永烈《反右派始末》，青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99—100页

传统：“我们面前的艰巨任务，是要把我国建设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的具有现代工业和现代农业的国家，要实现这个任务，就必须继续发扬我们党联系群众、艰苦奋斗的传统。各级的领导干部参加一部分体力劳动，使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逐步结合，就是发扬这个优良传统的一个制度，也是当前整风运动要求达到的一个目的。”请党外人士参加整风和要求党的各级领导人员参加体力劳动，这本身就有利于改善党群关系和领导与群众的矛盾，这是与以往整风的区别之处。¹

毛泽东极为重视整风，1957年5月14日，毛泽东写下《关于注意阅读整风消息的批语》：“少奇、恩来、陈云、小平，彭真同志阅。这一整版值得过细一看，不整风党就毁了。”这是从下面反应出来的“三害”的危害，强调整风的必要性和紧迫性。这个批语写在1957年5月10日上海《解放日报》第二版上。该报第二版以《大胆揭露矛盾，帮助党内整风》为题，整版刊登了座谈会的发言摘要。现将主要内容归纳如下：

第一，官僚主义方面：王浩川发言：几年来，作过很多次经验介绍，仿佛我校是专门制造经验似的。其实，问题也很多。首先，是我们的校长（也是党支部书记）站在云端上，只顾作经验介绍，而不抓学校内部的教学工作。其次对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更差。每逢开学，由教师各订计划，然后交流一番，至于学生实际存在的一些思想问题，从来不加以认真的分析、研究，只是到期末时，再要教师们“总结”。结果……有一个班级的一个学生，乱搞男女关系，而且连续偷窃校内外的东西，直到公安局依法来逮捕的时候，校方才知道。第三，“评优”工作中也缺少民主气氛。……“评优”工作做得这样糟，我们的校长还在区里介绍本校“评优”经验，说得头头是道哩。

陈绍元发言：谈三点：①领导对教学业务抓得不够。教学改革已经四年，校长到现在还讲“我是一个外行”。她每年到中央开会，回校后便照搬下来。今年中央没开会，校里的教学工作就没有很好安排。校长平时常在外面开会，很少和教师接触。②校内党政不分。党委委员中有三个是正副校长，因此党对行政不能起监督作用，党委和群众也很少联系。教师中的党员，极大部分是本校毕业的学生，

¹《社会主义教育课程的阅读文献汇编》第一编上，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58—60页

和中老年教师的联系也很差。③中等专业学校由高教部和业务部门双重领导，可是高教部只重视高等教育，业务部门又不管教育，因此，领导很薄弱。

赵宝礼发言：我是毕业班班主任。学生经常找我说：“你救救我们吧！”在这里，我要为他们呼吁。初三有12门功课，有些教材又重又深。每门课又抓得很紧，差不多每天有测验。……学生的担子已经很重了，但是因为毕业班，跟随毕业来的是升学、自学、劳动等问题，于是又得进行思想教育等工作。这些工作教育局要管，青年团要管，在学校里也是头头都要管，就管得学生更忙了，……我们班上就有两个学生有严重的神经衰弱症。医生要他们休息，有一个还死不肯休息。做班主任的对此感到很沉痛，我要叫：“救救孩子吧！”教师也是整天忙乱，兼职多，会议多，工作也多。我就是身兼十一职：校务委员，体协主任，班主任等等。职务一多会就多。这还不是个别现象……我也要叫：救救教师吧！

蔡大庆发言：我们的学校机构庞大，人事臃肿。全校有近千个教职员工，教员只有七十多个。科以上干部倒有一百多个。因为校长是局长级干部，校长下面设处，处长下面又设科；区里有分部，部主任下面又设队，有个队有四个队长，只有三个干事。我们学校是属财贸部，分管又归区委领导。事实上大家都不领导。校党委也是高高在上，每个分部都有党总支，队有党分支，但是群众都不知道支委是谁。有了福利就看到领导了。分房，处长、科长都搬进去住（他们本来都是有住房的）。评级也是这样，副队长以上干部不管德才资如何，普遍升级，到了下面就要实事求是。

第二，主观主义方面。赵宝礼发言：我们学校的党群关系也很不好。主要是党员的权威思想很严重，独断独行，不管下面行得通行不通，一个个命令往下发。比如工资改革，校委会和工会都不同意领导的做法，领导就是坚决不改。评选优秀教师也是这样。

翁世禄发言：在教育局的领导下，还出现了一些“宠儿”。这些学校在分配校舍、人事配备、使用修建费等方面都得到了优厚的待遇，而我们却像“童养媳”。

李子翁发言：领导作风生硬、粗暴、不民主，解决问题只跟少数干部商量。问题不能解决时，就推向教育局，不然就采取打击手段。有一位教师对工资改革不满。领导上却把他以前犯的错误，在办公室内大肆宣扬，并说，“你还有什么前途！”连学生都听到了，使这个教师消极苦闷。领导自认为有一套，但不敢明目张胆地独断

专行，找了一批干部来开会，却又不听干部的意见，仍一意孤行。

林炳彰发言：大家对领导偏听偏信，造成了“墙”，很有意见。教师们说领导只爱听几个人的汇报，不爱听群众意见，以致校内歪风上升，影响教师工作情绪。一个教师说，我有话不愿在小组会上讲，情愿在大会上讲，怕汇报的人走了样。本校有三个专业，只要上级一个指示，专业就有变动。有一回甚至是三天内变化了三次，使教师只好一再改行，手忙脚乱。

刘霞英发言：教育科对代课教师的态度可以说是“呼之即来挥之即去”。1955年我就要分娩了，教育科来通知一定要去代课，在下雪天滑一跤而早产。产后未一个月，又通知我到四川南路小学需要代课，我回答身体还未复原，他们说这是“缺额”代课，即代了一学期后可转正，我想了想就去了。搞了一学期工作后去教育科汇报，人事干事说现在奉局命令一概不吸收新人员。我说：“那么我不能转正了吗？”谁知这位干事马上脸孔一板，骂我：“原来你是找职业来的，你要明白我们这里是教育科，你要找职业到劳动局去找！”我写信给教育科说这位同志态度太欺人，教育科却说我想有问题。

第三，宗派主义方面。王浩川发言：很多教师对工资改革预先定好级别，讨论时草草收场不满意。在评级中，全校党员除一人以外，都是评的最高级，而工作质量与教龄都超过他们的非党员教师却大都偏低。在生活福利方面，不公平的事情也很多。如房屋分配，真正有困难的人得不到照顾，而暴跳如雷的人，或者是人事干部，却可以搬进新屋。校长搬进了新屋不算，还花了公家一百多元的装修费，据说这是有关组织同意的。

林炳彰发言：一位教师说，一个党员的假话胜过十个群众的真话。造成党群隔阂的原因是：过去运动中有偏差，党员对群众有猜疑；党群待遇不公平；党员工作简单化，只听上级命令，民主空气不够。个别党员有功臣自居的思想，以至造成群众对党不满。如何消除这种隔阂，我认为只有互相尊重，多交换意见，放下党员高人一等的架子。

吴蕴玉发言：我校党群之间有很深的鸿沟。在小学教师提升中学教师时，许多团员都提升，但有教学经验的大学毕业的中老年教师却升不上。群众提出了意见，一个领导同志说：“党团员是要培养的。”评级、选教研组长、工会干部时，行政看中的人，评得高的，就选得上。

韩雯发言：在党群关系方面：入党没有多久的支部书记，看见教师，脸闪过去，故意不理。

杨泽民发言：民主党派在学校里也是没有地位的，我们总想帮助领导搞些工作，但是无法插手……在“肃反”时期，还贴一张条子：“支部重地，闲人莫入”。平时大家也把支部看作神秘的地方，如果到党支部去说话，总是战战兢兢，心里别别跳。在“肃反”结束时，进行思想建设，结果是，自高自大……每个人帽子乱戴一通。

刘霞英发言：行政领导只听党团员意见。随便搞什么活动，都是党团员参加，群众挨不上。群众一提意见，就说“你有情绪”，“你有思想问题”。许多老年教师埋怨自己为什么早出世三四十年，不然现在也能争取入团入党，取得领导上的信任。¹

以上材料可以看出，无论从毛泽东等领导人指出许多高干存在着“三害”情况，还是从新闻媒体揭露许多大小干部存在着“三害”表现来看，都说明“党内有一部分人存在着反人民的思想作风，所谓人民民主，所谓群众路线，所谓和群众打成一片，所谓关心群众疾苦，对于这些人说来只是空话。党员不尊重党外人士，高人一等，盛气凌人，虽非全部，但甚普遍。这种错误方向，必须完全扳过来，而且越快越好。”²这充分说明了整风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总之，这次整风运动是吸取斯大林犯错误的教训和避免中国出现类似“匈牙利事件”，纠正党的干部“三害”作风的运动，因此，毛泽东采取党内党外两面夹攻的办法，要求各级领导认真学习、领会整风指导思想，学会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让各级干部参加体力劳动的措施等，希望纠正、克服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的作风。这是整风的初衷，是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初步尝试，客观上具有反封建专制和封建思想残余（其实“三害”作风本身就是封建主义思想和行动的表现）性质。

二、鸣放的形式

毛泽东把“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不仅仅看作是“使科学和艺术发展的方法，而且推而广之，也是我们进行一切工作的好方法，³也就是说，从1957年3月起，毛泽东把“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作为好方法引入政治思想领域。中央各职能部门采取各

¹ 参见《大胆揭露矛盾，帮助党内整风》，《解放日报》1957年5月10日

² 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56页

³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15页

种手段、各种渠道让对建国后一系列政治思想批判运动中挨整的和未挨整的知识分子打消顾虑，组织、动员、启发知识分子鸣放，请他们参加帮助党整风。毛泽东、党中央责成各职能部门采取座谈会、约稿、走访、大字报等多种形式进行鸣放，这些鸣放形式很有效，使广大知识分子在这些形式中道出了他们的意见。现在就主要形式介绍如下：

中央统战部从5月初至6月初，分别召开了两个座谈会，一个是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开了13次，共70余人次发言；一个是工商界人士座谈会，开了25次，共108人次发言。与此同时，国务院各部门的党组、党委，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和一些高等院校党委，也都相继召开了党外人士座谈会，请他们帮助党整风，请客人给主人提意见。

中共中央统战部邀各民主党派负责人举行座谈会。《人民日报》编者按：“在整风运动开始以后，党组织更应该继续征求党外人士的意见，不只可以邀请他们开座谈会，请他们畅所欲言地对工作中的错误缺点提出批评，而且还可以采用个别谈心的办法，更充分地听取党外人士的批评和意见。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5月8日开始邀集各民主党派的负责人对统战工作提出意见，这是请党外人士帮助我们整顿作风的好办法。”¹从这里看出：《人民日报》不仅肯定座谈会这个形式，而且还肯定个别谈心的办法，帮助党整风。

座谈会开始后，统战部部长李维汉说：“召集这个会的目的，就是请大家帮助我们进行整风，帮助我们改正缺点和错误，通过统一战线的方式来推动我们整风，这在我们党的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因此，希望大家多发表一些批评意见。”《人民日报》从5月9日、10日、11日、12日、14日、16日、17日报道了座谈会的情况。李维汉部长最后说，到今天为止，座谈会已经开了七次，有三十六人发言，对全国整风运动起了推动作用。从明天起，这个座谈会将休会几天，成立一个小组，把大家所谈的问题加以排队，准备以后继续开会。²从5月21日起，中共中央统战部邀民主党派负责人继续举行座谈会，直到6月3日下午结束。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部长李维汉在会上讲了话。“我们的座谈会从5月8日开始到现在，举行了十三次，有七十多位朋友讲了话。大家的讲话接触了国家政

¹《新华半月刊》1957年第11号，第17页

²《新华半月刊》1957年第11号，第35页

治生活和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许多重要问题，提出了许多批评和意见。这些都在各报发表了。中共中央十分重视这些批评和意见。”“总的说来，从各方面提出的批评和意见，我们认为有很多是正确的，应该认真地加以接受和处理；有相当一部分是错误的，还需要进一步加以研究和分析。”¹

5月15日，中共中央统战部和国务院第八办公室联合召开工商界座谈会。会议由李维汉主持。参加出席的有正在北京参加全国工商联秘书长会议的各省市代表，全国工商联和民主建国会主要负责人等。以及北京、天津两个市工商联的主要负责人。座谈会从5月15日到6月8日结束。李维汉作了总结发言：说：“这个座谈会有它的特点：第一，从5月15日起到今天举行了二十五次座谈会，讲了话的有108位，可以说：会开得相当热烈，话讲得相当充分。第二，参加座谈会的包含了各方面的朋友，有大、中、小各个类型和妇女、青年、资方代理人等等工商业者，有工商联、民建会地方组织的负责干部，有全国工商联和民建会中央的常务委员，这就使得这个座谈会上提出的问题、批评和意见比较广泛，比较能够反映各方面的情况。第三，座谈会在某些带根本性的问题上展开了热烈的辩论，对明辨是非起了重要作用。”“这个座谈会应当说是开得好的，对我们党的整风有很大帮助，对于继续贯彻工商业者的社会主义改造也有很大帮助。”最后评价说，“座谈会上提出和接触到的批评和意见，大多数是正确的，是善意的；有一部分是错误的，其中一部分错误的性质是严重的。”²

从5月4日到23日，《光明日报》编辑部在九大城市召集座谈会。

当时作为民主党派中央报刊的《光明日报》，“积极贯彻落实中共中央提出的请党外人士帮助党整风指示。座谈会的中心题目和要求：一是集中反映各民主党派人士和高级知识分子代表人物对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意见，对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意见和要求；二是从当地的具体情况出发，通过对某些典型问题和典型事件的揭发和讨论，提出各地对解决当前存在着各种主要矛盾的意见；三是希望参加座谈会的同志根据“放”的精神，彻底敞开，畅所欲言地提出问题，发表意见、批评

¹ 《新华半月刊》1957年第12号，第30页

² 《新华半月刊》1957年第13号，第66页

和建议。”¹这是自投罗网，愿者上钩的座谈会。

除上述几个主要单位之外，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国务院机关、各部委，高等院校、科研机关等等都相继召开了鸣放座谈会。总之，座谈会形式最大的好处就在于它的直接性和真实性，使领导者，当事者直接听到批评者、建议者的真实意见或要求；就在于主持者事先有计划、有目的、有选择的邀请与会者，做到心中有底、有的放矢，摸到真实情况，记录在案，成为日后整改的依据和整人的文字证据。

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重要报纸派出记者走访知名人士、学者，专家，希望他们谈谈对整风、鸣放发表感想。这种走访知名人士、学者、专家谈话或请他们写文章，主人到客人家里收集意见，这是鸣放的一种形式。

1957年5月16日，《人民日报》记者走访北京政法学院院长钱端升先生。钱先生认为：一是有些党员干部遇事同党外人士商量不够，一是对于老的司法人员和老教授缺乏必要的信任和尊重。他举出两个例子。一个是关于商量不够的。比如，我兼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法案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因不是专职就过问的较少，党员负责同志的确辛辛苦苦地做了许多具体工作，在工作方法和原则等问题上也没有很好商量，连刑法总则草案最近是否提出一事，我还是从另外一个干部口中知道的。再一个是关于对老教师不大信任，楼邦彦教授在北京政法学院时，钱先生曾提出让他担任一个教研室副主任，但前后说了三次才得到解决。钱先生认为学校中实行党委制，易使学校的领导搞两套：一边是党委会，一边是校务委员会一类机构，势必使几个党员负责同志多做许多重复的工作，浪费很多时间。因此他认为：“学校可以不要党委领导，而由校务委员会领导，这样省事得多。学校党的领导同志总得对党员和非党人士担负起政治思想领导，所以不要党委制并不说党不领导了。”记者访问人大教授李景汉先生。他认为“共产党今天是个执政党，他们把自己看成为特权者，这是当然的事。同时，他们又是整人的、改造别人的人，这无论从三反、五反和肃反运动看，都是这样。但是现在，忽然要来一个运动，要从前的改造者、执政者来接受被整人的意见，接受批评，这实在是反常的事，从古今中外看，那一个执政者会这样做呢？正是由于事实上的党的伟大的光辉的照耀，使他能长期的沉

¹ 转引朱地《1957年，大转弯之迷》，山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28页

默之后，重新唤起科学家特有的坚定的毅力来夜以继日的辛勤地劳动着。对于知识分子的遭遇，李先生打了个很有趣的比喻，在争鸣前，一切压力对他们来说，好比是缠了足，封了口，如果开口，就要人云亦云。现在的‘放’就是放足，刚一放足，走路当然是不很自然的，所以，在争鸣中有一点偏差是不可避免的。有人认为现在看不见争鸣的成绩，那是太性急了。但是也有一些党员同志像陈其通等很害怕放，他们认为一放，好像党的威信就没有了。但在李先生看来恰恰相反。他认为，如果放足，就彻底把它放成天足，这样才可以把我国的科学推进到世界水平，也大大提高了党的威信。”记者访问北师大陈友松教授。陈先生说：“年轻教师和助教们至今和老教授们还是貌合神离，教而不助的（也有例外）。例如有一位青年教师（团员），在儿童时代曾至少受到了某老教授的一照拂，可是到北师大后‘六亲不认’。现在听说他入了党（要转正），我才理解她为什么碰着我，不加理睬了。我们对助教的分配和提升以及留学等等一切都不能过问，当然他们只有把我们当希腊时代的‘教仆’看待了。我们认为向科学进军不能只靠一些子弟兵，还要多有一些识途的老马。师大党委的民主作风不够，集中多于民主。特别表现在教授们的下情不能上达。教授们不能参加学校政策方针的决定，他们表示被隔在四层楼板之下（指党委会，校务会议，系行政会议，教研组核心组会议）。他们都有工作不愉快之感。因此在高师系统中也要求迅速地实现在党委会领导之下的教授治校制度。”记者走访北京大学教授周辅成先生。周先生说：“‘百家争鸣’提出后，解除了我们怕犯错误的顾虑。马列主义是正确的，我是拥护的，但为什么又会害怕犯错误呢？他自己回答道：‘这是因为我们旧知识分子很害怕自己学术上的错误被人误认为政治上的错误，像处理胡风分子一样地来处理。所以长期在学术上不想钻研。抱着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思想。’“做学问当然就不能深入，不敢有创见了。”“可是，反对教条主义的问题提出后，跟着又来了反对修正主义。我们又产生了一种害怕心理，有些问题还是不敢说。比如，马列主义明确承认绝对真理的存在，自由和必然是统一的；但我们宁肯多谈相对真理，不敢多讲绝对真理，宁肯多讲必然，不敢多说自由。在个性和阶级性问题上也是一样，宁肯多讲阶级性不敢多讲个性。想这样可以避免误会。修正主义和创造性的见解，二者之间的区别好像又没有一个客观标准。同意你看法的人说，这是创造性的见解，但反对你的人又可说这是修正主义。其实，当时并没有出现什么修正主义，

中国没有这种传统，过虑修正主义只是限制的思想解放。有了修正主义之后，再提反对修正主义也还不迟。”¹

1957年5月17日，《人民日报》报道了新华社记者访清华大学副校长钱伟长教授。钱教授说：“我是老清华了，一向是敢说敢做的，但是这些年来，当家做主的味道越来越稀薄了。许多事情还想插手，但是做不了主，因为另外有一条线（指党的工作）总是比你走得快。”“在高等学校究竟依靠谁呢？应该主要依靠老教授”。他认为，不仅清华如此，目前全国高等学校对老教授的作用和积极性的估计不足是个普遍、严重的问题。”²

这种由记者采访和组稿的形式，先面对面交谈、引导、提示、提问，记者记录在案，然后由被访者写成文章，由记者去发表或报道，这种形式收集到的意见具有直接现实性、条理性，具有较高质量和史料价值。但这种有重点走访涉及面太窄，也有一定的局限性。不过，走访来的材料却为后来整人提供文字证据。

大字报大辩论的形式是表达民意的一种形式，是发扬民主的一种体现。1957年5月19日以后，北京大学的大饭厅、宿舍贴满了学生帮助校领导整风的大字报，其内容揭露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教条主义意见以及历届政治运动所遗留的问题，提出许多有建设性的意见，到5月22日晚上，全校贴出大字报达500余张。这是大学生积极主动关心党和国家大事的一种表现。

在鸣放形式中，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学生林希翎在北大演说、辩论，最后形成题为《我的思考》的书面意见，现在重点介绍一下：

（一）社会制度问题。社会制度问题，实际上是基础与上层建筑矛盾问题。社会制度应分两部分，即基础和上层建筑，我国的经济基础现在基本上是公有制，这是不可动摇的，从发展的观点上看，它比私有制前进一步，所以有人提出定息20年应该坚决反对，因为这是私有制的继续，取消定息的时机完全成熟，应该成为公有制。我国上层建筑的某些部分不能适应公有制的经济基础。“三害”的根本原因，就在于上层建筑的某些政治制度不好，不适合公有制经济基础的缘故。目前我国哲学、文学、艺术各领域都表现出教条主义非常厉害。政治制度不是抽象的，我想谈一些具体的制度，如人事制度，等级制度，保密制度扩大化，特别是产生官僚主义的重要

¹ 《人民日报》1957年5月16日

² 《人民日报》1957年5月17日

原因是官僚机构。

人事制度不合理现象、宗派主义反映在此明显，并不是以德才衡量一个人，而是看资格，看是否是党员、团员，许多不合理的现象，不仅要看到现象本身，而且要看这些现象的怂恿者和产生这些现象的条件。有些党员是为了享受特权，而跑到党内，不入党就没有出路。有人叫我入团，说你不入党入团，你的前途、婚姻、地位如何解决，我听了很生气，要这样我一辈子也不入团。

等级制度。干部发桌子、纸篓都分等级，等级制度已深入到各个方面……产生三害的原因是等级制度、人事制度与保密扩大化，这些小的制度（等级、人事、保密扩大化）组织了总的制度，具体制度本身产生了三害，这些制度和公有制是根本不适应的，是私有利的产物。

我国教条主义的统治在这些方面只是宣传光明的一面，现在有些人还说夸大黑暗面，有人说：“我们的现实生活是这样的吗？”这样使单纯的青年到了社会，看到这些问题会大吃一惊，甚至会苦着脸而消沉下去了，教条主义害人一点也不奇怪。

基础改变但思想意识仍是以前的，三害和过去的封建性、买办性、法西斯性有关，如宗派主义和封建性、法西斯性有联系，教条主义与买办性有关，买办是媚外崇美，对苏联的学习也是如此，当然苏联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中苏友谊不可破，但把苏联东西乱搬就太教条主义。有人说：“人民大学是教条主义大蜂窝”，我看“是教条主义策源地、大本营。”苏联是教条主义策源地。老师讲话就像个打字机，苏联医学就未超过中国的协和，组织疗法害人不少，无痛分娩法现在也不用了，这都是由于处在迷信的状态。

我不赞成改良主义思想，资产阶级思想还存在，封建思想、法西斯思想、甚至奴隶思想也出现了，要在巩固基础条件下彻底改革政治制度，中央现在也认识到这点，如现在的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相结合的根本制度，但这不是唯一方法，这不是根本解决，群众不一定是需要他们来干活，而是需要他们来办好事，当然整风是良好的开端。

（二）关于统治阶级的局限性。统治阶级都有共同的局限性，这是一个客观规律。对现在社会主义制度，这个局限性如何理解？在社会主义社会，这个规律是仍起作用的，当阶级存在时仍起作用。不过在社会主义社会这个规律可以被别人来利用，存在克服这个规律的可能性，但这可能性变成现实性是要有主观能动性，在许多条件

中政党起决定性作用。

现在社会主义社会，工人阶级与广大人民利益是一致的，但也有人民内部矛盾，表现在统治与被统治之间（领导与被领导），我认为领导与被领导就有矛盾，统治与被统治的地位不同，看问题角度不同、利益也不同。

在青年报上有文章说小资产阶级看问题有偏见，会发生匈牙利事件，害怕小资产阶级片面地反对官僚主义。我看只要有良心有正义感的人都有偏见。主席没有偏见还革不了命，赫鲁晓夫的报告没有偏见吗？工人罢工没有偏见吗？工人最有偏见；工人对不合理的事情非常不满。我国五亿多小资产阶级，五亿人不反对官僚主义，什么人反对官僚主义呢？五亿小资产阶级总比官僚主义好的多吧，五亿人总是宝贵的，除开五亿，剩下一亿，这一亿中真正的产业工人没有许多，工人和小资产阶级有很多联系，这样归根到底只剩了领导者。这个论调等于不让大家反官僚主义，我说：反官僚主义人人有责，甚至是反动的人。

（三）关于“对现实不满”。对现实不满，我认为是一个好现象，应该鼓励人们对现实不满。满足现实的哲学基础是黑格尔灵魂的复活。黑格尔有绝对观念。现在有些领导也成了黑格尔。

对现实不满是应该支持的，而现在有些先生唱一些廉价的赞美诗，成天和国民党、资本主义比较，向后看不向前看。教员讲课也是和国民党、资本主义比较。

有人说不满现实会失去人民对社会主义的信心，我看这不对。当然我们现在歌颂是需要的，真正的歌颂是好的。但不能要公式化的歌颂，吹牛的歌颂，这样会败坏人心，真是害人不少。要把现在有什么问题老实的告诉人民。

要把真实情况告诉人民，要彻底改革，要发动人民来讨论，社会主义是人民的，不只是党员的，应该让全民尽情地提意见。现在的“鸣、放”只是上层，这是不行的，我看上面的是老头子，不大胆，世故深，不敢说，为了巩固他现有的地位，不敢和共产党闹翻，要广大群众讨论提出意见，再综合起来，这是理想的。

（四）法制问题。以党代政的问题存在，共产党是执政党，威信很大，实权都在共产党手中。法律是形式主义，苏联宪法更虚假。苏联有法制组织，实际斯大林可以完全破坏法制。我们没有法制，法院量刑是审判员说了算。如肃反问题，是否扩大化，我感到是扩大了，主席说没有，我不同意。苏联破坏法制是骇人听闻的。中国

杀了 77 万人，这也不少，冤枉的人也有 72 万。肃反的理论根据也是错误的——罗瑞卿报告都是受了斯大林的社会主义建成后，阶级矛盾越来越尖锐化这一错误理论的指导。

胡风问题。这个问题很棘手。现在看来，胡风假如侦察当中没有其他新的材料，只是提意见，这是好的呀。所以我同意赶快解决。这方面我向主席进一言（主席这里是有错的，但也没有关系）。常委会决定对肃反大检查。那些公安局、法院，就涂改过去的案件，怕人民代表检查。很让人气愤，法院审判的结果都是党委的批示，把批示也都撤下。“十五贯”的现象在这里太多。你对领导有意见就是反领导，反领导就是反组织，反组织就是反党，反党则反人民，反人民则反革命，用这个公式来定罪的，完全是斯大林的方法。

（五）改革措施。用什么措施来改革？根本的改革要发挥群众智慧，要真正的社会主义。党、团中央应该在整风基础上抓紧整党、整团。整党问题不仅是党内的事情，人民也要管。因为党在人民中享有崇高的威信。执政党是人民的命运，所以每人都要来过问。要真正发挥党的作用，必须保证党的质量，清洗一大批混蛋，特别是解放后真正为共产主义入党者有多少？向上爬者倒不少。这是由许多等级制造成的。还有一批中等的人不坏也不起作用，没有什么思想，过去的党员强调“老实”，给爱人写封信也要汇报，成天谈思想，我看这些人可真没有思想。对于不起作用者，应该动员他们退党、退团。

入党、入团不仅要党团批准，应该有 70% 以上群众表示同意，而对不起作用者，群众还可以罢免他。党团不应有任何特权，他的特权应是人民给的信任，应吃苦在前，享受在后，不要在物质上给以特权。这样使真正的为人民服务、为共产主义事业的人入党多好？否则，他可以不入党。

在干部问题上，现在报上登的职工代表大会我很同意。把企业交给职工，这是很好的。

应该叫人民作主。同志们：过去你们感觉到作过主吗？我没有作主，我没感到是主人。

干部的提拔一定要群众同意。有些干部只是靠老资格吃饭。资产阶级国家的部长们可以辞职，可以罢免。我看这好，我们的干部，只是上提，不能下放。过去下放往往好像是犯了错误，升上去就高高在上，这样继续向上升，还能都当毛主席吗？干部经常换一下也好，资产阶级的两党制倒可以竞争一下，在我们国家里，当然这不

需要。但这说明能多提意见是好的。部长们调换一下和人民一起参加劳动是很好的。¹

这篇文章提出的问题是重大的，深刻的和切中要害的！根本不是什么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而是一篇改革的宣言书，是根治“三害”的良方，是一份珍贵的思想遗产，对当时和今后都具有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总之，鸣放形式所涉及的内容具体民主的味道，对揭露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等缺点错误都收到了预想不到的效果，起到反封建专制主义残余的作用，提出许多改进作风的措施，为当时整风起到积极作用。更为重要的是这些意见和建议成为后来改革开放的先声，成为一份宝贵的精神遗产，具有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然而通过这种形式，当时所收集到的材料和意见，后来成为整改的依据，更成为后来整人的重要文字凭证，这是当时知识分子始料不及的。就其鸣放的形式而言，对于健全的民主法制社会是不必要的，因为它们有正常表达民意的机构和渠道。

三、鸣放中的各种意见与建议

从1957年4、5月，鸣放整风运动开始之后，仅两个月时间，党外人士帮助共产党整风，提出了各种各样的批评、意见和建议。在这个鸣放之中，不仅有党外高级知识分子，更多是青年知识分子和学生。现在就这几部分人的主要意见摘录如下：

知名人士发表的意见，几乎都是通过上述几种鸣放形式表达出来的。

章伯钧（中国农工民主党主席、民盟中央副主席、光明日报社社长）5月21日在中央统战部召开的座谈会上发言：现在工业方面有许多设计院，可是政治上的许多设施，就没有一个设计院。政协、人大、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应该是政治上的四个设计院。一些政治上的基本建设要事先交他们讨论。近年来政协委员到下面视察工作，工作是增多了，当不能停留于视察工作，要进一步让大家经常讨论国家的重大问题。国务院开会常常是拿出成品要我们表示意见，这样形式主义的会可以少开。²

罗隆基（民盟中央副主席）在5月22日中央统战部召开的座谈

¹ 参见牛汉、邓九平主编《原上草》，经济日报出版社1998年版，第159-165页

² 《人民日报》1957年5月22日

会上发言：建议人民代表大会和政治协商会议成立一个委员会。这个委员会不但要检查过去三反、五反、肃反运动中的偏差，它还将公开声明，鼓励大家有什么委屈都来申诉，这个委员会包括领导党，也包括民主党派和各方面的人士。这个委员会一定要同“三反”、“五反”、“肃反”的原领导机构分开，因为这几个运动过去是共产党领导着搞的。委员会，除了领导党之外，还应该有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参加，说明运动有成绩，也为受了委屈的人解决问题。¹这里看不出有什么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而罗隆基建议成立“平反委员会”也是有根据的。毛泽东在《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讲话中谈到群众肃反路线时，“提出今明两年进行一次大检查，全面来检查一次，总结经验。中央由人大常委跟政协常委主持，地方由省市人民委员会协同政协主持。”²罗隆基遵循毛泽东关于对肃反进行检查、总结的精神而提出成立“平反委员会”的建议，应该说没有什么错误，朱蕴山提出同样的意见，没有被划为右派。看来谁当右派，谁不当右派毛泽东心中早就有数了。

储安平（九三学社宣传部副部长，民盟盟员，光明日报总编辑）在6月1日中央统战部召开的座谈会上以“向毛主席和周总理提些意见”为题发言说：“这个‘党天下’的思想问题是一切宗派主义现象的最终根源”。解放以后，知识分子都热烈地拥护党、接受党的领导。但是这几年来党群关系不好，而且成为目前我国政治生活中急需调整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的关键究竟何在？据我看来，关键在“党天下”的这个思想问题上。我认为党领导国家并不等于这个国家即为党所有；大家拥护党，但并没忘了自己也还是国家的主人。政党取得政权的主要目的是实现他的理想，推行他的政策。为了保证政策的贯彻，巩固已得的政权，党需要使自己经常保持强大，需要掌握国家机关中的某些枢纽，这一切都是很自然的。但是在全国范围内，不论大小单位，甚至一个科一个组，都要安排一个党员做头儿，事无巨细，都要看党员的颜色行事，都要党员点了头才算数，这样的做法，是不是太过分了一点？在国家大政上，党外人士都心心愿愿跟着党走，但跟着党走，是因为党的理想伟大，政策正确，并不表示党外人士就没有自己的见解，没有自尊心和对国家的责任感。这几年来，很多党员的才能和他所担当的职务很不相称。

¹ 《北京日报》1957年5月23日

² 《毛泽东思想万岁！》1949.10—1957卷，第15页

既没有做好工作，使国家受到损害，又不能使人心服，加剧了党群关系的紧张，但其过不在那些党员，而在党为什么要把不相称的党员安置在各种岗位上。党这样做，是不是“莫非王土”那样的思想，从而形成了现在这样一个一家天下的清一色局面。我认为，这个“党天下”的思想问题是一切宗派主义现象的最终根源，是党和非党之间矛盾的基本所在。今天宗派主义的突出；党群关系的不好，是一个全国性的现象。共产党是一个有高度组织纪律的党，对于这样一些全国性的缺点，和党中央的领导有没有关系？最近大家对小和尚提了不少意见，但对老和尚没有人提意见。我现在想举一件例子，向毛主席和周总理请教。解放以前，我们听到毛主席倡议和党外人士组织联合政府。1949年开国以后，那时中央人民政府六个副主席中有三个党外人士，四个副总理中有二个党外人士，也还像个联合政府的样子。可是后来政府改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副主席只有一位，原来中央人民政府的几个非党副主席，他们的椅子都搬到人大常委会去了。这且不说，现在国务院的副总理有十二位之多，其中没有一个非党人士，是不是非党人士中没有一人可以坐此交椅，或者没有一个人可以被培植来担任这样的职务？从团结党外人士、团结全国的愿望出发，考虑到国内和国际上的观感，这样的安排是不是还可以研究？

只要有党和非党的存在，就有党和非党的矛盾。这种矛盾不可能完全消灭，但是处理得当，可以缓和到最大限度。党外人士热烈欢迎这次党的整风。我们都愿意在党的领导下尽其一得之愚期对国事有所贡献。但在实际政治生活中，党的力量是这样强大，民主党派所能发挥的作用，毕竟有其限度，因而这种矛盾怎样缓和，党群关系怎样协调，以及党今后怎样更尊重党外人士的主人翁地位，在政治措施上怎样更宽容，更以德治人，使全国无论是才智之士抑或子子小民都能各得其所，这些问题，主要还是要由党来考虑解决。’

陈新桂（民盟候补中央委员）在民盟中央小组帮助党整风的组织生活会上说：“无产阶级专政是个‘根’，如果不从根本上解决，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将越反越多。”他所接触到的知识分子，对“鸣”“放”有五种顾虑：（1）耽心再有一次暴风雨；（2）怕变相报复；（3）提了意见没有下文；（4）怕卫道者、全面论者围剿戴帽子；（5）少数人怀疑整风有无用处。他认为储安平提出“党天

¹ 《人民日报》1957年6月2日

下”“一党治国”。储安平的话还没有说完。在苏联以及新民主主义国家是无产阶级专政，是通过工人阶级先锋队——共产党专政。把党外人士看成异党分子，这样不出宗派主义就很奇怪了。在延安整过主观主义，愈整愈厉害，无产阶级专政是个“根”，如果不从根本上解决，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将越反越多。¹

6月10日，在民盟中央小组的座谈会上，他继续发挥自己的观点：共产党的执政和无产阶级专政是同义语。共产党在执行国家领导和政治统治的时候，依靠党员作核心，而民主党派和群众团体是杠杆，传导带，这样一种方式就值得研究。我国这几年来对旧知识分而子的利用和改造采取了阶级斗争的方式：选派留学生主要看成份，看政治条件，按照无产阶级专政的逻辑，这是必然的。这样做，没有宗派主义就说不通。专政是对敌人，对人民内部是民主，这说法不全面。因为无产阶级专政的职能除镇压反动派外，还要组织经济工作、政治工作和思想工作。民主党派、人民团体作为无产阶级专政用来联系群众的杠杆、传导带，实际上是工具，完全被动，不可能发生主观能动性。²

6月13日陈新桂又在民盟中央小组座谈会上继续发言说：听了别人对他的许多批评，他一直还没有搞通。他声明：没有否定无产阶级专政，神经没有错乱。还重申储安平说“党天下”思想是一切宗派主义的最终根源没有什么不对。不过和储安平的说法的出发点不同。³这些意见虽然尖锐，如果认真分析接受，则是根治“三害”一副良药。但当局不愿听。

龙云（民革中央副主席）在5月22日民革中央小组扩大会议上发言认为为什么整共产党的风？这联系有职无权的问题，共产党是执政党，有职有权的人错误就多。民主党派的错误，也和共产党有关；整共产党的风有道理。这次视察回来，在报纸上看到马寅初、张奚若、章乃器等人的发言，受到很大鼓舞；但参加21日中共中央统战部召开的座谈会后，情绪反而低落了，因为发言的人有保留，有顾虑，折中的话很多。这样下去会冷下来，“没有做到步步紧，而是步步松”，对共产党帮助力量不大了。有顾虑可以理解。过去几个大运动，都是共产党整人，现在是不是共产党测验大家的思想，

¹ 《光明日报》1957年6月8日

² 《光明日报》1957年6月11日

³ 《光明日报》1957年6月14日

以便以后整人？现在时机不同啦！共产党是执政党，怎会出尔反尔，开这样的大玩笑，让大家把思想暴露出来，然后再整。¹

他还对共产党的缺点和错误产生的根源作了分析并提出他的看法，认为这次座谈会，大家所指出的错误和缺点，多半是在下面，而其根源多半是在上面，在国家的行政上没有做到分层负责，而是国务院指示一发，等于垂直领导，就一直贯彻到基层，党有党的指示，就成为双轨并行，没有注意业务部门的职权，业务部门也就无法帮助下，置于可有可无之地，很多错误和混乱，便由此产生，对问题不暇再加考虑和研究。²

在6月15日民革中央小组扩大会议上，龙云谈到过去说过“三反”、“五反”“肃反”等几个大运动，“都是共产党整人”，他现在认为这说法是有“毛病”的。此外他还声明钦佩章伯钧等人发言的精神，钦佩他们在整风开始时起带头作用，不是钦佩他们的讲话内容。现在才发现章伯钧的说法是没有根据的，是超宪法，超政府的。³

在最近一个重要会议上，龙云发言认为：（一）抗美援朝战争的经费，全部由中国负担，不合理。（二）第一、第二两次世界大战中，美国借款给盟国，又实施租借法案，后来他们有的赖了债，有的美国不要他们还了。苏联对我国借款，十几年都还不清，还要付利息。中国为社会主义而战，结果如此。（三）苏军解放我国东北时，拆走了工厂中的一些机器，有无代价？偿还不偿还？（四）我国援外预算太大，主张抓紧压缩对外的援助。⁴

陈铭枢（民革中央常务委员）在中共中央统战部5月15日下午召开的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座谈会上说：同意实行校务委员会制度，取消学校的党委制。至于互相拆墙的问题，民革方面是没有什么墙可拆的。⁵在第二天的会上他申明：说“民革没有什么‘墙’可拆”那句话不完整，要求撤回。那句话是就民革在学校中的成员很少，没有形成墙而说的，不是说民革本身没有墙可拆。在5月16日的座谈会上，他针对有人说整风不应该单提干

¹ 《人民日报》1957年5月24日

² 《人民日报》1957年5月31日

³ 《北京日报》1957年6月16日

⁴ 《北京日报》1957年6月19日

⁵ 《北京日报》1957年5月16日

部的缺点，而不提干部的优点说认为，这与党中央整风精神不符。从延安整风以来，以至这次整风，党与非党人士所提出的批评，都谈缺点，没有谈到优点，这是符合党的整风精神的。我认为这是好现象。¹

黄绍竑（民革中央常务委员）在中共中央统战部召开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座谈会上认为，我所以提党政关系问题，绝不涉及党的领导权问题，而是领导方法问题。我觉得过去某些地方某些工作上，没有通过人民、通过政府，而直接向人民和政府发号施令，各地方或机关党委五人小组在肃反运动中直接处理案件，如党和政府共同发布决定而没有把党对各级党委的指示和政府对于人民的指示分开来，这样就可能导致人们或某些党员认为党的领导方法就是直接向人民发号施令，这样对于动员和团结全国人民完成国家过渡时期总任务是有妨碍的，这样会造成很多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问题。

他还认为，成绩是主要的，偏差错误是个别的已经成为工作报告中的一种公式，任何工作报告都套上这个公式，这样会意味着强调成绩掩盖错误，并有造成更多错误的危险。个别错误即仅仅是百分之二三，也不能用百分之九十七八的成绩来掩护它、忽视它。就司法方面来说，百分之二三的错误案件，在全国范围内不知要造成多少人家破人亡、流离失所。我觉得宣扬成绩、夸耀成绩、掩护错误、忽视错误都是官僚主义的作风，也是铺张浪费的来源。成绩说得保守一些，错误偏差放在成绩的前面，并不等于掩没了成绩。而是成绩更加可靠，更加巩固，是有后备力量的成绩。人民对于政府的成绩是心中有数，不强调的说，他们也会知道；说得有一点漏洞，一点不确实，他们也会知道的。强调的说，并不增加他们的信仰；稍微有一两点不确实，就会减少他们好几分的信仰。²

谭惕吾（民革中央常务委员、民革北京市委常务委员）在5月25日民革中央小组扩大会上，针对卢郁文说与党员毫无隔阂，这不是由衷之言。我们要说真话，领导党选择人也要注意，要选对党进忠言的人。很多党与非党的关系问题，常常不是因为共产党，而是由无耻的民主人士弄出来的。这些人隔离党，隔离群众，借机会

¹ 《人民日报》1957年5月17日

² 《人民日报》1957年5月17日

向上爬。¹

在6月5日民革中央小组扩大会议上，她提出了四个问题：第一个是共产党领导国家的方式问题。党领导国家，大家承认，但用什么方式值得研究。现代政府有一套机构，党内又有一套机构，这是“双轨制度”。党内一套是清一色，不与群众在一起，脱离实际，这怎么不产生三大主义和“墙”“沟”？原说党是抓思想和政策的，实际上已超越这个范围，直接向人民发号施令，政府部门没有权。党中央和国务院联合发指示，是由于国务院单独发指示不起作用。既然我们的国家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为什么自己专政的机构不用，而要削弱其职权，另在政权之外来搞一套党的系统呢？希望中共中央考虑这样做是否合乎中国国情。接着她就党领导国家的方式问题提出了具体建议：主席办公室应该扩大；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机构要充实，要发挥它的作用，共产党员到这个权力机关来监督政府，掌握政策；把共产党内各个部改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里的各种委员会；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内可以设党组，吸收非党人士参加工作。

第二个问题是党的政策应该如何体现。党直接指挥行政部门的党员，会把国家行政系统搞乱了。党应该把政策提到人民代表大会制成法律，再由国家管理机关根据法律制成各种法令，通过法律、法令的实施，体现党的政策。不应在法律、法令之外，再发内部指示。指示代替法律、法令，是不可以的。

第三个是党遵守宪法和国家制度问题。党制定政策，应在宪法范围之内。上海对房产商的改造问题是违反宪法的。中共中央检查在制定的政策中是否和宪法有抵触的？如有，要赶快纠正。过去不遵守法律是为着推翻政权才不遵守它。共产党今天是想使国家长治久安呢？还是自己捣自己的乱？这不是小事情，共产党必须遵守宪法。司法、律师、检察是对执行国家制度起杠杆作用的，但有些地方这三者是在一个党委领导之下，这是不好的。共产党可以派党员到司法、检察等机关去担任负责工作，但这些部门不应该由一个党委领导。

第四个问题，是怎样使共产党接受全国人民的监督。她说，政府受人民代表大会监督，但是党不受什么监督，她认为应该建立制

¹ 《人民日报》1957年5月26日

度使人民监督共产党。¹

6月8日她在人民日报上对6月5日的发言又作了三点声明：第一，“党直接指挥党员，会把国家搞乱了”的原意是说“党直接指挥行政部门的党员，会把国家行政系统搞乱了”。不要以党代政。第二，关于上海对房产商的改造问题，是说上海将私营房产商和私营经租公司及属于资本主义经营性质的房屋纳入社会主义改造范围是完全正确的、是符合宪法的。但是在工作中把个别的作为生产资料的房屋和作为生活资料的私人住宅纳入公私合营是和宪法第十一条的规定不符合的。第三，关于司法、监察机关不应受党委领导的问题，是说这些部门不应该由一个党委领导。²

章乃器（中国民主建国会副主任委员）在5月8日中共中央统战部召开的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座谈会上，谈到对工商界的宣传教育工作问题时，认为这方面工作中的教条主义很严重。4月22日人民日报“工商业者要继续改造，积极工作”社论中的教条主义就不少。这篇社论对于工商界积极的一面是讲了，对于消极的一面讲了三点：消极自卑，违法乱纪、盗窃资财，骄傲自满这三条究竟那一条是主要的，很不鲜明。有人说私方违法乱纪、盗窃资财的百分比绝不比合作社、国营工厂来得多。说工商界消极自卑，也不能完全怪私方，还要看公方是否创造了条件。其次，文章中片面强调要服从公方领导，这也有问题，如私方当正厂长，片面强调服从领导，就必然有职无权。还有，文章中说工商界要进行脱胎换骨的改造，这不只是教条主义，而且是宗教上的信仰主义和神秘主义。照道教的说法，脱胎是脱凡胎，换骨是换仙骨。现在工商界已经过了五关（战争关、土地改革关、抗美援朝关、五反关、社会主义关），就是说，脱胎换骨的改造，也已经改造过了，如果还要脱胎换骨，只能使工商界增加无穷的忧虑，如何能不消极自卑？³

5月14日章乃器在人民日报发表题为《“从‘墙’和‘沟’的思想基础说起”》的文章，提出以下看法：“联共党史”记载斯大林在哀悼列宁时候的誓词，一开头就说：“我们共产党员是具有特殊性格的人。我们是由特殊材料制成的。”“这一句话自然也就成为“墙”和“沟”的一种思想基础了”。“单从文字看来，这句话是

¹ 《人民日报》1957年6月6日

² 《人民日报》1957年6月8日

³ 《人民日报》1957年5月9日

不科学的，是带着神秘主义色彩的。共产党员是特殊材料制成的学说马上就会被理解为：共产党员一生出来就是做共产党员的材料。我也听到过另一种解释：‘特殊材料制成’指的是革命理论的教育和组织的锻炼。但有人不同意，认为这些都只是对材料的加工而不是材料本身。我想，尽管这两种解释都可以成立，作为一种带政治口号性质的句子，也是不应该有可此可彼的两种解释的；它必须明确到足以使群众单凭直觉就可以正确理解的”。‘联共党史’曾经在我国展开学习，而教条主义是在党内党外都很流行的。说这种说法不会起到相当严重的教条主义的作用，是难以设想的”。“在“拆墙”、“填沟”的工作中。批判共产党员是特殊材料制成的这一条是必要的”。¹

在5月31日举行的中国民主建国会全国工商改造辅导工作座谈会上，章乃器作了讲话。会后他根据讲话的基本内容写了一篇题为《关于工商改造辅导工作的几个问题》的文章，刊登在6月9日大公报上。提出了以下一些论点：

第一，官僚主义是比资本主义更危险的敌人。因为，资本主义已经肯定不可能在我国复辟，而官僚主义却随时可以在我们的思想中甚至工作中复辟。在资本主义当中，我们还可以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找出一些在生产、经营上有益的经验 and 知识，为社会主义服务；而官僚主义则是“一无是处”的糟粕。这就是为什么一个社会主义企业加上了官僚主义效率反而不如资本主义企业的理由。何以现代化的资本主义企业会有较高的工作效率，资本家除了要图利外，还有一种企业心。为了图利，为了搞好企业，他们自然要用人材。像我们这次整风当中所揭露的某些企业、机关在人事方面“德重于才，以资代德”等等是非不明的偏向，在现代化的资本主义企业中是很难公然存在的。

第二，在公私合营企业中，应该明确以共事关系为主，肯定阶级关系是残余的。在工作中，更不宜强调公方与私方的界限，也不宜强调党与非党的界限，而主要地应该按照职责和分工办事。否则，有职有权是无法保障的，共事关系也是不可能搞好的。只有在思想改造工作上，在化除历史性的劳资双方之间的隔阂上，私方才需要警惕阶级关系。但也不可以理解为把阶级关系当作压服私方的“大帽子”。

¹ 《人民日报》1957年5月14日

第三，定息不是剥削，而是不劳而获的收入。理由是：如果今天的工人仍然被剥削，那就不能不对私方有对抗。这样阶级关系就不可能是非对抗性的矛盾了。既然现在已经肯定阶级关系是非对抗性的矛盾，就没有理由说定息是剥削。说定息是不劳而获的收入是比较合理的。也可以这样解释：从整个阶级来说，定息是剥削的残余；而具体到个别的阶级分子来说，定息是不劳而获的收入。这种说法不是咬文嚼字的末节，而是实事求是的正名。¹

在6月10日出版《工商界》杂志1957年第六期上，章乃器发表了题为《关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问题》的文章，提出以下论点：有两种关于两面性的概念。一种是工商业家所熟知的，是政治上革命与不革命甚至反革命的两面性，和经济上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积极的一面与不利于国计民生的消极的一面的两面性。在全行业公私合营以后，上述的两面性是一去不复返了。因此，当教条主义者仍然笼统地不加分析地指出：民族资产阶级仍然有两面性。这不能不使工商业家听了之后惊心动魄！另一种两面性的概念是毛主席在第十一次扩大的最高国务会议上所说的。工商业家从毛主席的讲话中理解到：既然什么阶级、什么人都有两面性，都需要改造，民族资产阶级当然有两面性，当然更加需要改造；民族资产阶级比起其他的阶级，消极的一面而且还要多一些；除了思想、作风问题以外，而且还有不劳而获的收入的尾巴——定息。²章乃器接着又说了一段值得注意的话，他说，过去有“墙”和“沟”，许多力量是在互相防范、互相摩擦，互相戒备中抵销了，许多旧人员、旧知识分子以及工商界的积极性还没有完全发挥出来，潜力还很大，这是过去斗争遗留下来的副作用，斗争是有成绩，但副作用也不能否定。³

请注意，以上引用知名民主人士的言论，都是《人民日报》、《北京日报》和《光明日报》报道的，除章乃器在5月8日发言外，其他知名民主人士、学者、专家的发言、文章，都是在5月15日毛泽东撰写的《事情正在起变化》指示下达党内最高层，下决心要反击右派后，党中央、李维汉和人民日报等有意识地执行指示中的“引蛇出洞”策略的结果。当储安平“党天下”的言论发表后，李维

¹ 《大公报》1957年6月9日

² 《关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问题》，《工商界》1957年第6期

³ 《北京日报》6月16日

汉向毛泽东汇报，毛泽东说：“他们这是要夺权了，什么政治设计院，什么轮流做庄，什么党天下，都是一个意思，要共产党把权交出来了，交给他们。什么小和尚、老和尚，我看他们才是和尚。和尚打伞无法（发）无天。再让他们放，不要反击，硬着头皮听。”¹由此看出，毛泽东把民主党派人士提出的上述意见看作是夺权。这已经是把反右斗争看作是一场夺权与反夺权的斗争。把问题看得如此严重，所以对右派斗争要采用对待敌人的手段进行无情地打击和歼灭也就不足为奇了。

上述知名民主人士提出的意见和建议，如果站在世界民主潮流，站在新民主主义、联合政府、共同纲领的角度，站在邀请党外人士帮助党整风的承诺，“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角度来看，只要不抱偏见，都会认为这些意见和建议是正确的，或是基本正确的。对改进、改善、克服、纠正党的缺点、作风和错误都极有帮助。可惜当权者站在一党执政，“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角度，认为这些言论是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然后加以无情打击、歼灭。

鸣放初期，各部门、学校，团体召开各种座谈会请高中级知识分子提意见，让他们鸣放，现摘引如下：

北大教授傅鹰对党和知识分子的关系提出尖锐的批评：“我对于年轻党员的看法，就同在重庆时对国民党特务的看法一样。特别是对正在争取入党争取转正的人有戒心。他们越多打你几棍子，入党转正的机会就越大。”“我相信党，但不相信个别党员不会作难。不怕官，只怕管。好汉不吃眼前亏。你可以批评人家没骨气，为什么不扛起来？这种批评不对。求生是动物的本性，吊打是‘不可逆’反应。当然不是说所有党员都坏，党员和非党员有一个共同之点：良莠不齐。”“我最讨厌‘思想改造’，改造两字，和劳动改造联系在一起。”“人们有什么不好的思想行为，总说是资产阶级思想影响，这是不公平的。资产阶级思想的老祖宗无非是孔夫子，孔夫子几曾教人贪污，损人利己，唯利是图？”“党到现在对知识分子的脾气还没有摸对。知识分子的要求就是要把我们当自己人，如此而已，并不需要优待。”“知识分子就是爱国。……我一生的希望就是有一天中国翻身，现在这个希望实现了，所以我拥护这个政府。……但我心里还是有不快，党还是把我当外人”。“还没有和

¹ 转引《中国百年政治风云实录》下，红旗出版社1997年版，第129页

党做到知己”。

“学校里至今没有建立起学术风气，衙门习气比解放前还浓厚……解放以来，教授没有地位。”“人事处全是一帮孩子，不知大学该如何办，不懂哪能不主观？……最好废除人事处。如果废不了，至少要他们了解自己的地位，不能掌生杀之大权。教授评级，最后也是由人事处定的。”“现在是长字辈的吃得开，后果何堪设想？当长，什么人都可以，摆一块木头在那里，它也能当长。但木头不能讲课。当长等于穿一件衣，穿了脱了都无所谓的，长与学问并不成正比，常是成反比的，做学问的人就不是当长的料。”¹傅鹰提出如此尖锐的意见，后来没有打成右派，那些提意见的人，不及他九牛一毛，却被打成右派了。因为傅鹰是毛泽东树立的典型，当然不能划为右派。所以谁被划为右派，谁不当右派，以毛泽东的意志为转移。

葛佩琦（人民大学讲师）在中国人民大学党委会召开的一次座谈会上认为，今天党群关系与解放前相比，差了十万八千里。统购统销搞糟了，所以物资供应紧张，老百姓吃不上。今天党群关系与解放前相比，差了十万八千里。学校是这样，老百姓也是这样，老百姓把豆饼做的豆腐叫做日本的混合面。统购统销搞糟了，所以物资供应紧张，“肃反”运动搞糟了，党犯了错误，领导人应该自请处分。猪肉紧张，老百姓吃不上，有人说这是生活水平提高，生活水平提高的是哪些人呢？过去穿破鞋，现在坐小卧车穿呢子制服的党员和干部。说良心话，物资供应之所以紧张，这是由于执行党的政策的人犯了错误，例如，猪肉哪里去了呢？不是被老百姓吃光了，而是因为执行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发生了偏差，老百姓不肯养猪所造成的。

1949年共产党进城时，老百姓都是“箪食壶浆”“以迎王师”来欢迎。今天老百姓对共产党是“敬鬼神而远之”。老百姓几时也是这样，中国历史上好多这样的例子，当统治者没得到统治地位的时候，老百姓总是欢迎他们的，但他们一旦得到了统治地位，而不顾人民利益时，人民就要反对他们。例如，1945年抗战胜利时，受了日本人压迫了八年的老百姓也欢迎过国民党，后来国民党的大员搞“五子登科”，人民就反对他们。现在的情况不同了，老百姓对共产党的意见很多了。共产党若不自觉也是很危险的。

¹ 参见《百年潮》1997年第1期

过去在学校做地下工作时，是用联系进步、争取中立等一套方式，而今天是用党员来领导，所以看党员的成绩就是看汇报多少，汇报的多，就是好党员，党员起了监视群众的便衣警察的作用。这事不能怪党员，因为党组织叫他们作情报，所以责任在党组织，因这是组织给的任务。

共产党对我三心二意，我对你也三心二意。中国是6亿人民的中国，包括反革命在内，不是共产党的中国。党员有主人翁的态度是好的，但是，你们认为“朕即国家”是不容许的。你们不应因自己是主人翁而排斥别人，不能只有党员是可靠的，而别人都是可疑的，特别是对爱发牢骚的党外人士，共产党可以看看，不要自高自大，不要不相信我们知识分子。搞得不好，群众可以打倒你们，杀共产党人，推翻你们，这不能说不爱国，因为共产党人不为人民服务。共产党亡了，中国不会亡。因为，不要共产党领导，人家也不会卖国。¹

1957年5月25日，《人民日报》报道清华大学教授徐璋本的发言，“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一定要产生教条主义；因为任何学说都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都有其局限性，若以一种比较固定的学说作为指导思想，不可避免要犯教条主义。”“即使一个聪明的领导者他要犯错误。马克思主义的理想是共产主义，但共产主义是全人类的理想，不只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想。印度对崇高理想的追求也很深刻。马列主义的理想也不能仅以政治与经济的内容来包括一切。所以拿马列主义的学说来处理一切矛盾问题就会有问题。……任何一个学说都不能包括全部的真理”。“任何一个学者一个学说都不能把一切好的东西都包括进去。”因此他“建议取消用马列主义作为我们的指导思想”。²

6月12日，《人民日报》报道：谁说今天没有右派言论？

荣子正（天津工商联常委）：“马列主义的理论著作都是很早期写成的，把这些理论搬到中国来运用，很多地方对不上号。”

黄心平（天津第三女中教师）：应由各党派轮流执政。共产党和民主党派都应退出学校。

胡宗翰（天津机电局科员）：中国共产党可以让民主党派在一个省、市或区里执政，并给它法制和警察，让民主党派试验着执政一

¹ 参见《人民日报》1957年5月31日

² 《人民日报》1957年5月25日

个时期，看看是能为人民办事。”¹

6月15日，《人民日报》报道“什么话”：

陕西师范学院讲师王尊一说：“我们要根除‘三害’是不是应向党中央和毛主席那里挖掘一下呢？”“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中国共产党的确有伟大的功勋，但从此共产党骄傲起来了，以为天下是我们打下的，政权应由我们掌握，好官我自为之，人民只能听从共产党的命令、指挥和摆布，人民那有宪法上赋予的思想、言论的自由。”“最后，我要向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呼吁：一、开放政权，建立一个真正的人民民主国家；二、真正给人民以思想言论的自由，解放人类个性；三、把民主的尺度放宽些，给人民以真正的民主生活；四、我要求毛主席，我要求你走下你的宝座，深入农村，看看农民的生活情况。”

西南师范学校讲师董时光认为：“群众有三种，根据我的分析，第一种最多，没有头脑，不能独立思考，只是跟着领导屁股后面喊口号，不折不扣地做领导上的应声虫。第二种是极少数，他们喜欢拍马屁，无耻钻营，他们对领导什么肉麻的奉承话都说得出来。领导们也专门喜欢听这种人的话，往往诬良为奸，在每次运动中造成无数冤狱。第三种人是有良心有正义感，却不敢站起来说话。”²

6月23日，《湖北日报》报道民盟盟员华中师范学院副教授艾璋生的言论：“‘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提法是不是不够恰当？因为‘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是对等的、双方的平等称呼，不能以不平等的双方来平等对待。当前共产党和民主党派是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一个领导，一个被领导，地位有所不同；共产党是大党，民主党派是小党，小的怎么来监督大的呢？这是个矛盾。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说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是解释不通的。”共产党和民主党派之间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应该改变。“在做法上应成立知识分子党，将民盟、民进、农工、九三等几个民主党派合并，成立知识分子的政党。这个政党是革命的知识分子的党……如果组织起来，他们会发挥更大的作用。”³

1957年6月28日《人民日报》报道《什么话》：“我十分怀疑，‘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呢？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¹ 《人民日报》1957年6月12日

² 《人民日报》1957年6月15日

³ 《湖北日报》1957年6月23日

的一切权力属于共产党？共产党为人民服务的？还是人民为共产党服务？共产党员是人民的勤务员呢，还是人民的统治者？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呢，还是奴隶？”“宗派主义到处泛滥，面对这样的现实，使我有这样的感觉——进入了社会主义的社会，旧的统治阶级是没有了，但是，又出现了一个新的特殊的阶层。”¹

知识分子所放的“毒草”，不过是对党的怨气和不满，希望党纠正缺点，然而毛泽东却不这么想，正如《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所说：“为了让人民见识这些毒草、毒气，以便锄掉它，灭掉它”²

大学生鸣放是不请自动出来提意见的，中国大学生历来就有忧国忧民的传统。

北京大学学生鸣放的意见，佚名“广场发刊词”：伟大的整风运动以其不可估量的壮阔的波澜，激动了全中国全世界，在此就学。

“五·一九”以来已经过了这个伟大运动的第一个浪头！第二个、第三个……难以预计的高潮必然会相继而来！这个运动已远远超出了党内整风运动的范围，而且有了伟大的社会思想意识大变革的巨大意义！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要重新调整，一些过去习以为常的正面和反面的东西要重新进行肯定和否定，对于现代的一些论点与观点要重新进行估计、评价和探索……总之，这里——整风运动为主流的大变革是一次伟大的社会主义思想意识的改造运动，或思想意识的大革命，对一切都要进行勇敢地再认识。大放大鸣成为这次运动的精神实质。毫无顾虑地发言为真理而作好争论，以及为证明一些新生的主张观点天才的创造都将如雨后春笋般地诞生！

中国将到来社会主义时代的春秋诸子百家争鸣，会到来社会主义时代的以少年事业为风骨的、建设文学的再生，会到来社会主义时代的盛（唐）般的诗的创造，会到来社会主义时代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伟大的马列主义的不朽理论会得到更进一步更全面正确的运用、阐明与发挥！党会因此而更强大更有生命力！人也会因此而返老还童，而具有十分鲜明可爱的社会主义的个性！一切都进了一步，都重新沐浴，清除掉一切垃圾，栽种下茂密的花木！一切都只有一个结论：好得很！

北京大学是五四的故乡，北大儿女是五四的后裔，我们的血管里（流）着五四的血液，在社会主义的五四时代，我们要学会五四

¹ 《人民日报》1957年6月28日

²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28页

先辈们的大胆提问、大胆创造的精神，去争取真正的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文化！我们的刊物——“广场”便为此而诞生，“广场”的含义在于：北大民主广场是五四举火的地方，五四的先辈们曾在民主广场上集会点火与誓师高歌！我们的“广场”是真正的“广”的“场”，是一切不脱离社会主义的言论的讲坛。只要为了“真善美”，不论什么基调的歌都可以到广场上来对年青人放开嗓子唱！我们的“广场”为争鸣而开，我们的“广场”是百花齐放的地方！我们的“广场”矛头指向阳光下的黑暗！我们的“广场”又是火葬场！

先辈们的广场已经荒芜了，我们艰难地把它打扫干净，我们愿爱讲话爱唱歌的人们一起来打扫它。整理它，使它开出一万朵美丽的花！来吧！朋友们！到“广场”上来！这里有自由而新鲜的空气，它可以震动你的声带，唱出你愿意唱的个性的歌！。我们的广场期待着二十世纪社会主义文艺复兴的到来！¹

这是一篇继承“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社会主义思想解放运动的宣言书，但只存在几个星期就被当作毒草被锄掉了，同时也中断了“五四”运动中的民主传统。而发刊词的作者、支持者和拥护者，后来在反右斗争中葬送了他们的青春，造成了历史的悲剧。

现在将北京大学学生鸣放的言论摘录如下：

(1) 对整风运动的看法：整风运动是一次争取民主、思想解放、文艺复兴的运动；鸣放政策是共产党“顺其时”的政策；党委阻碍鸣放。

(2) 对共产党员的看法：共产党员比国民党员坏；入城后共产党员蜕化变质了；党员的特权思想颇为严重；绝大多数党员都有官僚主义、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党员没有人性、没有个性；党好，党员不好。

(3) 对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意见：共产党将来也能正确吗？反党不等于反社会主义；反党不见得反人民；高度集权是危险的；取消党在政府中的特权；党的领导应该减弱；党内充满派别斗争；共产党培养领袖崇拜；党内没有民主；共产党是宗派；党比以前变坏了；党已僵化，应该下台；党奉行“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愚民政策；党群关系存在不平等；现在党群关系比解放初期恶化了；党群关系形成新“九品”；党的发展对象是一些唯唯诺诺的人；党只

¹ 牛汉、邓九平主编《原上草》，经济日报出版社1998年版，第19-20页

能培养出教条主义者；党包办学校的一切；取消党对高校的领导；取消党委制；党委退出学校。

(4) “三害”产生的原因和根源：党的领导就会产生宗派主义；阶级斗争的任务给我们的制度带来不可避免的缺陷，这个缺陷也就成为“三害”的根源；民主集中制是领导者犯错误的一个根源；权力集中是“三害”的根源；党的“行政方式”的领导是产生官僚主义的根源；“三害”根源是社会风气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某些环节；“三害”是与社会主义法制、民主问题有关，不光是党员作风。

(5) 对民主自由的观点：民主自由是人类的天性、是基本人权、不应看成手段；民主是人民用来保护自己、抵制统治者可能采取暴政的武器；民主是目的，不是手段或不仅是手段；民主与集中是绝对对立的；我国没有民主自由或不够民主自由；现在思想不自由，新闻不自由；欣赏资产阶级民主、两党制或多党制以及选举方式；今天应该强调民主自由，要求扩大社会主义民主。

(6) 对法制、肃反政策的意见：肃反是教条主义地搬用斯大林关于阶级斗争绝对尖锐化的结果；肃反一团糟；党在肃反运动中的群众路线是错误的；肃反纠偏要彻底；我国法制不健全；胡风以及胡风集团不是反革命。

(7) 对农业问题：共产党向农民夺之太多，与之太少；农民吃不饱。

(8) 对知识分子问题：知识分子受压抑；解放后知识分子是降级了；思想改造偏差很大。

(9) 关于人性、阶级性问题：人性比阶级性更根本些；人们个人欲望是社会发展的内在动力；利己愿望支配人的行动；人原来是自私的。

(10) 阶级斗争问题：阶级的产生是以人们利己愿望为基础；三大改造之后，不应提阶级性了；否认用阶级观点分析问题；人的阶级地位和立场是无法判断；立场可以歪曲事实。

(11) 对马克思主义的态度：“独立思考”可以不学习马克思主义；我认为马克思主义只有唯物辩证法是万岁的，其他一切结论都是可以改造的。

(12) 对苏联、对斯大林的态度：苏联出兵援助匈牙利是“合理不合法”，给对帝国主义得到造成借口；苏联存在大国沙文主义；向苏联学习感到怀疑；党对国家的绝对控制，国家权力的高度集中是斯大林错误的根源。斯大林的错误应该到具体制度中去找错误的

原因。

(13) 对反右派斗争的看法：反右派斗争是违反整风和风细雨的精神；是违反言论自由；反右派充满火药味；6·8人民日报社论阻碍鸣放；反右派斗争是小题大作；反右派斗争是愚蠢的、错误的；反右派斗争是扼杀真理；反右派斗争是严重摧残青年知识分子中的民主力量、反右派斗争是肃反的变种；反右派斗争中是没有宽容的政治风度。

(14) 对右派言论和右派分子的看法：右派理论是新真理，不应以旧思想方法反对；右派分子是民主运动的代表。

(15) 其他：政治课应该选修；“再论”是运用了教条主义形而上学的分析方法；积极分子是新贵；现在的分配制度悬殊大；不要分先进、中间、落后。¹以上引自北京大学社会主义教育委员会编的《社会主义教育参考资料》小册子中学生鸣放言论，该委员会编者《前言》说：“本选集所收集的是在本校大鸣大放和反右派斗争期间所出现的右派言论”，“都是右派观点”。

现将武汉大学学生对资本主义的看法摘录如下：“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并不可怕，关于危机我们已经叫了一百多年了，但现在资本主义还是存在着，而且今天还在发展”。“我个人并不赞成资本主义制度，但是我觉得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是要长期共存的，我想资本主义至少要和我们这一代相处下去。当然罗，由于历史发展的规律吧，资本主义是必然走向灭亡的，谁也不能否认这一点。但是这仅仅是一个理论问题。要想把理论变成现实，还须要作巨大的努力。我曾经这样考虑过：在本世纪的下半世纪我们还很难看到资本主义的全部覆没。资本主义直到现在还是强大而很可怕的敌人。也许我对资本主义的估计比较高了一些，我认为它还有很大的生命力，就是说一下子死不了。我们在过去很长时间内养成了一个很不好的习惯，就是不愿意谈资本主义的成就，就不愿意谈资本主义某些优越性，好像你一谈，就是反对社会主义。自认为拥护社会主义的人是怎样呢？只说社会主义好哇，资本主义不好哇，就是拥护社会主义。我的看法不是这样。我认为真正拥护社会主义的人，是要使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这人才是真正拥护社会主义的人。我们战胜资本主义是不容易的，我们要战胜资本主义，首先要研究资本主义，就是对资本主义保持高度的注意吧。对于资本主义经济

¹ 北京大学社会主义教育委员会编《社会主义教育参考资料》

文化的发展，对于资本主义科学技术的发展，对于它的政策密切的注意，就是了解敌人在那里做些什么。敌人在那里睡觉吗？他们也在为保卫他们的制度来作垂死挣扎，就是他们有很大的疯狂性吧！我们不认识这点。我每天坐在家，把马列主义政治经济学拿来翻开一看，好像资本主义总危机已经到来，于是就感觉天下太平。我觉得这对于我们青年一代没有什么好处。你说是不是宣传资本主义优越性就丧失了信心了呢？就害怕了呢？也不是这样。我们现在中国很贫穷和落后吧！但是我们整个国家是有信心的，我们并不因为我们贫穷落后，比资本主义苦，那么我们就向资本主义投降，我想我们中国人民决不会像这样作吧。正因为我们感觉自己差，感觉自己处于不利，我们更要努力赶上人家。在这方面适当的把资本主义国家建设成就向国内介绍一下，引起人民的注意，引起有关部门的警惕，我认为是完全必要的。……总的论点，我认为资本主义还是一个很强的敌人，目前为了战胜它，就必须了解它。附带谈到国内目前不敢谈资本主义是一个缺点。主要就是这几个论点。”¹这是一篇很有远见的文章，但文章作者及其支持者被打成极右分子。

上述以鸣放形式和鸣放内容所提出的意见和建议，可归纳如下：第一，对党的领导和党员干部的批评，批评以党代政，党政不分，批评党的领导制度的某些缺陷，批评党天下、党风不正，党员特权思想和行为。主张政府中的非党人士有职有权，改变外行领导内行，实行党政分工，改善党群关系，取消党员的特权，主张竞选，轮流做庄。成立政治设计院。第二，批评党内发扬民主不够，集权过多，批评无产阶级专政存在某些缺陷。主张扩大民主，适当放权，改革上层建筑中不合理的制度或体制，吸收资产阶级民主中的积极方面。第三，批评以人代法，以言定罪，破坏法制行为。主张加强法治，建立立法，实行司法独立，成立平反委员会。第四，批评知识分子政策，批评外行领导内行，主张教授治校，建议端正对知识分子轻视、歧视和敌视的态度，改善党对科学体制的态度。第五，批评党的干部政策，人事制度，主张改革干部制度，采用德才兼备干部，改善干部结构。废除干部终身制。第六，批评党内外，国内外的教条主义，主张结合中国实际，学习马克思主义，学习苏联先进的经验。第七，批评历次政治思想批判运动中“左”的偏差，主要是胡风事件、肃反，主张党的领导采取措施纠正“左”的偏差，建议全

¹ 转引《武汉大学右派言论集》

国人大政协组成临时检查机构出面处理。第八，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指导思想的批评，批评好大喜功，主张处理集中与分散，计划与自由，中央与地方，快与慢，冒进与反冒进等各种关系都需要实事求是，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综合平衡来处理，主张实行控制人口。第九，对其他方面的批评和建议，批评中国援外预算太大，主张压缩外援，苏联一定要变，中国也不能让许多小斯大林统治下去（人民日报 1957 年 6 月 20 日）。这些批评和建议，有些可能被中共中央所接受，有些被当作右派向党进攻的言论而受到无情打击。令人讽刺的是，有些批评与建议竟成为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改革开放的思想来源之一。

总之，整风运动前后出现的鸣放思潮是毛泽东过早放弃新民主主义制度，过早过快过急进入社会主义制度而产生诸多弊端的反映，是在苏共斯大林出现问题，波匈事件影响下出现的，是错误吸取苏联经验，探索中国社会主义新道路的尝试下出现的，是毛泽东提出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新形势下出现的，是毛泽东创造开明、宽松、和谐和有限民主、有意缓和制造阶级斗争紧张气氛下出现的，是毛泽东一再主动引导，积极动员，热情邀请党外人士帮助和党外人士积极响应党和毛泽东的号召下产生的，是人民日报等各大报遵照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在鸣放前后多次发表社论、评论，主动采访知名人士，希望党外人士积极参加鸣放，给共产党提批评意见于建议。根本不是像发动者所说的，是向党猖狂进攻，是企图颠覆新生的政权，是妄图复辟资本主义，是实现第三条道路的梦想。客观公正地说，这次整风运动是毛泽东自建国以来由上而下发动的有限民主、改革开放的运动，鸣放思潮的形式和内容本身就是民主、改革开放的表现，具有反对封建专制主义残余的性质，具有改革、开放的性质，当然在鸣放思潮中出现极个别言论不利于对毛泽东和党的领导，这也是正常的，毫不奇怪。这股鸣放思潮是五四时代的科学与民主传统的继承和发扬，同时这股思潮起到了反对专制独裁和个人崇拜的积极作用。简言之，整风前后出现的那一股鸣放思潮是争取民主自由，反对封建专制，高举改革开放，代表社会进步趋势的思潮。

第四节 从整风到准备反右

整风运动初期，毛泽东为了改正、克服党内业已存在的主观主

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以及其他缺点、错误，一方面发动党内进行自上而下的整风，自觉地克服自己的错误和缺点，另一方面又欢迎党外人士帮助共产党整风，邀请、鼓励党外人士提出批评或建议。毛泽东想用“内外夹攻”的办法来克服的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等坏作风。在党内外人士提意见过程中，绝大多数是正确的或基本正确的，其中有极少数人鸣放出一些领导者认为超出“三害”作风界限的错误言论，在这种形势下，毛泽东不但不加以制止，却采取因势利导，让超出“三害”作风界限的一些言论充分暴露和泛滥，以便择准时机，坚决予以反击。这样使整风运动急剧转向准备反击右派的斗争。

一、准备反右

整风运动，一方面为了克服和纠正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作风，另一方面也是为了防止匈牙利事件在中国重演。所以毛泽东非常注视着鸣放的发展和变化，当社会上极少数人鸣放出一些领导者认为是过激的、尖锐的、错误的言论后，他便于1957年5月15日撰写《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决心开始反右。

自从1956年苏共二十大的召开，斯大林错误被揭露，波匈事件的发生，国内不安定因素、党内外有要求民主自由的呼声的出现，毛泽东特别注意知识分子的思想动向。11月15日，他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的讲话中批评说：“有几位司局长一级的知识分子干部，主张要大民主，说小民主不过瘾。他们要搞的‘大民主’，就是采用西方资产阶级的国会制度，学习西方的‘议会民主’、‘新闻自由’、‘言论自由’那一套。他们这种主张缺乏马克思主义观点，缺乏阶级观点，是错误的。”¹

1957年1月18日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指出：“前年反右倾，去年反‘冒进’，反‘冒进’的结果又出了右倾。我说这个右倾，是指在社会主义革命问题上，主要是在农村社会主义改造问题上的右倾。我们的干部中间刮起了这么一股风，像台风一样，特别值得注意。我们的部长、副部长、司局长和省一级干部中，相当一部分人，出身于地主、富农和富裕中农家庭，有些人的老太爷是地主，现在还没有选举权。这些干部回到家里去，家里人就说那么一些坏话，无非是合作社不行，长不了。富裕中农……想退社。我们干部中的这股风。反映了这些阶级和阶层的思

¹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23页

想”。这是“我们自己家里出的”高级干部，对社会主义农业合作化的优越性产生了怀疑，“似乎合作社大有崩溃灭亡之势”。¹

对于学生和教授发出怪议论。毛泽东说：“石家庄有一个学校，有一部分毕业生暂时不能就业……少数反革命分子乘机进行煽动，组织示威游行，说是要夺取石家庄广播电台，宣布来一个‘匈牙利’。他们贴了……‘打倒法西斯！’‘要战争不要和平！’‘社会主义没有优越性！’照他们讲来，共产党是法西斯，我们这些人都要打倒。”清华大学“有个学生公开提出：‘总有一天老子要杀几千几万人就是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一来，这一‘家’也出来了。邓小平同志在这个大学讲了一次话，他说，你要杀几千几万人，我们就要专政。”“在一部分学生中间，哥穆尔卡很吃得开，铁托、卡德尔也很吃得开。”“在一些教授中，也有各种怪议论，不要共产党呀，共产党领导不了他呀，社会主义不好呀，如此等等。他们有这么多思想，过去没有讲，百家争鸣让他们讲，这些话就出来了”。²

对搞匈牙利事件的人要进行专政，毛泽东说：“苏共‘二十大’的台风一刮，中国也有那么一些蚂蚁出洞。”“党内党外那些捧波、匈事件的人捧得好呀！开口波兹南，闭口匈牙利。这一下就露出来头了，蚂蚁出洞了，乌龟王八都出来了。”“匈牙利事件的一个好处，就是把我国中国的这些蚂蚁引出了洞”。“如果有人用什么大民主来反对社会主义制度，推翻共产党的领导，我们就对他们实行无产阶级专政”。³

1957年1月27日，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指出，“社会上的歪风一定要打下去。无论党内也好，民主人士中间也好，青年学生中间也好，凡是歪风，就是说，不是个别人的错误，而是形成了一股风的，一定要打下去。”“对民主人士，我们要让他们唱对台戏，放手让他们批评。”“至于梁漱溟、彭一湖、章乃器那一类人，他们有屁就让他们放，放出来有利，让大家闻一闻，是香的还是臭的……他们讲的话越错越好，犯的错误越大越好。”“我们对待民主人士，要又团结又斗争，分别情况，有一些要主动采取措施，有一些要让他暴露，后发制人，不要先发制

¹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30—332页

²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32—333页

³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34、338页

人。”¹

上述引文说明，毛泽东非常注意知识分子(包括高干中的知识分子，民主人士、青年学生、教授)的思想动向，早就准备采取先放后打的策略，也是最早的“引蛇出洞”的策略。

3—4月间继续宣传先放后打的策略。3月20日，毛泽东《在南京部队、江苏、安徽二省党员干部会议上的讲话》，谈到“双百方针”时指出，“应该放，不是‘收’。”“文学作品里头，有些是不对头的”，“各种妖魔鬼怪都上来了，我说上来一点也不要紧。”“同志们!不要误会我在这里提倡妖魔鬼怪，我只是提倡这个东西，而想消灭它，而消灭的办法，要让它出现……。”²4月，毛泽东《在上海局杭州会上的讲话》指出，“我们要放，要硬着头皮让他们攻!”，“让牛鬼蛇神都出来闹一闹。”“有些知识分子还怕放长线钓大鱼”，“有人说，放长线钓大鱼，也有一些道理。”³毛泽东早已就准备，让蚂蚁出洞，让乌龟王八蛋、妖魔鬼怪、牛鬼蛇神都出来，用放长线钓大鱼的策略，然后将他们打下去，进行无产阶级专政。

关于确定打击的对象和数目，3月12日，毛泽东《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指出：“少数人对社会主义不那么欢迎，不那么高兴，甚至抱有一种敌对的情绪，认为社会主义没有优越性，社会主义活不长，会失败。或者有那么一些人，希望社会主义总有一天要恢复到资本主义。这种人是很少数的，有百分之一、二，或者更少一点”⁴后来在1964年毛泽东对讲话稿作了修改：“对于我们的国家抱着敌对情绪的知识分子，是极少数。这种人不喜欢我们这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他们留恋旧社会。一有机会，他们就会兴风作浪，想要推翻共产党，恢复旧中国。”“他们实际上是准备投降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主义的人。这种人在政治界、工商界、文化教育界、科学技术界、宗教界里都有，这是一些极端反动的人。这种人在五百万左右的人数中间，大约只占百分之一、二、三。”⁵

5月8日，中共中央统战部邀请党外人士以座谈会形式让他们给共产党提意见。仅仅在五月中旬前后，党外人士给党提出许多意

¹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50、355页

² 《毛泽东思想万岁》1949.10—1957卷，第212—213页

³ 《毛泽东思想万岁》1949.10—1957卷，第217页

⁴ 《党的文献》2002年第5期，第33页

⁵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04—405页。按记录稿确定数目大约是十万人左右，修改稿确定数字约是十五万人左右

见和建议，其中有些意见和建议让毛泽东很反感，从而使毛泽东提高了警惕性，这些意见摘几条如下：

无党派人士张奚若批评党和政府工作中存在“四种偏差”，“好大喜动，急功近利，鄙视即往，迷信将来”。民主人士陈铭枢也有类似的意见，7月15日，吴茂荪揭发陈铭枢于五月十八日写给毛泽东的一封信，信中批评毛泽东是“好大喜动，喜怒无常，偏听偏信，鄙夷旧的”。吴茂荪揭发陈铭枢“把毛主席说成是‘个人修养上的热而不淡，疾而不舒，躁而难宁，察而难周之失，也难免影响到察人听言，决策定计的睿断，以及在政策措施上的畸轻畸重，失缓失急。”“陈铭枢污蔑毛主席‘好大喜动’，并要毛主席‘更加深入体察，以求究竟’。他说毛主席有时‘为喜怒所乘，在一个浪潮之下，挫伤高级干部的自尊心和他们的固有地位’，他说毛主席‘轻信干部的虚假汇报与教条主义的分析方法，未经郑重细致的研究，即作过激的决定’。他认为毛主席‘过分鄙夷旧的’，‘对古典文学尚有不尊之处’”。¹

毛泽东对张奚若、陈铭枢的批评很反感，但又很重视，这从他多次批评证明了这一点。1958年1月11日，毛泽东《在南宁会议上的讲话》批评反“冒进”时回击了“陈铭枢批评我‘好大喜动，偏听偏信，喜怒无常，不爱古董’。”“张奚若（未划右派）批评我‘好大喜功，急功近利，轻视过去，迷信将来。’”“偏听偏信，不偏听不可能，是偏听资产阶级，还是偏听无产阶级的问题。有些问题偏听得不够，还要偏。我们不能偏听梁漱溟、陈铭枢。喜怒无常，常有也并不好，不能对资产阶级右派老是喜欢。不爱古董，这是比先进还是落后的问题，古董总落后一点嘛。”“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一般是后者居上，不是‘今不如古’，古董不可不好，也不可太好。北京拆牌楼，城墙打洞，张奚若也哭鼻子，这是政治。”²

1月28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再一次批评张奚若说，“好大喜功，看是好什么大，喜什么功？是革命派的好大喜功，还是反革命派的好大喜功？革命派里又有两种：是主观主义，形式主义的好大喜功，还是合乎实际的好大喜功。”“我们是好几亿人民之大，喜社会主义之功，这有什么不好呀？”“急功近利，要看是搞个人突出，主观主义，还是搞合乎实际，可以达到的平均

¹ 《人民日报》1957年7月15日

² 《毛泽东思想万岁》1958—1961卷，第6—7页

先进定额”。“至于鄙视过去，不是说过去没有好东西，过去是有好的东西，但是否对过去那么重视，老是天天想禹、汤、文、武、周公、孔子，我不赞成那样看历史。”“有的人为了拆城墙伤心，哭出眼泪，我不赞成。”“迷信将来，我们的目的是为了将来。”“我们把希望寄托于将来是对的，但不能迷信。”“陈铭枢说我‘偏听偏信，好大喜功，喜怒无常，轻视古董’。好大喜功我已经讲过了，至于偏听偏信，陈铭枢是叫我听梁漱溟、陈铭枢的，我不能偏听右派的，是偏听共产党，还是偏听国民党，杜勒斯。君子群而不党，没有此事，孔夫子‘杀少正卯，就是有党’，喜怒无常，陈铭枢你过去好，我就喜欢，现在你成了右派，我就愤怒，这还让我喜什么？说我不象个主席的样子，我这个人就是不象个主席的样子。还说轻视古董，古代的东西都好吗？我劝青年不要搞旧诗，不要那么重视古董。”¹

3月20日，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批评“好大喜功”，“张奚若批评我们‘好大喜功，急功近利，鄙视过去，迷信将来’。无产阶级就是这样嘛！任何一个阶级都是好大喜功。不‘好大喜功’，难道‘好小喜过’？”²

罗隆基批评“外行能领导内行”。从李维汉的回忆知道，“罗隆基说现在是马列主义小知识分子领导小资产阶级的大知识分子，外行领导内行之后”。³毛泽东才下决心反击的。我们可以从毛泽东多次批评罗隆基的论点，证明他非常重视，非常警惕的程度。1957年10月9日毛泽东《在党的八届中央扩大的三次全会上的讲话》指出，要“使自己成为内行，又红又专。”“右派说我们不能领导，‘外行不能领导内行’。我们驳右派说，我们能领导。我们能者是政治上能。”“罗隆基说，无产阶级小知识分子怎么能领导小资产阶级的大知识分子？他这个话不对。他说他是小资产阶级，其实他是资产阶级。无产阶级的‘小知识分子’，就是要领导资产阶级的大知识分子”。⁴

10月13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三次会议上的讲话》批评罗隆基说，“罗隆基不是讲过吗，无产阶级的小知识分子就领

¹ 《毛泽东思想万岁》1958—1961卷，第12—13页

² 《毛泽东思想万岁》1958—1961卷，第40—41页

³ 李维汉著：《回忆与研究》下，第834页

⁴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71、472、479页

导不了他这个小资产阶级的大知识分子。他不说他是资产阶级，一定要说他是小资产阶级，是小资产阶级的大知识分子。我看，不仅是无产阶级的小知识分子就是大字不认得几个的工人、农民，也比他‘罗隆基高明得多’”。¹

1958年1月28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讲话》中还批评“罗隆基说，‘小知识分子不能领导大知识分子’。我看工人阶级小知识分子领导大知识分子，这是条真理，工农出知识。”²

1957年5月16日，黄绍竑批评共产党直接向人民和政府发号施令。他所谈的是党政关系问题，绝不涉及党的领导权问题，而是领导方法问题。我觉得过去某些地方某些工作上，没有通过人民，通过政府，而直接向人民和政府发号施令，各地方或机关党委五人小组在肃反运动中直接处理案件，如党和政府共同发布决定而没有把党对各级党委的指示和政府人民的指示分开来，这样就可能导致人们或某些党员认为党的领导方法就是直接向人民和政府发号施令，这样对于动员和团结全国人民完成国家过渡时期总任务是有妨碍的，这样会造成很多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问题。³黄绍竑的意见引起毛泽东的高度警惕，促使他下决心进行反击。人民日报于7月10日发表题为《党不能发号施令吗？》的社论，说：“为了捍卫在人民民主国家中的党的领导地位，对于恶意的挑拨者和诽谤者，人民的任务却是给以坚决的、毫不含糊的回击！”⁴

毛泽东早就注意知识分子的思想动向，特别注意民主党派中过去主张过走“第三条道路”的“民主个人主义”头面人物，知名教授的思想动向。整风开始，罗隆基、陈铭枢、黄绍竑等人提出种种意见和建议，毛泽东下决心反击，而《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正是在这一大背景下产生的。这是从整风急剧转为反右的根本原因。

1957年5月15日，毛泽东写了《事情正在起变化》的文章，观察半个多月于6月12日才发到党内上层。这是从整风转向准备反右的重大决策，这篇文章以绝密文件形式发给党内高级干部阅读，其主要内容引用如下：

“几个月以来，人们都在批判教条主义，却放过了修正主义。

¹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84页

² 《毛泽东思想万岁》1958—1961卷，第15页

³ 《人民日报》1957年5月17日

⁴ 《人民日报》1957年7月10日

教条主义应当受到批判，不批判教条主义，许多错事不能改正。现在应当开始注意批判修正主义。……我党有大批的知识分子新党员（青年团员就更多），其中有一部分确实具有相当严重的修正主义思想。”“批判教条主义的有各种人。有共产党人——马克思主义者。有括弧里面的‘共产党’人，即共产党的右派——修正主义者。有社会上的左派、右派和中间派”。“最近这个时期，在民主党派中和高等学校中，右派表现得最坚决最猖狂。……我们还让他们猖狂一个时期，让他们走到顶点。他们越猖狂，对我们越有利益。人们说：怕钓鱼，或者说：诱敌深入，聚而歼之。”

“右派的特征正是他们的政治态度右。他们同我们有一种形式上的合作，实际上不合作。有些事合作，有些事不合作。平时合作，一遇到空子可钻，如象现在这样时机，就在实际上不想合作了。”“改造就是又团结，又斗争，以斗争之手段，达到团结之目的。斗争是互相斗争，现在是许多人向我们进行斗争的时候了。多数人的批评合理……右派的批评往往是恶意的，他们怀着敌对情绪。”“这一次批评运动和整风运动是共产党发动的。毒草同香花共生，牛鬼蛇神和麟凤龟龙并长，这是我们所料到的，也是我们所希望的。……有反共情绪的右派分子为了达到他们的企图，他们不顾一切，想要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刮起一阵害禾稼、毁房屋的七级以上的台风。他们越做得不合理，就会越快地把他们抛到过去假装合作、假装接受共产党领导的反面，让人民认识他们不过是一小撮反共反人民的牛鬼蛇神而已。那时他们就会把自己埋葬起来。这有什么不好呢？”

“右派有两条出路。一条，夹紧尾巴，改邪归正。一条，继续胡闹，自取灭亡。”“在我们的国家里，鉴别资产阶级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政治上的真假善恶，有几个标准。主要是看人们是否真正要社会主义和真正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大量的反动的乌烟瘴气的言论为什么允许登在报上？这是为了让人民见识这些毒草、毒气，以便锄掉它，灭掉它。”“‘你们把人们划为左、中、右，未免不合情况吧？’除了沙漠，凡有人群的地方，都有左、中、右，一万年以后还会是这样。为什么不合情况？划分了，使群众有一个观察人们的方向，便于争取中间，孤立右派。”¹

在这里，毛泽东首先将批判矛头转向修正主义思想，即社会上

¹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23～429页

的右派和党内的右派——修正主义者，对他们采取“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的策略，即开始使用“引蛇出洞”或“阳谋”的策略。第二，指出右派的特征是他们政治态度右。毛泽东认为他们右到不想跟共产党合作了。第三，指出右派的出路，不是改邪归正，就是自取灭亡这两条。第四，明确提出鉴别真假善恶的政治标准，主要是真要社会主义和真接受共产党的领导这两条，提出划分左、中、右的策略是为了孤立右派，打击右派。这篇文章是毛泽东放弃了批“左”、反“左”，转向只准批右、反右重大决策的转变，是放弃了批判封建专制及其附属物的思想作风和势力而打击、扼杀具有民主进步和改革开放思想与势力的一次重大转折。这一决策上的重大转变是在客观上维护、保护‘左’倾教条主义者、封建专制主义和封建思想残余势力，是以中断、放弃有限民主进步和改革开放以及纠正“三害”为代价的，确实换来了党内教条主义者、保守僵化势力和素质低下干部的支持。从后果看，是以牺牲百万知识精英为代价的，是以历史大倒退为代价的。从此，毛泽东的指导思想完全走上了犯“左”倾错误道路上来。而且越走越远，越走越深，终于酿成了“反右派”这一“左”倾错误。薄一波也承认，毛泽东“写了《事情正在起变化》的文章，发给党内高级干部阅读。”“这篇文章表明，毛主席关于整风的指导思想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决定要反击右派，发出了反击右派的信号。在实际工作中也开始了从整风到反右派斗争的转变。”¹

据李维汉回忆：“五月中旬，汇报到第三次或第四次时，已经放出一些不好的东西，什么‘轮流做庄’、海德公园等谬论都出来了。毛泽东同志警觉性很高，说他们这样搞，将来还会整到他们自己头上，决定把会上放出来的言论在《人民日报》发表，并且指示：要硬着头皮听，不要反驳，让他们放。在此次汇报之后，我才开始有反右的思想准备。”“当我汇报，有位高级民主人士说党外有些人对共产党的尖锐批评是‘姑嫂吵架’时，毛泽东同志说：不对，这不是姑嫂，是敌我。”“及至听到座谈会的汇报和罗隆基说现在是马列主义小知识分子领导小资产阶级的大知识分子、外行领导内行之后，就在5月15日写出了《事情正在起变化》这篇文章，发给党内高级干部阅读。”“这篇文章，表明毛泽东同志已经下定反击

¹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第612-613页

右派的决心。”¹这时的李维汉是紧跟毛泽东的，也执行了“引蛇出洞”的策略，冤枉了一些好人，当时惟恐跟不上，后来确实跟不上，被毛泽东撤了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的职务，直到毛泽东去世后，李维汉才恢复原职务。

黎澍指出：“这个讲话——指毛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讲话——广泛传达以后，在北京、天津、上海等几个大城市的民主人士和文化工作者中间果然起了鼓舞作用。他们被邀请在一些座谈会上发言。可是，即使这个时候，这种场合，发言者也还是心存顾虑。毛本人在《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中说，人们‘怕钓鱼’。这篇文章是反击右派进攻的信号。既然直到此时人们还说‘怕钓鱼’，可见直到反右派斗争开始时，也并没有什么资产阶级猖狂进攻需要打退。”²

根据毛泽东撰写的《事情正在起变化》文章的精神，中共中央发出了一系列指示，使整风向准备反击右派方向急剧转变。

1957年5月16日，《中央关于对待当前党外人士批评的指示》，其主要内容摘录如下：一方面肯定党外人士的批评基本上是正确的：“党外人士对我们批评，不管如何尖锐，包括北京大学傅鹰化学教授在内，基本上是诚恳的、正确的。这类批评占百分之九十以上，对我党整风，改正缺点错误，大有利益。”承认党内存在的错误“从揭露出来的事实看来，不正确地甚至是完全不合理地对党外人士发号施令，完全不信任和不尊重党外人士，以至造成深沟、高墙，不讲真话，没有友情，隔阂得很。党员评级评薪和提拔等事均有特权，党员高一等，党外低一等。党员盛气凌人，非党员作小媳妇。学校我党干部教员助教讲师教授资历低，学问少，不向资历高学问多的教员教授诚恳学习，反而向他们摆架子。以上情况，虽非全部，但甚普遍。这种错误方向，必须完全扳过来，而且越快越好。”另一方面要开始反驳：“少数带有反共情绪的人”，“发表一些带有煽动性的言论。”“放手让他们发表，并且暂时（几个星期）不要批驳，使右翼分子在人民面前暴露其反动面目，过一个时期再研究反驳的

¹ 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下，第833-834页

² 转引朱正《1957年夏季：从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第116页。黎澍《论历史的创造及其他》，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71页

问题。这一点，5月14日我们已告诉你们了。¹

5月20日，《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当前运动的领导的指示》指出：“现在的情况是，在上海、北京等运动已经展开的地方，右翼分子的言论颇为猖狂，但有些人的反动面目还没有暴露或者暴露不够。”“左翼分子前一时期不宜多讲话，共产党员则采取暂时不讲的方针。”“继续登载一些右翼分子的反动言论，最好是那些能够充分暴露他们的反动面目的言论（越反动的越好）。”“在一个时期内，党员仍以暂不发言为好。但是各省市党委必须指示宣传部门和党报立即着手分类研究右翼的反动言论和其他资产阶级论点，准备在适当时机（中央届时另作通知）发表一批论文和社论，予以反驳和批判。”²据薄一波回顾：“5月21日和25日，中央书记处连续召开会议，研究报纸宣传方针问题和写文章争鸣问题，并拟定了一批题目和指定了作者，确定了各文的审稿人和交稿日期。”³

5月25日，毛泽东《接见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全体会议代表时的讲话》中指出：“中国共产党是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没有这样一个核心，社会主义事业就不能胜利。”“同志们，团结起来，坚决地勇敢地为人民的伟大事业而奋斗。一切离开社会主义的言论行动是完全错误的。”⁴据薄一波回顾说：“如果说以前的指示都是党内的，并且是‘绝密’文件，限制在一定级别的范围内传达，莫说普通党员，就是级别较低的党员干部都不知道；那么，毛泽东这次接见青年团代表的谈话，一方面是向党内党外‘打招呼’，另一方面则是反击右派的公开动员令。”⁵

6月6日，中央发布《中央关于加紧进行整风的指示》，其主要内容：第一，加紧进行整风：“毛泽东同志2月27日在最高国务会

¹ 指中共中央1957年5月14日发出的关于报道党外人士对党政各方面工作的批评的指示：“目前，对于党外人士的错误的批评，特别是对于右倾分子的言论，不要反驳，必须原样地、不加粉饰地报道出来，近来许多党报加以删节，是不妥当的，这实际上是帮助了右倾分子，并且使人感到是我们惧怕这些言论。这种现象，请你们立即加以纠正。”《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第478页

² 转引叶永烈《反右派始末》，第185-186页

³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第615页

⁴ 《人民日报》1957年5月26日

⁵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第614页

议及3月间在宣传会议的两次讲话，准备于6月15日左右在报上发表。各省市一级机关、高等学校及地市一级机关用大鸣大放方法的整风，请即加紧进行。”第二，肯定大字报：“在机关及高等学校内部出大字报，一可以揭露官僚主义等错误缺点，二可以暴露一部分有反动思想和错误思想的人的面貌，三可以锻炼党团员及中间派群众，故利多害少，毫不足怕。大字报是延安整风时期的传统，并非现在才有。如果阻止出大字报，就会陷于被动。”第三，对党外人士批评态度：“至于各民主党派及社会人士大鸣大放，使建设性的批评与牛鬼蛇神（即破坏性批评）都放出来，以便分别处理，大有好处。必须注意争取中间派，团结左派，以便时机一成熟，即动员他们反击右派和反动分子。”第四，按左中右标准排队：“北京的情况证明，各民主党派、高等学校和许多机关中暴露出一大批反动思想和错误思想，反动分子乘机活跃，但是他们只占各单位人数的百分之几，最反动的分子不过百分之一，百分之九十几是中间派和左派。请你们注意将你们的单位人数，在运动中，按左中右标准，排一下队，使自己心中有数。”第五，尽快整改。“最后请你们注意一点，在各高等学校和各机关，凡是不合理的事而又现在能解决的，应当尽快解决一批，以利争取中间派，孤立右派。”¹

可以看出，自5月14日的指示以后，正在积极着手准备反右派斗争。“引蛇出洞”的策略，大民主的方法，抓右派的比例等均已确立。

李维汉将座谈会和其他部门提出的意见、批评和建议，归结为：第一，攻击共产党的领导；第二，攻击社会主义制度不如资本主义制度，没有优越性，诬蔑我国国内“一团糟”；第三，全盘否定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成绩，否定历次政治运动，攻击“两点论”是教条，叫嚷要为反革命“平反”，说“历次运动失败的居多”，“肃反的念头和错误很大很大”。第四，反对农业合作化、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粮食统购统销等社会主义改造的根本政策。攻击“现在政治黑暗，道德败坏，各级机关都是官僚机构，比国民党还坏”。反对社会主义的新闻事业，鼓吹资产阶级的新闻路线，提出让私人办报、办新闻社。第五，夸大党的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攻击讲优点成绩的人是歌功颂德，造成一种只许

¹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491-492页

讲缺点和错误，不许讲优点成绩的空气，把官僚主义说成是官僚主义的产物和代名词，把主观主义、教条主义说成是马克思主义的产物和代名词，把宗派主义说成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产物和代名词。第六，反对工人阶级的领导，否认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本质区别，不承认资产阶级有继续改造的必要性。公开提出共产党退出机关、学校，公方代表退出公私合营企业，叫嚣根本的办法是改变社会制度。¹

邓小平在《关于整风运动的报告》中认为，鸣放、大鸣大放的言论“其实质就是反对社会主义，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在报告中列举右派“在政治上的主要论点是：（1）宣扬资产阶级的经济政治制度和资产阶级文化，反对社会主义经济政治制度和社会主义文化。

（2）反对国家的基本政策，如外交政策、统购统销政策、知识分子政策、五大运动等。（3）否认人民民主革命、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否认党和无产阶级能够领导国家建设。（4）反对党对国家工作的领导，反对党在各个部门（特别是文教科学技术部门）的领导，要求取消党在若干基层单位（特别是高等学校和新闻出版机关）的领导。右派在学术文化方面的主要论点：外行不能领导内行。马克思主义就是教条主义。社会主义国家没有科学文化，有也不如资本主义国家。要求资产阶级的社会学、经济学、历史学、唯心论哲学复辟。向党和人民政府要求‘独立’和‘自由’、‘新闻自由’、‘出版自由’、‘文艺自由’等等”²

李维汉、邓小平的主要论点都是无限上纲、上线，为了树立对立面大造舆论，为准备反击找出充足的理由和根据，然后择准时机实行大规模地反击。显然，这些论点对反右派斗争犯严重扩大化错误起到了极大的推波助澜作用。

整风运动开始不久，一些高等学校的学生卷入到了运动中。走在前面的是北京大学的学生。他们参加整风，使整风复杂起来。现择其要者摘录于下：

1957年5月19日，燕园处在往日的宁静里。人们按时从宿舍走向饭厅，从饭厅走向课堂。一切都和往常一样。然而在这个平凡的日子里，北京大学的校史掀开了光辉的一页。中午，一张红色的大字报出现在大饭厅灰色的墙壁上，质问团委会出席“三大”的北

¹ 参见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下，第832—833页

² 《社会主义建设教育的阅读文件汇编》第一编上，第274页

大代表是如何产生的。接着出现了“一个大胆的倡议”建议开辟“民主墙”。要求党团领导支持，以帮助党整风。这两张普通的大字报，揭开了北大民主运动的序幕。大字报像雨后春笋一样增多着，宿舍、饭厅的墙壁上都贴满了。据“新闻公报”统计，截至20日下午5时20分止已有大字报162张。晚饭后，新的辩论会形式出现了，大家把饭桌当了讲台，发表自己的见解，这就弥补了大字报不能充分说理的缺陷。晚上，江书记代表党委宣布支持大字报。21号，刘奇弟贴出了“胡风不是反革命分子，要政府释放他”的大字报，轰动了全校。跟着许多讨论胡风问题的文章出现了。不少人都抱着怀疑的态度，认为根据三批材料不足以说明胡风是反革命分子。双方展开了争论。22日，大字报大量增加，由饭厅附近扩展到宿舍和教室区了。到处是辩论会、演讲台。人们沸腾起来了，许多同学要求停课参加民主运动。当晚，在廿七斋前的一个数百人的辩论会上发生了令人遗憾的事情，一群有组织的“群众”围攻两个昨晚辩论会上说错了话的同学，出现了“肃反斗争会的气息”，质问这两个同学有何意图，施加压力。然而同学们没有让这种不良现象继续下去，经过几小时的辩论之后，情况好转了。第二天党委会在广播台广播了一封致党员的公开信，要求党员不要压制群众说话。23号，法律系同学邀请刘奇弟等三人开辩论会，学生会特地搭了一座辩论台，并安上了麦克风。这是个大型辩论会，参加的人很多。在辩论开始不久，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四年级林希翎（程海果）同学上台发言。她谈到胡风问题，认为信中写我们文艺界领导者的话，不过是一种谩骂而已，不足以作为罪证断言是反革命。顺便谈到了当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一些问题，表示同意铁托同志的一些看法，认为“个人崇拜”是由于某些具体的政治制度造成的。（她声明拥护社会主义公有制。）最后谈到青年人应该怎样生活，说过去生活是机械公式的。见面之后总不外“天气好”之类的应酬话。我们青年应该争取过真正社会主义的人的生活，就是说，人的特长充分发展，个性真正解放，人与人之间真正平等友爱的生活。她的某些观点是不够全面的，当即遭到某些人恶意的攻击。会场秩序大乱，这些观点在她第二次来北大参加辩论时，得到了补充和说明。上面所谈的只是一些特别引人注意的大事，而琳琅满目的大字报所反映的问题是更加丰富多彩的。关于教学方面，许多人提出要求改革学制，开放全部禁书，改变考试制度，取消政治课必修制。（这一点引起强烈争论）反对盲目学习苏联，特别反对盲目崇拜苏联的教条主义（例如在苏联历史

中明显的大国沙文主义的倾向)。关于选派留学生制度，大家坚决反对宗派主义的作法，要求公开考试，并提出出国攻读希望政府支持，对于学校中具体问题提的很多，这里不详细叙述了。¹

“五·一九”开始的十几天里，北大学生生活起了重大变化，过去压抑着青年的一切戒律、禁忌、偶像、教条都被打得粉碎，笼罩在青年生活中的沉滞、呆板、相互不信任、冷淡、唯唯诺诺的风气改变了，一种新的充溢着生命力的生活已在建立，年青人已经敢于无所顾忌地大放大鸣，畅所欲言了。敢于大胆地唱，大胆地爱，敢于行动，敢于创造。²

十几天的生活表明：在过去缺乏民主空气的情况下“三害”多么深重地压抑了青年的进取心，束缚了青年的创造力，窒息了人们的思想，破坏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青年人对于“三害”是多么痛恨，对于民主自由的渴望是多么迫切！中央关于“百家争鸣”的方针正是在他们积极争取下，才冲破了一切保守势力得到充分贯彻。群众要想得到自由民主，全靠自己积极争取，“恩赐”的民主是不存在的。一旦群众掌握了社会主义民主这一有力武器，一切官僚主义，宗派主义，教条主义都将被群众民主的洪流冲洗干尽。这次民主运动，主要的是一次群众在拥护社会主义的前提下，自下而上地争取扩大社会主义民主的政治运动，是青年人挣脱一切束缚，争取思想解放的启蒙运动，是东方文艺复兴的序幕。“五·一九”的重大意义，将为历史所证明。³

“五·一九运动”第二天，即1957年5月2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加强当前运动的领导的指示》：“在最近期间，应该集中力量先在机关、文教系统内解决我们同党外人士和知识分子之间的矛盾，此外不要点火，特别不要同时在工厂和学生中发动工人和学生的批评运动。……在报纸上，目前不应该挑起这两方面的问题，不要登载工人、学生、农民闹事的消息。……如果发生的工人、学生闹事的事件，应该采取说服教育、合理解决的办法，迅速处理下去。”⁴

¹ 摘自牛汉、邓九平主编《原上草》，经济日报出版社1998年版，第21、22、24页

² 摘自牛汉、邓九平主编《原上草》，经济日报出版社1998年版，第23、26页

³ 摘自牛汉、邓九平主编《原上草》，第26-27页

⁴ 转引叶永烈《反右派始末》第186页

在这个指示发出之后,《光明日报》、《文汇报》先后报道了北京大学“五·一九运动”。其影响迅速地传播到全国。比如,北京大学“五·一九运动”迅速传播到武汉大学。一位北京大学研究生给武汉大学年轻教师写了好几封信。现摘录其中两封信的内容:

(一)

××:

今天我要给你们写信是因为我有了一个新的印象,不能已于言,这个新的印象使得我激动、兴奋,迫切地需要和你们谈一谈。

归纳起来,问题大致有这样一些,要求取消党委负责制,要求扩大民主广开言路,要求减轻课程……,有诉苦的,几年来过着一种窒息性的生活,思想被束缚在一根绳子上。有攻击性的,号召大家发扬五四传统,向三害分子开炮,也有自称为我是一根毒草,说了许多所谓污蔑性的反动话的,也有对于目前情势的估计:是时候了该起来斗争,怒吼了,等等。

事态这样发展下去,是好得很还是糟得很呢?个人的估计是不同的,我隐约听到一些小声的喊喊,注意只是隐约听到只是极潜在的说天下将要大乱了,自由主义将气温成灾了,但是绝大多数的人都是赞成这个运动的发展的,它是健康的,有力的,没有这样一个群众风暴,决不可能打倒三害分子,学校党组织开紧急会议,学生会也开了紧急会议,晚饭时,学生会表示态度,热烈支持同学们的大鸣大放,并且集纳同学们的建议,开辟民主墙,开办各种形式的讨论会。晚上江副校长代表北大党委向全校师生员工讲话,表示态度,讲过去党委决定的整风方式是不对的、保守的,同学们利用大字报向学校党组织提出尖锐的意见,这是很好的,他代表党委表示完全赞同同学们的行动,并且检查了党委和他自己的官僚主义,要求大家大胆的鸣放,尖锐的批评。

过去我们常谈到幸福,我觉得过去我们是有过幸福的,但是,说实在话那是一种理智上的幸福,是一种必须经过思索才能理解的幸福,在感情上,如果不是沉重就是麻木,无论如何,不能产生一种使自己整个身心都能沉浸进去的幸福感,也许有,那是在天安门游行的一霎那所产生的,但一会就消逝了。

现在却不然,现在,我觉得我们走进了一个全新的历史领域,过着一种全新的生活,真正的民主,真正的自由、真正的有了人的个性的全面发展,人只要是中国人,生活在这个时代里,不必压制什么,不必不自主地接受外来干涉,相反而是自由地发展自己,自

由地做自己所愿做的事，自己就是自己，人的本质得到充实而完善的实现，爱什么就爱什么，做什么就做什么，人的尊严，人的独创性得到承认、鼓励和法律的保护，这种生活在任何国家里都不会有，在人类历史上，在中国是第一次有了，所以这是一种从理智到情感都能确实感到的真正的幸福。百家争鸣和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提出以后，我闻到一点风声，只有在今天，我才真正的感受到。

×× 57年5月20日

(二)

××：

25号发的信收到了。

我们这里差不多每天都有新的情况，每个新的情况都使人们的思想向前跃进一步，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现在，那个挡住人们自由思想的大堤已经被冲溃了，自由思想像洪水一样，以欢快急促的步伐，奔腾着、泛滥着，非常有趣，在这个场面下，过去的积极分子、进步分子一变而为落后分子，落后分子则变成今天的积极分子了，刚好倒了一个头。

应该告诉你，26号光明日报的报道是不准确的，起码打个对折，不亲自参加这个事件的人是看不懂这篇通讯的，事件本身是激烈的，有尖锐的冲突的，有的是拿整个的生命对三害分子作控诉，有的是对现有的某些制度的大胆怀疑，一切的权威，一切束缚人们自由思想的罗网在这里都没有他们的地位，在这里奉行的原则是理性，然而这一切，在光明日报的通讯里却一点也看不到。但是，也应该看到，光明日报却是最先进的，其他的报纸甚至连这一点都做不到，我从这件事里懂得了一点秘密：自下而上的，自发性，群众争取民主的大风暴毕竟是件不十分受人欢迎的东西，也许是一件可怕的东西。自上而下发扬民主和自下而上的争取民主在理论上是一致的，实际上不尽然，北大的情况可以说是全中国的一幅缩影，它说明现行的政策是用一种逐步的缓和的方法冲淡一些积累已久的矛盾。并不是用大刀阔斧的方法造成一种群众性的民主高潮。但是，如果没有这种群众性的民主高潮，如果群众没有直接起来大胆地干预政治。那么，要想从根本上消除三害，无异于缘木求鱼。因此，我对这次整风的估计是不太乐观的。

诚然，报纸上谈了很多，也揭露了很多见不得天日的东西。但是，这仍然只停留在现象上。产生的这些现象的某些根源在于现存的某些制度，而这一点，却是很多人不敢讲，也是很多人不愿听的，

社会主义的公有制当然好，我举双手拥护这个制度，如果有人敢破坏公有制，企图恢复过去的人剥削人的制度，我将用我的生命来保卫它，这是不成问题的。另一方面，不得不承认，社会主义的分配有许多极不合理的地方，社会主义的民主，只看得见一点影子，社会主义的法制极不健全，人们被人为地分成若干等级，少数特选人物享有封建性的特权，这就使得广大人民处在一种窒息的状态中，虽然我说的这些在宪法和公开发布的文件上看不到，却的的确确是生活的真实，这不是一个纯理论性的问题，在今天如果对这个问题作学究性的争论是可笑的，这是每一个正直的公民从他全部的情感合理之所痛切感受到的问题。

在过去，我们只能说同样的话，唱同样的调子，人们的性灵被禁锢起来，不敢自由地思想、自由地感受，这对一个知识分子来说，是比受肉体上的重刑还要难受，更可悲的是，我们甚至不敢正视现实，不敢去感受我们说所受到的痛苦，每当我们在现实中碰了壁，总是反求诸己，拿一项不适合的帽子自己压自己，一天天地变麻木了、迟钝了，我们现在应该起来争取思想言论的自由，那些用大脑思想的人是值得尊重的，即令他想错了也是值得尊重的。相反，用鼻子来代替思想的人应该受到鄙弃，他们是像狗一样到处嗅，嗅领导的风声，嗅权威的片言只语，思想言论自由在宪法上明文规定，但在实际生活中却没有，这不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吗？

人的尊严和人权在过去可以随意受到侮辱和损害，人们生活着，但是随时都有被批判被斗争的可能，有一种人专门做抓小辫子的工作，抓住了就记在小本本上，在适当的场合，成为批判斗争的材料，而自己则没有任何凭借来保卫自己，作为一个人，有独立的人格，有独立的思想，他有权利和别人站在平等的地位上互相辩驳，尽可以不同意，竟可以争得面红耳赤，但是，他却没有做别的箭靶子的义务，而别人也没有批判斗争他的任何权利，在过去，这种不合理的情况却被视为当然，学生可以指着老师的鼻子破口大骂，同学也可以对同学们做，在这么做的时候，有自觉的，有昧着良心的，有糊涂的，但不管怎样，背后有一个强有力的指使者，试问，这种做法和我们这个社会制度的本质是相符合的吗？人为的等级多极了，党员一等，团员二等，群众，这三等中又可分为若干等，工人出身、中农出身……，在干部制度上也有多种分法，几级干部坐什么车子，吃什么饭、住什么房子都有详细规定，一层一层往下压，如果你是不幸地被列入最末等。那么，注定了永世不得翻身，工作分配，生

活待遇、社会地位……，直到进工厂去参观都有着决定性的影响。这是社会主义的正常现象，我也没有把这种等级说成阶级，因为这是不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的，我只是指出目前有一种可怕的人为的等级制，人的人格和人的一切都受它的支配，居高位者不仅为所欲为，把个人意志强加在别人身上，而且在人格上也比别人高一等，生下来的子女也比别人高一等。这实实在在是一种可耻的封建制，难道说这也和社会主义相容吗？

三反、思想改造和肃反这三个运动应该做重新估计。三反和思想改造属于人民内部问题，而使用的手段是根本错误的，在肃反问题上，扩大化了，更值得深思的是为什么造成扩大化，为什么法制在这里不起作用，为什么人权得不到保障？举胡风的例子说（我不是为他辩护，只是举例），说胡风是反革命，仅只是人民日报的判断，这就是说只有原告在说话，被告没有说话的权利，被告不能为自己辩护，没有经过法庭审讯，这是不合法的，过去我们的斗争都是如此，只有原告在说话，原告是什么话都说得出的，只要能证明自己的论点，不惜歪曲材料，而被告反正没有发言权，这样，整个肃反就是在一种主观主义想当然的盲目的破坏法制的情况下进行的，没有人敢出头来阻止，没有任何机关来控制，而正直的公民除了相信自己的良心以外，找不到任何的辩护，要不是中央谨慎，将有很多人含冤死去，万一中央不谨慎，这个可怕的事很难保证不会发生，斯大林的罪恶就是这样产生的，今后是否不会有这类事发生呢？很难说，因为如果把它寄托在个人身上，寄托在不可靠的思想意识上，那是不成的，一切都要用法律的形式巩固下来，破坏法律，不管他是什么人，都是社会主义的罪人，上至元首，下至老百姓，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人民的权利，包括人的尊严和人权，都受到法律的保护，律师是自由职业者，不受国家的控制，律师应该成为正义和真理的使者。

官僚主义和群众性的民主高潮是势不两立的，惟有群众才能从根铲除三害。因此，这个运动可以获得彻底的胜利，也可以受到控制获得某些胜利，也可以以一场悲喜剧而告终，关键问题，在于群众对民主的认识要求和争取，在于这个运动的广泛性，（特别是农村）在于民族传统在群众中的建立和巩固。

有些地方有些场合，对三害的斗争被歪曲了，被庸俗化了，而变成一个不关痛痒的生活检讨会，一个生活检讨会能解决什么问题？这是因为某些领导者心存顾虑，把人民当阿斗，而人民也觉悟

不高以阿斗自居，这是可恨的。

在现在，光喊共产党万岁，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是不够的。还要喊：

理性的原则万岁！

民主和自由万岁！

社会主义的法制万岁！

×× 57年5月27日”¹

这两封具有高质量、高水平、具有远见卓识的反封建、争民主、捍人权的信，由收信人在武汉大学公布，对武大鸣放起到煽风点火的催化作用。后来武大把它当做毒草加以铲除，写信人和收信人都被打成极右分子。

“五一九民主运动”、北大和其他高校的鸣放，被领导层认定为是令人担心的学生闹事，从此密切注意北大学生的动向。实际上，学生参与鸣放应该被认为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继承和发扬，是新时期一次具有反封建专制主义遗毒的民主运动。学生们提出问题是深层次的、高质量的、具有前瞻性的，他们无私无畏，没有政治野心，是在拥护和承认社会主义前提下提出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维护人权以及各种改革开放的建议；他们是在喊“中国共产党万岁！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还不够的情况下，还要补充喊出：理性的原则万岁！民主和自由万岁！社会主义的法制万岁！这些思想和观点，应该说是完全正确的。

领导层把这些学生的意见视为异端，认为是干扰了整风运动，视为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加以扼杀，是极端错误的。进一步说，社会上出现的鸣放思潮是领导者有计划、有步骤和有目的让人们发表出来的，看到这股思潮的巨大作用，当局开始反悔，立即加以压制和消灭，自以为会永远消失。而真理总归是真理，经过20多年后，新一代领导人吸取毛泽东的错误教训，举起改革开放，发扬和实行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的旗帜，不过是把当年学生们和有识之士提出的问题付诸实践。总之，经过20多年的穷折腾之后，才认识到1957年北京大学等高校学生们和有识之士提出的反封建争民主建议改革开放思想的难能可贵，才认识到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

二、“引蛇出洞”的策略

¹ 引自《武汉大学右派言论集》

毛泽东一生几十年中，都是从政治斗争、军事斗争中度过的，对敌斗争的一套战略、策略运用自如。新中国成立后，由于政治运动的需要，他又把当年对付敌人的“诱敌深入”和“引蛇出洞”等策略，运用于整风运动中。

1957年1月27日，毛泽东在《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中，讲到后发制人，他说：“对民主人士，我们要让他们唱对台戏，放手让他们批评。如果我们不这样做，就有点像国民党了。国民党很怕批评，每次开参政会就诚惶诚恐。民主人士的批评也无非是两种：一种是错的，一种是不错的。不错的可以补足我们的短处，错的要反驳。至于梁漱溟、彭一湖、章乃器那一类人，他们有屁就让他们放，放出来有利，让大家闻一闻，是香的还是臭的，经过讨论，争取多数，使他们孤立起来。他们要闹，就让他们闹够。多行不义必自毙。他们讲的话越错越好，犯的错误越大越好，这样他们就越孤立，就越能从反面教育人民。我们对待民主人士，要又团结又斗争，分别情况，有一些要主动采取措施，有一些要让他暴露，后发制人，不要先发制人。”¹这里已经定下了对待民主人士言行采取“让他暴露，后发制人”的策略。

2月27日，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毛泽东作了《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讲话》，3-4月份先后去天津、济南、上海、南京、安徽、杭州等党政干部、部队会议上结合当地实际宣讲他的讲话精神，鼓励大家接受“讲话”的思想。4月11日上午，毛泽东在丰泽园接见了贺麟，那次被接见的还有周谷城、胡绳、郑昕、冯友兰、费孝通、王方名等共12人。毛主席对大家讲：“我感觉你们这些当教授的被搞苦了，你们自己研究学问，向学生讲课，但我们的干部习惯搞阶级斗争，就不把你们讲的东西当客观的学问看。于是就顺手牵羊来搞你们。我们现在要整风。我们整教条主义是有经验的，你们有什么意见尽管谈出来，不会对你们怎么样的。”²这是毛泽东亲自动员教授们鸣放。

4月30日，毛泽东邀请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负责人上天安门城楼，说：“今天请各位来，是要请各位帮助我党整风。”“有人讲民主党派没有什么了不起，只不过是一根头发罢了，一根头发有没有无关紧要。其实这大错特错。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

¹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55页

² 《人物》1987年第5期，第91—92页

是联系着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不是一根头发，是一把头发，后边连着一大片头皮，不可藐视哩”“现在是新时代和新任务，阶级斗争结束，向自然界宣战！”“中国共产党要进行整风，中共中央书记处和统战部要主动找党外人士开座谈会，征求意见。”¹这里可以看出，毛泽东主动的“引”，让被邀请的民主人士无顾虑的“放”，就是“引蛇出洞”。

五月中旬期间，毛泽东撰写题为《事情正在起变化》这一篇极为重要的文章。²现在将有关“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的策略部分摘录如下：“最近这个时期，在民主党派中和高等学校中，右派表现得最坚决最猖狂。……现在右派的进攻还没有达到顶点，他们正在兴高采烈。党内党外的右派都不懂辩证法：物极必反。我们还要让他们猖狂一个时期，让他们走到顶点。他们越猖狂，对于我们越有利益。人们说：怕钓鱼，或者说：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现在大批的鱼自己浮到水面上来了，并不要钓。这种鱼不是普通的鱼，大概是鲨鱼吧，具有利牙，喜欢吃人。”“这一次批评运动和整风运动是共产党发动的。毒草共香花同生，牛鬼蛇神与麟凤龟龙并长，这是我们所料到的，也是我们所希望的。毕竟好的是多数，坏的是少数。人们说钓大鱼，我们说锄毒草，事情一样，说法不同。”“大量的反动的乌烟瘴气的言论为什么允许登在报上？这是为了让人民见识这些毒草、毒气，以便锄掉它，灭掉它。”³这篇文章在党内高层中传达，让高层领导掌握其精神，党中央积极落实这篇文章的指示精神。文章中的‘引蛇出洞’说得再清楚不过，给整风、反右带来极为严重的影响。

反击右派进行中，1957年7月1日，毛泽东撰写《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评》社论，在回答有人说“诱敌深入”的策略是一个阴谋时，说：“本报及一切党报，在5月8日至6月7日这个期间，执行了中共中央的指示，正是这样做的。其目的是让魍魉魍魉，牛鬼蛇神‘大鸣大放’，让毒草大长特长，使人民看见，大吃一惊，原来世界上还有这些东西，以便动手歼灭这些丑类。就是说，

¹ 转引叶永烈《反右派始末》第95—96页

² “时间为1957年5月15日，并在右上角‘内部文件，注意保存’后加写了以下文字：‘不登报纸，不让新闻记者知道，不给党内不可靠的人。大概要待半年或一年之后，才考虑在中国报纸上发表’。这篇文章当年和第二年均未发表，后来编入《毛泽东选集》第5卷，于1977年4月第一次公开发表。”

³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25、427-428页

共产党看出了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这一场阶级斗争是不可避免的，让资产阶级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发动这一场战争，报纸在一个期间内，不登或少登正面意见，对资产阶级反动右派的猖狂进攻不予回击，一切整风的机关学校的党组织，对于这种猖狂进攻在一个时期内也一概不予回击，使群众看得清清楚楚，什么人的批评是善意的，什么人的所谓批评是恶意的，从而聚集力量，等待时机成熟，实行反击。有人说，这是阴谋。我们说，这是阳谋。因为事先告诉了敌人：牛鬼蛇神只有让它们出笼，才好歼灭它们，毒草只有让它们出土，才便于锄掉。农民不是每年要除几次草吗？草锄过来还可作肥料。”¹这个“诱敌深入，聚而歼灭”的策略，是1月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关于“对待民主人士，要又团结又斗争，分别情况，有一些要主动采取措施，有一些要让他暴露，后发制人，不要先发制人”策略的运用和发展。

毛泽东对“诱敌深入”、“引蛇出洞”的策略并不讳言，到反右派快结束的时候，1957年10月9日《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三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承认：“去年下半年，阶级斗争有过缓和，那是有意识地要缓和一下，但是，你一缓和，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地主、富农以及一部分富裕中农，就向我们进攻，这是今年的事。我们缓和一下，他进攻，那也好，我们取得主动。正像人民日报一篇社论说的，‘树欲静而风不止’。他要吹风嘛！他要吹几级台风。那么好，我们就搞‘防护林带’。这就是反右派，就是整风。”²在这里，毛泽东把阶级斗争人为的运用自如，想缓和就搞鸣放，搞“引蛇出洞”！想激化、尖锐化就搞反右来歼灭“牛鬼蛇神”。这段话实际上总结人为阶级斗争的“规律”和“引蛇出洞”策略的经验。所以说，知识分子的命运完全掌握在毛泽东手中，命系一人，太危险可怕。

毛泽东制定和发出的“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的策略，或称为“引蛇出洞”的策略，中央和各级党委遵照执行。1957年5月16日，《中共中央关于对待当前党外人士批评的指示》说：“最近一些天以来，社会上也有极少数带有反共情绪的人跃跃欲试，发表一些带有煽动性的言论，企图将正确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巩固人民民主专政，以利社会主义建设的正确方向，引导到错误的方向，此点请

¹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36—437页

²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75—476页

你们注意，放手让他们发表，并且暂时（几个星期内）不要批驳，使右翼分子在人民面前暴露其反动面目，过一个时期再研究反驳的问题。”¹在这里提出放手让带有反共情绪的右翼分子们发表错误言论，积极贯彻“诱敌深入”的策略。

5月20日，《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对当前运动的领导的指示》说：“关于如何对待当前党外人士批评的问题，中央在5月14日，5月16日两次指示中已经告诉你们。现在的情况是，在上海、北京等运动已经展开的地方，右翼分子的言论颇为猖狂，但有些人的反动面目还没有暴露或者暴露不够。中间分子的批评，一般是善意和有益处的，但大多数是侧重批评方面，而正确的言论还较少，特别是由他们出面来驳斥右翼反动言论的更少；左翼分子前一时期不宜多讲话，共产党员则采取暂不讲的方针。因此，在最近的报纸上，很自然地表现为批评、不满甚至谩骂的言论占了主要篇幅。这在前一阶段是完全必要的，但是报纸这样报道的时间过长、分量过大，特别是正面言论少，是不利的。为了‘好好掌握形式，设法团结多数中间力量，逐步孤立右派，争取胜利’（5月16日指示），各级党委必须根据本地运动的发展情况，切实加强运动的领导。为此，中央提出如下各点，望加注意：

现摘录如下：甲，继续登载一些右翼分子的反动言论，最好是登载那些能够充分暴露他们的反动面目的言论（越反动的越好），但是右翼分子言论在报上所占比重应逐步缩小，特别是那种一般性批评和谩骂的东西，更应少登或不登。乙，特别注意登载中间分子那些比较公道的、批评右翼分子某些反动论点和批评某些错误观点的言论，这种言论应该逐步增多，占到报纸的主要篇幅。丙，应该逐步增加一些左翼分子的言论，但暂时不宜过多，特别注意登他们一些有说服力的东西不要登他们那些没有说服力和火气太大的东西，特别是“乱扣帽子”的东西。丁，应该登载关于改进工作的事实报道，并且告诉同志们怎样去改进工作。戊，在一个短期内，党员仍以暂不发言为好，但是各省市党委必须指导宣传部门和党报立即着手分类研究右翼的反动言论和其他资产阶级论点，准备在适当时机（中央届时另作通知）发表一些论文和社论，予以反驳和批判。²由此看出，反击的准备工作的准备工作，正在积极进行之中，登载那些“越反

¹ 转引叶永烈《反右派始末》，第184页

² 转引叶永烈《反右派始末》，第185—186页

动越好”的言论，还在继续“诱敌深入”，待时机成熟，“聚而歼之”。

6月6日，《中央关于加紧进行整风的指示》指出：“至于各民主党派及社会人士大鸣大放，使建设性的批评与牛鬼蛇神（即破坏性批评）都放出来，以便分别处理，大有好处。必须注意争取中间派，团结左派，以便时机一成熟，即动员他们反击右派和反动分子。”“北京的情况（证明），各民主党派、高等学校和许多机关中暴露出一大批反动思想和错误思想，反动分子乘机活跃，但是他们只占各单位人数的百分之几，最反动的分子不过百分之一，百分之九十几是中间派所和左派。请你们注意将你们的单位人数，在运动中，按左中右标准，排一下队，使自己心中有数。”¹这个文件认定“最反动的分子不过百分之一”，要按左中右标准排队，“引蛇出洞”差不多了，时机一成熟，就进行反击。

自毛泽东5月15日撰写《事情正在起变化》文章，发给党内高级干部阅读，表明毛泽东下决心要反击右派。据李维汉回忆：“工商界人士座谈会开始于五月中旬。这时，中央要反右的方针在我们脑子里已清楚了。当时胡子婴从西北视察回来，在会上讲了上海一些工厂搬迁西北，办得不好。黄炎培从外地考察回来，也讲了一篇类似的话。我看到如果让他们这样讲下去，将来要划右派不好办，就宣布休息，请孙起孟去做黄炎培的工作，保护了他。工商界座谈会期间，有人提出真正的资本家与会不多，代表性不够，于是又不断扩充规模，找了北京的吴金粹、天津的董少臣，上海的李康年等一些人到会鸣放，后来这些人都划为右派。这个做法实际上是‘引蛇出洞’，把对敌斗争的一套用于人民内部，混淆了敌我。这个教训深刻的。”²从这里看出，中央让某些党外高层人士不当右派，早已心中有数，像胡子婴、黄炎培就属于保护的人，像吴金粹、董少臣、李康年是请出来当右派的，是“引蛇出洞”策略的对象。让谁当右派，谁不当右派，毛泽东、统战部是早已定好的。中央如此，地方或下面，谁当右派，谁不当右派，党的领导人是心中有数的。

时任中华全国工商联会秘书长千家驹回忆说：“毛泽东有一次召开最高国务会议，参加的除中共领导人外，还有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的头头们。章伯钧在中国民主同盟总部传达毛泽东

¹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第491-492页

² 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下，第834-835页

在最高国务会议的讲话时说，毛泽东说在大学里大家如果对党委有意见，可以考虑取消。很明显，毛泽东是决不会主张取消党委对学校的领导的，这句话可能是一问号句，也可能是一种试探。但当章伯钧在民盟中央作这个传达时，在座的还有沈钧儒、史良、高崇民、罗隆基、胡愈之等，他们都是出席最高国务会议的，但谁都没有出来纠正章伯钧这句传达。章伯钧的传达由民盟中央打印分发各省市组织，在许多知识分子中广为传播，有的人就在座谈会上提出学校取消党委领导的意见，到了反右以后，这些人统统被打成右派分子。¹

原北京农业大学党委书记施平回忆说：“‘反右’正式开始前，北京市委主要领导人多次召开大学党委书记会议，听取各校关于民主党派、教师、学生帮助党整风‘鸣放’的情况，布置各校抓紧时间，动员‘鸣放’。有一天下午，市委负责同志找了清华、北大、师大和北农大四所重点大学的党委书记去谈话，听取了学校‘鸣放’情况后说：你们几所大学老师多，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翘尾巴的专家、教授、民主党派成员多，有影响的人物多，要用各种办法，制造适当气氛，‘引蛇出洞’，让他们把毒都吐出来，以便聚而歼之。你们几所大学‘鸣放得还不够，因为党委力量强，党委书记要示弱……，让他们敢于尽情‘鸣放’，无所顾忌，最后着重交待说，时间不多了，很快就要发动全面反击，反击开始后就没有人‘鸣放’了。”²

反右派斗争进行到深挖阶段，对“自家人”（彭真语）也采取“引蛇出洞”的策略。原新华社高级记者戴煌回忆：由于我是中央许多部门派往外交学院学习英文的同志所组成的党支部的书记，我也去听了彭真同志的报告。彭真精力充沛，红光满面，音宏气足。他开门见山地说，这次报告的主题，就是动员党内同志继续向党的组织领导提意见，不要受社会上‘反击资产阶级右派猖狂进攻’的影响。因为那些人和我们中国共产党不是一条心。他们装着响应我们党‘欢迎发表不同意见’的号召的样子，骨子里却要推翻我们党，或与我们党平分秋色，轮流坐庄。接着，彭真打着有力的手势，用愤慨的语调，说到了章罗联盟，也说到了龙云等人。继而他一改口吻，用十分亲切地调门对台下的听众说，这些人能和我们今天在座

¹ 千家驹《七十年的经历》，第243页

² 转引朱地《1957年：大转弯之迷》，第202页

的同志相提并论吗？我们都是自家人。一方面，党的组织领导确有许多自己未察觉的不足之处，需要大家提意见，多帮助；另一方面，党内也的确有许多人蜕化变质，胡作非为，骑在人民的脖子上拉屎拉尿，使得在他们鱼肉之下的人民怨声载道，有冤难伸。这更需要无情地予以揭露，并请大家帮助党组织想想办法，认真解决这个大难题。再说，党的方针政策及其贯彻执行，也并不都是十全十美、一帆风顺的。这也需要大家协助党的领导洞察秋毫，力求改正与完善之。总之，门外反右归反右，门内有意见照常提，这叫做内外有别。而且党支部书记和支部委员同志们要带头提，为整个支部的党员同志作出表率，把我们党的这次整风运动坚决搞好，搞到底！这时，彭真提高了声调说‘即便提的意见不一定都正确，甚至都错了，那也不要紧，党绝对不会把这些同志与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混为一谈。这一点，我可以代表中央在这里向同志们作保证……后来我才知道，彭真代表党中央所作的动员报告和保证，不过是忠实地执行了毛泽东的‘引蛇出洞’的指示，是一大‘阳谋’，我们的许多同志竟被‘谋’上了！’以上是中央、北京市贯彻执行毛泽东的“引蛇出洞”的情况。

作家韦君宜回忆，王蒙是如何成了“阳谋”的典型牺牲品：“这次反右运动，波及达上百万人。究竟为什么要这样做？当时身受其苦的人都想不通。只觉得冤枉。”“他本是头一个受到毛主席保护的人，并且使许多希望思想自由的知识分子都为之欢欣鼓舞。王蒙那篇《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说的是青年人要求改革共产党内组织部内的官僚主义、官风官气，当时就引起文艺界和共青团许多人的讨伐。奇怪的是毛主席竟为这个青年的作品仗义执言，说：‘谁说北京没有官僚主义？’还说：‘太守以上的官，都反对我，’大家欢喜极了。于是写文章说话的人纷纷涌出，真是空气为之一新。万万想不到的是，5月13日（1957年）《人民日报》突然变调子一百八十度。原来是天天鼓吹要‘放’、要‘放’的，竟提出个‘这是为什么’的问题。说现在人们在反对社会主义，反对共产党，你们反对官僚主义的人，都是心怀叵测，是资产阶级右派。这当然引起大批拥护毛主席主张的知识分子为之哗然。

王蒙那时才24岁，15岁入的地下党，真正耿耿忠心。一下子成了反革命大目标。他在共青团市委，他们不好意思公然把毛主席

¹ 参见戴煌《九死一生》，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58-60页

保护过的《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拿出来打，就另找口实。但是王蒙实在没有写过反党文章，无目标可找。于是他们就跟他谈话，日夜不休，要他狠挖思想。有没有写过宣扬资产阶级自由思想的文章，头脑里想过没有？对别人偶然提过没有？想出一点点，也要老实向党交代。年轻的王蒙，在这种苦逼诱供之下，拼命自己打自己，想自己有什么不符合党的方针的偶然动念。听人说，他说自己曾想到过，像英国的海德公园那样，谁有什么主张，都可以拉一个肥皂箱来，自己站上去去任意发表，那有多么舒服，多么自由啊。他这个想法，其实从未实行过，自己既从未去讲过，也没劝别人去讲过。但是他已经供了出来，这就是资产阶级右派的铁证。像这样的例证有这么两三件，王蒙的右派就跑不掉了。同时，毛主席所仗义执言保护的人和作品，就此完全作废。这个青年作家就此开除党籍，先打发下乡，后发往边疆，达25年之久。成了‘阳谋’的典型牺牲品。”¹

仅从上述几个“引蛇出洞”例子中说明，毛泽东制定了“引蛇出洞”策略，从彭真直到基层党支书，层层落实，采取各种手段，像领导人的一般号召，亲自动员，派专人走访、采访，党的主要领导人找重点人谈话、谈心，甚至采用诱导、误导、提过醒的方法，三番五次诱发被谈话人发表意见、感想、心得、体会。结果，引出来几十万条“蛇”，然后歼灭之。

对于毛泽东的“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的策略，或者称作“引蛇出洞”的策略，后来有不少评论。李维汉评述道：“政治上同反动派斗争，毛泽东同志的政策和策略同样非常英明，可以说是运用自如，得心应手。这些长期的阶级斗争实践，对他脑子不能不发生影响。政治斗争，不讲策略是不行的，对敌人就是要引蛇出洞，聚而歼之。错误在于把大量的人民内部矛盾看成敌我矛盾，因而把对敌斗争的一套用于人民内部，把朋友当成敌人，当成‘蛇’引出来，这就混淆了敌我。”²李锐说：“反右派斗争时，凡属提出不同意见，都视之为向党‘猖狂进攻’，采用‘引蛇出洞’，‘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等对敌斗争策略。毛曾经指示各级党组织，在两三个星期内，‘对于右派的猖狂进攻，硬着头皮，只听不驳，聚精会神，分析研究，聚集力量，准备反攻’。目的是让魑魅魍魉，牛鬼蛇神‘大

¹ 韦君宜《思痛录》，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53-55页

² 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下册，第843页

鸣大放’，让毒草大长特长，使人民看见，大吃一惊，原来世界上还有这些东西，以便动手歼灭这些丑类。这种人为地制造阶级斗争的方法，毛自己十分欣赏，把它称为‘阳谋’，认为‘这是一套很好的马克思主义策略’。正是这种策略，使冤狱遍及神州，毛泽东晚年阶级斗争扩大化的理论也从此生长。”¹胡绩伟回忆邓拓说：“邓拓对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新精神‘无动于衷’吗？以后想起来，他是‘有动于衷’的，这是他比较我们更有远见，更了解这位伟大领袖。他不仅看出毛主席这番话很快会变，而且还可能潜伏着一场‘引蛇出洞’的灾难。因而，他当时用自己的脑子进行了一些独立思考。……他的政治经验比我们丰富，政治警觉性也高，他对毛主席的讲话中采取‘经过中央批准以后再宣传’的办法，而不是闻风而动，赶快紧跟，是动了一番脑筋的。”“以后的事实证明，他的忧虑是完全正确的。紧接着毛主席的两个报告而来的，是反右派斗争；公开发表的《讲话》，对原来的讲话作了原则性的修改。所以，邓拓可以称得上是对‘引蛇出洞’的‘阳谋’有预见的人物之一。在反右派斗争开展以后，他悄悄对我说：好歹《人民日报》没有像《文汇报》、《光明日报》那样大鸣大放，不然，《人民日报》也会被打成右派报纸，中央党报被打成右派报纸对中央也很不好，《人民日报》没有大鸣大放，也挽救了社会上和报社内很多同志没有当右派。”²李新回忆杨献珍评述“引蛇出洞”的策略：“从1956年开始，他就极力反对个人迷信，1957年请民主人士帮助我党整风，他是赞成的。但因听不进意见就反过来整人，他很不赞成，特别是“引蛇出洞”的策略他更反对。他说：一个堂堂的执政大党，不敢光明磊落表明自己的态度，竟然鬼鬼祟祟两面三刀的手段，实在太不成话了！”³有的学者指出：“毛泽东“又采取对敌斗争的‘引蛇出洞’和‘放长线，钓大鱼’的策略来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毛泽东在1957年1月就认为，在社会上，党内外有一股反社会主义的逆流，要打退这股逆流。但他并没有打，他明白，经过解放以后的历次政治运动，知识分子成了惊弓之鸟，没有一定的气候是不轻易

¹ 李锐《毛泽东的早年与晚年》，贵州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41页

² 《报纸生涯50年》，转引自朱正《1957年春季：从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第336-337页

³ 《反右亲历记》，载肖克等《我亲历过的政治运动》，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30-31页

鸣放的。所以毛泽东在二至四月间的讲话，谈话中虽然也有讲阶级斗争没有完，有毒草就得批评，虽然也有批右的言论，但总的基调是轻松的，阶级斗争气息不浓，是鼓励大家鸣放，认为现在是放的不够。他这样做，用他后来的话说，是“有意识要缓和一下”为了让人们把大量的“毒素”吐出来。他一再向干部打招呼：要硬着头皮听，让人把话讲完，统统倒出来，而不要急于批评。他认为，共产党整风，就是主动将可能的“匈牙利事件”引出来，使之分割在各个机关各个学校去演习，去处理。1957年大量的“右派”就是这样主动引出的”。¹

以上对“引蛇出洞”策略的种种反思与评价，是公正、客观的。应该说他们代表了改革开放以来党内的正确思想观点，道出了那一场灾难受害者的的心声。“引蛇出洞”的策略不仅是错误地把对敌策略用来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更为严重的是有计划、有步骤、有目的，根据政治需要制造出一个中国式的“匈牙利事件”——反右派运动，然后进行残酷镇压。这个反右派运动给知识分子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三、反击右派的信号和导火线

由于从一般鸣放逐步转向大鸣大放，其中间鸣放出一些超越“三害”作风的框框的言论。根据鸣放情况，毛泽东将整风主题思想逐步转变为准备反击右派的行动，在采取“引蛇出洞”策略后，大大小小的“蛇”将要“引出洞”或已经“出洞”，看来，现在反击右派的时机已成熟，只等待导火线了。

1957年5月20日，中共中央指示：“应该逐步增加一些左翼分子的言论。”6月1日，中共中央统战部举行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座谈会。会上，统战部安排“越反动越好的”储安平的发言之后，紧接着就是“增加一些左翼分子”何香凝先生的书面发言。6月2日，《人民日报》报道了她的发言。她说：“我虽未来参加这个会，但我却天天在报纸上看到关于这个座谈会的消息，也看到了许多各党派人士的议论，香凝对此，我不能缄默无言，特此写信，作为我的书面发言。”

对整风表明态度，她说：“我完全拥护中国共产党的整风。因为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领导中国进入社会主义。我常常说：孙中山

¹ 许全兴《毛泽东晚年的理论与实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年版，第87页

先生的理想是伟大的。但是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所实现的却已远远超过了孙先生的理想，……中国共产党是领导党，也只有他是领导党。但是中国共产党自革命成功以来，发展得很快，就难免党员良莠不齐，显然在基本方向做对了，但仍然不免犯很多缺点和错误。许多朋友们在指出这些错误和缺点的时候，我感到有很多说得很对，我也有同感。但也有一些话，我是不能苟同的。”

她回顾中国革命的长期历史后说：“当时国民党内部确实有左派和右派，用不着别人来制造，我就一贯承认我就是国民党左派。因为我就是坚决拥护孙中山的三大政策的。国民党右派就是反对联合苏联，联合共产党和执行工农政策的。甚至连民生主义，也有人反对。革命党一定是联合左派，争取中间派和孤立右派，这个真理并不是从今天开始的，是古已有之的。在抗战开始的时候，毛主席的方针，根据我的记忆，也就是团结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反对和孤立顽固势力。自然，每个革命的新旧交替的时期中，昨天还是比较进步的人，今天也可能变成比较顽固的人；反过来，昨天是落后的人，今天也可能变为是进步的人。所以一个革命党和它的朋友联合的时候，我认为当然应该是联合进步的力量，争取中间的力量，孤立保守顽固的力量。这是一点也不奇怪的。如果不这样做，它就不成其为革命党了。因此，问题并不在于革命党应不应该这样做。问题倒是在于在这个革命潮流里的人，究竟自己应该是决心参加革命的行列，当一个跟着潮流走的左派呢？还是中间派，或者甘心自己当一辈子右派呢？”

书面发言中提到什么是左派呢、什么是右派呢？她说：“今天是新时代了，在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我们走上社会主义。难道在这个时代，也就一切都是清一色，再也不会左、中、右了吗？不会的。大凡忠心耿耿愿意在共产党领导下，诚诚恳恳地帮助领导党，我想这就是左派。我们中国人口占世界第一位，应有决心和工人阶级在一起，为全世界被压迫人类及劳苦大众跳出水深火热的苦境，这才是革命的左派。我认为民主党派中，每一个愿意进步的人士，都要努力做一个左派，并且要在行动上表现出来才好。其次，基本上有爱国良心的，但在思想上模糊不清，自己抓不定方向，这样中间的人们是很多的，我相信我们的领导党和各个民主党派的左派，应该努力地帮助这些人。但有极少数人对社会主义是口是心非，心里向往的其实是资本主义，脑子里憧憬的是欧美式的政治，这些人我认为显然是右派了。我希望有这类思想和抱着这种态度的人，

应该不要甘心于长久做右派，而应不断改造自己，提高自己，那么他们就有光明的前途了。”

最后提出几点希望，她说：“我希望在整风中，我们能够帮助领导党纠正错误和缺点，同时也希望民主党派在整风中提高自己。首先是希望极少数右派的人能彻底改造自己。所以在现在如果领导党团结我们的左派，争取和帮助我们的中间分子，教育和批评右派的话，那只能对我们民主党派有好处，我们欢迎领导这样做。长期共存也得有基础才行。辛亥革命以前的共存是反清。第一次大革命时期的共存是反帝国主义。现在的共存是坚决走社会主义的路。……我们共存的基础是存在的，前途是光明的，问题就是我们能否在工人阶级的领导下改造我们自己。”¹

左翼人士何香凝在此时此刻的书面发言，实际上表述了1957年5月15日毛泽东的《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中的基本观点和主要精神。何香凝的书面发言，提出了民主党派中的左派和右派的含义和标准，为反击右派做好舆论准备，因此可视为反击右派的主要信号。5月25日，毛泽东接见青年团代表的谈话：“一切离开社会主义建设的言论和行动是完全错误的”²这条新闻，对绝大多数知识分子来说，并没有引起注意，没有意识到是反击右派的公开动员令。

反击右派的信号发出后，毛泽东加紧部署反击右派的工作，此时发生几起重大的不平常的事件：

第一，1957年6月6日，关于印发6月4日一份《高等学校整风情况简报》的批语：“尚昆印发在京中委一阅。完全造谣，但值得注意。毛泽东 六月六日”。这个批语写在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1957年6月5日为报送《高等学校整风情况简报》给毛泽东的信上。《简报》说，北京大学有一学生写了一篇题为《我的忧虑和呼吁》的文章，造谣说党中央已开始分裂，毛主席的“鸣”、“放”方针遭到了党内百分之九十的人反对和党内保守势力的反击，有人想逼迫毛主席下台。这篇文章油印后在校内外散发，震动很大。³

现在援引北大学生叶于注《关于“我的忧虑和呼吁”的说明》：

¹ 以上引文均见《人民日报》1957年6月2日

² 1957年5月26日《人民日报》。按薄一波的回顾，“一方面是向党内党外‘打招呼’，另一方面则是反击右派的公开动员令”。（《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第614页）

³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第493页

一、本文不企图证明什么，只是写出作者个人的忧虑！以及基于忧虑的呼吁，列举诸“迹象”是为了说明忧虑的原因。

二、迹象的说明：（逐条解释）（1）鸣放方针提出之初，有百分之九十高干不同意。见林希翎致马老公开信和潘家威“论目前民主运动及其领导”，既然无人反驳，当属事实。（2）北大处于无政府状态等，见民主墙南开同学来信。（3）北大闹的比波匈事件还凶……是林希翎说的，我有几分相信，故列为“迹象”，冠以据说。（4）有人要毛主席下台……潘家威同学谈，这话是胡耀邦说的，有人写信给毛主席，要他下台等。（5）贯彻鸣放障碍重重，至今……，个人读报，观察结果。（6）胡耀邦谈当家难等是潘家威等六人，访问胡时，胡谈，并见潘文“论当前民主运动及其领导”。（7）反对鸣放有我们熟悉的领导者在内，出处同上条。据潘说此系友人告知，已答应保密，不便道出姓名。（8）陆定一、彭德怀谈话，见中国青年报，《人民日报》。（9）苏联转载陈其通文，“教条主义”是我校传达毛主席报告时说的。（10）苏联对鸣放冷淡是我读报观察所得。（11）我校领导落后于群众，是个人观察结果。落款是1957年6月2日¹

毛泽东批语：“完全造谣。”现在引用上面提到潘家威的文章。他说：“1957年5月24日下午16点35分到17点13分正当团代会通过改名共青团之后，团中央书记接见我班六个团员。……作了些原则性的指示：‘书记首先谈到‘当家难’。难啊……难啊……’书记说，‘朝鲜金日成当家，苏联赫鲁晓夫当家……中国毛主席当家，我看啊，中国这个家最难当——穷，落后，六万万！’他说，我们要改正错误，又要让敌人不钻空子。书记说到，有人要让毛主席下台，说如果没有主席，就不需要整风了。……”潘还写道：“毛主席最初提出整风时遭到绝大多数高级干部反对，甚至有人退出会场，大家都听了传达，不必多说。还有传说我们最熟悉的领导人中也有不表示赞成的。”²

笔者当时在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也听说党中央开始分裂，毛主席妥协了，毛主席的“双百”方针受到百分之九十的人反对，执行阻力很大。笔者认为毛主席这个批语：“完全造谣，但值得注意。”至于是不是“完全造谣”，待历史学家去考证，不过这个学生的文

¹ 参见牛汉、邓九平主编《原上草》，第145-146页

² 转引朱地《1957年：大转弯之迷》，第214页

章确实引起了毛主席高度注意，认为是一件极不平常的事件。

第二“六教授会议”

1957年6月6日，由章伯钧召开了六教授会议，后来称为“六六六事件”。这六位教授是曾昭抡、钱伟长、费孝通、陶大镛、吴景超、黄药眠。此外，还邀请了民盟办公厅主任叶笃义，以及史良、胡愈之（中途退席）、金若年和闵刚侯。“六教授会议”是6月6日上午10时，在北京南河沿全国政协文化俱乐部。会议内容：据一本题为《1957年的春天》书刊所载，当时情景是这样的：

那天下午，章伯钧在会上说，现在学校的情况十分严重，请大家来研究并考虑民盟在运动中应该怎样工作。费孝通和曾昭抡两人随后发言，主要讲在整风运动中暴露出许多问题，学生们因此情绪激烈，一触即发，如果他们一上街，市民就结合起来，问题就闹大了。钱伟长听了他们的话，接着说：“现在学生运动的特点是要找一个头，如果有老师领头就可出乱子。近来有一些学生的家长写信，要我劝劝他们的子弟不要参加闹事，我曾做过，但学生的表示十分坚决，这真像‘五四’前夕，和我们做学生的时代一样不接受家长的劝告。”

“知识分子最根本的问题是出路问题，学生闹事的原因是没有出路。只有党团员和靠近党的人才有出路。人有没有出路，命运是掌握在党员手里。有发展前途的课程都得由党员来担任，不论他懂得多少；而将一些真正的专家放在一边。党是运用这样一套机构和制度来为它工作的，这就是一切通过党团员或所谓的积极分子，党就是这样偏听偏信，运用这样一套官僚制度来进行工作是不行的。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是有问题的。上个星期蒋校长（南翔）在报告中居然说了这样的话，他说今天知识分子是吃共产党的饭，这句话引起了老教师们很大的不满！”

“谁说我们吃共产党的饭！”费孝通显然有些激动地，他打断了钱伟长的话，又说：“我们从来没有吃共产党的饭，我们是吃劳动人民的饭！”钱伟长点了点头，接着说下去，“目前学校里的情况，要收也容易，只要民主党派站出来说话就可以。现在民主党派说话是有力量的。学生到处找自己的领袖，希望我们能站出来！”¹

会议参加者，民盟办公室主任闵刚侯，反右派开始后的1957年7月4日，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揭发文章《章伯钧召集的一次

¹ 迟蓼洲《1957年的春天》，学习杂志社1958年

紧急会议》(即六教授会议):会议一开始,章伯钧说,“现在学校的情况十分严重,请大家来研究并考虑民盟在运动中应该怎样工作。”曾昭抡说:“今天学生们问题很多,一触即发,他们一上街,市民就结合起来,问题就闹大了。因为今天群众对党也是不满的,不要看秀才造反三年不成,中国知识分子闹事是有传统的,从汉朝的太学生到‘五四’都是学生闹起来的。”钱伟长说:“现在学生运动的特点是要找个头,如果有老师领头就可出乱子。”费孝通说:“当然要收也容易,三百万军队就可以收,但人心是去了,党在群众中的威信也就完了。”章伯钧说:“列宁死后有两个人,一个是南斯拉夫的铁托成为反对派,一个是中国的毛公继承了列宁主义。这次整风运动,要党外人士提意见,其后果我想毛公一定是估计到的。在民主党派提意见总是客客气气的,但估计不足;没有估计到党会犯这样多的错误,现在问题大大超过了估计,真是‘超额完成了任务’,弄得进退失措,收不好,放也不好。”¹

毛泽东表示了对这个会议的态度:“到处点火可以煽动工农,学生的大字报便于接管学校,大鸣大放,一触即发,天下顷刻大乱,共产党马上完蛋,这就是六月六日章伯钧向北京六教授所作的目前形势的估计,这不是利令智昏吗?‘利’者,夺取权力也。”²在这里,毛泽东把六教授会议看得非常严重,认为他们是“夺取权力也”。这是无限夸大“六六六会议”作用和动机。实际上,“六六六会议”在当时条件下,不但不是“点火”会议,应该说是一次“灭火”会议,企图帮助共产党解围的对策问题,根本谈不上夺取共产党政权问题。

有两件事可称为反右派斗争的导火线。

第一、卢郁文和谭惕吾之争。

卢郁文于1957年5月25日在民革中央小组扩大会议上的发言,5月26日《人民日报》用醒目的标题《卢郁文提醒大家:区别社会主义民主和资产阶级民主,警惕摆脱党的领导的想法》报到了他的发言,摘要如下:

怎样帮助共产党整风?现在自己不整风,光帮助领导整风,提意见很容易只看到别人的缺点,看不见自己的缺点,很容易片面。因此,他提醒大家在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时候,不要忘记我们是搞社

¹ 《章伯钧召集的一次紧急会议》,《人民日报》1957年7月4日

²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37页

会主义民主。我们提意见时要警惕，社会主义民主才刚刚形成，还在摸索中前进；而资产阶级民主却在人们思想中根深蒂固，一不小心，很容易用旧民主观点来看新事物，这不但无益，而且有害。举例说，最近民主人士对党的领导提了许多意见，如机关中党组如何工作，学校改变党委制，合营工厂中公方代表撤出，基层以党代政，党中央和国务院联合发指示，以及定息二十年等问题。这些意见看来虽然承认党的领导，但是恍恍惚惚又有摆脱党的领导的意思。他提醒说，我们不要忘记，共产党领导社会主义，我们走社会主义道路，这都是我们举了手的！

接着卢郁文谈到社会主义民主集中制问题。章伯钧认为用国务院开会不应拿出成品来让大家讨论，说这是形式主义的会议，这使他大吃一惊。他是国务院秘书长助理。他说，他是给国务院会议做准备工作的一员，是要搞成品的。在提出一个部的文件的时候，总要问清楚，部长看过了没有；如果文件牵涉到几个部，就要问清楚商量过没有，力求把文件搞得成熟再提给领导。越向高一级提出，越希望把文件准备成熟，免得费周折。……章伯钧先生不让把成品拿上去，他是希望在国务院会议上大讨论而特讨论，你说一通，我说一通，然后表决，这是资产阶级民主方式，表面上看来是民主的，实际上并不能取得一致。他说，章伯钧先生的这个意见我不同意。

然后他谈到党和非党之间的墙和沟的问题。他说，由于工作岗位不同，接触人物不同，就有不同的感觉。他觉得党员同他之间没有墙和沟，他和党员一起工作、学习、下棋、打扑克，并没有感到有墙，自己也没有自外。他说，不过从一般情况来看，党与非党之间是有墙有沟的。他认为必须拆墙填沟。他同意拆墙填沟共产党员应负主要责任，不过你也认为必须从两面拆墙、填沟。领导党如果有所辩驳，不能认为是打击报复。他说，……假如有一天领导党对我们提出来的某些意见作说明解释，这能算是抓小辫子打击报复么？他认为，……只允许自己提意见而不允许别人辩驳，这是自己堵塞进步之路。¹

同一天的《人民日报》报道了谭惕吾的发言：帮助共产党整风，民革成员应该采取什么态度呢？她认为应该是老老实实，诚诚恳恳，不能有任何虚假，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同志中间，旧作风还是少

¹ 《卢郁文提醒大家：区别社会主义民主和资产阶级民主，警惕摆脱党的领导的想法》，《人民日报》1957年5月26日

来一点！她说，必须坚持接受工人阶级的领导，走社会主义道路，这前提决不能动摇，否则不是今天中国的民主党派了。她说，为了社会主义少些波折，对阻碍社会主义建设的事情，一定要反映出来。提意见，不一定就是不接受领导。说一切都是因社会主义制度不好而产生的，那是离经叛道。谭惕吾不同意卢郁文的意见。认为卢郁文的意见不是帮助共产党整风，卢郁文说与党员毫无隔阂，那不是由衷之言。我们要说真话。领导党选择人也要注意，要选对党进忠言的人。很多党与非党的关系问题，常常不是因为共产党，而是由无耻的民主人士弄出来的。这些人隔离党，隔离群众，借机会向上爬。¹

5月29日，在民革中央小组扩大会议上，卢郁文和谭惕吾继续争论，《人民日报》5月30日报道：卢郁文不同意25日会上谭惕吾的意见。认为给领导党提意见是应当的，对这些意见表示不同的看法，也是应当的。这些看法对不对，可以研究。但不能说这就是要收，是压迫鸣放。为什么只许批评共产党，而不许批评批评者？不公平。党和非党之间有墙有沟。但是具体的讲，也有没墙没沟的。怎么非说有墙有沟才开心呢？不能养成这样一种风气，只能批评领导党，不能批评民主人士。在说到如何拆墙填沟的时候，他指出这应该是两方面的事，共产党应该拆的是三个主义；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要拆的是旧思想、旧习惯、旧作风，要放弃过去的立场，要坚定地树立人民立场。不这样，单是共产党拆墙，是拆不了的。如有人要求20年定息，墙怎能拆的了呢？拆墙填沟以后，应该是民主人士、工商业者经营者团结在共产党的周围，一起建设社会主义，这才是方向。

谭惕吾认为在割治三害毒瘤的时候，确实出现了一些毒草。关于定息20年，不要公方代表，取消高等学校的党委制等意见，她是反对的。但是，她也反对从另一方面损害党，帮助共产党整风，就是要揭露矛盾，就是要敲警钟，把一些党员敲醒。卢郁文是在代表抗拒整风的共产党员说话，他没有一句话是对党有帮助的，这是对党不实，对国不忠的表现。毛主席早在十八九年以前，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等等的文章里面，就教导共产党员要关心非党干部，要重视知识分子，要任人唯贤……。但是，现在工作中的很多缺点，都说明很多共产党员并没有按照毛主席的话办事。

¹ 《人民日报》1957年5月26日

他认为这些党员是对党不忠实的。因此，她要问问那些抗拒毛主席的指示的共产党员：“你们为什么不听毛主席的话，为什么抗拒？”她要求这些党员作深刻检查。”¹

第二 “匿名信事件”。

“匿名信事件”发生了，1957年6月7日，《人民日报》刊登新华社电讯，报道：“在国务院秘书长习仲勋今天下午邀请党外人士举行了座谈会上，国务院秘书长助理卢郁文首先发言，还宣读了他最近收到的一封匿名恐吓信。卢郁文在读完这封匿名信以后对大家说，因为我在民革中央小组座谈会上说了几句实事求是的话，对于不同意的意见提出了批评，就遭到了谩骂，骂我是言不由衷，对党不实，对国不忠。现在有人写这封匿名信来威吓我，辱骂我。”

卢郁文认为，整风中向党提意见应当实事求是，有不同的情况就有不同的意见，自己鸣，也要让别人鸣。我不理解有人为什么只许说反面话不许说正面话，对讲了正面话的人就这样仇视，有的人辱骂我，有的人威胁我，有的装出公正的态度来钳制我的发言，难道我们不应该站在社会主义的立场上吗？难道不是我们有了社会主义的共同立场，所以许多问题才能是人民内部矛盾吗？既然是人民内部矛盾，为什么要如此谩骂？他还说，另外还有人要求下轿、下台，这样怎么能够达到团结呢？我们应当深思，我们对共产党的批评究竟是从什么地方出发？要到什么地方去呢？卢郁文说他不怕辱骂，不怕威胁，他还要讲话。

在卢郁文发言当中，国务院参事李仲公谈到他也因批评了对中共提意见的人而收到一封对他进行威胁的匿名信，李仲公说我不怕辩论，但有人采用这种手段来对付我是卑鄙的。²

毛泽东选择了“匿名信事件”作为反击右派的导火线，他对刘少奇、周恩来说：“现在右派猖狂到了极点，只许他们骂共产党，大鸣大放，不许别人说一句公道话。这件事意义十分严重，我们都应该想想，这是为什么？说卢郁文‘为虎作伥’，那共产党就是右派心中的虎了，这岂不是太过分了？物极必反，现在的反右派的条

¹ 这封匿名信攻击卢郁文5月25日在民革中央小组扩大会议上的发言，卢郁文在那次发言中曾认为拆‘墙’是两方面的事，并且不同意有些人只许批评中共，不许批评批评者的主张。匿名信辱骂卢郁文“为虎作伥”，是“无耻之尤”，并恫吓卢郁文“及早回头”，还说，否则“不会饶恕你的”。“共产党如果只认你这班人的话”，“总有一天会走向灭亡。”

² 《人民日报》1957年6月7日

件成熟了。”¹

6月7日，毛泽东约胡乔木、吴冷西谈话。吴冷西回忆说：“我们刚坐下来，毛主席就兴高采烈地说，今天报上登了卢郁文在座谈会上的发言，说他收到匿名信，对他攻击、辱骂和恫吓。这就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发动反击右派的好机会。”“过去几天我就一直考虑什么时候抓住什么机会发动反击。现在机会来了，马上抓住它，用人民日报社论的形式发动反击的斗争。社论的题目是《这是为什么？》，在读者面前提出这样的问题，让大家来思考。”²反右派是毛泽东既定方针，“匿名信事件”提供了绝好机会。

毛泽东《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讲话、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以及一系列有关整风运动精神，主题都是为了解决人民内部矛盾，避免在中国出现类似匈牙利事件，因而采用整风运动的方法加以解决，也就是说，采用小民主的方法加以克服。当时确实起到解放思想，发扬民主（尽管是恩赐的民主）的作用，使广大知识分子解除顾虑敞开思想，真心诚意帮助党整风，确实实行“内外夹攻”的办法来克服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当广大知识分子发表了大量有真知灼见的意见时，也出现了过激，过头、超越“三害”作风框框的言论，在这些意见和言论中有百分之九十五以上是正确的，仅有极少数的意见和言论领导层认为是错误的，是过了头的。可是毛泽东对这些极少数错误言论和过了头的话抓住不放，认为是反党、反社会主义，是想夺取政权，或想轮流掌权。为了保卫、巩固刚刚建立的政权，击破某些高级民主人士的梦想，于是发动一场空前的、大规模的反右派斗争。毛泽东既然把这场反右派斗争看成是一场保卫、巩固新政权的斗争，是一场敌死我活的斗争。那么，采取“引蛇出洞”、“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的策略和大民主的方法也就不奇怪了。中国知识分子的苦难就这样开始了，一步步走向深渊，直到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才结束。由此反思，1953年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过早地放弃新民主主义制度，过急过早地转入社会主义制度，这是教条式的硬搬斯大林的社会主义模式，实际上是一次倒退，退到空想社会主义和民粹主义道路上去，实践证明，这条路是走不通的。从整风转变为反右派斗争，实质上是放弃反对封建专制主义残余的斗争，转而扼杀主张民主、自由的社会

¹ 《中国百年政治风云实录》下，红旗出版社1997年版，第129页

² 吴冷西《忆毛主席》，新华出版社1995年版，第39—40页

进步势力和健康力量，是党内教条主义、封建保守势力整肃党内外民主进步、健康势力，这又是一次历史倒退。倒退到以阶级斗争为中心的老路上去，实践证明，此路也是不通的。总之，这两次倒退只能表明，中国的封建主义残余多么深厚和顽固，说明中共党内教条主义、封建保守势力多么强大和稳固，说明中国民主进步力量多么脆弱和稚嫩。因此，摆在中国共产党内的健康、进步、民主力量面前的一项最重要的思想任务，就是要党领导全国人民彻底地始终不渝地反对教条主义、封建主义残余或封建主义遗毒，长期不懈地推动中国实现民主化、法制化的进程，大力发展经济，提高生产力，把中国建成民主、统一、富强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国家。

第三章 反右派斗争【上】

自从“双百”方针提出后，特别是毛泽东邀请党外人士帮助党整风后，知识分子慢慢解除或打消顾虑，开始鸣放，对共产党存在的三大坏作风提出批评。在此过程中，少数党外人士提出一些超越“三害”作风框框的一些错误言论，毛泽东等对这些言论不但不加以制止，反而指示舆论工具加以报道或渲染。待到1957年5月15日，毛泽东撰写《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要下决心进行反击右派，经过20多天精心准备，周密策划，于6月8日发动一场空前的反右派运动。6月19日，公开发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作为反右的理论武器，狠狠打击党外知名民主人士，进行三个多月的战斗，终于取得了反右派斗争阶段性的“胜利”。然后，在此基础上进行深入挖掘，就连党团员中的知识分子、中小学教师、企事业单位中的知识分子中也抓出不少右派分子，还嫌抓的不够，不彻底，然后进行反右“补课”，有补了不少右派分子，经过严厉的批判，最后进行处理。

第一节 开始反右

从1957年5月期间的整风和大鸣大放，已经或正在引出来大大小小的“牛鬼蛇神”。从6月8日始，毛泽东认为时机已经成熟，积极部署反击右派的步骤、策略：有组织地发动中、左分子对右派的揭发和批判；为了更有力地批判、分析和划分右派分子，他于6月19日公开发表了经过多次修改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作为反击右派的理论武器。

一、部署反右

1957年6月8日这一天对许多知识分子来说是遭劫的开始，是改变命运的开始，是右派分子及其亲属、子女历史性的、永远难忘的日子。因为这一天，毛泽东在中国大地开始发出反击右派的总动员令，即为中共中央起草《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的指示。摘要如下：首先使用大民主的方法，“以大字报为战斗武器，双方在战斗中取得经验，锻炼人才。反动分子人数不过百分之几，最积极疯狂分子不过百分之一，故不足怕。不要为一时好似天昏地暗而被吓倒。”其次采取“引蛇出洞”的策略，“请你们注意各民

主党派中反动分子的猖狂进攻。要组织每个党派自己开座谈会，左中右的人都参加，正反两面意见都让其暴露，派记者予以报道。我们巧妙地推动左、中分子发言，反击右派。此事很有效……注意组织中、左派写文章。”“高等学校组织教授座谈，向党提意见，尽量使右派吐出一切毒素来，登在报上……最好让反动的教授、讲师、助教及学生大吐毒素，畅所欲言。……予以反驳。”最后指出主动整风要达到的目的，“这是一场大战（战场既在党内，又在党外），不打胜这一仗，社会主义是建不成的，并且有出‘匈牙利事件’的某些危险。现在我们主动的整风，将可能的‘匈牙利事件’主动引出来，使之分割在各个机关各个学校去演习，去处理，分割为许多小‘匈牙利’，而且党政基本上不溃乱，只溃乱一小部分（这部分溃乱正好，挤出了脓包），利益极大。这是不可避免的，社会上既有反动派存在，中间分子又未能受到现在这样的教训，党又未受到现在这样的锻炼，乱子总有一天要发生。”¹

文件中肯定以大字报为战斗武器，有计划、有目的使用“引蛇出洞”的策略，组织反击右派的队伍，“我们主动的整风，将可能的‘匈牙利事件’主动引出来”，达到消灭在各个机关学校的目的。这是毛泽东给党内各级领导发出的反击右派总动员令。

对这份指示，李维汉后来评价说：“在六·八指示中，毛泽东同志一开始就对阶级斗争形势估计得过于严重，说：‘总之，这是一场大战（战场既在党内，又在党外）不打胜这一仗，社会主义是建不成的，并且有出‘匈牙利事件’的某些危险。现在我们主动的整风，将可能的‘匈牙利事件’主动引出来，使之分割在各个机关各个学校去演习，去处理，分割为许多小‘匈牙利’，而且党政基本上不溃乱，只溃乱一小部分（这部分溃乱正好，挤出了脓包），利益极大。’”²从这里看出，毛泽东错误吸取“匈牙利事件”的教训，把中国的阶级斗争形势估计得过于严重，这是指导思想最大的失误，其他的错误都由此产生。

发出这指示的当天，《人民日报》配合发表《这是为什么？》社论，其主要内容如下：

社论开头提到“匿名信事件”的内容：“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委员、国务院秘书长助理卢郁文因为5月25日在‘民革’中

¹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31-433页

² 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下册，第835-836页

央小组扩大会议上讨论怎样帮助共产党整风的时候，发表了一些与别人不同的意见，就有人写了匿名来信恐吓他。这封信说：‘在报上看到你在民革中央扩大会议上的发言，我们十分气愤。我们反对你的意见，我们完全同意谭惕吾先生的意见。我们觉得：你就是谭先生所指的那些无耻之尤的‘典型’。你现在已经爬到国务院秘书长助理的宝座了。你在过去，在制造共产党与党外人士的墙和沟上是出了不少力量的，现在还敢为虎作伥，真是无耻之尤。我们警告你，及早回头吧！不然人民不会饶恕你的！’在共产党的整风运动中，就发生这样的事件，它的意义十分严重。每个人都应该想一想：这究竟是为为什么？”

社论接着指出卢郁文在5月25日讲了些什么呢？归纳起来，“一是告诉人们不要混淆资产阶级民主和社会主义民主，不要削弱和取消共产党的领导；二是说国务院开会时应该有事先准备好的文件，以便讨论，免得像资产阶级国家的议会一样每天争吵，议而不决，不能说就是形式主义，就是不让大家讨论；三是说他自己同共产党员相处得很融洽，中间没有墙和沟；如果有些人和党员中间有了墙和沟，应该‘从两面拆、填’，双方都要主动；四是说共产党人对某些批评可以辩驳，这种辩驳不能认为是报复打击；五是对党外人士如何实现有职有权的问题提供了一些具体意见。我们和许多读者一样不能不问：发表这样实事求是、平易近人的意见，为什么就是‘为虎作伥’，‘无耻之尤’？为什么要‘及早回头’，否则就‘不会饶恕你’？”

社论又驳斥了“为虎作伥”的论点：“把卢郁文的发言说成‘为虎作伥’，共产党当然就是写信者们心中的‘老虎’了。……在这样的時候，却有人把维护社会主义民主、维护共产党的领导的言论称为‘无耻之尤’，‘为虎作伥’，把共产党人比作可怕的吃人的‘老虎’。这种人的政治面目，难道还能不引起人们的警惕么？”

社论认为恐吓信是挑起阶级斗争的信号：“我们所以认为这封恐吓信是当前政治生活中的一个重大事件，因为这封信的确是对于广大人民的一个警告，是某些人利用党的整风运动进行尖锐的阶级斗争的信号。这封信告诉我们：国内大规模的阶级斗争虽然已经过去了，但是阶级斗争并没有熄灭，在思想战线上尤其是如此。”

社论引用革命的老前辈、左翼人士何香凝先生的话来表达毛泽东反击右派的思想：“革命的老前辈何香凝先生说得好：‘今天是新时代了，在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我们走上社会主义。难道

在这个时代，也就一切都是清一色，再也不会左、中、右了吗？不会的。’她指出，有极少数人对社会主义是口是心非，心里向往的其实是资本主义，脑子里憧憬的是欧美式的政治，这些人就是今天的右派。”“在全国一切进行整风运动的地方，这些右派分子都想利用整风运动使共产党孤立，想使拥护社会主义的人孤立，结果真正孤立的却是他们自己。在各民主党派和高级知识分子中，有少数右派分子像卢郁文所说，还想利用辱骂，威胁，‘装出‘公正’的态度来钳制’人们的言论，甚至采取些写恐吓信的手段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但是这一切岂不是做得太过分了吗？物极必反，他们难道不懂得这个真理吗？”

社论最后强调要用阶级斗争的观点来分析一切现象：“非常明显，尽管有人叫共产党‘下台’，有人向拥护共产党的人写恐吓信，这些决不会使共产党和人民群众发生任何动摇。共产党仍然要整风，仍然要倾听党外人士的一切善意批评，而人民群众也仍然要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坚持社会主义的道路。那些威胁和辱骂，只是提醒我们，在我们的国家里，阶级斗争还在进行着，我们还必须用阶级斗争的观点来观察当前的种种现象，并且得出正确的结论。”¹

1957年6月8日，反击右派指示的下达和《人民日报》《这是为什么？》社论的发表，标志着一场围歼右派的运动在全国各地开展起来了。

为了更具体指导反击右派的斗争，6月10日，毛泽东又起草题为《中央关于反击右派分子斗争的步骤、策略问题的指示》，首先提出要求，仿效北京的做法：“北京条件已成熟，人民日报已于6月8日开始反击反动派。但建设性的批评将永远继续登载。也将继续登载一些突出的反动言论，使人民得到警惕，以利批判。各地情况不同，何时开始反击，要看当地情况确定。目前应着重组织各民主党派和高等学校开座谈会，推动左中右三派人物展开争论，最为重要。北京正在广泛开座谈会，极为有益。”接着指出对学生回家乡要加以注意：“回乡学生可能有许多地富子弟，你们要对地富做好工作，要他们善于教育子弟。学生如果煽动农民反对政府，就要批评他们的错误，给以坚决的教训。”

最后提出要使反动分子在公众面前扫脸出丑：“无论民主党派、大学教授、大学生，均有一部分右派和反动分子，在此次运动中闹

¹ 《人民日报》1957年6月8日

得最凶的就是他们，他们历史复杂，或是叛徒，或是在过去三反肃反中被整的人，或是地富资本家子弟，或是有家属亲戚被镇压的。但他们人数不多，一时间可以把空气闹得天昏地暗，日月无光，但是急风暴雨，不崇朝而息。就北京而论，闹了几个星期，现在劲头已经不大了，有些动摇恐慌了。各民主党派中，民革、民建、九三、民进等颇好，民盟、农工最坏。章伯钧、罗隆基拼命做颠覆活动，野心很大，党要扩大，政要平权，积极夺取教育权，说半年或一年，天下就将大乱。毛泽东混不下去了，所以想辞职。共产党内部分裂，不久将被推翻。他们的野心极大。完全是资本主义路线，承认社会主义是假的。民盟右派和反动派的比例较大，大约有百分之十以上，霸占许多领导职位。我们任务是揭露和孤立他们。他们的臭屁越放得多，对我们越有利。但民盟的多数仍然是好的，或者有希望改造好的。你们也要作具体的人物分析，实事求是，看得准，打得准。在这次运动中，一定要使反动分子在公众面前扫脸出丑。我们一定要团结大多数，孤立极少数，给扫脸的更是极少数。”¹

在这里可以看出，要求贯彻“引蛇出洞”的策略，坚决教训敢于煽动农民反对政府的地富出身的学生，指出民盟、农工最坏，斥责章伯钧、罗隆基野心极大，拼命搞颠覆活动，点出章伯钧、罗隆基为右派分子。这份文件同6·8指示一样，过于严重地估计了阶级斗争的形势，过分夸大了章伯钧、罗隆基等人的右派言论。这是一份严重混淆敌我，把朋友当成敌人，把朋友推向敌人的严重错误的文件。执行这一指示，必然犯下反右派斗争的严重错误。

为贯彻6月8日中共中央《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6月10日《中央关于反击右派分斗争的步骤、策略问题的指示》，《人民日报》除6月8日发表《这是为什么？》的社论外，还发表了贯彻上述指示精神的一系列社论，大造舆论和声势，及时指导反右派斗争。

6月9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要有积极的批评，也要有正确的反批评》的社论。社论说：“积极的、建设性的批评，对于人民的事业是永远需要的。”“对于这样的批评的任何压制，对于批评者的任何打击报复，都是完全错误的，都必须坚决反对。”“至于并非善意的批评，目的在于破坏社会主义事业、破坏人民民主专政、破坏党和人民的团结的批评，这就并不合于人民的利益，并不

¹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第502-504页

合于党的整风运动的利益，对于这种破坏性的批评进行正确的反批评，自然更为必要的了。”社论又说：“现在确实有一些口口声声称赞‘齐放’‘争鸣’的人，实际上企图只让他们自己讲话，而不让别人答辩。他们可以把马克思主义道理一概封之为‘教条’，把社会主义制度和机构一概贬之为‘官僚主义’的制度和机构。……也还有人（例如陈铭枢）从正面劝勉道：‘光说缺点，不说优点，这才合乎‘整风精神’呀！言下之意，那种既说缺点又说优点，既说错误又说成绩的人，还有那些出来解答和辩论的人，就都是‘整风’的挡路者了，于是，他们就把对方的嘴一下封住，至少也是把对方放到一个如果答辩就是‘不虚心’的地位上去了。”¹从这篇社论可以看出，是对鸣放初期批评者的反批评，实际上是反击批评者，并点名批评“光说缺点，不说优点”的陈铭枢，这样陈铭枢就成了右派分子。这篇社论的发表，就封杀了党外的批评。

6月10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工人说话了》的社论。指出：“这两天，北京、上海、天津、沈阳、鞍山等地的许多职工纷纷举行座谈会，愤怒地谴责极少数右派分子的反共、反社会主义的言论。工人阶级的舆论，正在吸引着全国人民愈来愈强烈的注意。……觉悟的工人群众不能不起来应战了。”“广大职工群众看得清楚，如果听任这种右派野心分子飞扬跋扈，那么，工人阶级所领导的国家就将受到危害，社会主义事业就将受到危害。……因此他们对于一切反对共产党，污蔑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污蔑社会主义的言论，表示了坚定的斗争的决心。”社论最后指出：“对于目前的种种反社会主义言论，究竟是谁更能够鉴别，谁更能够采取坚决明确的态度？工人阶级的这种坚定的立场，对于全国的知识分子也有重大的教育意义。同样的一件事，为什么有些大学生和有些大学教授是一种看法，而工人阶级却是另一种看法？某种无政府主义的狂热可以煽动少数知识分子于一时，在工人和劳动人民中却完全孤立了。工人阶级的热情不但表现在英勇的建设的劳动中，也表现在对反社会主义言论的坚决的斗争中。这个事实不但证明了，我们的国家必须由工人阶级领导，而且证明了，工人阶级有充分的觉悟和决心足以领导我们的国家。”²这篇社论表示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发动他们来教训知识分子，这是运动工人群众的一贯做法。

¹ 《人民日报》1957年6月9日

² 《人民日报》1957年6月10日

6月1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全国人民在社会主义基础上团结起来》的社论。指出:“社会主义首先是工人阶级的事业,是工人阶级领导下的工农联盟的事业……要走社会主义的路,没有工人阶级的领导,没有共产党的领导是不能设想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社会主义革命事业中实行了以工农联盟为基础,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方针。全国人民的革命大团结是一个伟大的力量,依靠这种力量,我国现在已经使社会主义革命……基本上取得胜利。”“我国目前还有少数反对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存在,这些右派分子还在利用各种机会积极活动,这并不是什么奇怪的事。……资本主义制度已经在我国一去不可复返,但是总有一些人还不死心,还不相信社会主义制度真能取得胜利,还想寻找机会来改变历史的进程。”社论最后说:“要不要社会主义?要不要人民民主专政?要不要共产党的领导?这是我们的国家生活中的最根本的是非问题。中国人民的大团结就是建立在对这样的问题的共同认识上面。右派分子企图混淆人们在这种根本问题上的认识。一切真正爱国的,愿意站在社会主义方面的人就应当同右派划清界线……。”¹从这篇社论可以看出,要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团结的政治基础就是要人们在坚持社会主义、人民民主专政、共产党的领导,谁反对社会主义、人民民主专政、共产党的领导,谁就成为右派分子。这三条原则作为划分右派的标准。

6月12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正确地对待善意的批评》的社论,说:“就目前的情况看来,各方面对党组织和党员的批评,绝大部分是好的、正确的、对党有益的。……少数右派分子企图把群众的批评引入歧途,利用批评运动达到削弱社会主义事业、削弱人民民主专政、削弱党的领导的目的。因此,我们必须对右派言论给予坚决的回击。”“少数右派分子尽管想用他们的破坏性的言论来扰乱我们的整风运动,但是我们的整风运动一定要继续进行到底,吸收党外群众帮助我们整风这件事也一定要继续进行到底。”²在这里,重申划分右派的三条原则,坚决地回击右派、孤立右派做到了。但接受善意的批评,继续整风只是走过场而已。

6月14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是不是立场问题?》的社论:“在我国的民主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成绩

¹ 《人民日报》1957年6月11日

² 《人民日报》1957年6月12日

究竟是不是主要的？这本来是不应该成为问题的……在目前的许多知识分子中居然成为问题。在政治界、新闻界、教育界、文学艺术界、科学技术界、工商界的人士中，在青年学生中，都有一部分人（其中也包括极少数共青团员和共产党员）对于这一点发生了怀疑……在有些地方……不许别人说成绩是主要的，谁说谁就是犯了教条主义和党八股的大罪。”“为什么会发生这种现象呢？这里是不是有一个立场问题呢？我们认为，成绩究竟是不是主要的，这是值得展开讨论的一个根本问题……倒是否认成绩，现在成了一个根本问题。”最后指出：“明察秋毫之末的大知识分子，不但不见月薪，而且看不见天翻地覆的历史变化，需要等待普通的工人农民来纠正他。这样的人，立场如果不是根本错误，至少也是没有站稳吧？”¹从这篇社论看出，凡是否认或怀疑成绩是主要的人，被认为是犯了立场的根本错误，至少犯了立场不稳的错误。犯了这种错误的人，轻则扣上右倾，重则是划为右派分子。这一条也成为划右派分子的标准。

总之，从《这是为什么？》到《是不是立场问题》的诸篇社论，有的社论是毛泽东亲自起草或修改过的，有些社论的撰稿人秉承上级的旨意，都是贯彻执行毛泽东批判右派、反击右派这一方针而大造舆论的，以此证明反右派斗争的正确和必要。但这些社论都人为加大、拔高反右派斗争的正确性和必要性，为人为制造阶级斗争和加重犯“左”倾错误起到了推波助澜、火上浇油的作用。这时的《人民日报》与鸣放初期不识时务，落得挨批、挨骂迥然不同，而是紧跟毛泽东的战略部署和执行他的意志，充分展示它作为党中央的喉舌的作用。如此才不至于犯前任负责人那样的“错误”。对于这一系列社论，后人评道：“如果说在当时人民日报发出来反击的信号以后，还有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不明白，公开批评人民日报肚量小，依然故我的话，那么，在这之后，这种不明事理的现象就不复存在了。也再没有出现过。经验使人们学乖了，看风使舵。这无论对广大知识分子的心灵和人格，还是对于共和国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都是一个深重的至今仍未治愈的残害。”²

二、揭批右派言论初步

¹ 《人民日报》1957年6月14日

² 张伟瑄等主编《共和国风云四十年》上册，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94页

依照 1957 年 6 月 8 日中共中央文件精神，“尽量使右派吐出一切毒素来……予以反驳。”开始组织、号召和动员各民主党派和学生中的中、左分子对右派言论进行批驳。

批驳葛佩琦、王德周的言论。葛佩琦、王德周均为中国人民大学讲师。他们在人民大学座谈会上的发言，经《人大周报》报道后，《人民日报》、《北京日报》等加以报道。6 月 9 日《人民日报》进行批驳。

王昆仑说：“不能不使人感到愤慨的是有人对党咬牙切齿，仿佛有什么深仇大恨。人民大学讲师王德周说：‘现在党内有百分之九十的党员闹宗派，甚至无恶不作。’又说：‘闹事要机关枪，这是可以的，麻烦的是怕机关枪倒过来打。’葛佩琦说：‘搞得好，可以；不好，群众可以打倒你们，杀共产党人，推翻你们，这不能说不爱国，因为共产党人不为人民服务。共产党亡了，中国也不会亡。……’同志们，请听一下这是什么人的愿望，什么人的声音？说‘共产党员百分之九十无恶不作’，是的，他们所作的是反对帝国主义的‘恶’，消灭地主阶级的‘恶’，肃清反革命分子的‘恶’！……可是，共产党这些‘恶’，正是人民心中的善，这些‘坏’正是人民心中的好。如果有人想起来杀共产党，决用不着架机关枪，老百姓就会拿起他们的锄头、铁锤来的。”¹

朱学范说，“像中国人民大学讲师葛佩琦和王德周的发言，是颠倒黑白，虚构事实。葛佩琦曾说‘今天老百姓对共产党是‘敬鬼神而远之’，不知道他指的‘老百姓’究竟是谁，葛佩琦为什么不到工人和农民中去看看。他不相信今天中国的工人、农民，青年学生、知识分子以及民族资产阶级对共产党是‘敬鬼神而远之’的。王德周说有百分之九十的党员无恶不作，也是没有根据的。葛佩琦说不要中国共产党，人家也不会卖国。可是大家都不会忘记，历史上前清、北洋军阀、袁世凯、蒋介石那一个不卖国？……我是根本不同意这种说法的。像葛佩琦这样的言论，可能是一时的冲动。因为不能相信，高级知识分子会发表这样的言论。民主党派的同志们有责任纠正这些错误观点。一切离开社会主义的言论和行动都是错误的。”²

6 月 9 日，《北京日报》报道了翦伯赞《拥护大鸣大放、反对乱

¹ 《人民日报》1957 年 6 月 9 日

² 《人民日报》1957 年 6 月 9 日

放乱鸣》的文章，文章中不点名的批驳了葛佩琦的观点，“说便衣警察问题。有人说共产党员起了监视人民的便衣警察的作用，对于这样的说法我也反对。大家知道便衣警察是反动统治阶级的鹰犬，而共产党员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党员向组织汇报，是为了帮助领导了解情况……更好地改进自己的工作……这和以迫害群众为职业的便衣警察没有任何共同之点。是的，个别党员在汇报时不全面，甚至不真实，而有些领导同志又专靠汇报了解情况，因而有时偏听偏信，这是应该纠正的，但决不能因此就把共产党员说成是便衣警察，因为这样说这等于说共产党员是人民的敌人，我看人民决不会把共产党员当做敌人来反对，人民要反对的正是那些敌视共产党的人。”¹

据原新华社记者戴煌考证：葛佩琦的发言，《人大周报》、《人民日报》作了断章取义、纯属捏造的报道：6月8日，毛泽东让《人民日报》发表了《这是为什么？》的社论，正式吹响了“反击右派猖狂进攻”的号角，对葛佩琦的批判也随之白炽化——就在同一天《人民日报》的第七版，就有《中国人民大学教师汪金丁等发言，要跟葛佩琦划清界限》的长约三千言的报道，六个黑体字小插图中的三个都提到了他的大名：《葛佩琦继续发表反共言论》、《汪金丁说，要同葛佩琦所代表的那种思想划清界限》、《赵玉珉表示坚决反对葛佩琦的观点》。在《葛佩琦继续发表反共言论》的那一段说：“葛佩琦说至今群众对鸣放还有顾虑，具体反映了群众对共产党的话不敢信任，共产党对这一点应特别重视。因为，‘民无信不正’。我还要重述一遍，群众是要推翻共产党，杀共产党人，若你们再不改，不争口气，腐化下去，那必走这条道路，总有这么一天。这也是合乎社会主义发展规律的，只空喊万岁也是没有用的。”

也许葛佩琦在那一段日子里，没有注意到《人民日报》5月31日至6月7日那几篇等于率先对他进行公开揭露的报道和批判文章；当他一看到6月8日的《人民日报》，他的脑袋瓜就更大！他知道就是在那一期断章取义横加篡改的《人大周报》刊登他的发言全文中，也没有这样一段话。因此这就不只是断章取义横加篡改，而是实实在在的纯属捏造！他当即写了更正信，并于第二天上午亲自送给了《人民日报》社，信的全文如下：

“编辑同志：六月八日你报七版刊登的我的那个发言，有些地

¹ 《北京日报》1957年6月9日

方和原意有出入，请予更正。‘我要重述一遍……只空喊万岁是没有用’这段报道的全文是：“我要重述一遍，群众总要推翻共产党，杀共产党人。若你们再不改，不争口气，腐化下去，那必是这条道路，总有这么一天。这也是合乎社会主义发展规律的，只空喊万岁是没有用的。”应改为“在这次整风中，如果党内同志不积极改正缺点，继续争取群众的信任，那不仅可以自取灭亡，而且发展下去，可以危及党的生存。葛佩琦 1957年6月9日”

“那时候，除了别有所图的少数人之外，大多数人都处于人人自危、自保平安的惊恐中，对‘右派’的批判揭露只能火上浇油，没有任何人敢于公开为‘右派’澄清片言只语。《人民日报》对葛佩琦的这封更正信不但只字未提，而且对他的批判更加连篇累牍。6月14日，该报以南京电、保定电、沈阳电，发表了三篇外地批判葛佩琦的报道，同时刊发了《葛佩琦的学生痛斥葛佩琦》的文章。6月15日，又登出著名人士马寅初的《我对储安平葛佩琦的言论发表些意见》。6月16日，在《坚决粉碎右派的进攻》的大标题下，不但有《农业劳动模范痛驳葛佩琦》的小标题，在《复员军人号召保卫革命果实》的那一段，还说‘葛佩琦、王德周之流说共产党员‘无恶不作’’。6月17日，《人民日报》第二版刊发了新华社的报道：《人民大学教授抨击葛佩琦王德周》。6月18日，《人民日报》第七版《坚决捍卫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北京矿业学院矿工和革命军人出身的学生座谈》，大批葛佩琦。6月20日《人民日报》头版《按不住心头怒火，恨透了右派野心》的总标题下，老苏区人民、河北一农业社农民以及一些著名烈士的夫人集会或谈话，痛斥葛佩琦的‘杀共产党’、‘要共产党下台’……在党中央喉舌《人民日报》的如此带动下，全国大小报刊迅速掀起大批大揭‘葛佩琦要杀共产党人’的高潮，使他成了‘人人得而诛之’的头号反共人物，被“理所当然”地划成了‘极右分子’。¹

批判储安平的“党天下”言论。储安平，《光明日报》总编辑、九三学社中央委员、他在6月1日发表的“党天下”的言论，受到严厉地批判。

1957年6月10日，《人民日报》记者发表吴晗的谈话，其中批判了储安平的“党天下”：“储安平做了一个很引人注目的发言，

¹ 转引戴煌《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8年版，第248-250页

这个发言的目的是离开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方向。他提出了‘党天下’的名词。在国民党统治时代生活过的人，都知道那时候的‘党天下’就是‘蒋家天下陈家党’，这怎么能和今天的人民的天下同日而语呢？这是一种恶毒的诬蔑。”¹

6月13日，《人民日报》报道了史良、千家驹批判储安平论点：史良说：“我作为民盟负责人之一，我要公开声明，储安平的整篇发言是彻底地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已经有人这样说：储安平敢于作这样的反动的言论，要是背后没有大力者加以支持是不可设想的。因此我主张民盟中央必须明确表示，和储安平划清界限，如果我们中间有谁支持储安平的，应当公开站出来。”“在这里我要向章伯钧副主席提一点意见。在上次中央小组座谈会上，伯钧的发言中，对储安平的批评，我认为是很不够，是含糊其辞，模棱两可的。……总而言之，伯钧对储安平发言的批评，并没有接触到问题的本质。我要问伯钧，你是不是也有所顾虑，所以故意含糊其辞，或者你真的不明白储安平发言的本质呢。”“储安平的发言，是以光明日报总编辑的身份发表的。伯钧是光明日报社长，社长应当负报社的政治责任，因此储安平这一篇发言在事前是否向伯钧请示商量，发表以后伯钧有没有向他追问，你有没有向他表示过同意或不同意他的意见。像这样的关键性问题，我认为伯钧是有责任向大家交代清楚的。”

史良又说：“记得上星期天晚间（6月8日），伯钧来找我谈话，我问过伯钧的。我问他储安平的发言稿，事前和你商量没有？他说‘没有，罗隆基是看过的’。伯钧又说，‘有人对我说，储安平的话击中了要害。但我看是用不着写社论的。而且一再掬出卢郁文来，卢郁文这种人不过是一个小丑而已。我看，胡风、储安平倒要成为历史人物，所谓历史人物要几百年后自有定评。’”最后说：“我今天在盟的会议上要求伯钧表明立场和态度。罗隆基现在出国，等到他回来以后，我也希望他能够有所交待。”²

又报道：“千家驹批判了少数右派在整风中混水摸鱼，假借整风反社会主义、反共。他说，为什么要批判储安平的错误思想呢？因为他有代表性，他代表了某些想在整风中‘捞一把’的人，而且

¹ 《人民日报》1957年6月10日

² 《人民日报》1957年6月13日

在民盟中支持他的大有人在。”¹

储安平“党天下”论点得到民盟候补中央委员陈新桂的支持，并辩护其论点。6月13日《人民日报》报道了陈新桂支持“党天下”的观点：“他说他完全同意储安平所说的共产党的‘党天下’思想是一切宗派主义的根源。而且据他臆测储安平可能是怕被人戴上修正主义的帽子，而不曾进一步指出这个党天下的思想根源是什么，而他认为党天下的思想根源就是无产阶级专政。接着，陈新桂进一步阐述他的观点说：从苏联无产阶级专政中发生的斯大林错误，从匈牙利无产阶级专政中发生的匈牙利事件，证明无产阶级专政这个政治制度是有问题的。陈新桂又说，无产阶级专政实际上就是共产党的专政。这样，共产党在贯彻政策的时候，首先要信任共产党员，再就是信任青年团员，再就是信任靠拢党的人。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产生宗派主义、不产生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是不可想象的，不形成‘党天下’是很难想象的。”²

民盟中央常务委员邓初民紧接着进行了反驳，同一天《人民日报》加以报道：“邓初民首先指出：说无产阶级专政有它的缺点我完全同意，但说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是由无产阶级专政产生的我不能同意。邓初民强调说：无产阶级专政本身绝不会产生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相反，所以会产生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正是由于有些共产党员丧失了无产阶级立场的结果。”他还批判了储安平所说的“党天下”的错误论调，认为储安平所说的“党天下”是不合乎事实的。党天下之说，好像天下是共产党的，别人没有份，无论从理论上、事实上都说不通。我们这些民主人士都参与了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并不是共产党一党专政。³

同一天，《人民日报》报道罗涵先批判储安平、陈新桂的言论：“罗涵先说：少数右翼分子的言论，无论就其性质、目的和提出问题的方法来看，是一个向社会主义挑战，向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和政权挑战，向共产主义挑战。他说，认为共产党领导就是‘党天下’和否认无产阶级专政的少数右派分子在实质上是反社会主义的。”⁴

¹ 《人民日报》1957年6月13日

² 《人民日报》1957年6月13日

³ 《人民日报》1957年6月13日

⁴ 《人民日报》1957年6月13日

6月15日,《人民日报》报道了九三学社主席许德珩在座谈会上总结发言,其中批判党天下的谬论,说:“在我们九三学社来说,尤其是储安平发言,在上次座谈会中,大家虽然有所批评,但还没有指出要害,今天大家的发言对储安平荒谬的言论作了批评,我们要和一切反社会主义言论划清界线,并认为:储安平的‘党天下’的谬论是彻底的污蔑。他所说的‘党天下是一切宗派主义的根源,是党与非党矛盾最终所在’,是企图取消党的领导,取消社会主义制度。至于‘大和尚小和尚’之说更是不严肃的。”¹

揭发章伯钧。章伯钧时任中国民主同盟副主席,中国农工民主党主席,《光明日报》社社长。他的“政治设计院”言论发表后,高层民主人士进行揭批。

6月9日,《人民日报》报道王昆仑的发言,其中批评“政治设计院”：“政治上的设计院,这样的看法,我个人不同意。像章伯钧先生的说法,很容易使人理解为:建国以来,许多重大方针、政策没有经过政治协商和人大讨论,而国家体制上这件大事是民主党派无从过问的。”“至于政治上的设计院我不明白,人大就是个权力机关,是否在这个权力机关内再来个权力机关?还是召集一些专家研究供参考,还是把几个权力、协商机关合起来另成一个机关?不大明确。我觉得有人大、人大常委会、政协,只要我们在其中多发挥力量,只要把政策提出来充分讨论,就可以扩大社会主义民主,更加发挥党外人士的作用。”²

6月11日,《人民日报》发表吴晗接见《人民日报》记者的谈话,谈话中对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进行了批判:批判章伯钧“政治设计院”：“宪法序言中讲到我国的统一战线由共产党领导,政协章程也说要进一步加强党的领导和核心作用。各民主党派也都承认共产党对各民主党派的领导作用。所谓领导,应该是政治上、思想上重大问题的领导。如果离开这种领导,另搞一个政治设计院,这是什么意思呢?是不是不同意宪法精神和政协章程,不满意共产党的领导呢?”接着,批判罗隆基的“平反委员会”;批判了储安平的“党天下”。³

6月13日,《人民日报》报道农工民主党中央扩大的座谈会,

¹ 《人民日报》1957年6月15日

² 《人民日报》1957年6月9日

³ 《人民日报》1957年6月11日

会上有的民主人士批判章伯钧的政治设计院问题，杨清源批评说：“章伯钧所谓‘政治设计院’的提法，是否有排斥和反对共产党领导的思想？是否有旧民主主义思想，应该自己检查一下。”严信民说：“章伯钧个人，多少年来在言谈和思想上，却常常表现了动摇。”“这种动摇的根源，一方面是阶级根源，即小资产阶级或资产阶级思想；另一方面是历史根源，即农工民主党在历史上曾经走第三条道路或中间路线。”

有的民主人士为章伯钧的“政治设计院”辩护。王忱心辩护说：“有人说，章伯钧提出的‘政治设计院’，有脱离共产党领导的思想，我也不同意。”张申府：“他认为章伯钧的立场不够百分之百坚定，但也够百分之九十五的坚定；关于章伯钧所说的组织‘政治设计院’的意见，他认为还是值得考虑的。”

章伯钧对“政治设计院”的表态：“政治设计院到底是什么东西？我自己还没有加以说明，这是个严重的问题。因此还希望同志们继续提意见，我要考验自己，用‘动心忍性’的功夫，克制自己，锻炼民主风度，请老师。”接着说，“我那个政治设计院可能是有代表性的错误。”¹

6月14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章伯钧题为《我在政治上犯了严重错误》的初步检查：“5月22日，我在中国共产党中央统战部召开的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帮助共产党整风座谈会上的发言，思想上犯了严重的错误，各方人士已经提出严正的批评。其中最错误的就是所谓‘政治设计院’和国务院开会的‘成品’问题以及文字改革问题。这说明了我的立场不稳，认识模糊，以十分不严肃的自由主义态度，对待国家政策，以至造成政治上的不良影响，为右派分子所利用。我初步检查结果，认为这是由于我几年来学习不够，我的资产阶级意识没有得到改造，因而思想上跟不上国家新形势的发展，以致犯这错。我辜负了共产党和毛主席几年来对我的教导和信任，我深觉惭愧。现在经过各国各界人士对我的批评，我应该及早觉悟，纠正错误，并对帮助过我的同志们表示衷心的感谢。我应该接受这次重大的教训，加强学习，改造思想，并继续深入地检查我的错误思想的根源。”²

揭发章乃器。章乃器是中国民主建国会副主席，中华全国工商

¹ 《人民日报》1957年6月13日

² 《人民日报》1957年6月14日

业联合会副主席。他在鸣放初期发表许多理论和提出不少意见，他的鸣放言论受到了批驳。5月31日举行的中国民主建国会全国工商改造辅导工作座谈会上，章乃器作了讲话。会后根据讲话的基本内容写了一篇题为“关于工商改造辅导工作的几个问题”的文章，刊登在6月9日大公报上。提出了以下一些论点：

“一、他认为官僚主义是比资本主义更危险的敌人。因为，资本主义已经肯定不可能在我国复辟，而官僚主义却随时可以在我们的思想中甚至工作中复辟。在资本主义当中，我们还可以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找出一些在生产、经营上有经验的知识和知识，为社会主义服务；而官僚主义则是‘一无是处’的糟粕。这就是为什么一个社会主义企业加上了官僚主义效率反而不如资本主义企业的理由。”

“二、他认为在公私合营企业中，应该明确以共事关系为主，肯定阶级关系是残余的。在工作中，更不宜强调公方与私方的界限，也不宜强调党与非党的界限，而主要地应该按照职责和分工办事。否则，有职有权是无法保障的，共事关系也是不可能搞好的。只有在思想改造工作上，在化除历史性的劳资两方之间的隔阂上，私方才需要警惕阶级关系。但也不可以理解为把阶级关系当作压服私方的‘大帽子’。”

“三、他认为定息不是剥削，而是不劳而获的收入。理由是：如果今天的工人仍然被剥削，那就不能不对私方有对抗。这样阶级关系就不可能是非对抗性的矛盾了。既然现在已经肯定阶级关系是非对抗性的矛盾，就没有理由说定息是剥削。他认为说定息是不劳而获的收入是比较合理的。他认为也可以这样解释：从整个阶级来说，定息是剥削的残余；而具体到个别的阶级分子来说，定息是不劳而获的收入。他说这种说法不是咬文嚼字的末节，而是实事求是的正名。”¹

在6月10日出版《工商界》杂志1957年第六期上，章乃器发表了题为“关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问题”的文章，提出以下论点：

“一、他说有两种关于两面性的概念。一种是工商业家所熟知的，是政治上革命与不革命甚至反革命的两面性，和经济上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积极的一面与不利于国计民生的消极的一面的两面性。

¹ 参见《关于工商改造辅导工作的几个问题》，《大公报》1957年6月9日

他说工商业家认为，在全行业公私合营以后，上述的两面性是一去不复返了。因此，当教条主义者仍然笼统地不加分析地指出：民族资产阶级仍然有两面性。这不能不使工商业家听了之后惊心动魄！

他说另一种两面性的概念是毛主席在第十一次扩大的最高国务会议上所说的。他说工商业家从毛主席的讲话中理解到：既然什么阶级、什么人都有两面性，都需要改造，民族资产阶级当然有两面性，当然更加需要改造；民族资产阶级比起其他的阶级，消极的一面而且还要多一些；除了思想、作风问题以外，而且还有不劳而获的收入尾巴——定息。

二、他认为说任何阶级都需要改造，不会混淆阶级界限、动摇工人阶级的领导权。因为历史上领导者与被领导者的区别，都只能是先进与落后的区别。不能设想：一个先进的阶级可以领导一个反动的阶级。他说，应该看到，只要这两个阶级的区别稍微再扩大一些，民族资产阶级由落后变成了“半反动”，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就很危险了。他认为，说‘工商业家可以爱国，但决不会爱社会主义’是完全没有根据的，是一种教条主义的说法。

三、关于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有本质的区别的问题，他说资产阶级的本质是剥削，工人阶级的本质是不剥削以至反剥削，矛盾是不可调和，区别是显著的。但是，阶级本质与人的阶级特性是有所不同的。资产阶级的本质——剥削的确是‘与生俱来，至死方休’，而资产阶级分子的阶级特性却并不是‘与生俱来，至死方休’。难道曾经有从娘胎里出来就一定要当资本家的人？他说民族资本家的阶级特性——主要是两面性，仍然是属于思想习惯的范畴。‘阶级的烙印’也只能盖在‘皮肤’上，而决不会盖在‘骨子’里去。他认为在今天还要片面强调阶级特性，而不同时指出人类共同本性这一伟大的目标，显然是错误的。”¹

6月10日《人民日报》发表章乃器在中共中央统战部召开的工商界人士座谈会上提出的书面发言，表示不同意别人对他的批评：“他认为‘抵抗改造’、‘离开社会主义’、‘离开党的领导’一类的大帽子多了一些。他认为主张定息延长到二十年的李康年的建议的用意仍然在于早点消灭资产阶级，摘掉资产阶级帽子；那就没有理由说他是离开社会主义，而只能说他是过急地追求社会主义和不问条件是否成熟就想摘帽子。而摘帽子的同时，又要求

¹ 参见《关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问题》，《工商界》1957年第六期

过多的赎卖金。他认为现在还有人思想问题组织‘围剿’，他问这是不是与党的方针政策一致的呢？他不同意吴大琨同志批评他曲解了斯大林‘共产党员是特殊材料制成的’一句话。他认为从列宁文选中去找，找出斯大林演说的全文来谈问题，这是标准的教条主义的方法。他认为这一句话对某些党员会起到什么影响，应该从客观实际去找。在文中他号召工商界不要怕扣帽子，更不要怕受打击。他说整风运动从某一些角落来看，肯定会有曲折，肯定会有过‘左’、过右的偏向。¹

6月16日，《北京日报》报道：“在15日的民建和全国工商联常委会联席会议上，章乃器继续表示不同意工商界人士和民建常委对他的批评，认为大家的意见从道理上还不能说服他。他说，‘大家反映下面的工作不好搞了，说这是我的言论挑拨起来的。我说不对。这是在党的‘鸣’‘放’方针下，在党的领导下自然发展起来的。许多话是整风运动引起的，不是我的文章挑拨起来的。他不同意对他错误言论的批判，实质上是两条路线斗争的问题，他认为革命没有胜利前，有领导权问题，有路线斗争问题。今天在革命已经胜利，宪法已经颁布的情况下，领导权路线问题都不会发生任何问题。他说别人给他戴这项大帽是违反实际，违反宪法精神的。关于阶级和分子的关系，他仍然说阶级和阶级分子应当有所不同。章乃器接着又说了一段值得注意的话，他说，过去有‘墙’有‘沟’，许多力量是在互相防范、互相摩擦、互相戒备中抵消了。许多旧人员、旧知识分子以及工商界的积极性还没有完全发挥出来，潜力很大。这是过去的斗争遗留下来的副作用。斗争是有成绩的，但副作用也不能否定。”²

上述那些有组织、有计划动员一些人批判右派言论，基本上是根据《人民日报》刊登最容易引起人们义愤和为了“政治需要”采取断章取义、掐头去尾，甚至纯属捏造的报道。批评者出于种种动机，理所当然要进行痛斥和反击，绝大多数被批评者无权为自己解释或辩护，形成一边倒即批评者一家独鸣的局面，这样即使够不上右派言论的上升为右派言论，不是右派分子也被划为右派分子。当然，像章乃器就不接受错误的批评，而且还进行反驳。应该说，对章乃器的某些政治主张、政治观点，还有较为深层次的思想观点，

¹ 参见《人民日报》1957年6月10日

² 参见《北京日报》1957年6月16日

不加分析或简单片面加以否定，往往扣上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反动政治主张的帽子，扣上右派理论家予以否定是不对的。实际上，如果领导真正诚心诚意虚心接受这些意见和建议，对改进和完善执政党的工作和作风是有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的。

自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向右派分子反攻动员令后，全国高校立即对学生中的右派言论发起揭批，现在就北京大学、人民大学和武汉大学等批判右派学生的情况简短介绍一下：

北京大学揭批右派学生。批谭天荣，据《北京日报》6月23日报道：6月22日，北大师生集中批判右派分子谭天荣的反社会主义言行，揭露了谭天荣言行的反动实质。谭天荣打着“反教条主义”的旗号来歪曲和否定马克思列宁主义；打着反“三害”的旗号来否定社会主义制度和人民民主专政。他写的“一株毒草”中对马克思列宁主义进行歪曲，批判列举一八九五年恩格斯逝世后，虽然第二国际少数领袖堕入了修正主义的泥坑，可是真正的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始终是顽强地在斗争着，并通过十月革命而不断取得了伟大胜利。修正主义是资产阶级思想在工人队伍中的反映，是马克思主义的敌人。而谭天荣却把修正主义说成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一个阶段，这更是荒谬。批判揭露谭天荣在他写的“教条主义产生的历史必然性”一文中，混淆是非，歪曲历史，散布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对苏联和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言论。谭天荣的“推翻三害分子的统治”的口号，实质上是推翻党的领导，想挖社会主义事业的根。萧篱父指出：谭天荣利用“争取民主”的幌子，企图推翻人民民主专政，更暴露了他的反动政治面目。¹

6月28日，《人民日报》报道北京大学六千七百多名学生致全国高等学校同学的一封信。“信中愤怒地揭露了在整风运动中，北京大学学生中的右派分子谭天荣、刘奇弟等，和社会上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相呼应，在校内外散布各种反动言论，歪曲学校党的整风运动，组织反动小集团，猖狂地向党和人民进攻的破坏活动。这封信呼吁全国各高等学校的同学们和北大学生站在一起向右派分子进行坚决的斗争，以取得最后彻底的胜利。”

信中指出：“少数右派分子和社会上的右派分子互相呼应，向党和社会主义发动了猖狂的进攻。张元勋、沈泽宜的诗‘是时候了’作了他们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的誓师词。物理系四年级谭天荣的

¹ 参见《北京日报》1957年6月23日

‘一株毒草’向党开了第一枪。”“这‘一株毒草’引起了我们广大同学的愤慨，不一会工夫，到处贴满了反击的大字报，纷纷要求铲除毒草。”“刘奇弟为胡风喊冤说：‘胡风决不是反革命’。”“谭天荣、刘奇弟和其它右派分子拧在一起，组织了反动小集团——‘百花学社’，散布反动谬论，企图‘开展自下而上的民主运动’，向党‘争民主’、‘争自由’、‘争人权’。”“广大同学奋起揭露右派分子的阴谋活动，驳斥其谬论。”“人民大学的学生程海果（林希翎）来我校进行了一次造谣诬蔑的煽动，引起了我们的极大愤慨，当场遭到了猛烈的反击。”

信中指出：“我们要从骨子里揭露右派分子的反动本质。目前，揭露批判右派分子的大字报和小册子更大量出现了，广播台天天播送着批判右派分子的稿件，全校召开了群众大会，全面批判了谭天荣、龙英华等右派分子。”“不彻底粉碎右派分子的进攻，决不收兵！同学们，团结起来共同战斗吧！”¹

据《北京日报》7月21日报道：北大集中批判“广场”反动集团，“广场”不仅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反动刊物，而且是一个反动集团，是右派分子在北大的大本营。“广场”反动集团曾企图在全国各高等学校煽起反动的火焰。会上许多人系统地揭发了“广场”反动集团向党猖狂进攻的……丑恶面目。何钟秀同学严厉地驳斥了右派分子这种诬蔑党的领导的谬论”，还“批判了‘反党不一定是反社会主义’的谬论。”²

报道说：“哲学系副教授汪子嵩着重批判了所谓‘五一九’运动的实质。‘像右派分子龙英华就为地主争选举权，说给资本家摘帽子就是民主扩大了……右派分子刘奇弟说胡风不是反革命，为胡风喊冤。右派分子谭天荣说反右派斗争是‘三害分子’向‘民主分子’的进攻。很清楚，他们是为地主和没落的资产阶级争民主，为帝国主义和反革命分子争民主，为自己的反动思想、反动言行争民主，这也就是‘五一九’运动的实质。汪子嵩说：右派分子说中国是经济民主，政治不民主。这种调子早已不新鲜，早已破产了。汪又指出：以‘广场’为中心的右派分子要扩大民主，争取‘真正的民主’和‘绝对的民主’。这是小资产阶级无政府主义的空想。汪子嵩说，谭天荣等右派分子口口声声要求个性解放，要求充分的个

¹ 《人民日报》1957年6月28日

² 《北京日报》1957年7月21日

人自由，他们说得是否真话！？他们的行动证明这都是假话。他们可以散布反动言论，却反对别人的批判，骂批评者是‘教条主义’、‘白痴’。由此可见，所谓‘民主战士’的行为并不民主。他们不过是青年中的一群渣滓、败类而已。”¹

7月24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汪子嵩撰写的《谁是“五四”精神的真正继承者？》批判文章，指出，“右派分子们说，他们是继承五四精神的，这是对于五四运动最无耻的诬蔑。谁都知道，五四运动是一次革命运动，是要将贫穷落后的旧中国转变为康乐富强的新中国的一次革命的启蒙运动。五四运动虽然是知识分子、青年学生发起的，但后来的事实证明，知识分子只有接受马克思主义，与工农大众相结合，用无产阶级思想来改造自己，走社会主义的道路，才能达到救中国的目的。这就是五四的精神和传统。”“我们摸索出来的共同结论只有一条：只有跟共产党走，才能建设新中国。”最后指出：“只有热爱社会主义和热爱中国共产党的青年，才是五四精神的真正继承者。”“在这次反击右派的斗争中”，“站稳立场，坚决保卫我们的党和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坚决与这些反共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作斗争，事实证明了我们极大多数的青年同学是经得起阶级斗争的考验的。他们无愧于他们的前辈，无愧于历次学生运动的前辈！所以只有他们才是五四精神的真正继承者。”²

7月24日《北京日报》报道：北大师生员工痛斥党内右派分子龙英华谬论：“北京大学哲学系一年级学生、党内右派分子龙英华在整风期间，打着‘共产党员’的招牌，在反对教条主义、反对官僚主义的幌子下，进行了一系列反对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的活动。”“北京大学广大师生员工严正驳斥了右派分子龙英华的反动言行。”“法律系三年级学生周道鸾把龙英华‘政治民主化’的观点批驳得体无完肤。”“龙英华‘凡长皆选’的主张，实质就是要取消民主集中制，实行极端民主”。“龙英华认为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只能通过党员在竞选中争取获得多数来保证，这种提法实质是为资产阶级右派野心家争夺领导权，是向党的领导权公开进攻。”

“哲学系一年级学生黄建武驳斥了龙英华关于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机会主义谬论。”黄说：“龙英华的第一个论据是：现在的帝

¹ 《北京日报》1957年7月21日

² 《人民日报》1957年7月24日

国主义比之列宁时代变好了，‘生产力发展了，工人生活得很不错，不要革命了’。所以无产阶级专政的口号过时了，再提就会‘脱离群众’，‘吓跑资产阶级’。这是极端荒谬的说法。”黄建武指出，龙英华的第二个结论是：‘世界是人类的大家庭，面对氢弹、面对自然，人们有着共同的利益’，是企图否定两大阵营的尖锐对立，否定阶级斗争。事实证明，现在是阶级矛盾超过人对自然的矛盾。”“黄建武说，龙英华的第三个论据是非常可笑的。他认为毛主席提出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形式比无产阶级专政更全面，更反映问题的本质，这是‘对列宁主义的修正’和‘否定’。还说‘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总结的五条经验中就没有提无产阶级专政。这完全是捏造。我国的人民民主专政实质上是无产阶级专政。它是无产阶级专政在我国的特殊形式。”

“中共哲学系党总支书记王庆淑说，龙英华的思想言行和我们的党纲、党章所规定的基本内容是根本对立的。党纲规定，我党的思想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我党的政治路线是加强党的领导，不断地巩固人民民主专政，建设社会主义、我党的组织原则是民主集中制。而龙英华对这一切都是坚决反对的。他的言论和活动，正是从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向党猖狂进攻；而他本人已经堕落为彻头彻尾的右派分子、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理人 and 党的叛徒。”¹

7月14日《北京日报》发表新华社记者朱彬报道：“‘百花学社’的一个发起人陈奉孝，他是数学系三年级的学生。他的父亲是个工厂的老板。”“另外一个发起人谭天荣，他出身于小地主家庭。他的父亲……因为生活上腐化，贪污公款，而被人民法庭判罪。”²7月21日《北京日报》报道揭露：“‘广场’编辑部是一个有组织、有纲领、有策略的反动集团，是北京大学一切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的大本营”，“也是高等学校右派分子向党进攻的总指挥所”。“由张元勋充主编，沈泽宜、王国乡充副主编。右派分子谭天荣也秘密地参加了广场编辑部的工作。广场编委会核心小组由陈奉孝、叶于注、崔德甫、许南亭、张元勋、沈泽宜等六人组成”。“有这样一条线索：谭惕吾、黄绍竑、——林希翎——‘百花学社’——‘广场’”。“另一条线索：章乃器、许汉三（章的秘书）——许南亭（许汉三的儿子）、章乃器的干儿子——‘广场’编委

¹ 《北京日报》1957年7月24日

² 《北京日报》1957年7月14日

会。”¹

7月24日《人民日报》记者报道：《摧毁右派分子在北京大学的据点》。报道说：“北京大学右派分子反动小集团——‘百花学社’‘广场’，这个一班人马、两个招牌的组织，经过月余的反右派斗争，他们的阴谋被揭露出来了。”“他们的目的是：以北京大学为据点，通过刊物、社团，同全国高等学校的右派分子建立联系，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火，放到全国各高等学校去，然后蔓延到中学，把高等学校搞乱，再把这火放到工厂、农村。”“确定十四条纲领。这些纲领彻头彻尾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经全校学生的揭露和批驳后，他们开始分化和‘退却’。”“广大学生正在进一步展开批判，来彻底打垮右派分子在北京大学的据点。”²

8月23日，《人民日报》记者说：经过反右派斗争，北京大学学生受到了深刻的教育，也得到了共同的认识，必须提高社会主义觉悟，加强政治学习，站稳无产阶级的立场，才能做个社会主义的大学生。”“学生中出现右派分子，绝大部分都是出身于地主、资产阶级家庭。他们过去没有认真接受思想改造，甚至抗拒思想改造，坚持反动立场，所以在本次风浪中都现了原形。”“根据1956年的统计，全校学生中的工农成分，只占22%，而地主、资本家等剥削阶级出身的人以及自由职业者等上层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人即占到70%以上。而在1954年以前招生的班级，剥削阶级出身的学生比例则占的更大。”“经过前一时期的斗争，每个同学联系到自己的情况，想到为什么漠视了当前还存在阶级斗争的现实？为什么警惕性不高？为什么立场不稳？为什么受了右派分子的蒙蔽？……大家一致认识到归根到底是同自己的阶级出身和忽视思想改造有关，都下决心要加强政治思想锻炼。”³

揭发批判北京大学右派学生的文章、报道还有不少，就不去引用了。

中国人民大学也发动了对右派学生的批判。6月30日，人民日报刊登了新华社专稿《毒草识别记——中国人民大学学生批驳了林希翎的谬论和谎言》的报道，说：“全校师生对林希翎的右派言论共进行八次大规模的辩论……加以驳斥。”“孙映通同学用马克思

¹ 《北京日报》1957年7月21日

² 《人民日报》1957年7月24日

³ 《人民日报》1957年8月23日

主义关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基本原理，驳斥林希翎反动言论的一个基本论点——‘我国公有制的基础是好的，但上层建筑要根本变革’的论点。”孙说：“同志们，根据林希翎的论点，我们便无法理解我国的公有制基础怎样建立起来，怎样维持下去和怎样不断巩固的。”“而我国的生产力并不是停滞不前，更不是被破坏了，恰恰相反，我国的生产力正在蓬勃地向前发展。几年来经济建设的伟大成就便是最有力的证明。”

“林希翎是从寻找‘三害’的根源，引论到必须变革上层建筑，改革政治制度的。许多同学在会上指出‘三害’产生的根源是多方面的，其中主要是旧意识对人们的影响，和思想方法的片面性。而这些旧思想旧意识是旧基础旧制度的产物，它们的存在，正是意识落后于存在的反映。”“林希翎企图从社会主义制度方面寻求‘三害’的根源，是完全错误的。”“大家对林希翎利用‘鸣放’机会，给早为全国人民同声声讨的胡风反革命集团作辩护，特别是她还影射今天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政策是从胡风处剽窃而来，尤为愤慨。”许征帆驳斥说：“胡风所提出的却是解散文艺界统一组织、分裂作家的团结、宣传资产阶级的文艺思想的主张，两者绝不能混为一谈。”许征帆批驳林希翎所说的等级制度说：“林希翎把由于人们的才能、劳动、分工而形成的不同级别与职别，和由过去人们由于对生产资料的占有关系与在社会生产体系中的地位的不同，以及由此反映在法律上的权利和义务区别而形成的等级制度混为一谈。”“林希翎的‘以党代政、我国没有法制’、‘肃反扩大化’、‘统治阶级的局限性’、‘人民应该对现实不满’等许多荒谬论点，都一一在辩论会上受到痛击。许多同学指出：林希翎所描述的党的现状是根本的歪曲和恶意的诬蔑。”¹

7月4日《北京日报》发表了许征帆题为《林希翎论战手法的批判》的文章：林希翎的论战手法，却十分狡猾，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种：“第一，两面派手法。空喊拥护党、毛主席、社会主义制度，而又具体地加以抨击、否定，用革命的词句掩盖反动的思想。”“第二，观察问题时违背了历史观点与阶级分析的方法，混淆不同性质的东西，抹煞了新中国与旧中国的根本区别。”“第三，以个别代替一般，以局部代替整体，否定我国的光明面，夸大现今社会中的黑暗面。”“第四，偷换概念，模棱两可，增加明辨是非

¹ 《人民日报》1957年6月30日

的困难。”许文还分析了林希翎的一些辅助性论战手法，如：“先发制人、出奇制胜；胜则留，败则溜；分化群众，争取同情者，吹嘘过去的所谓‘光荣历史’，掩盖今天言行上的错误等等。”¹

7月15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灵魂深处长了脓疮的林希翎》的报道，说：“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林希翎（原名程雨果）是怎样走上反党反社会主义道路呢？“这与他的家庭出身、生活环境及资产阶级思想意识是分不开的。”林希翎说：“她出身于贫农家庭，从小就吃苦、受罪，又做工。她自称有‘工人阶级觉悟’，十三岁参加革命，现在才是个二十一岁的女孩子。”实际情况是这样：林希翎的父亲做过浙江温岭县伪税务局主任，解放前夕带着姨太太逃跑，遗弃了原妻。”“家庭长期居住在城市，1948年底，才搬到乡下去，在土改期间，分了六亩地，于是就算个贫农了。林希翎的母亲是个‘虔诚的基督教徒’，曾当过中、小学教员。”“所谓做工，也只不过是帮助她母亲搞一些包香烟、雕雨伞柄等手工劳动。她母亲被丈夫遗弃后，把一切希望寄托在林希翎身上，要好好读书，将来飞黄腾达，高人一等。林希翎在母亲、父亲那儿接受来的思想，总结为，‘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人吗，不流芳千古，也要遗臭万年’。”

报道最后说：“整风开始后，林希翎和其他右派分子一样，猖狂地向党发起了进攻。她首先跑到北京大学去点火，她跑上讲台就诬蔑党的政策，说‘肃反扩大化’了，‘三害产生的根源是社会主义制度’。主张‘爆破’我们社会主义制度，骂我们伟大的党是‘混蛋’。后来，她又在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发表了几次反社会主义的谬论。”“尽管林希翎用了一套阴险的手法，企图推翻我们党的领导，但在今天用马列主义武装起来的大学生面前，马上就认出了她的反动本质。”“当她的论点被驳斥得站不住脚的时候，她就出走了。”“就跑到谭惕吾的家里去‘领教’。‘一见如故，就称母女’。她在谭家里又与右派分子黄绍竑勾结起来，密谋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策划。”“目前，林希翎这个阴险的右派分子的面目，已赤裸裸的暴露在广大学生的面前。她已陷于四面楚歌之中。”²

武汉大学批判右派学生。7月22日，《长江日报》发表了题为《“右派司令”吴开斌》的报道，说：“大名鼎鼎”的“害群之

¹ 《北京日报》1957年7月4日

² 《人民日报》1957年7月15日

马”——北京人民大学学生林希翎（程海果）写信给武汉大学中文系三年级学生，被武大同学称作“右派司令”的吴开斌。吴开斌写了回信之后，“他们之间发生了频繁的通讯联系，互相介绍自己的思想、观点、出身、历史、互寄照片，互通情况。”“这两个从未见过一面的“志同道合”的右派分子，就这样一拍即合，成了‘天涯知己’，‘相见恨晚’。”“吴开斌能够被林希翎赏识，成为坚决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的右派分子，是决非偶然的。他原来出生在一个国民党官吏的家庭，从小就想‘出人头地’，‘自命不凡’，‘想当‘大人物’，崇拜蒋介石；后来，受了储安平办的‘观察’杂志的影响，又非常向往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

报道说：“党提出了在全党开展整风的决议后，右派分子向党展开了进攻，吴开斌以为时机已到，他估计形势说：‘这次运动可以看出来，除非是思想非常僵化的人，都会跟我们走的。’他每天到‘图书馆看‘文汇报’、‘光明日报’回来，就唉声叹气，说：‘缺点怎么这么多啊！’‘唉唉，是天下乌鸦一般黑！’他以为共产党站不住了。当他看见在武大时机成熟后，就立即站出来，组织了‘火焰报’，自己当了学生中的右派分子的‘司令’。可是，这次吴开斌又估计错了，共产党不但没有垮下去，反而站得更稳了。经过这次反右斗争，社会主义阵地也更坚强了。而吴开斌们这一小撮右派分子呢，却碰得头破血流，他数载辛苦经营的反党小集团也土崩瓦解。”¹限于篇幅，武大师生揭批右派学生的文章就介绍到此。

总之，揭批学生中的右派分子除了无限上纲上线，人身攻击、打棍子、扣帽子、喊口号外，难得让人心服口服，只能更加产生对立情绪。他们的言论之中确有过急之处，但绝大多数言论是建设性的、前瞻性的。更重要的是不能因为批判，就将他们一棍子打死，断送一生前途。可实际上反右斗争断送了他们的一生前途，这等于扼杀了新生力量，于国于民都无益处。后来的历史发展证明了这一点

三、反击右派的思想武器

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作了《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的讲话，在党内外进行传达、学习，作为指导整风运动的思想武器，起到了发扬民主、促使进步、解放思想、改革创新的作用。自6月8日，毛泽东亲自动员、部署

¹ 《长江日报》1957年7月22日

反右派运动仅仅十多天，为了给各民主党派、广大干部和“左”派分子进行反右派斗争提供思想武器。6月19日公开发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根据形势的需要和认识发展的变化，从原来作为整风的理论武器变为现在反右派斗争的理论武器，为此，公开发表时作了原则性、关键性的修改，突出反右，强调阶级斗争，强调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谁胜谁负还没有真正得到解决等问题。

删去的部分如下：

第一，整理时，删去了对斯大林和苏联的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批评。比如：“本来是人民内部矛盾，讲政府的坏话，说政府，不满意政府，不满意共产党，批评政府，批评共产党，……斯大林在很长时期内，他是不加分别的，差不多是不加分别的。”只能讲好话，不能讲坏话；只能歌功颂德，不能批评。谁如果批评了，那么就怀疑你是敌人，就有坐班房的危险，就有杀头的危险。”“杀错了许多人，重要的人，象共产党代表大会的代表，杀了百分之几十，中央委员杀了多少？第十七次党代表大会的代表抓起来，跟杀掉的占百分之八十，而第十七次党代表大会上选出来的中央委员抓起来跟杀掉的占百分之五十。”¹对斯大林和苏联的批评，在讲话中占很大的篇幅，发表时统统删掉了。

第二，删去了对某些人“左”的错误的批评，对于不赞成“双百”方针的人的批评：“陈其通、马寒冰几位同志，在1月7日《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一篇声明，四个人署名，实际上是怀疑“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个方针，所谓自从这个方针提出来，就没有大作品了。这个结论作的过早了一点。”“陈其通、马寒冰的文章社会主义国家很喜欢，真理报登出来了，此外捷克、罗马尼亚都登出来了，很有市场是文学报？不是真理报……。‘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各人喜欢各人的东西，气味相投。”²

第三，删去了对王蒙和他的小说《组织部里新来的年轻人》的肯定。“王蒙的小说有片面性，有反官僚主义的一面，我看他的文章写得相当好”。“很有希望，新生力量，有文才的人难得。”³

第四，删去了各种各样具体事例：“北京航空学院一个党支部

¹ 《毛泽东思想万岁》1949.10-1957卷，第149-151页

² 《毛泽东思想万岁》1949.10-1957卷，第159页

³ 《毛泽东思想万岁》1949.10-1957卷，第143，146页

副书记马云风反对苏联出兵匈牙利的标语”；“去年（1956年）二十八个城市里头，大学、中学，听说二十几个学校有七千多学生闹事”；“1949年以来处死反革命分子的数字等”；“外国的人物，如赫鲁晓夫、哥穆尔卡、拉科西、格罗、铁托、卡德尔等等，他们的名字和对于他们的议论。”¹

上述那些删去的部分表明，其一，毛泽东开始放弃批“左”、批教条主义和纠“左”。其二，防止被批、挨整的人利用《讲话》中的某些观点来维护自己、为自己辩护。其三，有些人的某些观点来源于《讲话》中的某些观点，像“教授治校恐怕有道理”、征求非共产党人士应否有职有权和学校党委制的意见。²删去部分的真正目的，有洗清自己有某些“右派”观点成分的嫌疑，取得党内保守派即“左”派支持，更主要是为反击右派斗争需要。

修改增加部分如下：

代之以谨慎、明确的提法，比如在原稿中说：“百花齐放里面，包括各种不同的花，也包括一种性质不同的花。百家争鸣，也可以讲唯心论……只要不搞秘密团体。”修改为“艺术上不同的形式和风格可以自由发展，科学上不同的学派可以自由争论。”

在“向自然开战”中说：“我们的根本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明确“提出划分敌我和人民内部两类矛盾的界限，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以便团结各族人民进行一场新的战争——向自然界开战，发展我们的经济，发展我的文化。”

增加了对阶级斗争的分析：八大文件指出：在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已经处在消灭的过程中”，“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

修改增加为：“在我国，虽然社会主义改造，在所有制方面来说，已经基本完成，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但是，被推翻的地主买办阶级的残余还是存在，资产阶级还是存在，小资产阶级刚刚在改造。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

¹ 《毛泽东思想万岁》1949.10—1957卷，第152，161，151页

² 参见《党的文献》2002年第6期第20页

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还是很激烈的。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在这一方面，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这段话已经背离了八大关于我国阶级关系和社会主要矛盾的科学论断。

增加了对修正主义的批判：“我们在批判教条主义的时候，必须同时注意对修正主义的批判。修正主义，或者右倾机会主义，是一种资产阶级思潮，它比教条主义有更大的危险性。修正主义者，右倾机会主义者，口头上也挂着马克思主义，他们也在那里攻击‘教条主义’。但是他们所攻击的正是马克思主义的最根本的东西。他们反对或者歪曲唯物论和辩证法，反对或者企图削弱人民民主专政和共产党的领导，反对或者企图削弱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取得基本胜利后，社会上还有一部分人梦想恢复资本主义制度，他们要从各个方面向工人阶级进行斗争，包括思想方面的斗争。在这个斗争中，修正主义者就是他们最好的助手。”这是彻底放弃批“左”，坚决转向反右，给民主改革思想和民主改革派当头一击。

增加了“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的论断：“当人民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之后，中国要向哪里去？向资本主义，还是向社会主义？有许多人在这个问题上的思想是不清楚的。事实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实际上斯大林式的社会主义救不了中国，还是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社会、邓小平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

修改后增加了区分香花、毒草的六条标准：“（一）有利于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而不是分裂人民；（二）有利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而不是不利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三）有利于巩固人民民主专政，而不是破坏或者削弱这个专政；（四）有利于巩固民主集中制，而不是破坏或者削弱这个制度；（五）有利于巩固共产党的领导，而不是摆脱或者削弱这种领导；（六）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国际团结和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国际团结，而不是有损于这些团结。这六条标准之中，最重要的是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两条。”¹这六条标准成了六根到处乱打的棍子，随意划右派制造冤假错案。

¹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75、388—393页

修改、增加部分，更加强调阶级斗争，把阶级斗争引向思想领域、意识形态方面，这为阶级斗争扩大化提供理论依据。《正处》这一改动和公开发表，从原来作为整风、鸣放的理论武器，现在变为批修、反修、反右派和划右派的思想理论武器，理论根据。从有限的开明、民主、改革的思想武器变为人整人、划右派的思想武器。为后来“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斗争哲学”奠定了理论基础。

薄一波谈及《正处》发表的目的说：“《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讲话》“从讲话记录稿到最后发稿，加上中间的修改稿，共有15份稿子，就是说，一共修改了14次。修改，不仅是根据文章逻辑结构的需要，还有形势的需要，以及认识的发展变化。所谓形势的需要，就是有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趁党进行整风之机，向党向社会主义发动了进攻。发表稿中尽管没有直接提到反对资产阶级右派的话，但发表的目的含有为反击右派的进攻提供思想武器，则是无疑的。”¹

胡耀邦对《正处》公开发表后的的情况进行了评述，他对一位来访者说：1957年初，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讲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吧，本来讲得多好啊，可是后来整理发表时，添了很多政治思想领域阶级斗争的东西，成了那年划几十万右派的理论根据，也是后来在政治思想领域、意识形态领域一再搞政治运动的理论基础，把‘八大’提出的路线实际上给否定掉了。²其实这篇文章不仅为反右派斗争提供思想武器，而且后来成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重要根源之一。

汪澍白评述《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文章指出：6月《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经修改后正式发表，两类矛盾学说的框架未变，但阶级斗争观念又在新框架内恢复了活力，像旧酒注入新瓶一样，依然保持着它的原汁原叶，再通过为时一年的反右派斗争实践，便初步奠定了一整套阶级斗争扩大化的理论基础。其要点有五：第一，对主要矛盾的判断出现反复。这种对主要矛盾判断的反复，是形成阶级斗争扩大化的一个重要理论根源；第二，提出了政治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这样一个新概念。一旦提出‘思想战线上的革命’，或把思想战线与政治战线连在一起，采用大批判，大辩论的方法，借群众运动的压力来解决，就势必会将思

¹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册，第589页

² 参见《炎黄春秋》2002年第4期，第10页

想问题与政治问题等同起来，把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混淆起来，造成阶级斗争和反右派及后来开展的其他政治运动扩大化的严重后果；第三，突出了批判修正主义的任务，强调修正主义比教条主义有更大的危险性。二十大以后，批斯大林教条主义僵化模式，中国想走自己的路，对社会主义体制进行改革。2月的《讲话》支持改革的新思维，《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对刚刚萌芽的改革思想给了当头一棒。自此以后，改革总是被指斥为修正主义、资本主义，而教条主义的僵化思想则往往被视为立场坚定的表现。积久便形成了一种‘左’比右好，宁‘左’勿右的惯性心理。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因此被整整推迟了二十年。第四，开启了政治思想标准划分阶级成分的端倪。抛弃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别出心裁地按照人们在某一次政治运动中的言论划出一个‘资产阶级右派’来，这就错误地提出了按政治思想标准来划分阶级。第五，肯定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四大’形式，使其成为对持有不同意见的人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合法手段。在确定了‘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的反右策略方针以后，‘四大’已形同皇权专制时代的‘奉旨申斥’，经过几个月的‘四大’演习，此后的思想与政治领域便呈现出打手逞凶与百家缄口、百花凋零的景象。把‘四大’形推向经济领域，发动‘大跃进’，借‘四大’来发动‘文化大革命’，终于酿成大内乱。总之《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发生了巨大的破坏作用，至今仍不能低估其深远影响。”¹这是迄今为止，对《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最精辟、最富有说服力、最公正客观的评价。

1957年6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不平常的春天》社论。毛泽东在审阅此文一、二次清样稿时，都作了修改。这篇社论是配合《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讲话》公开发表而写的，是指导反右派斗争的又一篇很权威性的社论。现摘引主要内容如下：

社论首先肯定《讲话》的威力：“2月27日，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演。这篇讲演虽然到现在才发表，但是它的内容早已在社会各界人士中间传布了。这篇讲演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阐明了我国在所有制方面基本上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以后所面临的一系列根本问题。它对于提高我国人民的觉悟，巩固我国人民的团结，推进我国社会主义事

¹ 《炎黄春秋》2003年第2期，第4—5页

业的健康的发展，无疑将产生深刻的久远的影响。我们且不说遥远的将来，只从2月起至6月中这短短一段时间来观察一下，就已经可以看出它所提出的方针的威力来了。”

社论指出各种人对于《讲话》不同反应：“对于毛主席代表党中央所提出的方针，各种人的反应是不同的。广大群众热烈地拥护这个方针……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是另一种情形。他们对于中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是不甘心的。匈牙利事件加强了他们的一种想象：在所有制方面已经建立了社会主义基础的国家，仍然可以推翻，可以变质。党同人民群众相反，他们不但不把毛主席的讲演看做是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的武器，而且想入非非，以为可以利用它来作为削弱社会主义制度的工具。……5月间，共产党开始整风，而且要求党外人士帮助整风。他们认为机会来了。……向社会主义制度和党的领导展开了猖狂的进攻。”

社论揭露右派进攻的目的：“对于他们说来，‘大鸣大放’也好，‘帮助整风’也好，这原不过是一种触媒，一种由头。项庄舞剑，意在沛公。”接着毛泽东加写一段：“右派‘鸣放’，意在攻击社会主义制度、推翻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既然如此，工人阶级，劳动人民和革命知识分子就不能不坚决地进行反击。有人说，党不是在请别人帮助自己整风吗，怎么整到别人头上来了呢？不错，党还将继续请广大群众帮助自己整风，这是毫无疑问，必须坚持到底，也必然会坚持到底的。但是难道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反动言行，也可以受到保护，不受批判吗？如果各界革命领导人物对于反社会主义的言论行动（不管他们借什么神圣的名义）不知道警惕和识别，不知道迎头痛击，这样的革命者对于人民的事业还有什么责任心？”

社论指责右派挑起这场斗争：“大家看到，这一次斗争并不是工人阶级挑起来的。古人有云：树欲静而风不止。……资产阶级右派的政治活动家，资产阶级右派的知识分子，虽然也混在群众中迎了新，送了旧，但是他们是并不同意的。他们既然不同意，他们的反社会主义的风就不能止。”

接着毛泽东加写一段：“现在已经有了许多事实证明，某些人老早就另有企图的，他们不但是不赞成社会主义革命，而且也早就不赞成反帝反封建的彻底的民主革命。因此，无论如何，一场争论是不可避免的。本来有争论，而且是根本性质的，不容含混的争论，掩掩藏藏暗地进行好呢，摊开在桌面上好呢？显然，前者不好，

后者好。表面上躲开这场争论，决不会帮助我们平稳地建成社会主义。相反，经过这场争论，弄清了人们的真面目，就将教育广大群众。”社论最后指出目前的政治气候是艳阳天：“在目前的争论中，有些人也难免有会想到天气的寒暖。虽然立场之说还不能人人同意，但是立场不同，政治气候的寒暖之感也不同，这却是一个客观的事实。在我们社会主义者看来，目前的天气确实是一个大好春光的艳阳天。”¹

这是一篇由胡乔木执笔，经毛泽东修改发表在《人民日报》头版头条、极为重要的社论，社论中肯定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讲话》的威力，指出各界对于《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讲话》公开发表后的反应和态度，揭露右派进攻的目的，斥责右派挑起这次争论，大力歌颂反右斗争形势是艳阳天。这是对反右派十多天来大好形势的全面肯定。经毛泽东修改，以《人民日报》社论形式，再次号召各界领导人物痛击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行；把右派的现在与过去联系起来，以加深对右派的全面认识和加强对反右派斗争的领导。这篇社论在本来“对阶级斗争形势估计得过于严重的”的状况下发表，越发使反右斗争的错误更加趋向严重。

《正处》于6月19日在《人民日报》公开发表后，引起极大反响，除党报外，知名人士发表文章或谈话来表明态度。6月2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宋庆龄题为《否认共产党的领导，就是要使全国人民重陷于奴隶的地位》文章。首先肯定整风运动。“整风运动表现出共产党对它本身的力量和它的群众基础具有莫大信心。更主要的是这次运动将使共产党进一步加强。”“这是一次健康的运动。”“首先就是吸引非党人士参加共产党自己的改进工作，其次，就是给每一个人发表意见的机会，使一切心底里的意见都可以放在桌面上来加以探讨。”接着指出：“我对有些人所发表的一些谬论，是肯定不能同意的。”“但是必须明白，把病人甩掉是不能把病人治好的。”最后说：“我对中国共产党的一贯认识是它根据对于社会和政治发展的科学态度去追求真理，并且为真理而奋斗。”“我们也有权利要求每个共产党员为自己确立最高的标准，并且同广大的群众保持始终一贯的联系，以维护中国共产党的荣誉。行使我们这项权利的办法就是帮助共产党的整风运动。”“同时，我们帮助共产党整风，决不可否认共产党的领导或它的领导地位。否认共产

¹ 《人民日报》1957年6月22日

党的领导，在客观上、事实上就是要使历史倒退过去……重陷于奴隶的地位。”¹

7月13日，《人民日报》转载了宋庆龄题为《团结就是我们的力量》文章。首先肯定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毛主席及时指出，我们必须正视目前存在于我们社会中的矛盾，把它看成我们国家议事程序上的第一个项目。他曾经阐明这些矛盾是人民内部的矛盾，不同于敌我之间对抗性的矛盾，所以必须用不同的方法去处理。”“这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结合中国具体情况的新的运用。”接着提出判断正确、错误的标准：“在我们的讨论中，绝大多数的发言者都是为了促进社会主义发展的。总的说来，这个运动是健康的。”“不过，某些发言也显示着存在一些不健康的倾向，显然这只是存在于极少数人中间。这并不使我们感到意外。”“中国共产党和我们的政府已经打开了大门，听取一切意见。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有接受每一个意见的义务。有一种判断的标准：是否符合六亿人民的利益和有利于社会主义？我们用这个标准来衡量一切，这个标准告诉我们什么是全部正确的，什么是部分正确的，什么是完全错误的。”

最后提出“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她说：“没有共产党，我们的革命就不会成功，我们就连社会主义的希望也没有了。”“我们的人民当前的目标就在于改善社会主义制度，使它更深刻、更广泛。我们今天的愿望就是帮助共产党，在建设社会主义中支持它，因为事实证明社会主义是解决中国的贫穷和落后的惟一办法，是我国在国际上独立与尊严的惟一保证。”“在中国过去和现在所存在的一切政党中，只有共产党最了解我们的历史和情况，只有共产党在行动上最勇敢、最坚决。”“正如事实所一再证明的，只有共产党才具备在打败国内外敌人所必不可少的阶级决心。我认为上海的工人曾用一句简短的话把事情说明白：‘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²

以上两篇文章，前者是对党领导的整风运动持积极态度，后者是对《正处》公开发表的积极肯定，尽管没有像其他知名人士用六条政治标准的语言来表态，但她用是否符合六亿人民的利益和有利于社会主义作为标准来衡量一切，来支持和拥护《正处》的发表，

¹ 《人民日报》1957年6月21日

² 《人民日报》1957年7月13日

该文发表后，当时有人说她思想右倾，可是历史证明，她是正确的。

6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何香凝《民革需要整风》的文章，这是何香凝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矛盾的讲话》公开发表以后的一篇重要文章。也是对反右派斗争的表态文章。开头揭露右派鸣放的方向和目的：“最近以来，有一批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借口大鸣大放，帮助共产党整风，发表了反对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反对人民民主专政的荒谬言论。他们的谬论有的采取完全公开的方式，有的采取比较隐蔽的方式，但是他们的方向和目的确实一致的，那就是企图破坏社会主义事业，破坏人民民主专政，篡夺领导权，破坏党和人民的团结，妄图把历史的车轮往后拉，走向资本主义道路。”这是符合毛泽东提出的，有民主党派中的左派人士整民主党派中的右派人士，让民主党派内部互整的策略。

在回忆廖仲恺被国民党右派杀害后提出建议：“民革需要整风，各民主党派也需要整风。我赞同民革开始整风。以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演中所提出六条政治标准……为根据，揭露右派分子的错误言论和行动。凡违反这六项政治标准的都应整掉。”²

郭沫若发表反击右派的谈话。题为《拨开云雾见青天》。载于1957年6月28日《光明日报》。这篇讲话，1957年6月29日《人民日报》转载时，题目改为《乌云消散，太阳更加万丈光芒——郭沫若谈反右派斗争》。³每当发生重大政治学术文化事件，“升调歌手”郭沫若总是出来表明态度。

郭沫若向记者谈话主要内容如下：必须坚决回击右派分子猖狂进攻。“别有用心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企图偷天换日，竟假借帮助党整风的名义，对党、对社会主义制度进行了猖狂进攻。……右派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要推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推翻社会主义制度，让资本主义复辟。”“诚然，在一个短时期内，右派分子的种种谬论，曾欺骗了一些人，引起了一些紊乱，但是，它只像一团团乌云，把太阳遮了一下。6月19日毛泽东主席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公布了，26日周恩来总理根据毛主席的报告所

¹ 参见《炎黄春秋》2002年第3期。

² 《人民日报》1957年6月22日

³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第527页

提出的方针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作了‘政府工作报告’。人们得到了辨别是非的明确的标准，也清楚地看到了几年来，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所取得的成就，是多么光辉和伟大！可以肯定地说，今年已经是‘拨开云雾见青天’了。乌云消散，太阳是更加光芒万丈。”

“是不是‘言者有罪’了呢？“可能还有人这样问：不是说，‘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吗？怎么言者又有罪了呢？实际上，答复这个问题很简单：‘无罪者的言者无罪、有罪者的言者还是有罪的’。一个人的话，如果动摇了国家的根本，还是无罪，那还有什么国家法纪可言呢？在我看来，今天‘言者无罪，闻者足戒’这句话，仍然一点也没有打折扣。”“目前，有两件事是必须区分清楚的。一件是对右派分子的斗争。这是一场政治上、思想上的阶级斗争。是必须进行的。……另一件是整顿不好的作风。关于整风，不但共产党要做，目前许多民主党派也在开始做，这是很好的现象。”¹

以上的论述说明，用毛泽东所提出的六项政治标准，动员高级无党派民主人士积极写表态文章，动员左派民主人士以无限上纲上线的办法去反击右派分子；左派民主人士奉命要求各民主党派进行整风，实际上是动员左派民主人士去反击、批判右派民主人士。左派民主人士现在批判右派仅仅才开始，以后左派人士为了自身利益（当然也有个别人也许不是这样）而大打出手，积极参与反右派斗争的行列，其结果并不比右派的命运好多少，不过这次反右没有轮到一些左派人士的头上，在以后的政治运动中，他们也相继陷入悲惨的境地，这是人整人必然的逻辑。当然也会有些人的命运好些，但也活得很累，精神负担很沉重，压力很大，真正心安理得的那只是极个别人，这种人没有一点做人的良心。

这次揭批右派言论用的是建国以来历次政治思想批判运动一贯采取的做法，由上级定调子、划框框、找对象，由《人民日报》等权威媒体按照上级定好的调子加以报道，这些奉命报道往往做了许多技术上的处理，失去了公正、客观，违背实事求是的原则。加之，毛泽东公开发表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给批评者、执行者以反右的理论武器。许多批评者根据《人民日报》的报道，对被批评者加以批驳，这些批评者中有的领导组织左派知名人士写文章、发表谈话是为了给反右扩大影响、打造声势；有的批评者是

¹ 《人民日报》1957年6月29日

为了表态与被批评者划清界线，洗刷自己；有的批评者是为了从中捞一把，改善其地位，为以后荣升打下基础；有的批评者违心批评别人，则是为了交差，应付了事；真正出于公心批评别人的批评者、执行者，几乎微乎其微。在当时政治压力下，大多数的批评者只有如此，否则，自身难保。当时，根据毛泽东的战略部署，这次揭批仅仅是开始，随着反右派斗争的步步深入，狠揭、猛批、恶斗、围歼还在后头。

第二节 “歼灭性打击”右派头目及骨干【一】

自反击右派开始，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中的左派分子，由共产党领导有组织、有计划、有步骤地反击、批判各民主党派中的右派头目，经过半个多月的战斗，初战告捷。根据毛泽东的反击右派的重大部署，在此基础上乘胜追击，发出给“右派”以“歼灭性打击”令，这样使右派分子陷入了天罗地网之中，让他们处于被动、挨批、挨斗、挨讨伐的境地。此时的右派头目们、右派分子纷纷写出检查、检讨、认罪书，表示彻底交待，低头认罪，缴械投降。这样，使反右派斗争的进程向纵深发展。

一、毛泽东部署打击、孤立右派的重大举措

1957年6月中、下旬和7月初，毛泽东为了打击、孤立右派，采取了两项重大举措，一是撰写批判文章和社论，引导新闻媒体和舆论统一思想；二是批发中央指示，要求下级贯彻落他自己的重大战略部署，把打击、歼灭的重点引向到右派头面人物上来。

毛泽东一批《文汇报》。6月14日，毛泽东为《人民日报》写的以《本报编辑部》署名的《文汇报在一个时期内的资产阶级方向》文章，摘录如下：“上海文汇报和北京光明日报在过去一个时间内，登了大量的好报道和好文章。但是，这两个报纸的基本政治方向，却在一个短时期内，变成了资产阶级报纸的方向。这两个报纸在一个时间内利用‘百家争鸣’这个口号和共产党的整风运动，发表了大量表现资产阶级观点而并不准备批判的文章和带煽动性的报道，这是有报可查的。这两个报纸的一部分人对于报纸的观点犯了一个大错误。他们混淆资本主义国家的报纸和社会主义国家的报纸的原则区别。在这一点上，其他有些报纸的一些编辑和记者也有这种情形，一些大学的一些新闻系教师也有这种情形，不只文汇、光明两报如此，不过这两报特别显得突出罢了。错误观点是可以经过研究、

考虑和批判来加以改变的，我们对他们期待着。从最近几天这两个报纸的情况看来，方针似乎已有所改变。党外报纸当然不应办得和党报一模一样，应有他们自己的特色。但是，它们的基本方向，应当是和其他报纸一致的。这是因为在社会主义国家，报纸是社会主义经济即在公有制基础上的计划经济通过新闻手段的反应，和资本主义国家报纸是无政府状态的和集团竞争的经济通过新闻手段的反应不相同。在世界上存在着阶级区分的时期，报纸又总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我们在这个问题上展开辩论，以求大家在这个问题上取得一致的认识。新闻记者中，也有一部分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也有资产阶级新闻观点，也应当考虑、研究、批评这个错误观点。教条主义的新闻观点和八股文风，也是应当批判的。这一方面的东西是很讨厌的。党报，包括本报在内，在这一方面犯有错误。这一方面的错误，在辩论中也必须展开批判。这样一来，在新闻问题上就要作反‘左’反右的两条路线上的斗争。姚文元的文章只是含蓄地指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看到文汇报的一些人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向无产阶级进行阶级斗争的这个明显的和有害的倾向，是一篇好文章，故转载于此。并且借这个由头，向我们的同业——文汇报和光明日报说出我们的观点，以供考虑。”¹

同时，毛泽东还为新华社写了一则转发这篇文章的新闻导语，全文如下：“（新华社 14 日北京电）人民日报编辑部就姚文元的文章发表批评文汇报和光明日报的资产阶级方向。人民日报编辑部的意见和姚文元的文章如下。”这是以《本报编辑部》的名义来批判《文汇报》，借以达到“舆论一律”的目的。

6月10日，《文汇报》刊载姚文元写的《录以备考——读报有感》一文，摘录如下：文章说，同是一条消息，经过不同的编辑同志的编排，其价值已可以相差十万八千里之遥。例如，毛泽东 1957 年 5 月 27 日接见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全体代表的消息，解放日报用特别巨大的铅字和醒目的标题放在第一条新闻，人民日报排在当中，标题比解放日报要小些，也突出了毛主席的话：“团结起来，坚决地勇敢地地为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而奋斗。一切离开社会主义的言论行动是完全错误的。”但文汇报的标题却缩小到简直使粗枝大叶的人找不到的地步，或者看了也觉得这是一条无足轻重的新闻。再如，李维汉 1957 年 6 月 3 日在中共中央统战

¹ 《文汇报在一个时期内的资产阶级方向》，《人民日报》1957 年 6 月 14 日

部召开的民主人士座谈会上讲话，人民日报用‘社会主义是长期共存的政治基础’作为标题，并且用‘……总的说来，从各方面提出的批评和意见，有很多是正确的，应该认真加以接受和处理；有相当一部分是错误的，还需要进一步加以研究和分析’作为副标题，而文汇报则以‘中共诚恳欢迎监督和帮助’为标题，以‘认为很多批评和意见有助于克服三大主义和进一步加强和巩固共产党的核心领导作用’为副标题。文章批评了文汇报上述这些做法和‘新闻的编排是没有政治性’的观点，认为编排也有政治性，‘各取所需’即是。”¹

毛泽东撰写《文汇报在一个时期内的资产阶级方向》，是反右派斗争以来第一次公开发表的批判《文汇报》等文章，同时支持姚文元的《录以备考》“批评文汇报和光明日报资产阶级政治方向”的文章，这两篇文章除登载《人民日报》外，全国各地报纸都予以转载，对统一新闻为政治服务，推进反右派斗争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二批《文汇报》，但毛泽东还不够，又写下一篇极为重要的文章。7月1日，是中国共产党的生日，就在这天，发表了毛泽东为《人民日报》撰写的《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社论。这是一篇极不平常的社论，是反击右派的极为重要文件，它为下一步反击右派指明总进攻、总讨伐的方向和目标，是讨伐“右派”头目的一份檄文。现摘要如下：肯定《光明日报》回到社会主义方向。“自本报编辑部6月14日发表‘文汇报在一个时间内的资产阶级方向’以来，文汇报、光明日报对于这个问题均有所检讨。光明日报工作人员开了几次会议，严肃地批判了社长章伯钧、总编辑储安平的方向错误，这种批判态度明朗，立场根本转过来了，由章伯钧、储安平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路线转到了革命的社会主义的路线。由此恢复了读者的信任，像一张社会主义的报纸了。”接着点出了《文汇报》的要害：“文汇报写了检讨文章，方向似乎改了，又写了许多反映正面路线的新闻和文章，这些当然是好的。……严重的是文汇报编辑部，这个编辑部是该报闹资产阶级方向期间挂帅印的，包袱沉重，不易解脱。帅上有帅，攻之者说有，辩之者说无；并且指名道姓，说是章罗同盟中的罗隆基，两帅之间还有一帅，就是文汇报驻京办事处负责人浦熙修，是一员能干的女将。人们说：罗隆基——浦熙修——文汇报编辑部，就是文汇报的

¹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第509-510页

这样一个民盟右派系统。”

指出了打击目标是“章罗同盟”：“民盟在百家争鸣过程和整风过程中所起的作用特别恶劣。有组织、有计划、有纲领、有路线，都是自外于人民的，是反共反社会主义的。还有农工民主党，一模一样。这两个党在这次惊涛骇浪中特别突出。风浪就是章罗同盟造起来的。别的党派也在造，有些人也很恶劣。但人数较少，系统性不明显。就民盟、农工的成员说来，不是全体，也不是多数。呼风唤雨，推涛作浪或策划于密室，或点火于基层，上下串连，八方呼应，以天下大乱、取而代之、逐步实行、终成大业为时局评估和最终目的者，到底只有较少人数，就是所谓资产阶级右派人物。一些人清醒，多数被蒙蔽，少数是右翼骨干。因为他们是右翼骨干，人数虽少，神通却是相当大的。整个春季，中国天空上突然黑云乱翻，其源盖出于章罗同盟。”

社论驳斥《文汇报》的检讨，重申“阳谋”策略的正确性：“文汇报在6月14日作了自我批评，承认自己犯了一些错误，作自我批评是好的，我们表示欢迎。但是我们认为文汇报的批评是不够的。这个不够，带有根本性质。就是说文汇报基本上没有作自我批评。相反，它在14日社论中替自己的错误作了辩护。‘我们片面地错误地理解了党的鸣放政策，以为只要无条件地鼓励鸣放，就是帮助党进行整风；多登正面的意见或者对错误的意见进行反批评，就会影响鸣放’。是这样的吗？不是的。文汇报在春季里执行民盟中央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方针，向无产阶级举行了猖狂的进攻，和共产党的方针背道而驰。其方针是整垮共产党，造成天下大乱，以便取而代之，真是‘帮助整风’吗？假的，真正是一场欺骗。在一个期间内不登或少登正面意见，对错误意见不作反批评，是错了吗？本报及一切党报，在5月8日至6月7日这个期间，执行了中共中央的指示，正是这样做的。其目的是让魑魅魍魉，牛鬼蛇神‘大鸣大放’，让毒草大长特长，使人民看见，大吃一惊，原来世界上还有这些东西，以便动手歼灭这些丑类。就是说，共产党看出了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这一场阶级斗争是不可避免的。让资产阶级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发动这一场战争，报纸在一个期间内，不登或少登正面意见，对资产阶级反动右派的猖狂进攻不予回击，一切整风的机关学校的党组织，对于这种猖狂进攻在一个时期内也一概不予回击，使群众看得清清楚楚，什么人的批评是善意的，什么人的所谓批评是恶意的，从而聚集力量，等待时机成熟，实行反攻。有人说，这

是阴谋。我们说，这是阳谋。因为事先告诉了敌人，牛鬼蛇神只有让它们出笼，才好歼灭它们，毒草只有让它们出土，才便于锄掉。”

社论点明六教授会议的目的：“反动的阶级敌人为什么自投罗网呢？他们是反动的社会集团，利令智昏，把无产阶级的绝对优势，看成了绝对劣势。到处点火可以煽动工农，学生的大学报便于接管学校，大鸣大放，一触即发，天下顷刻大乱，共产党马上完蛋，这就是6月6日章伯钧向北京六教授所作目前形势的估计。这不是利令智昏吗？‘利’者，夺取权力也。”

社论最后定义“右派”含义：“现在又回到‘资产阶级右派’这个名称。资产阶级右派就是前面说的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反动派，这是科学的合乎实际情况的说明。这是一小撮人，民主党派、知识分子、资本家、青年学生里都有，共产党、青年团里面也有，在这次大风浪中表现出来了。他们人数极少，在民主党派中，特别在某几个民主党派中却有力量，不可轻视。这种人不但有言论，而且有行动，他们是有罪的，‘言者无罪’对他们不适用。他们不但是言者，而且是行者。是不是要办罪呢？现在看来，可以不必。因为人民的国家很巩固，他们中的许多又是一些头面人物。可以宽大为怀，不予办罪。一般称呼‘右派分子’也就可以了，不必称为反动派。”¹

这是一篇无限上纲上线给右派定性的《社论》，是又一次发出打击右派的动员令，而且错误地把民主同盟和农工民主党说成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政党，并为“阳谋”策略竭力辩护，还推论出“章罗同盟”是“‘利’者，夺取权力也”的错误判断。右派分子的灾难由此开始。许全兴正确评论说：“毛泽东在为《人民日报》写的社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该批判》中把民盟和农工民主党在百家争鸣和整风过程中提意见说成是‘有组织、有计划、有纲领、有路线的反人民的’，认为整个春季，中国天空上突然黑云乱翻，‘其源盖出于章（伯章），罗（隆基）同盟’。毛泽东对形势的这种估计和判断是不符合实际的。应该说，当时中国的春季总的来讲并没有形成黑云乱翻的局面。”“章伯钧、罗隆基两人长期有隔阂、矛盾，很难说有《同盟》。至于把两个民主党派向党提意见打成是有组织、有计划、有纲领、有路线的反共反人民的性质更是错误的”。

¹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34—438页

由于上述社论的发表，打击右派的歼灭战首当其冲的是“章罗同盟”及民盟右派系统。这样使反右派斗争上升到了一个新的台阶，即讨伐右派头子及其骨干分子。右派分子开始走向深渊。

7月2日，人民日报记者报道《上海、北京各报工作人员拥护本报批评文汇报的社论》：《人民日报》社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给上海新闻界带来了巨大的推动力量。上海的五家报纸，今天都全文转载了这篇社论，各报社工作人员都争相阅读，认为这篇文章给上海全体新闻工作者上了及时深刻的一课。《文汇报》今天在一版显要地位转载了《人民日报》的社论，并发表了二篇消息，揭露了该报副总编辑浦熙修的反对共产党的领导活动和该社社长兼总编辑徐铸成的错误言行。文汇报编辑部在消息后边加了一个按语。

按语如下：首先读到这篇社论的是本报值夜班的同志们。所有的同志一致的无保留的完全拥护这篇社论对本报的严肃批评，并且下定决心，在最短期内，彻底揭露报社内外右派分子利用本报向党疯狂进攻的一切阴谋活动，坚决划清和右派分子的界限，改正本报所犯的严重的政治错误，并以实际行动回答人民日报的严正批评和读者的殷切期待。²

就在毛泽东为《人民日报》撰写《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的社论第三天，报道了7月2日《文汇报》写的《向人民请罪》的社论和7月3日文汇报又以《痛切改造自己》为题的社论以及检查、声明等。

“本报（《人民日报》——引者）发表了‘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的社论以后，这两天文汇报已经开始检讨，表示决心要从资产阶级的方向扭转 to 社会主义的道路上来。2日文汇报发表了题为‘向人民谢罪’的社论，痛切地检查了文汇报前一时期工作上的错误，对这些错误作了分析和批判，承认文汇报这几个月中确实确实成了章罗同盟向无产阶级猖狂进攻的喉舌。章、罗同盟说：现在要到处点火。徐铸成就调兵遣将到浙江、江西、四川、两湖以及两广去点火。右派说：煽动学生出大字报，以便接管学校。徐铸

¹ 许全兴《毛泽东晚年的理论与实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年第90页

² 参见《文汇报》1957年7月2日

成又在编委会上‘建议’揭中小学的盖子。浦熙修就在北京发来‘北京大学‘民主墙’专电，徐铸成则指定编辑非登不可。登上了一篇还不够，还要再登一篇。右派说：‘党天下’是一切宗派主义的根源。徐铸成如获至宝地亲手围框登出储安平发言，还悻悻然嫌储安平发言不够尖锐。右派说：不许谈成绩，只许谈缺点。徐铸成也就东也批评编辑，西也批评编辑，说版面上正面文章多了。其实，版面上那有正面文章！右派说：反批评就是‘收’。徐铸成就三令五申告诫编辑：两点论是教条，谈成绩也是教条，谈思想改造也是教条，反批评也是教条。”

“社论说：综上所述，可右派怎么讲，文汇报就怎么做。章伯钧、罗隆基的锣鼓怎么敲，徐铸成浦熙修就怎么唱。社论中检讨文汇报有党的组织，但是没有起到党组织应起的作用，他们被徐铸成的‘以党代政’的狼牙棒吓呆了，同徐铸成的斗争是软弱无力的。社论表示决心要把文汇报‘从资产阶级的政治方向的危险道路扭转到社会主义的人民新闻事业的光明大道上来。’社论说：‘灯塔已经发出又一次危险信号了，我们再不摆正舵向，船非要触礁不可。我们全社现在正在作四件事：一、彻底揭发和批判文汇报和右派的种种关系。二、彻底揭发和批判文汇报从春季以来言论、报道、编排各方面的政治错误。以上两项揭发与批判，陆续登报，公诸读者。而且盼望爱护我报的读者予以严格监督。三、全心全意投入反右派斗争，用我们的笔，与右派决一死战。四、从今以后，坚决与资产阶级新闻观点和立场作不调和的不懈怠的斗争。’¹

“3日，文汇报又以《痛切改造自己》为题继续发表了社论，说，右派分子所以能够利用文汇报，是因为报社的许多同志在立场上，思想观念上有问题。社论表示，文汇报的全体工作人员，决心通过这次反右派斗争，改造自己，坚定立场，改变资产阶级新闻观点，办好一张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报纸。文汇报同时还在2日和3日连续以编辑部的名义发表了‘我们的初步检查’。这篇检查对文汇报前一时期报上发表的反动言论和报纸版面的编排，做了揭发和批判。另外还发表了一篇‘本报采访部的声明’，这篇声明是在2日上午文汇报采访部全体会议上通过的，签名的有全一毛等二十二二人。声明表示拥护人民日报社论对文汇报的批评，对‘浦熙修、徐铸成把文汇报引向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道路，成为右派

¹ 《人民日报》1957年7月4日

分子向无产阶级猖狂进攻的工具，表示最大的愤慨！’声明并表示一定要深刻检查自己报道工作中的错误和缺点，向人民还债。”¹

同一天，《人民日报》还报道了《文汇报》编辑部的《初步检查》：《检查》一开头就承认犯了罪、欠了债：“我们以沉痛的心情初步检查了这一个时期的报纸，许多事实强有力地证明了文汇报在这个时期确实变成了右派分子罗隆基、章伯钧向党猖狂进攻的有力工具，成为右派分子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罪恶活动的喉舌，我们在人民和读者面前犯了罪，欠了债。这也是我们的奇耻大辱，我们以沉重的心情作了如下的初步检查，并请读者继续帮助我们做深入的检查。右派分子不是企图抢夺知识分子的领导权么？为了夺取领导权，他们不是到处说党对文化、科学、教育是外行而右派分子是内行吗？不是说党应该从这里，从那里撤退而让右派分子来扮演领导者么？他们不是点火到基层，阴谋整垮中国共产党么？报纸每天和广大读者见面，它是一种强有力的思想武器，右派分子为了实现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目的，他们阴谋活动也就首先从篡夺报纸的领导权着手。正是这样，本报社长兼总编辑徐铸成和副总编辑兼北京办事处主任浦熙修在右派分子的指使下，就使本报在一个时期内沦为右派分子向党猖狂进攻的有力武器。”²

《检查》接着记录或者交代错误实例：“由于错误是路线性的，因此，错误的实例不胜枚举。……上面所揭露的事实，已无可争辩地证明，文汇报在过去一个短时期内确实犯了不可饶恕的政治错误，成了右派野心分子罗隆基、章伯钧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有力工具。这一令人痛心的事实，追寻根源，是和本报副总编辑兼北京办事处主任浦熙修和右派野心分子罗隆基、章伯钧反动联盟串联一起分不开的。这正像人民日报7月1日的社论所提到：罗隆基——浦熙修——文汇报编辑部这一根线，篡夺了文汇报的政治方向。”“浦熙修和罗隆基关系的密切是人所共知的。当文汇报去年复刊前夕，罗隆基就约了浦熙修同去北戴河。文汇报复刊后，浦熙修在报纸工作中，就贯彻着罗隆基章伯钧的反动观点。浦熙修不是向党靠拢，而事事向罗隆基、章伯钧等右派野心分子请示，布置本报北京办事处的工作。她还经常在北京办事处进行‘传达’。现在检查证明，她所传达的，不是党中央的指示，而是右派分子章伯钧、

¹ 《人民日报》1957年7月4日

² 《人民日报》1957年7月4日

罗隆基的指示。这样，就使得北京办事处的编辑和记者，在执行工作的时候，被浦熙修引往错误的道路。有时候，罗隆基还直接对本报北京办事处发号施令，居然狂妄地申斥记者，说他们不该不将某些新闻以专电拍发上海。其活动之猖狂，由此可见。……浦熙修的这些活动，证明她利用在本报的职权，执行右派分子的路线，把文汇报拖到绝路上去。”¹

“在上海，文汇报社长兼总编辑徐铸成也实行了右派野心分子的路线。他抗拒的领导，以反对‘教条主义’为名来反对马克思主义；以反对‘两点论’来抹煞党的成绩；主张在基层点火，并且提出‘唱反调’，坚持某些版面的反动编排。”

《检查》最后检查犯严重错误的原因：“从以上事例可以看出，浦熙修、徐铸成怎样执行章、罗反动联盟的方针，篡夺了本报原来正确的方针；也可以看出本报这次犯严重错误的最根本原因。”“除了上述的根本原因之外，还在于报纸编辑部和不少同志有严重的资产阶级思想和严重资产阶级新闻观点。如果不是这样，浦熙修、徐铸成的谬论就不可能找到市场，如果不是这样，他们的反动言行就早已被揭发；如果不是这样，前些日子和他们的斗争就不会如此软弱无力；编辑部也就不可能被笼罩在黑雾之中。因此，我们……对人民负了债，犯了罪，言之十分痛心。”“在本报编辑部中，有许多是从旧社会来的所谓‘老报人’。虽然经过思想改造，对资产阶级思想和资产阶级新闻观点作了初步批判。但是，并没有改造好……不少人的思想感情，还没有转移到工人阶级方面来。”²

《文汇报向人民请罪》、《痛切改造自己》两篇社论和《文汇报编辑部的初步检查》都是按照7月1日《人民日报》社论指出的要害进行“认罪”、“检查”的，对此，毛泽东在1957年10月13日《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三次会议上的讲话》指出：“我们不需要象波兰那样封一个刊物，我们只要党报发一两篇社论就行了。对文汇报，我们写了两篇社论批评它，头一篇不彻底，没有讲透问题，再发第二篇社论，它就自己改。”³这是对文汇报“请罪”、“检查”的评价。这样，文汇报的检查就算过关了。

1957年7月15日，光明日报报道了该编辑部所犯错误的检查，

¹ 《人民日报》1957年7月4日

² 《人民日报》1957年7月4日

³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86页

报道说：“我们在反对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章伯钧、储安平篡改本报政治方向罪行的同时，对编辑部工作进行了检查。”“从5月到6月上旬期间，本报的基本政治方向变成了资产阶级的方向。”“储安平从这个时候开始……按照章罗联盟的政治阴谋，利用‘百家争鸣’这个口号和共产党的整风运动，在报纸上发表了大量表现资产阶级观点而并不准备批判的文章和带有煽动性的报道。”“在这期间，由于储安平执行章罗联盟的政治阴谋，我们的报纸攻击党对文教事业的领导；歪曲党的政策，挑拨党和知识分子的关系，散布对党的不满情绪；鼓吹绝对民主和个人主义的自由；煽动大学生闹事；歪曲民主党派和共产党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夸大人民内部矛盾，否定成绩，把新中国涂成一片漆黑；宣传资产阶级新闻观点和作风。在编排方法上，着意渲染，加强了恶劣的宣传效果。编辑部的老同志，在这一段时期里，在采访、编辑工作上，也有不少人犯了相当严重的错误。对于这些错误，我们正在严肃认真地进行检查。”

报道说：“储安平抓业务的第一步，就是抓出记者到九大城市召开座谈会，处处点火，打乱整风步骤。”“从5月初起，在短短一个月里”，“我们的报纸，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提供了讲坛，发出了大量的荒谬言论，对党进行了恶毒的攻击，在各地造成了极坏的影响。从我们编辑部工作人员来说，在这些座谈会的报道工作中，也暴露出许多问题。”例如，“5月10日武汉专电：‘大家认为……甚至一般党员都自视为统治者、改造者，把党外知识分子看做被统治者，被改造者，以致在党群之间挖下了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5月14日发表的沈阳座谈会记录的小插题有：‘民主党派组织，在高等学校里像花瓶，是摆样子……’等等。”“由于我们的记者编辑中，有的同志政治认识模糊、立场不稳，在储安平执行章罗联盟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阴谋活动中，受了储安平的指使，不自觉地成了处处点火的执行者。”

报道说：“储安平来到报社以后，更把章伯钧的阴谋在宣传工作中具体化。他们离开了‘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政治基础——社会主义，来歪曲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改革……大肆强调对共产党的‘监督’，企图煽动民主党派篡夺和对抗党的领导。”“在储安平宣传方针的指导下，本报对民主党派的性质、任务的宣传，出现了一系列的严重的政治错误。”比如，“6月9日，刊登了章罗联盟所搞的反动的科学纲领全文，更严重的是组织了‘短评’。提

出‘保护科学家’的口号，并说这是民主党派对共产党监督的具体的新的方式方法，认为有很重大的意义。这是恶毒地挑拨了科学家和共产党的关系，露骨地说：“只有民主党派是保护科学家，不要跟共产党走。”“这一时期的本报对民主党派的宣传报道，是在资产阶级右派野心分子指导下，歪曲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方针，企图把民主党派引向资产阶级的政治方向，要把民主党派变成共产党的对手和敌手。”

报道说：“5月4日，本报发表了题为‘大胆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社论（本报学校教育部主任潘文彬执笔，经储安平亲自审阅同意）。这篇社论是本刊利用社论形式，向知识分子同青年学生进行煽动的一篇具有纲领性的文章。社论中把‘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政策和‘五四运动’相提并论，显然是原则性错误。‘五四运动’是反帝反封建的文化革命。‘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政策‘是人民内部的自由在文艺工作和科学工作领域的表现’（陆定一）。一个是对敌人的革命运动，一个是人民内部的自由问题。而这篇社论却号召‘继承和发扬五四的文化革命运动的传统’，把敌我的界限混淆了。”“如果把这篇社论作为一个纲领来检查本报在这段期间发表的反动报道和文章，那么，歪曲党的政策，挑拨党和知识分子的关系，我们在这方面的错误是最多最大的。”比如，“本报先后发表了费孝通的‘早春前后’和范朴斋的‘会外之音’两篇文章”，前者“主张要‘互相监督’来揭开‘盖子’，甚至提出冲开‘盖子’。”后者“恶毒地攻击了党员和积极分子，并进一步煽动知识分子要在‘鸣放’中把‘肚子里的闷气’‘发泄’出来。而这两篇文章，正是……由储安平亲自约来或亲自处理的。”

报道说，“‘章罗联盟’中的一项阴谋，是鼓动高等学校的教授起来反对党委负责制。储安平执行了这个阴谋。在这期间，本报发表了不少报道，煽动大学教授对党不满，反对高等学校的党委负责制，引起广泛的极为恶劣的影响。”“这方面的错误报道中，最突出的例子是‘复旦大学取消党委制’这个报道。这个失实的错误报道，造成了恶劣的政治影响。”“曾在若干高等学校内，处处点火。方式之一，是叫嚣所谓‘民主办校’。6月4日，本报报道了北京师范大学在右派分子陶大镛主持下召开座谈会的情况，为右派分子张目。”“本报记者徐颖写的‘中国人民大学像个教条主义的大蜂窝’一篇报道……激起了中国人民大学数千同学和教工人员的抗议。”

报道说：“储安平利用光明日报，在大学生中点了火。在他的直接指挥之下，5月26日发表了‘北大开辟民主墙’的报道。储安平跑到北大看了大字报，回来就通知本报学校教育部立即报道。”“在北大民主墙的报道中，突出地反映了右派分子反对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反对民主集中制的阴谋。诸如‘出席团代大会的代表如何产生’，‘选拔留学生由党团员包办’，‘毕业生分配工作时党员分配好的岗位’，‘把政治课改为选修’，‘取消学校中的党委负责制’等等。这些意见，有的是歪曲事实，有的是对党的恶毒进攻。”“北大开辟‘民主墙’的报道发表以后，……向那些学校的右派分子散播了对党进攻的恶毒方法，使得许多大学生受到了迷惑，在那些学校里造成混乱。在这里，也不能不指出，当时在章罗联盟控制下的两个报纸——文汇报和光明日报，在这个反动宣传上是相互呼应的。本报发表这个报道之后，文汇报接连发表了北京大学鸣放的报道。”

报道说：“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为了遂行其反共反社会主义的阴谋，所采取的手段之一，就是传播资产阶级办报的谬论，夺取新闻领导权。储安平在本报一方面坚决贯彻他的资产阶级办报路线，一方面对于宣传资产阶级办报观点的报道和文章，特别感到兴趣。而部分记者和编辑，同储安平有着不同程度的共鸣，因而也在报道上和组稿上犯了错误。”“在储安平反动的办报方针的指导和影响下，本报编辑工作人员采取了一系列反动编排手法。”

报道说：“回顾我们在这一时期所犯的错误的，暴露出我们编辑部的大部分同志身上所有的资产阶级思想和资产阶级新闻观点的严重性，表现了思想立场的模糊和动摇，在某些问题上或者在某些时候不能分清是非，因而犯了大量的不同情况的错误。”“我们通过检查自己工作上的错误，深刻认识到，知识分子如果不彻底进行思想改造，不把根本立场转到工人阶级立场上来，不同工农紧密地结合在一起，那么，知识分子必然要犯错误。”“本报政治方向一度被右派分子篡改的事件，经过全体工作人员严肃的批判以后，特别是经过这次检查工作以后，‘立场是根本转过来了，由章伯钧、储安平的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路线转到了革命的社会主义的路线。由此恢复了读者的信任，像一张社会主义的报纸了’。人民日报7月1日社论中这一段话，对我们编辑部同志们来说，是一个莫大的勉励和支持……我们将努力学习……弥补自己的缺

陷。”¹

有的学者对储安平担任《光明日报》总编辑的情况评论说：储安平提出《光明日报》一方面要经常宣传党的政策，号召大家学习马列主义，积极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另一方面要经常反映民主党派成员及其联系群众的要求。储安平的办报思想，与中共中央“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是一致的。也正因为如此，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曾对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周扬说过。以后有人要批评储安平先生，你要为他撑腰。当时《光明日报》所表现出来的倾向性，是在贯彻中共中央方针的过程中出现的一种偏差，而不是如后来所批判的是资产阶级方向。后来受到更为严厉批判的上海《文汇报》，情况也大致如此。²说实在的，《光明日报》、《文汇报》等宣传的观点、内容几乎都紧跟毛泽东的“双百”方针，《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讲话和南下《讲话》，来自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记录和4月30日毛泽东在第十二次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精神。当时《人民日报》没有紧跟毛泽东的《讲话》精神挨了严厉的批评。而在1957年5月中下旬毛泽东的思想上发生突变，准备反右。党报以外的报纸没有随着毛泽东的突变而改变，还继续宣传“双百”方针、整风运动中带有民主、改革、开放的思想，这必然受到毛泽东的严厉批评。

还有《中国青年报》编辑部、《新民报》等都作了检查，不再一一介绍了。

二、主攻“章罗同盟”

1957年6月10日，中共中央《关于反击右派分子斗争的步骤、策略问题的指示》中就指出：“章伯钧、罗隆基拼命做颠覆活动，野心很大，党要扩大，政要平权，……他们的野心很大……”³认为他们要向无产阶级夺权，颠覆新生的人民共和国，复辟资本主义制度。6月26日，毛泽东批发《中共中央关于打击、孤立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指示》指出：“前些日子，向工人阶级猖狂进攻的资产阶级右派，现在开始溃退了。我们必须认真地组织群众，组织民主人士中的左派和‘中左’分子，趁热打铁，乘势追击，紧紧抓住已经暴露出来的这伙阶级敌人，实行内外夹击，无情地给他们以歼灭性

¹ 《新华半月刊》1957年第15号第186—193页

² 参见朱地《1957年大转变之谜》，山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38页

³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六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503页

的打击。”¹7月1日，毛泽东为《人民日报》撰写《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的社论，其中指出：“整个春季，中国天空上突然黑云乱翻，其源盖于章罗同盟。”²依据两次指示和这篇社论的指向，章伯钧、罗隆基等必然成为予以无情打击、歼灭的对象，他们在有组织的强大的政治压力下，逼迫他们只有向党请罪、交代问题。

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党组织动员人大代表、左派知名人士对右派头目予以“无情”“歼灭性打击”。7月6日，吴晗作了题为《我愤恨，我控诉！》的发言。7月7日，《人民日报》作了报道：

吴晗一开始就控诉章、罗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恶活动：“章伯钧、罗隆基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活动是一贯的，有组织、有计划、有部署、有策略、有最终目的，并且，还和各个方面的反共分子有配合，异曲同工，互相呼应，妄想钻帮助党整风的空子，夺取党的领导权，把今日人民的天下，变为章罗同盟的天下，把工人阶级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变成资产阶级专政的劳动人民受压迫、受剥削的资本主义的国家，实际上是美国式的国家。他们的言论行动是破坏民盟盟章的，是违反宪法的，是反对全国人民的，也是反对民盟的多数盟员的。我愤恨，我控诉。”

“民盟的盟章规定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宪法序言肯定了共产党的领导。北京盟的组织一向坚持盟的各级组织必须接受同级党的领导的基本原则。这个原则章罗在表面上敷衍，在实际行动上恰好相反。他们异口同声，多年来恶意攻击北京盟组织，虽然我们一贯执行盟中央的指示，但是却因为不接受他们阴谋反共、反社会主义、反人民的指示，就说我们只听中共北京市委的话，不听他们的话，说民盟市委反领导，无组织，无纪律，是独立王国。是‘腰斩民盟’。我们只接受民盟中央符合盟章，符合人民利益的领导，却决不能接受章罗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个人领导，坚决地根据盟章和宪法，接受党的领导。……章伯钧在1951年五一节，在天安门城楼上和我说，‘只要我们两人合作，事情就好办。’我置之不理。这样就越发仇恨、敌视我们，无论我们做什么事，总是不对。北京的盟因为没有接受反社会主义反人民的章伯钧、罗隆基的领导，多年来像是封建

¹ 转引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册，第617页

² 《人民日报》1957年7月1日

家庭的小媳妇，怎么样也趁不了这两个要改嫁的恶婆婆的心。”

吴晗接着揭露章罗从冤家发展为章罗同盟：“章罗原来是两个把头，争权夺利，勾心斗角，互不相下。过去，他们之间有不可调和的矛盾，在盟内争地位，争各自党羽的安排，建国以来，章罗在民盟中央，除了闹人事纠纷以外，从来也没有想到要替人民办点好事。突然一年多以前，在苏共二十大代表大会之后，在匈牙利事件之后，在世界各国反共高潮之后，在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口号提出之后，他们对国际和国内形势的估计，以为要变天了，共产党站不长了，民主党派大有可为了。章罗两个多年冤家突然变成章罗同盟了，两个人此唱彼和一鼻孔出气了。一个腔调说话了。不是个别的而是联合一致的出来打击我们。”

吴晗揭批章伯钧：“章伯钧的政治设计院和他在农工民主党内部者谈话，‘我带头，主张中国搞两院制，把政协变成参议院，把人大变成众议院，政协有监督权和不同意权（否决权），人大有选举权和立法权。’他还说‘本钱大就是大党，本钱小就是小党，作一个政治家，就要从实际出发’”“他有本钱，有两个党，一个农工民主党，他是绝对党魁，一个民盟，他是第一副主席，和罗隆基同盟以后，包办一切。还有一个报纸，光明日报。但是本钱不够大，要拖六万万人上路，还拖不动，这就是他要发展八百万人的道理。”

吴晗揭批罗隆基：“罗隆基的本钱比章伯钧更小。只有一个小集团，这个小集团包括张东荪、曾昭抡、潘光旦、费孝通、吴景超、范朴斋、张志和、叶笃义、潘大逵、刘王立明、周鲸文等人。大体上以清华毕业一小撮不愿意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留学生为骨干，都是‘小资产阶级的大知识分子’，人数虽少，分量在章伯钧看来却不轻。其中罗隆基、费孝通又自命为最熟悉和了解知识分子的，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右派的代言人。因为他没有一个自己的党，所以只好搞据点，通过他的人来夺取当地组织的领导权。他的据点在西南是潘大逵，在太原是王文光，在浙江是姜震中，在上海是彭文应、陈仁炳，在湖南是杜迈之，在湖北是马哲民。他有这点本钱，也就可以和章伯钧结成同盟，也就可以策划于密室，点火于基层，上下串连，八方呼应。”

“罗隆基和章伯钧配合点党委制的火，还点另一把火：‘平反’的火。他的目标是争取知识分子，办法是替那些到今天才感觉是“早春天气乍暖还寒”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说话和写文章。想从中捞一把。在他的平反委员会谈话发表之后，收到一百多封信；他的回信

是‘请在各方面造成舆论，请向统战部和政协全国委员会建议’。造成什么舆论呢？很显然，就是反对肃反的舆论，反人民、反政府的舆论。这种舆论造成了，他估计‘天下大乱’了，不就可以取而代之，终成‘大业’了吗？”

吴晗无限上纲揭批章罗同盟：“造成舆论另一策略是夺取一个报纸，通过他的女将浦熙修夺取了文汇报，构成了罗隆基——浦熙修——文汇报编辑部这样一个制造舆论部。同时，他还通过和授意储安平，造成了‘党天下’的舆论。这样，两个党派，深入到基层点火，两个报纸，一北一南，派出大批记者，到九大城市，到各个大学到处点火。火焰弥漫，烟尘蔽目，弄得他们自己也晕头转向了，以为共产党‘失去人心’，以为‘共产党的能放不能收，要收得三百万军队，但人心是去了。这条船要沉了。’出路在哪里呢？只要民主党派的章伯钧、罗隆基等人出来说话就可以，‘现在民主党派说话是有力量的’。章伯钧的结论是‘共产党现在弄得进退失措，收不好，放也不好，现在我们民盟有责任帮助党。’大有‘收拾残局，舍我其谁’之慨。这就是章罗所组织的四个委员会之一的科学规划委员会，6月6日由章伯钧召集北京曾昭抡、费孝通、钱伟长、陶大镛、吴景超、黄药眠等六教授举行紧急会议所得的结论，这六个教授主要是章罗集团的密室人物，这次会议，是章罗同盟的一次行动表现，也是章罗同盟到处点火以后的高潮，反共反社会主义的高潮。他们妄图制造这样的气氛来威胁党，进行政治讹诈，他们要借此挺身而出，以帮助之名，行篡夺之实。他们的言论和各方面的右派分子配合，异曲同工，互相呼应。他们幻想匈牙利事件会重演于百炼成钢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中国，结果是从自己点火所造成的烟幕出发，错误的估计，罪恶的行动，点火，火烧了他们自己，凿船，整个右派分子下了水，暴露出他们是人民的敌人。”¹

吴晗的发言，是用“揭老底”的方式批判和控诉章罗及其同盟，在这样强大的政治压力下，迫使章伯钧只好承认“章罗同盟”，而罗隆基只肯检查交待问题，不承认“章罗同盟”。领导动员和利用吴晗的控诉，实际上是反右派斗争的发动者利用民盟上层左派来打击民盟上层右派，即拉一派打另一派的人整人。

章罗同盟在全国人民的声讨下，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下，他们不得不认罪和检讨。早在7月3日《人民日报》章伯钧在安徽省代表

¹ 《人民日报》1957年7月7日

小组会上作了检讨：“章伯钧承认了和罗隆基的联盟关系，他说，‘报上指出的章罗联盟的关系，不是冤枉的’。他又说，‘在思想上、工作上是和罗隆基联盟的，但没有正式开过会，没有明确的几条纲领’。他说，他所以能和罗隆基联盟，主要是‘利益没有冲突，思想是一致的，都有政治野心’。章伯钧说，他过去和罗隆基的关系是不好的，他现在所以和罗隆基联盟，是想通过罗隆基，把在罗隆基影响下的知识分子拉过来的。他说他对罗隆基耍的手段是‘先合作，后争夺’。章伯钧说他为了和罗隆基‘合作’，在盟内也要两面派手法。他说，史良是进步的，罗隆基常常和史良闹不团结。而章伯钧就两面拉。他说，他在很多方面支持罗隆基的意见。罗隆基也支持章伯钧的意见。章伯钧说：‘我们两人心心相印，从思想到工作结成了联盟。’”

7月4日，《人民日报》报道了章伯钧在农工民主党中央扩大会议上的交待：“说到章罗联盟，章伯钧说，章罗联盟是有事实的，是从去年开始的。过去同罗在盟内争权夺利，从去年开始合作。先从思想联盟开始。我思想上是资产阶级右倾思想。罗有英美民主思想，我们思想一致。从思想联盟到工作一致，即工作联盟，再变为政治上的联盟。是否有政治纲领呢？具体纲领与写成具体条文的是没有的。联盟是共同的，是为了个人的政治野心。因为民盟是大知识分子的集团，我想通过罗隆基影响大知识分子，同罗隆基联盟可以取得大知识分子的支持。罗隆基过去有一个小集团，他同我是反对的。去年我思想变化，公开主张西方民主的一套，符合他们的思想，他们就开始同我接近。去年民盟第二次代表大会，也不知道是人大第三次会议的时候，我请了罗的朋友，如马哲民、潘大逵、彭迪先、沈志远等人。在谈话时，我说我的一套理论，如民主政治、议会制等等，把毛主席的政治理论完全的扯到英美议会政治上去，他们完全拥护我的。沈志远是搞马列主义的，他也受到迷惑了。这样章罗联盟的政治联盟就开始起效果了。”¹

以上是章伯钧承认从思想联盟到工作联盟，再由工作联盟变为政治上的联盟的过程。

罗隆基对“章罗联盟”所持的态度。1957年7月4日，人民代表大会分组讨论中，继续揭露章罗联盟的反动言行，7月5日《人民日报》报道：“罗隆基今天在江西小组第一要求发言，他说：‘我

¹ 《人民日报》1957年7月4日

承认我和章伯钧有思想联盟，因为我们两人都有反动和落后的思想’。但是，罗隆基矢口否认他同章伯钧有政治联盟。他狡赖说他不知道这个联盟的反党阴谋和行动纲领。”¹

7月5日，继续分组讨论，7月6日《人民日报》报道：“罗隆基今天在江西省代表小组会上作了检讨，但是，他仍然狡赖说他同章伯钧只有思想联盟，没有政治联盟。”从这一点出发，罗隆基首先谈到他同章伯钧的关系。“他说，一年来他同章伯钧合作是事实。他把章伯钧看成是一个‘左派进步分子’，他们谈话‘很投机’。他说他是英美留学生，对英美情况很熟悉，回国以后经常看英美杂志。在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以后，英美杂志上有许多反苏言论，他看了以后对共产主义发生了‘怀疑’。在波匈事件以后，英美杂志宣扬有成千上万的知识分子逃到西方，他觉得‘共产主义制度有毛病’，他说这是同章伯钧思想共同的地方。罗隆基说，他同章伯钧的合作，首先在盟内。去年4月民盟工作会议，章伯钧提议把‘鸣’‘放’作为民盟中心工作，他支持他。他们共同之点就是迎和知识分子，拉拢知识分子，发展组织，提高自己。”

“罗隆基说……在盟内搞了四个小组，章伯钧已经谈过，但章伯钧没有谈出组织四个小组的阴谋。他说他了解章伯钧的阴谋是，成立取消高等学校党委制小组，的确想达到取消高等学校党委制的目的。章对他说，‘这事要大搞一下，派人到各地搜集意见，看趋势，党委制一定会消灭’。至于成立有职无权小组，是想发展力量同共产党‘分庭抗礼’……成立‘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小组，是想参加最高决策会议。他说，章伯钧成立了四个小组不仅是在北京点火，还要派人到各地点火。罗隆基说，所谓组织，就是利用民盟。他说他和章伯钧是思想上的联盟，都对党不满，对共产主义怀疑，所以行动上也一致了。他狡赖说他对党的领导有错误的看法，但不是想推翻共产党。”²

7月16日，《人民日报》发表章伯钧《向人民低头认罪》的发言，开头说：“我今天是一个在政治上犯有严重错误的罪人，能够获得全体代表的宽大，站在你们面前，允许利用几分钟时间，来表示我承认错误，低头认罪，下最大的决心努力改造自己的态度。”接着挖错误和罪行的历史根源：“我的错误思想和罪行是有历史的

¹ 《人民日报》1957年7月5日

² 《人民日报》1957年7月6日

根源，反动的阶级本质和一贯性的。我是地主阶级出身，长期受着封建思想（桐城派）和资产阶级教育的人。1927年我背叛了光荣的中国共产党以后，堕落成‘三分反共，七分反蒋’的中间路线的首要分子，组成了所谓第三党——中国农工民主党的前身。专作政治军事投机活动，一遇到机会就行动起来，没有了机会，就停止下来。这样的右倾机会主义的投机思想，一直保留到中国人民伟大的革命胜利以后。在一九五一年，七月一日正逢着光荣的、伟大的、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三十周年诞辰之日，我虽然发表了‘共产党救了我的自我批评’一文，表示了悔悟之意，但仍然没有挖出坏思想的根源，因此我的立场站得不稳，忽‘左’忽‘右’，忽冷忽热，往往表现两面派的作风，对旧事物很留恋，对新事物只是表面接受，而实际有距离。这个潜伏下来的坏思想在一九五六年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进行批判以后，又重新冒出头来了。我对斯大林有着过分的恶毒的批评，对苏联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的业绩有时给以过低评价，有时强调了它的缺点。又因为反教条主义的影响，就连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也加以轻视，从未认真学习，这就形成了反马列主义的所谓修正主义思想。这个新的坏思想正与我过去的右倾机会主义思想是一脉相承的。它的危险性是服务于资产阶级的危险，正如毛主席所指出的，它是：‘反对或者企图削弱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

“在这样恶毒的反社会主义反人民的资产阶级右派思想主导之下，我最近一年多以来，特别在帮助党整风运动期间所犯的严重错误的言行，是难以饶恕的。”

章伯钧再次谈到“章罗联盟”问题：“关于章、罗联盟的问题，在1956年以前，我和罗隆基有过私人权利的斗争。自五六年以后，由于思想认识一致，走上了今天章罗联盟的险途，我们联盟的结合，最基本的因素由于彼此都是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我的政治主张，符合他的需要，因而一些过去和他接近而反对我的高级知识分子，也一变过去反对我的态度而同意了我。罗隆基曾不断地向我表示：‘你走到那里，我跟到那里！’并提出民盟沈老做名誉主席，我可以做主席，他就可以做第一副主席，我没有同意。自去年以来在民盟工作上，他支持我的意见，在民盟中央人事安排上，如费孝通、范朴斋、潘光旦、曾昭抡、吴景超的工作岗位，我都满足了罗的愿望。民盟分工他管宣传，我管文教。‘争鸣’月刊，同意由他领导，我亦不加以过问。特别是他在民盟和政协方面极力强调知识分子问题，

我都予以支持，即在他硬要掌管文化俱乐部问题上，我也支持了他。”

“为什么我要和罗隆基妥协呢？我想在民盟内大知识分子中间取得一定的政治影响，所以我想通过罗的关系，使我在知识分子中间好做工作，盟内大知识分子如费孝通、潘大逵、曾昭抡、吴景超、潘光旦、华罗庚、钱端升、马哲民等都和罗有私交，在此我需要得到罗的支持，才能达到影响大知识分子的目的。这里，就可以说，由思想上的联盟，进到政治上的联盟。彼此互为利用，相得益彰。”

章伯钧最后表示请罪和痛改前非：“从上述各种错误的事实看来，在这一年多来，我的政治思想蜕化到了这样的可耻可恶的而又这样可怕的地步，我得意忘形，利令智昏，个人政治野心与日俱增起来。我企图把自己一套的反动的政治主张，利用我的工作的地位，通过种种方式，如政治会议、座谈会和私人会谈等和两个民主党组织关系与一个光明日报的宣传机构，去逐步扩大影响，散布毒素，以求其实现。而这一切错误的言论和行动，就是说明我站在资产阶级右派的反动立场，来否定我们国家最根本的制度，否定无产阶级专政，否定民主集中制，否定党的领导，是完全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这一个重大的罪行的责任，我是不能逃避的。我愿意向全国人民请罪，向党和政府请罪。”

“伟大的中国共产党过去救了我，今天党又重新救我一次，我希望在党和毛主席的领导和教育下，获得新的生命，使我重新回到爱党爱国家爱社会主义的立场，痛改前非，全心全意为社会主义服务。

各位代表，我这个检讨只是一个低头认罪的检讨，不够全面也不够深刻。关于一些必须交待的问题将继续向有关单位进行彻底交待。最后希望各位代表对我的错误言行，继续给予严正的揭发和批判。”¹

7月16日，《人民日报》刊登了7月15日罗隆基的发言，题为《我的初步交待》。从八个方面交待了他的错误，并且找出犯错误的原因，现在只引用罗隆基与章伯钧有关的问题：我站在民主同盟副主席的岗位上，一年多来，同章伯钧合作，把民盟指向了右的方向，这不止使民主同盟没有做党的好助手，并且使盟员中思想落后分子在右派分子猖狂进攻的混乱局面中迷失了方向，甚至有了推波助浪的行为，这就不利于党的领导，不利于社会主义事业。民主同盟走

¹ 《人民日报》1957年7月16日

向了右的方向，这在这次右派分子猖狂向党进攻的造乱行为中起了极端恶劣的作用，这种事情的发生不是偶然的。民主同盟是中上层知识分子的政治团体，它现在有了三万左右的盟员。盟员中绝大多数知识分子是进步的。从1956年民盟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后，民盟过分地强调了接受中间和落后知识分子政策。因此新旧盟员中思想落后的右派分子亦日益增多了。一年来民盟并没有认真做好对盟员的教育、改造工作，这就使民主同盟中一些右派盟员不能站稳拥护党拥护社会主义的立场。一年多来，由于我同章伯钧的合作，我们对‘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个政策有了不正确的解释，使这两句口号，成了右派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工具。‘百花齐放’本来是鼓励艺术推陈出新，自由竞争的政策。‘百家争鸣’是科学上的独立思考，自由辩论的政策。这都是今天中国文艺科学发展上的优良政策。由于章罗合作，利用了这两句作为政治上的工具，提倡所谓的无条件‘大鸣’‘大放’，有时竟把‘鸣’‘放’做成恶意地攻击党、反对共产党领导的工具。‘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这本是鼓励各民主党派做好自己的阶级思想改造，本是互相批评、互相规劝、站稳社会主义立场做领导党的忠实助手的政策。章罗合作，把这个政策歪曲地解释为民主党派、扩大组织，加强力量，提高地位，以便与领导党分庭抗礼的策略。今年春季，各地盟的组织反映到盟中央的材料已经发现了这种偏向，章、罗两人，不但不加以纠正，并且在今年的工作会议中，章伯钧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为中心工作，我加以有力支持。章、罗两人五月间在统战部座谈会上的发言，章伯钧提出的‘政治设计院’，我提出的‘平反委员会’的荒谬建议就更助长了盟员中右派分子大鸣大放的气焰。

现在民盟有三万左右的盟员，散布在各地的组织单位将近一百个据点。民盟在中上层的文教机关中几乎都有基层组织。民盟这个政治团体在全国文教工作方面的影响是很大的。章、罗二人是盟的第一和第二副主席，是实际负责领导的人。这两个人对‘鸣’‘放’，对‘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有了错误的言论，上行下效，影响是广泛而且恶劣的。五月间，右派分子在文教机关中发动猖狂进攻，各地盟组织中的盟员中，有些右派分子参加了这种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活动，这不是偶然的。章罗合作，领导民盟，播了恶因，结了恶果。”

罗隆基交待他与文汇报的关系：“这些年来我对文汇报的创立和复刊是相当关切的，这是无可否认事实。这一方面由于十年来我

同浦熙修的私人友谊，我希望她把她的事情做好。另一方面，我亦错误的认为在中国还应该有所谓的民间言论机关。因此我遇有机会就鼓励文汇报不要办成同人民日报一模一样的报纸。由于文汇报徐铸成一再向我发表埋怨党组织的牢骚，我的确曾一再直接间接地向文汇报负责人表示过，认为报馆不要过于迷信党组领导，有事到北京来反映。我与浦熙修是日常见面的，她亦经常向我征询有关文汇报的意见。通过她我向文汇报灌输了一些不健康不进步的意见，无形中使她的工作犯了右倾的错误，间接又使文汇报犯了错误。文汇报在今年三四月间是受人夸誉的报纸，今天为反右派斗争的对象，主要整风时期文汇报犯了错误。这是今年五、六月间的事情，今年五月间浦熙修到东北视察去了，等她视察回来，我六月三日又出国了。即使我真有利用文汇报，在整风时期，来扩大右派宣传，事实上这个时期亦无法利用的。我只说明事实，并非洗刷责任。文汇报的右倾，徐铸成、浦熙修两人自己的资产阶级思想已经承认了他们的责任，但我以往劝文汇报不要迷信党组的荒谬主张，我通过浦熙修经常灌输右派思想的影响是不能推卸责任的。对一个社会事业没有做到真诚爱护，并且通过我的恶劣影响，使一个解放以前有光荣历史的报纸今天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机关，我是有责任的。”“今天我对自己在言论和行动所犯的错误，已经初步的交待出来，我自己所犯的错误不应该推到章伯钧身上，章伯钧所犯的错误，亦不应牵涉到我。至于我同章伯钧共同合作的事件，亦应该清清楚楚的交待出来。”

“我这里必须说明我是一个思想落后的人，章伯钧亦是一个思想落后的人，尽管从去年在北戴河起，一直到现在我们两个人绝对没有单独的来往过，没有单独的密谈过，我们在统战部座谈会上的发言，亦绝对没有事先交换过意见，但思想既然有了联系，许多错误的言论和行动，就可以不约而同了。”

“由于我同章伯钧的合作，一年多来，我在民盟许多重要政策上，支持了章伯钧的主张，因此使民盟执行了一些错误的政策。举些具体事例来说：今年三月民盟举行工作会议，章伯钧建议‘百家争鸣，百花齐放’为民盟1957年的中心工作。我同意并且支持了他这个主张。章伯钧主张民主党派要发展到几百万人，他在工作会议中强调大发展，我认为民盟应对1956年的数目约二万余人，加倍发展，因此在工作会议中，我强调大发展。最重要的一件事，是民盟五月间成立了四个委员会，即党委制委员会，科学体制委员会，有

职有权委员会，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委员会，四个委员会。章伯钧用电话通知我，要约宣委、学习委员、文教委员会来谈大鸣大放，我在电话中同意了。后来盟中央成立了这四个委员会，这件事的确没有请示过民盟沈主席，没有同史良、高崇民两位副主席事先商量，更没有经过民盟常委会决定。今天这四个委员会的目的和企图是很明显的。党委制委员会是企图取消大专学校中的党委制。科学体制委员会已经搞了一套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科学体制的建议。有职有权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两个委员会的目的，是企图扩大民盟的地位。加大民盟的职权，以达到同共产党共同决定国策，平行执掌政权，与共产党分庭抗礼的目的。这四个委员会成立以后，章伯钧又向我表示过要由民盟派人到各地去推动这类工作，收集材料向中央提出建议，并且配合他的农工民主党所派的人进行工作。对他这种意见，我表示同意。六月三日我出国了，以后的工作是他领导和布置的，情况我就不知道了，但对这种利用合法机关，进行非法活动，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阴谋，我附和其事，这种责任，我是不能推卸的。”

“我同章伯钧合作的事件，今天只能交待这些。他是光明日报的社长，对光明日报的事情，三、四年来我从没有问过，他是农工民主党的主席，对农工民主党的事情我不可能过问。他在政治上有什么野心，他从来没有和我谈过。对他日常许多言论和主张，例如两院制，以及民主党派发展几百万等等，我不同意，我向高崇民和盟中其他人批评过，但从来没有向他说过。我在政治上有什么野心或愿望，我亦从来没有同他谈过。这就是章罗两人一年来的真实关系。我绝不隐瞒，我绝不捏造。”

“现在报纸上和许多人的交代中，都提出“章罗联盟”这样一个名词，都认为这是这次右派分子猖狂向党进攻的最高的指挥领导机关，是有组织、有计划，有步骤、有纲领的中心阴谋机关。今天我不辩解。我同章伯钧合作了的罪过行为，我据实交代。我还要请领导党和全国人民切实调查，认真追究。如果将来发现我同章伯钧的合作行为中我还有故意隐瞒某种阴谋，我愿受我应得的惩处。”

罗隆基最后表示，将来真是真非自然会水落石出的：“诸位代表，我今天在这个台上，是来向诸位低头认罪，不是来作什么辩解的。现在报纸上和许多人的交待中，已经揭发了我许多言论和行动的事实，揭发了我历史上的罪恶，揭发了我现时期的阴谋，我今天都不辩解。今天的问题，不是那句话说我没有，那件事我做了没有，那几个人我勾结利用了没有，那些右派集团我指挥煽动了没

有，对这些事情我坚决相信中国共产党是有真是真非的。不会冤枉任何人的。将来真是真非自然会水落石出的。并且我还要请各位代表让我将来有进一步彻底坦白交代的机会。有些关于民盟的问题，我还要到民盟去交待，哪些错误我应该老实承认的，我一定要老老实实的承认，那些不是事实，将来也要弄个清楚明白。”¹

总之，由毛泽东发出“歼灭性的打击”令，批判《文汇报》的文章和社论，突出把反右派斗争矛头指向“章罗同盟”。经过一个时期的讨伐，章罗二人作了违心的检查，向党请罪。章伯钧只承认思想上、工作上同罗隆基联盟，不承认在组织上、政治上联盟。而罗隆基根本不承认有什么“章罗同盟”。尽管如此，章伯钧、罗隆基都打成右派头子，挨批，挨斗。

毛泽东认为存在“章罗同盟”，这就把反右派斗争看做是一场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夺权与反夺权的斗争，看做是一场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复辟与反复辟的的斗争。可见，毛泽东把反右派斗争拔高为阶级斗争的最高斗争形式，即政治上夺权。所以，声讨者们响应毛泽东的号召，对右派采取讨伐、控诉、“无情地进行歼灭性打击”的手段，用对待地主阶级的办法来对待右派集团和右派分子。比如有的人在人代会上说：“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皆中山狼也。是狼，是吃人的狼。我们应该打死它。”²使章、罗身心受到极大的伤害，而且事情远未结束，不久又掀起了批判章罗为首的右派集团新高潮。

三、打击章罗为首的右派集团

毛泽东在《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社论中指出：“反动的阶级敌人为什么自投罗网呢？他们是反动的社会集团，利令智昏，把无产阶级的绝对优势，看成了绝对劣势。到处点火可以煽动工农，学生的大字报便于接管学校，大鸣大放，一触即发，天下顷刻大乱，共产党马上完蛋，这就是6月6日章伯钧向北京六教授所作目前形势的估计。这不是利令智昏吗？‘利’者，夺取权力也。”³这里指的北京六教授是钱伟长、曾昭伦、费孝通、陶大镛、吴景超、黄药眠，这六位教授在社论发表之前，已经受到批判。社论点了他们的名，这样，他们就成了章伯钧、罗隆基为首的右派集团的骨干，

¹ 《人民日报》1957年7月16日

² 《人民日报》1957年7月9日

³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37页

必然成为被打击的重点对象。

费孝通：民盟中央常委、教授，《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的作者，这篇文章被定为“右派分子向党进攻的第一炮。”“章罗同盟”的问题揭发后，费孝通被称为“章罗同盟”的军师。6月18日《人民日报》报道了费孝通在国务院秘书长主持召开的党外人士座谈会上的发言：“费孝通分析他立场不稳，是因为他具有严重的温情主义。因而使他不能明辨是非；当机立断，划清界线。对于错误思想，有些是看到了，但没有争；有些觉得不对头，但不清楚错在哪里；有些还觉得有些道理，甚至加以附和。他举例说，他在六月八日那天，见到《人民日报》‘这是为什么？’的社论时，觉得太猛了，空气太紧张了，因此十日提出了‘言者无罪’、‘以理服人’的发言。只是在第二天看到了《人民日报》把他的发言和陈新桂同意他的话小标题联系起来，他才明白他给右派分子打了掩护。”

“费孝通说，他立场不稳还表现在对储安平的态度上。他在报上看到了储安平‘党天下’的荒谬发言时，首先想到的是：‘坏了，他说错话了。为什么他不请几个朋友看看才拿出去呢？’当时他尽管觉得他们俩人看法有区别，但是不妨碍‘百家争鸣’。费孝通说，一直等到工人出来说话了，他才觉悟到这是件大事，在这件大事上他没有对储安平尽到朋友的责任，也没有及时地在原则上和他的思想划清界线。”¹

7月5日，人民日报报道了李达在人代会议上的发言，批判费孝通的《“早春”天气》。说：“《‘早春’天气》不是费孝通个人的抒情之作，而是章罗同盟的一个宣传文件。”“‘早春天气’的发表，是右派知识分子向党进攻的第一炮。”²

7月13日，人民日报报道杨东尊在人代会上的发言，他说：“费孝通的‘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和‘早春前后’，则是两篇包藏祸心的文章，字字句句埋了鸡骨头，行行段段搀杂了砒霜。他一方面倾泻了自己的资产阶级的世纪末的颓废的感情，大谈自己的‘体质’与‘气候’的适应关系，以便来感染那些在伟大时代仍然有落寞之感的知识分子；另一方面他不怀好意地煽动人们去揭盖子：先揭开‘百家争鸣’的盖子，后揭‘互相监督’的盖子。他不主张‘欲揭还罢’，而主张‘迟揭不如早揭，小揭不如大揭，揭开了比冲开

¹ 《人民日报》1957年6月18日

² 《人民日报》1957年7月5日

为妙’。”¹这些批判，对费孝通来说，仅仅是开始。

7月14日《人民日报》报道了7月13日费孝通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的发言，题目为《向人民伏罪》：我向人民伏罪，继续揭露自己的罪行，也就是为了揭露“章罗联盟”的阴谋作见证，交待了十四条“罪行”，现将主要的揭示如下：

(1) “1955年下半年，我在中国民主同盟文教委员会工作。为了发现知识分子问题，主张通过组织各种小型座谈会，邀请那些对党对社会主义心怀不满的盟员和所联系的知识分子，畅所欲言，一吐衷曲，并采取不记名，不批评的工作方法。这项工作虽则反映了一些知识分子的黑暗面，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但所起的危害性是极其严重的。……在这项工作的开始和进行中，曾多次在盟中央向章罗所把持的会议上汇报和请示，得到了章罗的批准和支持，他们并且亲自参加了这种串联活动。……我在这项工作中实际上执行了‘章罗联盟’的‘团结落后，争取中间、打击进步’的方针，并设计了实行这个方针的工作方法。”

(2) “我当时认为知识分子问题主要是由于两个盖子没有揭开。这两个盖子实质上是：学术上没有开放唯心主义，政治上没有开放资产阶级民主。这完全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提出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要求。这也说明了我对‘百家争鸣’、‘互相监督’两个方针的错误理解，暴露了我深藏心底……特别是资产阶级的‘自由’和‘民主’这两个问题，在进入社会主义的关头上，不但在思想上顽强曲折地表现出来，而且还支配了我的行动。这些荒谬论调却为章罗所重视，反复宣传，并且加以发挥。”

(3) “我写了‘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稿子曾给罗隆基看过，他怂恿我发表。这篇文章用了晦涩隐蔽的手法，传出了落后知识分子的心情，起到了刺激和启导作用，把这些反党反社会主义情绪勾动了起来。更应当和“章罗联盟”的阴谋联系起来看，这篇文章确是一个开放反共反社会主义的言论向党进攻的信号。我接受并感谢李达、夏康农和杨东蓀等三位代表对我的批判和帮助。我应当进一步自己批判。”

(四) “我既然思想上、行动上已经成了‘章罗联盟’中的核心分子，……就参加了‘章罗联盟’的重要活动。六月五日找到章伯钧门上，六月六日参加了文化俱乐部的会议，我发表了时局紧张，

¹ 《人民日报》1957年7月13日

对党不信任，同情肃反分子等言论和严重的反党情绪。这个会议为章伯钧……提供了错误的分析，使他得意忘形、跃跃欲试，觉得天下即将大乱，党已陷入困难，民主党派大有可为了。六月八日我又附和了章伯钧对人民日报社论完全荒谬的谰言……六月十日我又被章伯钧叫去，他听到我说‘言者无罪’的话，坚持要我去盟中央座谈会上发言，还想最后用我作他退却的掩护。我的罪行已达到了最高峰。我已站在‘章罗联盟’向党进攻的最前线，我犯下了弥天大罪，叛国大罪。”¹

费孝通的伏罪书同样是根据无限上纲的调子交代和认识的，这种伏罪书仅仅是开始。以后批判者更多的是对费孝通进行政治围剿，人身攻击。仅举一例：1957年8月19日，《人民日报》报道说：“费孝通是个不学无术，专门钻空子的政治野心家……解放后，他更加不读书、不学习，甚至连报纸也不看，把马列主义视为教条，根本不看的眼上。因而，吃饱了饭，不做正经事，专门找落后分子发牢骚，言不及义。”又说：“为了搞点所谓学术性的著作，借以抬高自己的身价，费孝通下流到窃占他人的劳动成果。解放以来，他发表了五、六篇学术论文，都是盗窃旁人的成果略加编改而成的”。“甚至连‘早春天气’也是由冰心帮助写成的。他在学术问题甚至在普通常识上一贯是强不知以为知，买空卖空，招摇撞骗的。例如，他家里根本没有‘廿四史’也从来没有读过‘廿四史’，但他却在那篇臭名远扬的‘早春天气’里说什么‘连我自己都把廿四史搬上了书架，最近还买了一部‘资治通鉴’大吹大擂，炫耀自己。”²

吴景超，社会学家，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六教授会议”的参加者，“章罗联盟”的“谋士”。7月23日《光明日报》发表了《章罗联盟谋士吴景超反动面目暴露》的报道：“中国人民大学师生员工四千余人，于7月20日在西郊举行集会，揭露和批判‘章罗联盟’的谋士吴景超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行。陈锡润讲师说：吴景超是‘章罗联盟’的骨干分子，他在这个集团担任着谋士的角色。他们之所以能彼此结合，是有共同的思想基础和政治愿望的，即反党，反社会主义，搞资本主义复辟。吴景超和费孝通、潘光旦三位一体地组成了罗隆基小集团中策划反党阴谋的智囊。罗的主要反党言论都是事先与吴景超等研究讨论或直接由吴起草的。吴景超和

¹ 《人民日报》1957年7月14日

² 《人民日报》，1957年8月19日

‘章罗联盟’的又一个骨干分子费孝通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他们同是章罗手下的谋士同僚。费孝通在今春写了《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一文，吴景超曾参与这篇文章的讨论，并承认这篇文章是代表了他的观点和思想。”¹

1957年8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许征帆《揭露章罗联盟的谋士——吴景超》的文章。文章一开头就揭露吴景超参与狠毒的战略计划：“右派大将吴景超，是章罗联盟智囊团里的头号人物。他参与这个联盟的反社会主义的战略计划的制定，并力图实现它。我们知道，章罗联盟反社会主义的战略是：趁整风的时机，借‘批评’、‘监督’、‘争鸣’之名，在科学文教界到处放火，煽动教师带领学生上街；再把火放到小商小贩中去，使上了街的学生与市民结合起来，造成混乱的局面；最后，打着‘收拾残局’的幌子，粉墨登场，妄想取共产党而代之，复辟资本主义。这个狠毒的战略计划，虽是最近才全盘暴露出来，但早在大‘放’大‘鸣’之前，章罗联盟的成员已千方百计在为实现它创造条件。在这方面吴景超当然不会落后于自己的‘盟兄’、‘盟弟’。”

文章接着揭露吴景超首立“汗马功劳”。“要实现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阴谋，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必须控制自己所在的组织，使它变质，成为作战的基地。吴景超自己认识到把民盟抓到章罗联盟手中的意义。要掌握民盟，关键在于民盟内的右派能否团结起来，争取中派，排除左派。为此，吴氏夫妇亲自出马，以三十多年老朋友的身份‘苦谏’罗隆基应与章伯钧搞好关系，罗用实际行动证明了他接受这种建议。在建立这个反动联盟过程中，吴景超首立‘汗马功劳’。章罗联盟建立后，右派分子就开始了排斥左派的行动，在执行这一阴谋的过程中，吴景超的‘功绩’同样是不可埋没的，他参与了攻击邓初民的大合唱，咒骂他是‘教条主义’；参加了进攻民盟北京市委会的活动，企图把吴晗撵走，让曾昭抡上台；进行了改组民盟中央文教委员会为文教部的工作，把楚图南搞下来，将费孝通捧上台，而吴景超也被内定为第一副部长。总之，一连串‘贡献’，使得仅仅有五年盟龄的吴景超，由一般的盟员，而民盟中央文教委员会委员，而中央委员兼学习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而内定为文教部首席副部长，并代表民盟出席全国政协。真是官运亨通，青云直上，这就是章罗联盟给自己的忠实的谋士的‘报酬’。”

¹ 《新华半月刊》1957年第17号第170—171页

企图复辟资产阶级社会学。“今年1月间，吴景超发表了‘社会学在新中国还有地位吗？’的短文，对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了一次试探性的进攻。6月9日在所谓‘社会学工作筹备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吴竟首创议开设社会学学系，并提出首先在北京、上海、广州、成都这四大城市的大学建系的具体方案，规定在北京须以中国人民大学的社会调查研究室、中央民族学院、北京大学为复辟社会学的据点。”

“吴景超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复辟资产阶级社会学的言行，并不是什么单纯的学术主张与活动，而是在为实现章罗联盟反对社会主义战略计划思想准备与干部准备。”

文章还揭发吴景超在“六教授会议”上的发言：“以章罗联盟谋士的身份，出席‘六六六’阴谋会议，是吴景超反党、反社会主义活动的高峰。这个会是资产阶级政治野心家研究‘目前的形势与右派的任务’的会议。在这个杀气腾腾的会上，吴景超发表了对形势的看法，介绍了李景汉的咒骂党为秦始皇、思想改造为侵犯人权、新知识分子为新狗熊的反动谬论，并攻击‘人大’为‘四不像’，必须‘摧毁’的教条主义‘堡垒’，最后，他还恳求主子章伯钧根据当时的形势，指示具体的任务。”

文章最后概括吴景超活动的特点：“第一，主动积极。只要章罗一出什么坏主意，吴善于立刻把它化为具体的方案、计划付之执行；第二，设谋献策。在关键性的问题上，他总是精于根据领导意图提出作战计划；第三，深谋远虑。凡是设计出来的各反动方案，幌子总是特别多，欺骗性大，而且进攻和退却的步骤，都有比较周密的考虑。这些特点说明吴景超真不愧为章罗联盟的谋士与干将。”¹

社会各界响应毛泽东的歼灭性打击右派的号召，对吴景超进行政治讨伐和人身攻击，仅举一例：1957年12月1日，光明日报发表文章说：“吴景超远在二十年前的丑恶脸谱，他不过是披着‘学者’、‘大学教授’外衣的中山狼。作为今天章罗联盟的谋士的吴景超，就是昨天蒋介石、阎锡山这些匪首的帮凶。”²

黄药眠，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委兼宣传部部长、六教授会议的参加者，也被列入“极右分子”的行列。

¹ 《人民日报》1957年8月26日

² 《光明日报》1957年12月1日

黄药眠在大鸣大放期间，发表了一些言论，1957年5月12日，《人民日报》报道了他在5月11日在中共中央统战部座谈会上的发言：

“黄药眠在谈到党与非党的关系时说，当前最重要的缺点是党与非党的关系搞得很不好。他认为，有些事党员不对也认为是对的，非党员对的也认为是不对的。党员可以一年提升三级，非党员尽管勤勤恳恳工作，三、五年也不能升一级。党员犯错误关起门来在党内检讨，只要不受组织处分，依然有权在手。非党员犯错误，党组织对他很少教育、帮助，一方面任其自流，另一方面就开始对这个人做组织处理。他说，有些学校领导怕和教师群众见面，专门坐在办公室听党、团员的汇报，造成部分群众怕和党、团员接触。还有部分党员恃功骄傲，有特权思想，不甚读书，靠党吃饭，口谈马列主义，而不肯刻苦钻研。他说，这次整风实在是十分必要的。”

“……过去大家对统战部批评过，统战部自己也作了自我批评，但批评以后依然未改，颇有‘诚恳接受，坚决不改’的神气。”¹

9月4日《人民日报》记者孙祖年报道《“章罗联盟”的军师——黄药眠》的文章：“黄药眠为什么能获得军师的称号呢？就是他在章、罗联盟向党发动猖狂进攻的时候，充分卖力，为章罗赏识，被提拔为民盟中央宣传部部长，成为章、罗联盟向党进攻得力的理论宣传家。”

小标题之一：一百零一条意见。“民盟对李维汉在去年人代会第三次会议上的发言讨论三次，会后，黄药眠、吴景超整理出来一百零一条意见，这些‘意见’中有：在互相监督的原则下，各民主党派应该纠正以往对共产党阿谀奉承、报喜不报忧的作风。……‘意见’中还恶意地挑拨道：现在还有一种风气：就是如果共产党说一句谁不好，那就成了落水狗，群起而攻之。这是非常庸俗的原则。……在这次会议上，黄药眠的反党‘天才’为章伯钧、罗隆基所赏识。因此，章伯钧用地位收买了黄药眠。”

小标题之二：民盟向右转中的角色。“今年4月份民盟召开民盟全国工作会议，中心议题确定民盟今后中心工作，这次会议是在章罗联盟操纵之下，第二阶段会议是讨论四个中心问题，黄药眠是第一组讨论‘民盟今后到底做什么’的召集人。领导小组在讨论黄药眠拟定的草案时，对‘民盟今后做什么’有很多意见。……黄药眠坚持应以‘加强政治工作为主，支持大鸣大放，监督共产党’。

¹ 《人民日报》1957年5月12日

他认为现在知识分子已成为劳动者了，再强调自我改造，提高政治水平，那是消极的表现。他野心勃勃地强调说，所谓‘共存’、‘监督’事实上也就是政治上民主化，当党提出政治民主化的时候，而有人要把民盟的首要任务放在自我改造、文教方面。这样长期共存就要落空。当时胡愈之不同意这种见解，发生了争论，章伯钧见事不妙，只好出来调解。他说现在进行监督还有困难，如人们不习惯，共产党内90%以上反对，我们提也好，不提也好，都不等于监督。这时黄药眠表示：章副主席这样说法，我才心服。在章伯钧这种两面手法的花招下，把左派的意见压下去了。从此，把民盟引导到向右转的危险道路上去。而黄药眠进一步获得章、罗器重。会后章伯钧亲赴黄药眠家中拜访，提出要他担任民盟中央宣传部长。并说，‘做民盟的工作大有前途，民盟部长的地位，相当于省府的副部长。’黄欣然接受，因而黄药眠一下子就爬上章罗联盟军师这把交椅。”

小标题之三：参谋团中的参谋长。“黄药眠自从担任民盟中央宣传部长以后，积极地向章罗联盟献策。……黄药眠提出了向党进攻的计谋。他要求动员全盟力量向党进攻。”“主张民盟中央成立‘政策研究委员会’，作为章罗联盟向党进攻的参谋团，由黄担任参谋长。”

小标题之四：民主办校幕后人。“黄药眠的结论是：党是不能领导国家和高等学校的，应由像他这样的知识分子来领导。他摆出一副正人君子的面孔说，国家不是共产党所有的，我们应当对人民负责。接着6月6日他出席章伯钧秘密召集的六教授会议，根据这次会议精神，又在‘民主办校’纲领的基础上，6月10日黄药眠亲自起草，代表章罗联盟完成了‘我们对高等学校领导制度的建议’。”

小标题之五：披着学者外衣的政客。“北京师范大学广大师生，揭穿了右派分子黄药眠是披着学者外衣的一个不折不扣的政客后，黄药眠装出一付哭丧着的脸，向大家表白自己是一个忠诚勤恳，奉公守法的学者，不承认他是向党进攻的政客，说他的工作从来就是教书第一，写文章第二，民盟工作第三。说他是传授知识的学者，从来不搞政治。这些谎言是掩盖不了事实的。”¹

揭露六教授会议参加者陶大镛的言行。陶大镛，北京师范大学

¹ 《人民日报》1957年9月4日

教授，六教授会议参加者，也成为极右分子。5月3日，北京日报报道北师大鸣放情况：陶大镛认为现行党委制有缺陷，赞成民主办校。他说，“现行的党委制虽有好处，但从过去的工作上看，还是有缺陷的……我们赞成‘民主办校’。总的精神是，将来在学校中有关教学和科学研究工作，教授有决定权。为了加强党在学校中的领导作用，将来应把行政工作和教学、科学研究工作分开。前者交行政会议处理，后者交学术委员会处理。学术委员会由教授、副教授、讲师、助教代表组成，党委会可以派代表参加，在会上提出党委的建议，但学术委员会不一定要遵照党委的意见执行。”¹

5月28日，《北京日报》报道市委征求党外人士意见，其中报道陶大镛提出的建议。“陶大镛说：在现今的情况下，党员在教授中的比重小，实行党委领导制的条件还不成熟，不容易很好地领导教学和科学研究工作。从过去的事实看，在党委制之下，由于党委管得太多，抓得太死，而党委的人力又那样有限，这就很容易造成领导上的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应当实行什么样的领导形式呢？他说，从实现的条件出发，似应把行政领导同教学、科学研究的领导分开，让教授们对领导教学和科学研究工作起决定作用。这样做，能不能实行党的领导呢？他说，这样做更能发挥教授们的积极性，更可以加强党的领导，党在教学和科学研究工作方面的意见，更容易通过他们去实现。所以，我们考虑改变一下党委制，绝不是要党委退出学校或削弱党的领导，而是要通过一个更好的形式来加强党的领导作用”。²

6月19日，北京日报报道北师大民盟支部揭批陶大镛的谬论：

“王麦初说，陶大镛主张的‘民主办校’，实质上是取消党的领导……他们主张的‘民主办校’实际上是教授治校，只是怕刺激党，所以才名之为民主办校。邵爽秋说，右派分子要削弱党的领导，企图取而代之。陶大镛所说的争民主办校就是一个例子。吴昱恒指出，陶大镛的道路是同章伯钧、罗隆基一致的。”陶大镛先生声明：“绝不是要党委退出学校或削弱党的领导，而是要通过一个更好的形式来加强党的领导作用。”“这就是说要在党的领导下实行民主办校’。我的观点有不少错误，但你（指北京日报）报消息把我的

¹ 《北京日报》1957年5月3日

² 《北京日报》1957年5月28日

名字与章伯钧、储安平并列，我认为是不恰当的。”¹

6月21日，北京日报报道陶大镛检讨不深刻引起不满，报道说：“民盟市委副主委陶大镛对他的右派言行作了检讨。他说，五月中旬，盟中央组织了四个工作组，推定黄药眠、费孝通、吴景超……和他组成‘关于高等学校党委负责制’工作组。陶大镛又说，六月六日，章伯钧曾邀请了费孝通、钱伟长、吴景超、曾昭伦、黄药眠和他到全国政协文化俱乐部座谈。当时章伯钧在会上危言耸听地说‘大学生这样闹下去，说不定会发生匈牙利那样的事件’，‘如果学生跑上街来，与市民搞在一起，事情就不好办了’，‘交通部在汉口办的一些学校已经罢课了，形势很严重’。陶大镛说，他和费孝通、钱伟长、曾昭伦、黄药眠几位同志的发言，也或多或少地受到章伯钧的感染，把党群之间的矛盾扩大了。”“陶大镛的检讨根本不是什么检讨，而是避重就轻、推卸责任，把自己装成一个被右派利用的小丑，实际他自己就是右派分子。”²

同一天，北京日报报道北师大民盟支部揭露陶大镛反党言行：“陆宗达说，陶大镛假借师大盟支部名义在师大进行‘民主办校’的活动情况，以及‘民主办校’的实质。”“白寿彝指出：陶大镛等提出‘民主办校’的主张，和章伯钧主张成立‘政治设计院’一样，都是向党夺取领导权，因此给陶大镛加上右派帽子是很恰当的。”³

6月24日北京日报发表了陶大镛《揭露章伯钧、罗隆基的阴谋活动坚决与右派分子划清界线》的文章，摘录小标题如下：第一、章、罗歪曲传达毛主席的讲话，企图夺取党在高校中的领导权；第二、我在思想上和实际行动上作了章、罗的俘虏；第三、章伯钧在六月六日那次别有用心集会上，野心毕露，使我和费孝通、钱伟长等都受了感染；第四、我初步检查一定很不深刻，深盼继续帮助我检查思想提高认识。⁴

7月7日，北京日报报道陶大镛检讨不深刻，北师大师生要陶大镛老老实实交代和进一步检查。

钱伟长，清华大学教授、民盟中委，参加了“六教授会议”。

¹ 《北京日报》1957年6月19日

² 《北京日报》1957年6月21日

³ 《北京日报》1957年6月21日

⁴ 参见《北京日报》1957年6月24日

《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发表后不久，7月6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记者陈柏生的报道：《右派分子钱伟长的阴谋破产了》。报道开头说：“连日来，清华大学师生向资产阶级右派分子钱伟长展开批判。在许多会议上，师生们指出，钱伟长在科学家的招牌掩护下来向党和人民进攻。他在校外与右派分子章伯钧等保持紧密的联系，在校内师生员工中间进行挑拨煽惑，想走资产阶级教育的道路，推翻共产党的领导，为资产阶级打天下。钱伟长自整风开始以来，即在学校中利用自由论坛发表煽动性的言论，争取群众、分化同学，打击党的威信。他迷惑了一部分青年，但是也有些青年对他的右派言论提出质问和怀疑，在学生中展开争辩。一直到6月6日会议被揭露出来以后，他的画皮才被揭掉。人们才看清楚他是有政治企图、有组织活动，用挑拨煽动的办法向党和人民进攻的右派分子。”¹

报道揭发钱伟长在六教授会议上的言论：“钱伟长对6月6日的会议内容是保持绝对秘密的……到了6月20日和6月24日民盟北京市委扩大会议上，参加6月6日座谈会的北京六教授之中的陶大镛和费孝通，都相继揭露了一些这个座谈会的内幕，又揭露了钱伟长在那天会议上曾说学生运动的特点是要找个头，若与教师联合，就要出乱子，等等。这样一来，钱伟长的绝对秘密就保守不住了。”

报道还揭露钱伟长挑拨党群关系：“钱伟长在解放前还只是清华大学一个普通教授，参加评议会也没有竞选上。现在他已经做到清华大学副校长、科学院学部委员、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他一身兼二十多职，但他还说党不重视他不信任他。他在清华的权很大，但还说他有职无权。吴晗曾经就此事在会上质问钱伟长道：今天的地位是谁给你的！您对党和人民抱着什么样的看法？什么样的态度呢？梁思成教授也在批判钱伟长的大会上激动地说：钱伟长你说‘不是党员就没有前途’，可是你不是党员，你没有前途吗？你身兼20多职，又是副校长，又是科学院学部委员！如果你认为还没有前途，那么你的前途是什么呢？是和章伯钧、罗隆基一样的前途吗？梁思成教授还说，钱伟长用的办法是搞个清华的大选举，搞个大签名，想由他来独揽清华的大权。”²

7月14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在‘反教条’旗帜的掩护下

¹ 《人民日报》1957年7月6日。

² 《人民日报》1957年7月6日。

贩卖资本主义私货钱伟长是章罗联盟在科学界的掎客》的报道：报道一开头说：“清华大学在7月13日召开了批判右派分子、清华大学副校长钱伟长的大会。参加大会的除清华大学全体师生员工外，还有中国科学院、高等教育部以及北京各学校的许多代表……与此同时，在北京大学的校园里，全体师生员工也收听了这个大会的实况转播。”接着张光斗教授说：“民盟中央‘科学规划问题’组提出的‘对于有关我国科学体制问题的几点意见’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纲领。这个反动纲领是由曾昭伦和钱伟长等所起草的，在这个纲领中，没有提到中国共产党；也没有提到党中央向科学进军的号召，党的科学政策的正确，以及解放后我国科学事业在党领导下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也没有提到社会主义建设以及科学研究要完成国家的科学技术任务。相反地，我们却看到对党所制定的科学政策和方针的肆意攻击和歪曲，并且竭力挑拨党和科学家、党和青年知识分子的关系。钱伟长等的意图是要摆脱党对科学工作的领导，由他们这些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取而代之’。钱伟长恶意地攻击党所制定的科学体制，目的在于破坏社会主义科学事业。钱伟长使用了两面派手法，在高等学校中攻击科学院‘一家独占，占而不为’，要以高等学校作为研究中心；在科学院那里他又攻击高等学校压制科学研究。两面放火，挑拨离间，惟恐天下不乱。”

张维教授说：“我要揭露钱伟长贯彻他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科学纲领的阴谋活动。这个纲领是章伯钧的政治设计院中科学的部分。他们策划着用这个纲领首先在文教和科学部门中打开缺口。这是他们这个集团在长时期内有组织、有计划、有纲领、有路线的活动。”¹

毛泽东说：“比如钱伟长，恐怕教授还可以当，副校长就当不成了。”²这是对自然科学家划为右派分子的照顾。但是钱伟长被打成右派的后果立即表现出来了。千家驹回忆说：“当钱伟长划为右派时，当时有许多我国留学生，科学家准备回到祖国，参加祖国建设，他们已经到了香港或东京，一听到钱伟长划成右派，于是赶快回到美国，申请加入美国国籍，说像钱伟长这样爱国的留学生还划成右派，我们还敢回去吗？”³

曾昭抡，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委、高等教育部副部长、全国科

¹ 《人民日报》1957年7月14日

²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93页

³ 转引千家驹《七十年的经历》第255页

联副主席、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教授，“六教授会议”的参加者。

《对于有关我国科学体制问题的几点意见》1957年6月9日《光明日报》刊头报道：民盟‘科学规划问题’临时研究组。对科学体制问题提出具体建议。

“本报讯，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即将召开会议讨论我国科学体制问题，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会‘科学规划问题’临时研究组负责人曾昭抡、千家驹、华罗庚，童第周、钱伟长，倾向国务院科学委员会提出一份有关我国科学体制问题的书面意见，就关于‘保护科学家’，关于科学院、高等学校、业务部门的研究机构之间的分工协作，关于社会科学，关于科学研究的领导和培养新生力量等五个方面提出建设性的意见，供作为参考。在此之前……曾广泛搜集的盟内科学家的意见。”¹

《光明日报》第一版报道。现在将《意见》的有关内容摘引如下：

一、“保护科学家”：“我国目前科学家还很少，科学基础还相当薄弱，需要开展科学研究，争取十二年内使我国最急需的科学部门接近世界先进水平，必须‘保护科学家’，就是采取具体措施保证科学家，特别是已有一定成就的科学家有充分条件从事科学工作，扭转目前科学家脱离科学的偏向，首先是要协助他们妥善解决时间、助手、设备、经费以及合理安排使用等问题，使他们真正能够坐下来，好好安心工作。”

二、分工协作：“目前科学院、高等学校和业务部门之间存在的问题，主要是本位主义，大家都想保存本单位的干部，不愿外调，甚至怕谈合作，怕这样被拉走了人，影响了自己。”我们建议：“科学研究工作除少数必须集中外，应尽可能把研究工作去‘就人’，科学家在哪里，研究工作就放在那里。”“我们建议今后建立研究机构应特别慎重。对现有的机构有无收缩或合作的必要。”

三、重视社会科学：“在我国目前情况下社会科学可以比自然科学放轻一些，但是社会科学并不是不重要，也应该有相当的发展。”“要发展社会科学，首先要改变对待旧社会科学的态度。有人认为资产阶级社会里没有社会科学可言，因为那些过去被称为‘社会学’的东西都是不科学的。社会主义社会里的社会科学要从头创造，没有可继承的。对于资产阶级社会科学只有批判，谈不到

¹ 《光明日报》1957年6月9日

接受。对旧社会科学不是改造，而是取消。因此，解放以来，过去研究资本主义国家社会科学的人，在情绪上受到了一定的影响，某些学科解放后竟被废除，或不成为独立科学。过去研究社会学、政治学和法律的人很多转业了。过去许多课程因为苏联没有就被取消了。有些课程比如研究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情况，政治制度、国际关系，国际法等本来就是政治学系的主要课程，但至今未受到应有的重视。这些做法我们认为是不妥当的。对待旧社会科学应当是改造而不是取消，因此应当恢复的应该采取适当步骤予以恢复，应当重视的就应重视起来。

在社会科学方面的另一偏向是往往把政策措施或政府法令当做客观规律。例如，有些财经上的重要政策问题，如果政府部门的负责人作过报告，学者们也只能作些宣传解释工作，这样是不够妥当的。开国以来，在政法、财经等方面所采取的方针政策，基本上是正确的，但也不能说每一措施、每一个阶段或者每一环节都是毫无缺点的。我们认为应该鼓励社会科学研究工作者重视调查研究工作，根据实事求是的精神，对政府政策法规提供意见，政府部门应该主动将有关资料尽量供给有关的社会科学研究工作者，并帮助他们制造研究工作的条件。只有这样，社会科学研究工作才能与实际相联系，才能克服目前理论落后于实际需要的状态。”

四、科学研究的领导：“为了加强科学家之间的联系和交流。应该发挥科联和各个专门学会的作用。国家对于专门学会应给予必要的支持。”“至于学术领导和科学研究的‘火车头’，我们认为在实际工作中逐渐形成，不要主观地规定谁是领导、谁是‘火车头’。”

五、培养新生力量：“过去在升学、升级、选拔研究生、留学生时，有片面地强调政治条件的偏向，我们认为今后应当业务与政治并重。人民内部在培养机会上应一视同仁，对于有培养前途的青年都应当平等地看待。”¹

这份由曾昭伦等主持负责起草《有关我国科学体制问题的几点意见》，竟被打成“反社会主义的科学纲领，而曾昭抡则被划为右派分子。

7月6日，《人民日报》报道了郭沫若在一届人大四次会议上作了《驳斥一个反社会主义的科学纲领》的发言：“民盟中央科学规划

¹ 《光明日报》1957年6月9日

临时小组的‘几点意见’，实际上就是一个在科学方面的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纲领。这不是一个孤立文件，而是章伯钧等右派分子企图夺取国家领导权，首先是文教工作的领导权的阴谋的一部分。章伯钧等右派分子为了夺取文教工作的领导权，在民盟成立的四个临时工作组中。首先加深‘科学规划组’和‘高等学校党委制组’的活动。光明日报在发表‘几点意见’的同时，还发表了短评，认为这是‘为互相监督开拓了新路’，真是好一个向资本主义复辟的所谓‘新路’！看来，这个‘几点意见’实际上就是章伯钧的‘政治设计院’所设计出来的第一批货色了。”¹

7月14日，中国科学院召集在北京的科学家一百多人批判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提出的反社会主义的科学纲领的座谈会，主要是批判对象是曾昭抡，7月15日《人民日报》作了报道：

郭沫若在会上说：“民盟中央‘科学规划问题’临时研究组提出的“对于有关我国科学体制问题的几点意见”，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反社会主义的科学纲领。”千家驹在发言中质问“曾昭抡搞科学体制问题是否有不可告人的动机。他说，民盟‘科学体制问题’临时研究组是章罗联盟阴谋的一部分。但是怎么成立这小组的，他和童第周、华罗庚三人是不清楚的。曾昭抡平时对民盟的工作管得并不多，但是对这件事却非常热心。”李达在会上指出：“民盟中央的意见书中，关于社会科学的问题是最重要的一部分，社会科学是阶级性党性最强的科学，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企图恢复的旧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法律学的共同点，就是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他们是利用资产阶级社会科学作武器向马克思列宁主义争夺领导权。”²

上述这些批判与自我批判都是执行上边所定的调子进行的，甚至以极端面目出现这都是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下所为。批判者往往以极“左”面目批判被批判者，被批判者常常以违心、自责、自毁来丑化自己，否则难以过关。实际上，六教授提出的意见与建议是正确的、合理的、建设性的，像《有关我国科学体制问题的几点意见》、《开设社会学系》等，无论在当时还是以后都是具有建设性的、改革开放性的建议。结果他们都被打成右派分子，他们所提的意见与建议被打成为《反社会主义的科学纲领》《复辟资产阶级社会学》。

¹ 《人民日报》1957年7月6日

² 《人民日报》1957年7月15日

历史证明，他们不但不是右派分子，而是我们知识界的精英与瑰宝。

第三节 “歼灭性打击”右派头目及骨干【二】

随着反右派斗争深入，在初步揭批右派的基础上，继续“歼灭性打击”与“章罗同盟”有关的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中的骨干右派，以迫使他们低头认罪，老实交代问题，缴械投降。

一、打击与“章罗同盟”有关的右派骨干

再揭储安平。对储安平已经作过初步揭批，现在要进行“歼灭性打击”，因为他的“党天下”言论，用毛泽东的话说，就是“夺权”。这样要把储安平同“章罗同盟”捆绑在一起进行揭、批。1957年7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九三学社座谈会上储安平交代“党天下”的发言是先和罗隆基商谈过的》报道：“储安平交代了一些他和章伯钧、罗隆基的关系，说他的‘党天下’的发言内容是和罗隆基商量过的，是在他的影响和支持下提出来的。”“储安平说，罗隆基说可以给‘老和尚’提些意见。我受他这些话的影响。储安平又说，罗隆基告诉他，希望大家对毛主席提些意见。储安平说我的发言稿没有送给他看。错误应由我自己负责，但受了他的影响。他讲到这个问题时，我立刻想到国务院十二个副总理没有一个党外人士的问题。并问他是否可以提。他说：可以提。这对我发言也有影响。因为对毛主席不容易提出意见，所以就提了有关十二个副总理的意见。”

接着，储安平交代了他和章伯钧的关系问题。“关于‘光明日报’的问题，储安平交代说：我4月11日到报馆，当时思想十六个字，即‘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以后又加上一个‘放’字，鼓励大家讲话，鸣、放；其次是偏重独立自主，忘了党的领导；再次是全面改版，想办成个什么样的报纸呢？就是想要互相监督，对党、对政府批评，用旧民主的观点理解鸣、放。这时，有人问储安平，在统战部座谈会上的发言稿，究竟哪些人看过？储说，没有给谁看过，但是发言的内容和意见，我和罗隆基和钱伟长商量过。储安平还说，他认为他和章、罗之间的关系主要是思想有共鸣，是他到‘光明日报’以后的一套做法刚好符合了他们同盟的野心。”¹

¹ 《人民日报》1957年7月8日

7月15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储安平《向人民投降》的检查发言：一开头就表示低头认罪：“我六月一日在统战部座谈会上的发言以及我在光明日报的工作都犯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严重错误。经过全国人民对我的批判，我现在认识到自己的错误，真心诚意地向全国人民低头认罪。”

接着承认“党天下”是“绝对错误”的：“我的关于‘党天下’的发言是绝对错误的。首先，我说今天是党一家天下的清一色局面，和事实完全不符。解放以后，人民在党的领导下翻身做了主人。今天的天下是人民的天下，到处蓬勃着巨大的人民力量。党以真正的大公无私的精神领导人民、教育人民、团结人民。……然而我在统战部座谈会上的发言中，硬说‘不论大小单位都要安排一个党员做头儿，事无巨细都要党员点了头才算数’。我这样说，正如工人同志批判我的，是睁着眼睛说瞎话，是混淆是非，模糊一部分人民的认识，挑拨党和人民的关系。其次，我们的宪法肯定了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领导地位。党的政策方针首先要由党员来执行。党指派党员在各个地方，各部门工作，是党员贯彻党的政策和履行党对国家人民的历史任务的必要措施。但是我却把这些情况说成是‘党天下’，想用这样一顶帽子来反对党的领导。不仅如此，我还进一步错误地把党说成是一个宗派组织，企图分裂党和人民的关系。党承认有些党员在思想作风上以及某些工作上有些缺点，为了克服这些缺点，更好地提高和加强党的力量，党决定用严肃的态度进行整风。可是我却把某些个别党员的缺点说成是党的缺点。这充分暴露了我的真正目的是要直接对党进行攻击，从而削弱党的威信，削弱党的领导。但是我这种反动的言论经不起驳斥，一经人民揭发，就完全露出了我这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丑恶面目。”

储安平发言把他的“党天下”与“章罗联盟”挂上钩：“我这些错误的言论和行为所造成的危害是极大的。”“我犯的错误，实质上又为章罗联盟为核心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反党活动而服务。根据最近报纸的揭发，现在大家很明显的认清，章罗联盟是一个阴险的政治勾结，他们的目的是想通过扩大自己的力量，和党分庭抗礼。逐步篡夺领导。我的‘党天下’的谬论实质上成为替他们的反党阴谋摇旗呐喊，而在那篇谬论中提出十二个副总理中没有一个是党外人士这一点，实际上也等于在替章伯钧、罗隆基开口要求副总理的职位。”

最后，储安平挖犯错误的根源：“我这次犯的错误，并不是突如其来事情，而是有它一定的历史根源的。我受过多年的英美资产阶级教育，盲目崇拜腐朽的资产阶级民主。在解放以前，我一方面反对国民党，一方面反对共产党。我在思想上宣传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在政治上标榜走中间路线。我鼓吹‘自由思想分子’团结起来，实际上就是不要人们跟共产党走。由于我只看到资产阶级一个阶级很小一部分所谓‘民主自由’，看不到广大劳动人民的真正的、更大的民主自由，因而便错误地认为‘在国民党统治下，这个‘自由’还有一个‘多’‘少’问题，假如共产党执政，这个‘自由’便变成‘有’‘无’问题了’。（一九四七年三月八日“观察”第六页）我在‘观察’复刊的时候，（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初步作了自我批评，否定了过去的立场，表示愿意在党的领导下改造自己。但实际上，那时只是在政治上表明了一下态度，我自己的立场和思想并没有真正改变过来，因而解放后这几年来，表面上是接受党的领导，拥护党，而实质上，仍然存在着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思想，因而一有机会我就露出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尾巴。当我初犯错误的时候，我没有正确认识我的错误。一个多月以来，经过全国人民和人民日报的批判，经过九三学社同志、光明日报同志以及人大江苏小组各位代表的帮助，才使我初步认识到自己所犯的反党反社会主义错误的严重。我认识到这次以章罗联盟为核心的反党反社会主义活动是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对打党对人民的一次猖狂进攻。”¹

储安平作了《向人民投降》检查后，揭、批更加猛烈，讨伐更加升级。当时发表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四川日报》等中央和地方报纸上的揭批、声讨文章，不计其数，其内容都差不多，就不再引用了。

揭露陈新桂。8月9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新华社记者于民生写的《右派理论家陈新桂的嘴脸》文章。文章一开头揭露陈新桂是怎样的一个人，章伯钧、罗隆基为什么赏识他呢？“章伯钧接受罗隆基的推荐，曾经准备要右派‘理论家’陈新桂出任光明日报总编辑。陈新桂是怎样的一个人呢？章伯钧和罗隆基为什么这样赏识他呢？社会主义学院揭露出来陈新桂的大量反动言行，为这个问题作了回答。陈新桂经常对人这样说：‘近年来精神生活不及解放前愉快’。可是，在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向共产党疯狂进攻的时候，陈新

¹ 《人民日报》1957年7月15日

桂活跃起来。他说：‘我从来没有这样高兴过。’那时，他曾经说：‘‘匈牙利事件’’很可能在中国发生，如果发生，将不可收拾。’他以为时机已到，他在民盟中央和社会主义学院所举行的座谈会上发表了一系列反对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的荒谬言论。陈新桂不但恶意地诬蔑‘无产阶级专政是产生‘三害’的根源’，而且对历次革命运动，特别是肃反运动，恶毒地进行了诽谤。他污蔑这些运动‘是制造矛盾的重大根源’，是‘助长了唯心主义，推销了唯心主义’，认为‘成绩是主要的，缺点是个别的’这种结论是‘反马列主义’的。”¹

“陈新桂把中国共产党描绘成‘独裁者’，他公然对毛主席和刘少奇同志进行恶毒的人身攻击。他对民主党派机关挂毛主席像很为不满，他要求民主党派机关应该挂自己党派领袖的像。陈新桂别有用心地攻击人民日报和新华社。说‘新华社危机到了’，说人民日报是‘教条’，‘没有人想看它’，并吹嘘光明日报和文汇报‘无论编排和内容，都是最好的报纸’。同时，陈新桂还在社会主义学院扬言要退学，到光明日报去担任‘重要工作’。陈新桂极端仇恨苏联，仇恨马克思列宁主义。他恶毒地诬蔑斯大林的错误和匈牙利事件的发生，都是无产阶级专政制度造成的。他说：‘资本主义有危机，社会主义也有危机；资本主义要完蛋，社会主义也要完蛋。’他还荒谬地说，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对苏联没有什么‘友谊’，都‘恨苏联’，报道说社会主义国家坚强团结是‘应酬话’，是‘讲得好听’。”“当报纸上对储安平的反动言论进行反击的时候，陈新桂竟无耻地捏造说：‘共产党恨储安平，是因为储安平提到联合政府，这是共产党最害怕的。他认为，储安平的早已破了的‘党天下’的谬论是真正所谓挖了共产党‘老根’。当他散布这些谬论的时候，他说他可能成为反革命分子，他已经‘做了准备了！’”²

文章接着揭露陈新桂同罗隆基的关系：“罗隆基和陈新桂是在1945年相识的。1946年陈新桂在‘人物杂志’上写了一篇‘民主斗士罗隆基’的文章，大捧罗隆基。从此，罗隆基和陈新桂的关系就更加密切了。罗隆基到了那里，就在那里安插陈新桂当他的耳目。解放以后，罗隆基任民盟宣委会主任，安插陈新桂作秘书，罗隆基负责政协外交组和人大宣传部工作时，又把陈新桂带去作秘书。再

¹ 《人民日报》1957年8月9日

² 《人民日报》1957年8月9日

以后，陈新桂又变成了罗隆基小集团的心腹。1951年，民盟北京市委改选；罗隆基支持陈新桂去竞选，阴谋夺取民盟北京市的领导权。陈新桂在罗隆基的支持下扶摇直上，1956年他成为民盟中央候补委员。反击右派刚刚开始的时候，罗隆基在国外。那时陈新桂是很慌张的，觉得问题很严重，并且在民盟中央的座谈会上检讨，表示愿意挖根交待问题。可是，罗隆基回到北京以后，陈新桂又变了，他以耍无赖的态度进行顽抗，说什么要为‘真理’而死。”¹

文章揭露陈新桂同章伯钧的关系：“陈新桂同章伯钧的关系也是很密切的。6月10日在民盟中央的整风座谈会之前，陈新桂就有人说：‘章伯钧今天要战斗，我今天也要战斗。’会上陈新桂继续发表了反动言论。会后，章伯钧找陈新桂谈话。章伯钧责备陈新桂没有见机而行，埋怨他不该‘到这时候还讲这种话。’

在章伯钧进行交代的那一天，陈新桂曾到尹肇雄家里去密谈。陈新桂向罗隆基的亲信赵文璧作了十五点指示。陈新桂制造了许多谣言如：‘学校党委制要撤走了，毛主席已同意在清华作试点，清华党委已撤销了’；‘农业合作化有冒进’；等等。”²

文章最后揭开陈新桂的家庭出身：“陈新桂为什么这样疯狂地向共产党向人民进攻呢？揭开他的家庭出身看一看，这个问题就很清楚了。陈新桂是在教会学校里读书长大的，并且得到外国传教士的资助，因而培育了他浓厚的买办思想。陈新桂是湖北江陵人，他的父亲陈眷煌是一个负有血债的恶霸地主。在大革命时代曾向农民进行倒算，并且由于他控告当时在当地坚持革命活动的先锋队队长张文申被伪军团逮捕杀害，1952年土地改革时，陈眷煌畏罪自杀。陈新桂的弟弟陈新炳是汉奸，是反革命分子，曾任日寇情报组长，伪乡队副，杀害过革命干部。在1948年为我游击队枪决。陈新桂一贯维护他的地主家庭的利益，直到今天他还说他的父亲是中农，他的弟弟是‘务农’的。原来陈新桂对共产党有‘杀父之仇’，有‘杀弟之恨’。难怪和陈新桂在一起工作六、七年的人揭露说：在六七年里，没有听到陈新桂对社会主义说过一句好话，也没有听到陈新桂对共产党说过一句好话，一提起共产党和社会主义，陈新桂总是进行恶意的谩骂。”³

¹ 《人民日报》1957年8月9日

² 《人民日报》1957年8月9日

³ 1957年8月8日“新华社新闻稿”

打击“章、黄、李反党集团”。再揭章伯钧。“民盟在百家争鸣过程和整风过程中所起的作用特别恶劣”。“还有农工民主党，一模一样”（人民日报1951年7月1日）在这里揭批农工民主党。1957年6月16日《人民日报》发表胡一禾《揭发章伯钧的言行》的文章指出：“去年，章伯钧在农工民主党中央委员会上传达毛主席的‘十大关系’时说：现在许多人都说资本主义不好，事实上资本主义也还有活力，就是因为有多党制度，有民主制度，有众议院和参议院，有在朝党和在野党。光绪皇帝为什么完蛋？就因为没有民主。资本主义为什么没有完蛋？就因为还有民主。资本主义的办法是：你不行，我来；我不行，你来。在朝的骂在野的，在野的骂在朝的，这就是活力。这在我们叫做批评与自我批评，在他们叫‘哇啦哇啦’。苏联二十次代表大会后，特别是匈牙利事件后，章伯钧几次说到社会主义民主还要发展变化，现在正在继续变化，形势还要变，我们大家的责任很重大之类的话。”¹

同一天《人民日报》报道：王继善揭露说：“章伯钧在去年一再强调民主党派要‘当家作主’，说统战部过去管得多了，今后我们不必去多找他们管了。他说农工民主党浙江、安徽的组织搞得这样糟，是统战部搞的。在中共中央号召学习马列主义时，他说：‘我认为诗经、论语还有用，马列主义只有那么几条，我就没有兴趣，不值一学’。他认为人民日报所载的完全是教条，毫无疑义，一文不值。”²

6月20日《人民日报》报道说：在6月19日农工民主党执行局扩大会议上，许多人揭露章伯钧两面派言行：李伯球说：章伯钧在苏共第二十次党代会后，在外地来京同志的谈话会上说：‘苏联一定要变，中国也不能让许多小斯大林统治下去’。在另一次谈话会上，他已表示对评级评薪不满，说，国家机关里的每一级都是共产党员作主，知识分子是‘农奴劳动’，怎样叫人去发挥积极性呢？他把社会主义与民主割裂开来看，认为‘现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与民主运动将要汇合’，‘中国要在科学与民主两个问题上赶上美国’。他念念不忘第三条路线——反马克思主义的改良主义。”³

揭、批黄琪翔。黄琪翔时任农工民主党中央副主席兼秘书长。7

¹ 《人民日报》1957年6月16日

² 《人民日报》1957年6月16日

³ 《人民日报》1957年6月20日

月2日《人民日报》报道了“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执行局整风扩大会议，撕破了右派分子黄琪翔两面派的假面目，揭穿了他的反共、反社会主义的真面目，以及章伯钧、黄琪翔、李伯球在农工民主党内组织右派小集团的阴谋活动。”黄琪翔曾经说，‘共产党内缺少民主，缺少自由，组织性、纪律性太强’。因此，他阻挠他的儿子参加共产党。他还认为共产党员发展到一千二百万了，太多了。1954年，黄琪翔在农工民主党中央叫农工的成员接受农工党的领导、不要接受共产党的领导”。“黄琪翔在去年就说，国务院的副总理尽是共产党员，没有一位党外人士，共产党包办一切，不民主。”

“还有许多人揭发黄琪翔在反右派斗争中公开包庇章伯钧。章伯钧在人民日报6月14日发表的“我在政治上犯了严重的错误”的假检讨，是章伯钧、黄琪翔、李健生的集体创作。黄琪翔在揭发章伯钧的座谈会前说，他和章伯钧有‘同党之谊’，‘轻描淡写几句就行了’。因此他和章伯钧常在座谈会上一起唱双簧，甚至还企图把章伯钧的问题说成是‘思想问题’，公开包庇章伯钧，说他检讨的态度‘比较老实’。他曾安慰章伯钧说周总理报告中批判右派分子的那段话是针对章乃器的。”¹

“黄琪翔从来不承认密室筹划，总是标榜他做事‘公开’、‘坦率’，其实并不如此。今年春天，农工民主党中央工作会议期间，有一天王大鲁到他家里去，正碰上他和李伯球正在把中央委员名单排队，计算哪些人同意黄琪翔作副主席，那些人不同意。李伯球当时并警告王大鲁不要向外讲。……今年1月11日，黄琪翔找李伯球到他家里去，他对李伯球说：‘有三个位子要安排，即人大常委会、政协常委和政协委员。’黄琪翔想当农工民主党中央副主席，他认为副主席就可以得人大常委会的资格。他并且表示，其他职务可以让给李伯球。五月初，黄琪翔同章伯钧，李伯球共同策划在医药卫生界、农林水利界、工程技术界等六个方面“点火”，进行反共反社会主义的阴谋活动。”²

揭发黄琪翔大量的反共反社会主义言行后，黄琪翔在7月13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作了题为《请求人民的宽恕》的发言：

首先交代他和章伯钧的关系：“我在农工民主党的职务是副主席兼秘书长，和章伯钧有组织关系和工作关系，并且在思想上和行

¹ 《人民日报》1957年7月2日

² 《人民日报》1957年7月2日

动上做了章伯钧的俘虏，我对此愿意彻底交待和批判。以民主同盟为活动中心的章罗联盟，在农工民主党内是得到我的支持的。在整风期间，我参加了农工民主党北京市委会所组织的所谓座谈会。到处起点火作用，造成了共产党威信上重大的损失；章伯钧的反共、反社会主义罪行被揭露以后，他要做假检讨，我又盲目地帮助了他。我在章伯钧问题上所犯的错误的严重的，是无可置辩的。我和章伯钧过去多年相识，解放以后，共事也已足有八年。章伯钧的政客野心家面目，凡是有一点政治嗅觉的人都早已察觉到了。八年以来，特别是最近两年以来，章伯钧的反共、反社会主义思想和言论冒头，而且有很多阴谋活动，我竟丝毫没有感觉，这是对人民事业完全不负责任的态度，是不能推卸责任的。章伯钧的罪行被揭发以后，我迟疑观望，这说明我的思想深处和章伯钧有不少共同之点。我经常自负，以赤胆忠诚拥护共产党，拥护社会主义，但一接触实际，则一切都变成假象：人家骂共产党我无动于衷；人家说社会主义缺乏民主我也无动于衷；人家说苏联不好我默认；人家说资本主义好我暗中同情。一切一切，说明我对共产党没有真正的感情，对社会主义也没有真正的热爱。我经不住事实的考验。”

黄琪翔从家庭出身和思想上找犯错误的根源：“我是一个封建地主家庭出身而又长期生活在旧社会的军人，我在历史上是有污点的，后来有沾染上不少欧美资产阶级社会生活的毒素。青年时代，无疑我的思想是封建的；大革命以后，二十年间又掺杂了一些资产阶级思想。解放后，我受到了共产党的教育，但进步很慢，留恋旧的多于接受新的；资产阶级思想和封建残余思想浓厚地潜藏在我的灵魂深处；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我来说，简直还无法掌握运用。代表们，经过深刻反省，我认为我的错误是严重的，责任是无可逃避的；我做了章伯钧的俘虏，我参加了章伯钧的罪恶活动，我的思想深处严重地存在着资产阶级的思想本质，而且还有不少的封建残余，因此行动上就表现为敌我不分、投机取巧、对人民工作不负责以及温情对人直至甘心作俘虏等等，这种思想的发展，结果就是走上了反党、反社会主义道路而毫不自觉。”

最后请求宽恕：“代表们，我是犯了错误的，任何批评，我都接受，我只有正视自己的错误，坚决改正错误。只是我犯错误的原因是由于失足而不是由于自愿，因此我有勇气来请求你们，不要遣

弃我这曾经迷失道路的浪子，并且请求你们宽恕。”¹

李伯球自我揭发。7月17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李伯球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题为《我痛恨自己给章伯钧作点火的工具，支持了黄琪翔在农工民主党执行章伯钧的道路》发言。发言开头说他是章伯钧放毒点火的工具。“我的严重错误首先是受章伯钧的指使，在北京市召开了各种座谈会，鼓励大鸣大放，上了章伯钧反党反社会主义阴谋的圈套，变为章伯钧放毒、点火工具之一。并且在去年以来，支持了黄琪翔在农工党中央执行章伯钧的路线，把农工民主党引入极可疑的、危险的方向。最明显的是今年农工民主党四月会议，章、黄处心积虑要实现黄琪翔的副主席，我做了他的支持者。会议以后，章伯钧在农工民主党要‘亲政’，要掌握全部权力，正企图更多地引用‘心腹’，进行大发展。所幸党和人民及时揭发和反击右派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阴谋，把农工党挽救过来。”²

8月16日《人民日报》发表《农工民主党除毒去污初见成效》报道农工民主党揭露出章伯钧、黄琪翔、李伯球右派集团，报道说：“共产党的整风运动开始后。这个集团及其各地代理人就得意忘形地进行了大规模的非法活动。首先，右派分子章伯钧、黄琪翔、李伯球、王一帆（农工中央执行局委员、秘书处副处长、交通部公路局副局长、全国政协委员）、杨逸棠（农工中央执行局委员、交通部办公厅副主任、全国人大代表）、李健生（农工候补中委、北京市委副主委、北京市公共卫生局副局长）、王寄一（农工中央委员、交通部船厂局副局长、全国政协委员）、钟岱（农工中央组织部副部长）等在中央经过策划以后，便派遣王一帆、杨逸棠、张云川分别到东北、山东、河南等地，执行反社会主义的组织路线，滥肆发展。在北京，章伯钧、黄琪翔和李健生动员了他们的骨干分子，如张申府（北京图书馆研究员）、王枕心（农业部专员）、张含清（对外贸易学院教员）、陈苏生（中医研究院编审）、曾宪朴（农业部经济作物总局副局长、农工党农业部总支部主委）、李宗恩（协和医院院长）、李万春（北京市京剧一团团长）等，邀请了很多对党不满的分子，举行了20多次点火会，煽动反党的毒焰。”³

¹ 《人民日报》1957年7月13日

² 《人民日报》1957年7月5日

³ 《人民日报》1957年8月16日

二、打击民革中的右派骨干

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惊涛骇浪是章罗同盟造起来的，别的党派也在选，有些人也很恶劣（参见《人民日报》1957年7月1日）在这里，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揪出来陈铭枢、黄绍竑、谭惕吾、龙云等几名右派骨干分子。这些人也成为被“歼灭性打击”的对象。

痛斥陈铭枢。7月8日、15日，民革中央小组扩大会议痛斥右派分子陈铭枢的狂妄无耻。陈铭枢在会上首先发言：“关于取消学校中的党委制问题，他承认他的‘本心是要以校务委员会负责制来代替党委负责制’，但他又说没有想到取消党的领导。关于他主张‘只提缺点，不提优点’问题，陈铭枢多方辩解。他说自己的动机是好的，但是经过检查，他又发现自己的动机不是良好的。他认为他的主要毛病是‘严重的个人英雄主义’，‘自由主义作风’。对于他发表的反动言论，他认为只是为党帮了倒忙，为右派野心家张了目。”¹

陈铭枢的检查发言，遭到了与会者痛斥：梅龚彬说：“陈铭枢的检讨，避重就轻，不着边际，他对自己的反社会主义的言行，毫无认识和悔悟，我们不能同意这样的检讨。”“不要说陈铭枢今天侈谈拥护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全是假的；就是解放前的反帝、抗日、反蒋也是盗名欺世。拆穿来讲，他是：名为反蒋，实际反共；名为抗日，实际拥蒋。”最后说：“我们原来不想算旧账的，如果解放后，他能自己斩除过去一贯的政治野心，彻底认识过去的罪恶，老老实实跟着人民走，人民当然不再追究历史，我们也不必要再提往事。但事实并不如此。”²

7月14日，吴茂荪揭发陈铭枢诬蔑毛主席的一些反动言论，说：陈铭枢公然把“毛主席同德国的俾斯麦、日本的伊藤博文相提并论，他把毛主席说成是‘个人修养上热而不淡，疾而不舒，燥而难宁，察而难周之失，也难免于影响到察人听言，决策定计的睿断，以及在政策措施上的畸轻畸重、失缓失急’。陈铭枢诬蔑毛主席‘好大喜功’，并要毛主席‘更加深入体察，以求究竟’。他说毛主席有时‘为喜怒所乘，在一个浪潮之下，轻于挫伤高级干部的自尊心和他们的固有地位’。他说毛主席‘轻信干部的虚假汇报与教条主义

¹ 《人民日报》1957年7月8日

² 《人民日报》1957年7月8日

的分析方法，未经郑重细致的研究，即作过激的决定’。”蒋光鼐揭露说：“陈铭枢提出了“毛主席的‘四大罪状’，所谓‘好大喜功，喜怒哀乐，偏听偏信，鄙夷旧的’。陈铭枢，你这种歪曲和诬蔑连三岁小孩子也能把你驳得体无完肤，也要举起他们的小拳头来活活把你打死。”¹

陈铭枢于1957年7月15日在全国一届人大第四次会议上作了《自我检讨》的发言：“今天，我在这庄严的人民讲坛上，怀着无比沉痛的心情来发言，作出自我检讨。”发言承认发表了许多谬论：“其中有‘撤销学校中的党委制’和‘只提缺点、不提优点’的论调。尽管我曾强调自己的主观愿望是善意的，并没有动摇国家基本制度的企图，同时也没有与章罗联盟及其联盟中的任何人有丝毫联系，但在客观上所发生的破坏作用，是与章罗联盟反党活动一致的，而且在思想本质上与他们也是一脉相承的。这是一种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罪恶，我应负政治上的责任。”发言提出向党请罪，向人民请罪：“我深自痛悔，我在党整风中，没有尽到维护党的责任，反而发表了违反社会主义原则的言论，为反党联盟帮了忙。在这里我向党请罪，向人向人民请罪。”

发言接受大家的批评并认识到自己：“一、我一生的历史都是丑恶的，过去在军事、政治上的一切活动，都是反动的、投机的，就是在‘抗日’‘反蒋’的活动中，也包藏这些肮脏的东西。二、我是一个狂妄自大的野心家，全部历史都是如此。解放后，我虽然经过多年的党的教育，但由于积习太深，还没有把立场转变过来，而这种劣根性，一有机会就会冒出。三、我是一个具有反动的、根深蒂固的唯心主义者，在意识形态上是与马克思列宁主义不相容的，我在这种反动的世界观的支配下，表现在作风上好自我表现，不安分，自以为是，主观，片面，滥用热情、温情，激动等等积习，集中表现为急功好利的个人主义和可耻的个人英雄主义。而最主要的是由于立场问题没有根本解决。”发言最后表示：“像我这样犯了严重错误，而且实际上已陷入了右派泥淖中的人，对于这一斗争同样是一个生死存亡的斗争。有敌无我，有我无敌，不达目的，至死不休。”²

揭批龙云的言行。1957年6月19日、20日、24日、7月1日，

¹ 《人民日报》1957年7月15日

² 《人民日报》1957年7月16日

人民日报发表了民革中央小组扩大会议批判龙云的右派言行的报道。

李济深第一个发言，他批判龙云“发出了怀疑苏联，甚至以为苏联不如美帝国主义的荒谬论调，我认为，这种论调，是离开了社会主义阵营的立场，是违反‘一边倒’的国策的，是违反孙中山先生三大政策的遗教的。”¹王昆仑驳斥了龙云的反苏谬论：“龙云认为，抗美援朝战争的经费，全部由中国负担不合理。王昆仑说抗美援朝是中国对美国的战争，也是社会主义阵营反对帝国主义阵营侵略的战争，是正义的战争。不是苏联帮助我们怎能打胜仗。……社会主义国家休戚相关，互相支援，而苏联帮助各国最多，却反要责备苏联没有负担抗美援朝军费，合情合理吗？龙云认为，‘中国借苏联的债要还，不如美国慷慨大方’。王昆仑说，看来龙云很欣赏美国的慷慨大方，龙云不知道美国在两次战争中不但并没有损失，而且发了横财，挖了它盟国的墙角。龙云说苏联对我们真厉害，我们不该为社会主义而战，难道龙云认为我们应该依靠美国，为资本主义而战吗！对龙云提出的，所谓苏联从东北搬走机器问题，主张压缩对外援助问题，王昆仑也作了驳斥。”²

吴茂荪发言，揭露龙云保持地主阶级的思想感情和立场：“事实上，龙云对于土地改革至今还是余恨未消的。解放八年了许多地主的帽子已经摘了，而龙云的地主阶级的思想感情还依然依附在身上。他平时常说，土改斗争太凶了，现在大家都被整穷了。对于农业合作化，他实质上也是不赞成的。他说去年搞得太凶了，强调这里饿死人。他对农民生活的改善，合作化的优越性是抱着怀疑的态度。对于公私合营、工商业改造，他又有一种妙论，他说，共产党的办法是把大家都整垮、整光，整得大家都穷了，大家都没饭吃。他说私股资金可怜得很，总共不过二十多亿元，全国六亿人口每人能分到多少呢？真穷得可怜啊！照龙云的说法，全国私股资金少就说明了国家穷，这是什么人的‘国家’呢？照龙云的逻辑来推论，农业合作化和工商业改造都是整垮、整光、整穷，买不到东西，以至饿死人这一切现象的根源。”“至于说，镇反，肃反，龙云是一贯不满意的，说起偏差错误一大堆，充满了埋怨气愤的情绪。这些就足以说明龙云一个思想根子就是反对社会主义；在思想感情上是

¹ 《人民日报》1957年6月19日

² 《人民日报》1957年6月20日

不喜欢社会主义的。”吴茂荪说，“八年来，龙云的言论，不论公开的、私下的，批评多，不满多，责骂多，很少对我们八年来伟大成绩来一个‘歌功颂德’吧？龙云曾公开说过钦佩章伯钧、罗隆基等人，说很钦佩的是他们的‘提意见’的精神，我看不是‘提意见’的精神，而是‘反对共产党领导’的精神吧？应该承认，龙云第二个思想根子就是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在思想感情上，是不喜欢共产党的。”“最后，由于龙云具有反对社会主义，反对共产党领导的思想基础，我们也就不难找到他这次发言的中心思想根子，那就是反对苏联。”¹

7月13日，龙云在一届人大四次会议上作了题为《思想检讨》的发言：首先说自己的思想模糊和立场不稳的根源：“从思想本质说，我的主导思想是封建地主阶级的思想，又掺杂了资产阶级民主自由的思想，我生长于少数民族的封建地主家庭，一方面受到封建道德和伦理的教育，另一方面受到民族歧视和压迫，清末民初，投身军伍，又渗入了军国民思想教育，同时，辛亥革命前的资产阶级民主思想，也给了我很多的影响，于是由狭隘的所谓‘忠军爱国’的观点，发展成为‘富国强兵’的思想。又在国民党反动派统治时期，主持一省军政，剥削压迫云南省人民达十余年，就养成了唯我独尊、自高自大的封建官僚和军阀作风。”接着检讨由阶级根源和思想根源所产生的错误：“例如，在减租退押时，我竟希望‘有押退押，无押不该要’。土地改革我是拥护的，让我希望和乎土改，不用斗争方式，思想上是对地主阶级和旧官僚同情的。‘三反五反’‘肃反运动’，我也认为搞得过火，冤枉了一些‘无辜’的人。农业合作化，我认为很好，但我觉得发展高级社太急太猛，反使农民生活困难，以及最近在帮助党整风初期，我还说‘过去几个运动都是共产党整人’，‘民主人士对党提意见，没有做到步步紧，而是步步松’。”²龙云检讨外交政策的错误，并认识到：“1、‘抗美援朝战争经费，全部由中国负担不合理’——首先我对这个战争性质的提法就提错了，抗美援朝，是为了保家卫国。”“2、‘第一、二两次世界大战中，美国借款给盟国，又实施租借法案，后来他们有的赖了债，有的美国不要还了，苏联对我国的借款，十年以内还清，时间过短还要付息。建议延期二、三十年归还，借以缓和国内

¹ 《人民日报》1957年7月14日

² 《人民日报》1957年7月14日

经济紧张，中国为社会主义而战，结果如此。’——以美帝在两次世界大战中发横财的租借法案来对比苏联对我国的借款，又把两者等同起来，这实在是敌我不分，毫无人民立场了。”“3、‘苏联解放我国东北时，拆走了工厂中的一些机器，有无代价？偿还不偿还？’——这种问题的提法，充分暴露了剥削阶级‘算倒账’的思想……”“4、‘我国援外预算太大，主张抓紧压缩对外的援助’这说明了既无远大眼光，又无磅礴的气魄，只能小手小脚，小家小管，紧把细持，量入为出。”“以上四个主要问题的再认识，使我深刻了解到：虽然我当初发言的动机是自以为是狭隘的爱国主义，实际的客观效果却是反苏、反社会主义、反党、反人民的。这是严重后果，是令人不能容忍的。”龙云检讨最后说，“经过这次各方面对我善意的揭发、批评，受到了很大教育，我深深的痛悔前非！”¹

揭批黄绍竑的言行。1957年6月18日，民革中央小组扩大会议揭、批黄绍竑的右派言行。李济深第一个发言，他说，“黄绍竑同志对于开国以来，中国人民所取得的伟大成就，一贯地使人们感觉到他不是采取欢欣鼓舞的态度，而是到处找岔子，给党和政府抹黑脸的样子。……肃反运动取得伟大胜利，巩固了人民民主专政，黄绍竑同志对此熟视无睹，一字不提，却一味强调缺点，到处找偏差例子，仿佛是今天的包拯，实际上是使人们看见他在替反革命说话。黄绍竑同志认为党不应该向群众发号施令。大家知道，党是国家的领导核心，为什么党不能够对群众直接说话？”程潜发言，“黄绍竑同志责怪人们说：‘成绩是主要的，偏差错误是个别的’，‘会意味着强调成绩掩护错误’，当人们反责他的意见时，自己还是躲躲闪闪，只承认这种错误论点‘有语病’。”²

6月30日继续开会批判黄绍竑的右派言行。黄绍竑作了检讨：“黄绍竑在检讨中，虽然承认了他的思想是反动的，但检讨的内容却空空洞洞，没有交代具体的事实。”聂轰揭发黄绍竑说，“黄绍竑视察司法就把司法说得漆黑一团，视察教育就把教育说得漆黑一团。黄绍竑在视察中从不接近工农群众，专门喜欢跟反革命罪犯打交道，一听到反革命罪犯喊冤就随声附和。……说这里的犯人吃得不好，那里的犯人住得不好。”³

¹ 《人民日报》1957年7月14日

² 《人民日报》1957年6月20日

³ 《人民日报》1957年7月1日

1957年7月15日，在全国一届人大第四次会议上，黄绍竑作了题为《我的错误和罪行的检讨》发言，发言开头说到思想立场如何形成的，他说：“思想立场是由每个人的生活历史形成的，我是地主家庭出身，八分之七的年光是在旧社会里生活，而且在国民党反动政权里做了二十多年的官僚军阀，做了很多对不起人民的事情，封建思想、资产阶级思想、旧民主思想种种落后思想在我的脑子里是根深蒂固的。”“但是我的学习并不认真，对思想改造存着慢慢来的想法，并且以为民主人士思想并不能改造得那么彻底，残存一些旧根子也可以跟着党的后面混进社会主义社会。在学习的时候，不能真正地用马列主义武装自己的头脑，那些残存反动思想随时随地不知不觉地在言论和行动中发现出来，也就是不知不觉地走向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立场。”接着检讨两方面的错误：在统战座谈会上所提的错误意见；视察工作和平时言论行动上的错误。“总之，我的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言论和行动并不是偶然的，是有历史根源的，前后一贯的，随着社会主义建设的进展而更多暴露出来。”

最后检讨发言说点对历史罪恶和现在的认识：“各位代表、各位同志揭发我过去历史上许多罪恶，绝大部分是我承认的，某些是与事实有出入的。……解放以来蒙党和人民的宽大待遇……但我却把历史罪恶忘了，思想模糊，立场不稳，以致发生许多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言论和行动，不但人情所不许，也为法理所不容。”“我现在诚心诚意的向党和人民认罪，今后争取彻头彻尾的改正错误作为赎罪的表现。”¹

7月19日，人民日报记者集采报道《黄绍竑保护的什么人？翻的什么案？》，更加深入的揭发黄绍竑的罪行。报道开头说：“黄绍竑以全国人民代表的身份，在去各地视察工作的时候，或从人民来信之中，专门搜集反革命案件的材料，替反革命分子叫冤，攻击我国公安司法工作和肃反运动。近年来，他在全国人民代表、全国政协会议等会议上，先后列举了一些案件，指这个是冤狱，那个是破坏法制；今天要为这个伸冤，明天要为那个翻案。最近，我们就黄绍竑提出的那些案件，访问了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和公安、司法部门的负责同志。事实证明：”“就在这八个反革命案件中，也没有一案冤狱，而且好些案犯都得到了宽大处理。”接着报道了八个反革

¹ 《人民日报》1957年7月16日

命案件的详细情况，以及最后结论：“从以上八案中，读者可以看出黄绍竑所要保护的，几乎完全是历史的或现行的反革命分子。他所极端仇视的，则是人民的司法和公安机关。黄绍竑对司法和公安机关的攻击，绝不是为了要建立革命法制，相反地，却是蓄意诽谤，用以削弱和攻垮无产阶级专政的最重要的机构。这也就是黄绍竑向社会主义的进攻，是他的反社会主义的阴谋活动中的一个重要部分。我们必须百倍警惕，打击右派分子的这一场进攻！”¹

揭批谭惕吾。1957年6月6日，人民日报报道了6月5日民革中央小组扩大会议上谭惕吾的发言，“谭惕吾提出了四个问题。“第一个是共产党领导国家的方式问题。她说，党领导国家，大家承认，但用什么方式值得研究。现代政府有一套机构，党内又有一套机构，这是‘双轨制度’。她说，党内一套是清一色，不与群众在一起，脱离实际，这怎么不产生三大主义和‘墙’‘沟’？原说党是抓思想和政策的，实际上已超越这个范围，直接向人民发号施令，政府部门没有权。”“接着她就党领导国家的方式问题提出了具体建议：主席办公室应该扩大；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机构要充实，要发挥它的作用，共产党员到这个权力机关来监督政府，掌握政策；把共产党内各个部改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里的各种委员会；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内可以设党组，吸收非党人士参加工作。”她谈的第二个问题是：党的政策应该如何体现。她说，党直接指挥行政部门的党员，会把国家行政系统搞乱了。她认为党应该把政策提到人民代表大会制成法律，再由国家管理机关根据法律制成各种法令，通过法律、法令的实施，体现党的政策。她认为不应在法律、法令之外，再发内部指示。她强调说，指示代替法律、法令，是不可以的。第三个是党遵守宪法和国家制度问题。她说，党制定政策，应在宪法范围之内。……谭惕吾要求中共中央检查在制定的政策中是否和宪法有抵触的？如有，要赶快纠正。……关于国家制度问题，谭惕吾说，司法、律师、检察是对执行国家制度起杠杆作用的，但有些地方这三者是在一个党委领导之下，她认为这是不好的。……共产党可以派党员到司法、检察等机关去担任负责工作，但这些部门不应该由一个党委领导。第四个问题，是怎样使共产党接受全国人民的监督。她说，政府受人民代表大会监督，但

¹ 《人民日报》1957年7月19日

是党不受什么监督，她认为应该建立制度使人民监督共产党。”¹

6月18日，民革中央小组扩大会议继续开会，批判谭惕吾的反动言行，6月19日人民日报进行了报道：程潜在发言中指出：谭惕吾的四点意见是反动的。他发言说：“惕吾同志有哗众取宠之心。她对国家体制问题，法制问题，以及党政关系问题所发表的四点意见，从骨髓里头来看，是彻底的反对共产党的领导的，是反动的。惕吾同志至今仍旧认为自己是左派分子，据我看来，惕吾同志是很反动的右派分子。”²

7月16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谭惕吾《我为什么犯了严重的错误》的发言。发言承认当了右派的急先锋：“我的言论，是犯了严重错误的，是有罪的。当资产阶级的右派分子，向党、向无产阶级、向社会主义疯狂进攻的时候，我们没有站稳立场，为右派言论所动摇，提出了四点错误的建议。这四点建议骨髓里是反动的，是与右派言论和主张相符合的。而且，我比其他的右派说得更具体更全面。无形中，不仅把自己滚进了右派的泥坑里，而且还做他们的急先锋。”接着挖犯错误的社会根源和认识根源。她说：“我是小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过去所受的是资产阶级的教育，学习的是一套资产阶级的专政理论。”“我在学生时代就有浓厚的国家主义的思想，因而曾经一度参加了青年党……我离开他们，并不是为了反对国家主义，而是反对他们那批人。至于反动的国家主义思想一直没有经过批判，仍然很顽强地印在我的心里。”“犯错误的思想根源，检查出来是我的立场是非无产阶级的……我和党的关系不是建立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

发言最后谈到对四点建议的认识，“由于上述一系列反动思想根源和立场的错误，使我提出了极其反动的那样四点建议……经过各方面的批判和帮助，经过再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我才认识到我的四点建议错误的严重性。现在，我的思想是很明确地认识了在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事业中必须要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才能完成这种很艰难复杂、曲折和巨大的历史任务”。“如果按照我的四点建议作，那就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取消党的领导，那就会限制党在政策思想方面的领导，那就会把党放在国家之下，而不是成为国

¹ 《人民日报》1957年6月6日

² 《人民日报》1957年6月19日。

家的核心力量来领导国家。”¹

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7月8日程潜的发言：坚决打垮右派分子猖狂进攻！其中揭、批民革中的右派骨干，他说：“民革中的右派分子，除了已经揭露民革中央的龙云、黄绍竑、陈铭枢、谭惕吾等人外，各地已经揭露出有二十余人。民革右派分子的反动言行的主要特征是：在发展组织问题上主张旧国民党员通通归队，……不问发展对象的政治历史和政治面貌；在肃反问题上，抹煞成绩，夸大缺点，口口声声强调‘有错必纠’，为反革命分子‘呼冤叫屈’，假和平解放台湾之名，行反对肃反之实；在接受共产党的领导方面，不是诚心实意，而是想分庭抗礼，秋色共沾，片面强调监督，却又不愿意接受共产党的监督；在贯彻‘团结、教育、改造’的方针上，只讲团结，不讲改造，只强调安排，不谈教育，不以旧社会的官僚军阀地位为可耻，反而沾沾自喜，以此作为争取安排的条件；在‘关心’农民生活的假幌子下，为地主，富农叫喊；蒙着‘爱国者’的青纱，大谈反苏滥调。上面种种表现，就它的实质来讲，都是封建地主阶级思想和资本主义思想在民革内部的反映。”²

正如李济深在9月21日《光明日报》上发表《全党动员起来，为彻底打垮右派而奋斗！》报告中指出：“民革中央和各地方的右派分子，是罪恶昭彰的，他们在资产阶级右派猖狂进攻中，形成了一个方面军。他们主要特点是企图使国民党反动派统治复辟。仅就中央情况来说，龙云、陈铭枢、黄绍竑、谭惕吾当首先就狠毒辣地向共产党进攻。龙云八年来咬牙切齿咒骂共产党，寤寐不忘地要恢复他云南王的宝座。陈铭枢一贯地野心勃勃，到处组织反动力量，甚至公然诋毁全国人民敬爱的领袖毛主席。黄绍竑用夸大缺点抹煞成绩的手段来否定党的领导。谭惕吾抛出了她的‘四点建议’，是最露骨的反党纲领。”³李济深的总结发言，完全按照党的意图揭批这些右派骨干的反动本质。

上述被揭批的言论，实质上都是正确的意见与建议，像“四点建议”体现了政治体制改革的远见卓识，可惜都被当局视为反动的右派言论加以扼杀，直到现在，政治体制改革还没有完全落实。可

¹ 《人民日报》1957年7月17日。

² 《人民日报》1957年7月8日。

³ 《光明日报》1957年9月21日。

见，政治体制改革的难度。

三、狼揭猛批民建、工商联中的右派头目

民建中央和全国工商联集中火力，狼揭猛批以章乃器为首的右派骨干分子。人民日报、新华社等大量报道或发出了这方面文章和电讯。

1957年5月中下旬、6月上中旬对章乃器的错误言行作了初步的揭批。6月13日、14日、16日，《人民日报》报道了全国工商联和民建会联席会议批判章乃器的错误思想：“胡子昂说：章乃器的错误不是偶然的，……最近我还同他进行了争论，但他一直坚持错误的观点。‘脱胎换骨’本来是形容资产阶级思想改造的很形象的比喻，章乃器却引用成‘抽筋剥皮’，以危言耸听。胡子昂认为，工商业者的思想改造正处在‘瓜将熟；水将到’的时候，章乃器认为，现在资产阶级分子同工人阶级分子已经没有区别了，这是摘未熟的瓜，拆水还没有流到的渠。这就是取消资产阶级的思想改造。因此，我们应该对这种错误思想给予严肃的斗争，不能让它流传开来。”

王光英揭露了章乃器所运用的阴谋手法。他说：“从章乃器发表的文章中，可以看出他的阴谋诡计有：一、给同他辩驳的人乱扣帽子，说他们是教条主义者；二、打、拉的战术，拉李康年、毕鸣岐，打击积极分子；三、他的言论是挂羊头卖狗肉。文章开头引用毛主席的话，下面贩卖他自己的思想。他是一贯贩运官盐加私盐，手腕很巧妙。他毒辣地想把革命的阶级观点推翻，把马列主义的理论基础推翻。他说工人阶级也有两面性，就是要神化资产阶级，丑化工人阶级。”¹

陈叔通说：“章乃器的思想在工商界已经引起了混乱。章乃器否认工人阶级的领导，也就是否认共产党的领导，他要破坏社会主义立资本主义。他的讲话带有煽动性与威胁性，例如他最近在工商界月刊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说，为什么现在还提工商业者仍然是两面性？是不是还要来一个‘五反’等等，这些话是要煽动工商界的不满情绪。陈叔通说，在我看来，章乃器的错误已不仅仅是思想，而是行动。煽动、威胁还不是行动吗？要赶快把他的面目揭开，要不然有些工商业者会被拖下水去。”²

¹ 《人民日报》1957年6月13日。

² 《新华半月刊》1957年第13号，第69页。

盛丕华说：“章乃器的重大错误，第一是他把工商业者与工人阶级并列起来，实质上是否定工人阶级的领导，使工商业者不知不觉地陷入迷途。第二，他说工商业者没有剥削，这样就不需要改造了。还认为章乃器的错误言论有挑拨的意思，使工商界和共产党疏远。他说，……如果按章乃器的话走，很可能会有非对抗性矛盾走向对抗性矛盾。”¹

“章乃器接着发言，他说大家的热情他很感激，但是从讲道理来说，不能说服他，他说这是他的老实话，要不然也可以来个假检讨。他说，大家反映下面工作不好搞了，说这是我的言论挑拨起来的，我说不不对。这是在党的‘鸣’‘放’方针下，在党的领导下自然发展起来的，许多话是整风运动引起的，不是我的文章挑拨起来的。他又说，这个时期的思想工作肯定会遇到许多新的问题，现在是从压服走向说服的阶段，要说服就要相当高的理论水平、政治水平，把这些变化说是我的文章的影响，这是没有看到形势的发展。”

“关于大家提出的对章乃器的错误言论的批判，实质上是两条路线的斗争问题，他表示不同意。他认为革命没有胜利前有领导权问题，有路线问题，今天，在革命已经胜利，宪法已经颁布，政权已经巩固，领导权和路线都不会发生任何问题。可能有人发牢骚，不满，但发牢骚是一回事，要不要党领导是另一回事。他认为应该把理论问题和政治问题区别开来，在理论上，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斗争无时无刻不在进行斗争，但在政治上还是要欢迎各种有唯心主义思想的人（如佛教、基督教），否则不利于民族大团结。他认为对某些具体问题的认识有些不同，这是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范围之内允许的，不是什么离开社会主义的道路问题，他说别人给他戴大帽子是违反实际，违反宪法精神的。”

“关于资产阶级两面性问题，他说他没有讲资产阶级没有两面性了，他认为两面性主要是思想作风上的问题，所以工商业者的改造是艰巨的长期任务。接着章乃器又一次强调了所谓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只能是先进与落后的关系。从民族资产阶级来讲，他参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比起工人阶级是落后了，以后参加社会主义革命也是落后了，但并不是反动的。他说如果大家认为说‘落后’不好，那么，叫做什么呢？关于阶级和阶级分子的关系，他仍然说阶级与阶级分子应当有所不同，这就是集体与个人的不同。阶级分子组成

¹ 《新华半月刊》1957年第13号，第69页。

阶级不仅是数量上相加，而且要起质变，如起初是零散的资本家，没有具体组织阶级本质不那么明显；到资本家组成自己的团体（如旧商会），其阶级的恶劣本质就露出来了；再进一步组成为政权，其阶级本质的危害性就大了；组成国际性的组织，危害性就更大了。他说，阶级本质是不可调和的，不可改变，而人是可以改造的。章乃器接着又说了一段值得注意的话，他说，过去由于有‘墙’有‘沟’，许多力量都在互相防范、互相摩擦、互相戒备中抵消掉了。许多旧人员、旧知识分子以及工商界的积极性还没有完全发挥出来，潜力还很大，这是过去斗争遗留下来的副作用，斗争是有成绩的，但副作用也不能否定。现在如果把‘墙’与‘沟’拆掉，能互相协作，这样，把社会主义事业加快三分之一或者四分之一的完全是完全可能的。他又说，现在工商界的主要缺点在于消极自卑。我们用实事求是的方法，把过去不大恰当的帽子去掉，这对改变工商界的消极情绪是必要的。他还说，要给工商界以平等的人格，不是给几顶大帽子，不是压服而是说服的方法来帮助他们改造。章乃器还批评有些人过去对工商界的思想改造要求过高，要求把工商业者都变成马列主义者，这是唯心主义的，是不切实际的。在他发言过程中，许多人对他的论点提出责问，他始终表示很难接受大家的意见。他说李维汉部长在中共中央统战部召开的工商界人士座谈会上的总结发言也不能说服他。”¹

6月18日、20日、28日《人民日报》报道了继续揭批章乃器等右派分子。报道说：“章乃器今天的发言，不但没有自我批评，反而责问这个联席会议是不是符合党的整风运动的精神。……他说，他怀疑目前各地工商界在开会批判章乃器到底是压服出来的还是说服出来。关于定息不是剥削的问题，他今年又解释了自己的说法，他说定息对私方个人来说，是不劳而获，而对资产阶级来讲是剥削阶级残余。……他不承认他的发言是反社会主义的，他也不承认这是两条路线的斗争。他说只有想要资本主义复辟的人才能说反动。他说，他是轻松愉快，心安理得；而别人对他的批判是‘想入非非’。他的这些发言，引起到会的人极端不满。”²

“在19日会议上，千家驹代表孙晓村、吴大琨、冯和法和他本人作了长篇的联合发言。这个联合发言对章乃器的反社会主义谬论

¹ 《新华半月刊》1957年第13号，第70页。

² 《人民日报》1957年6月18日。

作了深刻的分析和反驳。千家驹的发言着重指出章乃器的思想根源是资产阶级两面性的消极一面；它的具体表现就是在他对阶级关系、赎买政策、工商业者的进一步改造以及社会主义制度等问题的看法上。而这些看法已经不是再属于理论探讨的范畴，而是政治路线问题。他说，我们和章乃器之间所展开的斗争实质上是两条路线的斗争。”¹

6月20日《人民日报》刊登了千家驹、孙晓村、吴大琨、冯和法合写《为什么这是两条路线的斗争？——对章乃器反社会主义的批判》文章。首先表明立场和态度。“这篇文章的目的就是要批判这些错误的意见和看法，指明这种理论斗争实质上是政治斗争。为什么要这么做？我们认为章乃器的这些言论是离开了社会主义立场的。从这些言论中，可以看出章乃器的思想不是在这一问题或那一问题上的个别错误，而是集中地反映了资产阶级的消极落后的一面，也就是说，他的思想是有一定的代表性的。如果按照章乃器的主张来帮助党整风，如果按照章乃器的理论来处理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关系，来指导工商业者的改造工作，那么就要以资产阶级的面目来改造我们国家，以资本主义的道路来代替社会主义的道路。这是政治路线问题……我们就是站在这样的立场上，坚决地要与章乃器的反社会主义思想作不懈的斗争。”²

其次指出章乃器的中心思想是什么？“根据章乃器最近发表的一些言论文章，特别是‘关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问题’以及‘关于工商改造辅导工作的几个问题’这两篇文章来看，章乃器的中心思想实在已很明显。他的中心思想就是要鼓动、挑拨工商业者，使他们不要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甚至抵抗改造。他是在‘千方百计’地要工商业者永远保持资产阶级的立场而不要向劳动者转变，不要走社会主义的道路。”³

“我们认为：章乃器是在下列的四个关键性问题上，有意识地与党站在对抗地位上散布毒素的。第一、在资产阶级的两面性问题上。章乃器认为党所指出的工商业者在全行业公私合营以后依然具有两面性这一点乃是一种‘教条主义’。第二，章乃器为了要在实质上反对工商界接受社会主义改造，他总是千方百计地把资产阶级

¹ 《新华半月刊》1957年第14号，第97页。

² 《人民日报》1957年6月20日。

³ 《人民日报》1957年6月20日。

与工人之间的阶级区别混淆起来。第三，章乃器在定息的性质和资产阶级本质改造两个问题上，更露骨地企图掩蔽剥削和阶级差别。他还干脆否认‘定息’是‘剥削’，而是不劳而获的收入。第四，我国应走资本主义的道路还是应走社会主义的道路上，章乃器的论点更是特别值得注意的。根据以上所说，我们可以看出，章乃器的一系列荒谬言论的目的，是要从理论上模糊民族资产阶级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认识。但如果认为今天章乃器的错误还仅仅只是纯理论范围内的错误那么就未免太天真了。章乃器的真正意图，乃是在打起反教条主义、甚至假借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旗帜来歌颂资本主义，挑拨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之间的感情，煽动资产阶级从根本上反对接受党的领导、走社会主义的道路，因此，这就成为两条路线上的斗争，是政治上的斗争。章乃器在实质上是主张走资本主义的道路而不是走社会主义的道路。”¹

文章最后指出两条路线斗争的实质。“以章乃器为代表的右派分子，正是要利用今天我国民族资产阶级已经没有两面性，即使有的话，也同工人阶级一样，只有先进与落后的区别，其目的就是要抹煞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阶级区别。因为既然阶级区别已不复存在，那自然就无所谓工人阶级的领导了。他主张在合营企业中不宜强调公方与私方，党与非党的区别等等，这一切都是为了混淆阶级界限，从实质上取消工人阶级领导。章乃器这种主张如果得到胜利，那就等于否定了我国的宪法中以工人阶级为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庄严的规定。不仅如此，章乃器还企图进一步证明我国的资产阶级‘进入了社会主义，比那些赤手空拳、贴标语、喊口号的人进入社会主义要好些’。同时中国的资产阶级不是比工人阶级具有更高的文化、生产技术、经营管理经验吗？自然，这就不是工人阶级领导资产阶级的问题，倒是应该由资产阶级领导工人群众了。……章乃器不是已经说过社会主义加官僚主义比资本主义更坏吗，他不是一再讴歌资本主义的经营效率高吗。那么，章乃器理论的逻辑当然是应该以资本主义来代替社会主义，以资产阶级来领导工人阶级了。”²

7月12日，李烛尘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控诉章乃器等右派分子的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行的发言。首先控诉说：

¹ 《人民日报》1957年6月20日。

² 《人民日报》1957年6月20日。

他是犯了严重地反社会主义改造的罪行。“章乃器一贯地使用两面派的手法，在文章和发言中，他肆无忌惮地使用这种说法来达到鼓动工商界反对社会主义改造的目的。”“根据最近各方面人士的揭发，章乃器使用各种伎俩，极尽打击拉拢的能事，阴暗地在搞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小集团’活动，企图达到资本主义复辟的目的。他还恬不知耻的说他是‘左派’，真是无耻之极。”

其次，发言指出章乃器等右派散播的毒素。“第一、章乃器等右派分子不要工商界接受改造。第二、右派分子教工商界否认工人阶级的领导。第三、右派分子教工商界否认剥削。第四、右派分子挑拨离间工商界与党和政府的关系，要我们反对党的领导，要我们放弃走社会主义的道路。”

最后，发言提出警告。“我要再一次警告章乃器，章乃器今天已经不是有利于社会主义改造和有利于巩固党的领导问题，而是反对社会主义、反对党的领导，且已经成为不是处理人民内部问题了！”

“在帮助党整风期间，也是天夺其魄，敢于在群众雪亮的眼睛前胡说八道，那自然就把你的丑恶面目自行暴露了。但在反右派斗争中，无论大会小会经过群众的揭发，章乃器竟悍然无动于衷，顽强骄横拒不交待。民建和工商联两常委会对他均已作了停职检讨的处分，但他迄今尚置之不理。章乃器在右派分子中可谓无赖之尤，无耻之极。”“章乃器如不可理喻拒不交待，我们当然不愿压服你，民建、工商联两常委会，将要求政府彻底检查依法制裁。何去何从待你自决。”¹

7月15日，章乃器在全国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作了《我的检讨》发言：说：“我是一个犯错误的人。我的错误的性质，是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思想和作风。的确，在解放前，个人英雄主义对我是起了一些有益作用的。……在1952年，我曾经批判了我的个人主义。……今后是无论如何都要不得的了。”接着发言称自己在思想上属于右派：“一个犯有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思想的人，他在思想战线上肯定是属于右派的。但我经深刻检查，我同那些在政治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是没有任何共同之点的。”“八年来，我的言论和行动同那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的确是毫无相同之处的。八年来，我对党所提出的方针、政策，

¹ 《人民日报》1957年7月15日。

是没有任何怀疑的。不但没有怀疑，而且往往还觉得是出于意外的好。”“我绝不会反党、反社会主义。我到死都是忠于社会主义的。”

发言最后说：“在今天，我相信：‘真金不怕火’；有了共产党的领导，一定可以明是非。我始终认为，我的问题只是思想的问题；我的错误只是理论上的错误。当然，如果我的理论错误已经造成了超出时代思潮影响所可能引起的波动，那我应该负责。”¹

8月13日，《人民日报》报道了《粮食部开大会批判章乃器》。报道说：“他自称他‘今天的检查比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上的检讨有所提高’，他又说‘今天主要是思想检查’，对于各方面过去揭露的许多具体问题，他说他‘已经写成文章，准备印发给大家’。在这种狂妄的态度下，他的通篇发言都是在玩弄名词，根本没有检查他过去一系列的反动言行。他把自己的全部错误轻描淡写地解释为‘由于政治修养差，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得到发展，今年5、6月共产党宣布整风后达到了最高峰，主要表现是骄傲自满，自以为是，有时达到狂妄的地步，还有一些无组织、无纪律的情绪。’他对过去歪曲解释‘共产党员是特殊材料制成的’，诬蔑共产党有‘大党主义’和他在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定息的性质、阶级关系同共事关系等问题上发表的一系列谬论，只认为‘作为个人来讲，不应该在这些有关国际关系、阶级关系和涉及到党和国家的原则性问题上，公开发表意见。’²

“章乃器又借口所谓‘个人主义思想根源’，把他的一些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行归之于‘片面性’。他说他思想上的片面性主要是‘片面乐观’。他说由于他‘思想的片面性，反对教条主义就容易不自觉记走向修正主义、反对特权思想也就容易发展到反对一切权威。’章乃器在谈到他对民主党派看法时，又一次宣扬了他的右派谬论，他说，他‘一贯认为民主党派态度应该比共产党右一些，大家的论调都跟共产党一样就不能影响中间、落后，也不能联系他们。’他说‘我曾经说过：‘只求对革命有利，不怕当右派’，但是由于思想上的片面性，也可能是太右了。乃器在会上继续为自己涂脂抹粉，他说他‘对工农分子的感情，比对知识分子的好’。他把自己说得‘没有一件事不可以向党、向人民公开，没有一件事不可告人’。他要无赖地说，他‘是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是‘有

¹ 《人民日报》1957年7月16日。

² 《人民日报》1957年8月13日。

意识地，还是无意识地’，他自己‘分不清’，他要求粮食部的同志帮助他检查。章乃器还多次在‘动机和效果’‘主观和客观’等名词上兜了许多圈子。他的这种执迷不悟坚决顽抗的态度，引起到会的人极端愤怒。”¹

9月10日《今日新闻》发表陈叔通《在民建会和工商联联席会议上的报告》，报告指出章乃器是工商界中的右派骨干典型：“在工商界右派分子之中，章乃器是他们中骨干分子的典型，在政治立场上坚决地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在组织上采取各种方法扩大右派在我们会内的组织基础和窃取、篡夺领导权。他们有言论、有行动，政治野心很大，手段很毒辣，这些是右派骨干的特点。右派分子进行罪恶活动的时候，有时采取比较隐蔽的方式。以章乃器为例，他对于工商界乃至一般社会有着长期的欺骗性，他披着进步的民主人士甚至马列主义的外衣，一贯进行他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恶活动。他玩弄着极其阴狠的两面派手法：例如他实质上是反对马列主义，但是偏偏打着反对教条主义的幌子；他明明是在攻击党组织和党员，但是他偏偏打着反对宗派主义的幌子；他不像储安平那样以‘党天下’来攻击党，但他用了更加恶毒的、容易蒙蔽人的‘大党主义’的暗箭；他并不公开地反对社会主义制度，而是恶毒地说官僚主义是比资本主义更危险的敌人；他不像李康年那样地主张定息二十年，而是发表一种定息不是剥削的‘理论’；他也不喊出反对思想改造的口号，而是坚持他所谓资产阶级没有两面性以及资本家同工人没有本质上的区别的看法。等等。”²

民建会和工商联对章乃器发起历史地揭露和批判。9月21日《大公报》发表了千家驹、吴大琨、冯和法、王达夫、何尊梅揭露《章乃器是反共反人民的老手》文章。开头就说：“来看看章乃器是怎样一副丑恶的面目。”具体有以下几方面：“（一）章乃器就在1927年蒋介石背叛革命之后，就号召一切反共势力团结起来，进行‘彻底的有效的反共’。”“（二）在抗日战争以后，章乃器背叛救国会，发表了臭名远扬的‘少号召、多建议’的主张，继续进行反共的阴谋。”“（三）他无耻地颂扬国民党的所谓‘一个主义、一个政府、一个领袖’，为消灭中国共产党的阴谋作掩护。”“（四）他竭力为国民党反动派的恶性通货膨胀辩护，建议国民党反动派采

¹ 《人民日报》1957年8月13日。

² 《新华半月刊》1957年第19号第50页。

用希特勒的办法，建立经济上的法西斯统治，维护官僚资产阶级的利益。”“（五）不仅如此，章乃器为了巩固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还不惜主张出卖民族利益，向美帝国主义大借款。”¹

文章结论：“章乃器是惯于在自己脸上贴金的。他说自己是什么‘在资本主义泥坑里追求社会主义’的人。是什么‘出污泥而不染的光明磊落’的人。是什么‘爱护党等于爱护自己眼珠一样’的人，是什么‘死了把骨头烧成灰也找不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东西’的人。但是，历史是最无情的，事实胜于一切雄辩，章乃器在人大大会发言中仍以‘曾参杀人’的故事来诬蔑揭发他的丑恶罪行的人们，他还企图把铁证如山的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事实全部赖掉。自然，这是徒劳。……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这个自称‘出污泥而不染’的章乃器，原来是一个三十年来彻底反共的家伙，是一个披着民族资产阶级的外衣而混进了新中国来的官僚资产阶级的‘忠臣孝子’。”²

“又‘章乃器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老手！’”³毛泽东早就称“右派的老祖宗就是章伯钧、罗隆基、章乃器”。⁴

揭、批毕鸣歧的言行。毕鸣歧时任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副主席，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常委，民建（右派分子）。1957年6月18日，《人民日报》报道了毕鸣歧从自己的思想检查谈到他对章乃器错误言论的认识：“他说：我在统战部召开的工商界人士座谈会上的四次发言中有几点错误，如把民族资产阶级进步的一面作了过高的估计，而把消极的一面又脱离实际地低估了。这是由于我认为把生产资料交出去是主要的，把思想改造看做是次要的，这等于叫工商界放松思想改造；再如我在发言中说：‘绝大多数的民族资本家终于走上了今天这个历史新阶段，把私营企业改造为社会主义企业了，在这一段社会主义改造历史中，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是伟大的’，这些话和章乃器所说的‘红色资产阶级’曲子虽然不同，而调子是相同的，这就等于说民族资产阶级可以自发地走向社会主义。毕鸣歧说，我还说‘同是主人没有客，同在社会主义领域中’这句话就

¹ 《大公报》1957年9月21日。

² 《大公报》1957年9月21日。

³ 《新华半月刊》1957年第20号，第34-40页。

⁴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48页。

像要和工人阶级分庭抗礼了。”

“毕鸣歧在分析和检查自己上述论点的思想根源后，接着谈到他对章乃器的错误言论的认识。他说：章乃器的思想言论，实质上是否定工人阶级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虽然口口声声说社会主义制度是优越的，但他却说（章乃器说）由于‘三害’的存在，所以社会主义企业就不如现代化的资本主义企业会有较高的工作效率。照章乃器这样说法社会主义就没有优越性了，反而资本主义倒有优越性。这是闭着眼睛不看事实，也是歪曲了现实。毕鸣歧说，章乃器在若干论点中企图煽动和挑拨离间民族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关系，利用工商界的动摇性来使工商界不能平平稳稳地一心一意地跟着共产党走社会主义道路，这是非常恶毒的。”¹

7月6日、14日《人民日报》综合报道了对毕鸣歧反动言行的揭发和批判。天津市工商联执行委员会乔维熊汇报对毕鸣歧斗争情况：“他说，天津工商联和民建会已成立联合办公室，对毕鸣歧的反社会主义言行展开了斗争，天津工商业者认为毕鸣歧的反动言论跟章乃器的论调一模一样，是章乃器资本主义的批发商。毕鸣歧和章乃器是怎样一唱一和、互相呼应呢？乔维熊指出了三个主要方面：

（一）关于资产阶级本质的认识方面：章乃器说：‘经过‘五反’和全行业合营高潮，工商业者交出了生产资料，如仍教条主义地强调两面性，只对工商业者自我改造的信心有很大影响’，‘目前我国所有阶级的特性已经消灭’。毕鸣歧则说：‘各地私方人员存在着自卑感，最主要的是从阶级关系来的’。

（二）关于公私共事关系方面：章乃器说：‘在工作中，不宜强调公方和私方的界限’。毕鸣歧说：‘同是主人没有客，同在社会主义领域中’。天津工商业者董少臣提出‘撤出公方代表’的意见后，对毕鸣歧说：‘毕主委，我给你闯下祸来啦！’毕鸣歧支持他说：‘没关系’。

（三）关于借帮助党整风为名，抗拒社会主义改造方面：章乃器说：‘官僚主义是比资本主义更危险的敌人’，‘我并不是留恋资本主义，但资本主义也有好有坏’。毕鸣歧说：‘民族资产阶级的自卑感是由于阶级关系，不是取消阶级关系是由于党政干部的宗

¹ 《人民日报》1957年6月18日。

派主义的情绪和作风’。”¹

会上还有天津市工商联副主任委员王光英、朱继圣都发言，要毕鸣歧检查交待。毕鸣歧第一次的空洞的检讨，遭到与会者的批评。今天毕鸣歧作了第二次检查，他说，“他在教会学校毕业后，就在洋行当买办，帮助帝国主义剥削中国人民，因为他有极端个人主义思想、名利观念和虚荣心。解放以前爱的是钱，在解放以后特别是全行业合营以后，名誉地位观念很重。他的工作表面上是积极的，但骨子里却有严重的自私自利的打算；表面上是以走社会主义道路的进步分子自居，实际上是个假君子，假进步，脑子里装的是资本主义腐朽思想。他在检查中列举的几个事例都是大家已揭发的。”“陈叔通、李烛尘等在会上讲了话，他们指出毕鸣歧的检讨很狡猾，人家说一句他答一句，说小不说大，谈一般不谈重要的，一方面为自己辩解，一方面又批评别人。只承认思想问题，不交代最重要的事实……他们要求毕鸣歧在会后再深思猛醒，及时回头。”²

7月12日，王光英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作了题为《毕鸣歧同章乃器臭味相投》的发言：“毕鸣歧在党的整风期间，利用向党提意见的机会，发表了一系列反对工人阶级领导、反对社会主义改造的荒谬言论。这些言论和章乃器是一唱一和，完全同调的。尽管他曾经在小组会上一再矢口否认他和章乃器一样。但是，事实是最好的答复。章乃器说：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是红色‘资产阶级’。毕鸣歧就说：‘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是伟大的’。章乃器说，资本家已经过了‘五关’，如果还要脱胎换骨，只能使工商界增加无穷的忧虑。毕鸣歧就说：资本家以矫健的鲤鱼跳龙门式跳入了社会主义，没想到这顶阶级帽子还戴着，阶级关系还那么强调着，两面性还那么原封不动地严重。章乃器说：在全行业合营以后，工商业家的两面性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毕鸣歧就提出：资产阶级把生产资料交出以后，对资产阶级的改造不是基本胜利，而是完全胜利，如果这时还不加分析地说阶级关系存在，两面性存在，那就是教条主义的方式。章乃器说：‘合营企业中，不宜强调公方和私方的界限，也不宜强调党与非党的关系，否则，有职有权，是无法保证的，共事关系也是不可能搞好的’。毕鸣歧就说：‘资产阶级的

¹ 《人民日报》1957年7月6日。

² 《人民日报》1957年7月14日。

自卑感应由政府机关和企业中的党政干部负更大责任’，‘要消灭自卑感，首先应当消灭阶级’。章乃器说：资产阶级的分子和工人阶级的分子没有本质区别。毕鸣歧就说，‘资本家和工人今天在生产体系中的地位是没有什么区别的。惟一的差别就是工人没有定息，资本家有定息’。章乃器主张整风的时候完全可以不提优点，只提缺点。毕鸣歧也说，‘不要总是有成绩，有缺点。这个总结方法是养成官僚主义的总结方法’。章乃器说，他当粮食部长，有职有权是斗争来的。毕鸣歧也认为他当天津市副市长和全国工商联副主任委员是争出来的。”¹

王光英说：“毕鸣歧发表这些谬论的目的是什么呢？他认为：在各项问题中，对资产阶级的估计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因为对资产阶级的估计是和党的政策有密切联系的。改变了党对资产阶级的估计，就有可能改变对待资产阶级的政策。因此，他拼命在这个问题上作文章，力图通过这次争论，来动摇党对资产阶级改造的政策。幻想使党的政策作某种有利于资产阶级落后性的改变，以利于他篡夺工人阶级的领导权。在这个问题上，毕鸣歧所走的路线是这样的：第一、夸大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特殊性，夸大民族资产阶级的进步一面。批评党低估了他们，没有给他们应有的地位和权力，力图争得更高的地位和更大的权力。第二、强调资产阶级改造得已经和工人阶级差不多，拒绝进一步改造。力图模糊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思想界限，以便混入工人阶级的队伍，乘机混水摸鱼。第三、当他混入工人阶级的队伍，取得更高的地位和更大的权力以后，必然篡夺工人阶级的领导，以便按照资产阶级的面目来改造世界，复辟资本主义。”²

王光英揭发说：“毕鸣歧身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天津市副市长、政协天津市委员会副主席、全国工商联副主委、天津工商联主委，身兼数职……他代表的是资产阶级反动的、倒退的‘利益’。他代表了资产阶级，美化了自己，看不起工人阶级，不甘心退出历史舞台的‘利益’。他代表了资产阶级不安于现在所处的地位，抗拒社会主义改造，抗拒党的领导的‘利益’。他企图煽起资产阶级的不满，组织起阶级的队伍向党进攻。并从这种进攻中达到

¹ 《人民日报》1957年7月16日。

² 《人民日报》1957年7月16日。

自己卑劣的可耻的个人目的。这就是毕鸣歧的动机。”¹

8月29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各民主党派的严重任务》社论。指出:“各民主党派主要是民族资产阶级和他们的知识分子的政党,在民主革命阶段,在社会主义革命阶段,都不能不集中地反映这个阶级的两面性和政治分野。”“在过去几年中……就已经看得见有许多人希望长期保持‘新民主主义秩序’,使‘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各得其所’,实际上就是不要推进社会主义革命,而让资本主义得以自由发展,使中国逐步演变成为资产阶级共和国。”“各民主党派中的右派分子,从历史上看,有几种人。一种是民主革命阶段中间路线的倡导者和支持者。中间路线就是不要共产党领导,就是要搞资产阶级共和国。”“一种人是本来属于反动统治集团,直到人民革命胜利前后才投到人民方面来,却没有接受改造的人物。有些人则是右派分子新拉进来的反动分子。这几种人都是反共反人民的老手。”“经过较量,右派失败了。”

接着指出:“任何政党本身都不是目的,而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手段,不是为社会主义服务,就是为资本主义服务。”“但就现状说,各民主党派在总的方面还是资产阶级性质的政党,还没有成为真正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治力量。这里有一个不小的距离,就是说有一个大矛盾。要克服这个矛盾,只有进行根本性的自我改造。”“什么是改造的标准?毛泽东‘提出了判别是非的六条标准,其中最主要的是社会主义道路和共产党领导两条。这是我国政治生活中的根本标准,自然也是各民主党派进行自我改造的根本标准。”“只有真正在共产党领导下,依靠左派,团结和教育中间派向左走,孤立,分化右派,为社会主义服务,才是各民主党派惟一正确的路线和惟一的出路,才有长期共存和互相监督。”

社论最后指出:各民主党派“批判右派是整风运动的主要关键和决定性步骤,是各民主党派进行根本改造的转折点。”“各民主党派当前的迫切任务,就是要在中央和省、市领导机关继续深入斗争的同时,积极和有步骤地把斗争深入到一切基层组织去,为了揭发一切右派分子,取得全胜,为了从斗争中深刻教育广大的成员,为了澄清基层组织的政治面貌,这是完全必要的。”“为了深入批判右派的斗争,各民主党派的整风领导必须有坚定的立场。认为家丑不可外扬,而姑息养奸,养痍贻患,这种根本错误的立场,是批

¹ 《人民日报》1957年7月16日。

判右派的斗争的重大障碍，必须立即切实扭转过来。”¹

这篇社论是要各民主党派按照判断是非的六条标准、认真改造，接受共产党领导，积极深入反复地抓各民主党派基层中的右派分子，深入批判各民主党派中的右派分子。

毛泽东亲自指挥参与批判、打击和讨伐“右派的老祖宗”和民盟、民革、农工民主党、民建会中与“老祖宗”相关联的右派头面人物，有计划、有目的动员民主党派中的左派人士、民主党派中不公开的共产党员、知情人士、专家学者（或者称为理论爆破手）以及党报党刊的记者，对右派人士进行批判分析、揭发（实为乱扣帽子、打棍子、无限上纲、无中生有）和歪曲报道；还动员工人农民中的劳模、先进工作者和积极分子对“右派老祖宗”及其骨干进行声讨、攻击和控诉。右派们在这些声势强大的口诛笔伐的形势下，按照上面指定的调子去向人民检讨、认错、认罪和投降。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认罪，正如章伯钧所说的：“难道让上面认错吗？我不认错，这个运动能收场吗？再不收场，扩大蔓延下去，到了乡镇小城就是抓人、坐牢、杀头，老罗和乃器哪有我清楚。”²可是“罗隆基、章乃器就是死不投降”，连毛泽东也只好说：“他们人数很少，摆到那里，摆他几十年。”³如果说前者是出于威逼之下的一种无奈，或者说不愿因己而祸及无辜，那么后者则体现了一种为真理斗争而视死如归的风骨。

经过无情地“歼灭性打击”，反右派斗争取得了重大“成果”。据不完全统计，遭受打击的“章罗同盟”右派骨干分子共 89 人，都是些民盟中央和省市负责人。其中 2 名中央副主席，12 名中常委，35 名中央委员，13 名中央候补委员。待反右结束，3 万多人的中国民主同盟，就有 5000 多人被划为右派。所以，民盟成为反右的“重灾区”。其他民主党派也成为程度不同的“灾区”，民革划出右派分子 439 人，其中有一名副主席龙云。全国工商联系统揪出 302 名右派分子，其中有工商联副主任委员章乃器、毕鸣歧。还揪出农工民主党副主席黄琪翔，民进中央副主席林汉达，中国致公党主席陈其尤，台湾自治同盟主席谢雪红等右派分子。但斗争远未结束，还要在其他领域内进行深挖。

¹ 《人民日报》1957 年 8 月 29 日。

² 牛汉、邓九平主编《六月雪》第 269 页。

³ 《毛泽东选集》第 5 卷第 491 页。

第四章 反右派斗争【下】

第一节 深入反右

自从先挖出“章罗同盟”并进行“歼灭性打击”，取得了对“章罗同盟”及其有关右派骨干和各民主党派、工商联的右派头目揭、批、斗的阶段性的重大“战果”以后，七月中旬开始，反右派斗争引向深入，从党外转向党内，从中央转向地方，从大知识分子转向中小学教师，从普通知识分子转向工人、农民中的自发资本主义势力，挖掘右派分子（进行社会主义教育，不给工人、农民戴右派分子帽子）。在此期间，毛泽东和党中央进一步部署深入反右派斗争战略和策略，要求各级党组织贯彻执行，争取进一步扩大反右派斗争的“战果”。

一、毛泽东部署深入反右

毛泽东亲自部署反右派斗争一个多月后，总结了反右派斗争的形势，七月中旬，中共中央在青岛召开各省市委书记会议，进一步部署反右派斗争，毛泽东写了《1957年夏季的形势》一文，印发与会者讨论，这篇文章是部署下一步反右派斗争的重要文件。

《1957年夏季的形势》是毛泽东亲自部署深入反右的指导性文件，现将主要论点摘录如下：拔高和具体化了反右斗争的性质。7月9日，毛泽东在《打退资产阶级右派的进攻》讲话中提出：“这次反右派斗争的性质，主要是政治斗争，……思想斗争的成份有没有呢？有，但我看政治斗争占主要成份。”¹在《1957年夏季的形势》一文中，拔高和具体化了反右派斗争的性质。毛泽东指出：“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和人民的矛盾是敌我矛盾，是对抗性的不可调和的你死我活的矛盾。”²

为“引蛇出洞”策略叫好：“向工人阶级和共产党举行猖狂进攻的资产阶级右派是反动派、反革命派。不这样叫，而叫右派，一是为了便于争取中间派；二是为了便于分化右派，使一部分右派分子有可能转变过来。”“在两三个星期内，各单位的领导者对于右派的猖狂进攻，硬着头皮，只听不驳，聚精会神，分析研究，聚集力量，准备反攻，团结左派，争取中间派，孤立右派，这是一套很

¹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45页

²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56页

好的马克思主义的策略。”

规定整风的目标：“我们的目标，是想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以利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较易于克服困难，较快地建设我国的现代工业和现代农业，党和国家较为巩固，较为能够经受风险。”

清除党团内的右派：“这里所说的资产阶级右派，包括混入共产党内和青年团内的一些同党外团外右派分子政治面貌完全相同的人，他们背叛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向党猖狂进攻，因此必须充分揭露，并把他们开除出去，借以纯洁党团组织。”

批判富裕中农的资本主义思想：“我赞成迅即由中央发出一个指示，向全体农村人口进行一次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教育，批判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思想，批判某些干部的本位主义思想，批判富裕中农的资本主义思想和个人主义思想，打击地富的反革命行为。其中的主要锋芒是向着动摇的富裕中农，对他们的资本主义思想进行一次说理斗争。”

提出政治思想战线的革命新口号：“这一次批判资产阶级右派的意义，不要估计小了。这是一个在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单有一九五六年在经济战线上（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够的，并且是不巩固的。匈牙利事件就是证明。必须还有一个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

部署深入挖掘右派的任务：“第一个决定性的战斗，在过去几个月，主要是最近两个月内，我们已经胜利了。但是还需要几个月深入挖掘的时间，取得全胜，决不可以草率收兵。要知道，如果这一仗不打胜，社会主义是没有希望的。”

提出全民整风的任务：“民主党派、教育界、新闻界、科技界、文艺界、卫生界、工商界、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各阶层、手工业工人和其他城乡劳动者，都应当进行整风和社会主义教育，分期分批逐步推行。其中，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使他们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问题；小资产阶级，特别是富裕中农，也是使他们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问题；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基本队伍，则是整顿作风的问题。这是性质不同的两个社会范畴的问题，既然有这样的不同，为什么通用整风这个口号呢？这是因为整风的口号较易为多数

人所接受。”¹

这里毛泽东总结反右派斗争新经验，提出深入挖掘、全民整风两大任务和政治思想战线上社会主义革命的口号，用来解决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以此达到那种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的目标。然而，经过整风和反右派斗争的实践，这个目标实现没有呢，用薄一波的话说：“这个‘目标’……不仅没有能够实现，反而变得更糟了。”²更糟到为混淆敌我矛盾和阶级斗争进一步扩大化提供了理论和政策的支持，其后患无穷。学术界对《1957年夏季的形势》一文有以下评述：“从总体上看，这篇文章表现出的是一种‘左’的倾向，即过分地强调了阶级斗争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并把一些人民内部的思想认识问题夸大为敌对阶级间的阶级斗争。在实践中，毛泽东提出的政治目标和发展生产力的任务，与激烈的阶级斗争手段是无法统一起来的，即是说，毛泽东正确地提出了整风的政治目标和发展生产力的任务，但紧接着又用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为这个目标和这一任务设置了严重的障碍。由于目标、任务与手段的冲突，在以后阶级斗争的实践中，毛泽东所向往的那些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就仿佛是一种‘海市蜃楼’般的幻影，可望而不可即。”³这就是说，目标任务被手段冲垮了，实际上，那个目标本来就是一个空想的，难于实现的幻想。

为落实《1957年夏季的形势》的主要精神，部署在党内挖右派，清除党内不同意见和政见者，《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系列社论，具体指导深入反右。7月2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反右派斗争是对于每个共产党员重大考验》社论：“有一些好心的同志似乎认为右派分子只有党外才有，只有在资产阶级、民主党派和没有经过改造的知识分子队伍中才有，而在共产党内部是不会有有的。可是这个看法不符合事实。各地在反右派斗争中已经揭发出许多党内的右派分子了。”“但是不能否认，也有一部分党员的立场却并不是明确的坚定的，他们在这样严重的斗争中认识模糊，态度软弱；还有极少数的人虽然挂着‘共产党员’的招牌，实际上却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当资产阶级右派向党进攻的时候，他们成了可耻的内

¹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56-465页。

² 薄一波著：《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册，第622-623页。

³ 郭德宏主编《中国共产党的历程》第2卷，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282页

应。”“可见现在还有少数人觉得对党内的右派分子似乎可以宽容些，不必要像对待党外右派一样地给以反击，这种意见是错误的。对党外右派不能有温情主义，对党内的右派分子同样不能有温情主义。谁都知道，堡垒最容易从内部夺取。如果党的核心瓦解了，无产阶级领导权丧失了，堡垒就可以不攻自破了。为了使党的肌体不被右派分子腐蚀，为了保持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的纯洁，必须对党内外右派分子‘一视同仁’地展开斗争。”¹这是号召从党内抓右派分子，斗右派分子。

1957年8月1日，毛泽东亲自起草《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深入开展反右斗争的指示》，全文如下：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一）在深入揭发右派分子的斗争中，现在一方面正向地县两级（在城市是向区级和大工矿基层）展开，一方面又必须在中央一级和省市区一级各单位深入地加以挖掘。这样，右派分子将继续发现和挖掘出来，人数将逐步增加。右派中的极右分子，即骨干分子，登报的人数，也应适当增加。不是百分之几，也不是百分之十，而是要按情况达到极右派的百分之二十、三十、四十或五十。他们既是右派，既是实事求是地鉴定了的极右派（不是普通右派分子），多一个人在报上，揭露他们的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反动言行，使他们在公众面前出丑，就会越有利于教育广大群众，争取中间派，也有利于分化右派。这一点必须坚持，不要犹豫。（二）深入挖掘期间，必须实事求是，有些单位右派少，或者确无右派，就不要主观主义地勉强去找右派。（三）要准确地鉴定极右派、普通右派和中间偏右分子这三种人的界限，以免泛滥无归，陷入被动，丧失同情。此点必须注意。（四）反右派斗争，必须坚持辩论方式，摆事实，讲道理。而且事实要是准确的事实，不是虚构的‘事实’，讲道理要讲得使大多数人心服，切不可强词夺理。（五）地县两级、城市区级及工厂基层的领导人经验较少，有些人鉴别水平不高，你们必须谆谆给以教育，随时检查，使他们站得稳、打得准。这是要十分注意的。（六）党内团内右派分子，只要是同党外团外右派分子政治面目相同，即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向党猖狂进攻的，必须一视同仁，一律批判。该登报的，即应登报。（七）深入挖掘时期，党和政府工作中错误缺点，边整边改，取信于人，十分重要。这点请你们同样加以注

¹ 《人民日报》1957年7月28日。

意。¹这是一份深挖隐藏右派的文件，其中以一六两项最为重要，其余都是点缀。

8月16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使斗争深入，再深入！》的社论，指出：“目前中央一级和省、市、自治区一级各单位的斗争正在深入发展；专区和县一级机关，城市区一级的机关，大的工厂矿山，中等学校和工商界，斗争也正在逐步展开。”“在斗争深入发展的地方，总起来说，新发现的右派分子比前一阶段所已经揭发的，不是减少了，而是大大增加了。一部分躲在幕后策划的右派骨干分子，以及潜伏在共产党内、共青团内的右派分子，陆续暴露出来了。”“但是斗争的发展是不平衡的。”“大部分单位还正在高潮，需要继续扩展和深入；也有一部分单位对右派分子的挖掘、揭露和批判还很不够，即不广，也不深，总之是没有搞透；有些单位的领导者甚至还有草率收兵的思想。总的看来，目前的任务就是要使斗争在全国普遍的展开，而在一些已经展开斗争的单位，要使斗争普遍地深入。”接着指出：“为什么一部分单位的斗争还没有深入呢？主要原因，是这些单位的领导人员对反右派斗争的伟大历史意义仍然认识不够，或者是缺乏认真的具体的领导。反右派斗争是我国过渡时期不可避免的阶级斗争，是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因此，我们必须在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首先在政治界、教育界、新闻界、科学技术界、文化艺术界、卫生部、工商界，全面巩固地树立无产阶级的党的领导，取得社会主义道路对于资本主义道路的彻底胜利。”再次指出：“不少单位的反右派斗争没有深入，是由于那里的主要负责人对于斗争没有认真负责，那里的领导骨干和积极分子满足于空喊斗争口号，企图用简单化的方法解决问题。”“为了深入反右派斗争，为了在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取得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必须对于右派分子特别是右派骨干分子进行彻底的批判和揭露，不要让他们蒙混‘过关’。姑息养奸，养痍贻患，这不但对于社会主义事业不利……对右派分子的改造也不利。”“不积极参加和领导反右派斗争，是右倾思想的表现”。“全体参加反右派斗争的人们，都应该争取这一斗争的深入再深入。”²这是一篇号召党的各级领导、负责人克服右倾思想，认真落实反右派斗争深入抓右派，狠狠斗右派的社论。

¹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第556-557页。

² 《人民日报》1957年8月16日。

为有利于深入挖掘，中央先后发出两次指示。8月29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对右派分子不易过早地作组织处理指示》：文件认为：“目前反右派斗争正在继续开展和深入，对于右派分子的斗争，应是从政治上和思想上进行彻底揭露把他们搞臭，但还不宜过早地作组织处理，因为这样做会使斗争简单化，不利于运动的深入和开展。”¹

9月2日，中共中央又发布《关于严肃对待党内右派分子问题的指示》。全文如下：“随着反右派斗争在全国各地、各界的深入开展，党内的右派分子也更多地暴露出来，根据目前的统计，已经发现出来的党内右派分子约三千余人。党内的右派分子，多数是解放前后入党的，也有不少是一、二十年以上党龄的老党员。应该看到，从党内发现出这些右派分子，是这次反右派斗争的很大成绩，这对于我们党的巩固和纯洁，具有重大的意义。但是，现在还有一些同志，在反对党内右派分子斗争中，存在着比较严重的温情主义。特别是在中央肯定了右派性质和对党内右派分子的党籍采取从严的方针之后。他们对于同党外右派分子政治面貌完全相同的‘党员’，往往姑息宽容，不愿意把他们划为右派，特别是对一些应该划为右派的老党员，更加惋惜，心软，下不了手。有的单位甚至因此影响了反右派斗争的深入和开展。显然，这是完全错误的。应该指出，在运动中，对于一个党员应否划为右派，应该同党外人士应否划为右派分子一样，采取非常慎重的态度，对于党龄较老的党员尤其应该如此。但是，既然他的言行同党外右派分子一样就没有理由不根据一视同仁的原则，把他们同样地划为右派分子。并与之进行坚决的斗争。必须了解，党内右派分子有着‘共产党员’的招牌，有较多的政治资本，因而也就容易欺骗、蒙蔽和影响群众。同时，他们又和党外右派分子相呼应，相配合，从堡垒内部向党进攻，因而对党的危害就更加严重。这种党内右派分子，他们的党龄愈长，职位愈高，对党的危害就愈大。因此，对于那些同党外右派分子政治面貌完全相同的人，决不应该因为他们是党员而有所宽容，决不应该漏掉真正的党内右派分子。因为这样，不但对于开展反右派斗争是不利的，而对于纯洁党的队伍和提高党的战斗力，是尤其有害的。”²

9月4日，中共中央下发《关于在工人、农民中不划右派分子

¹ 转引朱地著：《1957：大转弯之迷》，第228页。

² 转引叶永烈《反右派始末》第551-552页。

通知》。全文如下：“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另印发北京各单位）现在农村中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和工厂中的整风运动正在逐步开展，不少地方来问在农民和工人中要不要划右派分子。中央认为，在农村中，对于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没有改变成分的，即照原来的帽子，但不要叫右派分子。富裕中农的资本主义思想应当批判，不要戴右派分子的帽子。工厂中科室以上的干部和技术人员可以划右派分子，在工人中间则只定先进、中间、落后的界限，不作左中右的划分，是阶级异己分子、反革命分子、流氓分子、坏分子的，可按各人具体情况加以确定，但都不用右派分子的名称。工人、农民中已经划了右派分子的，应当改正，此点望即通知工厂和农村中的党的基层组织。”¹

9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自然科学方面反右派斗争的指示》，说，“科学界的高级知识分子，是资产阶级右派和我们争夺领导权的一个重要方面。因此，在科学界高级知识分子中间，必须认真严肃地开展反右派斗争，决不能温情主义。但要区别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不同情况，对于那些有重大成就的自然科学家和技术工作人员除个别情节严重非划不可者外，应一律采取坚决保护过关的方针，对有较高科学成就的，不可轻易划右派，必须划的，也应‘斗而不狠’、‘谈而不斗’；对于在日内瓦会议后争取回国的欧美留学生，一般要‘不排不斗’。”²

9月11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严肃对待党内的右派分子》社论。首先说：“要知道，我们党是一个革命的组织的组织，不是温情主义的小集团；温情主义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东西，对于我们党只能起腐蚀和瓦解的作用。”接着说：“特别要指出的是，在那些堕落成党内右派分子的人中间，有许多都是混入党内阶级异己分子、投机分子和个人主义野心家，他们是抱着各种各样的动机加入我们党的。有的人是想从党内来破坏我们，也确实作过不少坏事，只是由于他们的活动比较隐蔽，没有及时地被揭发出来。有人把我们党当作追逐个人名誉地位的工具，当个人的欲望一再没有得到满足的时候，他们就由不满党而发展到仇恨党，最后更走上了反对党的道路。”最后指出：“反右派斗争是一场极为严重的阶级斗争。只有在党内和党外的反右派斗争中都取得胜利，才能更加巩固

¹ 转引叶永烈《反右派始末》第553页。

² 引自李晨主编：《共和国史记》二卷，吉林出版社1996年版，第103-104页

我们党和我们的国家，才能更好地推进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9月2日指示和这篇社论都是为深入挖党内右派分子提高党员干部认识而发的，这是“左”的指导政策更向“左”的错误发展。

9月15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为什么说资产阶级右派是反动派？》社论：“资产阶级右派就是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反动派，这是科学的合乎实际情况的说明。”“在今天，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什么是划分革命和反动的标准呢？现阶段中国前进的方向是彻底完成社会主义革命。因此，反对资本主义道路，拥护社会主义革命事业和建设事业，就是把社会推向前进，就是革命；坚持资本主义道路，敌视和破坏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事业，就是把社会拉向后退，就是反动。”“为什么还有人弄不清呢？有一部分人弄不清，是因为他们还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的旧标准来划分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的革命派和反动派。”“在民主革命时期，资本主义还有一部分积极作用，站在资产阶级立场还可以参加这个革命或者保持中立。在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资本主义所有制已经改变的现在，资本主义在我国历史上的积极作用已经发挥完了，它已经不再帮助生产力发展，反而要阻碍生产力发展，要使社会倒退。在这样的时候，坚持资产阶级立场而反对无产阶级的分子，就不但不能参加社会主义革命，而且势必成为社会主义的敌人了。”

社论指出：“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也需要一个由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一切接受社会主义的爱国者组成的统一战线，这个统一战线的政治基础就是社会主义。”“中国一定要走向社会主义，这是全国绝大多数人民的意志，并且已经在庄严地记载在我们的宪法之中。谁要是反对这个立场，谁就是违反了我国国家的根本大法。”最后说：“有人问：既然右派是反动派，为什么一般地不这么称呼，并且一般地不办罪？这是因为我们国家的巩固程度足够允许这样做，而且这也给右派分子一个重新做人的机会。我们坚持把反右派的斗争进行到底，这是为了彻底粉碎右派的进攻，同时也因为只有这样，才有可能使一部分右派分子认识到没有别的出路，因而不能不向人民认罪投降、改过自新。”²

这是一篇非科学的、不符合实际的社论，只指出一点就足够了。

¹ 《人民日报》1957年9月11日。

² 《人民日报》1957年9月15日。

社论中说什么“资本主义在我国历史上的积极作用已经发挥完了，它已经不再帮助生产力发展，反而阻碍生产力发展，要使社会倒退”。这个论断是完全错误的，本来中国资本主义没有得到充分发展，新中国成立之后，使有利于国计民生的资本主义得到发展。但在社会主义的“三大”改造中，很快“让资本主义绝种，让小生产也绝种。”历史证明非社会主义经济在中国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撰写这篇社论的王若水后来说，“这篇社论邓拓没有修改，送给胡乔木；胡乔木也只字未改，批准照登。当时觉得写这篇社论是理直气壮，现在真觉得后悔。”¹但死不悔改的还大有人在。

上述这些指示和一系列社论发出后，可谓排除各种深挖右派的障碍和干扰，加深对所谓右派分子性质的认识，从中央到地方的部门中先后深挖党内团内大批右派分子和许多“反党集团”。这些指示和社论达到了深挖右派分子的目的，同时也清除党内不同意见的人，为以后专制独裁扫清了障碍和铺平了道路。

全国上下都在贯彻落实深入挖掘右派分子的工作，中国科学院等单位紧跟毛泽东深入反右的部署，积极贯彻落实，在一个不到百人的哲学研究所挖出党内右派六人，其中三人是资深老党员，他们的右派言行被人民日报报道，1957年8月29日人民日报开辟《决不让党内右派分子腐蚀党的肌体》专栏以《公然反对党对右派分子的反击》为题，指责许良英的灵魂浸透了右派思想：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全体工作人员在党的领导下，于最近期间揭露并批判了该所右派分子共产党员许良英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和行动。在开始大鸣大放期间，许良英放出了许多煽动性的言论。他说：“整风的第一阶段主要是让大家吐吐怨气”；“发牢骚是拆墙的第一步。”并且说：“反正大家经过肃反，都可以一视同仁”，就是说不需要什么阶级路线和党内外的界线了。他持着这种思想和不可告人的目的，打着大鸣大放的旗子到处点火，散播反党言论，还说“这样的鸣放是党的最高利益”。许良英认为欧洲资产阶级革命初期有许多好的东西，如自由、平等、博爱、个性解放等等，值得我们继承。并认为只有继承了资产阶级的民主，才能“使社会主义国家不仅在经济上，而且在文化上、思想上能迅速赶过资本主义国家。”他说这是他学习了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讲话后的“心得”。并到处宣传资产阶级的民主和自由。他曾经对科学出版社的一位同志

¹ 《新发现的毛泽东》（下），第540页。

说“资产阶级旧民主好，苏联所以发生斯大林事件就是因为缺乏资产阶级民主。”在大鸣大放期间，他觉得文汇报最过瘾，因为“文汇报揭发得最彻底。”对人民日报则因为它反击右派“太粗暴”，所以他不愿再看了。这个右派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真面目的充分暴露，还是在党中央提出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战斗号召之后。¹1957年8月3日，人民日报“标题为《他们在哲学研究所研究什么？研究破坏社会主义立资本主义》报道许良英李德齐是党的叛徒。新华社2日讯，中国科学院在1、2两日举行大会，揭发和斥责党内右派分子许良英、李德齐。

报道许良英：“哲学研究所的研究人员许良英过去的许多老朋友、老同学以及同他一起工作过的同志举出大量具体材料，揭穿了许良英反对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的政治面貌。出身于恶霸地主家庭的许良英，自1946年入党以来，每遇到个人野心遭受挫折时，即和党对立，特别是反右派斗争开始后，他的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行更加猖獗。6月8日起，人民日报发表了反右派的社论，许看了以后咆哮如雷，要撕掉人民日报，他贩卖右派分子的谣言，胡说‘党中央分裂了’，‘毛主席受到高级干部宗派主义的反对，这些高级干部想报仇，太不‘道德’’；‘毛主席妥协了’等等。他四处奔走点火，曾经向科学院院部、几个研究所、中央团校等十多个单位的二十多人散布对中央、对人民日报反右派社论的不满言论；向他们宣传资产阶级的所谓‘民主’，鼓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字报。他认为党中央，领袖和任何人都不能配被信任，只能相信他自己的‘独立思考’。科学院党委书记对他进行教育后，他仍然坚持反社会主义反共产党的立场和观点，他扬言不惜‘牺牲党籍’，并为自己准备了两条退路：‘回乡种田’或者‘到资本主义国家去做‘地下工作’’。许良英在会上作的‘检讨’中，说他是客观上反党反社会主义，主观上不反党不反社会主义；他还说担心别人误会他的‘政治面目’。批驳他的人同声指责许的‘检讨’是极不老实的。批评者揭发的许多材料已足够证明许良英的政治面目很清楚——是右派分子；许的反动言行明明是通过主观的；许是党外右派分子向党进攻的内应。”²

报道李德齐：“许多人还揭露了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的另一

¹ 《人民日报》1957年8月29日。

² 《人民日报》1957年8月3日。

个右派分子李德齐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行。大家揭发出来的材料说明，李德齐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思想已经形成体系。他诬蔑毛主席，反对人民群众喊毛主席万岁和报上登载人民群众向毛主席欢呼的照片；扬言要改革中国的宪法，说宪法中可以不写‘共产党领导’的字样，主张社会主义社会要有‘反社会主义的自由’；主张把北京的中山公园变为伦敦的海德公园，他是想让随便什么人都可以在那里散播反革命言论；他主张政协的权力应该超出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等等。李德齐特别热衷于为反革命分子辩护，说‘对反革命分子为什么一定要狠？’主张对反革命分子要施‘仁政’。他说，他的被镇压的反革命地主母亲由于给他寄过钱，因此，他对革命也间接有‘功’，他并且为他的这些反动言论辩护，说是出于‘小资产阶级道德观’。到会的人指出，李德齐这些反党言论实际上是要取消‘无产阶级专政’。李德齐在整风开始以后，借口知识分子的脑力劳动要同体力劳动相结合，先后六次到北京郊区保福寺‘生产’农业社向农民点火。他鼓动农民不要把蔬菜卖给国家，说国家的收购价格‘太低’、‘对农民不上算’等等，挑拨农民同国家的关系，还煽动农民向政府‘告状’。但是，他的这些阴谋活动没有得逞，遭到农民的驳斥和拒绝。”¹

1957年12月2日，《人民日报》报道：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和中国作家协会，在11月26日到29日联合召开了揭露和批判党内右派分子徐懋庸的会议。……在这以前，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曾举行多次会议，对徐懋庸进行了揭发和斗争。报道说：根据历次会议的揭露，徐懋庸从去年11月到今年8月，在北京、天津、上海、武汉等地的报刊上发表了近一百篇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文章。在这些文章里，徐懋庸假借反对宗派主义，反对官僚主义和反对教条主义的名义，肆无忌惮地攻击共产党的领导，毁谤马克思列宁主义。他污蔑新社会不民主，号召人们以‘杀身成仁’的精神起来争‘民主’；他把党的领导干部描写成是一些‘不学无术’，只靠‘地位’来实行领导的‘官僚主义者’。他认为当前我国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几乎没有区别，主张在两者之间求同而不应当求异，认为求异就是宗派主义。他说：在共产党内存在着‘一朝天子一朝臣’的现象，在他笔下共产党的各级组织竟成了大大小小的宗派集团。他认为，凡是坚持阶级立场和阶级分析方法就是‘教条主义’。他把

¹ 《人民日报》1957年8月3日。

党在人民群众中，特别是青年中进行的社会主义思想一律说成是‘教条主义’。他竭力企图造成这样一种印象：好像我国人民，特别是知识分子和青年，迄今尚未获得解放，他们到处受到所谓‘官僚主义者’、‘宗派主义者’和‘教条主义者’的种种迫害，以至动辄得咎。几乎在他所有的文章里都充满了对党对人民的强烈的敌意，极尽谩骂挑拨诽谤之能事。另一方面，徐懋庸对资产阶级却抱着颂扬的态度，他竭力美化资产阶级，说资产阶级是和无产阶级一样的拥护社会主义；说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一样可以掌握真理。”¹

报道又说：“徐懋庸的反党行为是有他的历史根源的。他自己承认，他的参加革命工作，是‘投机取巧’，他说他‘一生所追求的，是个人的名誉地位、享受等等’。早在1936年，他背着当时共产党在上海文化界的地下组织，擅自写了一封极为恶劣的信给鲁迅先生，给党和人民的事业，造成了损失。1941年，他在太行山抗日根据地工作，曾公开反对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解放后他担任武汉大学副校长时期，严重的破坏党的争取、团结、改造知识分子的政策，排斥、打击他所不满的教师，对党闹独立性，同时在工作中实行个人领导，压制民主、目无组织。由于他所犯的严重错误，党曾给他以当众警告的处分，行政上则给以撤职的处分。……当他离开武汉大学，调到中共中央第五中级党校工作以后……进行非组织活动，反对领导，包庇反革命分子，所以在1955年11月又受到留党察看一年的处分。……他调到了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工作，他不仅没有真正接受党分配给他的工作任务，而且开始写他的反党杂文，用‘回春’、‘弗先’、‘梯卡’等化名发表。到了今年3、4月间，资产阶级右派的进攻越来越猖狂的时候，他认为时机已到，就更大量地抛出了他的反党杂文，赤裸裸地显示了他的反党面目。”²

报道最后说：“徐懋庸是混进党内来的资产阶级异己分子。近二十年来，党不断的教育他，历次的指出他的错误，帮助他改正，但是他始终不肯放弃他的资产阶级立场，阳奉阴违，与党为敌，以至在社会主义革命的关口终于堕落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³

上述哲学研究所的三名资深党员右派分子，其罪名是党的叛徒、阶级异己分子，他们在人民日报曝光后臭名远扬。其余三名党员右

¹ 《人民日报》1957年12月2日。

² 《人民日报》1957年12月2日。

³ 《人民日报》1957年12月2日。

派分子在哲学研究所组织的批判会上，受到批判和斗争。其中一位党员右派分子根本没有右派言行，只是在17级干部会上学习人民日报6月8日《这是为什么？》社论，这位党员同志对这篇社论情绪激动地连说三次是形而上学。与会者立即批评他的情绪不对头，说他是站错了立场，与党的社论对立。这位党员就因对这篇社论表态与党的立场不一致，以至受到多次批判，越批评越不服，态度越不好，因拒绝批评、态度不好被定为右派分子。还有一位党员梁××因在鸣放初期给领导提了意见，主要内容是因调爱人来京工作，办公室主任不积极办理，梁气得扬言要宰了主任，反右开始后，梁××被划为右派分子。党员赵中立也被划为右派分子。原因是不承认反斯大林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苏，又不接受批评，态度不好甚至强硬，被定为右派分子。共青团员齐云山因个人主义、自由主义严重，没有什么右派言论，定为右派分子。共青团员汪国训¹老实主动向党组织汇报，因汇报出来的言论被划为右派分子。共青团员杨子彬因反斯大林也被划为右派分子。

哲学研究所还在群众中揪出两名右派分子，一是龚献文，他根本没有什么右派言行，是因为《哲学研究》没有完成所里下达给《哲学研究》编辑部的右派百分比，龚献文是编辑部为完成百分比而被划为右派分子的（原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术秘书吴传启提供的材料）。一是温联璧，她也没有什么右派言行，平时衣着爱打扮，小姐、太太神气太浓，人们看不惯，整风期间，有人批评她有资产阶级太太小姐味道，她受不了那样的批评，与党小组长发生冲突，党小组长与她先是争吵，发展到二人对骂。就因温联璧态度恶劣，与党员对抗，最后定为右派分子。受批判、受斗争的还有六、七人，虽没有定为右派，有的被开除出党或取消预备党员资格²。

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揭批“先专后红”的旗帜——项志遵。《中国青年》杂志报道，摘要如下：

（一）科学奖金获得者。“物理研究所一共批判了三个右派分子。对于其中两个所以成为右派分子，大家都容易理解的……至于项志遵呢？自从在整风期间暴露出自己的右派面目后人们就感到困惑，感到总有那么点惋惜。”认为右派分子们绝大部分都是臭的，

¹ 汪国训即笔者，笔者当时在哲学所从事研究工作，既是运动的亲历者，也是其受害者。

² 其包括笔者的妻子程静宇

“而这个项志遴呢，似乎还不那么臭，似乎还是个‘香右派’。”报道说，有个项志遴的同学说：“项志遴是个聪明，有才能的青年，1952年，他才21岁，就从清华大学物理系毕业了……他在母亲和亲戚的眼光中，是个将来大有作为的孩子，说不定在自然科学方面会有什么了不起的成就哩！大学毕业后，他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来，他的表现也是有目共睹的……同志们称他为‘死干派’。他曾和科学工作者戴传曾、李德平等合作，在卤素计数管与强流管的制备和它们放电机机构的研究方面，做出了一定的成绩，获得1956年科学奖金三等奖。这么年青，就得了科学奖，谁不羡慕？”

（二）堕入了右派的泥坑。“组织上一直很信任他，重视他、两次让他出国学习，提拔得也不慢，现在他已经是助理研究员了。他到底为什么要反对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呢？”报道说：“整风初期，一向以似乎是‘不过问政治’的项志遴忽然积极起来了，他和右派分子联合起来攻击肃反运动……他诽谤凡是‘大运动’，‘都不是群众自觉自动参加的，而是领导强迫的’；而在反右派斗争开始后，他公然为右派辩护，甚至和其他右派分子一起，篡夺了共青团二室二支部的领导，疯狂向党进攻。”“自从六月八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反击右派的社论后，他已在叫嚷，说这是‘围剿’，这是‘人身攻击’。‘民主受到了妨碍’，‘人不敢说话了。’”“他坚决反对反击右派。他气势汹汹地说领导‘疯’了，他给他的大哥（胡绳——作者注）写信，公然质问：‘领导什么动机？’他骂‘党中央糊涂’，为了表明他的坚决态度，他告诉他大哥：‘我本来已口头提出入党申请，现在也考虑撤消了。他的大哥回了一封长信给他，向他指出，‘一个科学工作者如果对于根本的政治问题不彻底弄清楚的话，那决不是件好事，他们并不是生活在一个太平的世界里，前面的风浪还多着呢！’这些话他当然听不进去。”

（三）他为什么爱上她呢？“项志遴给他远在苏联的爱人，一个共产党员，写了这样一封信，信中说：我不久将退团，也入不了党的话，还愿意和我在一起吗？而且我特不接受你任何带宗派主义气味的言论，你受得了吗？如果你把目前党群间的墙和沟带到我们的家庭生活中，我可是受不了的……合则留，不合则散！”原来，项志遴的思想早就起了变化，甚至不惜和他正在恋爱中的对象决心分手了。她爱人是肃反运动学习的组长，在一起学习，“在那时，项志遴就已经走了不同的道路：他坚决反对党所领导的肃反运动。他说，‘中国的阶级斗争已经趋于缓和，用不到搞肃反运动。’说

‘人民日报揭露胡风材料’，是‘小题大作，浪费纸张。’而且他还进一步说，‘青年已经被那些‘政治运动、思想改造、组织纪律束缚得消沉了’，所有这一切，‘妨碍了青年的个性发展’。这种错误思想受到了他爱人的批评。”

报道说：“自从去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吹来一股修正主义的歪风，项志遵就渐渐理直气壮起来了”，‘更大胆了’。他认为过去想的一切‘都对了’。他说‘党的权力太大’，是‘极端集权’‘太缺乏民主’，‘斯大林的问题是制度问题’，‘无产阶级专政、民主集中制，就会产生这类问题。……他认定中国也肃反扩大化了。’他当然不同意他的这些想法。于是，在他心目中，他的爱人早已成为‘教条主义者’。项志遵对‘教条主义者’是深恶痛绝的。那么，他为什么还是爱上她呢？原来项志遵是想改造她，改造这个共产党员。‘我要帮助你做一个好党员！’……‘要独立思考’，‘不要做不动脑子的教条主义者’。他的爱人呢，也有她的想法，她想帮助他靠拢党，她想用耐心的争辩来说服他。但这毕竟是一场阶级斗争……而他的立场是那么坚定不移，不能不决然提出什么‘合则留，不合则散’了！”

（四）“我要走我自己的路！”“项志遵的家庭成员不算太坏……抗战一开始，他父亲失业了，他跟母亲住在舅父和姨母家来了。他的姨母是泰州的一个大地主，因为遭到丈夫遗弃，她非常宠爱项志遵，她的大地主生活给项志遵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的舅父呢？是个国民党的伪县长，后来又又在敌伪政权下当科长。他的舅父对共产党是有固定的看法的。‘共产党都是些工农干部和毛头小孩子，他们只能打天下，执政还得靠知识分子’，‘共产党经济上平等’，‘政治上不民主’——这就是他自认为客观、公正之论。他常常在项志遵面前议论这个。”

报道说，项志遵的母亲“对于自己的子女走上革命道路，原是没有加以阻挠的……她对项志遵说，‘政治上太复杂，真正要救国，还要靠知识，靠本领，还得好好念书’，这些话，在项志遵年轻的心灵上，打下了深深的印记。”“项志遵有一套想法，他舅父当年说的那套话起了作用了：‘工农只能打天下，不能建设天下’，‘建设得靠知识分子’。他想，‘既然是知识分子，就不可能有工农那样的思想感情’。他说，知识分子（不是指工人阶级知识分子）掌握政权和领导权，因为他们有能力，懂科学，是内行。工农应该在知识分子领导下工作’。他以为工农‘讲话简单，粗暴’，自然应

该由知识分子来教育、来领导。”“他说：‘工作好就是思想好，就是进步’，‘政治就是业务’。‘衡量一个人是否脱离政治，主要标准是看他的业务工作。’“就这样，从埋头业务‘不过问政治’，到坚决抗拒思想改造，项志遴走上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路。”¹

以后，中国科学院院部召开批判五名青年右派分子大会，项志遴是挨批判的一位。上述揭发批判是更深层次的分析批判。由思想认识问题上升为政治立场问题。笔者是亲自参加与经历了中国科学院院部、哲学研究所召开的揭批大会。被批判者所发表的言论应该说是正确的。可是，这些言论不符合领导者的口味，就无限上岗上线当成右派言论加以批斗。哲学所的徐懋庸，物理所项志遴都是中国科学院院部、学部批斗对象之一。都是由人民日报报道的，是够一定级别的右派分子。揭、批斗他们，实际上是错误东西批判正确的东西，是无知批有知，从无揭出有，从小上升到大。历史证明，被批斗的右派分子是一起大冤案。

二、深挖文艺界的“反党集团”

中央一级的文艺团体响应中共中央深入挖右派的指示，积极贯彻落实其精神，各团体深入挖掘，首先挖出了“丁陈反党集团”等。

丁玲是著名作家、中国作协副主席、中宣部文艺处处长，陈企霞是《文艺报》副主编。1955年发生丁、陈事件。案情反复曲折，过程错综复杂，前后经过3年，到1957年才定性。在此只涉及1957年反右派的问题。

1957年8月7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文艺界反右派斗争深入开展，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阴谋败露》的报道。现摘引会议揭露部分：“丁玲长期存在着极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她的反党言行是有一贯性的。1933年丁玲在上海被国民党特务逮捕，软禁在南京的时候，曾经叛党变节，受到国民党特务机关的优待，并继续与已经叛变投敌的丈夫特务冯达同居。这些事实，丁玲一直隐瞒到1943年才向党初步交待，但同时也交待了许多使党无法分辨的东西，因此使党当时无法对她的问题作出结论。她在1942年所写的反党文章‘三八节有感’和在她主编的文艺副刊上发表的托匪王实味的‘野百合花’，对党、对革命、对当时的革命根据地进行的露骨的、恶毒的诽谤。这些文章曾得到国民党反动派的喝彩，国民党特

¹ 《中国青年》1957年第19期第26-29页。

务机关曾经予以翻印散发。全国解放以后，曾分配她担任文艺工作领导岗位上的各种重要职务（中宣部文艺处处长、作协副主席、党组副书记、中央文学研究所所长、文艺报主编和人民文学副主编等），但她完全辜负了党对她的信任和期望，更加发展了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滋长了个人权力的欲望。这样，就同陈企霞结合起来，拉拢了一批对党不满的人，逐渐形成一个反党集团。”

“陈企霞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野心家，他说：‘我对丁玲、冯雪峰的心情，一向是同情的，同情知识分子受压抑的阴暗感情。反正文艺界漏洞百出，我可以在这里搞野心，我认为我在文艺界做野心家有基础。因为我了解文艺界情况多。解放区、国统区作家都熟悉。我做过编辑，很多稿子经过我的手，我很自负，我认为我在文艺界是大有可为的。’”¹

“这个反党集团的活动，也是阴险毒辣的。归纳起来，主要的有下列几个主要方面”：

第一、“拒绝党的领导和监督；违抗党的方针、政策和指示；并且违反党的原则，进行感情拉拢，扩大反党集团的势力。丁玲善于耍弄资产阶级的一套权术手腕，对许多人进行感情拉拢，或者封官许愿，或者施以小惠，或者对受到党批评的人给以安慰。各种各式反党的小暗流，几乎条条都通向丁玲，在她那里汇集成一股反党巨流。许多反党分子如陈企霞、李又然等，都把她当靠山。丁玲的家里几乎成了超于作协党组织之上的特别的指挥机关。陈企霞受到处分时，丁玲安慰他说：‘忍着吧，忍着吧！’陈企霞也多次公开说他在‘三反’时如何‘保护丁玲’。”

第二、“玩弄两面派的手法，挑拨离间，破坏党的团结。丁、陈反党集团经常散布流言蜚语，诬蔑和攻击小集团以外的人，甚至诬蔑到中央负责同志，丁玲常对一些同志说：‘周扬不喜欢你’。常对一些同志说：‘我曾提名让你当文联委员，或作协理事，或出国参观，可是人家不同意’。以此挑拨他们对组织的不满。丁玲对周扬却经常进行许多恶意的攻击。”

第三、“提倡个人崇拜，散播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丁玲在《文艺报》和中央文学研究所，狂妄地吹嘘自己，制造个人崇拜。她的反党集团的人，更为她鼓吹捧场，称之为‘旗帜’、‘领袖’。”

第四，“以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腐蚀青年，在青年人面前宣传：

¹ 《新华半月刊》1957年第17号第181—182页

只要你写出一本书，谁也打不倒你。”

报告最后说这次斗争的意义：“这次中国作协党组扩大会议对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的斗争，实质上是一场保卫党的团结和统一的斗争，是确保党对文艺事业的领导和反击资产阶级文艺思想篡夺文艺领导权的斗争。没有这场斗争，文艺界就不能在新的基础上团结起来，就不能在党的统一领导下繁荣我国社会主义文学艺术事业。”¹

“丁、陈反党集团”的主要成员，经过揭发共有七人：丁玲、陈企霞、冯雪峰、艾青、罗烽、白朗、陈明（丁玲的丈夫）。

挖出“丁陈反党集团的成员——冯雪峰。1957年8月27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中国作家协会党组扩大会议，进一步揭露出作协副主席、作协党组成员、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冯雪峰二十多年来一系列严重的反党言行的报道。主要内容如下：

小标题一：丁陈反党集团支持者和参与者。“会上指出，冯雪峰是丁、陈反党集团的支持者和参与者。1952年丁玲改任‘人民文学’主编，她推荐冯雪峰接替她作了‘文艺报’的主编，陈企霞作副主编。他们把‘文艺报’变成了抗拒党的领导和监督的‘独立王国’。……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向党大举进攻的时候，冯雪峰和丁玲、陈企霞密谋推翻1955年党关于丁陈反党集团所作的结论”。“冯雪峰除了背着党筹划办同人刊物，企图搞垮‘文艺报’外，还积极参加丁、陈反党集团分裂文艺界的阴谋活动”。

小标题二：人民文学出版社右派分子的“青天”。有人揭发“冯雪峰看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大举向党进攻的时候，他兴奋地说，‘洪水将冲破大门’”。在整风座谈会上，他号召对党不满和反党分子‘有冤报冤，有仇报仇’。他还在全社的整风动员大会上诬蔑人民文学出版社的肃反工作有‘重大错误’。他不但公开放火，而且还亲自和该社的……右派分子交谈，鼓动他们向党进攻。他的这种反党放火的行为，博得了出版社右派分子的喝彩。右派分子向他欢呼：‘好况钟’呀！‘向冯雪峰致敬’呀！肃反中有关问题的人跑去向冯雪峰‘诉苦’。一时，冯雪峰在出版社变成右派分子的‘冯青天’了。”

小标题三：三十年一贯反对党的领导。“会上揭露的许多事实证明：冯雪峰虽然入党三十年，在党内担任过重要的工作，参加过

¹ 《新华半月刊》1957年第17号第181—182页

长征，住过上饶集中营，但三十年来，他个人和党的关系，一直摆在不正确的位置上。他始终把个人放在党的上面，以自我为中心，对抗党的领导，从而走上了反党的道路。”“他总认为他在党内是受歧视、受压制的，个人的权力欲望没有得到满足，积存了一肚子怨气，对党的领导充满了仇恨，经常骂做党的工作的同志是‘做官’的，是‘革命绅士’，诬蔑党和国家机关，甚至人民团体都是‘衙门’，以示以自己‘超然’、‘清高’。”

小标题四：反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思想和胡风一致。“会议揭露：冯雪峰在文艺界的许多基本问题和重要问题上，是和胡风的极端反动的文艺思想相一致，而和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思想相违背的。”“胡风否定民族文学遗产，冯雪峰也和胡风一样，否定文学的民族形式，否定对民族形式的利用。”“胡风用所谓‘主观’、‘公式主义’和‘客观主义’两把板斧砍杀国民党统治区党所领导的进步文艺，冯雪峰在他的‘论艺术力及其他’一文，也用‘公式主义’和‘客观主义’抹煞国民党统治区进步文艺的成就。”“因为冯雪峰和胡风在文艺上许多根本问题的看法相一致，所以党和革命作家对胡风的反动文艺思想几次提出批判的时候，冯雪峰都采取对抗和缄默的态度。”

小标题五：反动的社会思想：“冯雪峰的社会思想是非常阴暗和反动的，他怀着阴暗的心理和虚无主义的态度去看一切。他常在青年人面前把长征和党内斗争，描绘得阴森可怕。在匈牙利事件发生后，……他甚至对陈企霞说：‘人类没有希望’。”“会议指出：冯雪峰的这种反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思想和反动的社会思想，正是冯雪峰反党行为的思想基础。”¹

8月28日、30日《人民日报》先后发表了钱俊瑞在作家协会党组扩大会议上所作《保卫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文艺事业》的发言、何其芳在作协党组扩大会议上所作《冯雪峰的反党反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思想和社会思想》的发言。9月1日，《人民日报》为丁玲、陈企霞、冯雪峰等人的反党问题发表题为《为保卫社会主义文艺路线而斗争》的社论：指出：“在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全面反击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斗争中，文学艺术界揭发了丁玲、陈企霞、冯雪峰、江丰、钟惦蓑等人的反党活动。这是一场明辨大是大非的原则性的斗争，是党的社会主义文艺路线跟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文艺路线的

¹ 《新华半月刊》1957年第18号第163—164页

斗争。这场斗争的结果，必将在文艺界产生深远的影响。”“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和各种反党分子所切齿痛恨和集中攻击的，正是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他们反对党领导文艺，其目的就是要使文艺脱离社会主义的轨道，使文艺成为给资产阶级服务的工具。”

社论指出：“反动分子尽管披着各色各样的外衣，在反对党的领导这一点上，他们是一致的。”“这些反党分子的共同思想基础，是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这些反党分子所提倡和实行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文艺路线，跟党的社会主义文艺路线，跟大多数愿意为人民服务，愿意进步的正派的文艺工作者的愿望和实践，显然是不能相容的。”最后指出：“为什么这些文艺界的‘老作家’、‘老党员’敢于这样无法无天，长期进行反党活动呢？除了因为他们有根深蒂固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思想根源之外，文艺界的党组织对他们监督不严，在批判和处理他们的错误思想行动的时候，往往采取了姑息和温情主义的态度，也是重要原因之一。……所以这一次对反党集团的斗争，必须坚决地进行到底”。“姑息足以养奸”。“必须抛弃温情主义，必须动员广大文艺工作者参加斗争……把腐朽的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彻底烧毁，不让任何反党野心家有隙可乘。”¹这篇社会为文艺界深入挖掘右派，揭批右派起了相当得要的作用，“百花齐放”的政策逐渐变为“舆论一律”的独家鸣放。

在这之后，批判、揭露和深挖丁玲、陈企霞、冯雪峰等反党问题的会议继续召开，中央非常重视。9月27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陆定一、郭沫若、茅盾、周扬等在中共中国作家协会党组扩大会议大会上的讲话》的报道：“批判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的中国作家协会党组扩大会议，在9月16、17两日举行总结大会。参加会议的，除北京的作家、文艺机关、团体的负责人外，还有中国作家协会各地分会的主要负责人和一部分作家，以及中共各省市宣传部门的负责干部等，共一千三百五十多人。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副部长周扬在会上作了讲话；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席郭沫若、中国作家协会主席茅盾、副主席巴金、老舍等，也在会上讲了话；作家协会党组书记邵荃麟，代表党组对文艺界反对丁陈反党集团的斗争，作了总结发言。”²

关于丁玲、冯雪峰的问题，毛泽东也注意到了。10月13日，

¹ 《新华半月刊》1957年第18号第161—162页

² 《人民日报》1957年9月27日

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三次会议上的讲话中谈到：“大鸣大放，一不会乱，二不会下不得台。当然，个别的人除外，比如丁玲，她就下不得台。还有冯雪峰，他在那里放火，目的是要烧共产党，就下不得台。”“有的人进了共产党，他还反共，丁玲、冯雪峰不就是共产党员反共吗？”“现在共产党又出了丁玲、冯雪峰、江丰这么一些人，你们民主党派不是也出了吗？”¹

1958年1月19日，毛泽东为《文艺报》发表对丁玲的《在医院中》等批判文章写了按语：“去年下半年，文艺界展开了对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的斗争和批判。许多同志在文章和发言里，重新发表了丁玲的《三八节有感》。其他文章没有重载。‘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许多人想读这一批‘奇文’，我们把这些东西搜集起来全部重读一遍，果然有些奇处。奇就奇在以革命者的姿态写反革命的文章。鼻子灵的一眼就能识破，其他的人往往受骗。外国知道艾青名字的人也许想要了解这件事情的究竟。因此我重新全部发表了这批文章。谢谢丁玲、王实味等人的劳作，毒草成了肥料，他们成了我广大人民的教员；他们确能教育人民懂得我们的敌人是如何工作的。鼻子塞了的开通起，天真烂漫、世事不知的青年人和老年人迅速知道了许多事情。”在这里，由于中央领导同志对“丁陈反党集团”的分析批判，特别是引起了毛泽东对丁玲、陈企霞、冯雪峰、艾青等人的注意，使他们的“反党集团”问题引人注目，问题性质更加严重，其后果便可想而知了。”韦君宜回忆“丁陈反党集团”问题并给予评价：“简直说不清丁玲、陈企霞怎么就会变成批判对象了。我只记得开始大概由于《文艺报》上登了一篇关于英雄问题的论文，陈企霞的观点与流行观点（实际就是苏联那一套一味歌颂英雄的观点）有所分歧，但是这怎么能扯到政治问题上去呢？他有一次在党组会上为此拍过桌子。还有一个李又然，说是他的宿舍里张挂着许多裸体画，是道德败坏。我并没有去看过，但听艾青说：那是西方美术作品！若果真如此，以作家协会来提出这种“罪状”来，真是可耻透了！对丁玲则是旧话重提，批判她过去的作品如《三八节有感》之类。又说她近两年的作品全是以个人为中心，每篇散文都离不了个‘我’。总之，我根本就记不得她们有什么突出的罪状。……”

那一阶段，作协的其他工作均已停摆，天天开批斗会，当然，

¹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81、487、488页

其中规模最大的是批丁玲、陈企霞的，后来又加上了冯雪峰，而且冯雪峰占了主导地位。那个会批的究竟是什么？其中给人印象最深的一件事大概是陈企霞同他的情人周×的秘密通信。他是有妻子的，跟情人通信当然是保守秘密。结果，这就被批判成是他的反革命秘密暗号。再一件是丁玲的历史问题，她怎么从南京国民党的监视下出走的？还有一件是冯雪峰在抗战开始后，曾因在上海工作上的不愉快而离开，回到浙江，这事算不算政治问题？总之，这些即使都可算数吧，显然也与他们政治上是否为右派毫无关系。但是，在那个批斗会上，硬是一项一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帽子从天而降。他们本人自然毫无置喙余地。就连别的人，在会议上辩驳一两句都完全不可能。”¹回忆当时情景，凡是亲身经历批判会的人，都有与韦君宜同志相类似的体会，批判者只能奉命按照已定好的上纲上线的基调进行批判，而被批判者只能接受批判者的各种政治大帽子，这里，谁也不敢为被批判者说什么，否则，就会落得到被批判者同样的下场。

再引用参加丁玲批判会的徐光耀同志回忆，他说：“每次会议都必须参加的丁玲自始至终地与陈明坐在一起，听着各种各样对她的批判、侮辱、作践和羞辱。她的痛苦，她的隐忍，她的入地无门，我这枝秃笔是没有办法写出来的。曾几何时，她还是中国共产党的，从延安来的有代表性的作家，斯大林奖金获得者，伟大领袖曾誉之为‘昨天文小姐，今日武将军’。转眼之间，变成了‘反党阴谋家’、‘野心家’、‘极端卑鄙的个人主义者’，被当面斥之为‘落水狗’、‘杨荫榆’、‘莎菲’、乃至‘风姐儿’、‘奸臣’……新中国建立才七八年，自己阵营里的‘阶级斗争’就打成这样！”“特别在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整人的也挨整，挨整的也整人，大家互相丑诋，互相撕咬，最无可奈何时，甚至互相欺诈，互相葬送”。²这些现象的发生，其源头在于毛泽东拉一派打一派和坐山观虎斗的策略，坐收渔人之利。

三、深挖省部级“反党集团”

为清除与中央省部级第一把手有分歧的省部级知识分子出身的领导干部，进行所谓深挖党内右派。

1957年12月5日“今日新闻”详细记载了监察部“反党集

¹ 《百年潮》1998年第2期第25-26页

² 转引自《书摘》2002年第1期第26-27页

团”的情况，《监察部反党集团的首领王翰原形毕露》：

首先，揭露王翰的面目。“监察部的干部经过坚决的斗争，最近挖掘一个长期混在党内窃取监察部副部长、党组副书记职务的右派分子王翰。右派分子王翰入党二十五年之久，他一贯曲解和反对马列主义，攻击社会主义，赞扬资本主义。几年来，他在监察部工作中，同右派分子彭达、陈达之等人勾结起来，形成了以他为首的反党集团，反对中共中央和监察部党组关于监察工作的指示和决议，企图夺取监察机关的领导权，把监察机关置于党和政府之上，利用监察机关作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工具，现在他的反动面目已完全暴露出来。”

其次，揭露王翰的反党活动。“整风开始，王翰认为时机来到，到处散布对党组的不满情绪，诽谤党组其他成员，进行挑拨离间；并且策动他的反党集团分子，在鸣放期间大肆攻击党组，诬蔑‘党组是纸老虎，一戳就破’。”“反右派斗争以后，王翰为包庇他的反党集团，竟公开破坏反右派斗争，极力为监察部几个党的右派分子辩护。当监察部第二司批判右派分子彭达的反社会主义言论时，王翰即察觉到他难以隐藏下去，千方百计地包庇彭达，他说：‘真正骂娘的人（指骂共产党和社会主义），不一定是毒草。红楼梦不是有个焦大吗？焦大是骂得很凶的，但他是贾府的忠实奴才。’当监察部整风领导小组确定彭达为右派分子后，王翰立即向彭达通风报信，密谈到深夜。”

“长期以来，王翰经常散布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谬论，诽谤革命导师和党中央的领导同志，主张取消阶级斗争，宣传妥协思想，歪曲建党学说。王翰在监察部党组学习‘八大’文件时，歪曲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认为在生产资料所有制改变后，过渡时期就结束了。这就是说，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公私合营以后，阶级斗争就熄灭，资产阶级不需要进行改造。……并且恶毒地攻击党所领导的历次社会改革运动，说历次社会改革运动总是一开始反右，最后反左，结果是什么名堂也搞不出来’。他认为改革土地制度时对地主阶级的斗争过火了，应该温和一些”。

“王翰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建党学说，大肆进行歪曲和诬蔑。……尤其是他一贯地破坏党内民主集中制，不受党的纪律约束，经常把党的会议当成吹谈聊天的俱乐部，任意地歪曲党的方针政策，违背党的决议。他的这些言行，是企图取消列宁主义建党的基本原则，而以资产阶级的思想来改造工人阶级的政党”。

“王翰多方地攻击社会主义制度。他对社会主义的新中国的一切都看不惯，否定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成绩，诬蔑国务院各部的工作是‘一塌糊涂’，攻击我国发展国民经济计划不是‘冒进’就是‘冒退’。他还说，现在的大学教育和建筑工程都不如解放以前，以此歌颂旧社会，贬低新社会。……王翰的亲美思想也极为严重。他坚持要用美国资产阶级学者杜威的‘图书十进分类法’来整理监察机关的档案。他吹嘘美国导弹‘高明’，赞扬资本主义的厂矿企业经营完善和产品的优美……”

“几年来，王翰一贯反对中共中央和监察部党组关于监察工作一些根本性问题的指示和决议，企图贯彻他的与党对立的一套监察工作主张，想把监察机关置于党和政府之上。”

第三，揭露王翰及其反党集团的手法。“王翰及其反党集团为了实现上述的反党主张，在日常工作中一贯地采取阳奉阴违的两面手法，对中央和党组的指示和决议，当面同意，背后反对，经常和党组闹对立。”

“王翰及其反党集团还经常打击别人，抬高自己，污蔑党组成员不懂业务，这个不行，那个也不行。他们一呼一应，互相吹捧。王翰夸耀‘彭达是工业监察工作专家，是全才’；彭达则吹嘘‘王翰是才子，监察部党组成员中惟有王翰熟悉业务，监察部离开王翰不行。’王翰夸耀‘陈达之能干’；陈达之也说‘王翰有才华，初来前政务院人民监察委员会时一套套的发表意见，现在受压抑不能发挥作用’。彭达、陈达之甚至吹嘘王翰应该当选中央委员，并且暗示应该当监察部长。王翰还在干部中拉拢一些人，打击一些人，企图扩大他的反党集团。”

第四，揭露历史上的王翰。“王翰的反党活动是由来已久的。他早在鄂北做地下工作时，就不执行上级党委的指示，违反秘密工作的原则，使地下党的组织遭到破坏，造成重大损失。他在军队做政治工作时，拉拢一些思想品质不好的青年知识分子干部，打击工农老干部，进行反党反领导的宗派活动。他还同地方党委和政府闹对立，严重地脱离人民群众，侵犯人民群众的利益，给党和军队造成了严重的不良影响。他在中南监察委员会工作时，对中共中央中南局也散布了许多流言蜚语。”最后指出：“王翰在大量罪证面前，不得不承认自己‘罪恶深重，灵魂丑恶，是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

的右派分子。’”¹

王翰的“反党集团”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得到彻底解决。

1981年1月18日，人民日报报道：王翰同志追悼会在京举行，胡乔木致悼词说：“王翰同志于1958年被错划为右派，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摧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王翰同志的问题得到平反”，“几十年来，他为党做了大量工作，为革命事业作出了宝贵贡献。”²

几位高级干部和作家对王翰作出客观公正的评价。1987年3月30日，人民日报刊登了郭述申等撰写《一位有胆有识的忠诚战士——忆王翰同志的革命一生》一文，提到：“建国后，王翰先后在中南大区和中央监察部担任领导工作。他为人正直，刚直不阿，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后，下放三门峡水库劳动，长达16年之久。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得到彻底平反。他在多年逆境中，身心都受到严重折磨，但是始终对党无限忠诚，关怀党的事业，关注国计民生，心里想着是祖国的安危，人民的苦乐，表现了共产党人的伟大胸襟，高尚情操。”³

韦君宜回忆王翰说：“我所认识的“右派”中，地位高的有柳湜、王翰，也毫无例外，都是知识分子出身的老干部。1957年我和他们没有多少来往。直到1984年，王翰去世，他的妻子张清华来找我，要求帮着写传记，我才知道了他的生平。他是“一二·九”运动在上海的领导者，复旦大学毕业生。在上海领导“社联”时代，就主张不能以工农党员人数的多寡作为标准，来判断支部工作的优劣（这是可笑的标准！在这种标准推行下，有的被“发展”的工人党员竟不知道自己是党员）。在新四军他参加建立五师，开辟中原解放区。在五师时他任政治部副主任，为了给战士编文化课本教文化和使用大学生干部来做政治工作，当时就受到很多非议。后来在中央监察部任副部长，他主张学业务，主张在经济建设时期做监察工作必须自己懂得工业，知道工业工作的漏洞在哪里才能查得出是非来，还公开反对过唯成份论。就为这些，把一个功勋卓著的老干部打成右派，去当了16年的铁工，劳动改造，不摘帽子。看了他的材料，实在使人觉得无理可言。如果是出身工农的干部，有王翰这样

¹ 1957年12月5日“今日新闻”《新华半月刊》1958年第1号第81—83页

² 《人民日报》1981年1月18日

³ 《人民日报》1987年3月30日

建立部队开辟根据地的功劳，怎么也不可能打成敌人吧。¹这段论述，既可看到划分右派分子的“主观随意性”和宗派主义情绪，又可看出在使用干部上重用工农出身的干部，轻视、乃至憎恨知识分子出身的干部，还有第一把手生怕第二把手或副职超过他，于是找出借口把第二把手或副职压下去。所以，王翰被打成右派分子，在那些憎恨知识分子的人看来，那是理所当然的。

随着反右派斗争的深入，已发展到地方党政机关。浙江省委内部揭发出沙文汉、杨思一、冯瑞林、孙章录四名右派分子。

1957年12月27日《人民日报》刊登《中共浙江省第二届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关于开除右派分子沙文汉、杨思一、彭瑞林、孙章录党籍的决议》：“遵照党中央的整风方针，采用大鸣大放的方法，彻底揭发和批判了省委常委、浙江省省长沙文汉，省委常委、浙江省副省长杨思一，省委常委、浙江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彭瑞林，省委委员、省委财贸部部长孙章录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罪恶活动。”

决议指出沙文汉、杨思一的罪恶活动：“会议揭发材料说明：沙文汉和杨思一两人已经完全堕落成为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理人。在今年春天大鸣大放期间，沙、杨两人和党内外的右派分子一唱一和，互相支持，亲如兄弟。沙文汉积极支持右派分子宋云彬、李士豪、陈修良等对党的猖狂进攻。杨思一同李士豪的关系极为密切，多方掩饰李士豪的反动面貌。在反右派斗争中，沙文汉、杨思一两人又狂妄地抗拒中央的方针和省委的指示，千方百计包庇宋云彬和李士豪破坏反右派斗争，并且在事后还多方掩饰，拒不交待。会上揭发的材料说明：沙文汉、杨思一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活动不是偶然的，而是一贯的。在1956年浙江省第二届党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期间，他们就结合在一起，罪恶地向党进攻。沙文汉在那次大会上宣扬资产阶级的政权观点，诬蔑我国的人民民主制度，反对党对政权工作的领导，并且支持以黄源为首的文艺界反党集团的资产阶级文艺路线。杨思一除了积极支持沙文汉反动的政权观点以外，还捏造事实，恶毒地否定全省几年来的工作成绩，歪曲党内生活真象，自吹一贯正确，冒充群众代表，攻击党的领导。在肃反运动中，沙、杨两人对党的肃反政策也心怀不满，杨思一并诬蔑肃反五人小组违反党的组织原则。代表们还一致指出：杨思一几年来一贯坚持地方主义宗派主义立场，在党内拉拢一部分人，打击一部分人，甚至发

¹ 《百年潮》1998年第2期第29页

展到在省委常委内部划圈圈，处心积虑地制造党的分裂。沙文汉在工作上长期不负责任，而且生活腐化、道德败坏，完全丧失了革命意志。此外，沙、杨两人几年来才安插了许多反革命分子叛徒和政治面貌不清的分子，到国家机关和企业事业机关工作。……”

决议指出沙文汉、杨思一等人堕落成为右派的根源：“沙文汉、杨思一、彭瑞林、孙章录所以堕落成为资产阶级右派，不是偶然的。我们党正处在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历史时期。资产阶级正在被消灭，资产阶级分子正在被改造，资本主义所有制基本上被消灭了。但是，阶级斗争还没有熄灭，资产阶级政治观点和资产阶级世界观还在许多人的头脑中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思想之间的斗争，还将存在一个很长的时期，这种斗争不能不在党内反映出来。特别是在政治上阶级斗争激化的时候，党内的这种斗争也必然会激化起来。沙文汉、杨思一、彭瑞林、孙章录在这种历史条件下，疯狂地进行反党活动，并且直接或间接地和社会上的右派同流合污，一唱一和，最后和党分裂，正是这个矛盾和斗争的具体表现。应当特别指出：沙文汉、杨思一、彭瑞林、孙章录都是出身于非无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在入党以后长期缺乏自我改造的自觉性，一直保持着资产阶级思想，一有条件，就力图使用他们的影响，企图按照他们的面貌来改造党，要把他们的意志强加于党。在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影响下，他们在政治上思想上就必然发展成为修正主义者，在组织上必然进行地方主义、宗派主义的活动，这是他们终于堕落成为右派分子的社会历史根源。”

“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是万恶的根源。沙文汉、杨思一、彭瑞林、孙章录都是极端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者。他们都有强烈个人野心，念念不忘个人的名利、地位。在他们看来，个人利益比什么都重要，至于党的利益，社会主义的利益，人民的利益，对他们都是空话。因此，当他们无限制的个人欲望得不到满足的时候，就必然要对党不满，并且一步一步发展到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地步。这是他们堕落成为右派分子的思想根源。”

决议对他们进行处理：“一致决议：沙文汉、杨思一、彭瑞林、孙章录是党内的右派分子，决定撤销他们党内的一切职务，开除党籍，在党内外公布，并且向有关方面建议撤销他们的一切行政职务。”¹

¹ 《人民日报》1957年12月27日

1957年12月2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中共浙江省委第一书记江华在中共浙江省第二届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的工作报告，题为《坚持党的正确路线，争取整风运动在各个战线上全胜》。《人民日报》编者按：“江华同志这个报告，用整风运动作为提起一切工作的纲……文章虽长，却很值得耐心地读完。报告的第一部分所涉及的问题不是地方性的而是全国性的……报告的第九部分着重地说明了从右派分子沙文汉，杨思一、彭瑞林、孙章录的反党活动得出的教训，也值得大家注意。”¹从这里可以看出，这个报告是有深刻背景的。”

请看“关于通知阅看浙江省委工作报告给叶子龙的信”（毛泽东一九五七年十二月十七日上午二时）

叶子龙同志：

请于今日上午八、九时通知舒同、曾希圣、江渭清、刘顺元、柯庆施、叶飞、周总理等七位同志看《中国共产党浙江省委员会向中国共产党浙江省第二届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的工作报告》这个文件，在下午一时以前看完。其他工作，可以移到明天上午去做。没有这个文件的，由你立即向浙江省委找到，分发各人。”²

由此看出，沙文汉、杨思一、彭瑞林、孙章录的右派分子问题是毛泽东同意的，经党中央批准，给他们戴上右派分子帽子。这是毛泽东亲自出面，清除知识分子出身的省一级领导干部，保持了江华省委第一书记的位置。沙文汉于1964年1月2日含冤离世，1981年4月，中共浙江省委对沙文汉的问题予以改正。

1958年3月10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中共安徽省委扩大的第六次全体会议关于开除右派分子李世农、杨效椿、李锐党籍的决议》，决议指出李世农等人的原身份：“中共安徽省委扩大的六次全体会议，彻底地揭露了李世农（省委书记处书记、副省长），杨效椿（省委委员、省委组织部副部长、省检察长）、李锐（省委委员、省副检察长）、陈仁刚（原省司法厅党组书记、副厅长，已开除党籍，撤销职务）等人的反党集团，粉碎了他们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恶活动，这是我们党的一个重大胜利。”

决议揭发李世农反党集团的活动：“这个反党集团的罪行是极为严重的。长期以来，他们阴谋破坏人民民主专政，危害党的组织，

¹ 《人民日报》1957年12月28日

²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第671页

反对党的方针、政策。当去年5月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向党疯狂进攻的时候，他们的反党活动达到了高峰。根据会议揭发：李世农是这个反党集团的首脑，他伙同他的爪牙，利用职权，宽纵了大批反革命分子、坏分子。为了遂行其宽纵反、坏分子的罪行，他篡改了党的肃反方针和政策，把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改变为只要宽大，不要镇压；把有反必肃，有错必纠的方针，改变成为有反不肃、无错也纠。他还经常散布取消肃反斗争，为反革命开脱罪责的谬论，说什么‘残余反革命保险一个也找不到’、‘反革命分子的坚决性愈来愈弱了’、‘反革命分子有两面性’、‘反革命分子在我机关多做一年工作，等于多赎一年罪’。他甚至亲手制定一些该判不判、重罪轻判的案例，令各地仿行。据初步统计，经过李世农罪恶指导，全省放掉的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达二千余名之多。由于李世农一贯罪恶活动的结果，使不少干部受到了毒害，使政法部门产生了普遍而又严重的右倾倾向。”

“1957年初，省委鉴于政法部门右倾思想严重，决定展开批判。当时李世农采取两面手法，在省委会议上不表示意见，背后却指挥他的爪牙陈仁刚、杨效椿、李锐等有计划地到各地‘查错反左’，搜集反党材料，并通过检查系统在全省普遍登记党委建议处理的所谓错案，寻找岔子，煽动政法干部反对省委的反右倾决定，向党发动猖狂进攻。他们明目张胆地诬蔑省委提出反右倾之后，下面‘搞得很糟’，不许政法部门将省委反右倾指示下达，号召政法干部要‘坚持原则，不要怕摘掉乌纱帽’。去年大鸣大放期间，他们的反党气焰更为嚣张。李世农在全省政法会议上，公然攻击省委的反右倾方针，否定反右成绩，他叫嚣：‘反右发生了偏差，省委要负主要责任’，谈反右成绩是主要的，这是个‘老公式’。公开挑拨政法干部与党委的关系，煽动政法干部与党委对抗，他把各级党委对某些政法干部右倾思想的正确批评，说成是‘党委过分责备政法干部’，他诬蔑党委搞错了案件，并要党委向政法干部‘承认错误’。他为了遂行其反党活动，还散播了‘合作化后，已经没有两条路线斗争’，现在经济基础已经改变，今后斗争只是‘新旧思想的斗争’，资产阶级走社会主义的道路是‘自己阶级的志愿’等等反动谬论，企图以此取消阶级斗争，取消无产阶级专政。”

“不仅如此，李世农还在许多重大问题上，一贯违抗中央的方针、政策，破坏党的统一领导。在土地改革时期，他庇护地主阶级利益；在合作化时期，他坚持资本主义道路；在生产和救灾方面，他

反对生产改革和生产自救的政治措施；在建党工作和干部工作方面，他歪曲建党原则，破坏党的纯洁，为反、坏分子大开方便之门；他篡改党的审干原则，宽纵叛徒和自首分子，把这些人的审查结论中的严重政治情节删去，甚至将‘对党不忠实’改为‘对党忠实’；他一贯包庇坏人坏事，对一些严重违法乱纪分子，百般掩护，多方照顾。他蓄意破坏党的统一，诽谤省委领导同志，煽动干部反对省委，阴谋篡夺省委领导；他培植个人势力，实行派别性的干部政策，拉拢落后分子，凡对党不满的人，他都同情和支持。”

决议揭发李世农“反党集团”的手法。“李世农为着施展他的反党阴谋，还运用了剥削阶级的那套权术，一贯采取两面手法，当面一套，背后一套，打击别人，抬高自己，甚至以‘模范党员’自封。他长期隐瞒党对他的处分，吹嘘自己‘德有余而才不足’。而且伪装朴素，假冒忠厚，把自己打扮成为一个十足的克己奉公的正人君子。他就是这样来骗取组织、骗取群众信任的。杨效椿、李锐是李世农反党集团的两员主将。他们长期相互勾结，相互包庇，相互捧场。除上面已说到的那些事实之外，会议还揭发了杨效椿、李锐的许多罪行。杨效椿亲手宽纵了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一百余名，错误地释放了大批被劳动教养的人，并且诬蔑1955年的肃反运动是‘犯了扩大化的错误’。他包庇右派分子，甚至公然提拔已经暴露的右派分子，扩充其反党势力。”

“李锐长期隐瞒恶霸地主的家庭情况，解放后，又极力包庇几个负有血债的恶霸哥哥，并给他们安插工作，他还将不少反、坏分子引进国家机关，甚至对明显的右派分子加以提拔。他常常借口‘人民内部问题’、‘犯罪未遂’、‘后果不严重’等等，拒绝批准逮捕和起诉，为大批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开脱罪责，并亲手宽纵了三十余名罪犯。他一贯抗拒省委决定，把省检察院变成独立王国，并竭力煽动检察干部反对党的领导和监督。他阴谋改变国家监察机关的性质，甚至公然宣称检察机关是保护犯人的。”

决议指出李世农“反党集团”的根源：“会议一致指出：以李世农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阴谋活动，并不是偶然的，而是有着深刻的历史的社会的根源。李世农、李锐都出身于地主家庭，虽然党对他们进行了长期教育，但他们一直拒绝改造，他们的剥削阶级本质，毫无改变。李世农在土改时曾说，家庭被划为富农（实际是地主），土地没收，思想为之一动，李锐在反匪反霸中，曾为恶霸家庭受到清算而痛哭流涕。这就是他们那种剥削阶级思想感情的自然流露。在

民主革命时期，李世农，李锐虽然百般伪装，混过了关，但就在那个时候，他们的反动本质，亦有所表现。李世农在抗日战争初期，把党所组织的武装送给了封建势力。在解放战争中，他在淮南工作时，又退却逃跑。李锐也和李世农一样，犯过逃跑主义的错误，他曾在战争紧急关头，放弃自己负责的工作地区。杨效椿系富农家庭出身，入党后，由于没有得到彻底改造，存在着资产阶级的极端个人主义，当个人欲望没有得到满足时，就由对党不满，仇恨党，与党对立，终于蜕化变质，走上反党道路。正是由于他们有的坚持反动立场，有的蜕化变质，所以他们就很自然地勾结起来，组成反党集团。当社会主义革命深入发展，阶级斗争激化的紧要关头，他们的反党活动就更加露骨，更加嚣张，他们的反动面目也就赤裸裸地暴露出来了。去年春天大鸣大放期间，资产阶级右派不甘心于剥削制度的死亡，向党发动疯狂进攻，反革命分子和地主、富农中的反动分子也乘机进行破坏活动。同时在国际上，由于帝国主义利用匈牙利事件掀起了反共高潮，修正主义思潮一度猖獗，他们竭力攻击无产阶级专政、攻击党的领导、诽谤马列主义。在这样的国际国内情况下，李世农反党集团从他们的剥削阶级立场出发，利用党外右派分子进攻的声势，借助于修正主义的谰言，就向党进行了有组织有计划的更为恶毒的进攻。所以，这一反党集团的形成，以及他们的反党活动在去年5月达到了高峰，是不足为奇的。这是他们坚持剥削阶级立场的必然结果，这是国际国内尖锐的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他们的反党活动是资产阶级右派对党进攻的一个组成部分。历史无情地证明了：他们完全是一伙长期隐藏在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和蜕化变质分子。”

决定对李世农等人进行处分：“会议一致认为：李世农、李锐和杨效椿是混入党内不堪改造的阶级异己分子和不可救药的蜕化变质分子，是党内的右派。大会一致决议：开除李世农、杨效椿、李锐的党籍，撤销他们党内的一切职务，并建议有关方面撤销他们党外的一切职务。”¹

3月10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中国共产党安徽省委员会第一书记曾希圣题为《巨大的胜利 深刻的教训》的报告，《人民日报》编者按：“安徽省委第六次扩大会议揭露李世农反党集团，使我们的党在整风运动中的一个巨大胜利。经过这次会议，不只清除了隐藏

¹ 《人民日报》1958年3月10日

在安徽党组织内的一窝右派分子，不只清除了在安徽政法部门中执行右派纲领的孽根，而且通过大鸣大放辩论，有力地批判了党内各种错误思想，大大提高了党内的思想水平，端正了两条路线斗争的政治方向。……本报今天将曾希圣同志总结报告的第四部分刊载如下，希望同志们一读。”¹

我们应当从李世农反党事件中吸取那些教训呢？只摘一下小标题就可以了。第一、党的政治警惕性必须提高，对危害党、危害人民的言行必须坚决斗争。第二、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必须维护，绝不容许破坏。第三、对中央的指示和方针政策必须全面理解，防止任何歪曲和篡改。第四、共产主义人生观必须确立，不能做一个冒牌共产党员。第五、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水平继续提高，学习的思想障碍必须克服。²

3月10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对敌人必须专政到底——论安徽省委揭露李世农反党集团的巨大胜利》的社论。批判了无产阶级专政取消论：“反右派斗争中政法部门揭露出来若干党内外右派分子，如监察部副部长王翰，最高法院刑事审判庭庭长贾潜，最高人民检察院运输检察院副检察长刘惠之，浙江省省长长沙文汉、副省长杨思一，以及浙江省司法厅厅长姜震中、福建省司法厅厅长何公敢、四川省司法厅副厅长张雪岩等人，他们的反动手法虽然各有不同，但是他们和李世农右派集团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他们不只是妄图把无产阶级镇压敌人的专政机关变成使敌人逍遥法外的保镖机关，他们还故意制造出一套无产阶级专政取消论，为他们的罪孽作掩护；而且用这些反动谬论毒害政法部门若干工作干部的思想。因而安徽省委这次扩大会议，在揭发李世农反党集团的时候，还特别着重通过大鸣大放辩论大字报的形式，有力地批判了这种无产阶级专政取消论，批评了阶级斗争中这种危害极大的右倾思想，对当前的思想斗争作了重要的贡献。”

“在机关肃反和社会镇反当中，李世农认为：‘残余的反革命保险一个也捉不到。’既然少到一个也捉不到，那还有什么反革命需要肃清呢？肃反工作不是就没有什么必要了吗？因此在1957年5月安徽省政法工作会议上，他公然主张把无产阶级专政的主要矛头，不要对准反革命分子，而要对准一般刑事犯。他还说什么‘反

¹ 《人民日报》1958年3月10日编者按

² 《人民日报》1958年3月10日编者按

革命分子也有两面性’，说什么隐藏在革命阵营内的反革命分子，也为革命干了工作，甚至说什么‘反革命分子在我们内部多干一年工作就等于多赎一年罪’！因此，他希望人民把反革命分子当成有功之臣，应该将功折罪免于法办。这就是李世农反党集团的取消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论点。”

提出对李世农这些右派进行无产阶级专政：“像李世农这些右派分子，有的是钻到我们党内来的反动阶级的代理人，有的是蜕化变质的各种反动分子，他们是故意认敌为我，敌我不分。但是确实还有不少政治经验幼稚的人，也往往分不清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是两种性质完全不同的矛盾。把人民内部矛盾当成敌我矛盾来处理，向不久以前山东四级干部会上所揭露和批判的那些人那样，当然是错误的；而把敌我矛盾也当成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更是大错特错。李世农反党集团和其他右派反党集团的揭露，再次证明敌我矛盾仍然存在，反革命分子仍然存在，我们和阶级敌人的斗争仍然是你死我活的生死之争，我们对阶级敌人不能有任何麻痹大意。我们决不能忘记，资产阶级按其本性的发展来说，它和工人阶级的矛盾是对抗性的，去年夏季资产阶级右派向党 and 人民发动猖狂的进攻，正是这种本性发展的表现。如果党和人民去年不对右派的进攻进行坚决的反击，将会产生这样严重的结果，难道还不明显吗？所以我们丝毫也不能削弱对敌的专政，只要世界上还有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只要还有敌人，我们对敌人就要专政到底！”¹

可以看出，李世农一案是反右派斗争当中重大案件，引起《人民日报》编者加了按语，配发了社论，在全国造成极大影响。直“到1962年7月，也就是曾希圣被免去中共安徽省委书记一职不久，安徽省委即对他（李世农一引者）的问题进行甄别，并报中央监察委员会同意，决定撤销开除他党籍的决议，恢复了党籍、名誉、职务和级别”。²李世农个人问题虽得到解决，但李世农“反党集团”问题并没有彻底解决。

自从1957年6月8日发出反击右派的总动员令后，从中央到地方，从党外到党内，从大知识分子到小知识分子（包括中、小学教师），以及大学生中抓出几十万右派分子，经过揭、批、斗、整等右派、歼灭性打击“章罗同盟”及其有关右派和深入挖掘省部级“反党集

¹ 《人民日报》3月10日

² 朱正著：《1957年夏季：从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第480页

团”等右派的几个月战斗，清除了各级领导身边的不同意见、不同政见，以及向党提出负责任、较高质量意见、建议的人，一句话，清除了党内外知识分子中的精英人才，使反右派斗争取得全面的“胜利”。这个所谓“胜利”是以中国知识分子的悲惨命运为代价的，也是拿中国前途当作赌注的。

第二节 反右接近尾声

在反右派斗争取得战果的基础上，为进一步从政治上孤立、分化右派，从思想上批判资产阶级思想，为争取中间派，壮大左派队伍，从政治思想上巩固无产阶级领导权。毛泽东、党中央发表、发布讲话、下达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建议和指示对右派进行组织处理和“反右补课”，争取使整风、反右取得“全面胜利”。

一、迟到的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

从1957年6月8日开始反击右派，经过四个多月的战斗，抓出了、划了、批斗了大批右派分子，已取得反右派斗争重大战果。直到10月15日中央才下达较为具体的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接着对右派分子进行组织处理。从此中国向“左”转，“左”的错误开始在全党全国占据主导地位。

1957年5月15日，毛泽东在《事情正在变化》一文指出“在我们的国家里，鉴别资产阶级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政治上的真假善恶，有几个标准。主要是人们是否真正要社会主义和真正接受共产党的领导。”¹6月8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人民日报发表《这是为什么？》的社论。社论借用何香凝的话指出：“今天是新时代了，在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我们走上社会主义。难道这个时代，也就一切都是清一色，再也不会左、中、右了吗？不会的。”她指出，“有极少数人对社会主义是口是心非，心里向往的其实是资本主义，脑子里憧憬的是欧美式的政治，这些人就是今天的右派。”²这里暗示了什么是右派的标准。

反右派斗争开始后的第十一天，1957年6月19日，人民日报公开发表了经过毛泽东修改过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提出了六条区分香花和毒草的政治标准：“（一）有

¹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28页

² 《人民日报》1957年6月8日

利于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而不是分裂人民；（二）有利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而不是不利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三）有利于巩固人民民主专政，而不是破坏或者削弱这个专政；（四）有利于巩固民主集中制，而不是破坏或者削弱这个制度；（五）有利于巩固共产党的领导，而不是摆脱或者削弱这种领导；（六）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国际团结和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国际团结，而不是有损于这些团结。这六条标准之中，最重要的是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两条。”¹用既抽象又原则、灵活而不易掌握的标准作为划分右派的标准，必然犯错误。

7月11日，中央批转统战部《关于划分左、中、右的标准的建议》，对这六条标准做了进一步的解释，虽然具体了些，但仍较空泛，不便于掌握。²8月29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各民主党派的严重任务》的社论，其中提出“什么是改造的标准？”指出：毛泽东主席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提出了判别是非的六条标准，其中最重要的是社会主义道路和共产党领导。这是我国政治生活中的根本标准，自然也是各民主党派进行自我改造的根本标准。各民主党派在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历史任务，就是要按这六条标准，去向他们所代表和联系的阶层和人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推动和帮助他们完成社会主义的自我改造；而不应当去代表他们的资本主义的倾向和要求，就是说不应当代表他们违反历史发展规律和利益，而只应当代表他们遵循历史发展规律的利益。为此，各民主党派必须对自己的成员进行‘破资本主义立场，立社会主义立场’的教育，对个人对集体进行彻底的改造，而目前，首先要进行普遍深入的整风运动，在整风运动中彻底粉碎右派集团，孤立、分化右派分子，帮助多数处于中间状态的人们同右派划清界线，进一步改造政治立场。这是各民主党派当前的严重政治任务。”³这个改造的标准，实际上成为划右派的政治标准。

9月15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为什么说资产阶级右派是反动派？》的社论，提出划分革命与反动的标准：“什么是反动？反动和革命是矛盾斗争的的两种倾向，反动就是逆革命之潮流而动。历史是向前运动的。按照历史发展的方向，坚决地打破旧制度，创建

¹ 《人民日报》1957年6月19日

² 参见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回顾》下册第621页

³ 《人民日报》1957年8月29日

和发展新制度，把社会推向前进，就是革命。违反历史发展的方向，在新制度产生以前顽固地维护旧制度，在新制度产生以后破坏新制度，企图恢复旧制度，把社会拉向后退，就是反动。”“在今天，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什么是划分革命和反动的标准呢？现阶段中国前进的方向是彻底完成社会主义革命。因此，反对资本主义道路，拥护社会革命事业和建设事业，就是把社会推向前进，就是革命；坚持资本主义道路，敌视和破坏社会主义的革命事业和建设事业，就是把社会拉向后退，就是反动。”¹上述划分右派的标准，可以说是以原则性和抽象概念代替具体的可操作性的标准，用这种标准来划分右派，往往是掌握不准的。错划了大量可划可不划的人，使右派人数猛增，造成大量冤假错案。

什么样的人划右派？这是个政治标准，是一个非常严肃关系到人的政治生命的问题。但1957年6月8日开始反右派的四个月后的10月15号，中共中央才下达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中共中央关于划分右派分子标准的通知》（一九五七年十月十五日）现将全文引用：

自反右派斗争开始以来，不少地方和部门分别拟定了一些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并要求中央予以审查批准。考虑到斗争中的实际需要，中央认为有必要制定一个统一的标准，以免各单位在划分右派分子的时候有畸轻畸重的地方。现在将经过中央讨论通过的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发给你们，请即下达到一切进行反右派斗争的单位，予以认真研究，在划分右派分子的时候即以此件为标准。同时望注意：

（一）全国反右派斗争一般是进行得健康的，所划分的右派分子，一般是适当的，但是也有划多了和划少了的情况。而在运动进行到深入阶段，在切实纠正了温情主义右倾情绪以后，一些单位把右派的标准放得宽了一些，以至多划了一部分右派的情况，比较更需要引起注意，无论划多了或划少了，都应该按照正确的标准及时地实事求是予以改正。但是在右派划的多了，需要改正的单位，必须注意保护群众和积极分子的热情和正义感，不要使人产生“反右派斗争过火了”的错误印象。有些中右分子有过不利于社会主义的言行，但是不够右派，如果当作右派斗争了现在不要当众宣布对他的批判是错误的，因为既有错误言行就应该批判。但是应在内部改划为中右分子，按中右分子对待，并注意多加教育争取，到适当时机

¹ 《人民日报》1957年9月15日

可以宣布情节轻微已有悔改，脱掉他们的右派帽子。

(二)为了正确地划分右派分子，达到既不多划又不少划的目的，除了要有适当的标准，还要有适当的审查批准手续，凡有各单位确定为右派分子的名单，必须报告县一级或县一级以上的党的领导机关审查批准。高级知识分子、重要民主人士中的右派分子和其他有特殊情况的右派分子的名单，必须报告省一级或省一级以上的领导机关审查批准。

(三)上级领导机关必须认真地审查所属单位上报的右派分子的名单外，还必须教育党员和群众十分重视对于实际情况的认真研究和具体分析，力戒浮夸和片面。同时，还必须经常主动地细心地抽查和调阅所属单位右派分子的详细材料，及时纠正其中偏宽或偏严的错误，并且对于极右分子、一般右派分子和中右分子的界限举出具体的人物和材料，切实帮助正确划分的标准。

附：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

(一)凡言论、行动属于下列性质者，应划为右派分子：

(1)反对社会主义制度。反对城市或农村中的社会主义革命，反对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关于社会经济的基本政策（如工业化、统购统销等）；否定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坚持资本主义立场，宣扬资本主义制度和资产阶级剥削。

(2)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反对民主集中制。攻击反帝国主义的斗争和人民政府的外交政策；攻击肃清反革命分子的斗争；否定“五大运动”的成就；反对对资产阶级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改造；攻击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人事制度和干部政策；要求用资产阶级的政治法律和文化教育代替社会主义的政治法律和文化教育。

(3)反对共产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领导地位。反对共产党对于经济事业和文化事业的领导；以反对社会主义和共产党为目的而恶意地攻击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机关和领导人员、污蔑工农干部和革命积极分子，污蔑共产党的革命活动和组织原则。

(4)以反对社会主义和反对共产党为目的而分裂人民的团结。煽动群众反对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煽动工人和农民分裂；煽动各民族之间的分裂；污蔑社会主义阵营。煽动社会主义阵营各国人民之间的分裂。

(5)组织和积极参加反对社会主义、反对共产党的小集团；蓄谋推翻某一部门或者某一基层单位的共产党的领导；煽动反对共产党、反对人民政府的骚乱。

(6) 为犯有上述罪行的右派分子出主意，拉关系，通情报，向他们报告革命组织的机密。

(二)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应划为极右分子：

(1) 右派活动中的野心家、为首分子、主谋分子和骨干分子。

(2) 提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纲领性意见，并积极鼓吹这种意见的分子。

(3) 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活动特别恶劣、特别坚决的分子。

(4) 在历史上一贯反共反人民，在这次右派进攻中又积极进行反动活动的分子。

(三)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其错误应予批评纠正，但不应划为右派分子：

(1) 在根本立场上并不反对社会主义和党的领导，而只是对于局部性的工作制度，局部性的不属于根本原则的政策，工作中的问题，学术性的问题，共产党的个别组织，个别工作人员表示不满，提出批评的人，即使意见错误，措词尖锐，也不应划为右派分子；同样，在根本立场上并不反对社会主义和党的领导，而只是在思想意识上有某些错误的人，也不应划为右派分子。

(2) 有过类似右派的思想，但是并未发表过或散布过，而且已经认识错误、自动检讨出来的人，或者偶然讲过类似右派的话，现在已经承认错误，而在历史上一贯不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人，不应划为右派分子。

(3) 对于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制度或共产党的领导发表了错误的言论，但是并未积极宣传，事实证明不是出于敌意，经过指正表示愿意转变的人，不应划为右派分子。

(4) 一度盲目地附和右派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行，或者一度被蒙蔽参加了右派小集团，或者一度被右派利用，在了解右派错误以后，迅速地站在正确立场，同右派决裂的人，不应划为右派分子。

(5) 历史上曾经站在反动立场，现在也没有显著的转变，但在右派进攻时期并未进行反动活动的人，不应划为右派分子。

(6) 凡是界乎右派分子和中右分子这间的疑似分子，在尚未查出足以确定为右派分子的充分材料之前，一概不划为右派分子，并且不用斗争右派分子的方法来对待他们。

这个“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下达之前，根据党的八届三中全会估计，全国已划右派分子大约十五万人。这个《通知》注意事项第一项指出：右派划多了，需要改正的单位，注意保护积极分

子的情感和正义感，不要使人产生“反右派斗争过火了”的错误印象；不够右派，当作右派斗了，不要当众宣布对他的斗争、批判是错了，应改划为中右分子，按照中右分子对待，有了悔改后，脱掉他们的右派帽子。按照这个精神，在“注意保护群众和积极分子的热情和正义感”的借口下，右派划多了的单位，很难予以改正。对于不够右派，批斗错了，改划为中右分子，按中右分子对待，实际上中右分子也是右派，这是将错就错，扩大了右派队伍，为自己多树立一些对立面。

10月15日，中共中央下达《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之前，全国已有几十万人被打成右派分子，下达之时，正如薄一波评述这个标准时说：“当时强调反对‘右倾情绪’的气氛下，却是很难做到的，实际上很多……人都被划成了右派分子。如把说了几句错话，属于认识上的问题，说成是反党反社会主义；把几个人在一起的自由议论，说成是反党小集团；把对某个或某些领导人的正常批评，说成是向党进攻；把向党交心，检查自己的错误思想，说成是恶毒攻击，思想反动；把在理论问题研究中的不同见解，说成是反对马列主义等等，这就不能不导致反右派严重扩大化。”¹

党史专家评论10月15日下达“划右的标准”说：“当时‘宁左勿右’的空气之下，各单位在贯彻这个《标准》时，对文件中的应引起‘注意’的地方并未引起注意，实际上很多‘不应划为右派分子’的人被划成右派分子。标准不是愈来愈紧，而是越来越宽，以至后来，为了实现右派指标，已经没有什么标准了。”²

这是下达一个‘宁左勿右’的标准。下达这个标准，不过是追认已划右派的“合法性”。笔者是在反右派斗争高潮期间被打成右派分子的，即正式下达划分右派分子标准之前就成了右派分子。根据中科院哲学所整风领导小组整理的材料，即“团内右派登记表”，简称“结论材料”。就是这份“结论材料”定笔者为右派分子，而笔者没有见到这个“结论材料”。更没有在材料上签名，可是笔者照样当了二十多年右派分子。标准下达后，在当时笼罩在“左”倾情绪下，有无此标准，并不影响划右派、抓右派，一个支部书记说谁是右派，谁就是右派，甚至一个整风领导小组长也可以定某某为右派分子。

¹ 《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第621—622页

² 晋夫《文革前十年的中国》中共党史出版社，1998年第45页

从1957年6月8日开始反右派斗争，已经抓了、划了右派分子十五万人，到10月15日才下达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这个标准下达之前是根据毛泽东在6月19日公开发表的《正处》一文中区别香花和毒草的六条标准来抓右派和划右派的。10月15日下达的划分右派的标准中，规定可划的六条，犯了其中一条就可以划成右派分子。可见，这个标准掌握、操作起来具有很灵活的随意性、伸缩性。标准下达前后，中央、党报一再号召和发表社论，大反温情主义和右倾情绪，党的领导和党员干部怕自己温情、右倾，怕丢乌纱帽，‘宁左勿右’，甚至个别领导和干部乘机打击、报复，在这种“左”倾情绪下，右派分子猛增了四十多万人，待反右派补课结束后，全国抓了划了五十多万人，还抓了划了反社会主义分子三十多万人，抓出名目繁多的“反党集团”20多个。

当时按照这个标准，划了五十五万多右派分子和三十多万反社会主义分子，二十多个“反党集团”。1978年12月落实政策，改正了五十四万多人，平反了三十多万反社会主义分子和二十多个“反党集团”。从数字上证明反右不仅扩大化了，而且根本上是错误的。其根源在于与其说是一个‘宁左勿右’的标准，不如说是制定和使用这个标准的人。制定和使用这个标准的人，上从反右派斗争的发动者、支持者，下至党支部、党小组，甚至党员个人都‘宁左勿右’，多抓多划右派分子，利用标准中规定可划右派分子六条，犯了其中一条即可划右派分子，这六条可划右派分子的伸缩性标准很不确定，可大可小，掌握标准的领导者的主观随意性，还带有打击报复的私心杂念，这样划右派分子的数量就会增多。像河南省委抓的右派分子数量居全国之冠，湖北省委抓右派分子也不落后，仅次于河南省委。

总之，1957年10月15日，下达的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起到了临时法律条文的作用，是党的意志的体现，是人治的体现，即典型的以言代法、以言定罪的体现。如果在正常的民主法治国家，是根本不可能出现的。只在缺乏法治的国度里才出现执政党直接下指示，定标准，给不同意见的人扣上反党反社会主义反人民右派分子帽子的局面，而且一戴上帽子长期不摘，直至新领导出来纠正前任的错误。这对国家、民族和个人的损失太大、太多、太长了。以后，是否有所改进，这就要看新的领导吸取历史教训的程度和政治体制改革的程度和深度了。

二、毛泽东部署全民整风和处理右派

毛泽东于1957年10月9日在党的八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三次全会上的讲话和10月13日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三次会议上的讲话，其中部署有关全民整风与处理右派问题。

部署全民整风。毛泽东提出全民整风的任务。首先提出基层的整改：“要大胆地放，彻底地放，坚决地放；要大胆地改，彻底地改，坚决地改”。“现在的重点是基层的放，基层的改，就是县、区、乡三级的鸣放和整改”。“整风有两个任务：一个任务是反右派，包括反资产阶级思想；一个任务是整改，整改里头也包含两条路线斗争。”“整风有四个阶段：放，反，改，学。就是一个大鸣大放，一个反击右派，一个整改，最后还有一个，学点马克思列宁主义。”“今年5月1日，中共中央发表的整风文件中讲和风细雨，当时许多人不赞成，主要是右派不赞成，他们要来一个急风暴雨，结果很有益处。……那时候右派他们说，你们不能驳，只能他们鸣放。我们也讲，要让他们放，不要驳。所以，5月我们不驳，6月8日以前，我们一概不驳，这样就充分鸣放出来了。鸣放出来的东西，大概百分之九十以上是正确的，有百分之几是右派言论。在那个时候，就是要硬着头皮听，听了再反击，每个单位都要经过这么一个阶段。这个整风，每个工厂，每个合作社都要搞。现在军队也是这样搞。这样搞一下很必要。只要你不搞，‘自由市场’又要发展的。……资本主义思想又要抬头。”¹

其次反复肯定鸣放形式及其作用：“今年这一年，群众创造了一种革命形式，群众斗争的形式，就是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现在我们革命的内容找到了它的很适合的形式。……我们找到了这个形式，适合现在这个群众斗争的内容，适合现在阶级斗争的内容，适合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我们的民主传统今年是一个很大的发展，以后要把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这种形式传下去。这种形式充分发挥了社会主义民主。这种民主，只有社会主义国家才能有，资本主义国家不可能有。”“现在整风找出了一种形式，就是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这是群众创造的一种新形式。”“在大多数人拥护社会主义这个基础上，在现在这个时候，出现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这种形式，很有益处。这种形式是没有阶级性的。什么大鸣、大放、大字报，右派也可以搞，感谢右派，‘大’字是他们发明的。我在今年二月二十七日的

¹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66、476、487-488页

讲话中，并没有讲什么大鸣，大放，大辩论，没有这个‘大’字。去年5月，我们在这里开会讲百花齐放，那是一个‘放’，百家争鸣，那是一个‘鸣’，没有这个‘大’字，并且是限于文学艺术上的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的百家争鸣。后来右派要涉及政治，就是什么问题都要鸣放，叫做鸣放时期，而且要搞大鸣大放。可见，这个口号无产阶级可以用，资产阶级也可以用，左派可以用，中间派可以用，右派也可以用。……归根到底，对无产阶级有利，对资产阶级右派不利。”“用我们的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办法，可以避免匈牙利那样的事件，也可以避免现在波兰发生那样的事件。”¹

第三改变八大对主要矛盾的提法：毛泽东说：“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革命的锋芒是对着资产阶级，同时变更小生产制度即实现合作化，主要矛盾就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概括地说，就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矛盾。‘八大’的决议没有提这个问题。‘八大’决议上有这么一段，讲主要矛盾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这种提法是不对的。”“社会主义革命是在一个什么范围内的革命，是一些什么阶级之间的斗争呢？这是无产阶级领导劳动人民同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我国无产阶级数目比较小，但是它有广大的同盟军，最主要的就是农村里头的贫农、下中农，他们占农村人口的百分之七十或者还要多一点。富裕中农大约占农村人口的百分之二十。”“工人阶级人数虽然少，但只有这个阶级有前途，其他的阶级都是过渡的阶级，都要过渡到工人阶级那方面去。农民头一步过渡到集体化的农民，第二步要变为国有农场的工人，资产阶级要灭掉，不是讲把人灭掉，是把这个阶级灭掉，人要改造。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要改造，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也要改造，可以逐步地改造过来，改造成为无产阶级知识分子。”²

第四提出红与专的问题：毛泽东说：“我们各行各业的干部都要努力精通技术和业务，使自己成为内行，又红又专。所谓先专后红就是先白后红，是错误的。因为那种人实在想白下去，后红不过

¹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67、468、480、485-486页

²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75、483、486-487页

是一句空话。现在，有些干部也不红了，是富农思想了。有一些人是白的，比如党内的右派，政治上是白的，技术上又不专。有些人是灰色的，还有一些人是桃红色的，真正大红，象我们的五星红旗那样的红，那是左派。但是单有红还不行，还要懂得业务，懂得技术。现在有许多干部就是一个红，就不专，不懂业务，不懂技术。右派说我们不能领导，‘外行不能领导内行’。我们驳右派说，我们能领导。我们能者是政治上能。至于技术，我们有许多还不懂，但那个技术是可以学懂的。”“所谓先专后红，就是先白后红。……知识分子要同时是红的，又是专的。要红，就要下一个决心，彻底改造自己的资产阶级世界观。这并不需要读很多书，而是要真正弄懂什么叫无产阶级，什么叫无产阶级专政，为什么只有无产阶级有前途，其他阶级都是过渡的阶级，为什么我们这个国家要走社会主义道路，不能走资本主义道路，为什么一定要共产党领导等等问题。”“知识分子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把他的资产阶级世界观改造成无产阶级世界观，这要一个过程，而且要有一个社会主义思想革命运动。今年这个运动，就是开辟这条道路”。¹这两次讲话的基本精神是违背“八大”决议，特别是违背“八大”对主要矛盾的提法，这两个讲话是“左”的指导思想的发展和延续，其影响极其深远。

贯彻落实全民整风指示。根据毛泽东上述讲话精神，1957年10月2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大胆地改、坚决地改、彻底地改》的社论。要求：“在进行思想动员工作的时候，领导人员要明确地表示态度，表示整改的决心，并且向群众说明，运动的第三阶段和第二阶段性质和内容上都是不同的，第二阶段以反击右派为主，目的是解决敌我矛盾；第三阶段是以整顿作风，改进工作为主，目的是解决人民内部矛盾，而解决人民内部矛盾正是这次整风运动的主题。”²

接着，1957年11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全民整风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发展》的社论。社论开头指出：“近年来的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是我国过渡时期在政治上和思想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运动。也是一个全民性的社会主义民主运动。这个运动从政治界、文化界科学界的工作人员和知识分子中开始，逐步

¹ 《毛泽东选集》第5卷 第471-472、489-492页

² 《人民日报》1957年12月21日

扩大到工人、农民、工商业者、中小学教职员和军队中间，已经具有全民的性质和全民的规模了。这个运动所要解决的问题是我国过渡时期的两种不同性质的矛盾，即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的矛盾。解决这些矛盾所采取的方式，是大鸣大放、大辩论、出大字报、开座谈会、开辩论会和几乎一切报纸刊物上作报道、写文章等目前已经普及的方式。这是适合于目前政治上和思想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内容的一种社会主义民主的新形式。”

接着指出：“我们采用这种形式进行党的、国家机关的和全民的整风运动，使我们的民主工作方法的一个重大的新发展。……我们找到了社会主义民主的这种形式，今后许多事情就好办了。无论革命问题或者建设问题，无论大是大非或者小是小非，都可以经过大鸣大放、大辩论而迅速地得到解决。各机关、各学校、各企业的大字报，都可以逐步地变为进行这种鸣放和争辩的一种经常性的武器。……由此可见，大鸣大放、大争大辩的方法，应该成为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方法。……一切大鸣大放、大争大辩，大字报，归根结底，只能有利于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而不会有利于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的敌人。右派害怕群众，不相信群众是有理由的，左派害怕群众、不相信群众是没有理由的。”

最后指出：“目前全国人民正在就两条道路的问题，就是说，究竟应该走社会主义的道路还是应该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展开大鸣大放、大争大辩，这是完全必要的。应该进一步对这个问题展开热烈的大辩论，使人人都彻底地弄清楚这两条道路的好坏和是非。对于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的问题，也应该发动群众，大鸣大放，贴大字报，开座谈会，弄清是非，找出原因和纠正的办法，并且监督这些办法的实行。各级党政组织、政府机关、人民团体、学校、企业和部队所规定的某些工作制度和管理制度，有许多不够合理的地方，在目前着重进行整改的时候，尤其应该经过大鸣大放、大争大辩，对这些问题加以整理和解决。……总之，只要坚决地信任群众，把同群众有密切关系的重大问题有领导地交给群众去讨论和辩论，那么，当前的全民整风运动就一定能够得到极为丰富的收获。”¹

人们对全民整风的态度，请看中央国家机关党委在《关于目前反右派斗争和转入整风第三阶段的情况与问题》中可以看出：“当转入整风第三阶段，各单位领导号召中间分子鸣放时，他们则顾虑

¹ 《人民日报》1957年11月1日

重重：怕‘言多必失’；怕‘合法的报复’；怕‘把打狼的鞭子打在羊的身上’。他们对我们的整改决心有怀疑，生怕领导上把群众在鸣放时期提出的意见连同右派分子的言论一笔抹煞。对我们彻底整改持观望与保留的态度。”请看北京市委在《关于北京市的整风运动的报告》：“许多学校对教师的发动还不充分，不少教授不愿意采用大字报的方式提意见，许多中间分子还存在着不少顾虑，有的怕又是一次‘阳谋’，怕‘钓了大鱼又钓小鱼’，‘替社会主义教育找典型’，抱着明哲保身的态度”。¹

共产党整风，全民整风，因为转为反右派斗争和抓漏网右派，第一阶段的党内整风和第三阶段的全民整风都走过场，都夭折了。都没有达到目的，反而变得更糟。正如薄一波所说的：“毛主席提出：我们的目标，是想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邓小平也提出，必须使反右派斗争的结果，有利于而不是不利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个方针的贯彻执行，有利于而不是不利于培养人民群众敢讲话的空气。然而，经过急风暴雨式的反右派斗争，这个‘目标’和‘结果’不仅没有能够实现，反而变得更糟了。……应该说，从反右派开始，……毛主席提倡的那种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一直未能出现，党内民主生活很不正常，‘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也没有认真贯彻执行。”²

从整体来看，整风运动没有达到预期目的，是一次不成功的整风。由于毛泽东把整风重点放在反右派斗争上，使一场整风运动变成一场反右派斗争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使整风运动变质变味而成为一场人为的阶级斗争，给广大知识分子和农村中的上、中、下中农带来极大的不幸和灾难。

对右派处理的建议和原则。第一，严厉批评右派的“老祖宗”。毛泽东说：“罗隆基说，无产阶级的小知识分子怎么能领导小资产阶级的大知识分子呢？他这个话不对。他说他是小资产阶级，其实他是资产阶级。无产阶级的‘小知识分子’就是要领导资产阶级的大知识分子。”“罗隆基不是讲过吗，无产阶级的小知识分子就是领导不了他这个小资产阶级的大知识分子。他不说他是资产阶级，一定要说他是小资产阶级，是小资产阶级的大知识分子。我看，不

¹ 转引朱地《1957年：大转弯之迷》第242页

²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册，第622-623页

仅是无产阶级的小知识分子，就是大字不认得几个的工人、农民，也比他罗隆基高明得多。”“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要承认有改造的必要。右派就不承认自己有改造的必要，而且影响其他一些人也不大愿意改造，说自己已经改造好了。章乃器说，改造那怎么得了，那叫做抽筋剥皮。我们说要脱胎换骨，他说脱胎换骨就会抽筋剥皮。这位先生，谁人去抽他的筋，剥他的皮？……右派中间那些不愿意变的，大概章乃器算一个。你要他变成无产阶级知识分子，他就不干，他说他早已变好了，是‘红色资产阶级’。自报公议吗，你自报可以，大家还要公议。我们说，你还不行，你章乃器是白色资产阶级。”“现在有些右派死不投降，像罗隆基、章乃器就死不投降。我看还要说服他，说几次，他硬是不服，你还能天天同他开会呀？一部分死硬派，他永远不肯改，那也就算了。”“右派不讲老实话，他不老实，瞒着我们干坏事。谁晓得章伯钧搞了那么多坏事！我看这种人是官做得越高，反就造得越大。章罗同盟对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两个口号最喜欢了。他们利用这两个口号反对我们。我们说要长期共存，他们搞短期共存；我们要互相监督，他们不接受监督。一个时期他们疯狂得很，结果走到反面，长期共存变成短期共存。”“这个农业发展纲领草案，是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是中共中央这个政治设计院出来的，不是章伯钧那个‘政治设计院’设计出来的。”¹

第二，对右派头目处理的建议。毛泽东说：“比如右派，过去是人民，现在这些人，我看是三分之一的人民，三分之二的反革命。是不是剥夺他们的选举权？除开个别的要法办、劳改，那要剥夺选举权外，一般的可以不剥夺为好。有的人还可以让他当政协委员，横直政协搞千把人都可以。右派，形式上还在人民内部，但实际上是敌人。我们公开宣布，他们是敌人，我们同他们的矛盾是敌我矛盾，因为他们反对社会主义，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反对无产阶级专政。总之，不合乎六条标准嘛！这是毒草。”“是不是要把右派分子丢到海里头去呢？我们一个也不丢。右派，因为他们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所以是一种敌对力量。但是，现在我们不把他们当作地主、反革命分子那么对待，其基本标志，就是不取消他们的选举权。也许有个别人，要取消他的选举权，让他劳动改造。我们采取不捉人，又不剥夺选举权的办法，给他们一个转弯的余地，以利于

¹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79，484，488—489、491—494页

分化他们。不是刚才讲分两种人吗？一种是改正了以后，可以把右派分子帽子摘掉，归到人民的队伍；一种就是顽固到底，一直到见阎王。他说，我是不投降的，阎王老爷你看我多么有‘骨气’呀！他是资产阶级的忠臣。”“章伯钧的部长怎么样呀？部长恐怕当不成了。右派当部长，人民恐怕不赞成吧！还有一些著名的右派，原来是人民代表，现在怎么办？恐怕难以安排了。比如丁玲，就不能当人民代表了。有些人，一点职务不安排，一点工作不给做，恐怕也不好。比如钱伟长，恐怕教授还可以当，副校长就当不成了。还有一些人，教授恐怕暂时也不能当，学生不听。那么干什么事呢？可以在学校里头分配一点别的工作，让他有所改造，过几年再教书。这些问题都要考虑，是一个麻烦的问题。革命这个事情就是一个麻烦的事情。对右派如何处理，如何安排，这个问题请诸位去议一下。”¹

从上述看出，毛泽东部署全民整风和肯定“四大”；改变了八大对主要矛盾的提法，重提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为主要矛盾，提出对右派要进行严肃批评和处理的原则建议。这几个原则问题对今后产生严重的不良后果。

按毛泽东的整个部署，1957年10月以后，反右派斗争，有的已接近尾声，有的还在进行，有的还需要补课，但就整个反右派斗争而言，开始转入对右派分子进行处理阶段。

对右派处理的原则精神。在1957年7月1日，毛泽东为《人民日报》撰写的《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社论中就提出了宽大为怀，不予办罪的原则性意见，说：“资产阶级右派就是前面说的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反动派，这是科学的合乎实际情况的说明。这是一小撮人，民主党派、知识分子、资本家、青年学生里都有，共产党、青年团里面也有，在这次大风浪中表现出来了。他们人数极少，在民主党派中，特别在某几个民主党派中却有力量，不可轻视。这种人不但有言论，而且有行动，他们是有罪的，‘言者无罪’对他们不适用。他们不但是言者，而且是行者。是不是要办罪呢？现在看来，可以不必。因为人民的国家很巩固，他们中的许多又是一些头面人物。可以宽大为怀，不予办罪。一般称呼‘右派分子’也就可以了，不必称为反动派。”²

¹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78、491-493页

² 《人民日报》1957年7月1日

1957年7月9日，毛泽东在上海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提出给右派穿小鞋：“现在要给什么人小鞋子穿呢？现在我们给右派穿。给右派一点小鞋穿是必要的。”7月，毛泽东在《1957年夏季的形势》一文指出，“不能转变的那一部分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是死硬派，只要他们不当特务，不再进行破坏活动，也给他们一点事做，也不剥夺他们的公民权。这是鉴于许多历史事件采取了极端政策的后果，并不良好。”¹10月9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三次全会上讲话指出：“比如右派，过去是人民，现在这些人，我看是三分之一的人民，三分之二的反革命。是不是剥夺他们的选举权？除开个别的要法办、劳改，那要剥夺选举权外，一般的可以不剥夺为好。有的人还可以让他当政协委员，横直政协搞千把人都可以。右派，形式上还在人民内部，但实际上是敌人。我们公开宣布，他们是敌人，我们同他们的矛盾是敌我矛盾，因为他们反对社会主义，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反对无产阶级专政。”²

以上意见的大意是，毛泽东认为给右派小鞋穿是必要的，但只对一些头面人物以宽大为怀。实际上，反右斗争是毛泽东错了，而错的人给不错的人以宽大，完全是是非颠倒、对错倒置。

1957年10月13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三次会议上建议：“对右派如何处理，如何安排，这个问题请诸位去议一下。”毛泽东说：“是不是要把右派分子丢到海里头去呢？我们一个也不丢。右派，因为他们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所以是一种敌对力量。但是，现在我们不把他们当作地主、反革命分子那么对待，其基本标志，就是不取消他们的选举权。也许有个别人，要取消他的选举权，让他劳动改造。我们采取不捉人，又不剥夺选举权的办法，给他们一个转弯的余地，以利于分化他们。”具体建议：“章伯钧的部长怎么样呀？部长恐怕当不成了。右派当部长，人民恐怕不赞成吧！还有一些著名的右派，原来是人民代表，现在怎么办？恐怕难以安排了。比如丁玲，就不能当人民代表了。有些人，一点职务不安排，一点工作不给做，恐怕也不好。比如钱伟长，恐怕教授还可以当，副校长就当不成了。还有一些人，教授恐怕暂时也不能当，学生不听。那么干什么事呢？可以在学校里头分配一点别的工作，

¹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51、456页

²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78页

让他有所改造，过几年再教书。”¹

1958年1月28日，毛泽东在十四次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指出：“对右派分子，第一要感谢，感谢他们向党进攻，引起人民的愤怒；感谢是因为他们当了反面教员。第二是帮助。所谓帮助，是三七开，十个人有七个人可以改造，逐步转变过来的，……给以帮助。”又说，“我们对右派的批判必须是全面的、深刻的，对右派分子斗争是严肃的，但处理要宽大点，不要宽大无边，要给他们留条路，这是为了教育中间分子，也是为了教育他本人。”²

援引毛泽东上述论点，说明处理右派既不能采取极端政策，但又不能宽大无边，因为，右派是言者，言者有罪嘛，因此，采取“给右派一点小鞋穿”的处理办法，“小鞋子那个东西穿了不舒服”³，但也得穿。这种给人头戴帽子、脚穿小鞋的软硬处理，真叫人心里不舒服，头脚都难受。实际上这是一种极不人道的软刀子处理方法，这种处理方法对巩固统治集团维护个人专制独裁更为有利。历史证明，反右派运动，只有百分零点六的正确，百分之九十九点以上是错误的。一个犯了严重错误的人，给没有犯错误或者本来就正确的人以“宽大为怀”的处理，实际上是软刀子的处理。这是毛泽东时代出现的是非颠倒、本末倒置的荒唐现象。

处理右派的办法和策略。对右派处理的具体办法和策略。中央有关部门根据毛泽东“给右派一点小鞋穿”的原则精神，制定出让右派不舒服又难受的具体办法和策略。1958年1月29日，国务院第96次全体会议通过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关于在国家薪给人员和高等学校学生中的右派分子处理原则的规定，规定处理右派分子的六条办法，其精神如下：第一条，开除公职，劳动教养，不给予生活补助；第二条，撤销职务，监督劳动，给予生活补助，一般不超过20-30元；第三条，撤销原有职务，留用察看；第四条，撤销原有职务，另外分配待遇较低的工作；第五条，降职、降级、降薪，一般从原级一级至四级；第六条，免于处分，只戴右派帽子。⁴看起来似乎比苏联斯大林时代的“大清洗”仁慈、宽大一些，而在长期戴帽，摘了又戴的折磨、折腾人这点上，却远胜于斯大林。

¹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91-493页

² 《毛泽东思想万岁》第58-60卷第14页

³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51页

⁴ 参见武汉大学图书馆藏档案

国务院规定处理右派分子的六条办法之前的1957年8月3日，公布《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指出对于下列几种人应当加以收容实行劳动教养：“罪行轻微，不追究刑事责任的反革命分子，反社会主义的反动分子，受到机关、团体、企业、学校等单位的开除处分，无生活出路的。”¹这条实质上就是为给开除公职的右派而定的，右派中最严重处分是开除公职、劳动教养。这样，右派被送去劳动教养就有了法律根据。

遵照毛泽东的意见，中共中央统战部于1957年12月召开第九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提出对100多名著名民主人士中的右派分子的处理意见，其中，绝大部分是撤职和降职，只有个别人免于处分。与此同时，在反右派斗争中，揭发出一届人大代表中的右派分子有六十二人。经中共中央决定，五十三人由原选区的人民代表大会撤销其代表资格。1958年1月，中央统战部会同中宣部、中组部等有关部门选择了比较知名的九十六名右派分子作为标兵，提出了《对一部分右派分子处理的初步意见》，报中央转发各地参考。九十六人中，绝大多数被开除公职，送劳动教养或实行监督劳动，只有二人，免于处分。²

各民主党派中央在1958年1月间先后都开会：宣布撤销右派分子在各民主党派中担任领导职务，被撤销职务的有：民革中央副主席龙云，中常委陈铭枢、黄绍竑、谭惕吾等；民盟中央副主席章伯钧、罗隆基，中常委曾昭抡、费孝通、黄药眠，钱伟长等；民建中央副主任委员章乃器，中常委毕鸣歧等；农工民主党主席章伯钧，副主席黄琪翔，中央执行局委员李伯球等；九三学社中常委陆侃如，中央委员储安平；台盟主席谢雪红。³1月29日，国务院作出决定，免去章伯钧、罗隆基、章乃器的部长职务。1月3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了这一决定。2月1日，毛泽东主席发布命令，撤销龙云国防委员会副主席职务和黄琪翔的委员职务。

通过对著名民主人士中的右派实行开除公职、劳动教养、监督劳动、撤销职务，毛泽东将过去恩赐给民主人士在政府中的领导权，通通收回来，把领导权牢牢掌握在无产阶级和共产党手中，以便对

¹ 朱正《1957年夏季：从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河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490页

² 参见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下册，第838页

³ 参见朱正著《1957年夏季：从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第512页

资产阶级进行无产阶级专政。这才是反右斗争的目的。

对普通右派分子或一般右派分子的处理，根据中央和地方，城市和农村，各级干部执行掌握政策的水平不同，有的处理宽些，有的处理过严些，但是，从总的处理来看，还是处理过严。

1958年3月2日，《中央转发团中央机关召开右派分子座谈会情况简报的批语》的一个注释中说：团中央第一书记胡耀邦对右派分子“宣读中央关于处理右派分子的六条办法，说明严肃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指出只要他们愿意悔改，党对他们是采取宽大政策的，可以一不按反革命处理，不杀不关，二不剥夺公民权，三大部分不开除公职，给饭吃，给工作做，而且组织上还准备诚恳地帮助他们改造，鼓励他们要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并指出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都很年轻，来日方长，只要愿意继续为人民服务，还可以取得人民的信任，不少人还可能变成好干部。”¹实际情况同胡耀邦当时说的不一样，李维汉回顾说：“全国五十五万余右派分子的人半数以上失去了公职……”²即便按照当时的标准来看，对右派处理也是过重过严了。

现在看看几个单位处理右派的情况：

先看武汉大学对教职员中右派的处理情况。对正、副教授中的右派分子处理情况：正、副教授中有右派分子19人，极右18人，一般右派1人。开除（因自杀逃跑）1人，劳动教养1人，监督劳动5人，留用察看3人，分配待遇较低工作7人，降职降薪2人。19人当中，8人留校劳动，10人离校去八里湖、沙洋农场劳动，1人逃跑自杀。

对讲师中的右派分子处理情况：讲师中有右派分子12人，其中极右5人，一般右派7人。开除公职，劳动教养1人，监督劳动2人，留用察看1人，降职降薪5人，免于处分一人，抗拒改造，畏罪潜逃，予以开除1人。12人当中，2人留校劳动，9人离校去八里湖、沙洋农场劳动，1人逃跑自杀。

对助教中的右派分子处理情况：助教中有右派分子22人，其中极右6人，一般右派16人。劳动教养2人，监督劳动4人，留用察看4人，分配较低待遇工作4人，降职降薪5人，免于处分2人。22人当中，留校劳动9人，离校去八里湖、沙洋农场劳动12人，

¹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第101页

² 李维汉著：《回顾与研究》下册第839页

回家自谋生路1人。

对职员中的右派分子处理情况：职员中有右派分子24人，其中极右6人，一般右派18人。开除公职、劳动教养2人、监督劳动7人，留用察看6人，分配较低待遇工作4人，降职降薪3人，免予处分2人。24人当中，留校劳动6人，离校去八里湖、沙洋农场劳动16人，回家受街道监督劳动2人。

再看看对中小学教师中的右派分子的处理。1958年3月2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正确处理中小学教师中的右派分子、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问题的指示》规定，“要把小学教师中右派分子的大部分（大于百分之七十左右）离开学校另行安置。或者将其中有教学能力而又愿意悔改的，调到教师人数较多和党的领导较强的学校学任教，以观后效”。¹

再看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对右派分子处理情况。科研人员中的右派分子8人，其中极右2人，一般右派6人，开除公职、劳动教养1人，监督劳动1人，撤销原职务，留用察看3人，撤销原职务，另外分配较低待遇的工作3人。科研辅助人员中右派分子3人，其中极右分子1人，一般右派2人。监督劳动1人，留用察看2人。全所右派分子11人中，送北大荒劳动教养1人，其余10人留所干图书资料室事务性的、待遇较低的工作和劳动，像剪报、刻蜡纸，抄写卡片以及在编辑部做些校对、跑印刷厂等事务性工作。1958年以后大部分右派分子分别去农村接受监督劳动。1961年春夏之交发往东北、西北各省，接受监督劳动。

对学生中的右派分子的处理。1958年1月4日，毛泽东在杭州会议上的讲话指出：“学生中的右派，百分之八十可以留校继续读书，要加强对他们的工作，学生要和他们往来，逐步把他们化过来、他们做了好事也要表扬，当然也有假积极的。”²毛泽东关于对右派学生百分之80可以留校继续读书的讲话还有几处。1月31日，毛泽东谈到对学生中的右派处理时说：“学生中的大部分普通右派分子也不只烂了一个指头，但又不是全烂了，所以还可以留在学校里。”³毛泽东对学生中的普通右派分子进行“宽大”处理，留在学校为学生树立一个反面教员，起到杀鸡给猴看的作用，起到反党就

¹ 转引叶永烈《反右派始末》第566页

² 《毛泽东思想万岁》第1958-1961卷第5页

³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第59页

成右派的作用，起到毒草肥田的作用。等到毕业分配，接受单位让他们做些用非所长的工作，只能起到笨重的劳动力的作用。

现在引用武汉大学对学生中的右派分子处理情况：该校学生中的右派分子254人，其中极右67人，一般右派187人。254名右派分子，留校165人，离校去八里湖、沙洋农场、潜江农村等劳动89人。中文系学生中的右派分子50人，其中极右14人，一般右派分子36人。开除、劳动教养3人，劳动考察10人，留校察看29人，免于处分7人，不接受处分，取消学籍1人（受劳动考察处分）。从上述留校、离校的比例得出，留校右派将近三分之二，占百分之六十六点弱，离校学生近三分之一强些，占百分之三十三强。这个留校继续读书的比例没有达到毛泽东所要求的百分之八十的比例。所以，下面执行上级指示往往产生过严、过重的情况。

上海在反右派斗争中处理了2.8万余人，其中，定为右派分子的为1.63万人；工人、营业员、民警因中央规定不划右派分子，而被定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的有4543人；主要因右派问题，而戴的是“四类分子”或其他敌我矛盾性质的帽子的有1154人；“中右分子”虽不戴“帽子”，但受到党纪处分、行政处分以致被开除公职的有6031人。至于殃及他人、株连家属的数量，那就更大了。这些错误做法，伤害了许多好同志、好干部和曾经同中国共产党长期合作过的朋友，其中不少是有才能的知识分子。他们长期蒙受委屈、压制，不能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发挥作用。这不但是这些人的个人损失，也是整个国家的巨大损失。¹

毛泽东利用反右派斗争收回恩赐给知名民主人士中的右派分子一部分领导权，试图避免匈牙利事件在我国的发生，不惜把许多知识分子出身的党政干部和知识分子打成右派分子，而是采取过严过重的处分，使右派分子成为毛泽东收回部分领导权的牺牲品，这为毛泽东等个人独裁奠定了组织基础。

对右派分子进行处分后，如何对待左、中、右问题。1958年3月7日，中共中央提出《对民主人士中的右派分子进行工作的意见》，指出：对右派分子作了组织处理之后，对他们应该有计划地进行教育工作，以进一步分化和改造右派，更好地争取中间分子。“一、对他们进行经常性的政治思想工作，交待政策，指明前途，消除他们的抵触情绪，批判其错误态度，推动和帮助他们接受改造；二、

¹ 参见陈沂主编：《当代中国的上海》上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年版，第198页

对于右派分子，实行劳动教养，监督劳动或者劳动观察外，一般应该按照他们新的职务给以适当的工作；三、应该按照他们新的职务和级别，给以相应的生活待遇。对于个别生活上确有困难的，可以酌给临时补助。在政治待遇上，让他们参加某些应该参加的会议和政治理论学习；阅读可以让他们阅读的文件。但对于某些公开出面的政治活动，凡是会在群众中造成错觉或造成他们政治资本的，不要让他们参加。”¹

1958年4月2日，中共中央又下达《关于整风问题的指示》中指出：“为了有力地分化右派分子，各地区、各部门应当选择适当时机，召开右派分子会议或者吸收右派分子参加会议，由负责同志作报告，交待政策，指明出路，并且要组织右派分子加以讨论。对于右派分子还应当注意分别进行工作，以便根据个人的不同情况，有拉有打，争取分化他们，并且督促他们彻底悔改。”²

1958年4月6日，毛泽东在汉口会议上的讲话，对右派一打一拉作了形象地解释，他说：“各大城市（三十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都要开，要主要负责同志讲话，讲透一些。首先一训，然后一拉。训则凄凄惨惨，冷冷清清，拉则全身发热，通身舒畅，指明前途，使他们有希望，像刘姥姥进大观园借钱一样，开始凤姐表示冷淡，后来很热情，搞得刘姥姥很高兴。凤姐这个人很厉害，有人说她为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³在这里，毛泽东非常欣赏《红楼梦》中的凤姐对刘姥姥采取的手段，实际上，毛泽东及其支持者对右派采取“引蛇出洞”的策略，处分后的“训、打、拉”比起王熙凤的手段高出千倍万倍。

这些指示发出后，各级党委积极贯彻执行。比如中国科学院组织在京的全院右派分子去参观《全国公安系统劳改犯成绩展览》（在农业展览馆展览）和《刘介梅翻身忘本展览》（在北京民族文化宫展览），刘介梅就是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三次会议上的讲话》指出的“湖北有那么一个雇农出身的党员，他家是三代要饭，解放以后翻身了，发家了，当了区一级干部。这回他非常不满意社会主义，非常不赞成合作化，要搞‘自由’，反对统购统销。现在开了

¹ 转引叶永烈《反右派始末》第564-565页

² 转引叶永烈《反右派始末》第567页

³ 《毛泽东思想万岁》1958-1961卷第61页

他的展览会，进行阶级教育，他痛哭流涕，表示愿意改正错误。”¹参观这两个展览是要右派分子接受改造，洗心革面，像刘介梅那样重新做人，否则，劳改犯中有的人不接受改造，还要加刑，延长劳改时间。这是用实际例证来教育改造右派。

总而言之，右派分子被撤职、降职、降薪，只给生活费，“半数以上失去公职”，送去劳动教养；即使被原单位留用的右派分子，也大多干用非所长的次要工作，或当作纯劳动力使用，那里有重活脏活险活、临时活，就派右派分子去；凡是党内、团内的右派分子一律开除出党、开除出团。学生中的右派分子，开除学籍、劳动改造、劳动教养。这样的处理，恐怕不是给“一点小鞋穿”的处理办法，当然“小鞋子那个东西穿了不舒服”，而且是很“不舒服”，是一种过严、过紧、过重的处理，是半辈子、一辈子也翻不了身的处理，而且还殃及家人。直到二十二年后的1978年12月才陆续结束处理。这种过严、过重、时间拖得过长的处理，造成人间最残酷、最冤枉永远无法挽回的悲剧，这是个人的不幸、民族的不幸，国家的不幸。

三、“反右补课”

1958年1月，着手进行右派处理工作，但整风反右还继续进行，也就是反复抓右派。2月18日，《人民日报》发表毛泽东亲自起草的社论：《反浪费、反保守是当前整风运动的中心任务》。中央根据社论精神，于3月3日，下达《关于开展反浪费反保守运动的指示》，指示说：“凡是没有经过群众鸣放、干部整改过程的地方，在这个运动中间，应该选择适当的时机，认真补课……”²为此，《人民日报》于3月6日配发《全民大动员的号角响了》的社论，指出：“反浪费反保守的斗争是去年五月以来的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的逻辑的继续。”“整风是要扫除官气、暮气，阔气、骄气、娇气和其他一切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不良作风，使干部和群众打成一片，争取生产和整个国家工作的大改进，争取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³

在中央指示和社论的号召下，全党全国很快掀起一场以“双反”为中心的鸣放和整改高潮。1958年4月2日，中共中央下达了

¹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81-482页

² 《人民日报》1958年3月4日

³ 《人民日报》1958年3月6日

《关于整风问题的指示》，指示提出：“一定要把整风运动坚持到底，不能虎头蛇尾，各地区、各部门，在目前的‘双反’运动告一段落后，应当及时地转入整风的第四阶段。”“千万不能把这个阶段滑过去……从目前情况看来，一般地区的整风运动，应当在六月底以前要基本结束，如果某些地区、某些部门有必要延长整风时间，也可以适当延长。”¹6月18日，中央又发出整风通知，要求在本年7月底以前结束整风运动。

就是在“双反”运动和整风运动第四阶段进行“反右补课”反复围剿中，许多党政干部、知识分子被补上右派分子、右派集团、反党分子、反党集团、反社会主义分子、地方主义者、地方民族主义者、民族分裂主义者和民族右派分子等各种各样的帽子。

中央、国家直属机关党委在深入挖掘、组织处理右派之后，有些单位在“反右补课”中被补上不少右派分子、右派集团、阶级异己分子等等。

国家卫生部挖掘出阶级异己分子齐仲桓（前卫生部长助理、卫生部党组成员）。中国作协党组拔掉、揭发和批判了文艺界修正主义白旗、党内右派分子秦兆阳（《人民文学》前副主编）的反党反社会主义活动和修正主义思想²。

1958年8月12日，《人民日报》报道：“开除右派分子、前《工人日报》社长陈用文的全总执行委员和主席团成员的职务和党籍，陈用文是在整风深入时才挖出来的。”中央广播事业局党组干事、副局长、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编委会委员、副总编辑、共产党员、行政级别九级的温济泽，他于1958年10月被划成右派分子。温济泽并没有实质上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行，按他自己的说法，“我当时执行了‘左’的政策，不过‘左’得不够。”“这就是在全局反右派斗争基本结束近一年后，又在局级‘补课’时把我划成‘右派’的原因之一。”³

中央广播事业局党组对温济泽的处分决定，部分摘录如下：以温济泽为首的小集团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阻挠和抗拒整风运动和反右斗争。整风期间，温济泽强调‘业务太忙，整风和反右不能抓得太紧’。他身为党组成员和对外部门的负责人，却把整风领导工

¹ 转引叶永烈《反右派始末》第567页

² 《新华月刊》1958年23期第20页，今日新闻》1958年7月11日

³ 参见温济泽《第一个平反的右派》，中国青年出版1999年版，第280—282页

作交给邹晓青，自己不挂帅。在整风期间，从不发动群众，但在专家鸣放阶段却乘机煽动群众，借以为自己的反党行动助威。为了逃避思想斗争，整风每一阶段，他都主张草率收兵。他对群众提出的意见采取了极端官僚主义的不负责任的态度，写了几条千篇一律的答案，叫秘书填写答复。对于贴大字报批评他的干部，则粗暴地予以打击。他认为‘国内经过几次大运动，反革命基本肃清了，阶级斗争趋于缓和了’，因此私自决定调进相当数量的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和有严重政治问题的人。在反右斗争中，温提出种种借口，力图缩小斗争面，甚至同情和包庇钱敏齐、陈润康等右派分子，并且为其弟弟右派分子温济中到处含冤说情。……为纯洁党的内部和严肃党的纪律，经讨论研究根据中央处理右派分子规定，给予开除党籍处分，并建议行政撤消原有一切职务。¹

温济泽在中央司局级干部“反右补课”被补成了右派，并揪出了一个以他为首的“反党小集团”。其成员有：钱敏齐，女，当年24岁，是人民大学毕业的研究生，见习编辑。组里要划她为右派，理由是她的丈夫在外交部被划为右派，她跑到外交部办公厅去哭闹。开始批判她时没有划为右派，后来斗来斗去还是划成了右派，定为右派以前就留下条子辞职回家了。陈润康，当年30岁，长期侨居法国，回国后在对外广播部门任翻译。反右派斗争时，组里提出划他为右派。温济泽问，根据是什么，组长回答说，他攻击我们党有官僚主义，温说，我们党不是承认有官僚主义才整风的吗？他攻击谁？组长回答说，他用资本主义国家虚伪的民主来攻击我们不民主。温问，他是怎样具体攻击的呢？组长说，他就是反对我这个组长。温说，这就算反党了吗？不是规定对华侨要慎重，不要轻率划吗？组长回答说，按照规定华侨归国3年以内不划，他已经过了3年。温问，过了多少，回答说，过了一星期。温说过了一个星期也不要划，看看情况再说。但后来七斗八斗，陈润康还是被划成右派，下放劳动，一年多就死亡。²

钱敏齐、陈润康等人成为温济泽“反党小集团”成员，根本原因就是温济泽主张不给他们划为右派，因为这些成员没有实质性的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行，温执行“左”的政策不力，是广播事业局党组把温济泽补为右派分子的原因之一。

¹ 参见温济泽著：《第一个平反的右派》，294—299页

² 参见温济泽著：《第一个平反的右派》，294—299页

1958年10月，胡乔木、廖承志两位听说温济泽划为右派都感到十分震惊，大吃一惊。都认为，应该历史地全面地看人，绝不该这样乱打一气。第二天上午，他们到了中宣部，得到的答复是：是广播事业局党组划的，中宣部已经批准，已报到中央书记处了，没法改了，'温济泽是在整风反右基本结束时的1958年10月被补为右派分子的。给反右斗争已经扩大化的队伍中又增添一个“反党小集团”。

从中央、国家机关的“反右补课”中，挖出了几名党内高级干部当作右派分子，都不是党的第一把手，他们同他们上级领导关系很不协调，分歧较大，往往是第二把手、副职、知识分子出身的干部被划为右派，或补为右派分子。实际上说明了党的干部政策存在弊端，党不太信任知识分子出身的干部，党内本身存在宗派、帮派，狭隘情绪和消除异己的做法，温济泽被补为右派分子就很典型地证明了这一点。

1958年5月5日至23日，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在北京举行，会上有浙江、甘肃、安徽、云南、广西、青海、广东、新疆、河南、山东等省和自治区的代表发言，报告本地区党组织同党内的所谓“右派分子”、“地方主义分子”、民族主义分子以及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作斗争的经过。许多地方的重要领导干部被宣布为“右派集团”、“右倾集团”或“反党集团”等。实际上，其中大部分是在“整风补课”中被补划为右派分子的，下面举些实例加以说明：

在反右派斗争中，“河南特别突出，反右派斗争持续时间长，划右派数量多，全省共划右派分子六万多人。”“对全省错划右派分子的人全部平反或摘帽。”²但没公布具体改正或不改正的数字，或者公布了，笔者没有看到。

1958年夏的中央成都会议之后，随着批判“反冒进”调门儿的不断升高，山东党内以反地方主义、反对右倾保守为基本内容的大规模“整风补课”运动趋向高潮。干部们提的意见，不论是否正确，统统被指责为向党进攻。先后把青岛、济南、惠民、菏泽等地市委负责人都打成反党集团；最后，又以反冒进积极、在“整风补课”中对右派态度不明朗等为由，将省长赵建民作为地方主义的总代表

¹ 参见戴煌著：《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9年版，第392页

² 参见《当代中国的河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29，169页

进行了重点批判，两位省委书记也遭到点名批判¹

1958年5月17日，《人民日报》报道中共甘肃省委第一书记张仲良谈甘肃省委反右派的情况。他说：

“党内的右派分子便利用我们工作中的个别缺点，大肆向党进攻。说‘五百万亩水地是用人命换来的’，是‘秦始皇磨民’；说1956年各项工作都‘冒进’了，‘技术改革措施搞坏了’，这些‘都是领导上的脑袋发热造成的’；说批判‘甘肃落后论’是无的放矢；等等……经过全民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特别是经过了传达八届三中全会的精神，在党内清除了以孙殿才（原省委常委、副省长）、陈成义（原政法党组书记、副省长）、梁大均（原省委委员、银川地委第一书记）为首的右派反党集团，情况大变，一个波澜壮阔的社会主义建设高潮，一日千里地向前迈进。1958年的水利工程六个多月的成绩就等于1957年的十倍。”²张仲良的报告说明，甘肃反右派同“双反”运动结合起来，从反右、反保守直接与“大跃进”联系起来，反右直接通向“大跃进”。这是从政治上的“左”倾走向生产上的“左”倾。从这时起阶级斗争引向生产、经济领域。于是经济中的大灾难开始了。

1958年5月26日，人民日报报道：云南省委揭发出以省委常委、组织部长郑敦和副部长王镜发为首的反党集团，他们通过地方主义、宗派主义、反党干部的政策，进行反党活动。³

1958年7月12日，人民日报报道：河北省委揭发和批判党内右派分子刘洪涛（省委常委、省委统战部长）、杜存训（省委候补委员、省工会主席）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行。报道说：“刘洪涛竟给王葆真（省政协副主席）出谋划策，企图借水利问题混淆视听，制造混乱，以达到其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目的……刘洪涛为了包庇王葆真，掩盖他自己的反党罪行，进行了一系列的反党活动：坚决反对在大会上对王葆真的彻底批判；隐瞒王葆真的反党言行材料；以省委统战部长身份，使用威胁手段，玩弄两面手法，阻止对王葆真的批判。”⁴

1958年7月15日，《人民日报》报道广西省委在“反右补课”

¹ 参见《当代中国的山东》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73页

² 《人民日报》1958年5月17日

³ 《人民日报》1958年5月26日

⁴ 《人民日报》1958年7月12日

中开除右派分子陈再励、王梦舟等六人右派集团出党。广西在“双反”运动中，“开展了所谓的‘反右补课’，把1957年给省委领导提意见的一些人错误地定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集团’，把他们开除出党，这些人包括原副省长陈再励、省委组织部长王梦舟、财贸部长廖原、文教部长王浩及原省委宣传部长骆明、原兵役局长廖联原。¹

1958年10月31日，《辽宁日报》刊登了辽宁省委《粉碎了以王诤为首的反党宗派活动》并作出决议：“会议通过检讨对极右分子、政治野心家、坏分子张烈（原省委常委、省工会主席）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行的处理。”“用大鸣大放、大辩论、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揭发、批判并粉碎了以王诤（原省委书记）为首、包括宋黎（原省委委员、旅大市委书记兼市长）、杜者衡（原省委书记兼省长）、李涛（原省委书记、副省长）、张烈、吴铎（原省委常委、秘书长）等人的反党宗派活动，并给他们以党的纪律处分。”²

新疆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在少数民族中进行整风、反右和社会主义教育的指示》。从1957年12月到1958年开展反对地方民族主义的斗争，但这场斗争也扩大化了，把一些说过错话，做过错事，甚至在工作中讲了不同意见，但并非主张民族分裂的党内外干部、知识分子、爱国人士，也划为地方民族主义分子，共有1612人，予以处理。1980年以后，对右派分子和地方民族主义分子进行复查改正工作，原来戴了帽子的共有6470人，除个别维持原结论，其余均得到改正³

内蒙古也执行了这个指示：开展了反地方民族主义的斗争，将一些少数民族干部划为民族右派分子⁴

自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凡在反右派斗争被定为地方民族主义分子的，一律摘掉帽子。⁵

上海市委在反右派斗争中，即在1958年“整风补课”中，把某些正确的意见当作错误的观点，有些基本正确但比较尖锐的意见当作“毒草”，有些善意的批评当作恶毒攻击，把大量人民内部矛盾

¹ 参见《当代中国的广西》第一编，当代中国出版社1992年版，第92页

² 《辽宁日报》1958年10月31日

³ 参见《当代中国的新疆》第一编，当代中国出版社1991年版，第244页

⁴ 参见《当代中国的内蒙古》，当代中国出版社1992年版，第85页

⁵ 参见《当代中国的民族工作》上，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年版，第166页

当作敌我矛盾来对待，以致右派分子越来越多。定右派分子为 1.63 万人。不仅如此，还在工人、营业员、民警等因中央规定不划右派分子的阶层中，划出了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 4543 人；主要因右派问题，而戴的“四类分子”或其他敌我矛盾性质“帽子”的有 1154 人；“中右分子”虽不戴“帽子”，但受到党纪处分、行政处分以致被开除公职的有 6031 人。这场反右派斗争，直到 1958 年夏才结束。¹

傅雷，著名文学翻译家，自反右派斗争开始后，就受到错误批判，有位好心的领导暗示他把检查调子定高一点，哪怕说实质上是反党反社会主义也行，傅雷坚持，“没有廉价的检讨。人格比任何东西都可贵！我没有反党反社会主义，我无法做那样深刻检查！”²最后被补为右派分子。

北京市监委机关在“反右补课”后的 1959 年批彭德怀“右倾机会主义”期间，还补划了右派分子。粉碎“四人帮”后，新成立的北京市监委办公室主任白祖诚回忆：“市监委机关内，一位领导人藉‘反右派运动’之机，挟嫌报复，要将几位给他提出意见的老干部打成‘反党’甚至‘右派’……我跑出来仗义执言”。“这自然使他脑羞成怒，非欲置我于死地而后快。这时正发生了八届八中全会将彭德怀同志错误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和‘反党分子’的事件，……这位领导人抓住这个时机，利用我两年前给中央写的一封批评党内生活中‘左’的倾向的信，歪曲内容无限上纲，先批判我是‘右倾机会主义，修正主义’，后更罗织罪名。诬我是‘阶级异己分子’。当时其他市监委副书记等同志都尽力保护我，都终归无济于事。我被打成了‘右派’开除了党籍，下放到农村劳动，在 20 年逆境中备受种种折磨。”1979 年 1 月，我获得了彻底平反。³这个材料说明，抓右派，自反右派斗争以后，不分时间、地点，统治者想什么时候，什么地点要抓右派就可以抓右派。可是抓的右派倒是些诚心诚意为党工作的好党员好干部，这充分说明了党的领导层中存在着独断专行的封建家长制浓厚的宗派主义的作风和行为。

武汉市在反右高潮中，划右派分子共 6261 人，还划了一批反社会主义分子（具体数字不详——笔者）。著名作家姚雪垠于 1958 年补为右派分子。

¹ 参见《当代中国的上海》上，当代中国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198 页

² 参见金圣华编：《傅雷与他的世界》三联书店 1996 年版，第 308 页

³ 白祖成著：《回忆与思考》北京燕山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260—261 页

以上各个省市地等单位从“反右补课”中挖出名目繁多的分子，按广东省委副书记区梦觉的说法，地方主义者实质上是党内的资产阶级右派。还有的省委负责人说，地方民族主义者是披着民族外衣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也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对共产党领导、破坏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的反动分子和不愿意接受改造的封建残余分子。这种人是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和其他剥削阶级里头的一部分。其实，帽子虽多，都是右派分子的变种，其性质都定为敌我矛盾，都受到党纪和行政的处分。上海市委是反右派斗争中最积极的执行者之一，除抓右派分子之外，还在工人、营业员、民警中定了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共有4543人。这就把本来扩大化的范围，延伸到工人、营业员中，使得扩大化范围更宽，性质更为严重。还有其他省市也抓也定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这个“反右补课”的做法模仿了“宁可错杀一千，决不漏网一人”的政策，而毛泽东抓右派分子的政策，采取“宁可错抓五十万，决不漏掉一个右派分子”政策，即采取党网恢恢，疏而不漏的政策。

基层单位主要指县、厂矿、企业等单位，它们基本上在1958年前后进行整风反右，同“双反”运动结合在一起进行，反右对象主要是中小学教师和部分知识分子干部，同时，抓出不少反社会主义分子。这是反右派斗争扩大化到基层，扩大到中小学知识分子，甚至扩大到工人、营业员、演员、民警等。现在引用一些具体实例加以说明：河北省赵县（古为赵州）的整风反右情况。1958年5月2日，集中全县中小学教师929名到县进行整风反右斗争，由县委整风领导小组派员领导。整个运动经历了学习、鸣放、批斗、处理四个阶段。

学习阶段。主要是学习县整风领导小组所作的整风动员报告，鼓励教师对党和政府的工作提意见，还组织教师到县政府大院参观鸣放大字报。号召每个教师写决心书，积极参加帮助党整风。鸣放阶段。首先发动教师对党和政府的工作提意见，进而写成小字报、大字报，然后让教师挖黑心（即个人检查错误）献红心（表示拥护党的整风行动），最后将鸣放的意见梳成辫子，准备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进行反击。在鸣放阶段中采取“引蛇出洞”的办法，诱导教师“抓芝麻搬西瓜”（不分大小问题都要鸣放）。并且规定每人每天鸣放条数，最多时，要求每人一天鸣放1000条意见。反击右派阶段。首先训练党团员、积极分子作骨干，然后以小组为单位批判右派分子，批判练兵时还有程度不同的体罚和打骂。在练兵基础

上对顽抗的右派分子在中队大会上进行批斗，经过反复斗争，搞臭右派分子。在这个阶段，对右派进行体力折磨，如拉大碾，修街道等体力劳动。组织处理阶段。中小学教师被打成右派的有 160 名，占教师总数的 17.3 % 强，还有部分教师因有所谓右派言论被开除回家。¹

1957 年 9 月 4 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工人、农民中不划分右派分子的通知》，通知规定：“现在农村中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和工厂中的整风运动正在逐步开展，不少地方来问在农民和工人中要不要划右派分子。中央认为，在农村中，对于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没有改变成分，即照原来的帽子，但不要叫右派分子。富裕中农的资本主义思想应当批判，不要戴右派分子的帽子，工厂中科室以上的干部和技术人员可以划右派分子，在工人中则只能定先进、中间、落后的界限，不作左中右的划分。是阶级异己分子、反革命分子、流氓分子、坏分子的，可按个人具体情况加以确定，但一律不用右派分子的名称。工人、农民中已经划了右派分子，应当改正，此点望即通知工厂和农村中的党的基层组织。”² 湖北省委违背了上述指示，在全省划了 6000 多名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定为敌我矛盾，当时并没有改正，直到 1979 年以后才改正。³

再看湖北一些县市划右派分子和其他分子的情况：湖北省在反右派斗争中共划右派分子 45956 人，其中包括教师 2 万多，就是说，教师占 50% 稍弱些⁴。广济县（今武穴市）所定右派分子中教职员约 60%，公私合营企业的私方人员占 10%，其它战线共占 30%。⁵ 监利县整风反右到 1958 年 6 月结束，全县共划右派分子 560 人，其中中小学教师 333 人，这就是说，教师约占 60%，改正工作到 1984 年结束。⁶

像违背中央关于在工人、农民中不划右派分子通知的指示和在教师中划右派分子比例较高的，还有河南省的某些县市。南阳市委，1958 年 6 月，又在工业、交通、工商界、文教界进一步开展反右派

¹ 参见《赵县志》中国城市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289 页

² 转引叶永烈著：《反右派始末》，第 553 页

³ 参见《当代中国的湖北》第一编，当代中国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79 页

⁴ 参见《湖北省志·教育卷》湖北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230 页

⁵ 参见《广济县志》汉语大词典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208 页

⁶ 参见《监利县志》湖北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31 页

斗争，号召工商界、文教界人士“交心”，在机关团体等单位“深挖右派”，又有一批人被错划为右派分子。全市先后有 351 人被错划为右派，还在工人、演员、营业员与勤杂人员中错划一批反社会主义分子、坏分子等。¹驻马店市委从 1957 年 10 月到 1958 年 8 月，全镇错划右派分子有 111 名，外地遣回驻马店原籍 12 名。其中干部 34 人，教师 50 人，医务工作者 5 人，工商界 18 人，技术人员 4 人，因为右的问题戴上各种帽子或未戴帽子而被处理的共 38 人。²

总之，在 1957 年大鸣大放、反右高潮、处理右派之后，1958 年起整风进入到第四阶段，穿插“双反”运动交织进行“反右补课”或“整风补课”，从中央国家机关到基层县属机关中进行，在“补课”中抓得最多的右派分子是中小学教师，他们之中有多少人打成右派没有公布精确的数字。不过根据已出版的部分《县志》记载，有的县少则划右派分子百人左右，有的县（湖北省监利县）抓右派分子五百多人，从这两个数字可以看出抓右派扩大化的程度是非常惊人的。

综上所述，自整风开始，有计划、有组织、有目的的组织党外人士进行鸣放，然后由整风转向反右派斗争，由领导定调子、划框子，要求人人表态，个个过关，人为制造浓厚的人人自危的政治气氛，进而按照既定的对象和规定的指标，号召“群众”揭发、批判，由整风变成整人，抓右派分子，无中生有地揪出所谓“反党联盟”集团，迫使他们进行检讨、揭发，并给以歼灭性无情打击和残酷斗争，迫使他们认罪、投降。反右高潮过后，中央下达不在工人、农民中划右派分子，10 月 15 日中央下达划右派分子标准，规定六划六不划的政策界限。当时，党内存在“宁左勿右”的思想已经相当普遍和相当严重，同时中央提出反对“温情主义”和“右倾情绪”，要求深入挖掘右派，此时将反右矛头直向党团内，挖出不少右派分子、“反党集团”。再经过 1958 年“反右补课”，从 1957 年 6 月到 1958 年 7 月整风、反右派斗争基本结束，全国共划右派分子 55 万多人，划各种“右派反党集团”、“地方主义反党集团”、“地方民族主义反党集团”等 20 多个，还划出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和中右分子 30 余万人。从 1957 年 12 月开始到 1958 年“反右补课”结束后，对右派进行组织处理，分别给右派分子劳动改造、劳动教养、

¹ 参见《南阳市志》第 7 卷第 225-226 页

² 参见《驻马店市志》第四编第 98 页

监督劳动、劳动观察、开除公职、降薪降职，党团员划为右派开除党籍、团籍，学生划为右派开除学籍。右派分子一律当作反面教员存在于各个单位。处理以后，右派们从事笨重的体力劳动，他们的行动受到严格的控制，心灵上受到无形的摧残和折磨，人格上受到凌辱、歧视，变成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二等公民、贱民。实际上，右派受处理后的悲惨命运才仅仅开始，接着步入遥遥无期的改造阶段，在改造过程中，主管改造的单位或个人，制造出许多人间悲剧。

总之，这场反右派斗争是不是像发动者所说的那样，“不打胜这一仗，社会主义是建不成的。”¹毛泽东领导和发动群众，动用国家机器将“一股思潮”、“一股势力”扑灭了、打败了。打败右派分子后，社会主义是否建成了，用1984年邓小平的话说：“什么叫社会主义，什么叫马克思主义？我们过去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是完全清醒的。”²既然对什么是社会主义也不是完全清醒的，更谈不上建成社会主义了。也连什么是社会主义革命，究竟革谁的命，是一场什么样的革命也认识不清。经过改革开放二十多年的实践，回顾这场反右派斗争，按照社会进步标准，是当时部分统治者镇压民主进步势力的运动，是最高统治者维护专制独裁、保守落后、拒绝改革开放的运动。说到底，反右派运动在客观上是封建专制主义压倒启蒙思想的运动，是新专制主义压倒新民主主义的运动，是空想社会主义压倒科学社会主义的运动，是封建保守落后势力压倒改革开放势力的运动。因此，反右派斗争是一次历史的大倒退，退到以阶级斗争为中心的老路上去，退到带有民粹主义色彩的空想社会主义道路上去，退到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道路上去。直到1978年党的十一届全会前后，邓小平、陈云、胡耀邦等领导集体在吸取毛泽东抛弃了的、刘少奇没有坚持的新民主主义理论，接受反右派斗争时的改革开放思想，吸取反右倾运动和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后，才提出真正合乎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

第三节 反右结局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10月6日“四人帮”被粉碎，中国的政局发生根本性的变化。1977年9月5日、28日《人民日报》

¹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32页

²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63页

先后发表聂荣臻的《发扬党的优良传统》、陈云的《坚持实事求是的作风》的文章，都强调应该实事求是地对待历史问题。1977年10月7日《人民日报》发表明确提出平反冤假错案的文章内容，该文章得到胡耀邦的支持。1977年11月27日，《人民日报》特约评论员文章，《毛主席的干部政策必须认真落实》，文中提出了“不管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搞的，不管那一级组织什么人定的、批的，都要实事求是地改正过来。”1977年12月25日，胡耀邦出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这对平反冤假错案有了组织保障，他先抓“文革”中的冤假错案的平反，同时着手解决右派的冤假错案的问题。落实这几项工作，阻力重重，但在新的党中央正确领导下，在胡耀邦的大力支持和亲自主持下，使历史上留下的冤假错案得以平反和改正。右派分子全部摘帽和百分之九十九改正。

一、右派改正的背景

右派分子全部摘帽和改正工作是一项政治性很敏感的问题，做出这样的重大决策是要承担极大风险的。这使右派改正遇到极大阻力。首先，当时党的副主席汪东兴引用毛泽东在1962年的讲话，“对右派分子不应当一般地提出甄别平反问题”¹，邓小平解释说：不是给右派平反，不过是给结论做错了的人改正而已。这时邓小平还是坚持毛泽东说的“右派不存在甄别平反问题”的意见。这就是“改正”一词的由来。“右派改正”的决定作出后，规定右派应回到原单位工作，可又遭到党内“左”派强烈的反对，文件发出时就被改为“就地安置”了。如果允许“右派”回原单位工作，那些因反右积极而上台的领导者和打手们又如何安排他们呢？所以中央只好将右派就地就近安排。只给右派政治上改正，22年来工资全被扣或部分被扣的都不补发，只是极少数生活极端困难的人，还需由本人申请，组织才给予困难补助。所谓平反或改正，只是政治意义上的，经济补偿不予考虑，精神上的补偿更谈不上。

第十一号文件精神原文如下：中共中央批复中央统战部、公安部《关于摘掉全部右派分子帽子的请示报告》的通知。（中发〔1978〕11号）1978年4月5日

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各大军区、省军区、野战军党委、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委党委、党组、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党委：

华主席、党中央批准中央统战部、公安部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

¹ 参见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第1008页

子帽子的请示报告。一九五七年伟大领导和导师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反右派斗争，是一场伟大的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革命。毛主席曾指出：不打胜这一仗，社会主义是建不成的。从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四年，遵照毛主席提出的关于分期分批摘掉改好了的右派分子帽子的指示，先后五批摘掉右派分子帽子。还没有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右派分子，经过长期的教育改造，大多数人有了转变，表现较好。现在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是必要的，有利于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把消极因素转化为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服务。各级党委应认真贯彻执行，切实做好摘掉右派帽子人员的安置工作。中共中央 一九七八年四月五日¹

附：中共中央统战部、公安部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请示报告

华主席、党中央：

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粉碎了王、张、江、姚“四人帮”反党集团后，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提出了抓纲治国的战略决策，胜利地召开的党的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政协第五届全国委员会，率领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为实现我国农业、工业、国防、科学技术的现代化进行新的长征，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已经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

在目前大好形势下，为了更好地贯彻党的十一大路线，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服务，我们建议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

一九五七年，毛主席亲自发动的粉碎资产阶级右派猖狂进攻的斗争，是一次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在这场斗争中，全国划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有××万人，并对他们进行了教育改造工作。遵照毛主席的指示，从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四年，先后五批摘掉约××余万右派分子的帽子。目前，估计全国大约还有右派分子×万名。他们经过二十一年长期的教育改造，大多数人有了转变，表现较好，有反党反社会主义新罪行的人只是极少数。这是毛主席、党中央改造右派政策的胜利。右派分子中的上层分子，绝大多数都已摘掉右派帽子，尚未摘帽子的，主要是原中下层干部、中小学教员和一部分大学生。他们多数都在农村，街道或劳教场所劳动，有的被管制，有的原来工作的取消了工作和工资，生活发生

¹ 转引华民《中国大逆转》，明镜出版社1998年，第402-404页

困难。自从一九七五年特赦释放全部在押战犯和宽大释放国民党县、团以上人员以来，特别是粉碎“四人帮”以后，各项政策逐步得到落实，右派分子和他们的家属迫切要求摘掉右派分子帽子。我们认为，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条件已经成熟。

一、全部摘掉右派分子的作法

(一)右派分子摘帽子工作，由右派分子所在单位的党组织负责。在收到中央的文件后，应向本单位群众讲解中央关于摘掉右派帽子决定的意义，宣传党的政策，然后向右派分子宣布摘掉他们的右派帽子，鼓励他们继续努力学习，进行自我改造，为社会主义建设贡献力量。摘掉右派帽子的人员名单向本单位群众公布，报上一级党委备案。

(二)对于有新罪行并已依法判刑的右派分子，不宣布摘其右派帽子，但刑满以后也不再作为右派分子对待。

(三)对于已经死亡的右派分子，为了争取、教育其家属子女，也应宣布摘掉其右派帽子。

二、右派分子摘帽后的若干问题

(一)右派分子摘帽以后，不再叫他们“右派分子”或“摘帽右派”。不要歧视他们。

(二)对原保留公职的人，能工作的要安排工作。有专长的要使用其专长；不能工作的可做退职、退休处理。原则上由所在的单位负责安排。对已开除公职的人，也要给以生活出路，年老体弱、丧失劳动能力，生活无来源的，可以从社会救济中适当解决。

(三)现在仍在劳教场所的右派分子，摘掉帽子的同时解除劳教。分别情况，予以安置。

(四)原属起义人员，如因其右派分子而戴上历史反革命帽子的，应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同时摘掉其历史反革命分子帽子。

(五)被遣送到农村的右派分子，摘掉其右派帽子后，一般不再返回城市，但工作有需要的或确属年老病残，在农村无依靠，而在城市有亲属赡养的，可准其返回城镇落户。原在解放军中划为右派转业到地方的，不要回军队。

(六)对右派分子的家属子女，根据我党的一贯政策，主要看本人表现，在入团、入党、参军、升学、招工等问题上都不应受到影响。

(七)对于过去已经摘了右派帽子的人，如果尚未落实政策(包括工作安置、生活待遇、子女等)，一律应按以上规定办理。

(八)遵照中央一九六二年的规定,对于右派分子一般不搞甄别平反,只是对于其中个别确实完全搞错了的,才作为个别人的问题,实事求是地予以改正。

三、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是一项重大的政策措施,各级党组织应予重视,认真做好这项工作。建立由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公安部和民政部共同组织一个摘掉右派分子帽子工作的办公室,负责处理右派摘帽子的有关事宜。县以上各级党委,亦应组织摘帽办公室,负责上述工作。

为了解决摘帽以后的许多具体问题,建议由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中央统战部、公安部和民政部共同召开一次中央有关部门和各省、市、自治区参加的专业工作会议,商定具体措施方案,以便统一贯彻执行。

为了解决右派分子摘掉帽子以后的安置问题,建议国家计委给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调拨必要的编制名额和劳动指标。

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后,由新华社统一发表消息。

以上报告,是否妥当,请指示。

一九七八年四月四日¹

关于1957年反右派斗争一案,李维汉回忆说:“1978年4月,中央统战部协同公安部、中组部等有关部门召开了烟台会议,产生了中央55号文件(实为11号文件),决定全部摘掉右派分子的帽子。我看到文件后感到不解决问题。因此写信给胡耀邦同志,主张对错划为右派分子的人要复查平反,并提到1962年中央统战部当时的意见。中央采纳了我的建议。当年9月17日,中央又批发了《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决定的实施方案》,指出:对于过去错划的人,要做好改正工作,恢复政治名誉、恢复原来的工资待遇。现在全国被划为右派分子五十五万余人中,已改正的五十四万余人(其中有些是从宽处理的),维持原案不予改正的只有五千人,而且还在陆续甄别。”²

为什么李维汉说十一号文件不解决问题呢?“十一号文件提出:从1959年到1964年,先后有二批摘掉了右派帽子。右派分子中的上层分子,绝大多数已摘掉右派帽子,尚未摘帽子的,主要是中下层干部、中小学校教员和一部分大学生。他们多数在农村、街

¹ 转引华民《中国大逆转》,明镜出版社1998年,第402-404页

² 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下,第839-840页

道或劳动场所劳动，有的被管制，有的原来工作的取消了工作和工资，生活发生困难。自从1975年特赦释放全部在押战犯和宽大释放国民党县、团级以上人员以来，特别是粉碎“四人帮”以后，各项政策逐步得到落实，右派分子和他们的家属迫切要求摘掉右派分子帽子。我们认为，全部摘掉右派分子的帽子的条件已经成熟。这个文件规定：被遣送到农村的右派分子，摘掉其右派帽子后，一般不再返回城市，但工作有需要的或确属年老病残，在农村无依无靠，而在城市有亲属赡养的，可准其返回城镇落户。文件还规定：遵照中央1962年的规定，对于右派分子一般不搞甄别平反，只是对于其中个别确实完全搞错了的，才作为个别人的问题，实事求是地予以改正。”¹

这两项规定，特别是最后一项规定，完全照搬1962年的规定，等于不给错划的右派分子改正，当然这个文件不能解决问题，仍然没有摆脱“左”的束缚，“左”的层层阻力，可见，改正也是一场激烈的斗争。时任中共中央统战部长李维汉，当时积极贯彻毛泽东的反右派的方针、政策，他对反右派斗争的错误深有体会，对错划右派也有一份责任，他的意见，胡耀邦很重视。

烟台会议，胡耀邦特地委派中组部副部长杨士杰和陈文炜出席。在闭幕总结会议上，杨士杰就“右派”改正与安置问题讲了话。他说：“反右运动已经过去二十年了。今天我们对待‘右派’的改正问题，一定要实事求是；不能说只有‘个别确实完全搞错了’的才可以改正，而应当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错多少改多少。”为使这一讲话更有力，杨士杰特地引用了胡耀邦刚进中组部时讲的一句话——“在今天这样的形势下，再不能通过我们的手去制造冤假错案！”杨士杰特别强调地说：“当年被打成‘右派分子’的同志，许多都是学有所成，有所建树的知识分子，他们的知识不但是我们党的财富，更是全社会的财富。对他们改正和摘帽后的安置，不能单纯只就其生活问题就地安置，而应当通过妥善安置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发挥他们的被压抑已久的聪明才智，为国家的四个现代化做出新的贡献。”²杨士杰等人表示对烟台会议产生的十一号文件持“保留意见”。

继烟台会议之后，中组部、中宣部、统战部、公安部、民政部

¹ 转引朱正《1957年夏季：从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第530页

² 转引戴煌著：《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第9页

五大部再次开会，研究“右派”的改正问题。在北京民族饭店开会。在会议上展开激烈的争论：坚持“单纯摘帽论”的同志说：“过去的是是非非已经过去，没有必要再一一清账了；今天只要统统摘去帽子，都当成自己人看待，就足够可以的了。”统战部的一位副部长在会上说，如果把几十万“右派”都“改”了过来，全党不就忙得乱套了吗？统战部的又一位副部长在会下说，不管怎么着，那个地方、那个部门总得留下一些“样板”，不能都改了。中组部副部长杨士杰在会上坦率地说：“党的历史上也曾为一些冤假错案平过反、纠过正，都是分清了是非、增强了团结，促进了革命事业的发展，从来就没听说过乱了套……我们今天的任务是落实三中全会路线，难道也需要再唱‘样板戏’？”

终于，杨士杰的这一席话，得到了“五人小组”领导成员——统战部长乌兰夫、公安部长赵苍璧、中宣部长张平化、民政部部长程子华等人的认同。这些部长一致表示：赞成士杰同志的意见。杨士杰立即打电话给中组部——“问题解决了，解决了！”陈文炜立即奔走相告——“‘右派改正’问题解决了，‘右派改正’问题解决了……”胡耀邦闻声更笑呵呵地说——“这就好，这就好！”于是，以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共中央统战部、公安部、民政部的名序，拟出了《贯彻中央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决定的实施方案》，中央于1978年9月17日以当年“五十五号文件”向全党转发了这个方案。¹

原文如下：

中共中央批准中央五部门《贯彻中央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决定的实施方案》（中发【1978】55号）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各大军区，省军区，野战军党委，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委党委、党组、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党委：

中央同意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中央统战部、公安部和民政部一九七八年八月二十五日呈报的《贯彻中央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决定的实施方案》，现发给你们，望贯彻执行。做好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人的安置工作，落实党的政策，是我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这部分人中，不少是有用之才，不要仅仅从解决他们的生活出路出发，要统筹安排，细致地做好工作，以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发挥所长，为社会主义服务。对于过去错划的人，要做好改

¹ 转引戴煌著：《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第10-11页

正工作。有反必肃，有错必纠，这是我党的一贯方针。已经发现划错了的，尽管事隔多年，也应予以改正。改正的标准，就是一九五七年十月十五日《中共中央关于“划分右派分子标准”的通知》中的有关规定。希望各级党委认真负责，切实做好这项工作。中共中央一九七八年九月十七日¹

附：中共中央组织部 中共中央宣传部 中共中央统战部 公安部 民政部 贯彻中央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决定的实施方案。在抓纲治国初见成效的大好形势下，华主席、党中央高举毛主席伟大旗帜，继承毛主席遗志，贯彻党的十一大路线，作出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英明决定。这对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促进安定团结，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实现新时期总任务，有着重要的意义。

一九五七年，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反右派的斗争，是一场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毛主席曾经指出，不打胜这一仗，社会主义是建不成的。反右派斗争的伟大胜利，巩固了无产阶级专政，促进了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

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党对右派分子采取了教育改造的政策。一九五七年，毛主席指示分期分批摘掉改好了的右派分子的帽子。从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四年，先后五批摘掉了大部分右派分子的帽子。

一九七五年，在特赦全部在押战犯的同时，毛主席、周总理指示摘掉章乃器的右派分子帽子，产生了很好的影响。当时考虑到右派分子经过长期的教育改造，绝大多数有了转变，表现较好，准备全部摘掉他们的右派帽子。由于“四人帮”反党集团的干扰和破坏，毛主席的这个无产阶级专政政策，当时未能实现。

为了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党中央关于改造右派分子工作的指示，认真贯彻落实中发〔1978〕11号文件，将有关问题规定如下。

关于安置问题。必须认真做好摘掉右派帽子的人的工作，落实党的政策。搞革命、搞建设，实现四个现代化，总是人多一点好。摘掉右派帽子的人中，不少是有用之才。安置工作不仅仅是为了解决他们的生活出路，更重要的是调动他们的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服务。

1、原保留公职的人，能工作的安排适当工作，有专长的发挥其

¹ 转引华民著《中国大逆转》，明镜出版社1998年，第405页

专长；不能工作的可做退职、退休处理。安置工作后的工资问题。原取消了工资级别，只发生活费的，根据现分配的工作评定工资级别；原受降级、降薪处分的，工资级别一般不动，工资级别降得过的，可以适当调整。需做退职、退休处理的，工龄应连续计算。退职、退休金的计算标准，按划右派受处分后的级别或后来重新评定的工资级别确定。工资过低维持生活有困难的，计算标准可以适当提高。退职、退休金由所在单位解决，没有工作的，由所在县、市负责解决。

2、开除公职的，也要根据本人实际情况给予安置。有专长、工作需要的，有关部门可以重新录用。其他的人，由组织、人事、劳动部门负责安置就业。年老体弱、丧失劳动能力生活无来源的，从社会救济中解决，使其能维持当地一般居民或社员的生活水平。在农村无依靠而在城市有亲属赡养的，准其返回城镇落户。原已离职、退职需要安置的，也照本条规定办理。

3、在劳教单位的，除本人愿意留场安置外，调离劳教单位，按上述各项原则，由所在省、市、自治区的组织、人事、劳动部门负责安排。留场就业人员，列为国家职工，给予职工待遇。

4、原是高等学校的学生，没有分配工作的，根据专长和需要安排适当工作，评定工资级别。

5、原是军队干部的，不再返回军队，按上述原则，由所在地方负责安排。

6、安置所需新增加的编制名额和劳动指标、尽量由省、市、自治区负责解决。确实解决不了的，由省、市、自治区党委从严掌握，核实后报国家计委解决。

7、安置工作，由省、市、自治区党委统一领导，统筹安排，由所在县以上的组织、人事、劳动、民政等部门负责办理。

若干政策问题。1、右派分子摘掉帽子以后，不再叫他们“右派分子”或“摘帽右派”。在提职、提级、调资、奖励、授予职称等问题上，与其他职工一样对待，不要歧视他们。

2、对家属子女应看本人的政治表现。过去因右派问题受牵连处理不当的，应该按照党的政策，妥善处理。今后在入团、入党、参军、升学、招工等问题上都不应受到影响。

3、原是共产党员开除党籍的，一律不得恢复党籍。经过考验，确实具备入党条件的人，可以重新入党。

4、对于工人、农民中已戴了右派分子或反社会主义分子帽子的，

要按照一九五七年九月中央关于在工人、农民中不划右派分子和不戴反社会主义分子帽子的指示，予以改正。中等学校学生、解放军战士、民警、营业员、民办教师和其他类似人员，戴了右派分子或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的帽子的，也照此办理。需要安置的，应适当安置。

5、原属起义，投诚人员，如因歧视右派分子而带上历史反革命分子帽子的，应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同时摘掉其历史反革命帽子，仍按起义、投诚人员对待。

6、对过去已有结论不以历史反革命分子论处或只有一般历史问题的人，因戴上右派帽子而被戴上反革命帽子的，在摘掉其右派帽子的同时摘掉其历史反革命帽子。因右派问题而后戴上其他帽子的人，均按上述原则处理。历史反革命分子又带上右派帽子的，这次只摘掉右派帽子。

7、对于有新罪行并已依法判刑的右派分子，不宣布摘其右派帽子，但刑满以后也不再作为右派对待。

8、因工伤残失去劳动能力的人，按国家有关规定给予生活补助、救济或劳保待遇。

原保留公职已经死亡的人，对其家属子女按照国家规定给予抚恤。

9、被抄抄的财物，要退还本人或其家属。查无下落的，要讲明情况，酌情处理。

10、对于过去摘掉右派帽子，尚未落实政策(包括工作安置、生活待遇、子女等)，一律按以上规定办理。

关于改正问题。按照一九七八年中央十一号文件精神和一九五七年《中共中央关于“划分右派分子标准”的通知》，对右派分子一般不搞甄别平反，对确实划错了的，要实事求是地予以改正。

一九五七年毛主席批准的中央关于“划分右派分子标准”(见附件)，明确规定了应划和不应划右派分子标准。当时有些地区和部门未能完全按照文件规定办理，错划了一些人。现在我们处理这个问题，仍应以一九五七年中央的规定为依据，凡符合划右派标准而被定为右派的人，是摘掉他们右派帽子的问题，不是改正的问题。凡不应划右派而被错划了的，应实事求是地予以改正。这样做，对恢复和发扬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有重要的意义。

对要求改正的申诉，由申诉人所在单位或所在地区县级以上党委受理，转交原划右派单位处理。

经批准予以改正的人，恢复政治名誉，由改正的单位负责分配适当的工作，恢复原来的工资待遇，不补发工资。生活有困难的，给以必要的补助。

原是共产党员，没有发现新的重大问题的人，应予恢复党籍。原是共青团员的，应予撤销开除团籍的处分。

加强党委领导，做好宣传工作。全部摘掉右派分子的帽子，进行妥善处理，实事求是地做好改正工作，是一项政策性很强的工作。各级党委要加强领导。建立健全工作机构。各有关部门，在党委统一领导下，密切协作，互相配合，主动承担任务，加强调查研究，认真处理来信来访。要认真解决问题，不要相互推诿，不要把矛盾上交，共同把这项工作做好。

要做好宣传教育工作，使广大干部和群众深刻认识反右派斗争的伟大意义和党对改造右派分子的方针政策，正确理解华主席、党中央决定全部摘掉右派分子的帽子的重要意义，正确对待摘掉右派帽子的人。

对摘掉右派帽子的人和搞错了予以改正的人都要做好思想工作。鼓励他们努力学习，改造思想，在各自的岗位上，为社会主义事业做出贡献。一九七八年八月二十五日。¹

五十五号文件与十一号文件相比，有了很大的进步：它不但对摘了“右派”帽子的人的安置使用等方面作了进一步的规定，同时作出了“提职、提级、调资、奖励、授予职称等问题上与其他职工一样对待”的明确规定，而且特别增加了“关于改正问题”的一段话：“凡是不应划右派而被错划了的，应实事求是地予以改正”；“经批准予以改正的人，恢复政治名誉，由改正的单位负责分配适当的工作，恢复原来的工资待遇”；“生活有困难的，给以必要的补助”；“原是共产党员，没有发现新的重大问题的人，应予以恢复党籍。原是共青团员的，应予撤销开除团籍处分”等等。²有人引用胡耀邦对改正的说法，这个文件的意义在于：如果说反右派斗争给国家、民族、右派本人带来灾难、损失和不幸，那么，五十五号文件解放了五十四万多人，右派改正就结束了那种不幸，体现了党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使他们获得新生，为祖国四个现代化提供了深厚的人才资源，其影响极其深远。同时应该指出，55号文件是

¹ 转引华民著《中国大逆转》，明镜出版社1998年，第405-408页

² 转引戴煌《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第11-12页

“左”倾思想严重干扰下的产物，没有完全反映党内的民主健康力量的正确的意见，给右派分子全部平反，就像全部平反“胡风事件”一样。

在胡耀邦同志的直接统筹建议下：1978年11月16日北京新华社发布《全国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报道：“从1959年到1964年，全国曾经先后五批摘掉大部分右派分子的帽子。”“做好这次及前几次摘掉右派帽子的人的安置工作，认真落实党的各项有关政策，这是我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在这部分人当中，有不少有用之才……妥善细致地做好他们的安置工作，使他们各得其所，以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发挥其所长为社会主义服务，是十分必要的。”报道又说：“对过去错划为右派的人，要做好改正工作……有反必肃，有错必纠。凡已经发现错划了的，尽管事隔多年，也应积极主动地予以改正。”“仍应以1957年中央规定为依据，……凡不应划为右派而被错划了的，应实事求是地予以改正。”¹

为此，11月17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一项重大的无产阶级政策》社论，指出：“最近作出了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进行妥善安置、实事求是地做好改正工作的重要决定。这项决定，深得人心……贯彻党中央的这项决定，是我国当前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从1959年到1964年，先后五批摘掉了大部分右派分子的帽子……自今年4月起全部摘掉右派分子的帽子。摘掉帽子以后，我们就不再叫他们‘右派分子’或‘摘帽右派’了。今后在提职、提级、调整工资、奖励、授予职称等问题上，都要与其他职工一样对待，不要歧视他们。”“他们中间许多人是有用之才。做好安置工作，不仅仅是为了解决他们的生活出路问题，更重要的是要做到人尽其才，发挥所长，调动他们的积极性，为社会主义服务。”“安置工作是落实党的政策的重要环节……”“在这次摘帽工作中，对右派分子，一般不摘甄别平反，对于确属错划的右派的人，尽管事隔多年，也要实事求是地予以改正。有反必肃，有错必纠，这是我党的一贯方针。”“凡符合右派标准而定为右派的，是摘掉他们的右派帽子的问题，不是改正的问题；凡不应划右派而被错划了的，应实事求是地予以改正。”最后指出：“贯彻党中央关于右派分子问题的决定，是一项政策性很强的工作，是一项繁重、细致、复杂的任务，各级党委必须提高认识，加强领导，把它放到自己的议事

¹ 《人民日报》1978年11月17日

日程，当作一件大事来抓。”¹

上述这些消息、报道和社论，都是为认真贯彻落实解决右派摘帽和改正工作大造舆论。

胡耀邦首先给温济泽同志改正。他在一个会议说：“现在说一下右派的改正问题，我已经开了个头，这位被改正的同志叫温济泽……经过了解，他的问题是冤案，我就批了，要改正，你们可以照这样办。”²

右派改正的样板，公安部等国家单位是抓得较快较好的样板。“新华社北京1月12日电 公安部坚决贯彻执行中央关于对错划右派分子进行改正的指示，实事求是，解放思想，这项工作做得又快又好。经过复查，原划的63名右派都属于错划，在去年年底前已经全部进行改正。

错划右派的改正工作刚开始时，有些同志顾虑这样做会否定反右派斗争的成绩；有的办案同志怕将来被扣上‘右倾’、‘一风吹’的帽子。经过反复学习中央有关文件，大家认识到，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应当坚持实事求是这一党的根本原则。不能认为对错划的右派进行改正就是否定反右斗争的成绩。专门负责这项工作的复查小组还提出，要设身处地为被错划的同志着想。二十一年来，这些同志背着沉重的思想包袱，时刻盼望着党对他们落实政策。早一天解决他们的问题，就可以早一天调动他们及其亲属的社会主义积极性，进一步发展安定团结的大好形势。在对被错划为右派的同志进行改正的工作中，公安部坚持在弄清事实的基础上，以中央关于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为准绳，依靠各单位群众讨论，分清大是大非。凡错划的就坚决改正，不附加任何条件，不纠缠具体问题。对属于给本部门的领导和工作提意见，改正结论就写上‘没有右派言论’；对说过一些错话，但不是从根本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结论就写为‘不是右派言论’，而不再纠缠具体问题，不搞烦琐哲学；对确有类似右派言论而当时很快作了深刻检查的，结论就写为‘有错误，但不应定为右派分子’。对于一些全部闻名的、难度较大的案件，由部领导同志主持召开有各局负责同志参加的典型案例讨论会，引导大家不要仅仅凭当事人几句尖锐的话下定论，而要分析他通篇言论的基本思想，严格按照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办事。有一个

¹ 《人民日报》1978年11月17日

² 转引何载著《冤假错案是这样平反的》中央党校出版社1999年版，第40页

干部对在肃反中自己被审查有意见，1957年整风鸣放时曾写文章批评本单位的肃反运动是‘无反也肃，有错不纠，言者有罪，闻者不戒’，因而被错划为右派。有的同志认为这个人出身剥削阶级家庭，社会关系复杂，他的上述言论是阶级本能的反映，他被划为右派的问题不能改正。经过典型案例讨论会和本单位党支部会、群众会上多次讨论，大家统一了思想，认为这位干部的文章是在充分肯定全国肃反运动的成绩的前提下，对本单位的肃反工作提出批评，言词虽然尖锐一些，但按《标准》衡量，仍属于错划，不能以他出身不好作为附加条件而不予改正。还有一位干部被错划为右派，前几年‘四人帮’在公安部的亲信曾利用这一错案整老干部。有人担心改正这个错案会使问题复杂化。但大家认为，这个同志既属错划，就不能因为‘四人帮’的亲信曾经插手而放弃实事求是的原则，因此，也坚决改正了错划他为右派的结论。

公安部对待被错划为右派的同志满腔热忱，改正的结论批准后，就立即通过口头或打电报、电话通知他们本人。部里还派出专人到这个部被错划为右派的同志居住比较集中的青海省，向他们当面宣布改正结论，和他们谈心，并对经济困难的同志给予了补助。这些同志对这次改正的决定都表示满意，特别为党恢复、发扬了实事求是的光荣传统而欢呼，表示要为实现四个现代化出力。

目前，公安部正根据这些同志的专长、健康状况、本人要求和工作需要，着手安排他们的工作。有一个懂三种外文的同志，已经上班工作。对于过去家属受到株连和影响的问题，公安部正根据本人提出的名单，分别发函到有关单位，消除影响。”¹

有了上述右派改正的样板，全国对右派摘帽和改正工作迅速行动起来。但仍然有阻力，有的人惊呼：“这怎么办？太多了！”胡耀邦说：“当年猛抓‘右派’的时候怎么不嫌多？”有人说：“有些人是毛主席点了名的。”胡耀邦说：“毛主席说错了的也得平反，不然咋叫实事求是？”²有中央文件、公安部右派改正样板和胡耀邦的大力支持，落实右派改正工作在全国开展了起来。

二、落实右派改正工作

1978年10月17日，中央组织部设立审查改正右派分子办公室，这使右派改正工作有了组织保证，同时，中央组织部召开了改正错

¹ 《人民日报》1979年1月13日

² 转引戴煌《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第13页

划右派的经验交流会。由于中央五十五号文件精神下达到各级党委，新华社、《人民日报》等新闻媒体发布电讯、社论、右派改正的样板报道，大造舆论，党的各级领导迅速贯彻落实右派摘帽和改正工作。

中央国家机关落实右派改正情况。1979年1月6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中央一些部门已改正一批错划右派》的报道：“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所属一些部门，认真贯彻执行中央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决定，积极慎重地做好已摘掉右派帽子的人的安置工作，做好不应划右派而被错划了的人的改正工作。这对发扬党的实事求是作风，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发展安定团结的大好形势，具有重要意义。

中央的决定下达后，不少单位对这项工作抓得较紧，进展较快，已正式公布了第一批改正的名单。据了解，中央党校原划右派分子九十八人，经过初步复查，确定王谭等三十九人属错划，应予改正。最高人民法院原划右派分子五十六人（包括由他们复审的原司法部、政法学会、法律出版社等单位），经过复查，初步确定贾潜、林亨元、朱耀党等十二位同志被错划为右派，应予改正。公安部原划右派分子六十三人，经过复查，确定有六十人是错划的，应予改正。外贸部原划右派分子一百九十三人，经过初步复查，确定由一百零四人是错划的，应予改正。人民日报社原划右派分子三十名，经过复查，初步确定黄操良、蒋元椿、刘蘅等十位同志是错划的，应予改正。凡是应予改正的，经过党支部讨论通过，报上级党委和党组批准，均已恢复组织生活和原来的工资级别，另行安排适当工作。现在这些单位的复查改正工作仍在继续进行，不受比例限制，错多少，改正多少，力争在不太长的时间内，全部妥善地完成这项工作。

这些单位所以能在较短时间内做出一定成绩，主要是由于领导重视，建立了专门班子。有的领导同志亲自审阅材料，分析案情，接待申述者、并以中央决定为武器，坚持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方针，以1957年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为依据，解除专案工作人员的思想顾虑。他们认真地分析了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斗争的形势和当时的定案材料，以及这些同志在革命斗争中的全部表现，确定是否应该改正。通过这一段的工作，许多单位的同志认识到，做好错划右派的改正工作，既恢复和发扬了党的优良传统，又维护了反右斗争的成果，这是大快人心之事，有利于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促进四个现代化的实现。

复查、改正的情况表明：这些年来，被错划为右派的同志，虽

然开除了党籍，降职降薪，但他们中的多数仍然相信群众相信党，仍然以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坚持为人民服务。经过改正，这些同志和他们的家属都感谢党给了他们第二次政治生命。他们表示：今后在新的长征中，一定要严格要求自己，尽最大的努力，为四个现代化做出贡献。”¹公安部的右派改正原为六十人，到1979年1月17日所划右派分子六十三人全部改正。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原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在1957年该所被打成右派分子11人：徐懋庸、许良英、李德齐、赵中立、刘清华、梁存秀、杨子彬、汪国训、齐云山、龚献文、温联璧。他们受到不同处分后，发往全国各地。自五十五号文件下达后，所党总支立即贯彻执行，1978年12月底，将错划的11名右派分子，经过严格审查，反复核实，作出决定，予以改正，恢复党籍、团籍，恢复原工资级别，另行安排工作，已调外地的人，改正后不得进北京，就地安置他们的工作，结果是，龚献文留在石家庄市某中学工作，温联璧就地退休，齐云山被安置到天津社会科学院工作，杨子彬从北大荒劳教后回到甘肃兰州，安置到兰州大学教学，汪国训被安置到武汉大学教学，像许良英、赵中立、李德齐、刘清华、梁存秀都留在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徐懋庸于1974年去世。

1979年7月14日，《人民日报》报道了徐懋庸等人改正的消息，报道说：“中国社会科学院（原中国科学哲学社会科学部）被错划为右派分子，现已得到改正，其中有哲学研究所徐懋庸、许良英、李德齐”。²他们三人原来在1957年8月和9月《人民日报》报道过，现在改正了也予以报道，这是他们三人的“政治待遇”，其余八名右派分子，只要所里发出改正通知书就解决问题。

落实爱国民主人士的右派改正问题。这里援引中共中央统战部的报告。中共中央统战部《关于爱国人士的右派复查问题的请示报告》（1980年5月8日，中共中央于6月11日批转）：一九五七年开展的反右派斗争，全国划了右派分子XX万余人，以后又陆续划了几批，共计XX万余人。遵照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关于分期分批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指示，从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四年，先后五批摘掉XX万人的右派分子帽子。粉碎“四人帮”后。一九七八年根据中央指示，全部摘掉右派分子的帽子。以后，又根据中央的指示对被错划成右

¹ 《人民日报》1979年1月6日

² 《人民日报》1979年7月14日

派分子的人做了改正。现在，已经改正和过去并未错划的，在工作上和生活上大都做了适当安排，整个工作已经接近完成，取得了很大成绩。被错划成右派分子的人改正以后，欢欣鼓舞，奔走相告，感谢党使他们重新获得政治生命，积极投身四化建设中去。不少人回到领导工作岗位，勇挑重担，发挥了骨干作用；许多知识分子在哲学、社会科学、文艺、科技、文化教育、卫生、新闻、出版等战线发挥了很好的作用，有些人已经作出了显著的贡献。实践证明，中央这个决策是完全正确的，对于恢复和发扬党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促进安定团结，发展革命的爱国统一战线，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并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同心同德搞四化，起了重要作用，在国内外影响很好。¹

有关上层爱国人士中的右派复查工作，现在还有几个重要问题，报告如下：

一、关于二十七名上层爱国人士的右派复查问题。一九五七年初对右派分子进行处理时，中央曾下达了《关于转发“对一部分右派分子处理的初步意见”的通知》，并附了中央统战部与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和有关单位协商提出的对九十六名右派分子的具体处理意见。现在，我们将其中二十七名代表性较大的民主党派、无党派上层爱国人士，提请有关省、市和民主党派中央进行复查。我们的意见是：拟予改正的二十二名：章乃器(故)、陈铭枢(故)、黄绍竑(故)、龙云(故)、曾昭抡(故)、吴景超(故)、浦熙修(故)、刘王立明(故)、沈志远(故)、彭一湖(故)、毕鸣歧(故)、黄琪翔(故)、张云川(故)、谢雪红(故)、王造时(故)、费孝通、钱伟长、黄药眠、陶大镛、徐铸成、马哲民(故)、潘大逵。

拟维持原案的五人：章伯钧(故)、罗隆基(故)、彭文应(故)、储安平(故)、陈仁炳。在复查章伯钧、罗隆基的右派问题的过程中，民盟的一些负责人曾提出对他们二人也应予改正。我们认为，他们二人在一九五七年的言行从根本立场上反对党反对社会主义，是资产阶级右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在右派向党猖狂进攻中起了极为恶劣的作用，现已摘掉右派分子帽子了，但并非错划，不应改正。

二、关于“章罗同盟”问题。近年来，民盟和农工党的许多负责人要求对“章罗同盟”问题进行复查。他们认为，一九五七年《人民日报》社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中有关“章罗同

¹ 转引华民《中国大逆转》，第416页

盟”的提法和对民盟、农工党的估计，不符合实际情况。他们说，“章罗同盟”问题不仅涉及到对民盟、农工党的根本估计，而且直接关系到一批因“章罗同盟”受牵连的人的落实政策问题，要求明确解决。现经复查，情况是：

(一)章伯钧、罗隆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政治立场是一致的，在向党的猖狂进攻中是互相呼应的，都是企图在我国建立资产阶级国家。但没有发现章、罗二人在组织上共同策划、进行阴谋活动的现实。

(二)章伯钧、罗隆基利用他们在民主党派的领导地位(章是农工党主席、民盟副主席，罗是民盟副主席)，大肆散布旨在推翻共产党领导的言论，在民盟和农工党中曾发生了恶劣的影响。但是，由于我党的统一战线工作有深厚的基础，他们没有能够发展到篡夺这两个党派的领导权，有组织、有计划地推动其反动纲领的地步。当时，民盟、农工党中央负责人中有我党党员和进步分子，是坚持了党的方针政策的，同章罗是有斗争的。章罗并没有能够根本改变民盟和农工党的本来性质。

(三)在批判“章罗同盟”时，曾经把民盟中央的《对于我国科学体制问题的几点意见》和《我们对于高等学校领导制度的建议》，说成是“章罗同盟”的反动纲领。事实上，这两份意见书不是章、罗二人提出的，而是民盟中央分别由曾昭抡和黄药眠负责的两个小组起草的。在这次复查中，我们和有关部门及民盟中央都认为，这两份意见书的基本内容是可取的，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不是“章罗同盟”的纲领。

根据以上的情况，我们认为：“章罗同盟”在组织上应肯定其不存在，但在作为资产阶级右派政治势力的代表的意义上仍应认为存在，因为他们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根本立场是一致的，在向党的猖狂进攻中起了同样的主导作用，并且互相呼应。同时应当承认，在反右派斗争中，由于把“章罗同盟”作为组织上的挂帅者，民盟中央和地方组织有一些负责人被戴上了“章罗同盟”的“军师”、“谋士”、“代理人”、“骨干”等帽子；两“帅”之外还有这个帅那个帅；在农工党内也有一些人和地方组织被指为所谓“章罗同盟”的“分店”，这些都扩大了打击面。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中央统战部是有责任的。为消除由此产生的后果，我们建议宣布一律取消这些组织性的帽子，宣布“章罗同盟”是指他们在右派反党活动中的共同主导作用，并不存在这样一个组织或组织系统。

三、关于召开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座谈会统一对反右派斗争的认识问题。目前，民主党派中的一些人看到被错划为右派的人改正的面大，就认为一九五七年不存在右派进攻，反右派斗争搞错了。我们认为这种看法是错误的，必须澄清。

一九五七年，我国已基本完成了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广大人民群众衷心拥护社会主义制度，但是，社会主义制度刚刚成立，还不巩固。广大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刚刚走上合作化的道路。资本家交出了生产资料，但还拿定息。一部分人对于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有动摇，极少数对社会主义改造不甘心，还在想方设法利用各种机会和手段实现其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政治企图。同时，社会上还存在反抗社会主义革命和敌视、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势力。在此期间，由于苏共二十大会全盘否定斯大林，国际上出现了一股反共逆流，在这种形式下，资产阶级右派分子错误估计了形势，认为我国将要发生匈牙利事件，局势已是“一触即发”。他们大肆散布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向党猖狂进攻。章伯钧一九五六年就恶毒攻击我们国家是“一个上帝，九百万清教徒，统治着五亿农民，非造反不可。”“中国也不能让许多小斯大林统治下去。”他说：“有在朝党和在野党，你不行我来，我不行你来”，要“轮流做庄”。一九五七年，他更露骨地说，“共产党以前扶植各民主党派，是‘周公辅成王’，现在成王长大成人了，周公要还政”，不然，“恩人就要变做仇人”。六月六日，他在以民盟中央名义召开的一次会议上说，现在中国“共产党内部问题也大”，“形势十分严重”，“学生上街，市民跟上去，事情就难办了”。罗隆基诬蔑国内是“一团糟”，他叫嚷要为反革命“平反”，煽动社会上的反动分子站起来“由各方面造成舆论”。储安平把我们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领导地位攻击为“党天下”。有些右派分子把无产阶级专政诬蔑为产生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的根源。有人公开提出共产党退出机关、学校、公方代表退出合营企业，叫嚣“根本的办法是改变社会制度”，甚至说要“杀人”，杀气腾腾。这些右派分子的言行表明，他们的企图就是要取消党的领导，改变社会主义制度，复辟资本主义。右派分子人数虽少，但能量很大。在他们的煽动、蒙蔽下，一些地方发生少数人罢课闹事，而且有蔓延之势。在当时的形势下，对这种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思潮进行批判，对极少数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予以反击，是完全必要的、正确的。

在这场斗争中，由于开始我们不适当地支持了党外一部分人提

出的所谓“大鸣大放”的口号，逐步造成了紧张的动乱气氛，后来又对形势估计的过于严重，随着运动的发展，特别在后期，确实犯了扩大化的错误。打击面宽了，对一大批人错扣了右派分子的帽子，处理得也太重了。经验证明，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由于复杂情况而出现一股群众性的错误思潮的时候，卷进去的人们情况各有不同，属于敌我矛盾的人总是极少数，大量的的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因此，在同错误思潮斗争中，一定要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社会矛盾。对于敌我性质的矛盾的问题，也要区别不同情况，集中打击少数为首分子，坚持争取教育大多数。在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斗争中，确有一些处于敌我矛盾边缘，拉一拉就可以过来的人，也有一些一时难以分清属于哪类矛盾的人。现在看来，为着严格掌握两类矛盾的界限，对于这两种人，都应当做人民内部矛盾对待。但当时实际把其中许多人划成右派，这是一个深刻教训。现在，根据中央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进行复查、改正，是完全必要的。但绝不能因此认为当时不存在或不应批判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思潮，不存在或不应反击右派的进攻。有许多当时有错误言行而被错划为右派的人，也不应因现在得到改正，就以为自己没有错误，对一九五七年这场反右派斗争必须历史地、全面地认识。只有这样，才能实事求是地总结经验，团结一致向前看。

以上问题，我们拟在中央批示后，由中央统战部出面，召开一次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座谈会，就二十七名上层爱国人士的右派复查意见，进行协商，取得一致；就“章罗同盟”作为一种政治势力当时确实存在，不能取消的理由做一说明；还要着重讲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斗争问题，特别是反右派斗争的必要性，以统一认识。

是否有当，请批示。¹

再援引中共中央批转中央统战部报告的通知：

中央同意中央统战部《关于爱国人士中的右派复查问题的请示报告》，现转发给你们。关于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斗争问题，需要着重提出以下几点：

（一）粉碎“四人帮”后，中央决定给尚未摘掉帽子的右派分子全部摘掉帽子，并按照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对被划为右派的人进行复查，把错划的改正过来，这是中央根据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严肃处理历史遗留问题的一项重大政治措施。实践证明，

¹ 转引华民著：《中国大逆转》，明镜出版社1998年，第416-419页

我们党正确处理这个历史遗留问题，广大人民是衷心拥护的，在党内外是深得人心的。这对于发展革命的祖国的统一战线，维护安定团结、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对于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并且尽可能地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为四化建设服务；对于台湾回归祖国，实现祖国统一的大业，都有重大的意义。

(二) 对右派问题的复查结果表明：一九五七年确有反党反社会主义思潮，确有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猖狂进攻，对这种思潮进行批判，对这种进攻进行反击是完全必要的。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派斗争，在全国人民中间澄清了根本的大是大非，稳定了新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制度。这是一个方面。但是随着斗争的发展，反右派斗争确实扩大化了，把一大批人错划为右派分子，误伤了许多同志和朋友，其中不少是有才能的知识分子。打击面宽了，打击的分量也太重，大批的人处理不适当。许多同志和朋友因受了长时期的委屈和压制，不能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发挥应有的作用。这不但是他们个人的损失，也是整个国家的损失。这是又一个方面。中央认为，必须清醒地看到这两个方面。才是历史地全面地看待这场斗争，只看到一个方面，而否定另一个方面，是不符合实际的。

(三) 为了消除反右派斗争扩大化造成的严重后果，根据一九五七年中央关于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进行了复查和改正工作，是完全必要的。属于改正的人大体上有三种情况：(1) 一部分人出于善意，提出的许多批评意见，现在看来是有利于改进工作的。把他们划为右派，是完全搞错了，当然必须改正。(2) 一部分人在涉及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等重大问题上，发表了一些错误言论，但不是在根本立场上反党反社会主义，把他们划为右派也是错误的，也应该改正。(3) 还有一些人确有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行，但是考虑到他们同向党猖狂进攻的右派分子在程度上和情节上有所不同，也考虑到他们后来确有转变，在这次复查中，也给他们改正过来。因此，应当看到，改正的面是很大的，但其中有些人属于可改正可不改正的，这次本着从宽的精神予以改正。

(四) 应当指出，一段时间以来，党内外一些同志看到改正面很大，因而对反右派斗争持全盘否定的态度，这是错误的。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应该离开当时的历史背景。当时确实存在资产阶级右派向党猖狂进攻的严重事实，我们坚决予以反击，是完全必要的，正确的。不进行反击，不取得这场斗争的胜利，全国就要陷入政治上思想上的大混乱，我们就不可能在社会主义道路上继续前进。

(五)反右派斗争的主要教训在于当时的阶级斗争形势估计的过分严重，把大量的人民内部矛盾当做了敌我矛盾，以至造成扩大化的错误。今后全党对于某一时期出现的重大思想动向和社会思潮，一定要经过深入的调查研究，冷静地、细致地加以分析，查明来龙去脉。做出符合客观实际的判断。问题发生在什么范围，什么领域，就应当在这个范围和领域内解决，而不要任意扩大，更不能搞“一刀切”，发动带全局性的政治活动，一定要注意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社会矛盾，如果矛盾的性质一时未分清，要先作为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绝不要把犯这样那样错误的人，轻易定为敌我矛盾。其次，一九五七年党提出要党外群众向党提出批评，帮助党整风，这是完全正确的。但是由于不适当地支持了党外有些人提出所谓“大鸣大放”，以至逐步发展为全国范围的紧张的政治动乱气氛，这也是后来反右派斗争扩大化的重要原因之一。“大鸣大放”以后发展成为“四大”，被认为是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好办法，但是做为一个整体的“四大”并不能发扬民主，而只能妨害人民行使正常的民主权利，并且人为地破坏安定团结，妨害社会主义建设，甚至导致无政府状态。一九五七年的经验已经证明了这一点，文化大革命的经验进一步证明了这一点。因此，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已经决定提请五届三次人大修改宪法有关条文。

(六)中央认为，肯定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斗争的必要性，同时指出在反右派斗争中犯了扩大化的错误，并坚决加以改正，目的是为着团结一致向前看，同心同德搞四化。当前，属于错划、得到改正的党内外同志，绝大多数人表现是好的。但也有极少数同志还存在着一些思想问题，有的甚至发表一些错误言论。这虽不是什么大事，但对团结一致向前看是不利的。有关党组织应对他们个别地进行耐心细致的教育工作。

对于维持右派原案、只摘帽子、不应改正的人(包括章伯钧、罗隆基等)，我们也要全面地历史地看待他们。他们中的有些人同我们党有过合作的历史，对人民做过一些好事，对这一点也应实事求是加以肯定，不要因为他们在一九五七年犯了严重错误，就把他们一概否定。因此，中央认为，就是对不予改正的人，凡是在世的，也应该在政治上和生活上予以适当的照顾，能够工作的予以适当安排，发挥他们的积极作用。特别是对不予改正的人的亲属子女，不得歧视。中央希望各级党委继续落实中央有关文件规定的各项政策，善

始善终地把这项工作做好。¹

上述《报告》和《通知》仍然是在“左”的思想残余指导下制定出的文件，看来纠正“左”的错误实在难呀！现在引用专家的评价：“所谓‘左’倾思想实际上是马克思主义批判过的那种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它从封建主义、小资产阶级观点看待社会主义，因此，它并非超越历史阶段而是落于历史发展的。长期以来，人们却总以为‘左’比右好。这是一个极其严重的误解。实际上，‘左’同‘右’一样，都与科学社会主义背道而驰，‘左’并不是什么超越了历史发展阶段的急性病，而是主张实际粗陋的原始共产主义和禁欲主义。如果我们把‘左’的东西同封建、保守、空想的社会主义联系起来，就一定能够在较深的层次上理解如下一些怪现象：为什么‘左’总是那么激烈地批判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以反右急先锋面目出现，为什么在资本主义发育不全的中国批判资本主义会那么频繁、激烈，而每次反右的结果并没有导致社会主义的发展却只是封建主义的强化；为什么‘左’的一套言辞会那么激烈进行，而行动却是那么保守、残酷、狂热；为什么封建主义历史悠久，小生产如汪洋大海的中国‘左’的一套搞起来容易，纠正起来却十分困难呢？”²“左”与封建主义、保守思想、空想社会主义连在一起，所以纠正克服“左”就十分困难了。因此，纠正反右派斗争的错误，改正右派工作就不能彻底，还是留下尾巴，保留几千名右派没有改正，这是可以理解的。

省市基层落实右派改正情况。继中央国家机关和民主党派抓落实右派改正工作之后，各省市自治区党委根据中共中央五十五号文件精神和1979年1月12日新华社关于公安部落落实右派改正工作的样板性报道，先后抓右派改正工作，从1979年到1981年落实右派改正工作。各省进展情况也不一致，有的地方直到1984年落实完毕，有的甚至更晚。现在根据已掌握的资料介绍右派改正工作的情况。

北京市在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和共产党内干部中一共错划右派分子10528人。到1981年底，对错划为右派分子的人，全部作了实事求是的改正。³北京大学直到22年后，这1500名右派分子才全部

¹ 转引华民著：《中国大逆转》，第420-422页

² 李振霞《中国当代哲学40年》，华夏出版社1997年版第247—248页

³ 参见《当代中国的北京》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23页

获得平反。¹这里转述一下北京大学哲学系学生右派分子黄宗羲的平反、改正情况。“他是1958年被枪毙的。据说黄原来是党员，建国前夕入的党，已有8年党龄；是调干生，贫农出身。他本来是哲学系反右领导小组成员，但他反对搞人身攻击，反对批判右派时动手动脚，结果被认为是立场不稳，同情右派。他当然不服，自恃出身好，与反右派领导小组的其他成员弄得越来越僵，最后让他在一间屋里反省，并派一个人监视着他。后来因为一件小事两人吵起来动了手，他打不过那个人，就拿出随身带的一把水果刀，将那人的脸划破了。这可好，立即被捕，最后以“右派杀人罪”枪毙了，为此还向各大学发了通报。黄临上刑场前，他的老婆孩子都来了，法院的人问他对家人还有什么话要说，他对老婆说：‘我死后你不要守着，早点找一个人家，好好教育孩子跟着党跟着毛主席走社会主义道路。’他说的这些话都被记录下来，‘文革’时期那么乱，但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的档案完好无损。七九年给右派改正时，北大落实政策办公室的人犯了难，查看了法院黄的档案，找了当时监视他的那位同学了解了情况，证实了他俩是因为一件小事口角打起来的，那位同学脸上只是被划破了一道小口子，特别是黄临死前说的话，显然这是一大冤案。可是人已经死了，怎么办？北大落实政策办公室的人还是很负责的，据说在淮阳县找到了他原来的老婆，但她已经嫁人了，又找到了他的儿子，当时在唐山市当架子工，给了他两千元，算是落实了政策。”²千古奇冤竟然发生在毛泽东时代，发生在北京大学，发生在党内，其实也不奇怪，因为在毛泽东专制主义统治下，才有可能发生这类冤案。胡风冤案不是在1955年就发生了吗？

天津市把一些知名人士、学者、专家、知识分子、机关干部和普通群众划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总共5410人。改正工作到1979年，还有九名右派尚未摘帽和改正。³是否到1980年以后进行摘帽和改正呢，也许可能会继续落实的。天津把普通群众划为右派分子的情况也是比较突出的。

上海在反右派斗争中处理了2.8万余人，其中，定为右派分子

¹ 参见共青团北大委员会编著《共青团在北大》，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00页

² 陈奉孝《我所知道的北大整风反右运动》载《岁月文丛》第511-512页

³ 参见《当代中国的天津》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05页

的为 1.63 万人；工人、营业员、民警因中央规定不划右派分子，而定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的有 4543 人；主要因右派问题，而戴的是四类分子（地、富、反、坏）或其他敌我矛盾性质“帽子”的有 1154 人；“中右分子”虽不戴“帽子”，但受到党纪行政处分以致被开除公职的有 6031 人。1978 年 9 月，上海市委对被划为右派分子的进行复查，把错划为右派的改正过来。上海改正了 99% 的人，并给予妥善安排。¹上海市委定右派分子为 1.63 万人，其中改正了 99%，就是说，上海还有 163 名右派分子没有得到改正。换言之，上海还保留一百多名右派分子作为反右派斗争是正确的、必要的证据，由此试图证明中国大地还存在右派分子。

山西在反右派斗争中定了 11274 人为右派分子，改正了 11062 人，还有 212 人没有得到改正。²看来山西比上海保留右派分子人数还多些，比例更高些。相对河北省改正得比较彻底。全省共抓右派分子 25717 人，改正了 25711 人，只有 6 人未改正。河南省是抓右派分子最多的省份之一，总共抓了右派分子 6 万多人，又说 70869 人，只对错划右派分子平反改正。³“湖南全省共划右派分子 34296 人，占全国右派分子总数的 6% 以上。”“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经过落实政策湖南全省原划右派分子中有 34285 人得到平反纠正，占原划数的 99.68%。”这就是说未错划的只有 11 人。⁴又说只改了 31000 人，究竟划多少，改多少都是一笔糊涂帐。

根据《当代中国》十七省、市、自治区公布右派分子人数统计，大约有 35 万多人，改正比例按 99% 计算，未改正人数约 3500 多人。还有黑龙江、辽宁、江苏、安徽、江西、浙江、四川、贵州、内蒙古、青海、宁夏等省、自治区没有发布该省、自治区所划右派分子的数字，只说除个别外都予以改正。究竟还有多少右派分子没有得到改正，这可能是一笔糊涂帐，至少目前说不清楚。

在县和相当于县级的厂矿、企业等单位中的反右派斗争基本上是在 1958 年前后进行的，而那里的右派改正工作大都在 1979 年 2 月以后进行落实的。现举例说明：

笔者是由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于 1961 年发往辽宁省鞍山市

¹ 参见《当代中国的上海》上，当代中国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198 页

² 参见《当代中国的山西》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178 页

³ 参见《当代中国的河南》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129 页

⁴ 参见《当代湖南简史》当代中国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153—153 页

五金制品厂，担任成品仓库保管员，体力劳动、脑力劳动集一身，劳动、监督劳动集一人。该厂是行政科级的手工业管理局的直属工厂，是大集体性质的。后来改为鞍山市自行车厂，其性质为国营、集体混合所有制，行政级别相当于县团级。该厂集中了不少右派分子，有中央下来的（笔者）、有鞍山市委下来的（原市委组织部副部长）、有市局下来的、有别的厂矿转来的等。当1978年中央下达五十五号文件后，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于1978年12月致函笔者，申请右派改正问题，当笔者去北京后回到鞍山市自行车厂时，该厂几位右派分子都由原单位通通改正，像原鞍山市委组织部副部长连工作也安置妥当：任市建委主任，接着，调任市委组织部部长，就是说，升一级。鞍山市自行车厂还给几名改正后同志300-500元不等的困难补助，以示关怀，笔者有幸领到300元的困难补助。但笔者改正、工作安排由原单位负责，同基层单位比较起来，中央国家直属机关就比较复杂、手续和程序繁多，安置工作更困难，在此不必叙述了。

再来看湖北省的几个县的右派改正情况：竹溪县于1958年在全县党政群系统、文化、教育、卫生系统、财贸系统错划右派分子224人，这些右派分子分别在1979-1984年间予以平反纠正，并分别予以妥善安置。¹当年竹溪县约24万人口，高中文化、大专文化程度约12000人，其中划右派分子224人。钟祥县的反右运动到1959年1月基本结束。1979年8月“对错划右派分子413人，全部摘帽。”²在这里，《钟祥县志》只记载错划右派分子413人，全部摘帽。是否改正，没有记载，究竟是什么原因，不得而知。该县在1964年人口统计，高中文化、大学毕业生、肄业生、在校生的知识分子约68000人，其中抓右派分子413余人，划右派比例高达知识分子数0.6%。汉阳县由外地遣送回来右派分子62人，全县在反右派斗争中抓右派分子417人，共有右派分子479人，1979年全部改正。³

再看湖南澧县落实右派工作的文件：关于改正曹业富右派问题的批复 县文教局：你局报来《关于曹业富被划为右派分子的审查改正报告》收悉。根据中共中央（1978）55号文件精神和中共中央1957年《关于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的通知》，经审查，同意对曹业富同志

¹ 参见《竹溪县志》大事记，武汉大学图书馆藏，第23页

² 《钟祥县志》湖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4页

³ 参见《汉阳县志》大事记

右派问题予以改正。撤销 1958 年 5 月 4 日对曹业富划为右派的处分决定，恢复政治名誉。从 1979 年 10 月份起工资定为小教六级，每月 43.50 元，其处理期间计算工龄，不补发工资。并向原单位干部、群众宣布。中共澧县县委摘帽办 1979 年 2 月 28 日。¹

由于党的正确方针指引下，排除各种阻力，右派摘帽和改正工作得以艰难地进行，全国上下，经过一年多的工作，右派改正基本结束，最后统计右派的改正数字：“全国公职人员中被改正的‘右派’达五十五万二千八百七十七人，占 1957 年国家干部总数九百五十三万人的百分之五点八，大大超过了毛泽东常说的百分之九十五以上是好人的界限。何况这还不包括留下做‘样品’未予改正的，不包括尚未纳入国家干部行列的大学生、中学生、民办教师、原属民族资产阶级工商界、民主党派等等不拿国家工资的‘右派’；据估计，这样的‘右派’不下十万人。此外，还有数以万计的不戴‘右派’帽子而‘内控’的‘右派’。”²

总之，对错划右派的改正，也是平反的一种表现，证明过去是错划了，现在恢复了历史的本来面目，是共产党改正错误的一种体现，是恢复实事求是路线的一种表现。

1978 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新的党中央领导下，进行拨乱反正，解决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大规模的进行冤、假、错案的平反和改正工作，其中包括错划的右派分子改正的工作，这样使原来被打成右派分子的 99% 得到改正，结束了他们二十多年的悲惨生活，从此回到正常的生活轨道，让这些不幸的人们再度主动、积极地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为这个饱受苦难的民族和国家做出应有的贡献，为祖国四个现代化出力。即使在改正前去世的精英们，也应让他们的爱国主义思想、大无畏的精神、崇高的品格、优秀的精神作品继续为祖国的社会主义事业服务，要认真对待、继承和发扬这份文化思想遗产，这是对死去的精英们最好的纪念。

右派改正后的情况。按 1980 年中央文件规定在二十七名最知名的右派分子中，改正了二十二名：章乃器（故）、陈铭枢（故）、黄绍竑（故）、龙云（故）、曾昭抡（故）、吴景超（故）、浦熙修（故）、刘王立明（故）、沈志远（故）、彭一湖（故）、毕鸣岐（故）、黄琪翔（故）、张云川（故）、谢雪红（故）、王造时（故）、费孝通、钱

¹ 曹业富改正复印件

² 转引戴煌《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第 17-18 页

伟长、黄药眠、陶大镛、徐铸成、马哲民（故）、潘大逵。

现就其中几名进行评述：关于“右派老祖宗”之一的章乃器先生的评述。新华社北京5月13日电：原中国民主建国会副主任委员、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副主任委员、粮食部部长章乃器同志于1977年5月13日病故。在他逝世五周年的时候，中共中央统战部、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常务委员会和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等有关部门以及章乃器同志的亲属为他举行的骨灰移放仪式，将他的骨灰移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第一室。”¹这种骨灰移放仪式是落实章乃器冤案的一项重大内容，也是对他进行肯定的一种举措。

但是对章乃器一生的功过是非直到1997年4月才作出全面的评价。新华社记者、人民日报记者4月25日报道：纪念章乃器先生诞辰100周年座谈会今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章乃器先生是中国民主建国会创始人之一，杰出的爱国民主人士，著名的经济学家和政治活动家，是著名的“救国会七君子”之一。生前曾经担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委员、粮食部部长、民建中央、全国工商联副主任委员等职务，1977年病逝。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王兆国代表中央统战部在座谈会上讲话。他说章乃器先生“参与了创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工作”。王兆国在讲话中还充分肯定章乃器既是一名民族实业家，又是学识渊博的经济学家。认为他主张保护和发展民族经济，并深入研究了中国的货币金融、现代资本和资本市场、民族工业发展模式，有计划地引进外资等问题，提出了一些较深刻的见解。王兆国最后说，“1980年6月，在邓小平同志的关怀下，章乃器先生的被错划为右派一案得到平反改正。”²王兆国代表中共中央给予章乃器一生的评价是公正全面而深刻的，这是恢复章乃器一生的本来面目。中共中央对章乃器的评价说明，彻底地推翻了强加给章乃器的一切不实之词。同时说明，反右派斗争后，章乃器被剥夺了一切，使国家痛失了章乃器这样的精英人才，真是民族、国家的不幸。如果不失去这样的精英，如果他能活到改正后继续发挥作用，中国可能比现在更好、更幸福。这种惨痛教训，应该永远牢记。

中共中央批准以纪念会或纪念文章的形式对龙云的一生作出评价。1984年11月19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王昆仑、楚图南撰写《怀

¹ 《人民日报》，1982年5月14日

² 《人民日报》，1997年4月26日

念龙云先生诞辰一百周年纪念文章》，说：龙云先生“生前为人民做了好事，为民革和民盟工作尽了心力，是值得我们怀念的。”“1957年，由于反右派斗争扩大化，龙云先生也被涉及，受了许多委屈。其实，当时他的一些被批判的观点，基本上是正确的，有些是对某一问题的不同看法，也是正常的。尽管这样，龙云先生并没有动摇对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的信念。1962年，龙云先生因病逝世后，周恩来总理亲自关心先生的后事和丧礼，在当时可能的条件下，做了安排，我们都参加了龙云先生的丧礼，并会见和慰问了他的家属。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对龙云先生的被错误处理的问题，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予以改正，恢复名誉。我们知道后，都为龙云先生感到十分欣慰。对于龙云先生一生的贡献，人们是不会忘怀的。”¹

11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纪念著名民主人士爱国将领龙云诞辰一百周年》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习仲勋在座谈会上讲了话，习仲勋说：“建国后，他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和民革中央副主席等职，1962年6月在北京市逝世。”“习仲勋说，1957年由于反右派斗争扩大化，龙云先生曾遭到错误的批判，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为他恢复了名誉。对于这一位在我国近代史上有影响的、为人民做了好事的爱国民主人士，实事求是地做出公正的评价，是完全应该的。”²

1989年10月26日，人民日报报道：“民革中央今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座谈会，纪念著名爱国民主人士陈铭枢先生诞辰100周年。今天的纪念活动由民革中央名誉主席屈武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书记处书记丁关根出席了会议。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习仲勋代表中共中央向陈铭枢先生表示了深切的怀念。”³

1981年3月4日《人民日报》报道了著名化学家、教育家曾昭伦教授的评价。《原高教部副部长、我国知名化学家和教育家曾昭伦教授追悼会在北京举行》曾昭伦于“1967年12月8日不幸逝世，终年68岁。今天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举行追悼会，为曾昭伦同志平反，恢复名誉。”“在追悼会上，中国民主同盟副主席楚图南宣布，关于曾昭伦同志被错划为右派的问题，经过复查，中共中央已

¹ 《人民日报》1984年11月19日

² 《人民日报》1984年11月20日

³ 《人民日报》1989年10月26日

决定予以改正，对他参与起草了关于我国科学体制问题的几点意见被当作‘反党科学纲领’加以批判的问题，也给予平反，恢复名誉。”¹

北大学生右派领袖改正后情况。北大学生陈奉孝说：“大名鼎鼎的谭天荣却是比较幸运的，他虽然经受了多年的劳教，但‘文革’一开始，便被遣送回了老家湘潭接受群众专政。不少当年的右派在‘文革’期间遭受了第二次迫害，而谭天荣回老家却被保护起来了。谭对我说，当时在他老家不论公社还是大队，掌权的都是他本家，给他在山坳里找了一间茅屋躲起来，别人根本不知道他是谁，他便在茅屋里搞学问，1978年平反后，他便陆续发表论文，现在已是青岛大学的教授了。杨路、王国乡和王书瑶的情况也大体如此。张景中的情况就更具有传奇色彩了，他被劳教二十多年，去过新疆，但在劳教期间，劳动之余他继续思考钻研数学，1978年平反后与杨路联名陆续在学报上发表大量论文，张、扬二人现已是世界知名的数学家。张景中还成了中科院院士，党的十五大代表；杨路则是九届全国人大代表。这也算是当年北大右派的骄傲吧！”²

北大哲学系55届右派改正后的情况。当年北京大学哲学系55届毕业生中，分配在科研和高校等单位，同学中被打成右派分子的有10人，55号文件下达后，都先后得到改正，回到了正常的社会生活，回到了自己的专业工作，他们在中断二十多年的专业之后，现在重操原来的专业，经过这些年的辛勤钻研、艰苦努力，在科研和教学方面，都取得了一定的成绩，有的取得了更大的成就。像余敦康、梁存秀、王荫庭等在学术上贡献突出，成为知名的专家和学者。如果不出现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他们的学术成就可能会更大些、更多一些。以此为鉴，希望永远不搞反右派运动。

1980年，中央文件指出，不予改正的五人：章伯钧、罗隆基、彭文应、储安平、陈仁炳。他们都是在反右派斗争期间受到毛泽东点名批评的人物。毛泽东批评说：“整个春季，中国天空上突然黑云乱翻，其源盖出于章罗同盟。”³又批评说：“在你们上海，就是什么……陈仁炳、彭文应……这么一些右派人物出来捣乱。是走章伯钧、罗隆基、章乃器、陈仁炳、彭文应……那种反革命路线。是

¹ 《人民日报》1981年3月4日

² 陈奉孝《我所知道的北大整风反右运动》载《岁月文丛》第514页

³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35页

要章罗同盟领导，还是要共产党来领导？”¹，毛泽东的批评，影响这些人的改正。既然这些人没有改正，不仅影响不改正的本人，又影响他们的家属。因此，邓小平作了如下的指示：“对于没有错划的那几个原来民主党派中的著名人士，他们结论中也要说几句：在反右派斗争前，特别是在民主革命时期，他们曾经做过好事。对他们的家属应该一视同仁，在生活上、工作上、政治上加以妥善照顾。”²中央及各级党委遵照邓小平的指示精神，认真落实照顾不予改正人士及其家属的措施。现介绍如下：

关于章伯钧的右派问题，中央和各民主党派负责人根据邓小平指示的精神对章伯钧的右派问题作出如下安排：据章伯钧的女儿章怡和回忆：“中央统战部把我母亲（由我陪同）找去谈话。谈话大意是：‘既然中央给反右定性为扩大化，那么就需要保留一些右派，要保留右派，就需要保留右派中的头面人物；要保留右派的头面人物，自然就需要保留章伯钧先生。’又说：‘当年给章先生划右的材料都不确实，从政治设计院到反对文字改革，都不能成立。而‘轮流坐庄’则是程潜批判右派时说的，也被按到章伯钧先生头上。现在我们重新整理了材料，右派定性用的是孙大光的揭发材料。’说罢，问我母亲有何感想。母亲说：‘对此决定，我只能服从，而不能赞成。’有关领导说：‘服从就好。以后我们对您及章家会有所照顾的。’”³从统战部这段谈话，说明一个重大问题，就是章伯钧构不成右派，但又打成右派，当然是冤枉的。既然是冤枉的，为什么只摘帽不改正，还保留右派呢？这种做法显然不符合实事求是的精神，于是，一方面要坚持反右的正确性和必要性，只承认反右扩大化了，以此来维护毛泽东等人的权威地位，又不致于让邓小平难看；另一方面又要妥善解决保留民主党派的著名人士中的几个右派问题。为此，中央采取以下办法来照顾：

照顾办法之一，将骨灰移存八宝山革命公墓。新华社北京1985年11月15日电：“前政协第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民主同盟第三届中央常务委员、农工民主党第七届中央委员章伯钧的骨灰，已于11月15日移存八宝山革命公墓。章伯钧委员是1969年5月17

¹ 《毛泽东选集》第5卷，448、450页

²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94页

³ 牛汉，邓九平主编《六月雪》，经济日报出版社1998年版，第267页

日因病在北京逝世的。”¹对于这个补救，章伯钧的子女反映说：“尽管父亲的骨灰摆进了八宝山，其实在他背上还背着黑锅。”²骨灰进八宝山，肯定章伯钧先生是革命者，是没有右派言论的右派，骨灰是革命的，思想言行是反革命的。让章伯钧先生背这样的黑锅，时下只好选择这种矛盾的办法。

照顾办法之二，以座谈会方式纪念章伯钧诞辰 90 周年。新华社北京 11 月 11 日电：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和民盟中央今天在政协礼堂举行座谈会，纪念著名的爱国民主战士和政治活动家章伯钧诞辰 90 周年。座谈会由周谷城主持。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杨静仁在座谈会上讲话，他评价说：“今天我们在这里纪念章伯钧先生诞辰 90 周年，缅怀他对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事业做出的贡献。章伯钧先生是一位著名的爱国民主战士和政治活动家，尽管在他一生奋斗中也有过曲折，然而他不断追求真理，总结经验教训，总的来说，他是爱国的、进步的，为我们民族和国家做了好事，是值得我们纪念的。”³

组织上是如何安排、安慰章伯钧的子女的，子女们说：由于章伯钧“背上还背着黑锅。越是如此，子女就越应该自强。”章伯钧的儿子章师明毕业于上海同济大学，现任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章伯钧的大女儿章昭学，毕业于北京大学物理系，现为北京第二光学仪器厂研究所所长，教授级高工，北京市政协常委，全国妇联执委。章伯钧的次女章怡和，毕业于中国戏曲学院戏文系，现在是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中国民主同盟盟员。⁴新一代领导人对不改正右派章伯钧的照顾比毛泽东对右派宽厚多了，是施仁政的表现，是一种进步。

关于罗隆基的右派问题。罗隆基尽管挨批、挨斗、挨讨伐，虽然作过检讨，但他不承认什么“章罗同盟”，死不投降，就连毛泽东也只好那么说：“现在有些右派死不投降，像罗隆基、章乃器就是死不投降。我看还要说服，说几次，他硬是不服……那也就算了。”⁵由于罗隆基死不投降的态度，以后受尽种种磨难，于 1965 年 12 月因病在北京逝世。

¹ 《人民日报》1982 年 11 月 16 日

² 转引牛汉，邓九平主编《六月雪》，第 275 页

³ 《人民日报》1985 年 11 月 12 日

⁴ 参见牛汉，邓九平主编《六月雪》，第 273-275 页

⁵ 《毛泽东选集》第 5 卷，第 491 页

罗隆基死后才摘掉右派分子帽子，而右派问题像章伯钧一样，没有得到改正。这是中央决定保留五个右派头面人物不予平反改正，以此证明反右派是正确的、必要的。否则的话，将右派头面人物通通改正，不存在右派，岂不是反右派斗争全部都错了。现在的领导只承认反右的错误在于“扩大化”，这个“扩大化”对右派头面人物不适用，认为这五个头面人物还是右派。对罗隆基的右派问题同样按对待章伯钧的右派办法处理。而处理的规格略低于章伯钧。

直到罗隆基死后的21年，即1986年10月24日以座谈会形式纪念罗隆基并作出评价：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会10月24日在北京举行座谈会，纪念民盟的创建人和领导人之一、著名的爱国民主战士和政治活动家罗隆基诞辰90周年，缅怀他对我国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事业做出的贡献。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盟中央主席楚图南、主持会议并讲了话。阎明复代表中共中央统战部向罗隆基先生的亲属表示亲切慰问。

“罗隆基青年时代曾以学生代表的身份参加过“五四”运动，以后赴美国、英国留学。回国后因发表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的言论被捕。抗日战争开始后，他任第一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1939年，他与张澜、沈钧儒、黄炎培、梁漱溟等在重庆联合发起组织统一建国同志会，为了促进实施宪政、成立民主政府而努力。“皖南事变”后，他积极参加发起创建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后改组为中国民主同盟），任中央常委兼宣传部长。他在昆明西南联大任教期间，主持创建了民盟昆明支部，在知识界扩大民主力量，推动了昆明抗日民主运动的开展。抗日战争胜利后，罗隆基离昆赴渝，全力从事民主运动。他积极赞同中国共产党关于建立联合政府的主张，并为之进行不懈的努力。1949年9月，他以中国民主同盟代表团的身份，出席全国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为新中国的建立作出了贡献。新中国成立后，罗隆基历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务院委员、森林工业部部长、全国政协常委、民盟中央副主席等职，为民盟的建设和发展，为爱国统一战线的巩固和扩大，作出了积极的贡献。他于1965年12月因病在北京逝世。”

“楚图南在座谈会上说，罗隆基一生奋斗的道路尽管有过曲折，但是，纵观他的一生，他是爱国的，是不断接受真理、走向进步的。今天我们纪念罗隆基同志，回顾展望过去的一段历史，更加激励我们全体同志，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同心同德，奋发前进，进一步发扬民主党派的光荣传统，积极投身改革，服务四化，为统一祖

国、振兴中华做出最大的努力。”

‘阎明复在会上说，罗隆基先生在他一生的奋斗中有过曲折，但是，他能努力总结自己的经验和教训。罗隆基先生的全部历史和全部工作，总的来说，是爱国的，进步的，为我们民族和国家做了好事，是值得我们纪念的。’¹阎明复代表中央对罗隆基的评价，总算是给罗隆基恢复了政治名誉，肯定他是爱国的、进步的，为我们民族和国家做了好事，是值得我们纪念的。

关于储安平的反右派问题。1966年8月31日，即文化大革命期间，他预感到将面临更大磨难，便偷偷地跑到京西青龙桥边潮白河，投河自杀，因河水太浅，自杀未遂，又被看管人员带回。后从关押地方回到家中，家里已第二次被红卫兵抄了，抄得一无所有，见此情景，储安平绝望了，于是就离家出走了，一走杳无踪影。对于这种活不见人，死不见尸的事，专案小组调查两年，到1968年也没有查出结果来。经过1978年全国右派摘帽、改正工作，储安平的反右派问题，根据1980年中央文件规定，他的反右派问题不予改正，维持原结论。直到1982年6月某日，中央音乐学院院长办公室主任对储安平的儿子储望华说：刚接到中央统战部来函，对你父亲储安平正式作出‘死亡结论’，特此通知子女。”这就是储安平失踪16年后的结论。²

在不予改正的反右派头面人物中，只有储安平没有得到官方的评述。直到1988年，《东方出版中心》出版了由张新颖编辑《储安平文集》（上下两卷），《文集》指出，储安平是当代有影响的知识分子。新闻出版单位出版《储安平文集》，这是对储安平先生最好的纪念，也是对知识分子和储先生后人的一点点安慰。其实，“党天下”言论没有什么错误，但储安平没有得到平反、改正，在正直知识分子心中早已平反、改正。

关于彭文应的反右派问题。彭文应，时任民盟中央委员、民盟上海市副主任委员、上海市政协常委。

反右派斗争期间，多次受到毛泽东点名批评，被划为反右派分子，经过长时间改造，又因“态度顽固”，列为中央一级不予改正的反右派分子之一。1962年12月15日，彭文应因病去世，享年58岁。1989年12月16日，中共上海市委统战部举行“彭文应同志诞辰85周年

¹ 《人民日报》1986年10月25日

² 参见《名人传记》2000第十期第68-69页

纪念座谈会”。统战部副部长赵定玉发表了讲话。他热情地称赞了彭文应在解放前的多方面的贡献，也肯定了在解放后做的许多有益的工作。赵定玉最后评述说：“彭文应离开我们已经27年了，纵观他的一生，虽然也有过一些曲折，但总的来说是爱国的、进步的，是值得缅怀和纪念的。”¹这是以纪念座谈会方式为彭文应同志恢复政治名誉。总算承认彭文应为同志，还彭文应本来的面目。

关于陈仁炳的右派问题。陈仁炳，时任民盟上海市委宣传部文艺副部长。反右派期间，几次被毛泽东点名批评，被认为是“章罗同盟”在上海的首要分子，被打成右派分子。先在上海市社会主义学院学习，实为劳动改造，1962年摘帽，回复旦大学教授历史课，“文革”期间干了九年木工，1974年退休，结束木工劳动。1979年，全国右派百分之九十九点几得到改正，但陈仁炳因受毛泽东多次点名批评，所以陈仁炳的右派分子问题没有得到改正。

1981年，陈仁炳书信要求中共上海市委解决他的问题，市委答复如下：一、右派不予改正，二、恢复教授待遇，工资、住房、医疗均按教授待遇，三、解放前和解放后，陈仁炳先生曾为人民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应予肯定。市委的答复，实际上是恢复了陈仁炳先生的政治名誉。

陈仁炳先生于1990年12月9日去世，走完了坎坷的一生。12月23日上海市《文汇报》发表了《陈仁炳遗体告别仪式举行》报道：“本报讯 民盟中央参议委员会委员、民盟上海市委顾问、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知名人士陈仁炳先生因长期患病，医治无效，于十二月九日上午不幸逝世，享年八十一岁。陈仁炳先生遗体告别仪式昨天上午在龙华殡仪馆大厅举行。中共上海市委常委、市委统战部部长毛经权，民盟市委副主委赵超构以及本市有关方面人士、陈仁炳先生生前好友出席了遗体告别仪式。中共中央统战部、民盟中央，上海市政协、中共上海市委统战部、市教卫办、复旦大学，有关方面领导楚图南，费孝通、钱伟长、苏步青、吴邦国、谢希德、谈家桢等送了花圈。”²对这位不予改正的陈仁炳先生来说，市委的答复和遗体告别仪式的形式，实际上恢复了政治名誉，不是改正的改正。

总之，中央一级不予改正的五名知名右派分子，除储安平外，

¹ 转引叶永烈《反右派始末》第434页

² 《文汇报》1990年12月23日

中共中央统战部、上海市委统战部都给他们以骨灰移存、诞辰纪念座谈会，遗体告别仪式以及照顾亲属等形式实际上恢复了政治名誉。虽然储安平官方没有正式说法，但国家新闻出版单位出版了储安平的文章，1988年，《东方出版中心》出版了《储安平文集》（上下两卷），这应该是一个积极的态度。上述的这些形式和态度，实际上给不予改正的右派恢复了政治名誉。从中共上海市委给陈仁炳先生答复的三条内容更可以看出，后两条内容与改正右派的内容没有两样。

除上述国家一级知名的五位右派分子之外，全国还留下几千名普通右派分子没有改正，其中就有学生右派领袖林希翎，这位被毛泽东定的右派，因拒不承认错误，态度恶劣被送进监狱。后来，不知为什么，毛泽东让她出狱。她回到老家，接受监督劳动，赌气中同比他小十岁的大学学生结了婚。1978年右派开始改正，她多次申请改正，上万言书，中央主要负责人不予批准，她与丈夫离婚后出国。现在从事科研工作，林希翎是著名右派学生领袖中唯一没有被改正的人，林希翎是中国最有骨气的知识分子，她的右派言行为后来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所吸取，人们早已给她改正、平反了。留下几个右派不予改正，试图证明反右派是必要的、正确的，问题只是扩大化，或者说，严重扩大化。这给后来研究反右派斗争的人留下思考空间。

三、评价反右派斗争

据邓小平在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上说，反右派斗争是毛泽东决定的，没有得到常委多数的同意，但毛泽东照样亲自发动和领导反右派斗争，党外高层人士对反右派斗争持不同看法，向毛泽东建议，不必要发动全国性的反右派运动，毛泽东根本不听，一意孤行，结果犯了“左”倾错误。

邓小平对反右运动评价。1980年1月16日，邓小平在《目前形势和任务》讲话中提到对反右派的看法，他说：“1957年的反右是必要的，没有错。”“问题出在哪里呢？问题是随着运动的发展，扩大化了，打击面宽了，打击的份量也太重。大批的人确实处理的不适当，太重，他们多年受了委屈，不能为人民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这不但是他们个人的损失，也是整个国家的损失。所以，给右派分子全部摘掉帽子，改正对其中大多数的人处理，并给他们分配适当的工作，就是一件很必要的、重大的政治措施。但是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1957年不存在反对社会主义的思潮，或者对这种思潮

不应该反击。总之，1957年的反右本身没有错，问题是扩大化了。”¹

1980年2月29日，邓小平在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第三次会议上承认的反右派扩大化有责任，他说：“1957年反右派，我们是积极分子，反右派扩大化我就有责任，我是总书记呀。”²1981年3月——6月，邓小平对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意见中，表示对反右的看法，他说：“1957年反右派斗争还是要肯定。三大改造完成以后，确实有一股势力、一股思潮是反对社会主义的，是资产阶级性质的。反击这股思潮是必要的。我多次说过，那时候有的人确实杀气腾腾，想要否定共产党的领导，扭转社会主义的方向，不反击，我们就不能前进。错误在于扩大化。”³1981年3月27日，邓小平在《关于反对错误思想倾向问题》谈话中，再次提出对反右派斗争的看法，他说：“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我多次讲过，那个时候确实有人杀气腾腾，但是我们处理得过了，扩大化了。当然，不能把当时所有被批判的人都说成什么问题、什么错误都没有。我看对反右派斗争，还是两句话：一句是必要的，一句是扩大化了。”⁴从引用邓小平多次谈到对反右派斗争的看法，找党、政、军负责同志谈话，多次提到“确实有人杀气腾腾”，最后，提出对反右派斗争的看法，或者说是对反右派斗争的评价，强调“还是两句话：一句是必要的，一句是扩大化了”。⁵

根据邓小平同志的多次谈话，1981年6月27日，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其中对反右派斗争作了以下定性：“这一年在全党开展整风运动，发动群众向党提出批评建议，是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正常步骤。在整风过程中，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乘机鼓吹所谓‘大鸣大放’，向党和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放肆地发动进攻，妄图取代共产党的领导，对这种进攻进行坚决的反击是完全正确和必要的。但是反右派斗争被严重地扩大化了，把一批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和党内干部错划为‘右派分子’，造成了不幸的后果。”⁶

党中央对反右派斗争的评价作出决议之后。1981年7月17日，

¹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43-244页。

²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77页。

³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94页。

⁴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80页。

⁵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80页。

⁶ 《三中全会以来》下，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805页。

邓小平在《关于思想战线上的问题的谈话》中，重申对反右派斗争的评价，他说：“1957年反右派是扩大化了，扩大化是错误的，但当时反右派的确有必要。大家都还记得当时有些右派分子那种杀气腾腾的气氛吧，现在有些人就是这样杀气腾腾的。我们今后不搞反右派运动，但是对于各种错误倾向决不能不进行严肃的批评。”¹

以上是党中央、邓小平对反右派斗争的评价。认为反击是完全正确和必要的，问题在于扩大化。上述引文里，邓小平给扩大化的界定，打击面宽了，打击的份量也太重。后来胡乔木解释扩大化，“就是一部分是有的，一部分无中生有，数量上扩大化了，性质程度上也扩大化了”。²邓小平说打击是必要的，胡乔木说一部分是有的。就是说存在右派，因此打击是必要的。

对反右派斗争的这样态度，党内高层人士可能有不同看法，存在着分歧，邓小平采用组织手段加以统一。1981年6月29日，邓小平《在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闭幕会上的讲话》强调，《决议》通过之后，统一思想的重要性，他说：“今后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来说，要在这个统一的口径下来讲话。思想不通，组织服从。”³可见党内高层人士对《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看法存在着分歧，其中包括对反右派斗争的看法也存在着分歧。非常清楚，邓小平对反右派斗争的态度或评价，是在肯定毛泽东发动反右派斗争的正确、必要前提下作出的。毛泽东承认反右派斗争带来一个缺点，而邓小平承认反右派斗争犯了扩大化的错误。

在这里，不得不提及李维汉对反右派斗争的看法。时任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说：“当时的客观形势不必要发动一场全国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在一定范围内对右派的进攻进行批判反击，完全可以制止事态的蔓延发展。”⁴又说：“对反右派是积极的，错误多大，我都有一份重要责任。对于一切被误伤的同志和朋友，我至今仍然感到深深的歉意。”⁵这里可以看出，李维汉认为没有必要发动一场反右派斗争，并向被误伤的人们道歉。李维汉早就承认反右派斗争犯了扩大化错误，他说：“对反右派斗争扩大化的

¹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90页

² 对《历史决议》学习中所提出问题的回答，第171页

³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83页

⁴ 李维汉著：《回忆与研究》下第843页

⁵ 李维汉著：《回忆与研究》下第839页

错误，我在六十年代初期开始有所觉察。”“1962年，我们在《关于右派分子工作几个问题的报告》中进一步提出：如果领导上认为需要和右派本人或家属申请甄别的，可以甄别。对于确实划错的，予以平反；对于可划可不划而划了的，可以从宽摘掉他们的右派帽子。由于‘左’的影响，这一案当时未能解决，以后又经过十年‘文化大革命’，一拖就是16年。”¹由此看出，李维汉认为反右犯了扩大化错误，主张对错划右派进行平反，并没有提及对错划右派进行“改正”。“改正”一词是邓小平发明的，其涵义是：反右派斗争没有错，认为是必要的，错误在于扩大化，只是对错误结论进行改正。可见，邓小平对反右派斗争的评价，比李维汉对反右派斗争的评价，是倒退了一步。而胡耀邦利用“改正”一词的含义，巧妙地把右派分子改正了百分之九十九以上，把反右派斗争的正确性、必要性基本上否定了。

党中央、邓小平承认反右派斗争犯了扩大化错误，经过落实右派改正工作，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的都得到了改正，实际上所划的右派分子百分之百是错划。但是党中央、邓小平仍然坚持反右派斗争是正确必要的，还是让历史作结论吧。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前后，从邓小平有关改革开放，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思想来看右派和反右派的对错、是非。1978年10月11日，邓小平在谈到为实现四个现代化的致词中说：“这是一场根本改变我国经济和技术落后面貌，进一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伟大革命。这场革命既要大幅度地改变目前落后的生产力，就必须要多方面改变生产关系，改变上层建筑，改变工农业管理方式和国家对工农业企业的管理方式，使之适应于现代化大经济的需要。”²这是较早论述和表达他的改革思想。同年12月13日，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闭幕会上讲话指出，在实现四个现代化过程中出现新情况、新问题，“尤其是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改革，不会是一帆风顺的，它涉及的面很广，涉及一大批人的切身利益，一定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复杂情况和问题，一定会遇到重重障碍。”³在这里，他明确提出改革的思想。

1980年8月18日，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谈《党和

¹ 李维汉著：《回忆与研究》下第839页

²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35—136页

³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52页

国家制度的改革》，说：“党和国家现行的一些具体制度中，还存在不少的弊端。”“从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干部制度方面来说，主要的弊端就是官僚主义现象，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家长制现象，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现象和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邓小平指出，“官僚主义现象是我们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广泛存在的一个大问题。”“官僚主义是一种长期存在的、复杂的历史现象。我们现在的官僚主义现象。”“它同我们长期认为社会主义制度和计划管理制度必须对经济、政治、文化、社会都实行中央高度集权的管理体制有密切关系。”邓小平指出，“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就是在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的口号下，不适当地、不加分析地把一切权力集中于党委，党委的权力又往往集中于几个书记，特别是集中于第一书记”，“党的一元化领导往往因此而变成了个人领导。”邓小平指出，“革命队伍的家长制作风除了使个人高度集权以外，还使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组织成为个人的工具。家长制是历史非常悠久的一种陈旧社会现象，它的影响在党的历史上产生过很大危害。”“不少地方和单位，都有家长式的人物，他们的权力不受限制，别人都要唯命是从，甚至形成对他们的人身依附关系”，“总之，不彻底消灭这种家长制作风，就根本说不上什么党内民主，什么社会主义民主。”邓小平最后指出：“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现象的形成，同封建主义的影响有一定关系，同我们党一直没有妥善的退休解职办法也有关系。”“任何领导干部的任职都不能是无限期的。”¹。在这里，集中体现了政治体制改革思想。

1986年6月10日，邓小平《在听取经济情况汇报时的谈话》指出：“现在看，不搞政治体制改革不能适应形势。改革应该包括政治体制改革，而且应该把它作为改革向前推进的一个标志。”又指出：“1980年就提出政治体制改革，但没有具体化，现在应该提到日程上来。不然的话……必然阻碍经济体制的改革，拖经济发展的后腿”。再次强调，“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的改革。”²9月13日，邓小平听取中央财经领导小组汇报时强调。“改革的内容，首先是要党政分开，解决党如何善于领导的问题。这是关键，要放在第一位。第二个内容是权力要下放，解决中央和地方的关系。”“第三个内容是精简机构，这和下放权

¹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27—332页

²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60、164页

力有关。”¹邓小平关于改革的论述还很多，不一一引证了。

邓小平开放思想与他的改革思想是密不可分的。1984年10月22日，邓小平谈到开放问题时指出：“长期闭关自守，把中国搞得贫穷落后，愚昧无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只能是对苏联东欧开放。以后关起门来，成就也有一些，总的说来没有多大发展。”“历史经验教训说明，不开放不行。”“你不开放，再来个闭关自守，五十年要接近经济发达的国家水平，肯定不可能。按照现在开放的办法，到国民生产总值人均几千美元的时候，我们也不会产生新资产阶级。”²在这里看出，邓小平主张对外开放，并不害怕资本主义的东西，也不怕产生资产阶级。

邓小平上述的改革开放的思想及其措施，应该说早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就有知识精英提出来了，遗憾的是当时的领导人把改革开放的思想当作异端扼杀了，走了二十多年的冤枉路。

现在部分引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言论：1981年6月由邓小平主持的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提出：“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还是处于初级阶段。”在十二大闭幕词中，邓小平指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来的基本结论。”³1984年6月30日，邓小平向外国客人说：“什么叫社会主义，什么叫马克思主义？我们过去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是完全清醒的？”⁴1987年4月26日，邓小平会见外国客人说，“现在虽说我们也在搞社会主义，但事实上不够格。只有到了下世纪中叶，达到了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才能说真的搞了社会主义。”⁵1987年8月29日，邓小平会见外宾时说，“我们党的十三大要阐述中国社会主义是处在一个什么阶段，就是处在初级阶段，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本身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我们中国又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的阶段。”⁶党的十三大阐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指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我国在生产力落后，商品经济

¹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77页

²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90—91页

³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页

⁴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63页

⁵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25页

⁶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52页

不发达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必然要经历的特定阶段。这个阶段要解决的主要矛盾，就必须大力发展商品经济，提高劳动生产率，逐步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为此需要改革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中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部分。¹

从邓小平有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思想中可以看出，中国搞的社会主义事实上不够格，只有到了二十一世纪中叶，中国才能说真的搞了社会主义。由此想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反右派斗争中划的右派分子，其中标准之一，就有反社会主义。按照邓小平的说法，是否搞社会主义都不清楚，所以反社会主义这一条也就说不通，这个标准划右派就不存在。历史证明，毛泽东搞的社会主义实质上是空想社会主义，邓小平搞的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要到二十一世纪中叶才真的搞社会主义，应该说要到那时有人反社会主义才能划为右派。显然把反社会主义当成划右派标准之一，是牵强附会的。

我们还可以从邓小平肯定八大路线，有关对苏联模式的谈话来看。1982年9月，邓小平在十二大会议的闭幕词中提出，“八大路线是正确的。但是，由于当时党对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思想准备不足，八大提出的路线和许多正确意见没能在实践中坚持下去”，“八大以后……遭受了严重挫折。”²1987年10月13日，邓小平会见外宾时承认，“从一九五七年下半年开始，实际上违背了八大的路线，这一‘左’，直到一九七六年，时间之长，差不多整整二十年。”³1985年4月15日，邓小平会见外宾时承认，“一九五七年后，‘左’的思想开始抬头，逐步占了上风。”⁴1985年8月25日，邓小平会见非洲客人时说，“1957年开始有一点问题了，问题出一个‘左’字上，反对资产阶级右派是必要的，但是搞过分了。”又承认，“我们总结了几十年搞社会主义的经验。社会主义是什么，马克思主义是什么，过去我们并没有完全搞清楚。”又说，“社会主义究竟是个什么样子，苏联搞了很多年，也并没有完全搞清楚。可能列宁的思路比较好，搞了个新经济政策，但是后来苏联的模式僵化了。”⁵1986年9月29日，邓小平会见波兰客人时说，“我们

¹ 参见党的十三大文件

²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25页

³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页

⁴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53—254页

⁵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15页

两国原来的政治体制都是从苏联模式来的，看来这个模式在苏联也不是很成功的。”¹1988年6月22日，邓小平会见外宾时承认：“从1957年下半年开始，我们就犯‘左’的错误。总的来说，就是对外封闭，对内以阶级斗争为纲，忽视发展生产力，制定的政策超越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²

邓小平的诸种论述说明毛泽东违背八大正确路线，“左”倾错误严重，连什么是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都没有搞清楚，就连苏联模式也是很失败的，但还是制定了超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政策等。回顾1957年整风反右期间，许多党外人士、党内知识分子出身的干部（许多延安时代的老干部）、共产党自己培养的知识分子和在校大学生的言论，正是针对毛泽东的这些“左”的错误而提出的，与邓小平的上述观点，如出一辙。在当时反而扣上反党、反社会主义、反苏、反斯大林、崇洋媚外等大帽子。邓小平的一系列论述，实际上是从根本上纠正毛泽东的“左”的错误，为右派平反。

反右派斗争的对象是各种类型的知识分子，经过20多年磨难，深知反右派斗争给他们带来什么，改革开放的近20年，又给知识分子带来什么，他们心中是有数的，是非观念还是很明确、清楚的。他们对反右派运动也有自己看法和评价。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不只是犯了扩大化的错误，从反右派斗争的发动者的指导思想、动机、策略、方法、划右标准以及处理方式、后果等各方面来看，是人为制造建国以来的最大的冤假错案，应该进行彻底地平反。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和领导人既然公开承认文化大革命运动是“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是一场浩劫，众所周知，反右派运动是文化革命的序幕和起因，文化大革命是反右派运动的必然结果。两者都是“左”的错误产物。正如邓小平所说的，“文化大革命整整耽误了我们十年的时间。说深一点，社会主义时期我们的失误主要来自‘左’的方面，而‘左’的事情从1957年就开始了”。“从1957年下半年开始，实际上违背了八大的路线，这一‘左’，直到1976年，时间之长，差不多整整20年。‘左’的极端是文化大革命。”³又说：“文化大革命10年浩劫，中国吃了苦头。中国吃苦

¹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78页

²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69页

³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53-254页

头不只这十年，从1957年下半年开始，我们就犯了‘左’的错误。”¹还说：“毛泽东同志从1957年开始犯了‘左’的错误，最‘左’是文化大革命的十年。”²邓小平从根本上否定了毛泽东非常欣赏和肯定反右派运动中的“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方法和形式。也看出，无论反右派运动也好，还是文化大革命”也好，两者都是“左”的错误的表现和产物，其性质上都是“左”的错误，不过是程度不同而已，反右派运动是“左”，文化大革命是极“左”，都是一对难兄难弟，本质上没有什么不同。问题还在于，右派分子（摘帽在内）在文化大革命中吃二遍苦，遭二茬罪，比在反右派运动中的遭遇更惨，更悲哀，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之一。所以，反右派运动同样是一场灾难，一次浩劫。

反右派运动的必要性和正确性究竟在哪里？即使根据对右派改正数字来看，既然有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的“右派”都属于错划，就算还有万分之零点到零点的右派，那么难道有必要为这个万分之一的右派而发动一场直接冤枉上55万多右派分子、30多万反社会主义分子、二十多个“反党”集团和间接受到株连的（按保守计算）至少也有500万人反右派运动吗？根据中央统战部《关于爱国人士中的右派复查问题的请示报告》的情况来看，从被划为右派的96名著名爱国人士中，选择出27名影响最大的进行复查，予以改正的为22名。不予改正、维持原案的5名。据李维汉说：“维持原案不予改正的只有5000人，而且还在陆续甄别。”³上述最知名的五名右派分子中有最知名人士、右派领袖、“右派的老祖宗”之一的章伯钧，他在反右派斗争中并没有实质性的右派言行，根本不构成右派分子，但是为了证明反右派斗争的必要性、正确性，让章伯钧背上右派的黑锅。这种奇怪的逻辑，实在不能让人理解，也难于说服人，只能说完全出于政治需要罢了，持上述看法的大有人在，不过不在公开场合发表罢了。

一位国家高级干部对反右派运动和留下尾巴的看法。这位是中国人民大学当时任党委常委等职，葛佩琦被划为右派分子时举过手，现在又为葛佩琦的冤案平反上下而奔走的国务院参事李逸三，1980年11月20日，他在为葛佩琦的冤案写信给胡耀邦，信中谈到了对

¹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69页

²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71页

³ 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下第840页

反右派运动的看法，说：“目前流行（这样）一种说法：‘当时有右派，我们搞反右派运动还是正确的；其中问题，是反右扩大化。’我现在认为：57年反右运动，是我们党内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产物，它的性质和文化大革命同一性质，是祸国殃民的大错。当时的阴谋是‘请党外帮助党内整风’，阴谋是‘引蛇出洞’。实践已经证明，55万条‘毒蛇’里，百分之九十九点九九是冤假错，万分之一左右是‘右派’。留这万分之一左右的尾巴，我看不能给我们党增加光彩；相反，后辈人会耻笑我们拖泥带水。反右派运动本身是错误的，保留万分之一左右的‘右派’帽子，作用不大，意义不多；我建议来一个一风吹，彻底翻。”¹李逸三对反右派斗争运动和留尾巴作出了客观、公正、实事求是、大胆的评价，真正代表和道出了受害者的意见和心声，也是比较到位的评价。

现在援引反右派斗争时右派学生领袖林希翎的评论意见，她在1980年6月给《邓小平的万言书》中对反右派运动作出评价：“现在在我看来，1957年的反右运动不只是犯了扩大化的错误，而是根本上就错了的。现在党既然已敢于公开承认文化大革命运动是一场浩劫，那么为什么不能承认反右运动是一场灾难呢？后者是前者的预演和起因，前者是后者的必然结果。当然，在我们党内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极左思潮和阶级斗争扩大化是由来已久的了，是有着悠久的历史根源的，但主要还是从反右运动开始逐渐形成一条占统治地位的政治路线，祸根是从这时种下的。按理来说1957年应该是把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教条主义的整风运动搞起来，那在实质上应该是开展一次反左运动，才能使‘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政策贯彻执行下去，从而也就能使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按照毛主席制定的《十大关系》的方针走下去，这才是正确的和必要的，可是突然搞了这么一场反右运动，就开始了中国历史上的大倒退和大复辟。”²林希翎早在1980年提出如实事求是、客观正确的评价、真是难能可贵。

再来引用华民的评价：“邓小平坚持说‘反右’很必要，本身没有错，问题只是扩大化了。头脑清醒的人基于历史事实，则说它本身就是错的，完全不必要和不应该。即使严格限制打击范围和斗争方法，如同1987年春‘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斗争’一样，也将

¹ 转引戴煌《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第279页

² 《林希翎自选集》第23页

为历史所不容。因为无论当年还是今天威胁和危害中国的主要妖魔是封建专制及其形形色色的附属物，而所谓的‘右派’和‘资产阶级自由化’，恰恰是这个妖魔不可调和的死敌。谁积极‘反右’、‘反资’，谁就必须得到封建专制势力的欢呼与拥护，也就证明他是这种势力的最佳代表者‘保护人’。”¹这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期提出对反右派必要性的评价，这是从反右派错误最深理论层次，最后深厚根源来评价的，是科学探讨的结果，是经得起历史检验的评价。

一位国外研究中国右派问题专家说：“总的来看，右派分子既不反对社会主义，也不反对共产党的领导。他们要求的根本之点是要个人自由和民主权利……并不对社会主义的信条构成挑战……他们批评的是，共产党未实践自己宣称过的理想。”²

党史、国史研究专家评价反右派运动。金春明说：“反右主要是知识分子被划为右派，这次斗争对在全国人民中澄清了一些带根本性的大是大非问题稳定了新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制度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从整体上看它所造成的不良后果和灾难性的影响是主要的。”³这是从反右派斗争的后果影响的角度，基本上否定反右派斗争，持此观点的人恐怕不少。郭德宏对反右派斗争的评价说：“关于反右派斗争，历史决议做出了肯定的评价，认为反击是完全必要的，只是犯了严重扩大化的错误。这20年所有公开出版的著作，几乎都是这么写的。但私下里，绝大多数人对反右派斗争是否定的。因为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99%以上的右派分子都作了改正。一个99%以上的人都搞错了的运动，怎么还能肯定呢？事实上，历史决议只是说对极少数右派分子‘进行反击是必要的，完全正确的’，并没有说开展这场运动是必要的，是完全正确的。我认为，对极少数右派分子进行反击是不可避免的，但反右派斗争作为一场运动是应该否定的。”⁴“这种观点，代表了绝大多数被打成右派分子的人的想法，道出了绝大多数研究反右派斗争的专家、学者的观点，其中包括本书作者的观点。这是目前国内对反右派斗争接近到位的评价。

一位中青年专家学者提出对反右派运动的看法：“反右派运动

¹ 华民《中国大逆转》1998年第354页

² [英]纳拉拉扬·达斯：《中国的反右运动》中译本第91—92页

³ 《中华人民共和国简史》中共党史出版社2001年版，第75页

⁴ 《对国史研究中争论较大的几个问题的思考》，《史学月刊》2002年第2期

是对旧中国过来的知识分子群体的致命打击。这是问题的一面。从另一方面来看，从‘双百’方针到‘鸣放’，知识分子却也成就了一场以反对教条主义为基本内容、在精神上与五四相通的思想解放运动。在这场夭折了的思想解放运动中，知识分子们以极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对如何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有民主、有法治、有自由、有平等、政治经济科学文化以及社会生活各领域充满生机与活力的新型社会主义国家，进行了创造性的思考和探索，使自己当之无愧地成为 20 年后终于在中国大地上掀起的改革开放事业的思想先驱。这个集团的覆亡，结束了一个政治时代与文化时代；它在覆亡前的最后一搏，留下了新时代的预言，播下了新时代的种子。因此，它的毁灭是光荣而又有几分悲壮的。”¹对反右派运动作出客观、科学、远见卓识的评价，真是难能可贵。作为一个受害者，看到如此深刻的评价，真正感到极大的欣慰。

总之，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以阶级斗争为纲治理天下。在政治思想领域用阶级斗争观点、阶级分析方法进行一系列思想政治批判运动，以确保新政权的巩固，同时在党内批判“右倾”观点、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揪出了几个“反革命集团”。实践证明，批判各种“右倾”思想，定的“反革命集团”都批错了、斗错了和定错了，已犯下了一系列“左倾”错误。主要包括：犯了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错误；犯了脱离实际、混淆是非的错误；犯了主观随意性的错误；犯了过严、过重和长期戴帽子的“左”的错误；犯了对右派申诉，采取一律不让甄别、平反的关门主义的过“左”错误；犯了对右派摘帽，采取时间拖长、条件苛刻的过“左”错误；犯了对右派改正采取树立几名右派代表人物不改正、留下尾巴作为今后还要反右派找出理由而犯下纠错不彻底的错误。归根到底，反右派斗争是一场人整人的人为运动，是掌握国家机器、占绝对优势的统治者整手无寸铁、占绝对劣势的被统治的那些知识分子。由于他们无“械”可“缴”，只有掏空心思挖出“反动”思想的根子，交出肉体，任凭组织去发落、去处理。这样，影响新老知识分子、党内外知识分子不再说什么了，毛泽东再也听不到党外知识分子的声音了。20 多年过去了，许多右派早已悲惨地死去，不知有多少右派家庭从神州大地消失，不知改变了多少右派分子的一生命运，许多右派熬到五、六十岁才结婚。右派的亲属子女也沦为二等贱民，他们背着

¹ 于风政《改造》河南人民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610 页

右派出身的包袱，在受歧视中挣扎着成长。许多右派因长期劳动教养和改造，学业专长荒废，被改造成为一穷二白的木头人、不言不语的驯服工具，不少幸存者大都年老体衰和风烛残年，改正恢复工作后还没有来得及发挥应有的作用就离退休，只有极少数的人，改正后为国家建设做出贡献。实践证明，反右派斗争是一场有计划、有步骤、有目的的人整人运动，是执掌大权的人整文弱书生的知识分子，是党内部分“左”倾教条主义、保守势力扼杀民主进步势力和改革派的运动，是建国后继“胡风反革命集团”冤案后，又人为地制造的一起大冤案，是一场灾难。因此，反右派斗争或反右派运动应该予以全盘否定。

第五章 反右派斗争所犯错误及其后果、原因和根源的探讨

反右派斗争所犯错误，其性质之严重，规模之大、范围之广、程度之深、影响之坏、后果之惨重、原因之复杂、根源之深厚，是以前任何错误都无法比拟的。因此，用较多篇幅就错误的表现及其产生的严重后果及原因、根源进行探讨。

第一节 反右派斗争所犯严重错误

毛泽东认为反右派斗争取得了“重大胜利”，“意义非常重大”。1962年4月9日，他在《在第十八次最高国务会议》讲话中承认，“右派猖狂进攻，不得不反，你不反怎么办呀？但是带来一个缺点，就是人家不敢讲话了。”¹在这里，毛泽东总算承认反右派运动后有一个缺点。但毛泽东始终没有意识到反右派斗争犯了什么样性质的错误。当时党外民主人士中的有识之士就对毛泽东发动反右派斗争提出批评意见，可是，毛泽东置之不理。结果反右派斗争犯了严重错误。

一、右派定性上的严重错误

反右派斗争的错误性质，在客观上主要是执政当局扼杀民主、自由、进步，维护个人独裁，保护封建专制，抵制改革开放。就右派属性来说，毛泽东定右派为资产阶级反动派。众所周知，中国资产阶级一般说来是反封建主义、反帝国主义的。1957年所划的右派分子们实际上是一支反封建反帝的同盟军，是一支民主、进步、改革、开放的力量。

对右派的定性问题有一个演变过程。右派问题本来不是一个新问题，建国前的1949年8月14日，毛泽东在《丢掉幻想，准备斗争》一文中阐明了那些人属于右派：帝国主义为了侵略的必要，它“给中国造成了数百万区别于旧式文人或士大夫的新式的大小知识分子”。帝国主义及其中国的反动派政府只能控制其中的极少数人。其他的例如：“学生、教员、教授、技师、工程师、医生、科学家、文学家、艺术家、公务人员，都造反了，或者不愿意再跟国民党走

¹ 转引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和事件的回顾》下卷，第623页

了”。“有一部分知识分子还要看一看”，“其中有些人口头上说拥护，骨子里是看。正是这些人，他们对美国存在着幻想”。这些人的“头脑中还残留着许多反动的即反人民的思想，但他们不是国民党反动派，他们是人民中国的中间派，或右派”。¹接着说了对这些中间派或右派的态度，他说：“先进的人们，共产党人、各民主党派，觉悟了的工人，青年学生、进步的知识分子，有责任去团结人民中国内部的中间阶层，中间派、各阶层中的落后分子，一切还在动摇犹豫的人们（这些人们还要长期地动摇，坚定了又动摇，一遇困难就要动摇的），用善意去帮助他们，批评他们的动摇性，教育他们，争取他们站到人民大众方面来，不让帝国主义把他们拉过去，叫他们丢掉幻想，准备斗争。不要以为胜利了，就不要做工作了。还要做工作，还要作很多的耐心的工作。”²在这里毛泽东看一看再说的知识分子里还残留反人民思想的，民主个人主义者定为人民中国的中间派或右派，还采取相应的说服教育方法。这可以说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最早的观点。

建国后，1956年12月，毛泽东在复信黄炎培的信中说：“既有矛盾就要求揭露和解决。有两种揭露和解决的方法：一种是对敌我之间的（这说的是特务破坏分子），一种是对人民内部的（包括的党派内部的，党派与党派之间的）。前者是用镇压的方法，后者是用说服的方法——即批评的方法。”³信中表明，党派与党派之间的矛盾，定性为人民内部矛盾性质，而解决和处理矛盾的方法是说服的方法即批评的方法。毛泽东把党派与党派之间的矛盾，定性为人民内部矛盾性质。

1957年的整风是毛泽东要求各民主党派帮助共产党整风，整风中听取各种意见，认为有些意见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这样党派与党派之间发生了矛盾，应该是人民内部矛盾的表现。

1957年4月，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回忆当时形势说：“去年（1956），国内国际都是大变动的一年。在国内，锣鼓喧天的后面，进行着深刻、激烈的阶级斗争。到了下半年，一股反社会主义制度的风，又一股反思想改造的风，逐渐地刮起来了。这股风主要是从右派那里吹来的，右派是这股风的主帅、军师。”“右派之外，

¹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89—1490页

²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92页

³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第255页

还有调和的人，还有受影响的人，我当时认为，这些现象是人民内部矛盾的反映，要用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办法来对待这股风。并且指出：右派是人民的一部分，只能这样对待。”¹李维汉作为统战部长，贯彻执行毛泽东的指示精神，明确指出，右派是人民的一部分，反右斗争是人民内部矛盾的一部分，应该按人民内部矛盾的处理。处理的方法是用批评的方法。

即使鸣放开始的整风阶段，1957年5月15日，毛泽东在《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中说：“右派的批评也有一些对的，不能一概抹杀。凡是对的就应采纳。右派的特征是他们的政治态度右。……让人民认识他们不过是一小撮反共反人民的牛鬼蛇神而已。”接着又说：“除了沙漠，凡有人群的地方，都有左、中、右，一万年以后还会是这样的。”²这段话表明，只说明右派的特征是政治态度右，右派是牛鬼蛇神。右派究竟是什么性质矛盾，还是比较含糊的。但是，毛泽东说：“最近这个时期，在民主党派中和高等学校中，右派表现得最坚决最猖狂。党内党外的右派都不懂辩证法：物极必反。我们还让他们猖狂一个时期，让他们走到顶点。他们越猖狂，对于我们越有利益。人们说：怕钓鱼，或者说：诱敌深入，聚而歼之。”³这说明对右派鸣放有毒的东西，不加制止，采取对待敌人的策略来对待，这已经用对待敌人的方法来对待右派了。

随着大鸣大放和反右派斗争的开始，毛泽东对右派性质问题发生了变化。1957年6月8日，毛泽东为《人民日报》撰写《这是为什么？》社论，其中借用革命的老前辈何香凝先生说的话：“今天是新时代了，在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我们走上社会主义。难道在这个时代，也就一切都是清一色，再也不会有们左、中、右了吗？不会的。”“有极少数人对社会主义是口是心非，心里向往的其实是资本主义，脑子里憧憬的是欧美式的政治，这些人就是今天的右派。”⁴这是何香凝先生在6月2日说的，国民党内部不是清一色，存在着左、中、右，从这里可以看出，右派还是党内派别，思想政治观点的分歧，还是党内的矛盾。

1957年6月26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打击、孤立资产阶级

¹ 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下卷，第829页

²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26-428页

³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25页

⁴ 《人民日报》1957年6月8日

右派分子的指示》中指出：“右派分子同人民的矛盾，实际上有些已经超出了人民内部矛盾的范围。但是，还需要按照情况的变化，加以分析，才能分别确定。”¹这段话表明右派与人民的矛盾，实际上已超出人民内部矛盾范围，这说明右派性质发生质的变化。

随着反右派斗争的深入，在1957年7月1日，毛泽东为《人民日报》撰写《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的社论，指出：“资产阶级右派就是……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反动派。”“这是一小撮人，民主党派、知识分子、资本家、青年学生里都有，共产党、青年团里面也有，在这次大风浪中表现出来了。”“一般称呼‘右派分子’也就可以了，不必称为反动派。”²在这篇社论里，既然右派定性为反动派，矛盾性质就已成为敌我矛盾了。所以，对待敌人的策略就有公开解释的必要，毛泽东说：“在一个期间内不登或少登正面意见，对错误意见不作反批评，……其目的是让魑魅魍魉，牛鬼蛇神‘大鸣大放’，让毒草大长特长，使人民看见，大吃一惊，原来世界上还有这些东西，以便动手歼灭这些丑类。就是说，共产党看出了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这一场阶级斗争是不可避免的，让资产阶级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发动这一场战争，报纸在一个时期内，不登和少登正面意见，对资产阶级反动右派的猖狂进攻不予回击，一切整风的机关学校的党组织，对于这种猖狂进攻在一个时期内也一概不予回击，使群众看得清清楚楚，什么人的批评是善意的，什么人的所谓批评是恶意的，从而聚集力量，等待时机成熟，实行反攻。有人说，这是阴谋。我们说，这是阳谋。因为事先告诉了敌人，牛鬼蛇神只有让它们出笼，才好歼灭它们，毒草只有让它们出土，才便于锄掉。”³在这篇社论中，既明确公开地把右派定性为反动派，为阶级敌人，性质发生了变化，因而对待敌人只能采取“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的策略和方法。

北京正在围剿右派的时刻，毛泽东外出巡视，7月9日，在上海干部会议上的讲话，谈到了反右派斗争性质问题，毛泽东说：“这次反右派斗争的性质，主要是政治斗争。”“现在民主党派整风的重点是路线问题，整资产阶级右派的反革命路线。”“共产党也有个路线问题，对于那些‘起义分子’，共产党，青年团里头的右派，

¹ 引自叶永烈《反右派始末》，第262页

²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38页

³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36-437页

是个路线问题。”毛泽东还歌颂了对付敌人的大民主的方法，说：“大字报是个好东西，我看要一直传下去。”而且把大字报提高到像“论语”，“五经”“十三经”、“二十四史”那样高度，要求都传下去，他接着说，“这个大字报不传下去呀？我看一定要传下去。”¹在这里，把反右斗争看成是反资产阶级右派的革命路线。

1957年7月期间，毛泽东在《在1957年的夏季形势》一文中明确指出：“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和人民的矛盾是敌我矛盾，是对抗性的不可调和的你死我活的矛盾。”“资产阶级右派是反动派、反革命。”“这里所说的资产阶级右派，包括混入共产党和青年团内的一些同党外团外右派分子政治面貌完全相同的人，……并把他们开除出去，借以纯洁党团组织。”在这篇文章里，毛泽东赞扬“引蛇出洞”的策略，他说：“在两三个星期内，各单位的领导者对于右派的猖狂进攻，硬着头皮，只听不驳，聚精会神，分析研究，聚集力量，准备反攻，团结左派，争取中间派，孤立右派，这是一套很好马克思主义的策略。”²这里清楚地肯定了右派同人民的矛盾是对抗性的不调和的你死我活的敌我矛盾，同时肯定了对右派采取‘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的策略。各级党委从这两方面贯彻执行，采用敌我矛盾和对右派斗争的策略和大民主的方法。

由人民内部矛盾而转化为敌我矛盾，转化的“度”是关键，这个“度”是毛泽东提出的政治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新口号或新概念。掌握不准这个“度”，就容易混淆不同性质的矛盾。在反右派斗争期间，党内上下相当普遍存在“宁左勿右”的思想与做法。“左”比右好，“左”是方法问题，右是立场问题等，加上领导、党报一再强调反对“右倾情绪”和“温情主义”。将鸣放初期、大鸣大放的言论结合历史上的种种问题都抖出来，再来审查，定性那些鸣放的人为右派分子，这往往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情况。主要表现如下：

第一、许多同志，特别是青年和大学生敢于实事求是地对本单位的领导以及上级领导存在的问题提出尖锐意见，对党所领导的历次政治思想运动的政策和做法中所存在的问题发表自己的看法或不同见解。就其内容而言，有的正确，有的片面，但不是反党。而许

¹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45、450、447页

²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56—457、464—465页

多领导干部过分自以为是，听不得逆耳批评，认为这些批评有损于尊严，将“向党进攻”、“攻击党的方针政策”、“否定历次政治思想运动”等大帽子扣在他们头上，并错划他们为右派分子。

第二、广大知识分子，其中包括青年知识分子经过思想改造、受过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教育，出于相信共产党，崇敬和热爱毛泽东、求进步，在整风、反右派斗争中，接受考验，表现对党的忠诚，如实反映自己的思想状况，向党交心汇报，主动检查对社会上某些错误言论的认识，以及对某些领导人的一些意见，把这些写成材料交给党组织，让其批评指正。结果被单位领导无限上纲上线，当作“反党言论”批判，认定是自动跳出来和不请自来与党较量，因而划为右派分子。

第三、许多人在一些具体问题上向党的领袖提出意见和建议，或者对领袖的某些言词提出疑问和看法，或者在某些问题上的认识不够确切，请领袖给予明示或指点，而根本立场上并不反对领袖，却被认定是对领袖的“恶毒攻击”、“疯狂反对毛泽东思想”，因而被定为右派分子。

第四、许多人在民主、自由和法制问题上，提出发扬民主不够、集权过多、法制不健全、舆论一律、要求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建立、健全或完善法制、广开言路等意见，被领导认为是鼓吹西方资产阶级民主自由，上纲上线为攻击民主集中制，主张资产阶级民主自由，因而被划为右派分子。

第五、许多人在鸣放或者反右派过程中，由于对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产生的根源进行探讨，提出“三害”根源与社会主义制度中的某些具体制度有关，同党的领导作风有关，并没有把“三害”根源归罪于社会主义的根本制度和党的领导，却被定为右派分子。

第六、许多同志对学习苏联、对斯大林、对南斯拉夫的一些问题提出了一些看法和见解，通通被扣上“反苏”、“反斯大林”、“反社会主义阵营”、赞扬“修正主义”等大帽子，因而被打成右派分子。

第七、把几个人在一起议论党的某些领导人、党的某些具体政策和做法，根本不是反对党的领导的言论，定性为自由主义、“小广播”错误，进而被划定为“右派反党集团”。

第八、在反右派斗争期间，有的人对反右派斗争的某些做法持不同看法，或在反右派斗争中，有个别领导执行反右政策不力，贯

彻“左”的做法不够，完不成下达抓右派的比例数字，不同意将一些同志和朋友打成右派分子，导致自己被定为包庇右派的右派分子或领导自己顶替当右派分子。

第九、把许多人对理论问题、学术问题、文学艺术问题中正常的争论，或独立思考而提出一些新的看法，当成标新立异，异端邪说，上升为政治问题，进而将这些人划为右派分子。

第十、对于解放前的问题已作出历史结论或有复杂历史关系的人，将其在鸣放期间某些言论同历史挂上钩，把他们划为右派分子。

第十一、把许多同右派分子有过联系、有过工作交往、或听过右派分子的讲演、通过信的人或右派分子的亲属加以株连，把这些人划为右派分子。

第十二、把仗义执言者打成右派分子，此事发生在中共北京市监委机关内部，据粉碎“四人帮”后新建立的北京市监委办公室主任白祖诚回忆说：“市监委机关内，一位领导人借反右派运动之机，挟嫌报复，要把几位给他提过意见的老干部打成‘反党’甚至‘右派’，引发了一场尖锐的党内斗争。我那时年轻，比较幼稚，跑出来仗义执言，为这几位老同志辩解，直至在市监委常委会上与那位领导人争辩，并揭露了他一些歪曲事实真相和破坏党内生活准则的行为。这自然使他恼羞成怒，非欲置我于死地而后快。此时正是1959年抓‘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和‘反党分子’时刻。这位领导人抓住了这个时机，利用我两年前给中央写的一封信批评党内生活中‘左’的倾向的信，歪曲内容，无限上纲，先批评我是‘右倾机会主义，修正主义’，后更罗织罪名，诬我是‘阶级异己分子’。当时市监委副书记刘诵等同志都尽力为我说话想保护我，都无济于事。我被打成了‘右派’，开除了党籍，下放到农村劳动，在20年逆境中备受种种折磨。1979年1月，我获得了彻底平反，经市委批复，肯定了我的案件属于‘冤假错案’，肯定了当年那场党内斗争中，‘坚持的意见是正确的，进行的斗争是正义的。’”¹由此看出，反右斗争结束两年以后在北京市监委机关内还存在是非不分，善恶错位，颠倒黑白的作法，可见，反右派斗争的种种错误做法更加发展，更加恶劣。

总之，把许多正直、忠贞的同志、朋友，许多有才华的知识分子，有政治热情而不够成熟的、具有无限潜力的青年学生等，以各

¹ 参见白祖诚《回忆与思考》北京燕山出版社2000年10月，第260—261页

种各样的罪名打成右派分子，出现种种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情况。实际上何止十二种！后果十分严重，一旦被打成右派分子后，矛盾的性质就变成了敌我矛盾。

到了1958年3月26日，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中，把右派分子的性质无限上升到同地、富、反、坏的同等层次，他说，“我们国内存在两个剥削阶级，两个劳动阶级。两个剥削阶级：第一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残余。地、富、反、坏未改造好的部分，现在要加上右派，它是反社会主义的阶层。”“国民党所作的事，就是右派作的事。帝国主义、台湾蒋介石非常赞成，关心右派分子。”“第二是民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民主党派中的大多数（民主党派中的右派分子占百分之十），至于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右派分子占百分之十，老教授中的右派比例多了（大概全国约有右派分子30万人，其中县以上和大专是十六万）。”“两个劳动阶级是工人、农民。”¹

4月6日，毛泽东在汉口会议上的讲话，他重复了成都会议上讲的：两个剥削阶级，两个劳动阶级的问题，这次表达更清楚，直接了当，他说：“第一个剥削阶级为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国民党残余，三十万右派也包括进去。”“没有改造过来的地富反坏和右派分子，这一些人反共，就是现在的蒋介石、国民党，是敌对阶级，如章伯钧等。党内的右派分子也是一样。包括一些现在划为中间偏右还没有触动过的右派。人数大约是百分之五，就是三千万，比较恰当。”“第二个剥削阶级，是民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加上一部分上层小资产阶级（如刘绍棠，陈伯华；农村富裕中农也包括在内）。”在谈到对第二个剥削阶级的方法时，毛泽东说，“我们也用文明的办法对待，采取批评方式，与反右派斗争的方法不同。对右派采取点带武的性质，无非是把他们搞臭。”对待这两个剥削阶级的方针也不同，他说：“我们是团结后一个剥削阶级，孤立打倒前一个剥削阶级，既团结中间，孤立右派。他们有三千万之多，但分散全国，在包围之中。”²从这里看出，右派（包括中间偏右还没有触动过的右派）人数就是三千万，这样就严重混淆界限，打击了一大片，人为的树立那么多的对立面。将章伯钧、右派与蒋介石相提并论，这是极端错误的。

¹ 《毛泽东思想万岁》第1958-1961卷，第45页

² 《毛泽东思想万岁》第1958-1961卷，第61页

综上所述，右派原是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的方法也就是批评的方法，说服的方法。通过反右派斗争，毛泽东把右派同人民的矛盾一步一步地上升，人为拔高为敌我矛盾，并定性为社会主义社会的第一个剥削阶级，同地、富、反、坏并列，构成了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随之而来的，早在反右之前就准备好：即“诱敌深入、聚而歼之”那种对待阶级敌人的策略用于反右派斗争，采取带有武力的性质、打倒的方法，或者是无情斗争、残酷打击的方法来对待右派分子。由此必然加深加重错误性质的程度，将五十几万，可能更多的知识精英推向对立面，并对他们实行无产阶级专政。这是反右派斗争犯的根本性错误，其他错误是由此派生出来的。

二、右派定量上的严重错误

自反右派斗争以来，毛泽东不仅注意对右派进行定性分析，而且非常注意对右派数量或定量的分析，试图做到心中有数。

1957年3月12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对全国五百万左右的知识分子进行了分析，记录稿是这样说的：“我国的知识分子大约有500万左右，其中有少数人对于社会主义制度不那么欢迎，不那么高兴，甚至抱有一种敌对的情绪，认为社会主义没有优越性，社会主义活不长，会失败。或者有那么一些人，希望社会主义总有一天要恢复到资本主义。这种人是很少数的，有百分之一、二，或者更少一点。除此之外，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是爱国主义，拥护社会主义。”¹这段话表明，要恢复到资本主义人只有百分之一、二或者更少，按百分之一，只有5万人，按百分之二计算只有10万人，这样的估计是合乎实际的，也是很正常的。

可是1964年正式公开发表修改为：“有人估计，各类知识分子，包括高级知识分子和普通知识分子在内，大约有五百万左右。这五百万左右的知识分子中，绝大多数人都是爱国的，爱我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愿意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的国家服务。”“对于我们国家抱着敌对情绪的知识分子，是极少数。这种人不喜欢我们这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他们留恋旧社会。一遇机会，他们就会兴风作浪，想要推翻共产党，恢复旧中国。”“这种人在政界、工商界、文化教育界、科学技术界、宗教界里都有，这是一些极端反动的人。这种人在五百万左右的人数中间，大约只占百分之一、二、三。绝大部分的知识分子，占五百万总数的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

¹ 《党的文献》2002年第5期第33—34页

都是在各种不同程度上拥护社会主义制度的。”¹这是1964年修改后的讲话，已有“左”的观点，这段话表明：按百分之一计算，就有五万个极端反动的人，再按百分之三计算，就有十五万极端反动的知识分子。这个统计数字是在反右派斗争后估计的，其影响仍然是很大的。

整风开始后不久，1957年5月15日，毛泽东写了《事情正在起变化》的文章，曾发给党内干部阅读，他指出：“批判教条主义的有各种人。有共产党人——马克思主义者。有括弧里面的‘共产党’人，即共产党的右派——修正主义者。有社会上的左派、中间派和右派。社会上的中间派是大量的，他们大约占全体党外知识分子的百分之七十左右，而左派大约占百分之二十左右，右派大约占百分之一、百分之三、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依情况而不同。”²这里的百分比表明，党外知识分子中，右派占百分之一到百分之十，就是说，由五万至五十万。毛泽东接着指出：“所谓百分之一、百分之三、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的右派是一种估计，可能多些，也可能少些。在各单位内情况又互相区别，必须确有证据，实事求是，不可过分，过分就是错误。”³当然，这是一种估计，不一定那么精确，这个基调定下来以后，事实上按百分之十这个基调抓右派分子的。

反右派斗争正正式开始前两天，1957年6月6日，毛泽东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加紧进行整风指示》，要求对左、中、右进行排队，指示指出：“北京的情况证明，各民主党派、高等学校和许多机关中暴露出一大批反动思想和错误思想，反动分子乘机活跃，但是他们只占各单位人数的百分之几，最反动的分子不过百分之一，百分之九十几是中间派所和左派。请你们注意将你们的单位人数，在运动中，按左中右标准，排一下队，使自己心中有数。”这个指示清楚表明，毛泽东在反击右派之前，早已做好抓右派分子的准备，甚至把左、中、右的比例都划好了，时机一到，就要抓右派，向右派开火了。

1957年6月8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指示中指出：“反动分子人数不超过百分之几，

¹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04-405页

²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24页

³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26页

最积极疯狂分子不过百分之一，故不足怕。不要为一时好似天昏地暗而被吓倒。”¹这是对形势的分析，鼓励人们不要怕右派。也就是这一天开始进行反右派斗争。1957年6月10日，毛泽东起草题为《中共中央关于反击右派分子斗争的步骤、策略问题的指示》指出，“民盟右派和反动派的比例较大，大约百分之十以上。”²这是对民盟右派和反动派的数字估计。实际上民盟全部盟员只有3万，被打成右派分子的有5千人，比例高达16%，即6个盟员就有一个右派。

进入反右高潮时候，1957年7月9日，毛泽东在上海干部会议上做了题为《打退资产阶级右派的进攻》的讲话，为干部反击右派鼓劲时，说：“我们总要相信”，“多数人是好人。所谓多数人，不是百分之五十一的人，而是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比如这一次，拿学生来说，北京大学有七千多人，右派只有百分之一、二、三。什么叫百分之一、二、三呢？这是坚决的骨干分子，经常闹的，闹得天翻地覆的，始终只是有五十几个人，不到百分之一。另外百分之一、二的人，是为他们拍掌的，拥护他们的”。“讲到教授、副教授，那就不同一些，大概有五分之十左右的右派。左派也有百分之十左右。这两方面旗鼓相当。中间派占百分之八十左右。有什么可怕的？”³果然，北大师生中被抓了一千五百名右派分子，比例超过21.4%，可算是全国之冠。

《讲话》中谈到党团员崩溃的比例时，说：“上海不晓得，北京学校的党员大概是崩溃了百分之五，团员崩溃得多一点，也许百分之十，或者还多一点。这种崩溃，我说是天公地道。百分之十也好，百分之二十也好，百分之三十也好，百分之四十也好，总而言之，崩溃了我就高兴得很”。“那一年清党、清团清得这么干净呀？他自己跑出去，不要我们清理。”⁴为什么党团员崩溃的比例那么高呢？这是毛泽东所采取的策略造成的。他说：“右派进攻的时候，我们的政策是这样，就是只听不说。有那么几个星期，硬着头皮，把耳朵扯皮长一点，就听，话是一句不说。而且不通知团员，不通知党员，也不通知支部书记，不通知支部委员会，让他们混战一场，

¹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31页

² 引自叶永烈《反右派始末》，第221页

³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40-441页

⁴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44-445页

各人自己打注意。”¹众所周知，以前，凡有重大事情，像政治运动，事先通知党、团员应如何去做，这一次不通知党、团员，“让他们混战一场”。这一下许多党团员迷失方向，犯了错误，成为右派分子。对此，难道决策者没有责任吗。反而说，“我就高兴得很。”

以上所述是毛泽东设想要抓右派的比例，可是群众运动发动起来之后，上面“宁左勿右”一再反对温情主义，又强调“深入挖掘”，还机械地规定百分比，比例达不到，就硬拼凑，知识分子感到人人自危，下面领导害怕犯右倾，也“宁左勿右”，上下两面头脑越来越热，抓右派的数字越来越大。与此同时，1957年6月26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打击、孤立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指示》估计，“全国暴露出来的企图复辟的右派分子，已经是数以千计。”²

6月29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争取、团结中间分子的指示》中，关于右派分子人数的估计：“右派和极右派的人数，以北京三十四所高等学校及几十个机关中，需要在各种范围点名批判的，大约有400人左右，全国大约有4000人左右，你们应当排个队，使自己心中有数。”³7月7日，中央转发吉林省委关于高校斗争的情况报告提出：“发现‘鲨鱼’一点很重要，请各地都注意”。省委报告认为，“先前在第一线公开向我们进攻的右派分子，主要是一些虾兵蟹将，更凶狠的‘鲨鱼’多在暗地活动。”省委报告中说，“吉林地区高校教师中（讲师以上，有的是老讲师以上）右派分子占百分之七至百分之十五不等”。这个通知要人们不仅抓小右派，还要抓暗地活动的鲨鱼，也就是抓大右派，而且准备抓右派的比例高达百分之十五。可以说，吉林省委在教师中抓右派比例算得上是全国最高的。

1957年7月9日，毛泽东起草的《中央关于增加点名批判的右派骨干分子人数的通知》中指出：“反右派斗争正在深入，准确的右派骨干名单扩大了一倍，全国不是四千人，而是大约八千人。”到了9月八届三中全会时，全国已划右派达六万二千多人，据会上的透‘底’估计，全国大约有右派分子十五万人。‘随着反右派斗争的深入挖掘，到1958年4月，毛泽东在汉口会议上说到敌对阶级时，

¹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44页

² 引自叶永烈《反右派始末》，第263页

³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第528页

⁴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第619-620页

“三十万右派也包括进去”。这是毛泽东向党内公布右派分子有三十万人。以后又进行了“反右补课”，补了大量右派分子，远远超过三十万，仅河南一省划右派分子六万人。¹1959年9月17日，《中共中央关于摘掉确实悔改的右派分子帽子的指示》。《指示》中估计右派分子的数字指出：“在这场斗争中，全国揭发出右派分子大约是四十五万人。”²

等到二十多年后复查统计，实际上全国共划右派分子五十五万二千八百七十七人。1980年5月，中央有关部门经过认真的复查、核对，改正被错划右派分子有五十四万多人，这个结果表明，“反右派斗争中所划的五十五万人中，除极少数是真正右派外，绝大多数或者说百分之九十九都是错划的。”³这个比例大大超过了毛泽东在准备反击右派开始所设想的百分之一、二、三的比例，五十五万右派分子为当时全国知识分子总数的九分之一左右。这就是说，九个知识分子中，就有一个右派分子。可见数量扩大化到惊人的程度。不过，这也符合毛泽东认为五百万知识分子中有百分之十的人是反社会主义的判断。所以，抓五十五万右派是毛泽东早已预料的数目。

反右开始，毛泽东动用新闻媒体，制造舆论，由人民日报和其他舆论工具发表了大反温情主义的社论和文章。1957年7月7日，《人民日报》转载南京《新华日报》的社论《反击右派不能温情主义》：“社论说，在反右派斗争中，有一个重要问题，就是手软，打不下去。因为这些右派分子有的原是老朋友、老同事；有的是学者、专家。社论说，人们怜惜人才，原是常情，可是朋友误入歧途，我们视死不救吗？至于有真才实学的人走错了道路，则更为可惜，更应该挽救，人们对他们的斗争，正是对他们的挽救……从整个国家利益、人民利益和人类整个前途来说，我们决不能为小失大，更不能因为对个别右派分子的温情，那就是怜个人而不爱大众，惜小才而不惜大才，小温情而大不人道，为仁者所不应取。”“总而言之，人们斗争右派的手软，这是由于温情主义起了很大的作用。人们对反右派斗争性质和严重性估计不足又是温情主义的主要根源，人们的小仁小义的观点也减少了人们的大仁大义，即对右派分子的斗争

¹ 《毛泽东思想万岁》第1958-1961卷，第61页

² 引自叶永烈《反右派始末》，第569页

³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第618-619页

勇气和决心。这些，对反右派斗争极其不利。”¹

7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斗争正在开始深入》的社论，社论指出，要防止一种倾向：对右派分子的温情主义，“抱着这种倾向的人竭力原谅右派分子，把右派分子描写成为中间分子，把他们的错误的言论行动描写成偶然的疏忽、修辞上的夸张、被人利用等等，不愿意同他们分清界限，更不愿意对他们进行坚决的斗争。这种倾向显然妨碍着反右派斗争的发展，妨碍着群众觉悟的提高。温情主义生怕伤害了右派，但是他们为什么不看到，右派分子的言论行动是怎样地伤害了人民的事业呢？为什么他们对于右派分子那样多情，对于人民的事业却这样寡情呢？而且，我们已经说过，除了屡犯不改，继续进行破坏活动，触犯刑律的以外，对于一般右派分子，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这些原则还是适用的。因此，目前的反右派斗争对于人民的社会主义事业固然完全必要，就是对于一般右派分子说来，也是他们痛改前非、洗心革面的一个机会。温情主义者的养痍贻患的立场，无论从哪一方面说来，都是完全错误的。”²

上述两篇社论，其矛头是针对社会上、党外民主人士，要求他们在划右派、斗右派中决不能心慈手软，决不搞温情主义，达到清除政府部门、人民团体中的持不同意见的党外人士的目。

9月11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严肃对待党内的右派分子》社论，社论说：“在反对党内右派分子斗争中，有一些同志存在着比较严重的温情主义。在党中央肯定了右派的性质和对党内右派分子同党外右派分子采取一视同仁的方针后，他们对于同党外右派分子的政治面貌完全相同的‘党员’，往往姑息宽容，不愿意把这些入划为右派分子，特别是对一些应该划为右派分子的老党员更加惋惜，心软，下不了手。这种情况已经妨碍了某些地方某些单位反右派斗争的深入，对广大群众也产生了不良的影响。在这样一场……严肃斗争中，这些同志竟然对党内的右派分子如此姑息宽容，这说明他们没有站稳立场。”“在对党内的右派，特别是有较长党龄的党内右派作斗争中，有些同志所以采取姑息宽容的态度，还因为他们过于看重了这些人的‘党龄’。他们总认为，这些人是经过革命斗争的考验的，是对党和人民有功劳的；同时又是自己的老同事、

¹ 《人民日报》1957年7月7日

² 《人民日报》1957年7月8日

老部下，是在一起共过患难的。因此，他们对划这种人为右派分子，不仅有一种惋惜情绪，而且也觉得拉不下面子。……要知道，我们党是一个革命的组织的组织，不是温情主义的小集团；温情主义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东西，对我们党只能起腐蚀和瓦解的作用。”¹这是要求领导一视同仁抓党内右派分子，的达到清除党内持不同意见的党员。

由于上述社论坚决贯彻执行毛泽东反右派斗争的部署，使反右派斗争更加深入，抓右派，划右派更加凶猛，许多反党集团、反党分子几乎都是在这些社论发表后被揪出来的。可见，新闻导向，特别是党报的舆论导向，对多抓、多划、多挖右派起到一定导向、推波助澜、火上浇油的作用。当然，多抓、多划、多挖右派是毛泽东、党中央“左”倾思想、“左”倾政策、策略和方法指导的结果。

在反右派斗争很浓的“宁左勿右”气氛中，党的各级领导坚决贯彻执行毛泽东的反右派斗争部署，积极完成上级下达划右派的比例指标，都害怕完不成下达指标任务，轻则被扣上思想右倾，重则被扣上立场不稳，与右派划不清界线。各级领导和积极分子非常害怕自己被打成右派分子，为了完成，超额完成上级下达抓右派的比例，都采用各种手段和方法来抓右派、划右派，其中主观随意性是最省事、最主要的方法。

韦君宜回忆说：“（北京）市委宣传部只划了一个钟鸿，还实在是在七拼八凑硬凑上的。这个钟鸿曾在我兼任市文委副书记时帮助我做过工作，所以常来我家，和杨述也熟，是一个温柔沉静的女子，黎锦熙先生的女儿。她文笔很好，我从来就没听到她发表过什么言论。那几天划右派的时候，我只见杨述天天往外单位跑，去开会、比较、定案。到最后，几位管机关支部的来找他汇报本部门要划的人，只听杨述说：‘这样，不够吧？’另一个说：‘唉，这也算可以了。再没有别人言论比她更重的了。’

原来，他们是因为一个单位如果一个不划，实难交代，是因为再找不着别人了，就这么‘矮子里选将军’。我知道杨述确实不想划她，而又不能不划她，对这点我能理解。但我同时又看见他参加高校党委有关划右派的争论，一派主张多划学生少划教授，另一派主张多划教授少划学生，杨述是属于后一派的。他说：‘年轻人犯错误该保护’，这就算当时态度不错的了。他说：‘傅鹰那样老骂

¹ 《人民日报》1957年9月11日

街的都不划，还划学生？应当划傅鹰。’但是，他完全想不到，所有这些人，老的、少的，都不应该划，他们都不是敌人，都没有反社会主义。这时候，他任部长（北京市委宣传部部长——引者注）既久，已经变成上级思想为思想了，自己的一切思想只能在这个圈子里转，不能越雷池一步。”又说，“作家协会总共不过二百人，右派划了五十多个，“踩线”的还不算。但是，这也不足为奇，当时全国哪个单位不是如此？刘宾雁、王蒙、邓友梅……与我们编辑部有点关系的作家都成了右派。我决不是埋怨那些经手划入右派的人，他们中有的人的确也想尽办法保护下几个人。但是这一场狂潮是从上而下铺天盖地砸下来的。我知道，自己很有划成右派的可能。我回家把此事告诉了杨述，他便转告了蒋南翔（我的入党介绍人）。蒋南翔打了个电话给胡乔木，说：“你把韦君宜调到作协，现在她快要划成右派了，要开批斗会了，你管不管？”胡乔木打了个电话给刘白羽，说我大约尚非右派。同时，杨述把这事也报告了彭真（我是个“一二·九”干部，彭真知道）。我大概就是这样才得幸免的。不过批斗会还是要开，要我一面挨批斗，一面在编辑部主持工作，继续发批判稿批别人。”¹

韦君宜还说：“杨述告诉我，在中宣部里讨论时，他和许立群二人力主不要划王蒙，与团市委负责干部争论，但中宣部最后‘平衡’了一下，结果还是划上了。许多人二十几年的命运就是靠这样‘平衡’决定的。你并不太坏，但是他的坏也并不超过你多少，他已经划成右派了，你怎么好不划呢？就用这种莫名其妙的‘比较攀扯法’，统治了当时整个中国的运动。盲目的、毫无法律根据的‘中央精神’，随时变化的‘领导意图’，就可以随便支配几十万人乃至几亿人的命运。”²

韦君宜说：“还有更多更多无法预料的人成为右派。北京市高等法院院长王斐然，被划为右派。他是北京市级干部右派中级别最高的，照道理他有何罪恶应当公之于众。但是没有，简直没听见，就悄悄地划上了。看起来，由于北京市干部也必须划上些右派才能搪塞过去，所以才抛出这一个的吧。”³

黄秋耘回忆说，“过去，每一次政治运动的后期，都有一个甄

¹ 《百年潮》1998年第2期第27页

² 《百年潮》1998年第2期第28、32页

³ 《百年潮》1998年第2期第30、34页

别定案的阶段。但是在反右派斗争中，划谁当右派，只要领导小组，甚至仅仅是领导小组的第一把手，三言两语就定案了。由于每个单位都要完成一定的比例，只许超过，不许达不到。有些单位，例如中小学校，实在找不出几个合适的对象，只好用抓阄的办法来决定‘右派’的人选，或者像选举代表一样，提名投票表决，这样的做法简直如同儿戏，但一个人甚至一个家庭的命运就从此决定了，假如再来一个甄别定案，原定的任务肯定无法完成，所以这样一道手续，就一律免掉了。”¹

请看“在北大，学生被划为右派的程序基本是这样：针对在鸣放期间有不满言论的学生，或虽无不满言论但却在别人的大字报上留有支持内容的批语、且被积极分子作了记录的学生，先由班级党小组将他们的材料一排，按照问题的轻重，将前面几个上报去系党总支，总支会议讨论一番后，提出初步意见再交学校反右斗争领导小组。我采访了北大的一位教授，57年时他还是学生党员，他所在的党小组将材料报到系总支后，有几个学生是否划右，系总支感到难以把握，于是总支书记要他和另一位学生党员，一起去参加学校反右斗争领导小组的一次开会。他的感觉是一大排人往那里一坐，俨然像当今学术委员会在开会评定职称，颇有民主讨论的氛围；但其实倒像阎王殿，众‘判官’多为虚设，一锤定音的常是‘阎罗’。该小组组长是陆平，常务副组长是崔雄昆，往往是谁的材料还未及念到一半，陆平便发话了，‘这还用讨论吗？行了。’崔雄昆也立马跟着说：‘行了，够划右派了’……随后两人往定性为右派的表格上签上大名，轻快的好似洛克菲勒在以花哨的字体签出一张几百美元的支票，一个年轻人的政治生命顷刻间便给‘支出’了。报上来的材料里有的学生年纪太小，比如中文系有个从浙江农村来的学生，只有十七岁，一向沉默寡言，鸣放时经不住党员的一再动员，说了这么一件亲身经历：家中生活清苦，本指望靠院子里的核桃树换点油盐钱，可核桃刚下树，便被村干部收走……对此类学生，还得加上此类轻微言论，在会上会引起一番讨论，表现出某种踌躇之意外，一般都是越划脑子越热。能不热吗？上面认为北大是右派精英的荟萃之地，倘若右派划得少了，只能证明领导者们右倾。何况江隆基已作前车之鉴，被中央认为划右不力而撤去校党委第一书记的职务，被从中央国家机关调来的陆平给取而代之，犹如受命于危

¹ 转引自朱正《1957年夏季：从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第503页

难之时的一员战将，陆平又怎会丝毫懈怠于党的高度信任呢？我采访的这位教授还记得，1958年开初，北大还搞了一次反右派斗争的‘补课’。他所在的党小组又把剩下的材料给抖落了一遍，从中又挑了几个出来。在第一批划了六个右派之后，这次又划了2个，已占到班级总人数的10%。不过是56年秋季才入校的学生，仿佛北大成了他们的青春的祭坛，他们小学和中学时代所有的勤奋、所有的努力、所有的憧憬，全作了这座祭坛的供品……或许陆平发现了再不断报上来的材料已经十分勉强，再骁勇的战将也不能和光秃秃的树干作战，一次会上，他终于发话了：‘好了，全校已经划了800多右派了，得关闸了，从今天起，刀下留人！’”¹

请看1954年筹备成立的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到1957年全所工作人员约110人左右，其中科研人员62人，反右派斗争中，一部分人主动检查，一部分人被点名检查，挨批、挨斗的大约有20多人，最后划为右派分子有11人，其中有研究人员8人，科研辅助人员3人，按上级下达给哲学研究所划右派百分之五的指标，哲学研究所以超过11%的比例，超额完成了上级的任务。《哲学研究》编辑部完不成百分之五的指标，硬是将不够右派的龚献文划为右派。相距40多年后，原党组领导成员吴传启说：“我们领导成员也害怕，说不定哪天轮到自己当右派，不积极完成上级下达抓右派的任务是不行的。”还说：“《哲学研究》编辑部完不成百分之五的指标，硬是将不够右派的龚献文划为右派，我想保，也没有成功。”²

笔者从未公开发表和散布过错误观点。即使当时看报纸，去北大参观大字报，受到某些影响，自己也主动写成书面材料交给党组织，在大小会议上，主动发言，交代错误想法，结果，就像朱正所说的那样：“第一步，宣布你为右派分子；第二步，责令其作深刻检讨；第三步，据检讨中所写的定案。”实际上，笔者没有在“定案”上签字，就这样被打成右派分子，领导小组根据你亲自承认，亲自写出的交心汇报材料定案的，尽管没有在定案结论上签字，还是定为右派分子，这是在1979年改正时才知道的。笔者就这样当上右派分子。

请看北京大学哲学系全系教学人员八十人中划为右派分子有十

¹ 引自胡平《禅机1957——难的祭坛》广东旅游出版社1998年版，第450-452页

² 1999年与笔者的谈话

三人，占百分之十六点二；全系学生二百七十二人中有右派分子二十四人，占百分之八点八；1955年毕业的一班学生32人中，据初步了解，有右派分子12个人，占百分之三十七点五；1956年中国哲学史教研室‘慎重挑选’的四名研究生中就有右派分子二人，占百分之五十。”¹从这个统计数字看出，北京大学哲学系完成上级多抓、多划右派的比例多么出色，以后那些领导人和积极分子荣升为国家高级干部。

再看武汉大学反右派斗争中多抓、多划右派数字。“武汉大学共划右派分子四百三十人；其中教授二十一人，占教授总数的百分之二十四，副教授七人，占总数的百分之十七，讲师十五人，占总数的百分之十九，助教二十九人，占总数百分之九，学生三百二十七人，其余干部二十二人，助理员四人，小学教师三人，医生一人，工人一人。法律系正副教授二十一人，划为右派分子的正副教授占全系正副教授总数的百分之八十六。中文系不到二百名学生，右派分子为二十六人，其中四年级学生三十七人，只有两个左派，其余均为右派和中右，右派元帅、右派司令均出自中文系，致使该系反右派斗争需要外系借‘左派’力量，为当时全国大学所仅见。”²可见武汉大学领导反右是“左”的出奇的，在高校中较为少见的。

上述例证说明抓右派、划右派的主观随意性达到多么严重的程度。正如薄一波在回顾中批评了毛泽东对估计右派数字带有主观随意性，说：“对右派分子数字的估计，在很大程度上带有主观随意性，并不是建立在严肃的事实基础上的，6月29日，毛主席估计需要在各种范围内点名批判的右派，北京大约四百人，全国大约四千人。仅仅过了十天，即7月10日新的估计又翻了一番。到了9月八届三中全会时，全国已划右派达六万二千多人，根据会上的透‘底’估计，全国大约有右派分子十五万人。而到整个运动结束，全国共划分右派分子五十五万多人，比第八届三中全会的透‘底’估计还多四十万人。这说明，我们对右派的情况，并没有一个确实可靠的估计，而基本上是根据群众运动走，整出多少算多少。从指导思想上讲，虽然也说过‘不可过分’、‘决不要扩大化’，但更多地是怕漏掉，所以在反右派过程中，一再反对温情主义，强调深入挖掘。

¹ 《学习》杂志，1958年第7期

² 《武汉大学校史》武汉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306页

机械地规定百分比，比例不够就硬凑。这种明显的主观随意性现象普遍发生，严重地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导致了反右派斗争扩大化的错误。”¹反右派斗争多抓、多划、错抓、错划到底是些什么人？据薄一波回忆：“有许多参加革命多年的党的干部，有许多同党长期合作共事的爱国人士和朋友，许多学有专长的知识分子和富有经营管理经验的工商业者，以及许多政治上热情但不成熟的青年学生。”²实际上主观随意性抓的、划的都是知识精英和精英储备人才——大学生。

综上所述，无论从右派分子定性方面，还是从右派分子定量方面，都说明反右派斗争犯了严重混淆敌我矛盾的错误。这个严重错误影响极其深远，无论对右派个人及其亲属，对整个国家民族都是不幸的。

三、右派摘帽、甄别上的“左倾”错误

毛泽东定性右派分子为敌我矛盾，定量方面抓多少算多少，把他们同地富反坏右并列为五类分子，对他们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在此基础上，把右派摘帽同特赦国民党、伪满战犯同等看待，视为特赦战犯一样宽大处理。基于这种“左”的认识，对右派摘帽条件必然过严，摘帽时间必然延长，而对右派甄别成为不可能。

反右派斗争后的1958年，全国开始大跃进，需要调动全国六亿人的积极性，毛泽东注意到右派也是一种可利用的力量，化消极为有用，同时还可以分化、孤立右派，先后在两次重要会议上提到右派摘帽问题。

1958年4月6日，毛泽东在汉口会议上讲话中提出右派摘帽问题，他说：“几年之后，他们把心交出来，真正改变，可以摘掉帽子。”5月17日，毛泽东在八大二次会议上讲话中指出：“你们开了右派分子会议没有？使右派中十个人有七个人改好，经过十年八年改造好了，会站到我们的方面来，摘掉右派帽子，再三五年再坏，再给他戴上。”³

1959年8月24日，毛泽东致函刘少奇，建议特赦罪犯，同时也给右派分子们以宽大处理——分批摘帽：“关于全国四十五万右派分子分期分批摘帽子的问题，据江西省委杨尚奎同志说，是一个

¹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第619-620页

²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和事件的回顾》下卷，第619页

³ 《毛泽东思想万岁》第1958-1961卷，第61、80页

重要的政策问题。他说，已经向你说过了，你答应回北京统一考虑此问题。我认为，积以时日，至少可以争取百分之七十的右派分子改变过来。例如说，在今后七年中（或更多时间），每年争取转变和摘掉帽子百分之十左右，是可能的。请你提向常委和书记处讨论一次，由中央发一个指示，在国庆十周年时机，根据确有改变的情况，给第一批改造好了的右派分子，摘掉四万五千人左右的帽子，即百分之十，对于教育右派分子、一般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民主党派成员，将大有作用，他们会感到确有前途。对于目前反右倾、鼓干劲也甚有利。摘去帽子后，旧病复发，再次、三次……右倾，也不要紧，给他再戴上右派帽子就是了。”¹从上述引文看出，毛泽东把右派摘帽（宽大处理）与特赦战犯相提并论，规定摘帽比例和时间，摘帽后表现不好还可以重新戴帽，这是“左”的指导思想的延续。党中央、国务院根据这个“左”的思想形成摘帽工作的指示、政策加以落实。

1959年9月1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确实表现好了的右派分子的处理问题的决定》。《决定》指出：凡是已经改恶从善，并且在言论和行动上表现出确实是已经改好了的右派分子，今后不再当作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看待，即摘掉他们的右派的帽子。9月1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摘掉确实悔改的右派分子的帽子的指示》。摘录如下：

《指示》对右派分子的情况进行分析：1957年，党领导全国人民粉碎了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猖狂进攻，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在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伟大胜利，在这一斗争中，全国揭发出右派分子约四十五万人，对于这一批右派分子，党采取了严肃与宽大相结合和区别对待的正确处理方针，对他们进行了一系列的教育和改造工作；同时，由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伟大胜利的影响，这就促使右派分子中多数人有了不同程度的转变和分化。根据若干单位的初步统计，右派分子的当前表现，大致可分为以下三类：

一、已经低头认罪、确实悔改，并且在工作、学习和劳动中表现较好，愿意向党和人民靠近的，约占右派分子总数的百分之二十到百分之三十，其中有一部分人已经有显著的悔改表现；

二、表示愿意悔改，但内心不完全服，表现时好时坏的，约占右派分子总数的百分之五十到百分之六十；

¹ 朱正《1957的夏季：从百争鸣到两面家争鸣》，第518页

三、基本不服或完全不服，表现不好的，约占右派分子总数的百分之二十左右，其中有一小部分人坚持反动立场、抗拒改造甚至继续有反动言行。上述情况说明，只要我们坚持正确的方针，继续加强对他们的改造工作，经过相当时期之后，就可以逐步地把右派分子中的绝大多数人改造过来。

《指示》分析摘帽意图、控制摘帽比例：党中央根据毛泽东同志的建议，决定在庆祝建国十周年的时候，摘掉一批人确实改好了的右派分子帽子。中央认为，这样做，对于教育右派分子，对于教育资产阶级分子、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民主党派成员将会大有作用，他们会感到只要自己真正接受改造，就确有前途；对于目前反右倾、鼓干劲也甚有利。摘掉帽子的右派分子的数目，以控制在全国右派分子的百分之十左右为好。

《指示》还指出，摘帽后还可再戴右派帽子：今后，根据右派分子的表现，对那些确实改好了的人，还准备分批分期摘掉他们的帽子。最后，剩下少数死不悔改的、花岗岩头脑的反动分子，就会完全陷于孤立。至于摘掉帽子之后，如果有人旧病复发，再次、三次进行右派活动，可以再把右派帽子给他戴上。

《指示》规定摘帽必备的条件：摘掉右派分子的帽子，是一件严肃的政治工作。摘掉帽子的人，必须具备三个条件：

- 一、真正认识错误，口服心服，确实悔改；
- 二、在言论、行动上积极拥护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道路，拥护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
- 三、在工作和劳动中表现好，或者在工作和劳动中有一定的贡献。各地各部门应该根据这些条件和实际情况，把右派分子仔细排队，定出摘帽子的具体计划和步骤，对于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人，进行认真的分析研究，作出其实事求是的鉴定。但不要机械地硬凑比例数字，比例可以稍大或者稍小于百分之十。

《指示》对党内外右派分子摘帽后的规定：原来是党员的右派分子，在摘掉帽子以后，一律不得恢复党籍，只有经过一个更长时间的考察，确实具备入党条件，才可以接受他们重新入党。¹

1959年11月2日，中共中央发出的《关于摘掉右派帽子的人员的工作分配和生活待遇的规定》的文件，文件中规定：现在分配

¹ 徐达深主编《共和国史记》第二卷，吉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93-394页

的工作职务，一般要低于他们受处分以前所担任的职务；并且不要让他们担任机要部门、要害部门的工作。“所有摘掉右派帽子的人，不经过相当长期的考验，一律不得提拔使用。”“凡已开除学籍、实行劳动教养的右派分子，在摘掉右派帽子以后，学籍一律不予恢复，可以帮助他们就业。”“原来学习国防、外交、尖端技术等机密性专业的右派分子，在摘掉右派帽子以后，一律不再学习原专业，可以转学别的专业和其他学校，或分配适当的工作。”¹

上述讲话和文件都是“左”的指导思想的产物，文件规定右派摘帽条件苛刻，时间拖延过长，具体表现：

第一，控制摘帽比例每年不得超过右派分子总数百分之十，五十万多名右派分子按此比率摘帽，时间需要十多年，至少拖延到七十年代，许多右派分子要戴上十多年帽子，一生中有几个十多年啊。

第二，摘帽三个条件太苛刻。就第一条认罪态度来说，多数右派被定为右派分子究竟犯了什么性质错误也搞不清，要做到服罪，确实悔改实在难于做到，许多右派就这一条认识上不去，不可能摘帽；就第二条标准来说。把拥护和反对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作为摘帽标准觉得太抽象，变动不居和难以掌握，人们对三面红旗本来存在疑虑，右派们不敢吱声，口头上表示拥护，内心却是另一回事；就第三条表现在行动来说。工作或劳动有一定贡献，对大多数右派难于做到，许多右派累死在劳动中，管理者不承认右派的成绩，累死是他们应得的。

第三，摘帽后再坏可重新戴帽，戴帽后分配低于受到处分前的职务，只能担任次要工作，一律不得提拔使用，这些规定，使摘帽或不摘帽的右派感到自己都没有前途，也没有奔头，认为这一生就完了，产生悲观、消极情绪。有的摘帽后重新戴上右派帽子，这就让右派摘帽后仍然紧绷阶级斗争这根线，时刻提醒自己，处处夹着尾巴做人，思想改造、工作、劳动仍然处在高度紧张状态，稍有放松，有的人就提出摘帽右派不像当右派时的表现那样好，政治运动一来，都要严密监视摘帽右派的动向，稍有不和“错误”言行，有可能重新带上右派分子的帽子，笔者于1968年就重新戴右派分子的帽子（大约半年多）。

第四，党内右派摘帽后不得恢复党籍，学生被开除后不得恢复学籍。这种规定实在没有道理。党内右派分子，许多是经过生死考

¹ 华民《中国大逆转》，第395页

验，坚信并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摘帽后不得恢复党籍，使这些人感到寒心，失去信心，产生悲观情绪。学籍一律不予恢复这一规定，实在太不应该，从根本上否定大学学习阶段，实行了读书无用的实验。尽管文件规定过“左”、过严，条件苛刻，但右派摘帽工作还继续缓慢进行。薄一波回顾说：“在1959年、1960年两批摘掉9.9万人的‘右派分子’帽子的基础上，从1961年起，又分批摘掉了一部分‘右派分子’等帽子。到1964年，已先后五批共摘掉约30万人（其中主要是知识分子）的‘右派分子’的帽子。”¹

文化大革命期间中断了右派摘帽工作，右派分子和摘帽右派一起受二遍苦，吃二茬罪，许多人是从死里逃生。直到1978年4月，中央统战部协同公安部、中组部等有关部门召开了烟台会议，产生了中央55号文件（实为11号文件），决定全部摘掉右派分子的帽子。

各级党委根据摘帽、甄别的指示精神，按照文件规定具体落实。现在介绍一些摘帽过严的具体案例：

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贯彻落实右派摘帽工作简单情况：

反右派期间，哲学研究所划右派分子11人，经过1957年冬，1958-1959年秋，右派们通过近两年的各种形式的改造。所领导落实右派摘帽工作，首先召开包括右派分子在内的全所工作人员会议，传达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右派摘帽工作精神，所里准备摘掉几个右派分子的帽子，右派分子摘帽必须具备三个条件：一、真正认识错误，口服心服，确实悔改；二、在言论、行动上积极拥护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道路，拥护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三、在工作和劳动中表现好，或者在工作和劳动中有一定的贡献。根据这三个条件来进行检查、对照、衡量自己是否符合必备的条件，要求右派分子都写出书面材料，交给基层党组织，由党小组讨论、研究、鉴定，然后送到所里党组，由党组成员讨论、评比、平衡，上报科学院党组，院党组批准同意后，所党组召开全体工作人员会议，由党组负责人宣布。

徐懋庸，李德齐两人具备摘帽的三个条件，摘掉他们两人的右派分子帽子，从宣布之日起，他们回到人民内部来了，是革命同志，其他未摘帽的右派分子都应向他们学习。学习他们的认罪态度，学习他们积极拥护党的领导和走社会主义道路，具体表现是拥护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还学习他们的劳动态度和工作态度。徐懋

¹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第1001页

庸、李德齐都是老党员，高、中级干部，他们受到开除党籍、降职、降薪处分，摘帽后，仍然留在哲学研究所图书资料室工作，其他一切待遇都没有改变，仅仅是摘帽而已。

笔者是哲学研究所十一名右派分子之一，写出思想汇报，经过反复折腾之后，党小组提出意见：认罪态度有问题，主要表现是忘掉自己的右派分子身份；劳动或工作虽好，其动机是为了摘帽等，这些意见当时让我无所适从，不知如何改造自己，带着痛苦、悲观、自卑心情继续在1960年、1961年上半年工作、劳动中改造自己，但摘帽无望。

1961年5月，笔者由哲学研究所发配到辽宁鞍山市，名义上是下放程静宇（笔者的妻子）去地方充实理论队伍，实则是发配我，是将矛盾往下交，因为单独下放右派分子是没有单位接受的，只有下放程静宇全家才可能有单位接受。通过市人事局多方说服工作，才把笔者安排到鞍山市五金制品厂，具体担任成品仓库保管员（工人工作，干部待遇，唯一标志，就是周三参加干部的政治学习）。厂负责政治思想工作的负责人，要求右派分子订好思想改造规划，主要是根据摘帽必备的三个标准制订规划。笔者牢记规划，通过实际工作，半体力劳动的考验（原来在中央国家科研机关从事科研工作，一下子变为基层作具体管理工作，工作性质发生巨大变化，需要一个学习、熟悉、适应的过程），工人师傅的热心帮助，基层党组织的真诚关怀，家属的不断鞭策（特别提醒：儿子快要上小学，难道让儿子上学时填写父亲政治面目就填右派分子吗，能否在儿子上小学之前争取摘帽，让他填写父亲政治面目是群众）。1961年没有提出申请摘帽，因到厂里的时间不到半年，根据1961年的改造规划，1962年加速改造自己，积极努力工作和劳动，克服生活上的困难（从1960年浮肿到1962年还继续浮肿）。到1962年国庆前夕，本人提出摘帽申请，党总支接受申请，组织全厂工段长以上的党员干部、全体党员进行讨论、作出鉴定，一致同意摘掉笔者的右派帽子，经党总支同意，上报鞍山市铁西区委统战部，再由区委统战部上报市委统战部批示，经过各种程序、手续，才由铁西区委统战部召开全区右派分子摘帽大会，统战部夏部长在大会上宣布，摘掉一批右派分子的帽子，其中就有笔者的名字。当时心情很激动、兴奋，盼望已久的愿望终于实现了，是一件大喜事。下班回到家，将这个好消息告诉妻子，她很平静地说，早该摘帽，你又不是什么坏人，摘帽后争取回到原来的专业上来，发挥所长，一个北大本科毕业生，到一个合

作工厂当保管员，用非所学。在妻子眼里，丈夫本来是个好人，摘帽是争取回到原专业上来，发挥学有所长，为人民做点贡献，这才是目的所在。

摘帽后，仍然当成品仓库保管员，降职没有改变，降薪三级没有恢复，其实与摘帽前一样。所不同的是，摘帽之前，全厂工人群众并不知道厂里成品仓库保管员是中央下放的一个右派分子。当是党总支书记蔡恒玉说，凡是上级党委分配到我厂的右派分子，一律不在工人群众、普通干部中公开右派分子的身份，只在党员干部、党员中宣布其右派身份，其目的是便于右派分子的改造、方便工作。可摘帽后，全厂工人都知道新来的大学生是从中央下放到我厂的右派分子。一时间议论纷纷。

有的工人说，从中央下放到我们这个合作工厂的人，肯定是有问题的人，领导上不让我们工人知道了；有的工人说，北京大学毕业大学生到我们这个小厂当仓库保管员，连一个小学生、初中生能干的活，确让一个大学生来担任，简直是大材小用，浪费人才，看来读大书也无用；有的工人说，你这个年轻右派分子，肯定是嘴上没有把门的，说话不注意，得罪了领导，他们给你小鞋穿，这一下，你知道了锅是铁打的，以后要注意，领导是得罪不得的；有的工人说，像你这样大学毕业的右派分子，现在摘帽，以后好好干，将来还可以调动工作，不会老当仓库保管员的。听了工人师傅们这些质朴的议论，我感觉到既有同情惋惜之词，又有鞭策、鼓励忠告之言，心里感到前途是光明的，还是有奔头的。总之，工人师傅们对笔者的处境是同情的、理解的。但摘帽之后的处境并没有什么变化，个别“左”派分子还是另眼相待，从一次评季度奖就反映出“左”派分子的看法：摘帽右派不能评一等奖，右派干得好是应该的，是悔改认罪的表现，评个三等奖就可以了，这位“左”派发言后，其他的干部立刻表示同意评三等奖。评三等奖事小，但打击摘帽右派对工作的积极性影响太大，动摇我继续前进的信心，感觉到摘帽后前途无望，没什么奔头。

哲学研究所的右派分子中，59年、62年摘掉几名右派帽子后，其余的七八位直到1978年才摘帽。拖了二十多年，同时也得到改正。

总之，右派摘帽采取过“左”政策，主要表现控制摘帽比例太小；标准过高，而且摘帽条件变动不居，让右派们莫衷一是；戴帽时间拖延过长，许多人戴了20多年右派帽子，摘帽后称做摘帽右派，政治经济待遇、工作生活环境和所受精神压力没有什么改善，并没

有从另册上消去，仍然是政治贱民、二等公民，夹着尾巴做人；表现欠佳或稍有不满意可以重新戴上右派分子帽子；什么政治运动一来，摘帽右派作为一条死狗，一块臭肉，随时随地等到挨批、挨斗。

右派分子甄别问题是在总结“大跃进”和纠正“左”错误基础上，国内政治环境出现稍微缓和气氛下提出的。1962年1月11日至2月1日，中共中央召开七千人大会，毛泽东在会上作了自我批评：他说：“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的，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¹

在七千人大会上，中共中央决定给几位被错误批判的党员、干部甄别平反。在此过程中，毛泽东认为，对谁都可以研究平反，但对彭德怀的问题不能平反。在这种给错批、错斗党员、干部甄别平反的情况下，联系到“反右派斗争”中许多被错批、错划的右派分子，也应该进行甄别平反。从李维汉的回顾中可以看出，他说：“1962年，我们在《关于右派分子工作中几个问题的报告》进一步提出：如果领导上认为需要和右派分子本人或家属申请甄别的，可以甄别。对于确实划错的，予以平反。对于可划可不划而划了的，可以从宽摘掉他们的右派帽子。由于‘左’的影响，这一案当时未能解决。”²李维汉为右派分子提出甄别平反问题的上述建议，受到毛泽东严厉的批评，在以下文件中可以见到。

1962年8月17日，中共中央《关于右派分子工作的几个问题的复示》，摘要如下：你们七月二十六日《关于右派分子工作的几个问题的报告》及所附平杰三等同志关于安置右派分子的意见，已悉。中央同意你们今年8月下旬召开一次关于处理右派问题的工作会议，检查工作，和再给一批确实已经表现悔改，或者有相当悔改的右派分子摘掉帽子的意见。此外有以下三点，请你们注意：

一、对右派分子不应当一般地提出甄别平反问题，只是对于其中个别完全搞错了的，即确实不曾有过右派言论、行动的，才作为个人的问题，实事求是地予以改正。但是报告中所提：“如果领导上认为需要和右派分子本人或家属申请甄别的（包括已摘掉右派帽子的人），可以甄别”的意见是不妥的。这样做起来，实际上会搞成一种对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普遍的甄别，或者对很多右派分子进行甄别。这是没有必要的，也是对党和人民不利的。

¹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0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24页

² 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下册，第839页

二、右派分子摘掉帽子以后，如果表现很坏，怙恶不悛，应该在审查确实后，选一部分恶劣的，再把右派帽子给他们戴上。

三、在精简中，对右派分子，既不要抱着卸包袱的态度，借机一概推出不管，也不能特殊照顾，应当按照一般精简原则处理和安置，对其中生活无着和生活特别困难的，应适当解决。¹

中央的复示，对统战部报告的核心部分予以否定，只允许“只是对于其中个别完全搞错了的，即确实不曾有过右派言论、行动的，才作为个别人的问题，实事求是地予以改正。”

这个文件下达后，下级党委有的贯彻执行，国家机关党委就是如此，据薄一波回顾说：“当国家机关党委确定冯雪峰等人为右派甄别试点对象，进行甄别试点工作时，毛主席9月29日在反映这一情况的中央宣传《宣教动态》增刊第63期上作了如下严厉的批示：

‘刘、周、邓三同志阅。请邓查一下此事是谁布置的，是组织部、中直党委，还是国家机关党委自己？此事出在中央机关内部，右派分子本人不要求甄别，而上级硬要试点，以便取得经验，加以推广。事件出在六七月。其性质可谓猖狂之至。阅后付还。查后告我’。这样，对右派分子的甄别工作就不可能进行下去了。”²从这里看出，对右派进行甄别的真正阻力是来自毛泽东。1962年8月，毛泽东在八届十中全会上批判彭德怀的“翻案”问题，认为翻案是阶级斗争日益严重的表现，在会上重申阶级斗争，而且是“年年讲”，“月月讲”。自此之后，甄别、平反问题停止了。可见，对右派甄别、平反的最大阻力是来自毛泽东坚持批判彭德怀的错误认识，来自毛泽东坚持“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错误认识。

引证一个终止甄别的案件。韦君宜回忆说：“有一个杨觉案，更加荒唐。因为他的妻子潘漪回乡养病，他去探视。碰见了那个村因为与邻村合成一个高级社，吃亏太大，一个穷村一个富村，分配太不公平。他们写了封信，请杨觉带到河北省委代为告状，要求仍然分开核算。结果那位高级社社长就来信到作协，说杨觉煽动分社，是破坏合作化。作协正在找右派找得眼红，发现了这个‘破坏合作化’的，便要把杨觉也算上。我当时已经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但我还尽力提了一个意见：派人下去调查一下再定。结果派了一个从未下过乡的年轻女同志。她去了一趟，把那位高级社社长的全部

¹ 叶永烈《反右派始末》，第576页

²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第1008页

谈话都记下来，而对于对方一点也没调查，就回来了，说那位张社长是怎样怎样的高风格，是一心为了合作化，所以杨觉非划右派不可。叫我还有什么办法呢？只能勉强同意把他划上了。到1961年，杨觉提出申诉。恰好这时他的妻子潘漪在我所在单位——人民文学出版社，这时我已经是社领导，便想做一点好事，使自己的心灵得以平安。我去和作协张禧联系，共同受理此案。然后由我社派人去重新调查。我选派了曾长期做农村工作的人事科长刘子玉同志，加一个年轻精干的何启治，一同前往。他们调查的结果，果然与那位女同志的调查不同，两面的话都听了，连县委认为那件事情本来不必要那样大搞的意见也取到了。然后我们在作协开会，把当年处理此案的人都请来。除了那位女同志仍然坚持必须划右派外，别人都说可考虑。看起来案子有可能扭转了。——但是谁也想不到，中央突然通知，凡划右派者，申诉要求翻案，一律不得受理。也就是一律不许甄别平反。全部的努力又都成空了。也就是说，当初各单位乱戳乱点的，甚至乱凑数字的这些‘右派’、‘敌对分子’，竟然连重新翻阅一下档案，看一看轻重，都不允许！这一手比以前划反革命、肃反、镇反、三反五反，都还要利害。那都还是允许甄别的啊！”¹

再引证一个截流申诉的案例。据通过处理各种给党中央、毛主席的来信的工作人员崔英说：“比如在半年多的时间里，仅仅从山东部分地区的来信看。1957年反右运动中被划为右派者的申诉信就占了很大的比重。申诉人怀着异常痛苦的心情，向党中央、毛主席叙述打成右派后，他们被开除党籍、降职、降级，甚至开除公职下放农村劳动改造的苦难历程。他们出于对毛泽东同志、对党中央的信任，希望能够为其申冤、平反。来信者中既有省级领导干部，也有地、市、县、区级的领导干部，更多的是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的一般干部、技术人员和大、中、小学的教师、教师，以及文艺界、新闻出版界的专家学者、艺术家、编辑、记者等知识分子。根据申诉人所提供的材料和定案依据，我看到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并不是否定社会主义制度，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多是由于对本省、本单位党员领导干部提出过批评，……或者说了一些符合客观实际情况的老实话，而被上纲成攻击党的政策；或者学术上的不同见解，而被说成是反马列主义、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严重政治问题，等等。接触

¹ 《百年潮》1998年第2期

这类信件多了，使我逐渐形成一个概念：在反右派运动中存在着扩大化的错误，使一些好党员、好干部受到了伤害，有的甚至是极为严重的伤害。作为代表党中央、毛主席处理信件的我，心情是极不平静的，一方面常常因申诉人苦难的遭遇而难过，一方面我为党的某些组织、某些领导者的错误做法感到不安，他们不但给许多同志造成不幸，而且使党的形象遭到损害。形成这个概念后，在处理这一类信件时，我总是怀着对申诉者深深的同情和有错必纠以体现党的伟大正确的想法，分别批注请当地省、地、市、县委研究处理，有的信件我还批上‘请将处理结果告诉我们’，以为这样批处会引起当地党委重视，从而纠正错案。但按当时秘书室规定的制度，这一类批处意见要经过秘书室领导审核才能下发。而这样的处理意见送到秘书室领导那里总是通不过，不是改为‘不处理’，就是改为‘送当地党委阅’的字样。而这样转回去的信件，却往往不但解决不了问题，反而使申诉人再一次受到打击，使他们不得不重新写信给党中央上诉。面对这种情况，我几次向主管信访的领导同志提出意见。但问题非但得不到解决，领导并一再重申：右派是敌我矛盾，右派信件原则上不作处理，右派不能平反。由于我坚持实事求是，强调对右派也应该贯彻‘有错必纠’的方针，和领导唱了反调，受到了领导和党小组会的批评，说我思想右倾，容易感情用事，以感情代替政策，严重自由主义，等等。

对这种批评，我当然想不通。我坚信党中央、毛主席是实事求是的，是爱护干部的，是关心干部疾苦的，是有错必纠的，只是不了解下情。当时我想，如果不把大批错划右派向党中央、毛主席申诉的情况反映给毛主席，是对工作的严重失职。共产党员的责任感，促使我想求见毛主席面陈实情和己见。在中国古代社会，像比干、屈原、海瑞等人，为国家、民族和人民利益，尚且不惜冒着坐牢、杀头的危险，敢向君主、皇帝请谏，更何况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共产党人！同时，我非常自信，毛主席知道真实情况后，一定会发出纠正错划右派的指示。因此，我下决心把大批错划右派的申诉情况直接报告给毛主席。

但是毛主席是异常繁忙的，我也没有工作上的机会直接接触他。即使我请求接见，恐怕他也不会会有时间接待一般干部谈话，更何况这种请求甚至传递不到他那儿。我想了来去，觉得只有利用周末晚会的机会，趁主席休息时，抓住时机向主席反映……

1963年1月间，在另一次周末晚会上，我又见到毛主席……毛

主席笑着向我点头，从沙发上站起，走向舞场。我一边跟主席踏着舞曲节奏像散步似地缓缓漫步，一边向主席谈起了右派申诉信件很多的情况。为了阐述得透彻，我列举了一些典型案例，以说明反右派运动中，某些地方党委不执行政策，甚至趁机打击陷害同志，把一些好同志打成右派，本人不服，不断地给主席来信申诉，寄希望于党中央、毛主席为他们平反的情况。

毛主席精神非常集中地听着我说，一曲未终，他在他经常坐着休息的沙发前停下，问我：‘划右派的定案材料寄来了吗？’‘寄来了。’我说，‘正因为看到了这些定案材料，才更加清楚地证明很多好同志被错打成了右派。’我连珠炮第似地接着说，‘这么多的右派申诉，主席知道不知道？下边有扩大化的错误，主席知道不知道？’主席说，详情不太知道。我又告诉主席：‘对右派申诉信件，领导有指示，原则上不作处理，说右派是敌我矛盾，不能平反……’我刚说到这里，主席有点气愤地提高了声音问：‘谁说的？真正错划的右派，要纠正，要平反！’他当即要我转告秘书室的领导，把各地的右派申诉情况写个综合材料送给他。听了主席的话，我高兴万分，几乎要跳起来。我的意见终于得到主席的重视和支持。和主席告别后，我立即离开舞会，回到办公室，记下了主席谈话的内容。星期一上班，我即向秘书室副主任陈秉忱同志转达了毛主席意见。他极为重视，马上向办公厅负责信访的领导做汇报。后来陈秉忱同志让我执笔起草全国各地右派申诉情况的综合材料。

材料很快写出来了，初稿送给秘书室领导审阅。然而，星期五下午——下一次舞会的前一天，我却突然接到了调动工作的通知，让我立即办理调动工作手续，交出工作证，调出中南海，调离毛主席身边……

离开中央办公厅一个月之后，在我不在场的情况下，给我做了一个是非颠倒的错误鉴定，这个突然的调动和这个错误的鉴定，使我背了十七年的包袱。这十七年里，我蒙受了很大的打击，精神上十分痛苦，我的家庭也受牵连。在过了一些年之后，在文革期间，我才知道，当我正在起草那份关于全国右派申诉情况的综合材料时，秘书室的有关领导就让人事部门四处联系调动我的工作。而我起草的那份材料，也始终没有送到毛主席手中，而是另写了一个违背客观真实情况的报告，致使下情没有上达，上情没有向下贯彻，使大批错划为右派的好同志继续蒙受着不白之冤。……1979年，组织上

也撤销了当年对我的错误鉴定。¹

从这些例证中证明：第一，反右派斗争中确实存在大量冤案、假案、错案，充分反映反右派斗争所犯的错误的严重性；第二，反映这个体制存在上下环节不易畅通的弊端，特别是下情难于上达，出现中间严重的梗阻现象，说明官僚主义体制弊端太严重；第三，申诉者对于毛主席、党中央寄予莫大的希望，可是早在1962年8月，毛泽东就作出对右派案件今后一律不准甄别的指示，这样，致使申冤者无处申冤，实际上彻底粉碎了他们请求毛泽东平反的希望；第四，当时为申诉者搭桥申冤、为民请命的好心人、人道主义者，为申诉者精心策划，安排上报冤情材料，事未成，反而受到不白之冤，增加一个新的受冤者。可见，毛泽东的个人专断、某些中间环节作梗这个体制中的某些具体制度确实存在很大的弊端，古代社会还出现一个包拯，五六十年代连一个包拯也出现不了。可见这种体制应该到了好好理顺的时候了。

总之，反右派斗争所犯严重错误，在右派定性上，犯了把真正朋友推向对立面，把同志当作敌人，把好人当作坏人，把人民内部矛盾当作敌我矛盾来处理等错误；在右派定量上犯了主观随意性错误，采用韩信带兵式的方法，抓右派“多多益善”，从4000人猛增到55万多人，占整个知识分子总数500万的九分之一，将大部分精英通通下去劳动改造，真是国家民族的不幸。摘帽时间过长，戴帽好似成了无期徒刑，不少人二十多年后才摘帽，一个人有几个二十年，让这些人没法发挥应有的作用，国家、民族、个人都受到不可弥补的损失；不仅摘帽时间过长，而且摘帽后还可以重新戴帽，这给那些“左派”分子以捞稻草的机会，确实有“左派”分子捞到稻草，官运亨通，飞黄腾达。在甄别问题上采取不让甄别的政策，让被错划的人一辈子背上黑锅，冤屈一生，株连全家。个别为民请命、主持公道的共产党人也落得被撤职、被调离，成为新的冤屈者。一句话，反右派斗争所犯错误性质，按社会民主进步趋势来判断，就是最高执政当局先开放民主、广开言路、解放思想，后来加以扼杀有限民主，打击民主进步势力，在事实上起到维护教条主义，个人专制独裁，保护保守狭隘思想的作用，实际上是抵制改革开放措施的作用。反右派斗争种种错误表现，说明了执政者及其支持者个人

¹ 肖蔚彬、黄伟经主编《告别“万岁”》广东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39-45页

独裁专行，主观随意性，一言堂或家长制的作风和行为。反右派斗争后，毛泽东一步一步走向个人专制独行，走向更大更严重的灾难性的错误，反右派斗争所犯的错误的只是后来灾难性、浩劫性错误的一个起点。完全可以说，反右派斗争所犯错误，同“大跃进”、“文化大革命”构成建国后的三大灾难。

第二节 反右派斗争的深远影响

反右派斗争的深远影响，直接表现为全国划了五十五万多人为右派分子、二十多个“反党集团”，还划了三十多万人为反社会主义分子，因右派被株连的人，包括其亲属不计其数，他们同右派分子一样也成为二等公民，其遭遇并不比右派分子本人好多少。间接表现在反右派斗争实践基础上形成一套错误的理论、策略和方法，还培养出一大批整人的爆破手和“理论”批判棍子。以后，由错误理论指导，爆破手和棍子们参与的实践产生极其深远的消极后果。最主要表现在：扼制积极因素的发挥，党的优良传统开始下滑，理论认识上形成的失误等。

一、遏制积极因素的发挥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意识形态领域里，进行多次批判运动，其对象是掌握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以及工程技术领域方面的知识分子，每次批判运动之后，其消极作用是时隐时现地暴露出来。到了1956年，毛泽东根据国内、国际形势，在《论十大关系》一文中总结出：“现在为了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建设社会主义国家”，我们要像民主革命时期一样，实行“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的方针”。

“我们团结党内外、国内外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目的是……为了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¹稍后，毛泽东提出达到这个目的的措施，采取整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在1957年5月，发动整风，6月发动反右派斗争，希望通过这两项手段，达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党内外、国内外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的方针。可是，通过整风、反右，不但没有达到和落实这个方针，反而遏制一切积极因素的发挥，妨碍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关系的改善，使得社会基本矛盾日益突出。下面就叙述这方面的问题。

妨碍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力是人运用生产工具和科学技术从改

¹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67、295页

造自然获取物质生活资料、创造财富的能力，是反映人和自然关系，是人的因素和物质的因素两种要素构成。其中人是掌握人文知识、自然知识（包括科技知识）和经营管理、劳动技能的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人，他们是生产力中最高级、最革命，最活跃的因素，在社会生产中起主导、起决定性的作用。如何对待生产力中人的因素是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毛泽东早在《论联合政府》报告中就正确指出：“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¹这是毛泽东在解放前提出的著名原理，这个原理适用于解放后的新中国，看共产党领导下的各种政策，看是妨碍、束缚生产力的，还是促进、发展生产力的。根据这个原理，衡量反右派斗争及其后果是妨碍生产力，还是发展生产力。让实践来证明。

1957年6月开始的反右派斗争，挨批斗的知识分子无法统计，最后划为右派分子的数字高达55万多人（官方统计），这55万多人中有学部委员（现在称院士）、哲学家、经济学家、社会学家、教育家、文学家、艺术家、法学家、政治学家、历史学家、物理学家、化学家、数学家等等各门学科的专家、学者和工程技术人员；有初出学门的年轻有为、未来学术界接班的大学毕业生和在校大学生；有许多工作多年，在岗卓有成就的中青年骨干知识分子等等。一句话是中国当时生产力中的精英部分。将这批精英分子中的人划为右派分子，并给以严厉处分。同时，毛泽东对右派分子采取一打一拉的霸道王道并用的策略，还希望他们在劳动改造中低头认罪，改过自新，重新做人。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改造几年，达到和符合规定的摘帽标准，回到人民内部来，让他们发挥作用。可是，实际情况并不是像毛泽东所预想的那样，右派分子经过艰苦的劳动改造，达到摘帽标准，回到人民内部后也难于发挥作用，党的各级领导不敢、也不愿意使用这批人，主要是怀疑，有私心杂念，怕扣右倾、立场不稳的帽子，怕犯错误，硬是把这批先进生产力，当作简单劳动力来使用。更有甚者，把那些没有摘帽的右派，那些有专门知识的人发往到最偏僻、最艰苦、最落后的地方当苦差。而且冠之以最革命的称呼，让他们去更好接受党的考验，把他们改造成有用之人。可是，许多人经不起管教人员的专横跋扈，也经不起沉重劳动和饥

¹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102页

饿的折磨，不少的精英分子不是被折磨得过早离开人世，就是被折腾到九死一生，或改造成了木头了。

还有留在机关、学校、工厂、企业等单位的右派分子，他们在“群众”监督下从事半体力、半脑力的次要工作，或充当反面教员干一些用非所学的事情。大学毕业的大学生、研究生去工厂当保管工，去食堂喂猪，看管菜窖，到图书资料室打扫清洁，抄写书卡，还随时随地充当临时、紧急的劳动后备军（抢救苞米、白菜等等）。

几十万右派分子在用非所学的劳动和工作耗费了20多年，浪费了他们的青春年华，埋没了他们经过多年辛勤劳动才积累起来的精神财富、科学技术知识。这些只能说明：是又一次对精神生产力、科技生产力的严重摧残和沉重打击。事实上，扼杀了生产力中最宝贵、最活跃、最革命的知识劳动者的积极性，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从理论上说，这个上层建筑所采取的政策是阻碍生产力的发展，扼杀了先进生产力的代表。

对城市、机关、厂矿中的右派分子如此，对农村中精英又如何？反右派斗争前后，毛泽东对农村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力量，即富裕中农采取什么态度呢。土地改革后，农业合作化过程中的富裕中农，按薄一波的说法：“中国富裕中农，其实并不怎么富裕，只是跟贫农比较，土地肥一点，耕畜、农具多一点，手头活一点。他们所以比较富一点，绝大多数是劳动比较勤奋的结果。”¹富裕中农是农村中的精华部分，是生产力中的最有生气的力量。从1955年开始，在农业合作化进行的过程中，富裕中农经常受到批判，同时受到批判还有邓子恢等人，他们强调生产关系的改造一定要同生产力发展需要相适应，要有利于达到增加生产的目的。

1955年，毛泽东在《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报告中指责邓子恢“老是站在……具有资本主义自发倾向的富裕中农的立场。”随后在《农业合作化的一场辩论和当前的阶级斗争》结论中，毛泽东给邓子恢定性犯了“右倾”的错误，邓子恢后来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的按语中，毛泽东指出：“在富裕中农的后面站着地主和富农……在合作化的这面站着共产党。”²在这里，毛泽东“把富裕中农同地主、富农摆在一起，这不仅委屈了邓子恢同志，更重要的是，这个精神传到农村里，使不少

¹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和事件的回顾》上卷，第362页

²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183、208、231页

地方出现一股批判富裕中农的风气。”¹批判地结果，限制和挫伤了富裕中农的积极性，这对农村生产力发展是非常不利的，换言之，是束缚，阻碍农村生产力的发展。

反右派斗争过程中，虽然反右的主要矛头是对准精神生产力和科技生产力载体的知识分子，但对农村中的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富裕中农同样受到批判。1957年7月，毛泽东在《1957年夏季的形势》一文中提出：“我赞成迅速即由中央发一个指示，向全体农村人口进行一次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教育，批判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思想……批判富裕中农的资本主义思想和个人主义思想……其中的主要锋芒是向着动摇的富裕中农。”²毛泽东一句话，中央立即行动。8月8日，《中共中央关于向全体农村人口进行一次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教育》的指示正式发出。教育的中心题目，“是关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辩论。这种辩论在不少乡村已经开始进行”。辩论结果，“纠正了党内右倾机会主义思想，发扬了正气，压倒了邪气。”中央认为：“凡是没有展开这种辩论的地方，必须展开这种辩论，以便有力地批判富裕中农的资本主义思想，反对……个人主义和本位主义。”³从合作化到1957年开始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对富裕中农进行了多次批判，其“人数在一亿以上”（薄一波统计数字）。批判的结果，限制和挫伤了富裕中农的积极性，也使得一些贫下中农不敢劳动致富，这种批判对农村生产力的发展是非常有害的，换句话说，是妨碍、阻碍、束缚农村生产力发展。

1957年10月，在反右派斗争过程中，毛泽东对富裕中农作过分析：“现在，全国究竟有多少人不同意社会主义？我和许多地方同志摸了这个底。在全国总人口中间，大概有百分之十的人，是不赞成或者反对社会主义的。这里包括地主阶级，富农，一部分富裕中农，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一部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一部分城市上层小资产阶级，……六亿人口的百分之十是多少呢？是六千万人。”在这里可以看出，部分富裕中农同地富一样，都是反对社会主义的。又说：“富裕中农大约占农村人口的百分之二十。现在的富裕中农大体分三部分：赞成合作化的，占百分之四十；动摇的，

¹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第361-368页

²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58页

³ 参见《社会主义教育课程的阅读文件汇编》（第一编）上第66页

占百分之四十；反对的，占百分之二十。”¹可以看出，富裕中农中有百分之二十是反对合作化的。

基于对富裕中农的这样分析，富裕中农在合作社里不能担任社里的干部，只是一个普通社员，1957年前后，富裕中农成为农村批判的对象，批判他们的自发资本主义，批判他们对合作化的动摇性，像有的富裕中农和中农社员，觉得在社队干活，劳动一年，只能挣得全家几口人的口粮，至于全家的零花钱，孩子们的学费，老人医疗、赡养等费用，单靠社队工分分钱，没什么指望。于是，凡有一技之长（木匠、瓦匠等手工业者）的农民就外出打工，赚点零花钱。当社队领导发现后，就把他们从打工单位召回，进行批判，批到不外出打工才结束。但是，城乡许多部门，需要一些有技术的手工业的人，于是，社队领导同意外出打工，规定每人每天向队里交钱，如不按时交钱，就不给全家口粮。还有一部分富裕中农会经营管理，开辟生财之道，利用业余时间，在自留地里种菜、栽烟、养鸡下蛋，除自用外，拿到集市去卖，换点零花钱，可以用来补充不足的生活费用。即使在业余时间搞点小自由，也常常被当作自发资本主义道路来批判。在农村，被批判了20多年的自发资本主义势力，直到毛泽东逝世，也没有绝迹。这就让毛泽东要使“小生产也绝种”的目的始终没有达到。批判不了的根本原因，是因为中国农村太落后，农民生活太苦，绝大多数是在求生存，富裕中农是在求生存的基础上求一点温饱，想达到温饱水平，他们在集体经济里找出一些“歪门邪道”，想让温饱维持下去，可是，一批再批，这样一来，大家都过着半饥不饱生活的日子，这些富裕中农的生活水平一再下降，越来越穷。但是，在越穷越光荣，越穷越革命的口号下，经过“大跃进”，在这人为的灾害等各种因素的影响，全国出现大饥荒。最后，从1959-1961年非正常死亡的人数达到4000万人左右。²而精神生产和物质生产的损失无法统计。

综上所述，由于几十万右派分子和上千万的富裕中农受到处分与批斗，挫伤了他们的积极性。这样的方针、政策直接束缚、扼杀和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使中国社会停留在不发达国家的水平上，让全国人民受苦受难。这是毛泽东发动反右派斗争后产生的严重后果之一，其影响极其深远。

¹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82-483页

² 参见晋夫《文革前十年的中国》中央党史出版社1998年版，第104页

恶化人际关系。1956年前后，在人民内部之间的关系可以说是平等互助、同心同德、彼此信任、团结合作的关系。大家齐心协力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为建设社会主义而奋斗。可是，1957年6月反右派斗争和反右派斗争以后，由于出现人整人，使得人际关系出现紧张以至恶化，反右派斗争后，处理右派过重过严，是这种紧张、恶化关系进一步升级和发展，使人们之间出现了万马齐喑的局面。

毛泽东在1957年10月13日《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三次会议上的讲话》指出：“在不赞成或者反对社会主义的人里边，最顽固的分子，包括极右派，反革命，搞破坏的，还有不搞破坏但很顽固的……这样的人有多少呢？大概只有百分之二左右”。“全国人口的百分之二是多少呢？就是一千二百万”。又指出：“在全国总人口中，大概有百分之十的人，是不赞成或者反对社会主义的。这里包括地主阶级，富农，一部分富裕中农，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一部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一部分城市上层小资产阶级，……六亿人口的百分之十是多少呢？是六千万人。”¹在这里，毛泽东把极右派视为反社会主义的人，是在一千二百万人之列；把一部分富裕中农视为是反社会主义的人，是在六千万人之列。这两部分反社会的人加在一起，就有七千二百万人。实际上，右派分子、富裕中农并不是真正反社会主义的敌人，而是被毛泽东颠倒为敌人，但这些人还要生存，还要继续生活下去，必须同人发生关系。毛泽东认为这批反社会主义的人，要改造，当时改造主要方法，就是在劳动中改造，去劳改场所、劳动基地、边远农村、工厂参加生产劳动。在劳动中，人与人之间必然发生的关系，这种关系一般称为生产关系。

众所周知，右派分子中绝大多数是知识分子，他们本身除了知识以外，一无所有，他们参加体力劳动，主要是通过劳动改造思想。劳改部门派出监管人员，右派分子首先与监管人员打交道。监管人员负起监管的责任，首先约法三章，你们右派们要老老实实听从管教，你们现在是右派，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阶级敌人，不要忘记自己的身份，你们是有罪之人，要你们到这里劳动改造，要认罪、服罪，才能改造好；你们要遵守纪律，不许乱说、乱动、乱窜、乱交往，老老实实地劳动，听从指挥，服从领导，如有违规，后果自负；定好改造规划，继续交待和揭发他人的罪行，按照规定改造标准，按时写出书面思想汇报，随时汇报周边人的情况等。可见，监管人员

¹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82-483页

与右派之间的关系，是一种监管与被监管、服从与被服从、专政与被专政的关系，如右派们在劳动中表现欠佳，在生活中违反约法三章，监管人员命令右派检查，发动其他人对右派进行揭发、批判，右派只能听从监管人员的训斥。这里，右派们处在极不平等、任人宰割、凌辱的地位。¹

生产效率的好坏，与右派生活无关，因右派的生活即吃的、穿的、用的，都由原单位或监管部门统一管理。生活中吃的只能维持生存，甚至再生存都无法维持，规定粮食指标，玉米窝窝头，外加点咸菜，谈不上营养，连肚子都难以填饱，患浮肿病的人日益增多，长期沉重劳动和营养不良，不少右派被折磨得过早地离开了对他们极不公平的世界。

被监督劳动的右派分子，他们的处境略好于极右派，他们在机关，农场、农村、工厂进行劳动。在劳动中，管理人员分给他们的几乎都是重活、险活、脏活，在1958年“大跃进”年代，右派分子在劳动中稍微慢了一点，就挨批、挨斗并上纲上线为对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不满，接着责令右派检讨，大家帮助，实为批斗。在交往中，右派喊了别人一声同志，“左”派立即提出批评，谁是你的同志，上纲上线为：你这个右派分子又忘记了自己的右派身份，忘记右派身份就是对自己右派罪行认识不够，是对划为右派不服的表现。在大饥荒的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人们的口粮都吃低标准，右派们和在劳动锻炼中的干部们，他们干重体力劳动，付出的劳动能力最大，消耗体力最多，瓜菜代粮的低标准，入不敷出，身体一天一天垮下去，右派们首先浮肿，干部们接着跟上。1960年，中国科学院下放到曲阜的100多名干部，没有几个不浮肿的，浮肿到像头上戴帽，脚上穿靴，历史研究所的下放干部李学勤、肖良琮手拄拐杖才能支撑身体行走。右派们同干部一起劳动，右派们的劳动性质不同，是在群众监督下劳动，说是改造反社会主义思想，改恶从善、改过自新的劳动；干部们下乡劳动，是通过劳动锻炼，改造非无产阶级思想，改造资产阶级的世界观，树立无产阶级思想和世界观。

右派们无论在劳动改造或监督劳动中，还是在机关、企业、学校充当反面教员观察劳动或次要工作中，都处在监管人员的监督下，根本没有人身自由，处在极不平等的地位中。这种人际关系是

¹ 这方面的事例可参见戴煌《九死一生》一书

一种敌我关系下的改造与被改造、监督与被监督、专政与被专政的关系。

即使右派回到人民内部后，这种关系是否有所改善呢？表面上似乎是平等关系，但人们对右派分子摘帽后，称“摘帽右派”，表现不好，可以重新戴上右派分子帽子。摘帽后，“左”派们还在监视“摘帽右派”。在各种待遇上，右派分子摘帽后，不安排原来的专业，就地就近安置劳动、工作，不恢复原工资，国家给干部涨工资，没有“摘帽右派”的份，评奖金只能评三等，甚至没有，就算是评上，也是领导的恩赐，在干部中评先进，“摘帽右派”没有资格参与，原来是党员的，不恢复党籍，非党员“摘帽右派”不准申请入党，原来搞哲学专业的，上层建筑部门不接受他们。总之，“摘帽右派”回到人民内部后，政治待遇与右派分子相比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变化，仍然被轻视、被孤立，处于不平等的地位。生活待遇上，与右派分子相比有点变化，给“摘帽右派”重新定级定薪，一般说来，不可能恢复原来级别，而是保持最低生活水平的工薪，维持受处分时的工薪级别。其他福利待遇比正常干部低一等，甚至不能参与，实际上，还是把“摘帽右派”当作异己，受歧视，政治上的二等公民。

受右派分子牵连的家属大约有 200 多万人，他们的处境并不好过，在生产、工作中的积极性受到压抑，一是来自社会舆论的压力、某某右派分子的家属，二是领导人不敢使用、重用。这样一来，他们的积极性难于发挥出来。而且，每次政治运动一来，注意右派及其家属的新动向，如有右派被有关部门传讯或批评，家属们就非常紧张；1958 年后，右派分子同地、富、反、坏并列，被称为五类分子，右派分子家属也升为五类分子的家属，简称“反属”，打这以后，他们的政治，经济地位基本上同右派一样，列入另册，也是二等公民，成为被轻视、被凌辱的对象。当时出现右派夫妻真假离婚的现象，右派子女与右派分子声明脱离父子、父女、母子、母女关系，实际上，这种真假离婚改变不了株连关系，脱离父子、父女、母子、母女关系也改变不了株连关系，子女上学、参军、提干填写履历表即不填右派分子的父母，人事部门一追查，还是无济于事，仍然不能上学、参军、提干。所以右派分子影响家属及子女的前程，阻碍新生力量的成长，这样使得右派分子受到无法挽回的损失和承担极大的痛苦。这是反右派斗争所派生的一个最恶劣的后果之一。

在农村，不停顿批判富裕中农的自发资本主义倾向，反右派斗

争后期，批判富裕中农的不满意粮食统销统购、不愿意加入合作化、想自由单干等问题和思想。由于受到批判，富裕中农的生产积极性受到压抑。同时，他们在集体经济里，难于施展才能。在生产中，一切由社队安排，在劳动中完全听命于队长、组长的吩咐，一般地都派富裕中农干一些技术活，但工分报酬同无技术的贫下中农一样，这样就挫伤了他们的积极性。在生产队里，富裕中农处于贫下中农领导下，生产队的生产、生活、财务等事务，都由贫下中农干部说了算，富裕中农的意见很微弱，也不去提出什么建议，埋头干活算了，省得惹出麻烦又挨批、挨斗。一句话，富裕中农处于被领导、被批判、不平等的地位下，他们的积极性被压抑、被扼杀，他们的生活水平每况愈下，同贫下中农生活水平差不多，甚至还低于贫下中农的生活水平。这与批判富裕中农有关，更与生产关系中的所有制有关，富裕中农的生产资料都交给生产合作社。说到底，当时农村的生产关系不适合生产力的发展，是生产关系阻碍生产力的发展。

在反右派斗争期间和以后，知识分子的积极性是否发挥出来，他们的心态如何，现在举例说明。

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季羨林反思这方面的问题，他说：“政治运动，一个紧接一个，好像有点喘不过气来。批判武训，批《〈红楼梦〉研究》，批判胡风，批判胡适，再加上肃反等等，马不停蹄，应接不暇。到了1957年的反右斗争，达到了一个空前的高潮。我虽然没有被裹进去，没有戴什么帽子；但是时时处处，自己的精神都处在极度紧张的状态中，日子过得并不愉快。像季羨林那样的高级知识分子日子过得都不愉快，处在人人自危的人际关系中。那么一般普通知识分子，他们在政治思想运动中，特别在反右派斗争或以后，精神状态处在极度紧张中，日子过得更不愉快。在运动中，领导要求揭发别人，还要检查自己，运动后，接受下乡劳动锻炼，参加大炼钢铁运动，还参加季节性抢种抢收临时性的义务劳动。就是说，知识分子的一切活动，几乎都是为政治服务，为简单生产服务，根本没有多少时间从事自己专业工作。

削弱团结力量。反右派斗争之前，全国五百多万知识分子是共产党与非劳动人民联盟的一支重要力量，这支力量在共产党领导下，通过思想改造运动，政治觉悟有所提高，爱国热情有所增长，表示愿在共产党领导下为建设社会主义祖国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为此，

¹ 季羨林《牛棚杂记》中央党校出版社1998年版，第212页

党制定了鼓励知识分子献身国家建设的一系列方针、政策，比如号召知识分子“向科学进军”、“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和“相互监督、长期共存”等等，这些政策都是调动一切可调动的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力量的措施，起到了积极作用。当知识分子正在接受并在行动中实行这些政策的时候，忽然，在1957年6月发动了反右派斗争，反右派斗争以后，对右派分子（包括内控右派）从原来的领导与被领导、团结与被团结、改造与被改造逐步变为现在的监管、改造；从原来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逐步变为“一花独放、一家独鸣”；原来的“长期共存、互相监督”逐步名存实亡，最后，右派分子成为被专政的对象。大大削弱了可以团结的力量。

几十万右派分子被从严处理后，政治地位、工作岗位、工资待遇、生活水平、人际关系都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受处分前后，右派分子参加所在单位的各种半劳动和劳动，处分标准下达后，三、四、五、六类右派分子，大多数留在单位干些次要工作和劳动，一、二类右派分子除年老体弱者例外，大多数被发配到东北、西北等边远地区去劳教或劳改，这种劳教劳改是无期的。有的单位把右派分子送到劳改农场同劳改犯人一起劳动。留在机关、企业、学校的右派分子，除了充当反面教员外，还参加次要工作和临时突击性的劳动任务。右派分子原来正式工作被剥夺，大小权力被收回了，剩下的就是劳动和半劳动。对右派头目和大右派分子撤职、免职，收回了开国时期给他们的一点权力，逐步形成一党执政的局面。右派头目受处分后，还保留了选举权，民主党派中的知名右派分子还参加政协组织的学习，政治学习，就是接受改造，改造到重新接受共产党的领导，接受毛泽东提出的各种方针、政策。在基层和在劳动改造中的普通右派分子也参加学习，其内容，是正视自己所犯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行（许多右派分子不承认自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而且长时间认识不上去），如有不服，组织“左”派们进行帮助，这种帮助实为老调重弹的批判。其他会议或学习，布告上标明，右派分子不得参加，像这种布告，真正刺痛了一些右派分子（原来是老党员、团员、老积极分子）的心灵。右派分子除了劳动和这种学习之外，其它时间，规定闭门思过，写检查、写认罪书，由主管右派分子的单位和机构实行监督检查，这是右派分子受处分的初期情况。

右派分子被改造1-2年，1959年，中央制定右派分子摘帽政策。由于右派分子表现不同，开始分化，每年按百分之十比例的摘帽，就是说百分之九十的右派分子摘不了帽子。当时规定的摘帽标准，

最根本的一条是否拥护大跃进、人民公社和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简称“三面红旗”，这条既抽象又灵活的“三面红旗”标准，给掌握右派分子命运的部门和监管者以最大权力，在摘帽问题上，取决于主管部门和监督者的政策水平和素质的高低。1959年9月开始摘帽，预计每年按10%比例，到1969年，右派分子摘帽工作可告一段落。可实际情况，摘帽工作中断，直到1979年才全部摘完，其中主要原因是“左”的东西干扰，使正常的右派分子摘帽工作拖延了十年。右派分子一批一批摘帽后，回到人民内部，政治地位、经济状况同以前一样没有实质性的变化，“左”派和受“左”的思想影响的“群众”，一样轻视“摘帽右派”，甚至还监督他们的行动。所以，“摘帽右派”这个群体的积极性在当时是不可能发挥出来。比如，有的右派分子在业余时间写的论文，翻译的译著，出版部门就不让发表，还出现奇怪现象。笔者合作在1957年译出《托兰德的唯物主义》一文，发表在《哲学译丛》1956年第一期上，划为右派分子后，《哲学研究》编辑部搜集译文集出版时，将笔者名字勾掉¹一句话，剥夺了或否定了右派们的搞科研、翻译和创作的权利。右派们是如此状况，知识分子中的“中间派”，也不敢轻举妄动，谨小慎微。同样也不敢去搞科研、创作。毛泽东所倡导的“双百”方针并没有贯彻下去，只有某些“左”派们发表大批判文章，形成一家独鸣、独放的现象。

1958年，毛泽东把右派分子上升到同地、富、反、坏并列，成为“五类分子”，在党报上出现“五类分子”的称呼时，右派分子的处境同地、富、反、坏一样，是阶级敌人，成为被专政的对象。众所周知，民主党派中右派头目，被撤职后，保留政协委员，像章伯钧，还可以参加政协举办的学习，民主党派、工商联中原来参加政府任职的人，划为右派分子的大多数人被撤职，再也没有资格参政、议政、执政了，即使有极个别右派头目还留在政府里，这是毛泽东的策略，1959年8月，他说：“至于罗隆基、龙云他们现在还有官做，那些人实际上是反革命，所以摆他们的位子，无非是以示宽大。因为有30多万右派，我们摆他们几个，那些右派说，唉，我

¹ 哲学研究所编：《论16世纪末——18世纪初西欧哲学》三联书店1961年版，第255-273页

们朝中还有人啊！这有利于改造这些右派。”¹还有由于毛泽东不划为右派分子的个别民主人士，在大鸣大放时，由民主党派中的共产党员出面，暗中做工作保护下来的民主人士，他们在政府里再也不敢发表什么意见。即使民主党派中的左派，中间派，看到充当反面教员的权利派分子，看到还在政府里充当摆设的个别右派头目，他们在各自的党派里，由统战部、政协组织学习，讨论如何过好社会主义这一关，如何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如何改造自己的非无产阶级思想，主要改造反动的封建思想、资产阶级腐朽思想，如何避免走章伯钧、罗隆基等右派头目的下场。从此，民主党派中的左派、中间派学着夹着尾巴做人。反右以后，“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为短期共存、单方面监督所代替，实际上这个方针名存实亡，最后形成共产党单独执政的局面。

1955年，毛泽东说过：“无产阶级、共产党也要搞阶级独裁。如果搞个人独裁，那就不好。”²反右派斗争后，撤销民主党派中的被打成右派分子在政府中的职务，收回了民主党派的领导权力，这是从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参政、议政的政府，走向共产党单独执政的局面。随着反右派斗争的胜利，毛泽东搞个人独裁，清除党外的异己。从社会主义三大改造结束，他就开始骄傲自满。反右派斗争，听不进党内外人士的建议和意见，一意孤行。1958年，他不听取党内正确意见，发动大跃进，拔白旗。1959年，开庐山会议，因彭德怀给毛泽东提出批评性的意见，接着毛泽东突然发起反击——批判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的反右倾机会主义的运动。李锐（庐山会议的参加者、记录者）说，“庐山会议的形式，说到底，就是对毛泽东批评不得。”³从1956年到1959年，毛泽东已经违背了1955年说的“搞个人独裁，那就不好”的正确思想，从此以后为“个人独裁”敞开大门，通行无阻，最终酿成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场浩劫运动，这是“搞个人独裁”必然的结果。

同时，毛泽东在历次政治思想运动中非常注意培养、提拔和利用“新生力量”、左派人士和惟毛泽东是从的人，让他们在阶级斗争的大风大浪受到锻炼。所以，在历次运动中涌现出大批真假左派

¹ 转引李锐《毛泽东秘书手记：庐山会议实录》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96页

²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10页

³ 李锐《毛泽东秘书手记：庐山会议实录》第329页

分子、大大小小的“理论批判家”、政治爆破手和各种各样积极分子。他们秉承领导的旨意，观察领导的脸色，揣摩领导的意图，怀着各种动机和目的，对被批判者进行批评、批判、批斗、声讨、围攻、围剿、讨伐、最后歼灭，让被批判者永世不得翻身。这些批评者后来的命运如何呢？许多紧跟者成为步步荣升，成为既得利益者，有些跟不上去的就一个一个被抛弃，落得与右派分子同样的下场，甚至更糟。

长期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和党的文艺领导干部的周扬，他在文艺界“真的说一是一，说二是二，多少作家的一生成败都决定在他手里”。他没有首先出来批判电影《武训传》，因而挨过毛主席的骂，所以，在后来批判俞平伯、冯雪峰，批胡适、批胡风 and 反右中，特别积极贯彻毛泽东的旨意，可以说是立了汗马功劳。然而，毛泽东并不因为周扬过去有功，网开一面，在文化大革命中，还是挨批判，而且被抓起来。在1978年拨乱反正才恢复自由。晚年，“他竟对自己生平所作所为作了痛心的忏悔。”¹最后获得人们的谅解。后来称为“周扬现象”。

毛泽东如何把《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作者誉为新生力量的，据韦君宜说：“我只觉得李、蓝两位真是运气好。他们二位只是把这人人都能看到、人人都写得出的问题写了一下。”俞平伯的著作“并非在解放后向共产党大张旗鼓地挑战，何必那样对待人家？他两位年轻，不考虑这些因素，写篇文章一碰，一下子就出了名。真碰巧，运气好！”²这两位新生力量，写了不少批判地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文章，以后，一个荣升，官至艺术研究院副院长，至今无忏悔之意；一位在1957年被打成右派分子，成为二等公民，改正后，从事文艺创作。

党的一大代表、毛泽东的挚友、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李达，对毛泽东在意识形态领域内发动的批判运动，积极写文章著书，深层次、高水平地批判被批判的对象，影响很大，意义深远。可是在文化大革命中，这位解说毛泽东“实践论”、“矛盾论”的权威专家和批判右派分子的理论权威，被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罗织罪名揪出来，准备批斗时，请示毛泽东，毛泽东说：在小范围里批判。造反派、红卫兵得到圣旨，对李达进行批斗，来回几次批斗，李达被折磨死

¹ 参见韦君宜《思痛录》第184、188页

² 韦君宜《思痛录》第26页

了。直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上半期，才得到完全平反。

左派民主人士、明史专家吴晗，早在1949年1月，就曾寄信给毛主席要求入党。毛主席答复他说，同意他的要求，但实现时机尚值得研究。后来他又几次提出要求。到1957年3月，中央正式批准吴晗入党，但做为秘密党员不公开。¹这位反右派斗争的“英雄”，为毛泽东打击“章罗同盟”立了汗马功劳的斗士，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无产阶级司令部首批揪出进行批斗，毛泽东并不觉得吴晗因为反右派斗争“有功”而出面保护他。吴晗经过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领导集团的精心安排，通过多次批斗，他觉得冤枉，为毛泽东竭尽全力，忠心耿耿贡献自己的一切，还是得不到谅解，最后悲惨地死去。直到拨乱反正后才恢复名誉。这是毛泽东对知识分子召之即来，挥之即去的策略的体现。这是中国老一代知识分子的悲哀。

再如：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术秘书兼任哲学研究所学术秘书的吴传启，时任哲学研究所整风领导小组成员，是党内一名“左”派知识分子，反右期间，在张镛的领导、主持下，吴传启、姜丕之等领导小组成员参与下，为哲学研究所超额完成10%的抓右派分子任务而立下了“不朽功勋”，他们也得到升迁。吴传启还积极写文章批判右派分子。据吴传启在1999年10月对笔者说，对当时所里划的右派分子表示赞成，只有划龚献文时，提出一点看法，说龚在反右期间，没有公开发表和私下散播什么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此人只有一般历史问题，平时散漫，不修边幅，为了达到所里下达《哲学研究》编辑部5%的抓右派分子任务，龚献文还是当上了右派分子。因此，吴传启说，“当时我也提心吊胆，朝不保夕，害怕有时也说错话，被别人揭发，就可能当上右派分子，真是人人自危。”反右以后，他与林聿时、关锋一起，以撒仁兴的笔名在《哲学研究》发表大块批判文章。就是像吴传启这个机灵的人，“左”派知识分子，反右派运动中积极参与者，到文化大革命期间虽紧跟无产阶级司令部，还是被无产阶级司令部送进了秦城监狱，一去就蹲了十三年大牢，出狱时已有60岁，办完退休。这位“左”派知识分子被利用尽了，送入监狱，落得可悲的下场，2000年已去世。

哲学研究所还有几名反右派的积极分子、打手，在反右派期间，他们在哲学研究所整风小组领导下，积极批斗右派、整人，无限上

¹ 张友渔《回忆与吴晗共事的一段往事》，参见《党史研究》1980年第4期第62页

纲上线，并置被批斗的人于死地，结果把梁存秀这位北大研究生、贺麟先生的得意门生、年轻共产党员打成右派分子；把王维诚先生的夫人温联璧这个普通资料员打成右派分子；把北大本科毕业生杨子彬打成右派分子。这些积极分子和打手为什么如此呢？他们都有不纯的动机和目的。外哲史某某出身资产阶级家庭，以“左”的面孔出现，反右特别积极，从中捞到稻草，步步荣升，以后官至副部级；中哲史某某地主家庭出身，带着原始负罪感为共产党工作，认为抓右派给他带来了赎罪的机会，所以他拚命要整、要抓右派，反右结束后，这位“左”得出奇的人调出北京，回东北吉林某高校任教员，晚年评为教授；陈某某出身国民党高级职员（自报）家庭，其妻被打成右派分子，这位原是统战工作出身的党员科级干部，瞄准当时的政治气候，以唯我独“左”，唯我独“革”的面目出现，对研究组内两名被批斗的人揪着不放，罗织罪名加在被整的人头上，最后这两位被整的人打成右派分子。后来，陈某某由科研组调至图书资料室当负责人，所里 11 名右派分子受处分后都去资料室工作和劳动，这一来，他成为监管右派的头头，动辄训人、贬人、挖苦人，在业务上是个外行，偏偏充当内行，闹出不少笑话。不久，右派分子分别送去劳教、下乡劳动改造。这位反右、管右积极分子、假左派也去乡下进行劳动锻炼，回京不久，调出哲学研究所，回中共中央统战部工作。总之，这几名反右“积极分子”、打手，因反右“有功”，他们都成为既得利益（升官）的体现者。

综合以上政治思想批判运动造就出来的真假左派知识分子、大大小小的“理论批判家”、“新生力量代表”、“政治爆破手”、各种“积极分子”和打手，他们都是毛泽东的“左”倾政策忠实执行者、实践者，他们也怀着各种不同的动机和目的去完成任务。如果毛泽东的方针政策正确，他们如实执行、贯彻，就能促进社会发展和进步，反之，就会阻碍社会发展和进步。实践证明，毛泽东的反右派斗争的指导思想和政策都是错误的，其后果是极其严重的，当然毛泽东要负主要责任，但是，积极贯彻执行、甚至在执行过程中夹杂某些个人不良动机的人，难道就不感到没有一点责任吗？难道就真的那样心安理得吗？如果还有一点起码的良心的话，会感到内心不安、甚至忏悔的，周扬晚年作了痛心疾首的忏悔。可是，包括毛泽东在内，绝大多数执行者并没有意识到反右派斗争是错误的，后果如此严重，以为还是为社会主义革命做出贡献，当然，反右派斗争中，并不排除确实有真正的革命者，那是少得可怜呢。总之，

从毛泽东提出的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实践，用它是束缚生产力，还是解放、发展生产力的著名原理来衡量。不难看出，毛泽东在意识形态领域中发动一系列运动，在运动中被整的对象几乎都是知识分子，他们都是各条战线上的精神财富、物质财富的创造者，是精神产品、科技产品以及教育产品的承担者，他们是先进的精神生产力、科技生产力、教育生产力的重要力量。但在反右派斗争中，抓了50多万右派分子，其中许多人是精英，对他们进行严厉的处分，扼杀了他们的积极性，这势必影响其他知识分子发挥积极性。同时，对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中的右派分子进行无情打击和歼灭，也势必影响其他民主人士参政、议政的积极性，削弱可团结的力量和非劳动人民的联盟。还有，在农村批判富裕中农，打击他们的劳动致富的积极性，也影响了中农、下中农以及部分贫农劳动致富的积极性，削弱阻碍农村生产力的发展。归根到底，毛泽东发挥上层建筑中的执政党的作用，制定实行的方针、政策，束缚、阻碍和扼杀生产力，恶化了人际关系，削弱了可团结的力量，阻碍了全社会的进步。这就是上层建筑过分发挥反作用的不良后果。

二、党的优良作风开始下滑

在长期革命过程中，党已形成优良作风传统，这些作风主要是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以及批评与自我批评等。自从新中国成立后，党内进行几次小整风，1956年，毛泽东提出准备明年整风，一整主观主义，二整宗派主义，三整官僚主义。到了1957年，党中央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于5月1日发出指示，“在全国重新进行一次普遍的、深入的反官僚主义、反宗派主义、反主观主义的整风运动”。¹整风开始后，毛泽东看到《解放日报》报道整风情况写下批语：“不整风党就毁了”。可见，对整风很重视。在反右期间的7月，毛泽东提出整风、反右要达到的政治目标。他说：“我们的目标，是想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以利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²整风、反右结束后，用薄一波的评述说：“这个‘目标’不仅没有能够实现，反而变得更糟了。”³

¹ 《人民日报》1957年5月1日

²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56-457页

³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第622-623页

主观主义作风重新泛滥。主观主义现象是个老问题，历次整风都是被批评对象。它的含义用毛泽东的话说，就是“不从客观实际出发，不从现在可能性出发，而是从主观愿望出发。”¹这是57年整风后给主观主义的界定。反主观主义要达到的目的，就是要做到一切从客观实际出发，实事求是，主观符合客观，就是说一定要做到实事求是。可是，自整风、反右后，这个实事求是作风受到不同程度的动摇和损害（也许是不自觉、还没有意识到）。如对春季鸣放形式缺乏实事求是的估计。在鸣放初期，毛泽东等动员高层民主人士和知识分子鸣放，而且是千方百计，动用各种手段，希望他们鸣放。待他们放出统治者认为是一些过激、过头的言论，统治者便主观错误地估计形势。据薄一波回忆说：“毛主席和我们都把右派的进攻看成是‘整个春季，中国天空上突然黑云乱翻’、‘黑云压城城欲摧’、‘惊涛骇浪’、‘十级台风’等等。”正是出于对春季鸣放形式缺乏实事求是的分析，作出了“这样夸大的估计，于是就决定发动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性阶级斗争，进行反击。”²而客观情况并不是那样，如时任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的李维汉说：“当时的客观形势不必要发动一场全国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在一定范围内对右派的进攻进行批判反击，完全可以制止事态的蔓延发展。”³毛泽东对当时的客观形势作出了过分夸大的估计，从而作出反击右派斗争的决定，这既违背了实事求是的作风，同时也削弱破坏了民主集中制的原则。

对划右派、定右派的数字带有主观随意性。像划右派、定右派是一个非常严肃的、关系到一个人的政治前途和命运的重大问题，可是，毛泽东等掌握人的政治生命的各级领导负责人，甚至支部书记、党小组长和某个党员，都可主观随意性决定某个人的政治命运。薄一波说：“对右派分子数字的估计，在很大程度上带有主观随意性，并不是建立在严肃的事实基础上的。”请看具体数字，6月29日，毛泽东估计需要在各种范围内点名批判的右派，“北京大约400人，全国大约4000人。仅仅过10天，即7月10日，新的估计又翻了一番。到9月八届三中全会时，全国已划右派达62000多人，据会上的透‘底’估计，全国大约有右派分子15万人。而到整个运

¹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97页

²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第619页

³ 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下，第843页

动结束，全国共划右派分子 55 万多人，比八届三中全会的透‘底’估计还多 40 万人。这说明，我们对右派的情况，并没有一个确实可靠的估计，而基本上是跟着群众运动走，整出多少算多少。”“这种明显的主观随意现象普遍发生”，“所划的 55 万人中，除极少数是真右派外，绝大多数或者说 99% 都是错划的。”¹可见，划右派，定右派的主观随意性严重到惊人的程度。

掌握划右派标准也有主观随意性，薄一波说：“如把说了几句错话，属于认识上的问题，说成是反党反社会主义；把几个人在一起的自由议论，说成是反党集团；把对某个或某些领导人的正常批评，说成是向党进攻；把向党交心，检查自己的错误思想，说成是恶毒攻击，思想反动；把在理论问题研究中的不同见解，说成是反对马列主义的。”²这五种情况中只要有人犯了其中的一种，那就有被划右派分子的危险。

右派摘帽的主观随意性。中央文件规定，划右派、定右派按 5% 的比例下达，1959 年中央规定右派摘帽按 10% 比例下达。这种机械硬性规定的比例，中央和各级领导都没有认真执行，抓右派，划右派的百分比，大大超过 5%，五百万知识分子就有 55 万多人被打成右派分子，高达 10% 的比例。摘帽工作按照规定比例进行五年之后，文革中终止摘帽工作，还有二十多万右派分子拖延到 1978 年才全部摘帽，他们因主观主义多戴了十多年的右派帽子。这些没有摘帽的右派，比摘帽右派遭罪更多，处境更加恶劣，他们一直在从事各种形式的劳动改造，直到摘帽为止。

右派甄别的主观主义作风。对右派分子加以甄别的问题，党内的分歧很大，1962 年 7 月，统战部几次向中央提出对右派分子进行甄别。“当国家机关党委确定以冯雪峰等人为右派甄别试点对象，进行甄别试点工作时，毛主席 9 月 29 日在反映这一情况的中央宣传《宣教动态》增刊第 63 期上作了如下严厉的批示：‘刘、周、邓三同志阅。请邓查一下此事是谁布置的，是组织部、中直党委，还是国家机关党委自己？此事出在中央机关内部，右派分子本人不要求甄别，而上级硬要试点，以便取得经验，加以推广。事件出在六七月。其性质可谓猖狂之至。阅后付还。查后告我’。这样，对右派

¹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和事件的回顾》下卷，第 618-619 页

²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和事件的回顾》下卷，第 621 页

分子的甄别工作就不可能进行下去了。”¹毛泽东一个批示，右派甄别就停止，直到1978年，使这一起大冤案延长了16年以后才得以改正。由此看出，主观主义作风已发展到何等的地步。以权代法、以言定罪，民主集中制遭到破坏，甚至到了不要民主，只要集中，认识到这些，此后发生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的大灾难就不难理解了。

官僚主义作风有增无减。官僚主义现象是长期存在的问题，反过多次，仍然存在。毛泽东在1956年波匈事件后批评过官僚主义现象，说：“有些人如果活得不耐烦了，搞官僚主义，见了群众一句好话也没有，就是骂人，群众有问题不去解决，那就一定要被打倒。现在这个危险是存在的。”接着说：“我们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长官僚主义作风，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谁犯了官僚主义，不去解决群众的问题，骂群众，压群众，总是不改，群众就有理由把他革掉。我说革掉很好，应当革掉。”所以又提出：“大民主也可以用来对付官僚主义者。”²为防止官僚主义者、官僚主义现象继续滋长，毛泽东才提出整顿三风，官僚主义作风是其中之一：

“官僚主义就包括许多东西：不接触干部和群众，不下去了解情况，不与群众同甘共苦，还有贪污、浪费，等等。”³这表明毛泽东是非常重视反对官僚主义这个问题的。经过整风、反右之后，整顿官僚主义作风究竟取得多大成效呢？

鸣放初期，官僚主义者，官僚主义现象确实受冲击、鞭挞，出现了大量的揭发官僚主义现象的意见，毛泽东很重视群众的批评意见，并批示，“不整风党就毁了”。指示中央和各级党委，对党政所犯错误缺点的批评，对于党和政府改正错误，提高威信极为有益。可是，反右派开始之后，那些鸣放初期向党的领导和干部提过意见和批评的人，大都被打成右派分子。中国科学哲学研究所党员梁存秀向副所长、整风领导小组组长张镛和办公室主任周宜明的官僚主义作风提出意见，为什么从沈阳调他爱人到北京，一拖再拖，长期不解决夫妻分居问题，梁很气愤，说了一句要宰了周宜明的气话。梁后来被打成右派分子（当然还有其他原因，这是重要的一条）。当时哲学社会科学部秘书、哲学所学术秘书、所整风领导小组成员吴传启在1999年10月与笔者谈起笔者的右派问题，说：“领导小组

¹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第1008页

²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24、326页

³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27页

没有讨论，是谁定的不清楚，梁存秀的右派问题，领导小组讨论过。”吴还说，“哲学所被打成的右派都是‘阳谋’的产物，我这个领导小组成员也是提心吊胆，不知什么时候右派帽子戴在自己头上。”可见，当时大多数知识分子差不多都处在人人自危的状态。

搞形式主义。反右派斗争后，哲学研究所在整改阶段，领导小组发动全所人员向领导提意见，号召每人写出十张大字报，图书资料室的负责人自言自语，写了九张大字报，还差一张，怎么也想不出写什么好，绞尽脑汁，还是写了《加强领导》为题的最后一张大字报。当时，笔者在图书资料室接受监督劳动，心想，这不是在搞形式主义嘛，形式主义是官僚主义的一种表现。

外行领导内行的措施。哲学研究所为了加强图书资料室的党的领导，领导小组从研究人员中抽调党员陈××负责图书资料室工作，陈从中共中央统战部调到哲学研究所历史唯物主义研究组从事科研工作，研究职称未定，是17级以上的党员干部，但不懂图书馆学业务，在毛泽东主张的外行能够领导内行的方针下，陈出任图书资料室负责人。原来负责人是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毕业，她主持筹备哲学所图书资料室其成绩有目共睹的，自从陈××任负责人之后，积极贯彻“厚今薄古”的方针，结果使图书资料室的工作受到很大损失。

欺上瞒下的作风。自1958年12月后，老百姓喊吃不饱，哲学所下放干部也吃不饱。有人却向领导说能吃饱。充当歌德派，会说假话。这种说假话的风气，害人也害己。一害别人，其原因在于当时只能说社会主义优点，不能说社会主义缺点，否则那是对社会主义的态度问题，是立场问题，轻则挨批，重则不给摘帽，甚至以言定罪。

整风、反右后，上述大大小小、上上下下的官僚主义的作风，包括外行能够领导内行，好摆门面、搞形式主义、好说空话、假话，欺上瞒下等等，比整风以前都有上升、发展，而且还有扩大之势，不仅是个作风问题，已经走向以言代法，以言定罪，个人专断、独裁的地步。随着时间推移，官僚主义更加严重。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官僚主义现象是我们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广泛存在的一个大问题。它的主要表现和危害是：高高在上、滥用权力，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好摆门面，好说空话，思想僵化，墨守陈规，机构臃肿，人浮于事，办事拖拉，不讲效率，不负责任，不守信用，公文旅行，互相推诿，以至官气十足，动辄训人，打击报复，压制民主，欺上

瞒下，专横跋扈，徇私行贿，贪赃枉法，等等……都已达到令人无法容忍的地步。”¹这是邓小平对整风反右和文革后的官僚主义现象的总结。也为以后克服纠正官僚主义现象指明方向。

宗派主义变本加厉。党内的宗派主义早已严重存在，毛泽东看到了这方面的情况，提出要整掉宗派主义作风。鸣放开始群众对宗派主义作风提了不少意见，而且还相当尖锐、刺耳。后来《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主编胡绳承认：“党内有一部分人存在着反人民的思想作风，所谓人民民主，所谓群众路线，所谓和群众打成一片，所谓关心群众疾苦，对于这些人说来只是空话。党员不尊重党外人士，高人一等，盛气凌人，虽非全部，但甚普遍。”²这里指的党的作风，其中也包括宗派主义作风。宗派主义的主要表现在于党与非党的关系，党与民主党派关系，党与知识分子的关系，具体说来主要是党员不尊重党外人士，高人一等，盛气凌人，搞特权，还表现在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用人方面，等等。毛泽东希望通过整风，“将这种错误方向，必须完全扳过来，而且越快越好。”³然而不但没有完全扳过来，相反走向变本加厉的地步。

党与非党本来存在“墙”和“沟”，党外人士、专家有职无权等现象。整改后，特别反右后，哲学研究所在反右派斗争中，除批斗11名右派分子外，还批判了老党员王慎失等六人，在反右派斗争时刻挨批的，不是扣上思想严重右倾的帽子，就是与右派分子有关系或划不清界线，从批判中寻找右派，这六位挨批的人，有的被取消预备党员的资格，有的后来调出北京，大部分下乡去劳动锻炼。这些挨批的人，本来没有什么错误，与党的关系很好，但受批判后，无形与党产生距离，扩大了党与他们之间的“墙”和“沟”。

关于有职无权的问题，鸣放初期，提出意见很多，有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的单位，几乎都存在此问题。反右派斗争之后，一些高级民主人士在政府、高校和科研单位任职，因有的人被划为右派，干脆撤销他们的有职无权的职务，收回给他们的权力，比如毛泽东说，“章伯钧的部长怎么样呀？部长恐怕当不成啦。右派当部长人民恐怕不赞成吧！”⁴就这一句话，章伯钧的部长当不成了。这不是

¹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27页

² 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70年》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356页

³ 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70年》第356页

⁴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92页

以权代法吗？毛泽东批评罗隆基时说：“罗隆基不是讲过吗，无产阶级小知识分子就领导不了他这个小资产阶级的大知识分子……我看，不仅仅是无产阶级的小知识分子，就是大字不认得几个的工人、农民，也比他罗隆基高明得多。”¹罗隆基挨了这样挖苦的批评，又是“章罗联盟”的头目，章伯钧当不成部长，罗隆基也不能当部长。通过反右，就顺理成章地剥夺了他的部长职务。毛泽东批评章乃器时说：“右派中间那些不愿意变的，大概章乃器算一个。你要他变成无产阶级知识分子，他就不干，他说他早已变好了，是‘红色资产阶级’……我们说，你还不行，你章乃器是白色资产阶级。”²毛泽东认为章乃器是白色资产阶级，又不愿意接受改造，还影响别人不接受改造，这样的人不用当部长。

毛泽东说：“有一些著名的右派，原来是人民代表，现在怎么办？恐怕难安排了。比如丁玲，就不能当人民代表。”³丁玲的人民代表本来就是形式主义选举出来的，撤销她的人民代表的资格，只需毛泽东一句话就行了，不需要人民代表大会来决定，这不是以权代法吗？毛泽东又说：“有些人，一点职务不安排，一点工作不给做，恐怕也不好。比如钱伟长，恐怕教授还可以当，副校长就当不成了。”⁴钱伟长是搞自然科学的，对巩固政权有用，还算照顾，不让他掌权，还让他当教授，这是大开恩。毛泽东说：“还有一些人，教授恐怕暂时也不能当，学生不听。”⁵这些是社会科学方面的教授，他们都去做些次要工作或从事体力上的劳动，充当反面教员。

建国初期分配给民主党派的职权，实际上有职无权，通过反右，连职带无权通通收回。当然政府中还有几位民主人士担任部长，只不过是个摆设，重大事情由党员副部长或党组书记定夺。后来政府中几乎是清一色共产党人，实际上，宗派主义进一步深化，非党人士再也不说，保持沉默。

综上所述，毛泽东提出纠正、克服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三大坏作风，通过整改收效甚微；提出要达到的“目标”也没能实现，“反而变得更糟了”。坏的作风渗透到政治领域，侵蚀到

¹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84页

²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89页

³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92-493页

⁴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92-493页

⁵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93页

某些领导人、党的组织和某些党员中，出现了少数人的个人专断、独裁，破坏民主集中制现象，以至出现极个别人以权代法、以言定罪等破坏法制现象。“变得更糟了”的表现，出现强调集中、强调纪律、强调统一意志的多了，强调民主、强调自由的少了；感到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人少了，感到人人自危、夹着尾巴做人的人多了，这是整风、反右带来的消极后果。以为打垮右派后，“整风就可以顺利进行了。”¹但事实上，群众不敢说话了，整风草率收场。党内存在的严重问题和缺点被冲淡了，被掩盖了，那些挨过批评的党的领导，反转过来说对批评者进行打击报复。此后很少有人敢于向党组织提意见了。有话不敢说，要说就说假话，好听的话，这样成为一种风气。这就严重地破坏了党的实事求是的党风，人们接受了挨整的教训，没挨整的人看到那些挨整的人的下场，共产党的威信逐步降低了。农村进行大辩论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也没有带来生产效率的提高。更深层和更严重的表现还是理论认识上的失误，这种失误影响深入而持久。

三、理论上形成的失误

整风、反右过程中和之后，右派们受到种种伤害，党的优良作风受到程度不同的损害，领导人的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的作风更加主观片面化、官僚化和宗派化。党在反右派过程中动用了国家机器中的专政工具，以绝对优势，粉碎了右派的“猖狂进攻”，取得了反右派斗争的“胜利”。在此实践基础上，重新审查并修改了八大以来的正确路线、方针和政策，从而形成了一系列错误理论。

从批教条主义转变到批修正主义。社会主义时期，毛泽东界定教条主义、修正主义，他说，“用形而上学的观点来看待马克思主义，把它看成僵死的东西，这就是教条主义。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这就是修正主义。”²照这样的定义考察毛泽东从批教条主义到批修正主义的演变过程，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即整风反右为标志，先批教条主义为重要任务，后批修正主义为重要任务，而且长期当作重要任务。

1956年4月5日，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讨论，由人民日报编辑部写成的《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在肯

¹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39页

²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17—418页

定斯大林的功劳的同时，批评斯大林的教条主义：“有一些天真烂漫的想法，仿佛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是不会再有矛盾存在了。否认矛盾存在，就是否认辩证法。各个社会的矛盾性质不同，解决矛盾的方式不同，但是社会的发展总是在不断的矛盾中进行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也是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进行着的。”文中批评用教条主义的方法对待斯大林，“有些人用教条主义的方法看待斯大林的著作。”“千篇一律地加以应用，这样就不可避免地要犯错误。”¹在这里，文章既批评了斯大林的教条主义，又批评了有些人运用斯大林著作中的教条主义。

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一文中指出：“最近苏联方向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过去我们就是鉴于他们的经验教训，少走了一些弯路，现在当然更要引以为戒。”毛泽东说，“党内一些人有一个时期搞过教条主义，那时我们批评了这个东西。但是现在也还是有。学术界也好，经济界也好，都还有教条主义。”²这里指出了在现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教条主义仍然存在。

1956年8月30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大预备会议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指出：“这次大会应当……把主观主义、宗派主义这两个东西切实反一下”，“现在，我们反对的是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主观主义。”“主观主义就是不从客观现实出发，不从现实可能性出发，而是从主观愿望出发，”“根据我们过去的经验，批评那些不符合实际的观点，批评这个主观主义，打击这个主观主义。”³这里提出要打击主观主义。不到两个月，11月15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提出，“我们准备在明年开展整风运动。整顿三风，一整主观主义，二整宗派主义，三整官僚主义”。⁴上述援引两段话表明，毛泽东准备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批评、打击主观主义。众所周知，主观主义有两种表现形式。教条主义是其中之一，其主要特征是惟书、惟上，从书本的定义、公式出发，理论脱离实际，

¹ 《人民日报》1956年4月5日

²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67、286页

³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96—297页

⁴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27页

对具体情况不作具体分析，到处生搬硬套。教条主义的思想根源在于割裂理论与实际具体历史的统一，割裂矛盾的普遍性和矛盾的特殊性的统一。

毛泽东注意批评教条主义的时候也没有放过批判修正主义。1956年12月29日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讨论，由人民日报编辑部写成的《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中提出：“斯大林的错误的一个严重后果是教条主义。我们在坚决反对教条主义的时候，必须同时坚决反对修正主义。”又说“在目前的反对教条主义的潮流中间，在我们国内和国外，都有人借口反对照抄苏联经验，而否认苏联的基本经验的国际意义，借口创造性发展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而否认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的意义。”¹这是指匈牙利事件后，毛泽东认为国内外都出现了修正主义思想。

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中批评了教条主义说：“教条主义并不是马克思主义，教条主义也是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的东西。教条主义它的方法是形而上学的方法。”²批评许多教条主义表现，具体例子不必重复了。这是很好的现象。3月10日，毛泽东《和新闻出版界代表的谈话》中指出：“目前思想偏向有两种，一种是教条主义，一种是右倾机会主义，他说，教条主义的文章”“看不下去，简直强迫受刑。”右倾机会主义的文章“倒能看下去。”“教条主义和右倾机会主义都是片面性，都是用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去片面、孤立地观察问题和了解问题。”³1957年3月11日，毛泽东《在天津市演员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现在还有修正主义——南斯拉夫，我们国家有没有呢？我们国家也有‘这样的人’，这种人可以叫做右倾机会主义。”毛泽东又说：“教条主义的来源就来自斯大林。”⁴3月12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的记录稿，说到第八个问题说：“希望各省市也开这样的会，把思想问题都抓起来，现在没抓，不是忙的问题，是面对500万知识分子，他们是人民的教员，我们和他们的关系，有很多新问题，关系很不正

¹ 《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人民日报1956年12月29日

² 参见《毛泽东思想万岁》1949.10—1957年卷，第158页

³ 参见《毛泽东思想万岁》1949.10—1957年卷，第179页

⁴ 参见《毛泽东思想万岁》1949.10—1957年卷，第189—190页

常。内部矛盾突出，要研究，要把思想问题抓起来，要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地方党委第一书记要出马，我就是第一书记，你就有责任抓陆定一同志把我找了出来，讲了一通。”“做了第一书记，你就有责任抓。希望也召开这样的会议，党内党外的同志都参加，这次没有解决的问题带回去。这样的会议证明有益处。”“希望地方召开这样的会，把思想问题摆在议事日程上来。”¹在这里并没有批修正主义。

1957年5月，整风开始，逐步形成鸣放高潮期间，给党和政府提出了许多意见，其中直接给毛泽东本人提出意见，15日，毛泽东撰写《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当作党内文件发给高级干部，准备下决心批判修正主义。毛泽东指出：“几个月以来，人们都在批判教条主义，却放过了修正主义。”“现在应当开始注意批判修正主义。”毛泽东接着为教条主义辩护：“有一部分人有教条主义错误思想。这些人大都是忠心耿耿，为党为国的，就是看问题的方法有‘左’的片面性。克服了这种片面性，他们就会大进一步。”而对有修正主义思想的想法就完全不同。“有一部分人有修正主义或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思想。这些人比较危险”，“他们向往资产阶级自由主义”，“他们与社会上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毛泽东为教条主义担担子或开脱说：“有些被攻击的‘教条主义’，实际上是一些工作上的错误。有些被攻击的‘教条主义’，实际上是马克思主义，被一些人误认作为‘教条主义’加以攻击。真正的教条主义分子觉得‘左’比右好是有原因的，因为他们要革命。”“有些错误，是因为执行中央方针而犯的，不应当过多地责备下级。”毛泽东对知识分子新党员、团员中的修正主义思想大加指责，“我党有大批的知识分子新党员（青年团员就更多），其中有一部分确实具有相当严重的修正主义思想。”“他们跟社会上的右翼知识分子互相呼应，联成一起，亲如弟兄。”毛泽东还把批教条主义的人是些什么人指出：“有共产党人——马克思主义者。有括弧里的‘共产党人’，即共产党右派——修正主义者。有社会上的左派、中间派和右派。”²在这里，完全放弃了批教条主义。只要找个突破口，反击右派立即变为行动。

自1957年6月8日公开反击右派不到半个月，6月19日人民

¹ 《毛泽东思想万岁》1949.10—1957年卷，第263页

²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23—424页

日报公开发表毛泽东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该文是作为反击右派的思想理论武器，文中严厉指责和无限拔高修正主义的危险性。毛泽东说：“我们在批判教条主义的时候，必须同时注意对修正主义的批判。修正主义或者右倾机会主义，是一种资产阶级思想，它比教条主义有更大的危险性。修正主义者，右倾机会主义者，口头上也挂着马克思主义，他们也在那时攻击的……正是马克思主义的最根本的东西。他们反对或者歪曲唯物论和辩证法，反对或企图削弱人民民主专政和共产党的领导，反对或企图削弱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取得基本胜利以后，社会上还有一部分人梦想恢复资本主义制度，他们要从各个方面向工人阶级进行斗争，包括思想方面的斗争。而在这个斗争中，修正主义者就是他们最好的助手。”¹这段话是后来公开发表时增加的，原来的《讲话》没有批修正主义的问题，增加进去是为了反右派斗争的需要，把右派看成是梦想恢复资本主义制度的人，其严重后果是不言自明了。

1957年7月9日，毛泽东在《打退资产阶级右派的进攻》讲话中，竭力为教条主义辩护，说：“教条主义现在不是个路线问题，因为它没有形成。”“现在的教条主义没有形成制度、政策、纲领。”他拔高右派是个路线问题。“共产党也有个路线问题，对于那些‘起义分子’，共产党、青年团里头的右派，是个路线。”“给右派一点小鞋穿是必要的。”²由此看出，犯教条主义的人照样当官，犯修正主义错误的人要受到处分。反右派将要结束时，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三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右派，形式上还是人民内部矛盾，但实际上是敌人。我们公开宣布，他们是敌人，我们同他们的矛盾是敌我矛盾，因为他们反对社会主义，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反对无产阶级专政。”³在这里，毛泽东掌握了政权，他说什么就是什么，随便无限上纲上线，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从毛泽东在1957年2月27日的《讲话》，其本意是防‘左’，批教条主义，他的重点是防止把人民内部矛盾变为敌我矛盾，可是到5月15日后，毛泽东改变了他的本意，主要批修正主义，抓右派，

¹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92页

²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50—451页

³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78页

修改《正处》，变成反右的武器，《正处》从原来基本正确到修改后违背了原来基本的思想，原来其中错误东西的进一步发展了，还增加补充一些阶级斗争的东西，为阶级斗争扩大化提供理论根据，后来成为“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理论策源地，其后果更加严重，负面影响更加深远。实际上，从批教条主义转变到批修正主义，在实践上做到了中断民主、自由，改革、开放，保护、维护封建专制残余。

修改八大路线。八大政治报告决议明确指出：党领导人民取得了对社会主义三大改造的全面的决定性的胜利。“这就表明，我国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解决，几千年来阶级剥削制度的历史已经基本结束，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建立起来了。”现在，“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的实质，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的情况下，也就是先进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党和全国人民在当前的主要任务，就是集中力量来解决这个矛盾。”¹这个决定基本上是正确的。

八大决议在分析社会的主要矛盾仍有不足之处，似乎社会制度、生产关系可以超越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八大会议后，全党上下有一段时期沉浸在建立起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感之中，以为有社会主义就可以无限地发挥主观能动性，急急忙忙变革生产关系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出现“一大二公”的模式。以为这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表现，实际上，这个社会主义是个早产儿，这个生产关系是人为一手拔高，靠党的意志强迫出来的，是违背了生产关系适合生产力规律。但八大对主要矛盾的提法比毛泽东主张以阶级斗争为主、主张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是主要矛盾提法正确得多。

对于八大关于主要矛盾的提法原来就抱有保留态度的毛泽东，经过反右派斗争的实践，于1957年10月9日，在党的八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三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对八大决议提出修改，他说：“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我国当前社会的主要矛盾。我们现在的任务跟过去不同了。过去主要是无产阶级领导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那个任务已经完结了。那么，现在的主要矛盾是什么呢？现在是社会

¹ 程波《中共八大决策内幕》中国档案出版社1999年版，第261-262页

主义革命，革命的锋芒是对着资产阶级，同时变更小生产制度即实现合作化，主要矛盾就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概括地说，就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矛盾。‘八大’的决议没有提这个问题。‘八大’决议上有那么一段，讲主要矛盾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这种提法是不对的。”¹这是倒退到以阶级斗争为主要矛盾的观点上。在小组讨论中，不少同志对毛的观点表示怀疑，仍然认为党的八大关于主要矛盾的结论是正确的，不能因发生反右派斗争就改变八大的结论。另一些同志认为经济领域中的阶级斗争虽已基本解决，政治和思想领域的阶级斗争仍将长期存在，是社会主要矛盾，毛泽东否定前者，主张后者，党内经过一番辩论，最后还是接受后者这种错误观点。

1958年5月，在党的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刘少奇代表中央作工作报告宣布：“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的经验再次证明，在整个过渡时期，也就是说，在社会主义社会建成以前，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社会主义道路同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始终是我国内部的主要矛盾，这个矛盾，在某些范围内表现为激烈的、你死我活的敌我矛盾”，“但是在我国目前的具体条件下，上述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矛盾在大多数的情况下表现为人民内部的矛盾。”²就这样，刘少奇代表全党接受毛泽东修改八大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正确论断。从此，动摇了八大路线的根基，中断了党的工作重心转移，使我们党和国家长期陷入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迷误中，“这成为后来党在阶级斗争的问题上一次又一次犯扩大化甚至无中生有的错误的理论根源。”³直到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才把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发展经济、发展生产力上来。

八大政治报告指出，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已经在大陆上消失了；封建地主阶级，除个别地区以外，也已经消灭了；富农阶级也正在消灭中；原来剥削农民的地主和富农，正在被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新人；民族资产阶级分子正处在由剥削者变为劳动者的转变过程中；广大的农民和其他个体劳动者，已经变为社会主义的集体劳动者；工人阶级已经成为国家的领导阶级，它的队伍扩大了，它的觉悟程

¹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75页

²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第631页

³ 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第360页

度和文化技术水平大大提高了；知识界已经改变了原来的面貌，组成了一支愿为社会主义服务的队伍；国内各民族已经成为一个团结友好的民族大家庭；以共产党为领导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更加扩大和巩固了。以上是八大对国内阶级状况的正确分析。

到1957年10月13日，毛泽东在党的八届三中全会上的讲话，修改八大对国内阶级状况和他本人对知识分子状况的分析和评估：“社会主义革命……就是无产阶级领导劳动人民同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富农是农村的资产阶级，他们在农村说话没有什么人听。地主的名声更臭。买办资产阶级早就臭了。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农村的上层小资产阶级（富裕中农），城市的上层小资产阶级（一些比较富裕的小业主）和他们的知识分子，这些人就有些影响了。特别是这个知识分子吃得开。那一样都缺不了他。办学校要有大学教授、中小学教员，办报纸要有新闻记者，唱戏要有演员，搞建设要有科学家、工程师、技术人员。现在知识分子有五百万人，资本家有七十万人，加在一起，约计六百万人，五口之家，五六就是三千万人。资产阶级和他们的知识分子是比较最有文化的，最有技术的。右派翘尾巴也在这里。”¹这段总结表明，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看成是最有影响、敢于同无产阶级较量的力量。这已经把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其他知识分子当作异己力量，成为社会主义革命的对象了。知识分子的一切灾难已经开始，还继续下去。

八大的路线是正确的，八大对阶级关系的变化分析尚有不足之处：第一，八大认为，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正在消灭过程中”，但未宣布资产阶级作一个阶级已经完全消灭，这对后来大反资产阶级有一定影响。第二，八大放弃了1956年1月中共中央召开知识分子会议上提出的知识分子大多数“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的论断，这样就势必造成知识分子以后挨整挨批的命运。反右派斗争，知识分子遭到严重打击就是一例。

1958年3月26日，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提出“两个剥削阶级”的新观点，他说：“我们国内存在两个剥削阶级，两个劳动阶级。两个剥削阶级：第一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残余。地、富、反、坏没有改造好的部分，现在要加上右派，它是反社会主义阶层。富农一有剥削，二有选举权，但不受人尊重。右派本来与我们合作，现在他们反社会主义，故看作敌人，国民党所

¹ 《毛泽东选集》第483-484页

做的事，就是右派做的事。帝国主义、台湾蒋介石非常赞成、关心右派分子。第二是民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民主党派的大多数。两个劳动阶级是工人、农民。过去的被剥削者和不剥削人的独立劳动者也可以说是两个劳动阶级。独立劳动者，有一部分有轻微剥削，如富裕中农和城市的上层小资产阶级。”¹

1958年4月6日，毛泽东在汉口会议上的讲话重复两个剥削阶级的论点，他说：“在成都会议上说过的，两个剥削阶级，两个劳动阶级，第一个剥削阶级为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国民党残余，三十万右派也包括进去。第二个剥削阶级，是民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加上一部分上层小资产阶级，大多数是中间分子，他们是剥削者，与前一个剥削阶级不同，又反共又不反共，是个动摇阶级。他们反共，但不坚决，与蒋介石不同，看谁力量大，就跟谁走。这两个剥削阶级，我们的方针也不同。我们是团结后一个剥削阶级，孤立打倒前一个剥削阶级。”毛泽东提出“两个剥削阶级”的新论点，为党的八届四中全会和八大二次会议所接受。刘少奇代表党中央在八大二次会议作工作报告，按照毛泽东的观点，资产阶级右派、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均系剥削阶级。八大二次会议上宣布我国存在两个剥削阶级，其中把已经作为剥削阶级消灭了民族资产阶级，把已经作为工人阶级一部分的绝大多数的知识分子，重新划入了剥削阶级的范畴。1958年11月21日，毛泽东在武昌会议上说，“一种是作为经济剥削的阶级容易消灭，现在我们可以说已经消灭了；另一种是政治思想上的阶级（地主、富农、资产阶级，包括他们的知识分子），不容易消灭，还没有消灭，这是去年整风才发现的。”²反右派斗争刚结束，毛泽东总结出两个剥削阶级的新观点，其实这个新观点是完全错误的。第一个剥削阶级，作为民主革命的对象，即三个敌对阶级，早在民主革命取得胜利后就被消灭了，这三个敌对阶级只剩下些残余分子，不能把他们上升为阶级，如果上升为一个阶级，这既犯了扩大化错误，又在理论上说不通，把三十万右派分子列入第一个剥削阶级更是荒唐的。第一，这三十万右派分子都是国家的公职人员，他们既无生产资料，又无生活资料，是名符其实的无产者，为他们所有的只是一些知识（人文科学、自然科学、工程技术科学），凭这些知识为政府工作，而政府依知识贡献

¹ 《毛泽东思想万岁》1958-1961卷，第45页

² 《毛泽东思想万岁》1958-1961卷，第61、161页

大小多少分给他们工资。这完全是凭脑力劳动获得报酬，根本不存在丝毫剥削收入。所以，右派分子根本不是什么剥削阶级。

为毛泽东这种观点辩护的人说，毛泽东是从思想上、世界观角度说右派分子是剥削阶级的。大家都承认，许多右派分子在旧社会受的是资产阶级教育，无论封建思想，还有资产阶级思想对他们都产生过影响。当时的人们包括像党的领袖、普通党员都受过上述思想的影响，只有程度不同而已。不能说受了资产阶级教育，受了封建思想和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就视为剥削阶级。从思想上、世界观划分阶级是错误的，因为这种划分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从经济范畴划分阶级的原理，把右派分子从思想上、世界观上划为第一个剥削阶级更为荒唐。毛泽东说，右派“反社会主义，故看作敌人，国民党所做的工作，就是右派所做的工作。”这是把右派看作第一个剥削阶级的理由或根据之一。其实绝大部分人也不过停留在思想上，以及在口头上说说，并没有实际行动，绝不能把极个别的思想和口头上说说的人上升为剥削阶级。

毛泽东提出第二个剥削阶级指的是民族资产阶级、民主党派、知识分子，这个新观点也是不能成立的，也是错误的。

第一，民族资产阶级，经过社会主义工商业改造之后，民族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被消灭了，作为分子还存在，还拿“定息”，这是赎买后留下的尾巴，由政府决定终止时间。他们失去生产资料的占有权和支配权，也就失去剥削工人的条件和手段，（中国民族资本家本身参加企业的经营管理，既是脑力劳动者，又是体力劳动者），再把拿“定息”的分子上升为民族资产阶级，当作为第二个剥削阶级是完全错误的。

第二，民主党派。他们是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他们参与制定“共同纲领”的起草工作，一致拥护“共同纲领”，为“共同纲领”而奋斗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宪法诞生，各民主党派应邀参加、制定并举手通过，拥护维护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宪法。事实上，各民主党派是共产党的统战对象，他们的成员都是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团体的工作人员，各民主党派的工作经费都由人民政府拨给，然后以工薪形式付给各个工作人员，就是说，民主党派的成员也是以脑力劳动获取报酬，从政府拨款中分得一份工资，这是他们唯一的经济来源，根本不存在任何剥削。因此，说民主党派大多数是剥削阶级是毫无道理的。

第三，毛泽东认为知识分子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以后还要论及），

更是错误的。新中国成立时，对以前的知识分子采取包下来的政策基本上安置了工作，新中国培养出来的知识分子，都分配相应的工作，就是说，广大知识分子在各行各业都有一份工作。靠知识为人民服务，他们靠付出脑力劳动生活，靠政府发放的工资过日子，广大知识分子除了脑袋壳里装有各种知识外，身无任何东西，竟然把广大知识分子，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也都说成是第二个剥削阶级。这个观点完全违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阶级是一个经济范畴的基本认识，放弃了从经济关系划分阶级的观点，采用从政治思想上来划分阶级。中国知识分子遭受不幸，其理论思想根源就在于此。

八大路线为什么很快改变和没能坚持下去呢？其中有直接和间接两个方面原因：

直接原因：波匈事件的发生，使毛泽东等人吸取波匈事件的教训，错误地认为波匈党的领导人既没有抓好阶级斗争，又没有搞好无产阶级专政。毛泽东等人结合中国实际，力图避免波匈事件，特别是匈牙利事件不要在中国重演。因而提出整风，在整风过程出现反右派斗争，在此过程中犯了阶级斗争扩大化错误。毛泽东等人从国际、国内阶级斗争出发，错误地总结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还是主要矛盾，因而提出了修改八大的正确路线。

间接原因：在思想上理论上对社会主义的理解比较理想化简单化、没有预料到苏联社会主义社会出现斯大林的错误，由于苏共暴露斯大林的错误，冲击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相继发生“东柏林事件”，“波匈事件”，毛泽东认为这些事件的发生是尖锐的阶级斗争的反映，这时候，对原有的观点产生了怀疑。他在1958年3月19日写了说明：“1955年是在生产关系的所有制方面取得基本胜利的一年，在生产关系的其他方面以及上层建筑的某些方面即思想战线方面和政治战线方面，则或者还没有基本胜利，或者还没有完全胜利，还有待于尔后的努力。我们没有预料到1956年国际方面会发生那样大的风浪，也没有预料到1956年国内方面会发生打击群众积极性的‘反冒进’事件。这两件事，都给右派猖狂进攻以相当的影响。”¹这段话说明了毛泽东改变八大路线，主要矛盾的原因。

提出“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口号。“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的社会主义革命”口号最早见于1957年6月19日经过修改后的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

¹《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25—226页

文章中强调阶级斗争是长期的、曲折的、很激烈的：“在我国，虽然社会主义改造，在所有制方面说来，已经基本完成，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但是，被推翻的地主买办阶级的残余还存在着，资产阶级还存在着，小资产阶级刚刚在改造。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在这方面，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我国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谁胜谁负的斗争，还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才能解决。这是因为资产阶级和从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的影响还要长期存在，作为阶级的意识形态，还要在我国长期存在。”¹

这段说明，毛泽东对我国社会阶级状况与八大对阶级状况的科学分析有了重大的改变：只指出两点就说明问题。第一，八大政治报告指出，“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已经在大陆上消灭了；封建主阶级，除个别地区以外，也已经消灭了”。修改为“被推翻的地主买办阶级的残余还存在着。”第二，八大政治报告指出，“民族资产阶级分子正处在由剥削者变为劳动者的转变过程中。”修改为“资产阶级还存在着。”

反右派斗争开始后，经过一段斗争，毛泽东谈到反右派斗争意义时说：“这一次批判资产阶级右派的意义，不要估计小了。这是一个在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单有1956年在经济战线上（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够的，并且是不巩固的。匈牙利事件就是证明。必须还有一个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²在这里，提出政治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口号是错误地、片面地吸取“匈牙利事件”教训的结果。

1957年9月18日，《人民日报》根据毛泽东的观点撰写《这是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社论解释：“所谓政治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并不是说取得了政权。……但是右派分子的进攻证明，无产阶级对于国家政权的领导，就某些方面说来，还不是巩固的。无产阶级对于某些国家机关和某些文教组织还没有

¹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89~390页

²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61页

真正建立起自己的领导……反右派斗争的重大任务之一，就是要在我们国家的一切方面把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巩固地树立起来。”“所谓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就是对中间派说的。”“所谓中间派，就是动摇于左派和右派之间、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革命和反动之间的人们。”“对于中间派，是要使他们在思想上同右派划清界线，克服自己在资本主义立场和社会主义立场中间动摇不定的两面性，需要在思想上进行自我改造，过好社会主义这一关，并且一部分从中间派归入左派。”“为了团结中间派，就要坚决反对右派，并且批评中间派的动摇性。思想革命就是要革掉他们的动摇性，使他们变成真正的社会主义的知识分子、社会主义的工商业工作者和社会主义的农民。”¹

关于政治路线上和思想路线上方面，还没有完全取得胜利，还有阶级斗争，毛泽东于1957年3月12日《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77年出版时经过修改，明确提出：“在我国，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还会长期存在。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建立。我们已经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改造方面，取得了基本胜利，但是在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方面，我们还没有完全取得胜利。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谁胜谁负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又说：“我们国内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疾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但是还有阶级斗争，主要是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阶级斗争，而且还很尖锐。思想问题现在已经成为非常重要的问题。”²

1957年6月8日，毛泽东在《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一文中指出：反右派斗争：“这是一个伟大的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这是一场大战（战场既在党内，又在党外），不打胜这一仗，社会主义是建不成的，并且有出匈牙利事件的某些危险。”³7月9日，毛泽东在《打退资产阶级右派的进攻》一文，他提出反右派斗争的性质：“这次反右派斗争的性质，主要是政治斗争。”“大字报是个好东西，……是作战的武器之一，像步枪、短枪、机关枪这类轻武器。”⁴在这里，毛泽东指出反右派斗争的目的、性质和方

¹ 《人民日报》1957年9月18日

²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17-418页

³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32页

⁴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45-448页

式等。

由此看到，经过不到半年的反右派斗争实践，毛泽东提出反右派斗争是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新口号，无论从其对象、任务，还是策略、方式来说，都是错误的，并导致毛泽东修改了八大对国内主要矛盾的科学论断；改变了八大关于阶级状况的正确分析，提出了“两个剥削阶级”和“政治思想上的阶级”的论断。由于定性反右派斗争是敌我矛盾，在上述理论指导下提出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的社会主义革命的观点。从此在反右派斗争实践上形成一套错误理论。在这套错误理论指导下，错误的把知识分子当作革命的对象，当作阶级敌人，所以，从反右派以后，就一批批地整倒、打倒，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整得神州大地只剩下一些毛泽东所需要的“歌德派”知识分子。

综上所述，反右派斗争的严重后果，不仅使右派分子遭受种种伤害和歧视，即政治上的异己分子，被专政的对象，经济上被剥夺只能维持生存，思想心灵倍受压抑、折磨和被扭曲，人格上处在被凌辱、二等贱民、夹着尾巴做人的地位，肉体上受无形摧残，而且使某些领导人、干部和党员的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作风走向个人专断、以言定罪和以权代法的地步，党群关系进一步紧张、甚至恶化，“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变成实际上的一花独放、一家独鸣，“长期共存、相互监督”的方针实际上有名无实，成为短期共存。同时，由于反右派斗争的后果使党的工作重心从经济建设重新倒退到以阶级斗争为重点，形成一套错误的阶级斗争理论，在这个“左”倾理论指导下，发动了以空想社会主义为特征的“大跃进”运动，发动了以整彭德怀为代表的反右倾运动，发动了以反修防修为特征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最后发动了以创造空想社会主义模式为特征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毛泽东发动的这些运动的后果和影响，真正无法挽回的损失的还有：敢提意见、敢讲真话的都被打下去了，说假话、溜须拍马最为吃香。挨整者灵魂被扭曲，整人者胡说八道，指鹿为马，丧尽良心。造成人妖不分、对错倒置、风气败坏这些都是抛弃民主自由法治和大小领导专制独裁的结果，都是“左”倾错误逐步发展的结果，这种恶劣的影响并没有完全消除，还在起作用。

第三节 反右派斗争犯错误的原因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从1951年开始，毛泽东就发动带有阶级斗争性质的政治思想批判运动一个接一个，到1956年前为止，当局认为在阶级斗争中取得了许多胜利，在同反唯心论的斗争中并没有意识到犯了错误，因而提出“继续给他们（资产阶级——引者）以粉碎性的打击”。¹到了1957年6月，毛泽东发动反右派斗争又犯了严重错误，直到他去世也没有认识到自己犯了“左”倾错误，更谈不上找犯错误的原因了。后来新的党中央及其领导人从原则上指出毛泽东犯的错误及其原因。国内外党史、国史专家、学者作出了有益的探讨，笔者在吸收他们成果的基础上再作进一步的深入探讨。

一、直接现实原因

反右派斗争所犯严重错误的直接现实原因也是由多种原因构成的，带有综合性质，大致有以下几点：

1、阶级斗争形势的估计过于夸大

党的八大政治报告决议指出：党领导人民取得的社会主义三大改造的全面的决定性的胜利，这就表明，我国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基本解决，几千年来阶级剥削制度的历史已经结束，社会主义社会制度在我国已基本建立起来，现在，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就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党和全国人民的当前主要任务，就是要集中力量来解决新矛盾。²

八大对国内阶级状况也作出全面科学地分析，政治报告指出，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已经在大陆上消灭了；封建地主阶级，除个别地区外，也已经消灭了；富农阶级也正在消灭中；原来剥削农民的地主阶级和富农，正在被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新人；民族资产阶级分子正处在由剥削者变为劳动者的转变过程中；广大农民和其他个体劳动者，已经变为社会主义的集体劳动者；工人阶级已经成为国家的领导阶级，它的队伍扩大了，它的觉悟程度和文化技术水平大大提高了；知识界已经改变了原来的面目，组成了一支为社会主义服务的队伍；国内各民族已经组成为一个团结友好的民族大家庭；以共产党为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更加扩大和巩固了。³

¹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199页

² 参见《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81页

³ 参见《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9-10页

1956年，在苏共二十大会议上，赫鲁晓夫大反斯大林的秘密报告，引起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的混乱，相继出现了波兹南事件、匈牙利事件等，“特别是匈牙利事件，对毛主席和我们党的影响和震动太大了。仿佛中国也存在着这种现实的危险。”¹这一股反共反社会主义浪潮，也影响了中国的一些人，但没有引起什么大的波动，毛泽东在1957年2月间形象地说，不过是“吹皱一池春水”。

1957年3月12日，毛泽东还在《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正确地分析了我国知识分子的状况指出：“有人估计，各类知识分子，包括高级知识分子和普通知识分子在内，大约有五百万左右。这五百万左右的知识分子中，绝大多数人都是爱国的，爱我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愿意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的国家服务。有少数知识分子对于社会主义制度是不那么不欢迎、不那么高兴的。他们对社会主义还有怀疑，但是在帝国主义面前，他们还是爱国的。对于我们国家抱着敌对情绪的知识分子，是极少数。”²少到五百万知识分子比例百分之一、二，或者更低一点。还说，知识分子是脑力劳动的工人。³

上述分析都正确地反映了当时的客观现实。

从5月初开始，毛泽东一再号召和动员党外民主人士帮助党整风，中央各部门组织各种各样的鸣放形式，提供各种鸣放讲坛和场所，发动党外人士对党和国家领导以及建设工作提意见、发议论，并在各种新闻媒体上公布。5月中旬，毛泽东来了一个180度的急转弯，在《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中说，“什么拥护人民民主专政，拥护人民政府，拥护社会主义，拥护共产党的领导，对于右派说来都是假的，切记不要相信。不论是在民主党派内的右派，教育界的右派，文学艺术界的右派，新闻界的右派，科技界的右派，工商界的右派，都是如此。”⁴从这里看出，毛泽东告诫说，对除工农以外的知识分子，都“切记不要相信”。从这时起，毛泽东对阶级斗争形势做出了过分严重的估计。

当鸣放开始后，李维汉向毛泽东汇报党外人士鸣放情况后，谈到储安平的“党天下”时，毛泽东说：“他们这是要夺权了。什么

¹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第631页

²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04页

³ 参见《党的文献》2002年第5期第33-34页

⁴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25页

政治设计院，什么轮流坐庄，什么党天下，都是一个意思，要共产党把权交出来了，交给他们。什么小和尚、老和尚，我看他们才是和尚。和尚打伞，无法（发）无天。再让他们放，不要反击，硬着头皮听。”¹毛泽东发动党外人士帮助党整风，本意是整掉下面的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作风，没有预料到知识分子中有些人响应毛泽东亲自倡导的“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大无畏的精神向毛泽东等提意见，当储安平等提出意见后，毛泽东认为他们是要党交出权力，是夺权。这种看法就把人民内部矛盾当成敌我矛盾，把知识分子的言行当作敌人的言行。

6月19日，毛泽东公开发表修正后的《正处》一文中对阶级斗争形势作出了夸大估计，他说：“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²在这里，显然不同于2月27日在《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讲话》中对阶级斗争形势的估计。

7月1日，毛泽东为人民日报撰写题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的社论中，同样过于严重地估计阶级斗争的形势：“民盟在百家争鸣过程和整风过程中所起的作用特别恶劣。有组织、有计划、有纲领、有路线，都是自外于人民的，是反共反社会主义的。还有农工民主党，一模一样。这两个党在这次惊涛骇浪中特别突出。风浪就是章罗同盟造起来的。……整个春季，中国天空上突然黑云乱翻，其源盖出于章罗同盟。”“黑云压城城欲摧”……接着写道：“他们是反动的社会集团，利令智昏，把无产阶级的绝对优势，看成了绝对劣势。到处点火可以煽动工农，学生的大字报便于接管学校，大鸣大放，一触即发，天下顷刻大乱，共产党马上完蛋，这就是6月6日章伯钧向北京六教授所作目前形势的估计。这不是利令智昏吗？“利”者，夺取权力也。”³在这里，毛泽东描述当时的客观形势是“黑云压城城欲摧”，认为“章罗同盟”及六教授会议是有组织有计划有纲领有路线的夺权行动。显然把知识分子的鸣放言行看得过于严重、过分夸大，甚至到了无中生有的地步。7月9日，毛泽东在《打退资产阶级右派的进攻》一文中说：“一个时期天昏

¹ 引自《中国百年政治风云实录》下，红旗出版社1997年版，第129页

²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89页

³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35-437页

地黑，日月无光。”¹。

从这些引文中可以看出，毛泽东认为“章罗同盟”等右派人物就是要夺取共产党的领导权，认为他们把整个形势搞得“黑云压城城欲摧”、“日月无光”。这种过于夸大的估计和无中生有的谎言便派生一系列错误的政策。

80年代中期，李维汉回顾当时党外人士提出各种意见和建议时评述说：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知识分子、大学生等提出的意见，“这实际上是一种积极性的表现，是我们党领导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成果，符合阶级矛盾基本解决之后的新形势任务的要求。同时也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人民内部矛盾转到历史舞台的主要方面的必然的和正常现象。但是，当时我们党对他们的这种进步性和积极性估计不足。当党外人士在整风期间向党和政府工作提出大量意见以至尖锐批评的时候，当人民内部各种矛盾突出表现出来的时候，党在指导思想仍然停留在过去的阶段……把人民内部的各种批评和意见误认为敌我斗争，并且对极少数右派的进攻估计得过于严重。”“认为是‘惊涛骇浪’、‘十级台风’、‘黑云压城’。”“向党进攻的右派分子只是极少数。对右派分子的进攻……予以反击是必要的，这是为着澄清大是大非，为着教育广大中间派和维护社会的安定，而绝不是意味着人民民主专政有被颠覆的危险。我们党在人民群众中有崇高的威望，我们的人民是团结的，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是爱国的，愿意为社会主义服务，民主党派、民主人士和资产阶级分子的大多数是拥护党的领导的，我们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是巩固的。”李维汉回顾说：“因此，当时的客观形势不必要发动一场全国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在一定范围内对右派的进攻进行批判反击，完全可以制止事态的蔓延发展。”²李维汉代表了大多数人对形势的客观分析：不必要进行一场大规模的反右派运动，但必须对右派言论进行一定范围批判。可惜以李维汉代表的看法，没有被毛泽东等人接受，其结果是中国人民遭受一场空前的灾难。

毛泽东不仅把知识分子鸣放看成是阶级斗争的反映，作出了过分夸大的估计，而且把知识分子看作是反对社会主义、反对无产阶级的主要社会力量。他在反右派期间，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第十三次

¹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42页

² 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下册，第841-843页

会议上的讲话中对知识分子的状况进行阶级分析。他说：“富农是农村的资产阶级，他们在农村说话没有什么人听。地主的名声更臭。买办资产阶级早就臭了。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农村的上层小资产阶级（富裕中农），城市的上层小资产阶级（一些比较富裕的小业主）和他们的知识分子，这些人就有些影响了。特别是这个知识分子吃得开，那样都缺不了他……现在知识分子有五百万人，资本家有七十万万人，加在一起，约六百万人，五口之家，五六就是三千万人。”“现在，全国究竟有多少人不赞成社会主义？我和许多地方同志摸了这个底。在全国总人口中间，大概有百分之十的人，是不赞成或者反对社会主义的。这里包括地主阶级，富农，一部分富裕中农，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一部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一部分城市上层小资产阶级，甚至个别的工人、贫下中农。六亿人口的百分之十是多少呢？是六千万人。这个数目不小，不要把它看小了。”¹在这里，毛泽东把知识分子不加区别的都称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认为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是政治思想领域里潜在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主要力量，认为在全国人口中，有百分之十的人是不赞成或者反对社会主义的力量。这个潜在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人数有六千万。这种过于夸大的主观估计，从而制定一系列错误的政策：把当时右派当成被打击、歼灭的对象，把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当成挨整、挨批和继续改造的对象，把地、富、反、坏，后来加上右派，当成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其结果，右派遭劫，知识分子挨整，民族遭殃，国家受损。这就构成反右斗争错误的原因之一。

片面地总结和吸取波匈事件的教训。经毛泽东审阅和修改的《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中：“认为匈牙利事件造成的原因是“国际帝国主义起了主要的决定性的作用”，认为“过去时期的匈牙利还没有认真地建立起无产阶级专政。”²毛泽东在《党的八届二中全会的讲话》中，认为“东欧的一些国家的基本问题就是阶级斗争没有搞好，那么多反革命没有搞掉。”³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讲话中，又谈到造成“匈牙利事件”原因指出：“匈牙利对于反革命根本没有肃，杀了拉伊克，他倒是把革命分子杀了几个，而反革命就杀得很少，所以就出现了匈牙利事

¹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82-484页

² 《人民日报》1956年12月29日

³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23页

件。”¹毛泽东批评匈牙利前领导人说：“匈牙利从前的领导者，它的阶级斗争是失败的，它的建设工作也是失败的。”²这些观点是毛泽东等人从波匈事件中总结出的而且都是片面的，经不起历史检验的。“匈牙利事件”发生的真正原因，在于匈牙利党的领导集团教条主义地照搬、执行斯大林模式以及苏联大国沙文主义的干涉。

毛泽东认为应从“匈牙利事件”中吸取教训，在《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中指出：“现在我们主动的整风，将可能的‘匈牙利事件’主动引出来，使之分割在各个机关各个学校去演习，去处理，分割为许多小‘匈牙利’，而且党政基本上不溃乱，只溃乱一小部分……利益极大。”³由此看出，通过主动整风，达到主动引出和人为制造“匈牙利事件”来，然后加以无产阶级专政的处理。这个指示发出后的第四天，1957年6月12日，湖北省汉阳县一中学发生一起学生罢课游行事件。中央和地方的一些领导人抓着此事大做文章。

8月8日《人民日报》记者曹葆铭写了《马哲民策动的“小匈牙利事件”》的长篇报道，说：“6月12日、13日，“在章罗联盟驻武汉的大员马哲民的策动下，以汉阳县民主党派联合小组长、民盟盟员杨焕尧和民盟发展对象、汉阳县一中副校长王建国为首的反革命集团，在汉阳县机关所在地蔡甸镇制造的一次他们自称的‘小匈牙利事件’。他们利用汉阳县一中学生要求升学而又缺乏政治经验的弱点，组织了八百多名学生罢课游行，捣毁县人民委员会和县委机关，困绑和殴打干部。他们还图谋打发电厂、抢军火、劫监狱，扩大事件。这次暴乱事件，是杨焕尧和王建国这个反革命集团接受了章罗联盟驻武汉专员——马哲民集团的秘密指示，做了长期准备的有组织的活动。”

报道又说：“果然，星期三（6月12日），他们就利用自己制造的‘招生比例问题’，把学生煽动起来。这个反革命集团又进行了组织分工，确定了那些人员负责联系他们的党羽，那些人在幕后指挥学生。他们还派遣了学生许斯武、范贤仕等五人参加到学生群里带头闹事，并随时向他们汇报情况。一次‘小匈牙利事件’，就在这个魔鬼集团的策动下爆发起来了。”“地委秘书长赵克坚和县

¹ 《毛泽东思想万岁》1949，10-1957第151页

² 《毛泽东思想万岁》1949，10-1957第187页

³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32-433页

委已分析了这个事件的性质，派人把王建国找来，向他严肃指出：“这已经超出了民主范围，是敌我问题。下午，赵克坚召集学生开大会，在会上分析了反革命分子趁机制造暴乱的事实。县委又派了大批干部去附近各乡说明事件真相，并组织各界代表参观现场。县司法机关也在群众要求下，传讯和逮捕了当场发现的祸首杨松涛。事件平息下来了，学生开始复课。”¹

9月6日，汉阳县召开三级干部大会，宣布“汉阳事件”处理结果：以反革命暴乱罪判处王建国、钟毓文、杨焕尧三人的死刑，判处胡平轩、杨松涛等九名教师和一名学生二至十五年有期徒刑，李穗等三名教师送去劳动教养，三名教师带上坏分子的帽子，十一名教职员和十名县委机关、政法机关干部受到政纪、党纪处分，三十三名学生开除学籍、团籍和勒令退学。“汉阳事件”经《人民日报》、新华社等媒体报道和政府对于事件的处理，在国内国外造成极大影响，起到惩一儆百、杀一人以安天下的作用。

相隔二十八年的1985年，所谓《马哲民策动的“小匈牙利事件”》即“汉阳事件”得到了公正的处理。1985年5月30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发文，将胡斌等人要求为1957年“汉阳事件”平反的信批转给中共湖北省委，请省委牵头，对此案进行复查，结果报中央审批。湖北省委批示省政法委组织力量复查“汉阳事件”，在省政法委书记张思卿担任复查组长领导下进行工作，经过大量调查，核实，论证，取得共识：“根本不存在所谓‘以王建国为首的反革命集团’；‘汉阳事件’的实质是一中部分学生为升学率问题而自发地罢课、闹事，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原来认定是‘以王建国为首的反革命集团’策动制造的‘反革命暴乱’，全部失实；所谓‘马哲民策动的‘小匈牙利事件’’实际是一起大冤案。”湖北省委向中央报送《关于‘汉阳事件’复查情况和处理善后问题的请示报告》，中央同意省委关于为“汉阳事件”彻底平反的意见。²

实际上，“汉阳事件”这起冤案的发生和处理，是毛泽东等领导人片面吸取“匈牙利事件”教训的结果，是人为制造“胡风反革命事件”的延续和发展，是以权代法、轻视法治重人治的结果，是毛泽东“左”倾指导思想的错误产物。

错误的策略、手段和方法。由于毛泽东主观主义地指导反右派

¹ 《人民日报》1957年8月8日

² 参见《“小匈牙利事件”真相》，《南方周末》1999年1月15日

斗争，认为反右派斗争是一场敌我斗争，所以采用对付敌人的策略和方法来解决这场敌我矛盾。像什么“引蛇出洞”、“诱敌深入”等等。还重新拾起封建株连法等等。这些策略和方法执行的结果，造成是非颠倒、黑白混淆、对错倒置，人为制造了一起冤、假、错案。现在分别谈谈：

第一，“引蛇出洞”的策略。前面已经谈过“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的策略，或者称为“引蛇出洞”的策略。在这里，把“引蛇出洞”的策略当作一种手段、方法来叙述。为达到“引蛇出洞”的目的，中央、地方各职能部门、各级党委采取各种形式加以贯彻，如召开座谈会、专访组稿、专门采访报道等，让知名人士、学者、专家在大鸣大放期间发表意见、提出建议和表态，各新闻媒体及时加以报到、渲染；毛泽东等各级领导人亲自接见、会见、号召、动员各界知识分子以及大学生等帮助党整风，让他们以大字报、大辩论、演说、漫画、音乐等形式表述意见和观点，然后加以报道或收集起来以备后用；领导小组及其成员主动访问重点人物，同他们谈心，鼓励他们鸣放。还有许多党员，党的积极分子和没有政治私心的大学生为了表示对党的忠诚，对毛泽东的敬仰，对国家大事的关心和对祖国的热爱，主动将自己的思想、意见、建议写成文字材料，如实向党组织汇报（愿者上钩），让党了解掌握这些情况。由于“引蛇出洞”的手段，配合多种形式的结果，“现在大批的鱼自己浮到水面上来了，并不要钓”。（毛泽东语）

在运用“引蛇出洞”策略的同时，新闻媒体还采取“无中生有”、掐头去尾、断章取义、捕风捉影、无限上纲等手法，像划章伯钧、罗隆基、“章罗同盟”、葛佩琦等为右派就是采用几种方法实现的。

章伯钧是怎样被“引入”的，据章诒和（章伯钧的女儿）回忆说：“既然确立了反右，也就同时确立了反右目标。于是中央统战部出面召开座谈会，让目标‘入围’。于是中央统战部长李维汉亲自电话催促父亲，一定要出席座谈会，给中共提批评意见。父亲再三推托，声明自己的观点意见平时都讲过了。‘平时讲的不算数，一定要在会上讲。’——看来，非去不可了。1957年5月21日下午，腹泻不止的父亲坐在‘吉姆’车内，心里还不知一会儿该说些啥？想来想去，想出个‘设计院’……”据千家驹回忆：“至于章伯钧，

¹ 牛汉、邓九平主编《六月雪》第265页

他自命为‘左派’，在整风初期，他没有发表什么实质性的言论，中央统战部长李维汉为了要使章伯钧上钩，特地多开了几次政协座谈会，一定要章伯钧发言，章伯钧就抛出了‘政治设计院’的谬论。这一下就被抓住辫子。”¹

“章罗同盟”是怎样形成的。章乃器的儿子章立凡回忆说是用“无中生有法”。他说：“老子《道德经》云：‘世间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这是一种对万物起源的哲学思考。而用此法整人者大都不明事理，更无道德可言，或捕风捉影，或凭空捏造。例如‘章罗同盟’就是其典型杰作，章伯钧、罗隆基在民盟内素不相和，被硬拉到一起，株连多人，铸成冤案。父亲与此事风马牛不相及，但也有人造谣说他参加‘章罗同盟’在全聚德的会议云云。”²据千家驹回忆：“毛泽东认为‘右派’的猖狂进攻，以中国民主同盟与农工民主党表现最为恶劣，‘其源盖出于章（伯钧）罗（隆基）联盟’云。‘章罗联盟’这个毛泽东钦定的罪案，其实完全是一场冤案，真可以说是千古奇冤！章伯钧与罗隆基都是中国民主同盟的副主席，我和他们两人都很熟，与章伯钧的来往尤为密切。凡是对民盟内部历史稍有所知的人，谁都知道章罗两人在民盟内部极不相能，互相水火。‘章罗联盟’的名词是毛泽东定的，说他们两人结成‘联盟’来‘反党’，要取而代之！这在稍知民盟内幕的人无不认为滑天下之大稽！真叫黑天冤枉！”³

韦君宜对“章罗联盟”的评述，说：“罗隆基是个大学教授，是我们这些‘一二·九’学生经常请来帮我们说话的人。他家在天津，我就到他在天津的家去邀请过他。他在五四纪念活动时来清华讲过，痛斥胡适等人如何放弃了当年五四的传统。在西安事变时，他更加勇敢地到清华来，说蒋介石如何如何不得人心，说清华老同学只想做官，我们必须反对。在新中国建立之后，他当然会以为这个国家将符合自己的理想。结果却说他和章伯钧组成了‘章罗反党联盟’，真不知从何说起！”⁴

上述引用材料说明，“章罗同盟”纯系一桩千古奇冤，完全是为政治需要推断出来的，是无中生有的手法编制出来的。不是扩大

¹ 牛汉、邓九平主编《六月雪》第163-164页

² 牛汉、邓九平主编《六月雪》第221页

³ 牛汉、邓九平主编《六月雪》第163-164页

⁴ 《百年潮》1998年第二期第33页

化错误能说明了的，这是发动者和追随者制造的。

葛佩琦是怎样被“引入”的，据李新回忆说：“原来葛佩琦是个老党员，他对党并没有什么不满，也不想在整个整风中对党提意见。人大（中国人民大学）党委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他一再谢绝参加。后经反复动员，他勉强参加了，在会上说了几句很一般的话，但就是这几句话，被任意篡改歪曲而打成‘右派’分子。他发言的原意是‘外行办不好大学，不要脱离群众，不要看不起知识分子，党员干部不要生活特殊化，要克服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官僚主义’。他是在1957年5月24日发言的。5月27日《人大周报》就刊登了他的发言（回忆录说‘篡改了的发言’）。其中说：‘不要不相信我们知识分子。搞得不好，可以；不好，群众可以打倒你们，杀共产党人，推翻你们，这不能说不爱国，因为共产党人不为人民服务’。当天下午，葛佩琦去找到人大副校长、党委书记聂真，指着《人大周报》那段话气愤地说：‘这不是有意诬陷我吗？’聂真说：‘你不用着急，共产党是实事求是的，登错了，可以更正。’聂真在党内是素来以态度温和著名的。现在他早已知道毛主席‘引蛇出洞’的策略，于是便以温和的态度去对待葛佩琦气愤的态度。

6月8日，《人民日报》以葛佩琦发表反共言论为标题，报道了葛的发言说：‘群众总要推翻共产党，杀共产党人；若你们不改，不争口气，腐化下去，必然走这条路。总有这么一天，这也是合乎社会主义发展规律的。喊万岁也是没有用的。’葛佩琦在《回忆录》中说：“我从来没有说过这段话，《人大周报》刊登的……也没有这段话。这段报道纯属捏造。”他当即写了更正信，6月9日亲自把它送到了《人民日报》社（这封更正信，到80年代居然查出来了）。《人民日报》不但不登更正信，还连续发表批葛的文章。6月14日，《人民日报》以本报南京电、保定电、沈阳电，同时发表三篇批判葛的报道，当天《人民日报》还发表了《葛佩琦的学生痛斥葛佩琦》的文章。15日，《人民日报》又刊登了某名人批判葛佩琦的文章。于是，全国大小报刊纷纷发表文章，批判葛佩琦要杀共产党人，一时形成批判葛佩琦的高潮。就这样，葛佩琦被划为‘右派’分子。后来定为‘极右派’，判处无期徒刑。”¹葛佩琦的问题是人民大学党委和人民日报根据需要捏造出来的。

¹ 李新《反右亲历记》载肖克等《我亲历过的政治运动》，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24-25页

第二，重新拾起株连法。反右时使用此法比以前有所“发展”和“创造”，比如上挂下连，左联右系等形式，其范围之广、规模之大、程度之深都是空前的。

“章罗同盟”被株连的人，据不完全统计，中央和北京就有曾昭抡、费孝通、钱伟长、储安平、陈新桂、潘光旦、吴景超、黄药眠、叶笃义、浦熙修等 11 人，上海的有沈志远、陈仁炳、彭文应、孙大雨、徐铸成，赵文璧等 19 人。天津有王大川、杨思慎 2 人。安徽有吴伯敏、王晋斋等 4 人。浙江有宋云彬、姜震中。河南有王忆斋。湖南有杜迈之等。湖北有马哲民等 6 人。江西有许德瑗等 4 人。甘肃有杨子恒等 2 人。四川有潘大逵、李康等 11 人。陕西有韩兆鄂、李子健等。这些被株连的人，都是因为同“章罗联盟”的章伯钧、罗隆基有上下级关系、组织关系、业务关系、工作关系以及思想政治观点有某些相同或相似的观点而受到株连的。

章伯钧的夫人李健生是如何被株连的呢？章伯钧的女儿章怡和回忆说：“反右”红火的时候，上级派人来动员她与我父亲离婚，让她远看刘清杨、近学浦熙修（这二人都是在丈夫张申府、罗隆基倒霉之际，宣布“划清界限”的）。我母亲听了摇摇头说：我封建思想严重，在这个时候要老婆离婚，绝对办不到。翌日，这段话就上了首都各大报刊。自然，我的妈妈也戴上右派帽子。¹

新风霞是怎样被株连为右派分子的呢？据新风霞自己说：“1957 年我受丈夫牵连，领导逼我离婚‘划清界线’。我想到祖光没有反党的心，全是为党好；但他不被党理解，我可不能不理解他，因此，我也被戴上右派帽子。”²

在上述株连法基础上，又发明一种新型株连法：恋爱关系、通信关系。学生右派领袖人物林希翎，因她的言行被株连的就有成千上万的无辜者。据说：“仅是在北京的就有一百七十名，而在全国各地则不计其数。”一是工作关系，如林希翎 1956 年在北京东四人民检察院实习期间，办了一个案件，法学家、民革中央常委谭惕吾女士以全国人大代表的身份，来院视察并恰恰过问了这个案件，两人为此打过一阵交道。反右派斗争中，这便成了民主党派中的“大右派”与高等院校右派学生的头面人物相互呼应、相互勾结的证据。一般朋友关系，如吴玉章的外孙蓝其邦、谢觉哉的秘书吉世林、胡耀邦

¹ 牛汉、邓九平主编《六月雪》第 273 页

² 胡平著《禅机》下卷，第 548 页

的秘书曹治雄，均是因为以上三位中央委员接见林希翎时陪同在座而开始认识她，以后曹治雄与她发展到两人相恋外，吉世林只是奉谢老之命给她写过一封信，通知谢老再见她一次；蓝其邦则按吴老之意来看过她几次并转达了吴老的话，结果这三个人都被打成右派分子，开除了党籍。其中最惨的是吉世林，赶回老家当农民，母亲悲愤上吊自杀，妻子闹离婚带上孩子走了……。一种通信关系，1956年暑假，林希翎作为《中国青年报》特派记者，采访了西北地区，写出了一些文章在报刊上发表，编辑部给她转来过大量读者来信。鸣放高潮时她在北大多次演讲，又收不少听众表示支持的来信。反右派斗争开始后，人民大学党委当即审查她与社会各方面的联系，她被迫交出自己保存的一切文稿、日记和信件。结果在她这里留有姓名的人，均有材料转去本单位，他们中多数被打成右派……。¹从这里看出，封建株连法，在毛泽东时代有所“发明”和“创造”，连工作联系（临时性的联系）、朋友关系（恋爱关系）、通信关系都成了被株连的对象。

第三，不择手段，采取打进去、揭老底和大义灭亲等方式来抓右派、打击右派。毛泽东在反右期间，为要整倒整垮自己的对手，不惜采取一切手段。像派共产党员到民主党派中央机构任职，培养民主党派中左派分子加入共产党。吴晗就是在1957年3月，经毛泽东批准加入共产党的，但没有向外界公开，是以左派民主人士出现在政治舞台。可怜可悲的吴晗，明史专家，著名教授，被统治者招之即来挥之即去，利用完了后，在文化大革命中被逼迫自杀。这就是打进去的战术或手段。揭右派分子的老底算旧账的方法应用更广泛。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总有些被当局者认为不干净的地方，许多知识分子甚至学生被国民党政府强迫加入国民党、三青团，那怕没有为它们作任何事，到解放后，人民政府号召凡是加入反动党团的人都要登记，历次政治运动中都已经交待清楚，做出历史结论，到反右派时，把知识分子过去的陈旧老账也要翻出来，让知识分子出丑，将历史的老账加以上纲上线，逼迫知识分子承认反党反社会主义。这种揭老底，算旧账的方法对多抓多划右派分子起了主要作用。在大义灭亲的口号下，领导一再动员被批斗的知识分子，揭发自己的亲友，或让亲友与其划清界限，互相斗争。笔者被批斗后，组织上一再动员我妻子揭发我的反党罪行，我妻子根本不知道我有

¹ 参见胡平《禅机》下卷第474-475页

什么罪行，我的所谓罪行，所谓错误几乎都是报纸上宣传的观点，引起了脑中一闪念，自动地把这些一闪念的东西，写成思想汇报交给党组织（我有私心杂念，想在整风反右中表现自己，接受党组织的考验，想加入共产党）。我妻子根本不知道我有什么错误和罪行，她无法揭发丈夫的“错误”和“罪行”。党小组警告她不老实与右派丈夫划不清界线思想严重右倾，后来她被取消预备党员资格，下放劳动调出北京，发配东北当中学教员。有的夫妻互相揭发后，都被划为右派分子，弄得妻离子散，家破人亡。这就是亲属互相揭发的恶果，朋友之间互相揭发也落得双双都是右派。

在反右前后和反右补课中只要能多出右派，快出右派，不管什么手段，只要能整人都通通用上，这对于置人于死地，制造冤假错案起到了雪上加霜的作用，因而成为反右派斗争所犯错误又一个重要原因。

不恰当的群众运动斗争形式。中国革命是靠群众运动斗争取得成功的，在未取得政权，群众运动斗争形式是可以的，是一个取胜的法宝，在取得政权之后，在巩固政权初期采用群众运动斗争方式还是起到一定积极作用。但已进入建设阶段，特别是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后，阶级、阶级斗争已基本消灭，党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发展经济，从经济上巩固社会主义政权，党的八大提出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方面来。不久，毛泽东将主要精力放在反右派斗争上，又来以群众运动的形式来抓阶级斗争，而且对群众运动斗争的形式有新的“发展”和“创造”，即把群众运动与“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大民主形式结合起来，发动群众以“大字报”、“大辩论”“大鸣”、“大放”的大民主形式整人。

1957年6月8日反右派斗争开始，毛泽东在《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指示中，号召“以大字报为战斗武器”，反击右派分子。7月9日，毛泽东在《打退资产阶级右派的进攻》讲话中，号召群众同右派进行大辩论：“成绩是主要的，还是错误是主要的？右派否定人民事业的成绩。这是第一条。第二条，走哪一个方向呢？走这边就是社会主义，走那边就是资本主义。右派就是要倒转这个方向，走资本主义道路。第三条，要搞社会主义，谁人来领导？……是共产党领导，还是那些资产阶级右派来领导？右派说不要共产党领导。我看这一回是一次大辩论。”毛泽东又说：“大字报是个好东西，我看要传下去。”“比如将来工厂里头整风要不

要大字报呀？我看用大字报好，越多越好。”“无产阶级可以用大字报，资产阶级也可以用大字报。”“大字报这个工具有利于无产阶级，不利于资产阶级。”“大字报是作战的武器之一，象步枪、短枪、机关枪这类轻武器。”¹毛泽东所说的“大辩论”实际上是利用政权力量的武器批判。

7月，毛泽东在《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一文中，又提出全民性的大辩论问题：“大辩论，全民性的，解决了和正在解决着革命和建设工作是否正确……是否应走社会主义道路，要不要共产党领导，要不要无产阶级专政，要不要民主集中制，以及我国的外交政策是否正确等项重大问题。很自然地要发生这样一次全民性的大辩论。”“大字报，除商店的门市部、农村（区乡）、小学、军队的营和连队以外，都可以用。在我国条件下，这是一个有利于无产阶级而不利于资产阶级的斗争形式。怕大字报，是没有根据的。”“大字报、座谈会和辩论会，是揭露和克服矛盾、推动人们进步的三种很好的形式。”²

10月9日，毛泽东在《做革命的促进派》的讲话中高度评价“四大”这一形式，他说：“今年这一年，群众创造了一种革命形式，群众斗争的形式，就是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现在我们革命的内容找到了它的很适合的形式……我们找到了这个形式，适合现在这个群众斗争的内容，适合现在阶级斗争的内容，适合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抓住了这个形式，今后事情好办得多了。大是大非也好，小是小非也好，革命的问题也好，建设的问题也好，都可以用这个辩论的形式去解决，而且会解决得比较快。”“这种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形式，最适合发挥群众的主动性，提高群众的责任心。”“我们的民主传统今年是一个很大的发展，以后要把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这种形式传下去。这种形式充分发挥了社会主义民主。这种民主，只有社会主义国家才能有，资本主义国家不可能有。在这样的民主基础上，不是削弱集中，而是更加巩固了集中制，加强了无产阶级专政。”³

10月13日，毛泽东在《坚定地相信群众的大多数》讲话，再次肯定“四大”是群众创造的新形式，他说：“现在整风找出了一

¹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31、443、447、448页

²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62、464页

³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67-468页

种形式，就是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这是群众创造的一种新形式。”“新的革命内容，它要找到新的形式。现在的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是为了建设社会主义国家，它找到了这种新形式。这种形式，可以很快普及，很快学会，几个月就可以学会。”“在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下，在大多数人拥护社会主义的基础上，用我们这个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办法，可以避免匈牙利那样的事件，也可以避免现在波兰发生的那样的事件。”¹上面引证说明毛泽东对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大民主形式、作用给予高度评价，认为“大字报是个好东西，我看要传下来。孔夫子的《论语》传下来了，《五经》、《十三经》传下来了，《二十四史》都传下来了。这个大字报不传下去呀？我看一定要传下去。”²大字报确实传下去了，传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后来为什么会传不下去了，会取消呢？下面文献回答了这个问题。1980年6月11日，中共中央批转中央统战部《关于爱国人士中的右派复查问题的请示报告》的通知中指出：“一九五七年党提出要党外群众向党提出批评，帮助党整风，这是完全正确的。但是由于不适当地支持了党外有些人提出的所谓‘大鸣大放’，以至逐步发展成为全国范围的紧张的政治动乱气氛，这也是后来反右派斗争扩大化的重要原因之一。‘大鸣大放’以后发展成为‘四大’，被认为是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好方法。但是作为一个整体的‘四大’，并不能发扬民主，而只能妨害人民行使正常的民主权利，并且人为地破坏安定团结，妨害社会主义建设，甚至导致无政府状态。一九五七年的经验已经证明了这一点，文化大革命的经验进一步证明了这一点。”³在这里党中央承认“四大”不是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好方法。”到了1981年6月27日，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取消了不利于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所谓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⁴由此看出，党中央认为“四大”不仅不是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好方法，而且还成为反右派斗争犯错误的重要原因之一。因而，作为整体的“四大”，理所当然就不能继续往下传下去了，而是被取消了。这是毛泽东所没有预想到的。

¹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80、486页

²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47页

³ 《三中全会以来》上册，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97-498页

⁴ 《三中全会以来》下册。第824页

独断专行的作风。建国前，毛泽东是非常谦虚谨慎的，自己身体力行，比如，他在《学习与时局》的报告中谈到：“我党历史上曾经有过几次出现了大的骄傲，都是吃了亏的。”“全党同志对于这几次骄傲，几次错误，都要引为鉴戒。近日我们印了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们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¹1949年3月5日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告诫全党提出：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这一点现在就必须向党内讲明白，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²1953年8月12日毛泽东在全国财经工作会议上提出：“要坚持谦虚、学习和坚忍的精神，坚持集体领导的制度”。³

随着民主革命任务的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的开始，毛泽东很快忘记自己向全党同志讲话，违背自己的思想，他在这些胜利和成绩面前，开始滋生骄傲自满情绪和独断专行的作风。1955年10月11日，毛泽东在党的七届六中全会扩大会议上，告诫党的领导干部说：“有许多人总是不爱跟人家商量一下。许多同志口里赞成集体领导，实际上十分爱好个人独裁，好象不独裁就不象一个领导者的样子。当一个领导者不一定要独裁，你晓得！资产阶级有个资产阶级民主，它讲究阶级独裁。无产阶级、共产党也搞阶级独裁，如果搞个人独裁，那就不好。”⁴毛泽东对别人的要求多高多好，可是他自己后来就从来不履行，历史已经证明。请看薄一波是怎么说的：“由于毛主席的伟大功绩和崇高威望，在我们党内，从上到下，几乎都认为毛主席一贯正确，没有也不会发生错误。即使自己的看法和毛主席有不同，也总是从自己方面检查，找原因。记得我的一位老领导和一位老战友曾不止一次告诫我：毛主席讲的话，如你觉得不对，千万不要讲，你回去想想，慢慢就会知道毛主席是正确的。长期以来，在我们的脑筋里，的确形成了一个思想框框：毛主席说对，就对；说错，就错，人人都以毛主席的是非为是非。”⁵在这段话里充分肯定毛泽东的威望，同时也暴露了毛泽东的独断专行和下

¹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971—972页

²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40页

³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97页

⁴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09—210页

⁵ 参见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第881页

级官员盲目崇拜的作风，实质上是一种君臣关系，是一种主仆关系，有了这些作风和那种关系，在实际工作中，就严重妨碍对国内形势和党的正确判断和正确决策。独断专行是一言堂的作风。

1956年6月20日《人民日报》经周恩来同意，发表题为《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的社论，提出：“急躁冒进所以成为严重问题，是因为它不但是存在下面的干部中，而且首先存在于上面各系统的领导干部中，下面的急躁冒进有很多就是上面逼出来的。”¹毛泽东对此社论有意见，认为“反冒进”是右倾保守。1957年10月党的八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批评说：“反冒进”扫掉了几个东西，扫掉了多快好省，扫掉了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扫掉了促进委员会。又在1958年1月南宁会议上，毛泽东把自己当成“冒进”的罪魁祸首，说什么冒进是马克思主义，反冒进是非马克思主义的。又说社论既要反对保守主义，又要反对急躁冒进，好像有理三扁担，无理扁担三，实际重点是反冒进的。认为社论中引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序言的几句话来说明反冒进‘是用毛泽东来反对毛泽东’。还说在这篇社论上批注：“庸俗辩证法’、‘庸俗马克思主义’，尖锐地针对我。”²毛泽东又在1958年2月北京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继续批评反冒进，3月成都会议上毛泽东还在批评反冒进问题。一直批评到周恩来、陈云等向毛泽东作出了违心的检讨才算结束。实际上，6月20日社论是一篇完全正确的社论，是经政治局（毛泽东未参加）集体讨论，然后向毛泽东报批。

毛泽东不同意社论中的观点，花了近两年多的时间，不断地批评，最终以不正确的意见否定了正确的意见，政治局常委多数人服从毛泽东一人。后来薄一波评价说：“这次批评反冒进，历时半年之久，其影响所及，在党内政治生活史上是一件很不小的事情，也可以说是一种标志，它标志着建国以后党的民主生活开始由正常或比较正常向不正常转变。有一位同志曾经说过，南宁会议前后，党内气氛逐渐紧张了。毛主席有些高居政治局之上了，已经很难像以前那样经常同政治局的同志坐在一起平等地商讨问题，党内的生活开始不正常了，我同意这种看法。”³这说明党的组织原则和集体领导原则遭到破坏。毛泽东个人的专断作风已变成个人的专断实践，从

¹ 《人民日报》1956年6月20日

² 参见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第638页

³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第653页

1956年起，党就失去了约束和纠正党的领袖犯错误的手段，这也为毛泽东犯更大错误敞开了大门。毛泽东对于反右派斗争的政策、策略、方法、形式等等自始至终都由他亲自部署和指导，因此，他对反右派斗争犯错误负有主要责任。

关于毛泽东的独断专行的作风，李维汉谈出他的看法，说：“毛泽东同志在巨大胜利面前却逐渐骄傲起来，发展主观主义和个人专断的作风，违背了党的集体领导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使党内民主和国家的政治生活受到了损害”。“到了1956年11月八届二中全会期间，毛泽东同志错误地批判了反冒进是‘促退委员会’之后，”“正确的意见受到抑制，党内民主生活逐渐受到损害……。但在这期间和以后他却滋长了‘一言堂’的作风”¹这个“一言堂”作风，薄一波说：“‘一言堂’这个词，也是毛主席最先使用的，他是用来批评那种不民主的个人或少数人说了算的专断作风的。”²上述引证是毛泽东对党内实行个人专断作风的表现。

对党外人士，特别对1957年反右派问题上党外人士向毛泽东陈述建议，毛泽东的态度又如何呢？据李维汉回忆：“对反右派斗争的扩大化，民主党派和全国工商联的某些负责人在一开始就表示不满，提出不同意见。黄炎培6月15日表示不要树敌过多，要把可能拉过来的人拉过来，而不要把这样的人推到反党这一派那里去。陈叔通六月中旬说：不能因对党提了意见就作为右派。党的某些领导人没有掌握好这一点，现在问题很严重。邵力子说，现在有许多问题处理的方法太硬，得人心很难，失人心很易，表示对民革中央的反右派斗争要来一个沉默抵抗。史良不赞成把揭发右派分子的材料登在报上，担心这样做运动搞得很大。6月下旬，李济深表示他要在人代大会上发言提出不要骄傲自满，困难还很多，还要努力。对党外人士的这些意见，中央统战部虽向中央作过反映，但在当时‘左’倾思想影响下，这些正确的意见不可能引起重视和认真研究，而是简单地反映了之。”³

上述引证说明，毛泽东自建国后，骄傲自满情绪、独断专行作风逐步滋生和发展起来，这些思想作风与民主自由思想是格格不入的。李锐对民主自由提出独到的看法，说：“‘民主与自由’，是

¹ 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下卷，第844-845页

²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第881页

³ 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下卷，第838-839页

人类社会赖以进步的历史产物，是专制与独裁的对立物，西方经过几百年斗争，依靠民主、自由和科学才从封建主义发展到资本主义。……我们的宪法规定人民有各种自由权利，不得侵犯。但是法律规定自由有范围，例如不能妨碍他人身体自由，不得危害国家民族利益，不得违反政府法令，等等，都是把自由限制在一定范围以内。有了这些规定，自然就不必怀疑自由是专属资产阶级的特权了，社会主义离开了自由和民主，也就不成其为社会主义了。我们过去搞的那一套。只能名之曰封建社会主义。”¹到了1957年，在大鸣大放中，有人提出‘轮流坐庄’的观点，毛泽东视为异端、毒草，认为右派是要夺取政权，是分享共产党、毛泽东经过千辛万苦来之不易的权力。其实这个“党天下”、“轮流坐庄”的观点（右派提出的建议）是具有破坏专制独裁、家天下、一言堂的观点，是政治民主化的思想，是择优政党领导人的好方法。

李新对“轮流坐庄”提出了他的看法，说：“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传统，在各种条件没有改变的情况下，国家领导人，只能是终身制，也就是只能出现事实上的皇帝。不管他的名称叫什么，或者叫委员长，或者叫总统，或者叫主席，其实质都是一样。蒋介石如此，其他人也是如此，事实上都是皇帝，不过名称上不同罢了。袁世凯的愚蠢，就在于他非称为皇帝不可。在中国，国家的领导一定是终身制，政党的领导也得是终身制；国民党如此，共产党也是如此。高岗、饶漱石提出党的主席要轮流坐庄，他们要倒霉是必然的。一个真正实行民主的党，它的领导人，虽不一定是‘轮流坐庄’，但也绝不该是终身制。”²在这里，即批判了右派提出“轮流坐庄”脱离中国现实，要犯高、饶那样的错误；又批判了中国事实上存在的皇帝，事实上的终身制；同时，希望党能够真正实行民主来结束事实上的终身制。这些思想很有见地，应值得高度重视。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由共产党领导，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参加的联合政府，共产党担任政府中主要职务，民主人士担任政府中的副主席、副总理、部长、副部长等重要职务。联合政府中民主人士分享一部分权利。好景不长，从1953年春开始，中共中央决定：“为了使政府工作避免脱离党中央领导的危险，今后政府工作中一切主要和重要的方针、政策、计划和重大事项，必

¹ 《直言》李锐六十年的忧与思，今日中国出版社，1998年版第381—382页

² 李新《反右亲历记》载肖克等著《我亲历过的政治运动》，第18页

须经过党中央领导的讨论和决定或批准，”；“今后政府各部门的党组工作必须加强，并应受中央的领导。因此，现在的中央人民政府党组干事会已无存在的必要，应立即撤销”，“今后政务院各委和不属各委的其他政府部门一切主要和重要的工作均应向中央直接请求报告，如属两个部门以上而又不隶属于一委的事项，则经由政务院负责同志向中央请求报告”。¹权力集中于党中央的开始。

1953年9月，毛泽东在《批判梁漱溟的反动思想》一文说，“我们是坚持无产阶级对于一切问题的领导权（工人、农民、工商业者、各民族、各民主党派、各民众团体、工业、农业、政治、军事总之一切）。”²1955年10月11日，毛泽东在党的七届六中全会扩大会议上宣布：“资产阶级有个资产阶级民主，它讲究阶级独裁，无产阶级、共产党也要搞阶级独裁。”³以上毛泽东指示，讲话等，对以党代政、一党独裁“党天下”观点的形成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在基层政权中，几乎都是清一色的党员执政当头儿，在大学各个系里，系主任是非党专家，可系秘书是党员，形成秘书执政、当家的现象。在反右派前后，知识分子对以党代政，秘书当家，凡是一个部门都有党员当头儿，不管是否有领导能力，都要党员担任，外行领导内行等现象提出意见。这些提意见的人大都被打成右派分子。实际上，“党天下”的观点远比封建专制的“家天下”、皇帝一人独裁、朕即国家要进步得多。因为“党天下”的观点对破除“家天下”，朕即国家的封建专制独裁，有积极作用，对改进、完善共产党的领导作风，加强党的建设也有积极作用。所以提出“党天下”观点的人不但没有错误，而且是反封建独裁的战士。

众所周知，在历史上，中国的皇帝，没有几个开明君主，就是好皇帝，几乎都是独断专行，说一不二，都以皇帝的是非为是非，皇帝说对就对，说错就错。毛泽东的这种独断专行，一言堂作风，不仅作为思想作风而存在，而且还有组织保障，即民主集中制来保障。按毛泽东1957年对它的解释：“民主是对集中而言，自由是对纪律而言……在人民内部，不可以没有自由，也不可以没有纪律；不可以没有民主，也不可以没有集中。这种民主和集中的统一，自由和纪律的统一，就是我们的民主集中制。”又说：“民主这个东

¹ 《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增订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61页

²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115页

³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10页

西，有时看来似乎是目的，实际上，只是一种手段。”¹说到底，你民主，我集中，民主是手段。发扬民主也好，集中意见也好，都是由党的领导人来执行，仅仅把民主当作一种手段，当作一种工具。57年夏季的鸣放是毛泽东恩赐的民主，集中鸣放的意见也是由党和毛泽东来集中。集中到对己有利时就收，然后就整。可见毛泽东把民主集中制当作一种工具、手段，这在当时中国存在个人专断、一言堂和缺少民主作风的情况下，只能把民主集中制当作工具来使用。

不仅毛泽东在巨大胜利面前逐渐骄傲起来，滋长个人专断和一言堂作风，而且党内部分领导干部，甚至一些普通党员也在巨大胜利面前滋长骄傲自满、以功臣自居和宗派主义的情绪。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这些党员和广大干部因中国革命的胜利而产生不同程度的骄傲自满情绪，认为自己是中国人民的解放者，是有功之臣，是大恩人。认为在领导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既有功劳，又有苦劳。这些思想本身就反映了小生产者的狭隘保守思想。在1957年初期鸣放中，在整风运动中，毛泽东请党外民主人士帮助共产党整风，请他们向党提意见，整整党内干部中存在的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三大坏作风，这些作风与封建专制主义残余、小生产者落后思想意识密切相联。当时犯有这些作风的党员和干部，出于消极被动和挨批的境地，对毛泽东提出的鸣放政策、请党外人士帮助党整风不理解、产生抵触情绪，甚至不执行。同时，毛泽东发出的整风运动、鸣放运动，也没有估计到党外人士和知识分子有如此之多的批评和意见，有的是很尖锐、过头的意见。毛泽东决定发动反右派斗争，本来对整风、鸣放有抵触情绪和不满以及挨批的党员和干部，他们积极投入反批评行列中来（即反右派斗争），这样上下相结合，对过去向他们提出批评和意见的人，进行打击、整人、栽赃、陷害和“给小鞋穿”等报复行动。

李新提到人民大学反右期间借机整人的实例：“有的系总支，由于领导人的心胸狭窄，借机整人，就是抓住一些人不放，非把他们打成‘右派’不可。例如经济系有个青年教师孟氧，注释《资本论》出了名，但系领导嫉恨他，要把他打成‘右派’，几次送到常委会讨论。常委会多数同志‘爱才’，说小青年说几句怪话不能算反党，应好好地教育他、教训他。但系里最后硬是找到了他恶毒攻击党的‘罪证’，终于给它扣上了‘右派’帽子。”李新又说：“聂

¹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68页

真（人民大学副校长、党委副书记）分明知道‘引蛇出洞’的策略，他竟然把葛佩琦这样一个老党员也当成一条蛇引出洞来打了！胡锡奎（人民大学党组书记）那样狠心的人，要把我打成右派又何足为奇？而且他也确实这样干了，只是因为吴老（吴玉章，人民大学校长）识破了他的阳谋，采取了巧妙的措施，才阻止他的阳谋得逞。”¹这种人心胸狭隘，素质低下，借机报复，借合法方式报私仇的做法，是小农落后思想意识的表现，也是个人专制和宗派主义的表现。

总之，骄傲自满，个人专断独行、一言堂作风，首先表现在毛泽东身上，其次表现在各级部分领导人身上，还表现在某些党员身上，由于上下结合，产生“人治”、“独裁”作风和变成行动、实践。然后，毛泽东采用群众运动的方法（这个方法是民主方法，在未取得政权之前，发动群众的大民主方法同敌人斗争是正确的，取得政权后，对人民内部还使用群众运动方法则是错误的）进行反右，在方法上也错了，说实在的，群众运动的方法，实际上是运动群众，让群众成为统治者的驯服工具。这种在毛泽东时代下的“人治”与“群治”相结合的作风和方法，人为制造了大量的冤、假、错案，同时构成毛泽东等犯错误的重要原因。如果不尊重集体领导原则，听不得不同意见，失去制约领导人的措施，就会犯严重错误，斯大林的错误就证明了这一点，毛泽东的错误又证明了这一点。

二、间接深层原因

制度上的某些弊端。邓小平说：“单单讲毛泽东同志本人的错误不能解决问题，最重要的是一个制度问题。”²首先分析制度方面的深层原因。所谓制度上的某些弊端，是指社会主义具体制度中的某些弊端，比如政治体制、经济体制、思想文化体制等具体制度中的某些弊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各民主党派参加的人民民主制度，一方面刚刚建立，没有经验，另一方面向苏联学习，可能存在问题。所以出现这样或那样的一些问题，并不奇怪，只有在实际工作中摸索前进，有了问题再进行解决。

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实行人民民主专政制度，这个政治制度得到了全国各族人民的热烈拥护，大家都为新民主主义社会而奋斗。经过国民经济恢复工作，一系列政治思想运动，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实施，这个社会

¹ 李新《反右亲历记》载肖克等著《我亲历过的政治运动》第22、27页

²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97页

主义制度中的政治体制、经济体制和文化科技体制中存在某些弊端逐渐暴露出来。毛泽东在总结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中就初步涉及到了，但没有深入探索。比如：1956年4月5日、12月29日，由《人民日报》编辑部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讨论而写成的《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简称《一论》、《再论》）。《一论》承认：“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也是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中进行的。”“还存在着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¹在这里，只是提了一下存在着矛盾。

《再论》进一步承认：“在基本制度适合需要的情况下，在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在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也仍然存在着一定的矛盾。这些矛盾表现成为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某些环节上的缺陷。这些矛盾，虽然不需要用根本性质的变革来解决，仍然需要及时地加以调整。”²由于时代限制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领导集体的认识局限，不可能客观地、实事求是地总结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和斯大林犯错误的真正原因，反而从各方面为斯大林的错误进行辩护和开脱罪责。

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讲话承认：“国家机构中某些官僚主义作风的存在，国家制度中某些环节上缺陷的存在，又是和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相矛盾的。我们今后必须按照具体的情况，继续解决上述的各种矛盾。”³上述引文中承认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中存在某些缺陷，但没有进一步分析。毛泽东认为这些缺陷只是思想作风、工作作风问题。因此，毛泽东提出整风，即整掉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作风。并号召党外人士帮助党整风，由于党外人士和知识界响应毛泽东的号召，向党的各级干部、各级组织中存在的问题，以及向苏联学习等存在的问题提出建议和批评。比如：鸣放期间，北京大学学生王书瑶的大字报写道：“斯大林错误的原因是什么呢？是因为他骄傲了。但是他可以破坏法制，进行独裁，进行疯狂的屠杀的保证又是什么呢？无论苏联共产党。也无论是中国共产党，都未能给出令人满意的答复，因为他们都不免统治者的共同弱点，他们害怕说出问题的原因是由于共产党对国家政权的绝对控制，国家权力的高度集中，正是

¹ 《人民日报》1956年4月4日

² 《人民日报》1956年12月29日

³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74页

由于这种高度集中的权力，才使斯大林在后期可以胆大妄为，犯出一切错误。”北京大学学生张景中在辩论会上发言：“到处无原则地强调民主集中制，过去破坏法制的行为很多，主要的要从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来根除三害。”王存心的大字报说：“我在用三害一词时，联想到的是共产党在国家机关中权力过大（指以党代政之类），法制不健全，令人窒息的思想统治，以及部分党员的恶劣作风。所谓三害其实质是：人民的民主权利未得到足够的保障，社会主义民主没有充分发扬。”¹这几位学生的言论，北京大学社会主义教育委员会编辑将其定性为右派言论。当局还未能认识或有意不提出这项任务，所以把现有提出政治体制、经济体制改革的意见错误认为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言论。实际上学生的言论是沿着毛泽东指出的国家制度中存在某些缺陷的观点，对斯大林犯错误的原因“进一步探讨和发挥”。学生们确实抓住了这些错误的弊端以及斯大林犯错误的根源是权力高度集中和无原则强调民主集中制，抓住了消除三害根源在于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和健全社会主义法制。

先就权力高度集中进行一些探讨。我国权力高度集中形成的原因，与我国历史上封建专制制度传统和苏联共产党的个人过度集权影响有关。建国初期，国民经济遭到战争严重破坏，国际帝国主义对我国实行经济封锁，阶级敌人在反抗。早在革命战争年代，实行党的权力集中统一是必要的，建国初期，国家体制实行权力高度集中也是必要的，随着战争创伤被医治，国民经济形势基本好转，国内外阶级斗争有所缓和，政权已经稳定和巩固。在这样形势下，权力高度集中应有所削弱，应该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建立、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可是，对已形成的权力高度集中的体制还在加强。

权力高度集中体制产生些什么弊端呢？它产生官僚主义、宗派主义、特权思想、独断专行等等弊端。在鸣放初期，党外人士、社会各界人士、大学生等，针对上述弊端深挖斯大林错误的根源，提出了不少意见和建议，并建议如何克服，凡是提过意见和建议的人，在反右期间，大都以反党、攻击党、污蔑党等罪名被打成右派分子、中右分子。凡是对这些弊端探讨较深，挖出弊端根源的人，就扣上反对党的领导，取消和削弱党的领导，否定党对国家的领导、攻击、

¹ 引自《右派论点选辑》第22、77、78页，北京大学社会主义教育委员会编，1957年9月

污蔑社会主义制度和反苏等等大帽子，而被打成右派分子。

权力高度集中还产生以党代政、以言代法、以权代法、以党压法等现象，还削弱政府职能、限制政府工作人员的积极性发挥、排斥普选，导致干部任免制和终身制等等，鸣放期间，提这方面的意见和建议最多，当然也有偏颇、过头的意见。在反右期间，按照毛泽东6月19日公开发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指出辨别香花和毒草的六条标准，对号入座，划了大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

权力高度集中相应的要求控制思想文化，要求舆论一律。反右派前后，广大知识分子要求领导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广开言路，要求新闻、舆论有所放开，向领导提出许多建设性的、改革开放的意见，后来按照毛泽东的舆论一律的观点，许多鸣放的人大都被打成右派分子。

总之，人们出于热爱党、热爱祖国，希望党整风，克服和解决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等作风问题，人们响应毛泽东的号召，向着毛泽东指引的“三害”开火，向“国家制度某些环节上缺陷存在”进行探索，有识之士找到产生“三害”的根源、斯大林犯错误的根源，探索到了政治体制中存在的某些弊端。而鸣放、探讨出来的意见和建议，超出了领袖所允许作风的范围，探讨到了不该去探讨的范围。结果，领袖说，你们这些人想夺权，要推翻社会主义制度、要颠覆无产阶级专政，企图复辟资本主义制度，而把这些探讨体制中弊端的人打成右派分子。这种对国家制度中存在某些弊端、斯大林犯错误根源的探讨而被打成右派分子，也是反右派斗争犯错误的一个更为根本的间接深层次原因。

然而，权力高度集中的弊端，当时不但没有解决，反右以后反而更加发展了，在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方针的指导下，权力高度集中变为权力过分集中，由阶级独裁走向个人独裁，最后发动文化大革命。“文革”被否定了，但权力过分集中并没有很完满解决和克服，至今仍是政治体制改革中一个难点，一个很敏感的禁区。这是犯错误的制度根源，要避免犯错误就要从制度上来解决。可事情是不断变化的，人类总是要进步的，问题迟早是要解决的。1980年8月18日，邓小平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中回忆说：“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毛泽东同志就说过，这样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他虽然认识到这一点，

但是由于没有在实际解决领导制度及其他一些原因。”¹邓小平之所以引证此话，是想论证制度的重要性。从这段话里看出，毛泽东是明白问题所在的。英、法、美是宪政国家，有高度的民主和健全的法制，如果有谁像斯大林那样滥用权力，早就‘被赶下台’了。可见，要避免重蹈斯大林的覆辙，答案本来是现成的。毛泽东没有按这个思路探讨下去，是出于某种政治需要考虑。²如果毛泽东这段话当时公布、公开，或许党史又要改写了。不过，对毛泽东来说，宁肯维护斯大林模式，也决不能容忍中国实行英、法、美式的民主，这是毛泽东式的社会主义制度所决定的。

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的某些失误。中共建党初期，成员主要是知识分子，大革命失败后，党转入农村，建立根据地和发展武装力量，这时吸收大批农民入党，党的领导骨干逐渐变为以农民出身居多，从成分看，中共已成为一个农民党。抗日战争时期，大批知识分子投奔延安。1939年以后，毛泽东发表一系列文章、著作和书信，开始纠正知识分子在党内低于工农的地位。民主革命胜利后，共产党进了城。新中国成立后，继续解放战争时期对知识分子的政策，制定了“团结、教育和改造”知识分子的政策，这些基本上是正确的，从五十年代中期起，对知识分子问题又开始失误。

第一，在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上的正确观点及其变化。毛泽东在《大量吸收知识分子》、《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等著作中，肯定了知识分子和学生并不是一个阶级或阶层³

1948年5月21日，毛泽东写信给周恩来、胡乔木，谈到了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中央根据毛泽东的信，对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作了解释：“知识分子不应该看做一种阶级成分。知识分子的阶级出身依其家庭成分决定，其本人的阶级成分依本人取得主要生活来源的方法决定。”“例如家庭属于地主的是地主出身，家庭属于中农的是中农出身等。知识分子本人的阶级成分，依本人取得主要生活来源的方法决定，例如本人当地主的是地主，本人当资本家的是资本家，本人当自由职业者的是自由职业者，本人当职员的是职员，本人当军人的是军人等。知识分子依靠家庭供给主要生活来源者，其本人成分亦依其家庭成分决定。把知识分子看做一种单独的成分

¹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33页

² 参见王若水著《新发现的毛泽东》上册，第253页

³ 参见《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12页

是不对的，把劳动人民子弟在学校读过书的分子（所谓毕业生）当作一种坏的成分更是不对的。”“所谓自由职业者，是指一切不剥削他人的医生、教员、律师、新闻记者、作家、艺术家等。这种自由职业者，为了执行自己的业务，有时雇佣助手或雇工助理家务劳动，这种雇工行为，不算入剥削者范围之内。”¹上述的文件精神是毛泽东对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正确表达，这个观点完全符合马克思主义关于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的论断。

对知识分子阶级属性的正确观点开始发生变化。民主革命胜利前夕，1949年3月5日，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提出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说：“要求我们党去团结尽可能多的能够同我们合作的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它们的知识分子和政治派别。”²七届二中全会，规划了由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工人阶级同资产阶级已成国内的主要矛盾，资产阶级成为革命的对象，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制定“团结、教育和改造”的政策。

1949年12月30日，教育部副部长钱俊瑞解释“团结、教育、改造”方针政策时说：“毛泽东告诉我们：对于旧文化工作者、旧教育工作者和旧医生们的态度，是采取适当的方法教育他们，使他们获得新观点、新方法，为人民服务。”³很清楚，这个“团结、教育、改造”的政策是针对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而制定的。

1950年6月6日，在党的七届三中全会上，1951年10月23日，政协一届三次会议上，毛泽东发出对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号召，同年11月，中共中央部署“在所有大中小学的教职员中和高中学校以上的学生中，普遍地进行初步的思想改造的工作……在大中小学的教职员中和专科学校以上（即大学一级）的学生中，组织忠诚老实交清历史的运动，清理其中的反革命分子。”⁴这是著名的思想改造运动。这次思想改造运动是贯彻落实“团结、教育、改造”的知识分子政策的措施之一。其积极作用是：大批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政治立场开始转变，初步树立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但副作用主要表现在简单粗暴。后来，毛泽东也承认：“过去的思想改造是

¹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7册，第176—177页

²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438页

³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90页

⁴ 徐达深主编《共和国史记》，吉林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552—553页

必要的，收到了积极的效果。但是在做法上有些粗糙，伤了一些人，这是不好的。这个缺点，今后必须避免。”¹实际上，缺点、失误还在继续发展。

1953年6月15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批评了刘少奇等人“右倾观点”，说：“我们现在的革命斗争，甚至比过去的武装革命斗争还要深刻。这是要把资本主义制度和一切剥削制度彻底埋葬的一场革命。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的想法，是不符合实际斗争情况的，是妨碍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²在这里，毛泽东放弃了关于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思想，要进行社会革命转变，这是七届二中全会关于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的延续和发展。

过渡时期总路线实施过程，就是资本主义所有制被消灭和改造的过程，就是资产阶级及其思想被消灭、被批判和改造的过程，也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被改造、受批判的过程。1953年8月13日，毛泽东批判了薄一波的资产阶级思想，9月，毛泽东批判了梁漱溟的反动思想，1954年10月，毛泽东批评了俞平伯的唯心主义思想，批判了胡适实用主义思想、胡风的文艺思想、揭发了胡风“反革命集团”等，这些思想政治批判运动在知识分子中进行，震动面、影响面都是很大、很广泛，其负面作用大于正面效果，留下很大的后遗症。

第二，在知识分子问题上产生重大失误。失误之前，有短暂的知识分子黄金时期。这就是1956年1月，周恩来代表党中央作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他站在要建设社会主义事业高度，重视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地位和作用，他说：“目前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的主要倾向是宗派主义”，“低估了他们在我国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重大作用，不认识他们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在社会主义时代，比以前任何时代都更加需要充分地提高生产技术，更加需要充分地发展科学和利用科学知识……除了必须依靠工人阶级和广大农民的积极劳动以外，还必须依靠知识分子的积极劳动，也就是说，必须依靠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密切合作，依靠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兄弟联盟。”³在这里，明确了绝大多数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第一次正确表述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和充分肯定知识分

¹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85页

²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82页

³ 《周恩来选集》下册，第166、159—160页

子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的作用。这是五十年代中期，知识分子的春天，好景不长。正在贯彻落实知识分子会议精神过程中，1957年1月以后，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这是1964年公开发表时，做了大量修改，下面引文是修改后的引文）等著作中，站在阶级斗争的角度，对周恩来作的《报告》提出不同意见或批评。

首先对安排和改造问题，毛泽东批评说：“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现在有一种偏向，就是重安排不重改造，安排很多，改造很少。”又认为，“如果社会主义改造只改造别人，改造地主、资本家，改造个体生产者，不要改造知识分子，那就错误了。知识分子也要改造。”¹

其次，对阶级斗争的形势估计，毛泽东提出不同看法，他说：“这五百万左右的知识分子，绝大多数人都是爱国的。”“对于我们的国家抱敌对情绪的知识分子是极少数。”“他们留恋旧社会。一有机会，他们就会兴风作浪，想要推翻共产党，恢复旧中国。”“这种人在政治界、工商界、文化教育界、科学技术界、宗教界都有，这是一些极端反动的人。这种人在五百万左右的人数中间，大约只占百分之一、二、三。”²后来反右运动所抓的右派分子人数的比例高达百分之十。

再次，提出划分知识分子的世界观标准，毛泽东说：“我们现在的大多数的知识分子，是从旧社会过来的，是从非劳动人民家庭出身的。有些人即使是出身于工人农民的家庭，但是在解放以前受的是资产阶级教育，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他们还是属于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³否定了知识分子中绝大多数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的正确论断。在这里就提出了以世界观来划分知识分子的标准。

最后还提出抓思想斗争，他说：“我们同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还要进行长期的斗争。不了解这种情况，放弃思想斗争，那就是错误的。”“思想问题现在已经成为非常重要的问题。各地党委的第一书记应该亲自出马来抓思想问题。”⁴

上述提出的问题和批评，基本上否定了周恩来《报告》中已经

¹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38、407页

²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04、405页

³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09页

⁴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17、418页

得到初步解决了的知识分子问题，这样使得知识分子问题产生重大失误，混淆了几个界限：

其一，团结、教育、改造的知识分子政策，其对象主要应该是从旧社会过来的二百万左右的知识分子，现在却错误地把党内的知识分子和新中国自己培养的三百万左右的知识分子也包括在这个方针之内，就这样，党内知识分子和新知识分子也成了改造的对象。

其二，改造旧知识分子的标准，就是接受共产党的领导，为新中国服务、为人民服务，是个政治立场的转变。新中国自己培养的知识分子不存在这个立场转变问题，说要改造，只能是提高修养、世界观的改造。决不能把政治立场的转变和世界观的改造混为一谈。政治立场的改造是解决为谁服务的问题，世界观的改造是解决为谁服务得更好、更有效率的问题。

其三，用世界观标准来划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工人阶级的知识分子是不正确的。毛泽东曾承认，知识分子是脑力劳动者，不是一个独立的阶级。以为谁服务作标准，就成为那个阶级的知识分子。新中国成立后，二百万左右的旧知识分子经过几年改造，已经为人民服务了，他们之中绝大多数已是工人阶级的一员了，现在提出世界观标准，认为现在的知识分子，解放前受的是资产阶级教育，世界观是资产阶级的，这样就把新旧知识分子都称作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同时强调，“世界观的改造，要有一个长期的过程。”这样一来，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队伍越来越大，改造的时间越来越遥遥无期，改造成工人阶级知识分子越来越渺茫。这个世界观标准成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长期改造的理论依据之一。

其四，继经济革命之后，现在重点要抓思想斗争，而且要党的第一书记亲自抓。这不是把党的工作重点回到以抓阶级斗争方面来吗。这既阻碍了党的工作重点向经济建设方面转移，又否定了周恩来《报告》中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

在3月12日《讲话》之后，5月15日，毛泽东在《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指出，大批知识分子新党员有严重的修正主义思想，并同社会上的右翼知识分子亲如弟兄。6月8日，毛泽东亲自发动了反右派斗争，撰写大量文章、起草很多指示来指导反右派斗争。主要的有以下几点：1、反右派斗争的矛头是对准新、旧知识分子和党内外（青年团员、大学生）知识分子；2、反右斗争是一场夺取部分权力的政治斗争，是夺取知识分子在政权中的权力；3、定性右派分子为敌我矛盾，因而到处搜罗党内外知识分子中的右派分子；4、在

反右期间，统计出六亿人口中有反社会主义的人（包括知识分子）共计六千万；5、通过反右派斗争使知识分子依附于社会主义公有制解决吃饭问题，接受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改造成为工人阶级知识分子。总之，企图通过反右派斗争这种社会主义思想领域中的阶级斗争形式，达到从思想路线上巩固无产阶级政权，彻底改造资产阶级世界观，使知识分子成为工人阶级知识分子的目的。这是一个主观的良好愿望。可是给知识分子带来的是一场灾难，其中给五十五万右派分子及其家属带来的是一场浩劫。

第三 毛泽东对知识分子失误的根源。毛泽东从青年时期对知识分子，特别对大知识分子既羡慕又不满。他在延安时期同斯诺的谈话中就暴露出对知识分子强烈的不满。他说：“我的职位低微，大家都不理我。我的工作中有一项是登记来图书馆读报的人的姓名，可是对他们大多数人来说，我这个人是不存在的。在那些来阅览的人当中，我认出了一些有名的新文化运动头面人物的名字，如傅斯年、罗加伦等等，我对他们极有兴趣。我打算去和他们攀谈政治和文化问题，可是他们都是些大忙人，没有时间听一个图书馆助理员说南方话”¹

毛泽东早年在北大旁听胡适的课。有一次，他举手要提问题。胡适觉得这个年轻人不像正式学生，问他：你注册了吗？毛回答没有，于是胡适拒绝回答他的问题。1942年延安整风时，毛泽东发泄对知识分子的不满。在改造我们的学习的讲演中说，“学生学习书本知识是并不难的，甚至可以说是最容易的，相反，大师傅做饭倒要困难些。要把柴米油盐酱醋等件合起来创造成吃的东西，这是并不容易的事情……火大了要焦，盐多了要发苦（笑声），煮饭做菜真正是一门艺术。书本上的知识呢？如果只是读死书，那么，只要你认得三五千字，学会了翻字典，手中又有一本什么书，公家又给你小米吃，你就可以摇头摆脑地读起来。书是不会走路的，也可以随便把它打开或者关起，这是世上最容易办的事情，这比大师傅做饭容易得多，比他杀猪更容易。你要捉猪，猪会跑（笑声）；杀它，它会叫（笑声）。一本书摆在桌子上既不会跑，又不会叫（笑声），随你怎样摆布都可以，世界上哪有这样容易的事呀！那些将马列主义当宗教教条看待的人，就是这种蒙昧无知的人。对于这种人，应该老实地对他说，你的教条没有什么用处了，说句不客气的话，实在比屎

¹ 斯诺《西方漫记》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127页

还没有用。我们看，狗屎可以肥田，人屎可以喂狗。教条吗，既不能肥田，又不能喂狗，有什么用处呢（笑声）。¹

上面这些话在《毛泽东选集》中删掉了，只保留像“……主观主义的方法，是共产党的大敌，是工人阶级的大敌，是人民的大敌，是民族的大敌”。²

在《整顿党的作风》中，毛泽东批评知识分子说：“许多所谓知识分子，其实是比较地最无知识的，工农分子的知识有时倒比他们多一点。”³在这里，把知识分子讽刺挖苦得太过份了。

毛泽东掌握全国政权后，做出高姿态，盛情相邀梁漱溟参加政府工作，梁未表态。毛又动员说：“我们非常欢迎梁先生能参加新中国的运筹和建设”。梁回答说，“主席，像我这样的人如果先在局外呆一下，不是更好吗？”毛当然对梁生气，待到1953年，梁因给政府提出意见，毛泽东大骂梁漱溟一通。⁴

1956年8月30日，毛泽东在八大预备会议上又严厉批评了王明、李立三。他在动员说服党内同志还是要选王明、李立三当中央委员时说：“问题是我们这个社会有这么多小资产阶级，我们党内有这么多小资产阶级动摇分子，知识分子中间有许多这样动摇的人，他们要看这个榜样”。选不选王明，李立三，“关系到的是党内成百万容易动摇的出身于小资产阶级的成份，特别是知识分子，看我们对王明、李立三是怎样一种态度。”由此看出，毛泽东认为党内知识分子有许多是小资产阶级动摇分子，“归到小资产阶级范畴比较适合。”⁵1956年9月25日，毛泽东在同拉美一些党的代表谈话中，不厌其烦地批评瞿秋白、李立三、王明为代表三次“左”倾机会主义路线，认为王明是既犯“左”倾，又犯右倾的反面教员，“我们还有一个很好的反面教员，就是李立三。”⁶

1957年1月，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中警告民主人士说：“至于梁漱溟，彭一湖、章乃器那一类人，他们有屁就让他们放，放出来有利，让大家闻一闻，是香的还是臭的，经过讨论，争取多数，使他们孤立起来。他们要闹，就让他们闹够。

¹ 王若水遗著《新发现的毛泽东》（上）第79-80页

²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20页

³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37—838页

⁴ 参见《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107-115页

⁵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02、304页

⁶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07页

多行不义必自毙。”¹凡是没有顺从毛泽东的意见和事情，有机会就要训斥一通。1957年整风期间，毛泽东动员知识分子鸣放，给毛泽东本人提出不少意见，最为使他大吃一惊的有以下意见：张奚若批评说：“好大喜功，急功近利，鄙视过去，迷信将来。”罗隆基说，“无产阶级的小知识分子怎么能领导小资产阶级的大知识分子呢？”还有储安平的‘党天下’以及不知谁提出‘轮流做庄’等，都使毛泽东大为恼火。因为，待反右结束时，这些给毛泽东提过意见的人，轻则受到批评。毛泽东看了张奚若的意见说，‘好大喜功，何错之有？我们就是要好社会主义之大，喜社会主义之功！’²毛泽东如此解释，就放过张奚若了。重则划为右派，“现在要给什么人小鞋子穿呢？现在我们给右派穿。给右派一点小鞋穿是必要的。”还批判罗隆基，“罗隆基说，无产阶级的小知识分子怎么能领导小资产阶级的大知识分子！他这个话不对。他说他是小资产阶级，其实他是资产阶级，无产阶级的‘小知识分子’，就是要领导资产阶级的大知识分子。”毛泽东在另一处又挖苦道：“我看，不仅是无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就是大字不认得几个的工人、农民，也比他‘罗隆基高明得多’。”“我历来讲知识分子是最无知识的。”³

在这里，用胡乔木的话转述毛泽东对知识分子的看法。胡乔木说：“经过反右派斗争以后，在毛主席头脑里，知识分子就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没有什么不是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一直到最后都没有改变过。”又说，“毛主席对知识分子有很大的敌对的心理。他本来跟资产阶级的一些代表人物、民主党派的一些代表人物、知识分子的一些代表人物，经常有个人接触，经过一九五七年，他感觉到这些人不大靠得住了。……所以，一个思想的方向、思想的潮流如果搞错了，在社会主义社会里面，确实可以发生严重的影响、损失、灾难。”⁴这是中共中央主管意识形态的胡乔木逝世后出版的书，书中揭示毛泽东对知识分子有很大的敌对的心理，由此看出，处理知识分子问题失误的根源早已存在。反右派斗争不过是敌对心理的一次大表露。

¹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55页

² 转引叶永烈《反右派始末》第123页

³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51、452、479、484页

⁴ 《胡乔木谈中共党史》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20—121页

综上所述，自1939年以后，纠正了对知识分子的种种偏见，取得民主革命胜利。新中国成立后，改造旧知识分子，培养新知识分子，使他们都为人民服务，这样，新旧知识分子中的绝大部分变成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是用脑力劳动的工人。由于按世界观标准，毛泽东认为知识分子以前受的是资产阶级教育，世界观是资产阶级的，所以否定了周恩来关于知识分子中绝大多数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的正确论断，一下子把知识分子变成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变成社会主义革命的对象。从此，知识分子的苦难更加深重，更加悲惨。分析其深层原因，自从七届二中全会决定由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国内主要矛盾，由中国人民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主义的矛盾转向工人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从这时开始，资产阶级成为消灭的对象，资产阶级分子成为革命的对象，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成为改造的对象。自过渡时期路线实施开始，从经济上消灭资本主义后，与此相适应，在政治思想批判资产阶级腐朽思想，从意识形态领域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影响。知识分子在历次政治思想，特别是反右派运动和右派分子改造中所受的苦难、冤枉等，都是过早地实行社会主义革命、过早地放弃关于新民主主义社会所造成的。正如邓小平总结经验教训指出：“从一九五七年下半年开始，我们就犯了左的错误。”“就是对内封闭，对内以阶级斗争为纲，忽视发展生产力，制定的政策超越了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¹这段话是对知识分子问题所产生的重大失误，对右派分子所产生的一切苦难最深层根源的切中要害的揭示。由此可见，对知识分子问题处理失误、失当成为毛泽东犯严重错误的主要原因之一。

处理资本主义的失误。中国民主革命的任务是打倒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民主革命胜利之后，就要向社会主义过渡，这个过渡时期的任务一方面继续完成民主革命时期的任务，另一方面要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其对象一般说来，就是要消灭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就中国来说，对资产阶级、资本主义如何处理是一个非常复杂而带有全局性的重大问题。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等人自革命开始，就同“左”的、右的错误进行了斗争，经过失败，总结经验教训，提出正确处理中国的资本主义、民族资产阶级的问題，但后来还是产生了重大失误。

正确对待和处理资本主义问题有一个认识过程。毛泽东在四十

¹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69页

年代《新民主主义论》一书说：“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国营经济是社会主义的性质，是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力量，但这个共和国并不没收其他资本主义的财产，并不禁止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¹这里提出了有限制的发展资本主义的思想。1945年，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报告中说：“拿资本主义的某种发展去代替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压迫，不但是一个进步，而且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它不但有利于资产阶级，同时也有利于无产阶级，或者说更有利于无产阶级。现在的中国是多了一个外国的帝国主义和一个本国的封建主义，而不是多了一个本国的资本主义，相反地，我们的资本主义是太少了。”²这里提出，我国的资本主义是太少了，意思是说，中国还要发展有利于无产阶级的资本主义生产。毛泽东接着在《对〈论联合政府〉的说明》讲话中指：“这个报告（《论联合政府》——引者）与《新民主主义论》不同的，是确定了需要资本主义的广大发展。”³1949年3月5日，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中指出：“……由于中国经济现在还处在落后状态，在革命胜利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还需要尽可能地利用城乡私人资本主义的积极性，以利于国民经济的向前发展。在这个时期内，一切不是于国民经济有害而是于国民经济有利的城乡资本主义成分，都应当容许其存在和发展。这不但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经济上必要的。”⁴

根据毛泽东对资本主义的正确认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起到临时宪法作用的《共同纲领》的总纲中载入了如下条款：“保护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经济利益及其私有财产，发展新民主主义的人民经济，稳步地变农业国为工业国。”在“经济政策”中规定：“经济建设的根本方针，是以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政策，达到发展生产，繁荣经济之目的。”“国家应在经营范围……调剂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农民和手工业者的个体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使各种社会经济成分在国营经济领导之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以

¹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49页

²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83—1084页

³ 《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中央文献出版社第100页

⁴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32—1433页

促进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¹这就是说，毛泽东对资本主义的认识在建国后的《共同纲领》中成为国家经济的大政方针。在党的七届三中全会的书面报告中提出“保存富农经济的政策”，批评“有些人认为可以提早消灭资本主义实行社会主义，这种思想是错误的，是不适合我们国家的情况的。”²在《不要四面出击》讲话中指出：“要在工人阶级领导下，以工农联盟为基础，把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团结起来。民族资产阶级将来是要消灭的，但是现在要把他们团结在我们身边，不要把他们推开。我们一方面要同他们作斗争，另一方面要团结他们。”“使民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中的绝大多数人不反对我们。”³这些都是正确对待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的思想。这些也符合恩格斯1895年3月6日发表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中所写的导言中提出的，“历史清楚地表明，当时欧洲经济发展的状况还远没有成熟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程度”的论断⁴

根据上述的正确思想、观点，毛泽东对民族资产阶级采取既团结又斗争的政策，对民族资本主义采取既发展又限制的政策，如果过早或提前消灭资本主义就要犯“左”倾错误，如果放任不限制资本主义发展就要犯右倾错误。

毛泽东对资本主义的失误同样有一个演变过程。1952年6月6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起草的一个文件上的批语：“在打倒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以后，中国内部的主要矛盾即是工人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故不应再将民族资产阶级称为中间阶级。”⁵实际上这个批语，是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指出的：“中国革命在全国胜利，并且解决了土地问题以后，中国还存在着两种基本的矛盾。第一种是国内的，即工人阶级和资本主义的矛盾”⁶。也就是说，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由基本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这是毛泽东改变他过去对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正确认识的开始。1953年6月15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十年到十五年或者更多一些时

¹ 姜士林主编：《世界宪法全书》青鸟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70—71页

²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18、19页

³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3—24页

⁴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597页

⁵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65页

⁶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34页

间内，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宣布“我们现在的革命斗争，甚至比过去的武装革命斗争还要深刻。这是要把资本主义制度和一切剥削制度彻底埋葬的一场革命。”严厉批评“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的右倾观点。”¹在这里，毛泽东宣布实行社会主义革命，革命的任务是彻底埋葬资本主义制度和一切剥削制度，明确指出“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是右倾的表现。1953年8月，毛泽东在一个重要批示中指出，“这条总路线的许多方针政策，在1949年3月的党的二中全会的决议里就已提出，并已作了原则性的解决。可是许多同志却不愿意遵照二中全会的规定去工作……甚至公然违反二中全会的原则。”²究竟是谁违反了二中全会的原则呢？请看毛泽东在二中全会关于对资本主义的看法，他说：“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代表人物，由于受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或限制，在人民民主革命斗争中常常采取参加或者保持中立的立场。由于这些，并由于中国经济现在还处在落后状态，在革命胜利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还需要尽可能地利用城乡私人资本主义的积极性，以利于国民经济的向前发展。在这个时期内，一切不是于国民经济有害而是于国民经济有利的城乡资本主义成分，都应当容许其存在和发展。这不但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经济上必要的。”³这是毛泽东正确对待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的观点或原则。

刘少奇等人在民主革命胜利后，积极贯彻落实毛泽东对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的正确观点或原则所制定的方针政策。时间不过四年，毛泽东又宣布要彻底埋葬资本主义制度和一切剥削制度。毛泽东这时改变了对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制度的看法，是他本人违反了自己在七届二中全会对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的正确观点，批评刘少奇的“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是错误的。1953年12月，经中共中央批准的“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中提出：“实现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就是要扩大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和合作社员的集体所有制，把农民和手工业者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私人所有制改造为合作社员的集体所有制，把以剥削工人阶级的剩余劳动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私人所有制改造为全民所有

¹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81—82页

²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89页

³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32—1433页

制。”“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的实质，就是使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所有制成为我国国家和社会的惟一的经济基础。”这也就是中国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要“完全消灭城乡资本主义的成分。”¹1953年是毛泽东对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从正确认识到失误的一年，是“完全消灭城乡资本主义的成分”开始的一年。

实行过渡时期总路线的两年后的1955年10月，毛泽东在党的七届六中全会上谈到《农业合作化和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关系》问题时说：“农业合作化使我们在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基础上，而不是在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基础上，巩固了同农民的联盟。这就会使资产阶级最后地孤立起来，便于最后地消灭资本主义……就是要使……资本主义绝种，小生产也绝种。”²从1953年到1956年的实践，实现了农业和手工业的合作化，实现了资本主义工商业全部公私合营，这就达到了资本主义绝种，小生产也绝种的目的。总之，实现过渡时期总路线过程，也就是资本主义绝种的过程，小生产绝种的过程。本来要十年或十五年实现的过渡时期的总任务却提前十二年完成了。这个对资产阶级，资本主义和小生产提前处理的失误是毛泽东以后一切失误和犯错误的总根源之一。1981年，党承认“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也有缺点和偏差”，“对于一部分原工商业者的使用和处理也不很适当”。同时也承认“对农业合作化及手工业和个体商业的改造要求过急，工作过粗，改造过快，形式也过于简单划一，以致在长期间遗留了一些问题。”³党中央新领导人指出的前人的缺点、偏差、错误，实际上是毛泽东在处理社会主义改造的指导思想上失误的反映。在对待资本主义问题，至今还不能说完全处理妥当了，处理好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关系是个重要的理论课题和实际课题。

毛泽东在要使“资本主义绝种、小生产也绝种”实践中产生的后果是严重的、深远的。直接后果是在社会主义改造后，只存在两种经济成分即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这种单纯从生产关系所有制上的革命，同当时中国时社会生产力水平是极不相适应的，正如

¹ 《社会主义教育课程的阅读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一编上第347—348、342页

²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198页

³ 《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800、801页

于光远所说的：“结果是中国经济长期停滞不前。”¹间接后果是失误之后引起的不满。这些不满，人们都埋在脑子里，并没有马上表现出来，就是在波匈事件发生后，毛泽东说：“倒是乡下的地主、富农、城市里的资本家、民主党派，多数还比较守规矩，他们在波兰、匈牙利闹风潮的时候还没有闹乱子。”²待1957年5月整风开始后，中共中央统战部和国务院第八办公室联合邀请全国工商联和民主建国会的主要负责人召开座谈会，会议由李维汉主持，参加出席的有北京参加全国工商联秘书长会议的各省市代表以及北京、天津两市工商联的主要负责人，座谈会从5月5日到6月8日结束。

在这个座谈会上与会者们鸣放出了方方面面的不满和意见，李维汉最后总结说：“大多数是正确的，是善意的；有一部分是错误的，其中一部分错误的性质是严重的。”对这次座谈会，李维汉回忆说：“工商界人士座谈会开始于5月中旬。这时中央要反右的方针在我脑子里已经清楚了。当时胡子昂从西北视察回来，在会上讲了上海一批工厂搬迁西北、办得不好。黄炎培从外地考察回来，也讲了一篇类似的话，我看到如果让他这样讲下去，将来要划右派不好办，就宣布休息，请孙起孟去做黄炎培的工作，保护了他，工商座谈会期间，有人提出真正的资本家与会不多，代表性不够，于是又不断扩大规模，找了北京的吴金粹、天津的董少臣、上海的李康年等一些人到会鸣放，后来这些人都被划为右派。这个做法实际上是‘引蛇出洞’，把对敌斗争的一套用于人民内部，混淆了敌我。这个教训是深刻的。”³由此可知，工商界人士的鸣放是由统战部、国务院第八办执行毛泽东的“引蛇出洞”策略的结果，工商界人士在被邀请的座谈会上提了一些意见，结果其中有许多人被打成右派分子。章乃器被看做资产阶级、工商界的代言人之一，毛泽东称章乃器是右派的老祖宗之一。⁴李维汉保了黄炎培不当右派，却使吴金粹、董少臣、李康年当了右派。省市一级较为知名的有毕鸣岐、荣子正、阎少青、彭一湖等四十多人。反右深入之后，工商界划了多少右派分子就不得而知了。总之，工商界中“不少人在后来政治运

¹ 于光远《从“新民主主义社会论”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8页

²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33页

³ 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下，第834—835页

⁴ 参见《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48页

动中受到歧视，有的还受到过不应有的打击，吃了不少苦头。”¹以上就是处理资本主义失误的后果，极大的影响了我国的经济的发展。

三、理论认识上的原因

上面探讨了直接现实原因和间接深层原因，下面探讨理论认识上的原因，即更深层次上的原因。众所周知，犯错误理论认识上的原因，无论对领导人，还是对干部都有一个由浅入深，由现象到本质，由局部到全面的循序渐进的过程。一次认识正确了，随着时间转移，认识跟不上去，可能超前或落后于实际。同时，认识问题是个变动不居的发展过程。如果人的认识不随着事物的变化而变化，如果人的认识不全面，如果人懒于学习，满足已有的理论知识，这就有可能犯各种各样的错误。因此探讨犯错误的理论认识上的原因是非常必要的，为以后吸取教训是有所帮助的。

对唯物史观认识上的偏颇。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为我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制定了科学理论和方法论，其中唯物史观是马克思的一大发明，他在1859年写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说：“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的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活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来到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在考察这些变革时，必须时刻把下面两者区别开来：一种是生产的经济条件方面所发生的物质的、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指明的变革，一种是人们借以意识到这个冲突并力求把它克服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哲学的，简言之，意识形态的形式。我们判断一个人不能以他对自己的看法为根据，同样我们判断这样一个变革时代也不能以它的意识为根据；相反，这个意识必须从物质生活的矛盾中，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现存冲突中去解释。无论哪一个社

¹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第432页

会形态，在它们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存在的物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所以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形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做是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是社会生产过程的最后一个对抗形式，这里所说的对抗，不是指个人的对抗，而是指从个人的社会生活条件中生长出来的对抗；但是，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胎胞里发展的生产力，同时又创造着解决这种对抗的物质条件。因此，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就以这种社会形态而告终。”¹这段话是马克思对唯物史观最完整而严密的经典表述。马克思主义整个思想体系就是竖立在这段话即唯物史观这个基础之上的，而唯物史观是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的核心。《序言》中有几条最重要原理应该重视：

第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过程”的原理，这是马克思关于一切历史事件的“物质动因”的学说。

第二，“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的原理，这一原理是唯物史观区别于一切唯心史观的最重要的原则和最根本之点，也是唯物史观不可动摇的基石之一。

第三，提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生产力的发展必定要求生产关系作出相应的变革。上层建筑要随着经济基础的变革或慢或快地发生相应的变革。这一原理体现了生产力发展是引起一切社会变革的一元论观点。同时需要牢记马克思说的，“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们所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的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这段话说明了人们不能随意地拔高或压抑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一定要按照生产力，生产关系自身运动的规律去从事革命和建设。

第四，提出“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

¹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2—83页

至少是在形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发生”的论断。这里告诫人们：解决任何任务，从事社会变革，都要遵循客观条件，实际情况因地制宜去革命或工作，决不能主观盲目去蛮干，这样去做会碰钉子的，会吃大亏的。

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和毛泽东都非常重视唯物史观在中国的传播和研究，并且运用于中国的实际，毛泽东将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使中国民主革命取得成功。在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对唯物史观的理解产生某些偏颇，主要表现在过分运用专政职能，在建国初期限对反对者进行镇压，是应该的，不镇压不能巩固政权。自1953年以后进行社会主义三大改造，让资本主义绝种，让小生产也绝种，改造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这些作法都违背了马克思说关于“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形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发生”的论断，运用政权强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手工业和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历史证明，这三大改造不能说是成功的，后来邓小平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也说明这一点。

1957年夏季，毛泽东发动反右派斗争，将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职能从抓经济建设，抓提高生产力的职能立即转向用党政主要力量去抓反右派斗争，抓反右派运动（当然党内外的高级干部向毛泽东提议，不必要发动一场反右派运动，毛泽东根本听不进去），运用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机器对右派分子实行武器的批判，这样就违背和颠倒了和平建设时期国家职能，而且长期抓镇压职能，长时期忽视抓发展生产，提高生产力，经济管理文化建设，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职能，这是毛泽东犯错误的重要理论原因。

片面理解社会主义的本质。1941年，毛泽东回忆说：“记得我在1920年，第一次看到了考茨基《阶级斗争》，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和一个英国人作的《社会主义史》，我才知道人类自有史以来就有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初步得到认识问题的方法论。可是这些书上，并没有中国的湖南、湖北，也没有中国的蒋介石和陈独秀。我只取了它四个字：‘阶级斗争’，老老实实地开始研究实际的阶级斗争。”¹毛泽东非常注重阶级斗争作为认识和方法论。当时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认识存在局限是可以理解的。1949年8月14日，毛泽东在《丢掉幻想，准

¹ 《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1-22页

备斗争》一文中，回答了什么是历史的唯物主义和历史的唯心主义，他说：“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拿这个观点解释历史的就叫历史的唯物主义，站在这个观点的反面的就是历史的唯心主义。”¹他仍然强调阶级斗争是文明社会发展的原动力，是认识社会历史的方法论。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简单的理解。

新中国成立后，据黄克诚回忆说：七届二中全会开过不久，“他向毛泽东汇报天津工作时，毛问他，‘你认为今后城市工作的主要任务是什么？’黄毫不犹豫地回答：‘当然是发展生产’。毛很严肃地摇了摇头说：‘不对，主要任务还是阶级斗争，要解决同资产阶级斗争的问题。’黄认为这次当面考试是不及格的。可见‘阶级斗争’这根弦，虽然在公开文件未加强调，在实践上从来没有丝毫放松过。”²这时候强把阶级斗争当作党的主要任务则是片面的。

为什么毛泽东只取“阶级斗争”四个字呢？这是毛泽东长期观察、考察中国社会而得出的，当时中国是一个贫穷落后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家，各种社会矛盾都存在，主要表现在中国人民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矛盾，当时要解决这个主要矛盾，其办法只能采取阶级斗争的最高形式，即采取武装斗争的形式，“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消灭反动统治，夺取政权。经过二十多年艰苦卓绝的斗争，终于夺取政权。所以在落后的中国，阶级矛盾较为集中的地方，只取阶级斗争，侧重于阶级斗争，也是有道理，可以理解，能够接受的。问题在于，夺取政权后，阶级矛盾已基本解决；由解放生产力转移到发展生产力，保护或保卫生产力，党的工作重心应该转移到发展经济文化，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上来。可是，毛泽东仍然强调阶级斗争学说，这就让人有些不解了。

1955年3月31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中，号召全党学习理论时说：“马克思主义有几门学问：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阶级斗争学说，但基础的东西是马克思主义哲学。”³从这里看出，把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几乎理解为阶级斗争学说。在实践上随时随地都把阶级斗争当作主要任务，把社会上的各种非阶级斗争的现象也

¹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91页

² 转引李锐著《毛泽东的早年与晚年》第219页

³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145页

当作阶级斗争的现象。如“社会主义就是消灭阶级，”“无产阶级专政是阶级斗争的集中表现，”“党员犯错误是资产阶级在党内的反映，什么右派是帝国主义在国内的代理人，等“左”的观点。这些都是片面理解社会主义本质的。

众所周知，阶级斗争学说，或阶级斗争观点，只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历史唯物主义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阶级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是阶级社会中一个重要观点。历史唯物主义体系中包含几个根本观点或基本原理：唯物辩证观点、劳动生产观点、阶级斗争观点和群众观点等。在这些观点里，劳动生产观点是第一个基本观点，它适用于一切社会。阶级斗争观点，它只适用于特定的阶级社会。

1956年，党的八大会议的政治决议就抓住了社会主义的本质，由解放生产力向发展生产力转移，由抓阶级斗争向发展经济文化方面转移。8月17日，关于《政治报告决议》指出：“我们党领导中国人民，已经完成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并且完全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这就使我国出现了一种完全新的社会面目。在旧中国社会中的主要矛盾……由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胜利而解决了。……在国内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这是社会主义革命所要解决的矛盾。我们对于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就是要变革资产阶级所有制，变革产生资本主义的根源的小私有制。现在的这种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取得决定性的胜利，这就表明，我国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求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的实质，……也就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党和全国人民的当前的主要任务，就是要集中力量来解决这个矛盾。”¹在这里，八大决议抓住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石和社会主义的本质：把发展社会生产力、发展经济和文化、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作为主要任务。可是，后来事情起了变化。

1957年6月8日开始反右派斗争后，经过三个多月的反右派斗争，毛泽东改变了八大对主要矛盾的提法，他在10月9日《中国

¹ 《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81-82页

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三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指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八大’决议上有那么一段，讲主要矛盾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这种提法是不对的。”¹改变这些提法，说明毛泽东倒退到以阶级斗争为主要矛盾、主要任务的老路上去，把以发展生产力、发展经济文化、提高人民生活水平降为次要矛盾、次要任务。因而又重新强调阶级斗争是国内的主要矛盾，党的工作重心重新回到抓阶级斗争上来，党的第一书记的重点工作是抓思想方面的阶级斗争，也就是批判修正主义思潮，当时把全党把主要精力放在抓右派分子，批斗右派分子方面。这是毛泽东抓阶级斗争的主要表现，也是片面理解社会主义本质的表现。这种颠倒国内主要矛盾，造成重大理论失误，自此之后，把阶级斗争当成一切工作的纲，当作主要矛盾，这就成为犯“左”倾错误的理论原因之一。

违背阶级划分的客观标准。在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很注意以经济地位来划分敌、我、友。1926年3月，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指出：“我们要分辨真正的敌友，不可不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基础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做一个大概的分析。”²这是最早的把经济地位和对革命的态度作为划分阶级的标准。这里指的经济地位，实际上是指生产关系中人们所处的经济地位，其中指经济关系。

1933年10月，毛泽东在《怎样分析农村阶级》一文中，明确指出：“……而靠剥削农民为生的，叫地主”。“地主剥削的方式，主要的是收取地租……但对农民收取地租是地主剥削的主要方式。”³这个文件，作为划分农村阶级成分的标准。1948年4月1日，毛泽东《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注释（三）解释：“向农民和干部说明，划分阶级成分，应以剥削关系为惟一的标准。”⁴1948年5月21日，毛泽东在《对知识分子应避免唯成份论的偏向》指示中说：“原件说地主出身者是地主，富农出身者是富农，中农出身者是中农，这是说社会出身，这是对的。但必须补充，根据知识分子所从

¹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75页

²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页

³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23页

⁴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315页

事的职业，例如参加军队者是军人，参加政府工作者是政府职员，参加生产企业者是工人、职员、技师或工程师，参加文化工作者是教员、记者、艺术家等，并将着重点不放在社会出身方面，而放在社会职业方面，方可避免唯成份论的偏向。¹这里清楚表明，划分阶级成分以阶级关系为惟一的标准。运用这些标准，顺利地进行农村的阶级成分的划分，完成了土地改革的任务，彻底地消灭封建地主阶级的剥削制度。

在合作化过程中，1955年9月，毛泽东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按语中指出：“（一）现在还处于困难地位的贫农，（二）新中农中间的下中农，（三）老中农中间的下中农，这样三部分比较容易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人们。”首先让他们加入合作社。这个划分是按他们的“经济地位和政治态度”来划分。尽管毛泽东说：“这不是在农村中重新来一次划分阶级成分的工作，而是在合作化的进程中，党的支部和派到农村做指导工作的同志们应当注意掌握的一种方针。”²按经济地位（按富裕程度）政治态度（对合作化态度）来把农民划分为三六九等的标准，以后就按这个三六九等标准来对待农村的阶级成分。这些做法，已经背离了按照剥削关系来划分阶级成分的标准。

1957年3月12日，毛泽东《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提出按世界观划分阶级的观点。他说：“有些人即使是出身于工人农民的家庭，但是在解放以前受的是资产阶级教育，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他们还是属于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我们国内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但是还有阶级斗争，主要是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阶级斗争，而且还很尖锐。思想问题已经成为非常重要的问题。”³（这是1964年公开发表时增加的内容）以上这些观点表明：按世界观划分知识分子，现在大多数知识分子的世界观是资产阶级的，是属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范畴；按阶级斗争胜负来分，经济战线上的阶级斗争已经取得胜利，但是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存在着尖锐的阶级斗争，胜负还未解决；因此，提出思想战线上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对修正主义进行批判。其对象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或是修正主义者，

¹ 《毛泽东文集》第5卷，第97页

²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39页

³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09、418页

因为他们想走资本主义道路。在这里，提出从世界观上、从思想上划分阶级的标准，就容易混淆敌我界限，认友为敌，这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带来极其严重的后果。

5月15日，整风鸣放开始后，毛泽东在《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提出：“在我们的国家里，鉴别资产阶级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政治上的真假善恶，有几个标准。主要是看人们是真正要社会主义和真正接受共产党的领导。”¹这里明确提出政治上划分阶级的两条标准：要社会主义和接受共产党的领导。

待反右派斗争开始不久，1957年6月19日，毛泽东几经修改后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公开在人民日报发表。增加了区分香花、毒草的六条标准：“（一）有利于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而不是分裂人民；（二）有利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而不是不利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三）有利于巩固人民民主专政，而不是破坏或者削弱这个专政；（四）有利于巩固民主集中制，而不是破坏或者削弱这个制度；（五）有利于巩固共产党的领导，而不是摆脱或者削弱这种领导；（六）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国际团结和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国际团结，而不是有损于这些团结。这六条标准之中，最重要的是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两条。”²具体地提出六条标准作为政治上划分阶级的标准，为政治上、思想上划分阶级成分提供理论依据，这是完全背离以剥削关系和经济关系作为划分阶级成分的标准。

综上所述，毛泽东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阶级划分的标准，是从正确运用走向片面运用；是从经济关系、剥削关系走上政治态度、政治思想上划分阶级标准的过程。这是从坚持正确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阶级划分标准走向背离马克思列宁主义阶级划分标准的过程。这种人为变动划分阶级标准又是犯错误的重要理论认识上的原因之一。

夸大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对生产力、经济基础的反作用。毛泽东很注意发挥主观能动性的作用，早在1937年8月，他在《矛盾论》一文中，强调生产关系、理论和上层建筑这一条件下对生产力、实践和经济基础表现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他说：“有人觉得有些矛盾并不是这样，例如，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生产力是主要的；

¹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28页

²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93页

理论和实践的矛盾，实践是主要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经济基础是主要的；它们的地位不能相互转化，这是机械唯物论的见解，并不是辩证唯物论的见解。”“诚然，生产力、实践、经济基础，一般地表现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谁不承认这一点，谁就不是唯物论者。然而，生产关系、理论、上层建筑这些方面，在一定的条件下，又转过来表现其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这也是必须承认的。当着不变更生产关系，生产力就不能发展的时候，生产关系的变更就起了主要的决定作用”。“当着政治文化等等上层建筑阻碍着经济基础的发展的时候，对于政治上和文化上的革新就成为主要的决定的东西了。我们这样说，是否违反唯物论呢？没有。因为我们承认总的历史发展中是物质的东西决定精神的东西，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但是同时承认而且必须承认精神的东西的反作用，社会意识对于社会存在的反作用，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这不是违反了唯物论，正是避免了机械唯物论，坚持了辩证唯物论。”¹这段话里，“生产力、实践、经济基础，一般地表现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如果指的是第一性的、决定性的作用，这样的表述是正确的；生产关系、理论，上层建筑“在一定的条件下，又转过来表现其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如果指的是第二性、反作用，这样的解释也是正确的。问题在于：能否说在一定条件下生产关系对生产力，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可以起主要的决定的作用呢？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在一定条件下，生产关系对生产力、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作用，仍然属于反作用。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的反作用再大，仍然由生产力、经济基础所决定。问题还在于，“一定条件”是靠客观条件和经济事实来判断，还是凭主观意志来确认呢？这个“一定条件”最容易从领导者的主观意志中产生出来。所以，这段话的提法，实际上是夸大生产关系对生产力、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理论对实践的反作用。

这些说法，在以后的革命和建设表现出来。1955年，毛泽东和邓子恢在农业合作化发展速度上产生严重分歧。1953年，邓子恢提出：“互助合作化运动要根据生产的需要，逐步前进，绝不能单凭主观要求，否则就达不到增产的目的。”²在1955年《第三次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结论》中，邓子恢指出：农业合作化的目的有三：

¹ 《毛泽东选集》第2卷，1952年版，第792页

² 参见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第350页

发展农业生产，最后消灭资本主义；发展农业生产，保证国家和人民的需要，是主要的；主张小发展，着眼点在于保障合作社切实增加生产。”¹可见，邓子恢强调生产关系的改造一定要同生产力发展需要相适应，要有利于达到增加生产为目的。这是遵照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发展水平的要求这个原理来指导合作化运动的，这是正确的原理和方针。但是这个指导合作化进程的方针，受到严厉地批评。

1955年10月11日，毛泽东在党的七届六中全会的结论中，谈到加快农业合作化时，严厉地批评了邓子恢，他说：“农业合作化使我们在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基础上，不是在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基础上，巩固了同农民的联盟。这就会使资产阶级最后地孤立起来，便于最后地消灭资本主义。在这件事情上，我们是很没有良心哩！马克思主义是有那么凶哩，良心是不多哩，就是要使帝国主义绝种，封建主义绝种，资本主义绝种，小生产也绝种。在这方面，良心少一点好。我们有些同志太仁慈，不厉害，就是说不那么马克思主义。使资产阶级、资本主义在六亿人口的中国绝种，这是一个很好的事，很有意义的好事。”²这段话的意思是说要加速农业合作化，让小生产也绝种，通过加速生产关系的改造或变更来大力发展生产力，这种主观愿望是好的。实际上给人们这样的印象，似乎生产关系的改变可以不顾现实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改变得越迅速越能发展生产力。³这样执行的结果，生产关系脱离了现实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不但没有达到增加生产、满足国家和人民的需要的目的，反而使农业生产徘徊不前，甚至减产。历史实践证明，毛泽东指导社会主义三大改造的方针，让资本主义、资产阶级绝种，让小生产也绝种。是过早过急地，因而也是片面的，其根本原因在于夸大了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反作用，夸大了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最终违背了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发展状况要求的根本原理。

1957年3月12日，毛泽东《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提出批判修正主义任务：“……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这就是修正主义。修正主义是一种资产阶级思潮。”“我们现在思想战线上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开展对

¹ 参见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第350页

²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198页

³ 参见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第351页

于修正主义的批判”。“思想问题现在已经成为非常重要的问题。各地党委的第一书记应亲自出马来抓思想问题。”¹5月15日，毛泽东在《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中提出：“现在应当开始注意批判修正主义。”6月19日，毛泽东在正式公开发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再次提出批判修正主义，抓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他说：“我们在批判教条主义的时候，必须同时注意对修正主义的批判。修正主义，或者右倾机会主义，是一种资产阶级思潮，它比教条主义有更大的危险性”。“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取得基本胜利后，社会上还有一部分人梦想恢复的资本主义制度，他们要从各个方面向工人阶级进行斗争，包括思想方面的斗争。在这个斗争中，修正主义者就是他们最好的助手。”²

从上述几处引文中，说明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党的工作重点并没有转移到以发展生产力、发展经济为中心来巩固社会主义制度、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服务。而党的工作重点、党的第一书记把主要精力去抓思想战线、政治战线上的阶级斗争，去抓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具体表现在也批判教条主义，更多的是批判修正主义思潮和抓右派分子。这并不是说，不要批判各种错误思想，而是说，不要过分强调上层建筑领域内的阶级斗争，不要过分强调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从农业合作化到反右派斗争，特别注意发挥上层建筑中政党抓意识形态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其结果，人为地夸大了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为阶级斗争越来越尖锐化、绝对化提供理论依据。

总之，正是由于上述诸原因的综合作用，才最终酿成了反右悲剧！

第四节 反右派斗争所犯严重错误的根源

反右派犯错误的根源既有党史上遗留下的根源，又有斯大林、共产国际留下的根源，更有中国封建专制和封建附属物的根源。现在探讨如下：

一、放松对党史上犯“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的警惕性

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领导人犯过一些“左”倾错误，由于

¹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17-418页

²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92页

毛泽东正确领导，全党批判“左”倾错误（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主要是教条主义错误，团结全党，领导全国人民同国民党反动统治作斗争，取得民主革命的胜利。建国后，在取得政治、经济等方面成绩，在思想政治领域进行批判取得某些成绩时，却忽视了党史上历次犯“左”倾错误对党的各级领导和全体党员的影响，实际上党的许多中高级干部曾经犯过“左”倾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错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放松对“左”倾错误的警惕性，可能还会犯“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反右派斗争就说明这一点。

历次“左”倾教条主义的来源。中国共产党于1922年7月正式加入共产国际，成为国际共产党之中国支部，从此，中国共产党由共产国际领导。列宁逝世后，共产国际由斯大林实际领导。在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指导和领导下，对中国革命产生过积极作用，也带来了消极影响，主要是脱离中国实际指导中国革命。所以，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犯“左”倾错误归根到底是来自斯大林共产国际代表的错误指导和直接参与。建国后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和广大党员放松了党史上“左”倾的教训，重犯“左”倾错误，所以党史上犯过的“左”倾错误成为新的条件下犯“左”倾错误的来源之一。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斯大林在《时事问题简评》等文章中提出中国“三阶段论”认为“在革命第一阶段的时期，当革命是全民族联合战线的革命（广州时期），这时候无产阶级的同盟者是农民、城市贫民、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民族资产阶级”。“在革命的第二阶段上，蒋介石和民族资产阶级转到了反革命营垒，革命运动的中心由广州迁到武汉，这时无产阶级同盟者是农民、城市贫民、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第三阶段是苏维埃革命，这个革命现在还没有到来，但它是会到来的”¹。斯大林又说，这个阶段“就是武汉国民党领导集团之脱离到反革命阵营，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脱离革命”。“在最近时期新的革命高潮成为事实，那末，成立工农代表苏维埃的问题就会提到日程上来，成为当前的口号，以与资产阶级政府相对立。为什么呢？因为在当前革命发展阶段上，在新的革命高潮条件下，成立苏维埃将是一个完全成熟的问题”²

奉共产国际之命的罗明那兹（苏联人），于1927年7月来到中国，贯彻落实斯大林的“三阶段论”和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

¹ 《斯大林全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306、322页

² 《斯大林全集》第10卷，第15页

罗明那兹以斯大林的“三阶段论”为依据，发展了“三阶段论”，提出了“不断革命论”。罗明那兹认为中国是“‘不断革命论’，说中国是民主革命，但一直发展下去是社会主义革命，他说广州时期是四个阶级联合，武汉时期是三个阶级联合，南昌起义时只有工农，是两个阶级，中间不经任何停留，不经任何阶段，一直发展下下去，就是社会主义革命。”罗明那兹认为大革命失败后，“民族资产阶级离开国民革命战线而走入反革命的营垒”¹

周恩来谈到斯大林的“三阶段论”和罗明那兹的“不断革命论”时说，“1927年11月中央扩大会议接受了这种观点，认为当时虽不是社会主义革命，但一直发展下去就是社会主义革命。罗明那兹的意见，在我们党员中间是有影响的”²

1928年7月，布哈林代表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上正式提出“第三时期理论”成为共运的指导思想，“第三时期理论”把一战后的历史发展划分为三个时期。1918—1923年是“第一时期”，这个时期是资本主义制度陷于严重危机的时期则无产阶级采取直接革命行动的时期。1923—1928年是“第二时期”，这个时期是资本主义制度渐趋稳定和局部稳定，是资本主义经济“复兴”的时期，是资本主义攻势加强和扩大时期，是无产阶级大军为几次严重失败所削弱后，继续进行自己斗争的时期。1928年以后进入“第三时期”，“这个时期必然要通过资本主义稳定中各种矛盾的不断发展，导致资本主义稳定的进一步瓦解和资本主义总危机的急剧尖锐化”。布哈林还提出，“当今时代的共同特征是‘战争和革命的时代’”，帝国主义战争已迫在眉睫，因而“制止日益迫近的帝国主义战争，保卫苏联，反对干涉和瓜分中国，保卫中国和殖民地起义——这就是目前共产主义运动的主要国际任务”。共产国际的口号：“用战争对付帝国主义的战争！”“保卫苏联！”“保卫中国革命！”³1929年10月26日，共产国际给中共中央四封来信，总的精神：要中共反对右倾，反对资产阶级、反对富农、反对中间势力，号召政治罢工。

1929年，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十次全会和主席二月扩大会议，曾

¹ 《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60，172页

² 《周恩来选集》上卷，第160页

³ 参见曹军《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关系史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93—195页

预报革命高潮必将进一步发展，其速度必将加快，这一预见已完全得到证实。认为中国苏维埃和各兄弟党的任务，就是“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和武装干涉苏联；揭露帝国主义政府正在准备进行武装干涉；反对干涉中国苏区”。1931年3月，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十一次全会指出，“右倾危险过去是主要危险，在世界革命运动阶段仍然是主要危险，在我们为无产阶级专政而胜利战斗的整个时期，都将是主要危险”。中国已经到了革命时期，“中国的苏维埃运动使整个殖民地世界日趋革命化”¹1932年8月27日至9月15日，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十二次全会，认为“中国共产党今后必须竭尽全力”，“在群众的反帝斗争中……反对一切帝国主义者，推翻帝国主义的代理人——国民党”。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通过《关于中国共产党任务决议案》，规定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政策。²

总之，历次“左”倾教条主义都来自共产国际和斯大林。这些外来的“左”倾教条主义，在新时期由于领导者和广大党员放松警惕，依然影响他们，让他们在新条件下犯“左”倾错误。

历次“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的表现。由于受到斯大林左倾观点的影响和共产国际代表罗明那兹直接参与指导，由于大革命失败后急躁情绪，以瞿秋白为代表的党中央犯了“左”倾盲动主义错误，其表现：犯了混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界限的错误；犯了分不清革命与妥协的民族资产阶级、进步与反动的资产阶级两面性的错误；犯了笼统推翻资产阶级（把反帝反封建和反资并列）和扩大打击面的错误；犯了不承认革命处于低潮、教条式搬用武装暴动，一味采取盲目进攻的错误；犯了只重视工农干部而轻视知识分子干部等错误。

由于受到共产国际提出“第三时期理论”和四封来信的指示。1930年从李立三为代表的党中央犯了“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其主要表现：在对革命形势估计上，认为新的革命高潮已经逼进我们的面前，已经有了“直接革命的形势”，“有极大可能转变为全国革命的胜利”，因此主张要大干，不要小干。在中国革命性质上，认为“资产阶级已经是反动联盟的一部分”，主张革命如果在一省与几省首先胜利，就要没收资产阶级的工厂、企业、银行。“需要从

¹ 《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2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120，144，121，120页

² 转引自曹军《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关系史研究》第238—240页

工农专政进行无产阶级专政。”认为“革命政权建立的开始，就是革命转变的开始。”在革命道路和策略上，坚持以城市为中心，强调“无产阶级的伟大斗争，是决定胜负的力量，不承认还存在中间营垒，只要在产业区域或政治中心突然暴发一个工人斗争，就可以立即通过武装起义实现一省或几省的首要胜利。”¹。李立三本人在党的机关刊物上宣传“宁‘左’勿右，‘左’比右好的‘左’倾思想，大搞一言堂，压制正确意见，乱扣‘右倾’、‘右派’”等大帽子等错误。

1930年米夫以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的身份来华指导革命。1931年1月，米夫以国际代表资格裁决和通过新政治局名单，宣布成立新的党中央，扶持王明当上了政治局委员，后来党中央实权落到了王明手中，从此，王明“左”倾教条主义或“左”倾冒险主义在党中央占了统治地位。

王明“左”倾教条主义思想集中表现在《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的小册子中，他在书中夸大了资本主义在中国经济中的比重，夸大了现阶段中反资产阶级斗争、反富农斗争的意义，否认中间营垒的存在，继续强调全国性的“革命高潮”、“进攻路线”，提出要能以积极拥护和执行国际路线的斗争干部，来改造和充实各级的领导机关等错误观点和主张。

在革命形势和党的任务上，教条式搬用共产国际关于右倾“在世界革命运动现阶段仍然是主要危险”的错误论断。王明认为右倾“倾向是目前的主要危险”，全党要“集中火力反对右倾。”王明接受共产国际关于各兄弟党的任务的观点，他认为，党的“中心任务”是反对进攻苏联和苏区，拥护苏维埃、武装保卫苏联，反对帝国主义的强盗战争而斗争。²在阶级关系和斗争策略上，1932年1月通过的《中央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强调，“在目前形势下，国民党破产已经是铁一般的事实”。“在革命危机迅速成熟的时候，这些派别是最危险的敌人，应该以主要力量来打击这些妥协的反革命派”。³王明要“使富农得到较坏的土地”⁴在

¹ 参见盖军主编《中国共产党80年历史简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1年，第58页

²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7)第466页

³ 《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1册，第490、491页

⁴ 《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1册，第383页

革命的道路上，王明照搬“城市中心论”，并强调“无产阶级的伟大斗争，是决定胜负的力量，没有工人阶级的罢工高潮，没有中心城市的武装暴动，决不能有一省与几省的胜利。不特别注意城市工作，想“以乡村包围”、“单凭红军来夺取城市是一种极端错误的观念”。¹在干部政策上，以王明为首的“左倾教条主义者”、“左”倾冒险主义者，凡是对他们的错误观点或错误做法不同意、不满意，不积极执行的干部和同志，都扣上“右倾机会主义”、“富农路线”、“调和路线”、“罗明路线”等大帽子，然后加以“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王明对干部采取过“左”的肃反政策，犯了肃反反扩大化错误等。

总之，王明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实际上是共产国际的“左”倾理论和实践的翻版，他的“左”倾错误是前两次“左”倾教条主义的延续、发展，更加系统化和理论化，他的“左”倾错误比前两次“左”倾错误在党内统治时间最长，长达四年之久，因而对革命损失更大更惨重，要纠正和克服也不是很容易做到的。但在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通过艰苦细致、耐心说服以及通过团结，批评或斗争等手段纠正了“左”倾教条主义错误，使党走上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道路，因而使中国的民主革命取得了胜利。

毛泽东与党史上“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的斗争。毛泽东与党史上“左”倾错误的斗争，其时间之长，过程之曲折、问题之复杂、斗争之艰难都是空前的。在这里只进行简短扼要的考察：

毛泽东抵制“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毛泽东还不是党中央的领导人，但对中央犯的错误的提出了他的看法和作法。1927年8月7日，在汉口中共中央召开了一次重要会议，即“八七会议”，毛泽东参加了会议，在会上作了发言，对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以及土地问题提出初步设想，特别提出，“要非常注意军事问题，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²8月18日，在湖南省委会议上，毛泽东指出“我们党从前的错误就是忽略了军事。现在应以百分之六十的精力注意军事运动，实行枪杆子夺取政权，建立政权。”对土地问题，他认为，“单只没收大地主的土地，不能满足农民的要求和需要。要能

¹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8页

² 参见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第163—165页

全部抓着农民，必须没收地主的土地交给农民”。¹

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在莫斯科召开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毛泽东没有出席六大，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和在《在井冈山的斗争》两篇文中，提出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1929年12月，毛泽东在《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一文，提出从思想上肃清盲动主义，从制度和政策上纠正盲动的行动²1930年1月5日，毛泽东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中，批评他们“没有在游击区域建立红色政权的深刻的观点。”“做这种建立政权的艰苦工作为徒劳”，“等到全国各地争取群众的工作做好了，或做到某个地步了，然后再来一个全国武装起义，那时把红军力量加上去，就作为全国范围的大革命。他们这种全国范围的……先争取群众后建立政权的理论，是于中国革命的实情不适合的”。³在这里，含蓄地批评了“城市中心论”，提出了“以农村为中心”的思想。

1930年5月，毛泽东反对李立三的盲动主义路线，其中强调“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当时教条主义叫本本主义）。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毛泽东写道“读过马克思主义‘本本’的许多人，成了革命叛徒，那些不识字的工人常常能够很好地掌握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又写道：“你试试离开实际调查去估量政治形势，去指导斗争工作……一定要弄出错误。”严厉批评了“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本本’保障了永久的胜利，只要遵守既定办法就无往而不胜。这种想法是完全错误的。”⁴

1933年8月，毛泽东在《必须注意经济工作》一文说道：“过去有些同志认为革命战争已经忙不了，那里还有闲工夫去做经济建设，因此谈到经济建设，就要骂为‘右倾’……这些意见是不对的。”⁵

毛泽东纠正“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1935年1月，在贵州遵义举行了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毛泽东在会议上作了重要发言，着

¹ 转自《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第81页

² 参见《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00页

³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03页

⁴ 《毛泽东著作选集》（上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51、55页

⁵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15页

重批判了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和长征途中以来博古、李德军事指挥上的错误，以及博古在总结报告中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辩护的错误观点，张闻天、王家祥、朱德等支持毛泽东的正确意见。会议上，毛泽东被推选为政治局常委，并参加三人军事指挥小组。这次会议，集中力量纠正当时具有意义的军事上和组织上的错误，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从此，中国革命走上了正确的道路。

1936年12月，毛泽东发表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总结了第二次国内战争的经验，针对“左”倾教条主义关于革命战争问题的错误。文章指出，“我们应该研究一般战争的规律，也应该研究革命战争的规律；最后，我们还应该研究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教条主义者说，“苏联的战争是革命的战争……而且苏联是胜利了。”毛泽东针对说，“我们还应该尊重中国革命的经验，因为中国革命和中国红军又有许多特殊情况。”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战争犯的错误之一是“1931年至1934年的‘左’倾机会主义。这个错误使土地革命战争受到了极严重的损失，得到了在第五次反‘围剿’中不能战胜敌人反而丧失了根据地削弱了红军的结果。”“围剿”与反“围剿”是中国内战的主要形式，“李立三同志不懂得中国内部的持久性，因此，看不出中国内战发展中‘围剿’又‘围剿’，打破又打破的这种长期反复的规律”，“在红军还弱小的时代……命令全国举行武装起义，企图使全国迅速胜利。这就犯了‘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1931年至1934年的‘左’倾机会主义，也不相信‘围剿’反复这一规律。”给了中国革命以很大的损失。¹

1938年11月1日，毛泽东在《战争和战略问题》一文中，开头就说：“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是武装夺取政权，是战争解决问题。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原则是普遍地对的，不论在中国在外国，一概都是对的。但是在同一个原则下，就无产阶级政党在各种条件下执行这个原则的表现说来，则基于条件的不同而不一致。”然后指出，“中国则不同”，“无议会可以利用，无组织工人举行罢工的合法权利。在这里，共产党的任务，基本地不是经过长期合法斗争以进入起义和战争，也不是先占城市后取乡村，而是

¹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69—170、183、193—194页

走相反的道路。”“在中国，主要的斗争形式是战争，而主要的组织形式是军队。”毛泽东还进一步说，“中国的问题离开武装就不能解决。”“每个共产党员都应懂得这个真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枪杆子里面出一切东西。”¹

1937年7月、8月，毛泽东写成《实践论》、《矛盾论》两篇哲学专著，从理论上、哲学上彻底清算党内教条主义思想。《实践论》主要揭露轻视实践的教条主义这种主观主义。这种教条主义思想，曾经在1931年至1934年使得中国革命受了极大的损失，而教条主义者都披着马克思主义的外衣迷惑了广大的同志。《实践论》是为着用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观点去揭露党内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这些主观主义的错误而写的。²《实践论》中批评了“只有那些主观地、片面地和表面地看问题的人，跑到一个地方，不问环境的情况，不看事情的全体，也不触到事情的本质，就自以为是地发号施令起来！这样的人是没有不跌交子的”。又“我们也反对‘左’翼空谈主义。他们的思想超过客观过程的一定发展阶段，有些把幻想看作真理，有些则把仅在将来有现实可能性的理想，勉强地放在现时来做，离开了当前大多数人的实践，离开了当前的现实性，在行动上表现为冒险主义。”“唯心论和机械唯物论，机会主义和冒险主义，都是以主观和客观相分离，以认识和实践相脱离为特征的”。“我们的结论是主观与客观、理论和实践、知和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反对一切离开具体历史的‘左’的或右的错误思想”。³

《矛盾论》是《实践论》之后，为了同一的目的，即为了克服存在于党内的严重的教条主义思想而写的。⁴《矛盾论》开头就指出，我们现在的哲学研究工作，应当以扫除教条主义思想为主要的目标。毛泽东用“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的原则，指出，“中国革命又受了敌人的严重打击，是因为我们党内产生了冒险主义。当着我们清算了这种冒险主义的时候，我们的事业就又重新发展了”。又用矛盾特殊性原理批评“我们的教条主义者是懒汉”。“他们也不懂得人类认识的两个过程的互相联结——由特殊

¹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05、507—509、511页

² 参见《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82页

³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89、294—295页

⁴ 参见《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766页

到一般，又由一般到特殊，他们完全不懂得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利用教条主义者违背列宁的指示，“从来不用脑筋具体地分析任何事物，做起文章或演说来，总是空洞无物的八股调，在我们党内造成了一种极坏的作风。”¹

最全面、系统纠正三次“左”倾错误集中表现在《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现摘录部分如下：

(一)在政治上，各次“左”倾错误首先表现在革命任务和阶级关系上。它们都混淆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的界限，都低估农民在反封建斗争中的决定作用，都主张整个地反对资产阶级以至小资产阶级。它们实行了许多超民主主义的所谓“阶级路线”的政策，如消灭富农经济，强调以共产主义为内容的国民教育政策，对知识分子的过左政策，过左的肃反政策等。

(二)在军事上，第一次“左”倾盲动主义错误使红军脱离群众，第二次“左”倾错误说是使红军实行冒险的进攻，第三次“左”倾错误，在建军问题上，把红军任务缩小为单纯打仗，在作战问题上，进攻中的冒险主义，防御中的保守主义，退出时的逃跑主义。

(三)在组织上，“左”倾错误的代表者，为贯彻其意旨起见，在党内曾经把一切因为错误路线行不通而对它采取怀疑，不同意、不积极拥护、不坚决执行的同志，不问情况如何，一律错误地戴上“右倾机会主义”、“富农路线”、“罗明路线”、“调和路线”、“两面派”等大帽子，而加以“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甚至以对罪犯和敌人作斗争的方式来进行这种“党内斗争”。

(四)在思想上，“左”倾错误的代表者抛弃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实质，而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书本上的若干个个别词句搬运到中国来当做教条，毫不研究这些词句是否合于中国现时的实际情况。因此，他们的“理论”和实际脱离，他们的领导和群众脱离，他们自以为是、自高自大，夸夸其谈，害怕正确的批评和自我批评。而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的错误都是从思想上违背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²

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抵制、纠正了“左”倾教条主义错误。这些错误基本上来源于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错误指导，并与其强迫中国党的领导人贯彻执行有关。但中国党没有公开批评他们，其原因

¹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765、769、776、777—778页

² 参见《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993、1005、1007、1009、1041页

是：一、“既然中国人听了他们的话，那么中国人自己就该负责。谁叫我们去听他们的话呢？有两种中国人：一种是教条主义者，他们就听斯大林那一套；另一种中国人就不听那一套，并且批评教条主义者。二、我们和苏联的关系中不愿意引起不愉快。第三，国际没有检讨这些错误，苏联也没有提到这些错误，我们提出批评就会同他们闹翻的。”¹

综上所述，毛泽东在民主革命时期成功地抵制和纠正了党史上三次“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毛泽东犯了一系列“左”倾错误教条主义以及空想社会主义错误。犯反右派斗争错误同放松对党史上“左”倾教条主义的警惕性有密切关系。这就构成毛泽东及其他人犯“左”倾错误的重要根源或来源之一。

二、受国外教条主义的影响

20世纪初期，马克思、恩格斯的学说通过直接、间接的渠道传播到了中国，特别是社会主义和阶级斗争学说受到中国早期传播者的重视，在中国思想理论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毛泽东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实际上，这个马克思主义是俄国式的马克思主义，即列宁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俄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而形成了俄国的马克思主义，它指导俄国取得十月革命的胜利。不久，列宁逝世，斯大林担任俄共（布）总书记，由他来解释马克思主义，从而形成了斯大林式的马克思列宁主义。

20世纪20-30年代，中国共产党人既接受马克思主义，同时也接受斯大林式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在接受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人，一方面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从而形成了毛泽东思想，即中国化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在它的指导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民主革命取得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另一方面，也传来了马克思主义和教条式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共产党中的教条主义者生搬硬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斯大林式的教条主义观点，从而使中国革命遭受损失。20世纪40年代末到50年代初，毛泽东提出向苏联学习，50年代中，又提出以苏为鉴，走自己的路。我们既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正确东西，又受到了斯大林教条主义的影响。因此，中国共产党在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同时，犯了教条主义错误。

¹ 《毛泽东外交文选》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54页

受斯大林教条主义影响。以俄为师是孙中山先生提出来的，中国共产党继承了孙中山的遗志。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总结出“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¹这是中国革命先行者向外国人学习的经验总结。

早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马克思、恩格斯合著的《共产党宣言》就传入到我国，以后，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列宁、斯大林的著作公开合法地和秘密地流入中国，在解放区公开传播，在国统区秘密流传。传播最广影响最大的首推《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以下简称《教程》）。

1938年，《教程》由斯大林为首的联共（布）中央特设委员会编写，联共（布）中央审定的，是作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党史教科书，是一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知识的百科全书”和一件“新的强有力的布尔什维主义的思想武器”；²联共（布）中央作出决定：凡是党史方面，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理论方面的解释，一律以《教程》的提法为准；还规定在高等学校和广大干部中，要以《教程》为基本教材，成为大学生的必修课，成为广大干部必读的著作。规定社会科学、文学艺术等都以注释、阐发的方式，宣传斯大林的思想理论，颂扬斯大林的功绩，树立斯大林的形象。不仅如此，共产国际作出决议，要求各国共产党及其党员必须认真学习《教程》，并称该书是“全世界千百万进步人士所必读之书。”

既然知道联共（布）和共产国际对《教程》的评价如此之高，那么以俄为师和加入共产国际的中国共产党首先译出第七章和结束语在延安《解放》杂志上发表。1939年全译中文版先后在莫斯科、上海、武汉出版，发行总数达10万册。在当时环境下，这个出版数字是非常之大的。1942年，延安整风运动，党中央、毛泽东号召党员和干部认真学习这部著作，并将《教程》的结束语列为整风文献之一。《教程》的结束语第四条说：“堡垒是最容易从内部攻破的。为了达到胜利，首先就必须在工人阶级的党内，在工人阶级的司令部内，在工人阶级先头堡垒内，把所有的投降主义者、逃兵、工贼和叛徒清除出去。”还引证斯大林的话：“党是靠清除‘自身’中的

¹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71页

² 转引卢之超主编《关于斯大林问题的再认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268页

机会主义分子而巩固起来。”¹这个观点，中国党变为实际行动。1945年4月24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七大口头政治报告》中评述《联共党史》时说：“这本书是历史的，又是理论的，又有历史，又有理论，它是一个胜利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是马克思主义在俄国成功的历史，这本书要读。”²从40年代以后，毛泽东就不断清除党内外持不同意见的人，其负面作用很大。1949年3月13日，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总结》中规定党的干部必须读的书：“现在积二十多年经验，深知要读这十二本书（其中之一就有《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规定在三年之内看一遍到两遍。如果……有三千人读通这十二本书，那就很好”³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仍被规定为“干部必读”的政治理论书籍之一，党和政府的干部几乎每周抽出一个下午时间用来政治理论学习，其中根据干部的理论文化水平，分高、中、初三个层次组织学习。同时被规定为全国高等学校的公共政治理论课的教材，当作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启蒙书，当时的中共中央高级党校、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等高等院校开设马克思列宁主义课程，《教程》是基本教材，由苏联专家教授，中国的政治理论课教师和哲学系的学生听课，还参加课堂讨论，学习时间为两年。规定《教程》当做哲学系学生的必修课外，还规定《教程》中的第四章第二节：“论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必修课。由苏联专家和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艾思奇讲授，讲授时间、学习时间均为两年，指定参考书除马克思、恩格斯原著外，主要要参考列宁，特别是斯大林的著作。艾思奇说，斯大林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学习马列主义著作主要是要学习斯大林的著作。50年代初期，由苏联专家（教授、副教授，甚至讲师）、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理论家、理论工作者培养的政治理论课宣传员、哲学系学生，他们结业和毕业后，分配到全国各地，由他们传播、宣讲《教程》的内容、观点，同时，《教程》作为教材，苏联和中国出版界大量发行，从苏联进口的莫斯科版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不算，仅中国出版发行达数百万册。可见，《教程》传播内容和发行数量均达到空前水平。这部著作影响了中

¹ 《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396-397页

² 《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350页

³ 《毛泽东文集》第5卷，第261，267页

国两、三代人，并且至今没有完全消除。这种影响可分为积极影响和消极影响。积极影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的传播、启蒙、普及和提高起到积极作用。同时，不可忽视《教程》在中国起的负面影响，其突出的表现：“阶级敌人愈是失去立足的基地，社会主义愈是取得成就，阶级敌人的反抗就会采取愈加尖锐的形式。”¹斯大林的这个阶级斗争日益尖锐化的观点是1928年提出来的，他在《论工业化和粮食问题》演说中指出：“随着我们的进展，资本主义分子的反抗将加强起来，阶级斗争将更加尖锐，”“而剥削分子的反抗不能不引起阶级斗争的必然的尖锐化。”²1929年，斯大林曲解列宁的原话时提出：“只有通过顽强的阶级斗争才能消灭阶级，而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阶级斗争比无产阶级专政以前更加残酷。”³斯大林的阶级斗争日益尖锐化理论被用来指导实践，被运用到党内、经济领域内指导党内斗争，指导农业集体化，就变成大清洗运动，变成对农民的剥夺和镇压，对农业的摧残。经过大清洗运动和农业集体化运动，斯大林消除了所有的现实对手和潜在的对手，最后形成和巩固了个人独裁集权制。

与此同时，斯大林把阶级斗争日益尖锐化理论引入到意识形态领域，指导意识形态各领域内的大批判运动。首当其冲是哲学界。30年代，斯大林指使米丁等人向德波林及其学派发难，把哲学问题的争论上升到政治问题，德波林及其学派受到大批判后，米丁等人将哲学政治化、现实化，大谈斗争性，不谈统一性，为斯大林的阶级斗争扩大化提供理论根据。毛泽东在《矛盾论》中说：“苏联哲学界在最近数年中批判了德波林学派的唯心论，这件事引起了我们的极大的兴趣。德波林的唯心论在中国共产党内发生了极坏的影响，我们党内的教条主义思想不能说和这个学派的作风没有关系。”⁴其实，中国党内的教条主义与德波林学派作风的关系不大，而主要的是来自斯大林的教条主义，这才是教条主义真正的源头。斯大林对经济学、史学、法学、文学艺术、甚至自然科学、技术工程等都进行干预、大批判，对知识分子进行迫害、流放、以至镇压。这种用阶级斗争的手段解决意识形态领域的问题，造成严重后果。首先是

¹ 《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324页

² 《斯大林全集》第11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149—150页

³ 《斯大林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30页

⁴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765页

压制、破坏了正常的学术争论和学术民主，其次是错误地打击和扼杀了知识分子的积极性，更加错误地镇压、流放了大批无辜的知识分子，第三是让学术服从政治，让真理服从权力，第四是形成以权力论是非，以权力大小作为裁决对错的标准。这些作用极大地影响了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

《人民日报》高级记者章世鸿在《重新审视〈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一文指出：“斯大林上台后，虽然《教程》中吹捧他‘高举列宁主义大旗’，实际上他并没有按照列宁确立的原则进行任何政治体制改革，却形成了一个高度中央集权、丢掉民主和法制、党政不分，官僚主义严重、个人崇拜盛行的政治体制，最终由中央集权变成个人独裁。并且把这种个人独裁发挥到登峰造极的地步，这就种下了苏联最终灭亡的祸根，也毒害了其他国家的党。”作者又说：“我们说斯大林——苏联模式坑害了几代共产党人，并不为过。我们曾错误地把斯大林亲自修改定稿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当作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百科全书’加以学习，贻害无穷。抛弃斯大林——苏联模式是历史的必然，应该是一种解脱、解放。”¹这是对《教程》和“斯大林模式”的最新评价。

《教程》中的第四章第二节《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由斯大林名义撰写的。该著作对于传播与普及马克思主义哲学起了积极作用，但并不像苏联哲学家米丁那样，把斯大林的《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捧为“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发展中划时代的创作，并且具有世界历史的意义”，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顶峰”。²也不像罗森塔尔、尤金等哲学权威在《简明哲学辞典》中所说那样：把《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评为“完整地、严密地、系统地叙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原理。它是苏联工人阶级和共产党为社会主义而斗争的极丰富经验的哲学概括，是人类历史上情况复杂、史实丰富的时代的革命经验的概括。斯大林这部著作就是以对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最丰富的哲学遗产的总结为基础的”。“这部著作已和马恩和列宁的巨著一起成为全世界共产主义战士必读之书。”³实际上，斯大林的这部哲学著作有许多观点是违

¹ 摘自《炎黄春秋》2003年第3期，第2—5页

² 转引自安启念著《苏联哲学70年》，重庆出版社1990年版本，第81页

³ 罗林塔尔、尤金编：《简明哲学辞典》三联书店1973年版，第744、747页

背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基本原理的，最突出的表现是最实用、最教条运用列宁哲学中的原理。斯大林引用列宁的话：“就本来的意义说，辩证法是研究对象的本质自身中的矛盾。”¹其次，“发展是对立面的‘斗争’。”然后他解释说：“辩证方法认为，从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不是通过现象和谐的开展，而是通过对象，现象本身固有的矛盾的揭露，通过这些矛盾基础上活动的对立趋势的‘斗争’进行的。”²在这里，斯大林没有抓住列宁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片面的抓住了“发展是对立面的‘斗争’”。而不是引用和发挥列宁的的下述观点：列宁说：“可以把辩证法简要地确定为关于对立面的统一的学说。”³又说：“辩证法是一种学说，它研究对立面怎样才能够同一，是怎样（怎样成为）同一的——在什么条件下它们是同一的、是相互转化的。”⁴上述列宁的辩证法观点即对立统一规律才是全面的、正确的观点。斯大林抓住列宁辩证法某个正确观点加以片面化、绝对化，这样就违背了列宁辩证法的核心。

斯大林抓住发展是对立面的斗争，即是出于政治斗争的需要。斯大林掌权后，挑起党内激烈的斗争，他把他的反对派、潜在的对手、不同意见者一个一个地打倒和驱逐出境。从1934年后，斯大林发动了一场大清洗运动（或镇压运动）。其对象大都是党内的高级领导人，军队、共青团、职工会、科学界、文化艺术界、经济界中的优秀分子，他们遭到镇压。大清洗涉及面极广，被处死者不计其数，后来实践证明，这些被镇压的人几乎都是无辜的冤死者。由此可见，理论上的片面性，根据片面性的理论制定政策，指导实践就造成极大的危害。

总之，斯大林的《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有不少形而上学观点，首先把辩证法与唯物主义割裂开来，在认识上缺乏辩证法，在对立面的斗争与统一问题上片面强调斗争而排斥统一，在辩证法规律中不提否定之否定的规律是缺乏辩证法的表现，提出生产关系完全适合生产力的形而上学观点等，一句话，斯大林的思想方法具有僵化、教条化、简单化、绝对化以及片面性、封闭性等形

¹ 《列宁哲学笔记》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256页

² 《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121页

³ 《列宁哲学笔记》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210页

⁴ 《列宁哲学笔记》，第86页

而上学的特征。

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到五十年代初期，中国的革命先行者、中国共产党人以俄为师，走俄国人的路，这个老师是布尔什维克党和斯大斯，最重要的教科书是《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这位斯大林先生，通过《教程》，教会学生搞形而上学。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讲话》中承认，“斯大林有许多形而上学，并且教会许多人搞形而上学。”¹由此可见，中国共产党人包括领导人和一般党员干部几乎都受斯大林的教条主义的影响。这种影响必然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表现出来。

向苏联学习。建国前夕，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说：“苏联共产党就是我们的最好先生，我们必然向他们学习。”²建国初期，毛泽东去莫斯科会见斯大林，在告别苏联时说：“苏联经济文化及其他各项重要的建设经验，将成为新中国建设的榜样。”稍后又在政协会上号召“要认真学习苏联的先进经验”，“必须诚心诚意地向苏联学习。”³1953年3月5日，斯大林逝世，3月9日，毛泽东在悼念斯大林的文章《最伟大的友谊》中又号召：“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将更加加紧学习斯大林学说，学习苏联的科学和技术，以建设我们的国家。”⁴那个时代，最流行口号：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一切都以苏联为榜样。当时历史条件下，世界上只有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我国民主革命成功后，发展的必然趋势是要建立社会主义制度，而帝国主义国家不允许、不承认我们，而且千方百计地想扼杀、封锁我们，那时，只有苏联党政和斯大林支持、承认和援助（当然有条件的）我们。因此，我们只有向苏联学习，以苏联为榜样才有出路。苏联援助、支持我国的革命和建设，向我们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确实起到了积极作用，这是应该肯定的。

大家知道，“向苏联学习”，以苏联为榜样，学习以下主要内容：高度集权化的政治体制、以党治国的体制，有计划按比例的经济体制；行政命令的管理手段，社会主义生产资料的国有化和集体化的所有制形式，以优先高速度发展重工业的工业化道路，以马克

¹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47页

²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81页

³ 《新华月报》1953年第3期

⁴ 《毛泽东思想万岁》1949、10—1957卷，第31页

思列宁主义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文化体制，由共产党绝对领导的军事体制，以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为原则的对外路线等等。苏联 20 年代末到 50 年代初是斯大林统治时期，形成了苏联社会主义国家体制，在当时条件下，这个体制实行国家工业化，农业集体化，有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武装起来的布尔什维克党，由党指挥的苏联武装力量，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党领导下苏联各族人民经过几十年艰辛劳动，使苏联成为世界强国之一，苏联人民在布尔什维克党和斯大林的领导下，击败了法西斯的进攻，取得反法西斯战争的伟大胜利，苏联人民过上幸福的生活。由于苏联的存在、发展和强大，为不发达的国家和地区的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光辉榜样和可依靠的力量。所以中国领导人提出向苏联学习，而且是全盘向苏联学习，当时并没有意识到苏联社会主义有什么弊端。实际上也向苏联学习了不少弊端。后来总结苏联社会主义称谓苏联社会主义模式，或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简称斯大林模式。这个模式包括政治、经济、理论三方面模式。

政治模式包括党的领导体制、政治体制度和政权运行机制的完整体系。国家的权力机构高度集中于党的领导机构，党的领导机构的权力又高度集中于党的中央政治局，而中央政治局的权力又高度集中于总书记（当时斯大林任总书记）手中。这样就形成了党的最高领导人掌握了无限的权力，最终导致个人集权制。这个个人集权制的主要弊端：破坏了民主集中制原则。斯大林统治时期，民主集中制原则逐步为个人集权制所替代，形成党的中央委员会的权力大于党的代表大会，中央政治局的权力大于党的中央委员会，党的总书记的权力大于政治局的权力，这种权力的颠倒，完全破坏了列宁提倡的民主集中制原则，斯大林只强调集中，不讲民主，晚年成为一个独裁者。鼓励个人崇拜。斯大林本人很欣赏、鼓励、提倡、纵容、支持个人崇拜。个人集权制需要人们对他个人崇拜，个人崇拜强化个人集权制，这种互相利用，使个人崇拜达到神化地步。斯大林身边的人出于权力欲、私心欲竭力地美化、神化、吹捧，无原则地歌功颂德。这些歌功颂德的人被斯大林加以重用。削弱中央监察机关的权限。斯大林根据个人集权的需要，逐步缩小、削弱中央监委和地方监委的权限和独立性，把它们逐步演变为附属中央委员会和附属地方各级委员会的一般监察机构。十九大取消了中央监委监督党和中央委员会决议执行情况的权力，只保留了监委检查党员遵守党纪的情况和追究党员违反道德的行为。错误对待党内不同意见，

斯大林把党内不同意见分歧往往看成是阶级斗争或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把持不同意见的人或反对派看成是阶级敌人或阶级敌人在党内的代理人，轻则开除出党或驱逐出境，重则流放或加以肉体消灭。像布哈林、托洛茨基等人就是著名的例子。

经济模式包括经济结构、经济体制和经济运行机制的整个体系。经济结构主要指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形式。斯大林根据政治斗争的需要急于消灭私有制，建立单一纯粹的社会主义经济结构。运用政治模式将工业、商业、银行金融业、运输业等经济命脉和非经济命脉收归国家所有，实现垄断；农业方面，采取专政手段强行推进农业集体化，先消灭富农经济，然后消灭个体农民经济，再将集体农场进一步变成国营农场，这样形成了单一纯粹的社会主义全民和集体所有制。经济体制的特点：国家实行高度集权的决策和指令计划管理。为了保证社会经济机构、生产、管理和分配能够正常运行，采取的主要方法是国家强制、行政命令以及专政手段。在这样经济体制下，国家直接占有全部生产资料，直接组织生产、管理和分配，资金由国家统一划拨，物资由国家统一调拨，物价、费用、工资由国家统一规定，以致家庭、个人消费也纳入国家统一计划之内。总之，一切东西都纳入高度集中的无所不包的计划经济之内，“计划就是法律”。

理论模式指的是斯大林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一整套理论体系，大致包括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理论，优先发展重工业理论，农民农业地位附属、从属观点，社会主义内部积累观点，空地上创造社会主义经济形式理论，社会主义速成理论，阶级斗争日益尖锐化与“大清洗”的理论，阶级斗争扩大到意识形态领域与大批判的理论等等。这套理论体系是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理论的支柱。斯大林的理论体系与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有联系，但更有区别，区别在于斯大林偏离了列宁主义，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而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作了实用化、简单化、庸俗化、绝对化、教条化的曲解和诠释。斯大林的理论模式是斯大林的政治模式与经济模式的反映，又为政治模式、经济模式提供理论根据并服务于政治模式、经济模式。经济模式是政治模式的集中体现并服务于政治模式，而政治模式指导和强化经济模式。总之，它们之间是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相互制约，相互促进，形成一个有机整体。

这个模式既不同于马克思主义所设想的科学社会主义，马克思说，“工人阶级不是要实现什么理想，而只是要解放那些在旧的正

在崩溃的资产阶级社会里孕育着的新社会因素”¹这段话包含两个意思，第一，资产阶级孕育着即资产阶级社会的社会主义的母体，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必然属性发展出来的，不依人们意志为转移。第二“新社会因素”，是指政治上成熟的工人阶级，高度发达的物质生产力，社会化大生产及其科学管理形式，资产阶级创造的民主、科学文化等，可见没有现代资本主义，也就没有现代社会主义，而斯大林抛弃了马克思所说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也不同于列宁晚年所通过新经济政策过渡的社会主义，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其核心是退回到利用商品经济，利用资本主义一切手段来提高生产力，以便挽救社会主义。斯大林抛弃了列宁的新经济政策，而创造了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这是斯大林独创的社会主义模式。

关于斯大林模式，其中有积极因素，也有消极因素，中国人当时向苏联学习，而且是全盘向苏联学习，分不出哪些是积极的，哪些是消极的，照搬、照抄就是了，结果犯了许多错误。我们学习了这个不成功的模式，后因斯大林模式的弊端愈加暴露。毛泽东试图在肯定斯大林模式前提下，走自己的路。所以，我国受斯大林模式的影响是很深远的，不仅在五十年代，就是现今，这种模式的影响依然起作用，随着时间推移，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前进，会消除其影响。邓小平同一位波兰领导人谈话时指出“我们两国原来的政治体制都是从苏联模式来的。看来这个模式在苏联也不是很成功的。”²他同津巴布韦总理穆加贝谈话时指出：“社会主义究竟是什么样子，苏联搞了很多年，也并没有完全搞清楚。可能列宁的思路比较好，搞了个新经济政策，但是后来苏联的模式僵化了。”³从这个评价看出，苏联模式是个不成功的模式，“在这一点上评价斯大林的功与过，完全是‘过大于功’的。”⁴

以苏为鉴，走自己的路。1953年3月5日，斯大林去世，1956年2月，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召开，赫鲁晓夫在大会上作了秘密报告，根据这个报告，大会通过了关于克服斯大林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决议。毛泽东知道“秘密报告”全盘否定斯大林，感到震惊，表明对斯大林问题的看法：“斯大林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列

¹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79页

²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78页

³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39页

⁴ 陆南泉等主编《苏联兴亡史论》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8页

宁主义者。”同时指出：“他骄傲了，不谨慎了，他的思想里产生了主观主义，产生了片面性，对于某些重大问题作出了错误的决定，造成了严重的不良后果。”¹

毛泽东总结教训说：“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过去我们就是鉴于他们的经验教训，少走了一些弯路，现在当然更要引以为戒。”²在这里，毛泽东既在总结学习苏联的教训，又在开始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这是一个良好的开端。

斯大林错误被揭发半年后，“匈牙利事件”发生。1956年12月29日，《人民日报》编辑部发表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讨论写成的文章：《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文章对斯大林的功过作了全面的评述：“斯大林在苏联的内外政策方面都犯了一些严重的错误”，“这种错误，特别明显地表现在肃清反革命的问题上和对某些外国的关系问题上”，“我们在总结斯大林的全部思想和活动的时候，必须同时看到他的正面和反面，他的功绩和错误”，“我们认为，斯大林的错误同他的成绩比较起来，只居于第二位的地位”。³

1957年1月，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中，批评了斯大林的形而上学的观点，说：“斯大林有许多形而上学，并且教会许多人搞形而上学。他在《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明教程》中讲，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有四个基本特征。他第一条讲事物的联系，好像无缘无故什么东西都是联系的。究竟是什么东西联系呢，就是对立的两个侧面的联系。各种事物都有对立的两个侧面。他第四条讲事物的内在矛盾，也只讲对立面的斗争，不讲对立面的统一。按照对立统一这个辩证法的根本规律，对立面是斗争的，又是统一的，是互相排斥的，又是互相联系的，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的”。又批评《简明哲学辞典》第四版关于同一性的条目，就反映了斯大林的观点，《辞典》说，‘象战争与和平，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生与死等等现象，不能是同一的，因为它们是根本对立和互相排斥的’。这就是说，这些根本对立的现像，没有马克思主义的同一性，它们只是在相互排斥，不互相联结，不能在一定的条件下

¹ 《人民日报》1956年4月5日

²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67页

³ 《人民日报》1956年12月29日

互相转化。这样说法，是根本错误的。”“对立面的这种斗争和统一，斯大林就联系不起来。苏联一些人的思想就是形而上学，就是那么硬化，要么这样，要么那样，不承认对立统一。因此，在政治上就犯错误。”¹在这里，毛泽东清算了斯大林等人哲学上的形而上学观点，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的哲学观点。这是中国共产党人自接受斯大林的形而上学观点以来，公开批评斯大林的观点。

1957年3月17日，毛泽东在《天津市党员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谈到斯大林“有教条主义，他这个教条主义影响中国，使得我们一个时期革命就是失败。如果照他的办，后头的革命也办不成。”又说“我们现在提的口号是学习苏联先进经验，没有讲要学习他的落后经验，那一天提出这样的口号呢？但是虽然没有提，有那么一些东西跟着搬过来了，在最后七年里头，但是大体上说，我们不算是完全不加选择，这就是硬搬，因为我们曾经对教条主义有所批评，而教条主义的来源来自斯大林。”²

尽管毛泽东对斯大林的错误和哲学上的形而上学观点以及教条主义的批评，是在肯定、维护和顾全大局的条件下进行的，总算有个良好的开端。在毛泽东的带头批评下，到1957年鸣放时期，社会上的人们对苏联、斯大林的某些政策和做法提出了意见，对匈牙利事件、铁托等提出些不同看法。

(1) 对向苏联学习感到怀疑。有人说，苏联教条主义很严重，在中国的苏联专家都是如此，对苏联专家讲课内容怀疑起来，苏联专家并不比中国专家强。

(2) 对斯大林错误提意见。有人说斯大林犯错误的原因是他骄傲了。但是他破坏法制进行独裁，进行疯狂的屠杀的保证又是什么呢？无论苏联共产党，还是中国共产党，都未能给出令人满意的答复，因为他们都有统治者的共同弱点，他们害怕说出问题的原因是由于共产党对国家政权的绝对控制，国家权力的高度集中，正是由于这种高度集中的权力，才使斯大林在后期可以胆大妄为，犯出一切错误。有人说苏联共产党内的斗争是争夺权力的斗争，党中央那些人都是拍马屁，为什么斯大林犯错误当时不敢揭发呢？有人说，苏联人民对苏联共产党可能发生的错误领导丧失了任何警惕性，认

¹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47—348页

² 《毛泽东思想万岁》1949—1957卷，第190页

为斯大林就是一切，再加上苏联政治制度本身重大的缺陷，这点起了重大作用。有人提出，斯大林的错误应该从社会制度中去找根源，不是整个社会主义制度问题，也不是个别环节的问题，而是应到具体制度中找错误原因。

(3) 斯大林的教条主义，有人说中国肃反的指导理论是斯大林的阶级斗争日益尖锐化的公式，北大副教务长张仲纯的肃反动员员报告说：过渡时期阶级斗争尖锐化、深刻化、复杂化，从理论上苏共的历史上确实如此。有人说，拿肃反运动来讲，我觉得这是生硬地抄用苏联老大哥的错误经验的结果，犯了极端教条主义的结果。有人说，苏联的自然科学，因为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不直接，发展很快。而社会科学只是给马、恩、列、斯的著作做注解，所以也就没有发展。有人说，在所谓反修正主义的光辉标志方面：列宁主义上罩上了斯大林主义之阴影，在胜利后的苏联，也就逐渐形成教条主义的中心，再加上斯大林的个人作用，教条主义达到登峰造极。

(4) 苏联与兄弟国家的关系，有人批评说，不少人对苏联在对待兄弟国家关系有怀疑，认为苏联存在大国沙文主义，二战后，把波兰东部的加里宁格勒一带划归苏联是不对的。有人说“乌克兰并入苏联是不是大俄罗斯主义，是不是民族平等呢。有学生说，斯大林表面大公无私，对波兰暗中取利（指煤价问题），因之怀疑中苏贸易是否公平

(5) 对波匈事件的看法，有人说，苏联第一次出兵匈牙利不明智，第二次出兵匈牙利没有国际法的根据，所以在联合国很狼狈。有人问，侵略的定义是什么？苏联出兵匈牙利算不算侵略，用武装改变了一个国家的基本政治态度谓之干涉，苏联不出兵，匈牙利政治格局可能会改变，故是干涉。有学生说，匈牙利事件至少表现了匈牙利青年、大学生能够参预国家政治生活，这是好，……我们的示威游行等总是领导给安排好自上而下的，没有自下而上起来的，这不正常。有个别团员欣赏波匈事件说，波匈不只是以批评作武器，而且拿起武器来批评了。有人认为，中国人没有民主传统，给一点民主也就满意，真差劲。而东欧人民就是不满意嘛！中国人只要有饭吃就满意了，不要求很多民主，所以，中国没有出乱子并不能说明中国比匈牙利民主多。还有民革中央副主席龙云对苏联在抗美援朝

朝等问题提出意见。¹

上述是人们对苏联党和政府的政策，对斯大林的教条主义，对东欧兄弟党国家的关系等等提出的意见、疑问和怀疑等，实际上是沿着毛泽东早已对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对斯大林的错误以及向苏联学习提出的批评和建议深化了一步。在反右期间，毛泽东在《正处》公开发表时，增加了区分香花和毒草的六条政治标准，其中第六条说：“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国际团结和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国际团结，而不是有损于这个团结。”²拿这条标准去衡量上述人们的意见，当然触犯了标准。所以，许多人被打成右派分子。可是此前毛泽东对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对斯大林的错误和观点进行了一系列批评时，广大干部党员和知识分子以及大学生，都受到启发和鼓舞，因而在鸣放初期，在毛泽东亲自动员号召下，民主人士、知识分子以及大学生才学着毛泽东批评斯大林的错误，批评苏联对我国和兄弟党的政策以及批评在斯大林错误影响下产生的各种各样的错误。结果，毛泽东批评斯大林没有问题，而学着毛泽东批评斯大林、苏联及其对外政策的人都成了问题，其中有许多提出意见的人被打成右派分子。这只能说明领导者对问题采取了双重标准。

总之，毛泽东提出以俄为师，走俄国的路，最终使中国民主革命取得胜利。提出向苏联学习，使中国建设取得不少成绩，提出以苏为鉴，走自己的路，使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进行新的探索，但因种种原因，未能继续下去。依然回到苏联社会主义模式老路上去。尽管毛泽东批评了斯大林的教条主义、形而上学观点以及斯大林的错误，这些批评是在肯定斯大林是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是功大于过而不知不觉犯了错误前提下进行的，却没有意识到斯大林的教条主义对中国党及其干部的深刻影响，特别是斯大林的阶级斗争日益尖锐化理论，以及把阶级斗争引入到意识形态领域内的实践，这两者对毛泽东本人，对党员干部，党内知识分子以及党外知识分子，甚至大学生都影响至深。这种影响，在整风反右期间更为明显、直接和突出。因此，受斯大林教条主义影响就成为反右派斗争犯错误的最重要外部根源之一。根据毛泽东所教导的，外因要通过内因才能起作用的原理，所以犯错误的原因还是内因起了

¹ 参见《北京大学右派分子反动言论汇集》1957年，北京大学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委员会编印

²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93页

决定作用。

马克思列宁主义被教条化。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就指导中国革命，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产生了毛泽东思想，在这个结合过程中，既反对教条主义，又反对经验主义，主要是反对教条主义，最后形成了中国化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即毛泽东思想。由它指导中国革命，终于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成为国家指导思想，成为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建国后，由于全盘照搬苏联模式，这是一个已经僵化、教条化的模式，运用到中国，使马克思列宁主义更加僵化和教条化。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地位的变化。马克思主义主要是通过俄国、日本传入中国。当时中国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由军阀统治中国，他们视马克思主义为洪水猛兽，对传播、信仰它的共产党人及其同情者，发现后，轻则坐牢，重则杀头，传播完全处于半合法状态。自从共产党开辟了革命根据地，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成为合法，并指导中国革命。从此，马克思主义随着革命的发展而扩大传播，随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新中国成立，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从局部合法走向到全国合法，并定为国家的指导思想、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上升为国家的指导思想、占统治地位的简略轨迹。

传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实际上是列宁化、斯大林化了的马克思主义，特别是斯大林化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其中存在着教条主义东西（前面叙述，不重复）。毛泽东在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到中国革命时，花了很大精力反对教条主义，其中包括共产国际中的、斯大林的教条主义。更主要是反对中国党内的教条主义，最终形成毛泽东思想。

自从新中国成立后，由中国共产党执掌政权，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定为国家的指导思想，成为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党和国家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制定革命和建设的方针、政策指导实践。众所周知，马克思、恩格斯所设定的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产物，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结果。在科学的社会主义社会里，不存在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社会主义革命将它们消灭了。而俄国取得社会主义革命成功后，还不能立刻消灭资产阶级、资本主义，所以，列宁采取新经济政策，让资产阶级存在一个时期，利用资本主义提高生产力。这主要是俄国

经济落后，资本主义还不发达。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成功后，更要让有利于国计民生的资本主义发展一个时期，这是因为中国资本主义更不发达的缘故。俄国采取新经济政策不久，斯大林运用政权手段结束了新经济政策，转到消灭富农经济的政策，实行社会主义农业集体化，实行超速度发展工业化。中国向苏联学习，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向斯大林请教，根据国内外阶级斗争形势，制定过渡时期总路线。党和国家运用行政手段，在短短三年期间，完成了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了农业、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让资本主义绝种，让小生产也绝种，过渡到社会主义国有制和集体所有制。虽然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取得了成绩，但留下后遗症。本来，毛泽东对有利于国计民生的资本主义和民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有一套正确的方针、政策。由于受到斯大林教条主义的影响，照抄照搬苏联模式和经验；由于急功近利、急于求成、趁热打铁、只争朝夕的不断革命良好愿望等因素，促使毛泽东犯了教条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的“左”倾错误。

由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地位的变化，已成为国家的指导思想，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具有极大权威性，人们只能遵守，不敢轻举妄动，不敢越雷池一步，只讲坚持，只能解说和维护，不敢探讨、发挥以及发展，如果说探讨、发挥和发展，那是毛泽东的事，普通人只要照本去宣科就可以了。新中国成立后，党中央发出指示，掀起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高潮，出版发行大量的经典著作及其辅导书籍，由专家、学者解说《实践论》、《矛盾论》及其他，以及学习经典著作的心得、体会的著作和文章等。这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传播、普及理解和提高起到了积极作用。可是，当时的专家、学者所宣传的著作基本上是斯大林的著作，最主要的著作是《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由苏联哲学家米丁等人根据《教程》中的四章二节编写的《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四卷中译本，以及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艾思奇等指定斯大林著作要人们必须阅读，还说，要学好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斯大林著作和中国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泽东著作，特别是《实践论》、《矛盾论》。五十年代的人们所接受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其中有不少是教条主义东西，也都接受过来了，而且是当作马克思列宁主义全盘接受过来。实际上，斯大林著作大都是三十年代至五十年代前后写成的，是当时政治斗争的需要，毛泽东著作也是为了反对党内各种不良倾向写成的，都具有时代局限性。到

了五十年代后期，有些原理或个别结论不一定适应新时代的需要，如果生搬硬套就可能出现某些保守、僵化、教条化现象，如果指导实践，就可能犯教条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的“左”倾错误。

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成为国家的指导思想、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为了占领、巩固在国家、人们思想中的阵地，必须批判非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首当其冲的是批判封建反动思想、资产阶级腐朽思想，而封建主义思想在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应是被消灭的对象，但中国有几千年的封建主义专制思想传统，中国资本主义没有得到应有的发展，不可能去清算封建主义。新中国成立后，进行几次批判，其目的是用笔杆子来占领无产阶级思想阵地，从意识形态领域巩固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阵地，为巩固新生的政权服务。像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中，批判封建主义思想，批判梁漱溟的反动思想中批判封建主义思想。接着批判的资产阶级腐朽思想、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以及崇洋媚外的洋奴思想等，以后更多的是批判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思想。凡是被批判、被改造的对象，一律都要写自我检查、检讨，其标准是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来衡量来裁判，而执行这个标准和裁判的人是共产党的各级领导人，他们的理论水平不同、综合素质的差异，掌握裁判的标准也就各异。这样就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当做整人、打人的棍子，这也成为犯严重错误的重要根源之一。

教条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中的表现。新中国成立后，号召向苏联学习，在当时条件下是一种别无选择的道路。但在学习过程中出现教条主义倾向，特别在意识形态领域里更加突出。教育界学习苏联教育模式是最积极的领域。自五十年代初开始，党中央发起思想改造运动，批判电影《武训传》，并涉及陶行知的教育理论，这两次知识分子被改造、被批判运动为教育领域学习苏联教育模式奠定了基础，扫清了障碍。1952年6月开始全国大专院系调整，到1953年调整完成。这样中国的高等教育转向苏联式的教育模式。时任教育部党组书记、副部长钱俊瑞主张，学习苏联要“一板一眼的学”，在另一次会议上说“学习苏联就要教条的学”。就这样在教育改革中照抄照搬苏联的教育模式、教学模式、教学管理模式，采用苏联教材、教学法和考试方法等等。这种学习苏联教育模式的做法，脱离中国教育实际，教条主义非常严重。

笔者是1952年暑假时从武汉大学哲学系调整到北京大学哲学系，领导号召要向苏联学习，认为苏联在教学建设上，建立了不同

于西方的一套教育模式，在学习苏联过程中，实际上完全是照抄照搬苏联教育模式。具体说来，调整后的北大哲学系，西方教材一概被否定不用了，采用的教材全是苏联教材，像马克思主义基础课，采用《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马克思主义哲学课，采用斯大林《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逻辑学课，采用斯特罗果维契的《形式逻辑》，西方哲学史课，采用亚力山德洛夫主编《西欧哲学史》，由苏联专家亲自讲授，还采用列昂节夫《政治经济学》，叶菲莫夫《世界近代史教程》，生物学主要讲米丘林学说，心理学讲巴甫洛夫《高级神经活动学说》。指定参考书是苏联出版的马列经典著作，主要是列宁斯大林著作。不分必修课和选修课，专业课学习为一年、二年，为了更好学习苏联，老师、学生一律必修俄语，为译教材和听苏联专家讲课服务。院系调整后的北大哲学系，集中全国哲学精英、著名哲学家、哲学史家、逻辑学家、美学家、心理学家等，但他们大都不担任教学任务，主要学习马克思主义著作来指导对所学的专业进行改造。1952年院系调整后的我班学生，没能聆听到著名哲学家金岳霖、贺麟、郑昕等先生的讲授是一件憾事。当时认为他们都是唯心主义哲学家，正在学习、改造中，讲授条件还不成熟，他们从事些学术研究，即使有成果，也不敢公开发表，一旦发表，轻则当作唯心主义来批判（像对冯友兰先生批判），重则扣上反动宣传的帽子，所以，当时的老专家、老教师处境左右为难，心情不可能舒畅（当时不敢释放）。按苏联模式教学，哲学系教授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教师不够，本科生的教学请年轻党员教师或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班速成学员担任，他们也才接受马克思主义不久，走上课堂，按苏联教材照本宣科，然后进行课堂讨论或进行辅导。这种教学质量可想而知。中国哲学史课虽然由著名哲学家冯友兰先生、张岱年先生讲授，但也受斯大林、日丹诺夫哲学史观的影响。这从一个小小的系便可见当时的一般了。

心理学也学习苏联，著名心理学家高觉敷教授在题为《我是怎样批判资产阶级的心理学，开始学习苏联心理学的》文章中写道：“感谢党的教育使我从唯心论心理学的泥坑中救出来，开始认真学习苏联心理学。我深切地体会到苏联科学不是在科学本身内所可能学得好的；必须首先通过政治活动和政治理论的学习改变立场，由资产阶级立场转向于无产阶级的立场；其次必须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辩证唯物论和毛泽东思想，因为苏联科学是建立在辩证唯物论的基础之上的；第三就我们心理学而言，还必须钻研巴甫洛夫的高级

神经活动学说。”¹这种让自然科学家向苏联学习来转变政治立场，接受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导，用苏联巴甫洛夫学说来改造心理学说，是典型地受苏联教条主义的影响，是盲目照抄照搬苏联教育模式的表现。

在学习苏联过程中，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时把社会学系取消了，许多从事社会学专业的人都改行了。像知名学者、专家费孝通、吴文藻、李景汉、吴景超等去政府、高校任职、任教，普通学者就改为其他工作。

专家们、教师们意识到学习苏联教育模式中存在的要害问题，调整后的大学教学质量普遍下降；否定旧中国的高等教育；错误地对待资产阶级科学文化即否定资产阶级科学文化；否定从旧社会过来的老教授、老专家，他们成为被改造的对象，有的被养起来，有的边改造边学习，以便为人民服务。时任华中工学院副院长刘乾才的说法颇有代表性：“在学习苏联的问题上，高等教育都是主观主义加教条主义，再加宗派主义，三样俱全”。“我们学习苏联，许多是生搬硬套，甚至只凭想像”，“有一个时候，曾经这样强调，‘百分之百学习苏联’，‘不折不扣学习苏联’……而我们却不结合实际，闭着眼睛乱搬乱学”。刘乾才批评说，“自然科学本身，本没有阶级性，只要是好的技术、好的理论，不管是哪一国的，照理说，都应该学。可是过去高教部为了强调学习苏联，对于资本主义国家的东西，一概加以否定，好像只要是苏联的，就是好的，就是先进的；只要是资本主义国家的，就都是不好的，都不能学……这是什么东西在作怪，不是别的，是严重的宗派主义情绪。”刘颖副教务长说，“学习苏联经验，结合中国实际，贯彻执行起来却只抓了上半截，忘记了下半截。所谓学习苏联经验，几乎就是盲目抄袭。‘六节一贯制’搬来了，‘五分制’搬来了，‘工作量制度’搬来了，‘理工分家’搬来了”。“他们的讲课、习题课、毕业设计口试、五分制等等，都是沙俄时代留下来的。他们改了几十年，实际上只改了几点：加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领导，把过去不固定的考试、实习固定下来了，还有，加了一些专门化课程，如此而已。可是我们呢，几乎把过去自己的一切全盘否定了，一刀两断，一切从头搞起。说到过去的，不分青红皂白，一切都是落后的，都是资

¹《光明日报》1953年8月24日

产阶级性质的。”¹一些学者还提出要重新确定综合大学的地位，学习苏联要同中国实际情况相结合，要正确对待资产阶级的科学文化，要正确对待老教授、老专家等。

总之，在学习苏联过程中，文艺界、史学界、法学界等等都出现过教条主义现象。不再一一叙述了。

冲破教条主义的束缚。自苏联共产党二十次代表大会上，揭露了斯大林统治时期的严重错误，暴露了苏联模式的缺点和错误，1956年4月，毛泽东总结学习苏联的经验教训，提出以苏为鉴走自己的路方针，又正式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时任主管意识形态的书记、中宣宣传部部长陆定一深刻全面阐明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精神，党中央召开了知识分子会议，号召“向科学进军”，1957年2月，毛泽东作了《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讲话》，4月30日亲自号召党外人士帮助共产党整风，5月14日上海《解放日报》以《大胆揭露矛盾，帮助党内整风》为题，刊登“三害”的危害，毛泽东作出：“不整风党就毁了”的批示。陆定一在“双百”方针讲话中批评了乱贴阶级标签的错误作法；他说：“在某一种医学学说上、生物学或其他自然科学的学说上，贴上什么‘封建’、‘资本主义’、‘社会主义’、‘无产阶级’、‘资产阶级’之类的阶级标签，例如说什么‘中医是封建医，西医是资本主义医’、‘巴甫洛夫的学说是社会主义的’、‘米丘林的学说是社会主义的’、‘孟德尔——摩尔根的遗传学说是资本主义的’之类，就是错误的”，又批评说，“在学习苏联的时候，我们学习方法必须不是教条主义的机械搬运，而是要结合我们的实际情况。这一点必须引起注意。”²

自从毛泽东正式提出“双百”方针和陆定一诠释“双百”方针讲话后，初期的鸣放开始了。1956年8月召开青岛遗传学会议，在会上，时任中宣部科学处处长于光远在会议开始时讲话，宣布全部摘掉过去强加给摩尔根学派的一切政治帽子。以此为开端，“双百”方针进入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文学艺术等领域。

1956年10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北大哲学系主任郑昕先生写的《开放唯心主义》文章，他说：“自由是改造的起点。只许批判，不许辩护，就很难使人心服。不能心服的拥护和不能心服的

¹ 引自《光明日报》1957年5月19日

² 《人民日报》1956年6月13日

批判，都是不彻底的、表面的，尽管唯心主义是不正确的，但容许有辩护唯心主义的自由，就是激发一个有唯心主义思想的人，乐于改造自己和批判自己的唯心主义，逐渐走上唯物主义的道路。”¹10月23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冯友兰先生写的《关于中国哲学史研究的两个问题》文章。他说：“我们近年来的哲学史工作大概用的是形而上学唯物主义的方法，把哲学史中的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斗争简单化、庸俗化了，使本来内容丰富的哲学史变成贫乏、死板。”²郑昕、冯友兰两位先生的文章是向苏联教条主义和中国教条主义学习苏联提出的批评，他们是从自我改造和自我批判的角度来参加争鸣的。即使如此，以后还是受到批判。可见，中国受教条主义荼毒之深之烈。

社会学家吴景超看到1956年10月19日的《真理报》上，刊登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费多谢耶夫参加国际社会学学会第三次会议所写的文章，在文章末尾指出：“西方国家的社会学者，发表了大量的关于劳动、文化、生活、家庭、道德、都市与乡村等问题的文献，但是这些材料，在苏联及人民民主国家中，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这一缺点，应当很快地加以矫正。”当时正是鸣放初期，吴景超先生受到上述启示，在1957年第一期《新建设》杂志上发表《社会学在新中国还有地位吗？》的短文，提出初步意见：“社会学原理及近代社会学思潮这些课程，是旧社会学的核心部分。它是历史唯物论的对立物。资产阶级的学者，以社会学的理论来与马克思主义进行对抗……但是，在百家争鸣的时代，我认为在我国的哲学系中，还有设立社会学一门课程的必要。在这一门课程中，可以利用历史唯物论的原理，对于资产阶级社会学进行系统的批判，同时也尽量吸收其中的一些合理部分，来丰富历史唯物论。”³从这里，可以看出，吴景超先生的意见还是从批判中、从丰富历史唯物论角度来要求给社会学以应有地位的。

自“百花齐放”口号提出后，文艺界思想很活跃。青年作家思想较为解放，率先向教条主义冲击的有刘宾雁和王蒙。在《人民文学》1956年4月发表刘宾雁的报告文学《在桥梁工地上》，6月发表短篇小说《本报内部消息》。这两部作品，冲破了当时文艺创作模式

¹ 《人民日报》1956年10月8日

² 《人民日报》1956年10月23日

³ 《社会学在新中国还有地位吗？》，《新建设》1957年第一期

要写本质、写光明、写进步、写先进人物的框框，刻画了一个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停止不前的个人主义和保守主义者的形象，揭露了现实生活中先进与落后的斗争的真实矛盾。王蒙在1956年9月《人民文学》杂志上发表短篇小说《组织部新来的年青人》。该作品更大胆、更尖锐地揭露了党的机关中存在的官僚主义现象。王蒙的《组织部新来的年青人》在讨论中受到批评。1957年1月，毛泽东说，“小说揭发官僚主义，很好，揭发得不深刻，但很好”。又说：“王蒙的小说有小资产阶级思想，他的经验也还不够，但他是新生力量，要保护，批评他的文章没有保护之意。”再说：“王蒙很有希望，新生力量，有文才的人难得。”¹由于毛泽东表态，王蒙暂时渡过了批评关。

整风开始后，逐渐形成鸣放高潮，这时知识分子给教条主义提意见更加尖锐。光明日报记者徐颖报道说：“许多教授抨击了人民大学的教条主义。新闻系许孟雄教授说：人民大学不像个学校，倒像个教条主义的大蜂窝。培养出来的蜂不是去采蜜的，却是去散布毒素的，并且散布得很广。他说，学习任何外国先进的东西都是对的，但是必须注意到外国的东西有它自己的特定的历史背景，搬到中国来，就必须把这些理论和中国的实际结合起来。可是我们的学生学习马克思主义，只是学着背这些条文，却没有教他们注意联系实际。而更严重的是，学校领导把背条文背得最熟的人，看成是优秀学生、积极分子，于是，教条主义者便成了天之骄子，这对青年教师，对青年学生，有什么好处呢？如果说人民大学有功的话，就是散布了教条主义，这种功继续下去，就会变成罪了。”²林希翎说：“有人说，人民大学是教条主义大蜂窝，我看是教条主义策源地、大本营，苏联是教条主义策源地，老师讲课就像个打字机，苏联医学就未超过中国的协和，组织疗法害人不浅，无痛分娩法现在也不用了。”³

在经济学方面，北京大学经济系教授陈振汉等提出了《我们对于当前经济科学工作的一些意见》，其中对教条主义现象的意见如下：

(1) 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批判接受问题：虽然现在有人提出开放

¹ 《毛泽东思想万岁》1949、10—1957卷，第141、142、146页

² 《光明日报》1957年5月25日

³ 《批判右派分子林希翎等论文集》中国青年出版社1957年版，第50页

唯心主义的说法，事实上一般的了解是为了更有效的批判。在经济学界我们也已开始做了一点介绍资产阶级重要经济学说像凯恩斯经济学说的工作，也只是为了了解和批判，而没有人提出来从这些东西里面是否也能吸取一些有用的概念或分析方法呢？例如凯恩斯的“乘数论”只是一种数字概念，是否也可以用来分析我们的投资效果的呢？又如资产阶级经济学中所常用的“边际观念”，作为一种分析工具是否也有它的用处呢？特别是像统计学这样的一门方法科学，对于社会现象的科学研究具有普遍的重要性，但现在我们资产阶级统计学里面的许多方法概念，像选择理论，常态曲线，时间数列，和相关系数等等，我们感觉可以同样应用来分析我们社会经济现象的，但被一概摒诸统计领域之外，而我们所学所教的统计成为除了加减乘除与简单平均数以外，毫无其他内容，因之极端枯燥简单和贫乏的东西，是否是我们过分夸大了有些学问的阶级性甚至对有些东西[不懂]并不了解也没有接触但要是资产阶级的便有草木皆兵之感而碰一切学问在未加接触之前就有“草木皆兵”之感而一笔抹煞呢？

(2) 如何对待经典著作问题：现在的风气是经典著作上的一字一句都是金科玉律，只能引证训诂，逐字逐句转述背诵，或者注释训诂，甚至连手工排校的错误或翻译上的错误[都]诘屈聱牙的英语译文也神而敬之的在那里体会“精神实质”。我们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切经典著作毫无疑问是应该严肃认真地学习，但其目的在于懂得经典作家们的思想、观点和方法，而不是字句，掌握这些著作中的本质的东西，而不是他们的枝叶。可是许多经典著作写作于百年以前，对于百年来的事物只能预见其大，不能洞烛几微，只能预见趋势，不能先卜年月时地，十月革命爆发于工业落后的俄罗斯不就是显例吗？可是我们从未有人怀疑马克思和列宁都是著作等身，而且马克思的许多著作都是出版于身后，又怎能保其每字每句都是珠玉呢？然而在我们这里多少年来又有谁敢公开提出关于“绝对贫困论”的怀疑？

不仅思想内容和概念方法方面如此，即是在阐述说明问题的体例形式我们也不能加以丝毫变动。例如现在政治经济学教学中关于资本主义部分的讲授大纲，完全是抄袭资本论的体例，而且一般还认为这一部分是整个全部政治经济学里面体例最完整的部分，但是我们经常感觉这样一种从完全抽象商品二重性的概念开始的体例是和我们从具体到抽象的认识过程相反颠倒的，事实上对于教师和学

习这开宗明义第一章无异当头闷棍，有的人甚至就此终生被这一关挡住在政治经济科学的门外。然而直到今天又有谁会想到变动一下我们教科书中资本主义部分的体例呢？

(3) 创造性地发展马列主义和修正主义间的界限问题：由于我们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著作看成了僵化的文字，我们也惯于对任何不同经典著作文字的说法扣上修正主义的帽子。但另一方面，我们当然也都知道马克思列宁主义并非[停止在]及马克思列宁之身而止，而是在继续发展和丰富中的。因此究竟怎样才算发展，怎样又是修正主义的泥淖，在概念上容易划分界限，到了具体问题往往易于混淆。结果，为了省事，为了安全，为了避免修正主义这样可怕的名声，谁也不愿多惹是非，这就堵住了经济科学上的任何创造性发展的可能而助长教条主义的气焰。¹这是对经济科学工作中的教条主义致命的一击。

在历史学方面，南开大学历史系教授雷海宗作了批评马克思主义过时、停滞的讲话，他说“对马克思和恩格斯树立的新的社会科学的看法，大家在理论上是一致的，承认马列主义应该发展，可是实际上是停止了发展，还停留在恩格斯死时 1895 年的地方。1895 年以后，列宁斯大林在个别问题上有了新的提法，但他们主要谈当前革命问题。从了解整理几千年来人类历史经验，建立新的社会科学来说，基本上停留在 1895 年。教条主义者就是这样。马克思恩格斯生平也是经常修改他们的学说，他们注意到当时每个社会科学部门的发展情况，掌握科学研究的材料和成果。可是以后人们就认为他们已解决了一切问题，社会科学不能再发展了。事实上并不如此。1895 年以后社会科学上新材料很多，对旧材料有很多新的认识。我们今天的任务，就是要把 1895 年到今天六十二年的课补上。这不是那一个个人的问题，而是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问题，工作艰巨得很。……另外历史问题，如希腊史，六十二年来发现了好多材料，1890 年在埃及发现的雅典宪法，可以说明好多问题。这本书恩格斯未看到，他如果看到，他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在有些问题的提法上就会不同。社会科学是需要不断发展的；在理论上大家都这样说，在实践上却认为社会科学是停留在 1895 年的了。……我们要体会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问题的方法，而不是光揣摩他们的结论。马克思恩格斯是掌握六十二年前的材料做出的结论，

¹ 《经济研究》1957 年第 5 期，第 128 页

如果他们掌握了今天的材料，就会另作结论。如果拿六十二年前马恩研究希腊史时的结论来解决中国古代史问题，这当然解决不了问题，而只会把问题搞得越来越糊涂。”¹这个讲话是对史学界包括马哲史的教条主义猛烈的冲击。

民盟科学规划问题临时研究组建议，其中要重视社会科学，建议如下：“在我国目前情况下社会科学可以比自然科学放轻一些，但是社会科学并不是不重要，也应该有相当的发展。”“要发展社会科学，首先要改变对待旧社会科学的态度。有人认为资产阶级社会里没有社会科学可言，因为那些过去被称为‘社会学’的东西都是不科学的。社会主义社会里的社会科学要从头创造，没有可继承的。对于资产阶级社会科学只有批判，谈不到接受。对旧社会科学不是改造，而是取消。因此，解放以来，过去研究资本主义国家社会科学的人，在情绪上受到了一定的影响，某些学科解放后竟被废除，或不成为独立科学。过去研究社会学、政治学和法律的人很多转业了。过去许多课程因为苏联没有就被取消了。有些课程比如研究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情况、政治制度、国际关系，国际法等本来就是政治学系的主要课程，但至今未受到应有的重视。这些做法我们认为是不妥当的。对待旧社会科学应当是改造而不是取消，因此应当恢复的应该采取适当步骤予以恢复，应当重视的就应重视起来。

在社会科学方面的另一偏向是往往把政策措施或政府法令当做客观规律。例如，有些财经上的重要政策问题，如果政府部门的负责人作过报告，学者们也只能作些宣传解释工作，这样是不够妥当的。开国以来，在政法、财经等方面所采取的方针政策，基本上是正确的，但也不能说每一措施、每一个阶段或者每一环节都是毫无缺点的。我们认为应该鼓励社会科学研究工作者重视调查研究工作，根据实事求是的精神，对政策法规提供意见，政府部门应该主动将有关资料尽量供给有关的社会科学研究工作者，并帮助他们创造研究工作的条件。只有这样，社会科学研究工作才能与实际相联系，才能克服目前理论落后于实际需要的状态。”²这是继吴景超等人提出恢复社会学以后，又一次建议要恢复以前被取消和不重视的社会科学，而且还要发展社会科学。这是对过去学习苏联、照搬苏联教育模式的全面冲击，也是对教条主义现象、教条主义者的全面冲击。

¹ 《人民日报》1957年4月22日

² 《光明日报》，1957年6月9日

正在向教条主义冲击的时候，5月15日，毛泽东《在事情正在起变化》党内文件指出“几个月以来，人们都在批判教条主义，却放过了修正主义”。“有些被攻击的‘教条主义’，实际上是马克思主义。”又提出“批评教条主义的有各种人。有共产党人——马克思主义者。有括弧里面的‘共产党人’，即共产党的右派——修正主义者。有社会上的左派、中间派和右派。”¹这里是指示党内高干放弃批左的教条主义，下决心反右。待1957年6月8日，毛泽东正式发动向右派反击了，领导当局为了取得“左”倾教条主义者的支持，对上述给教条主义现象、教条主义者提出意见的人进行严厉的批评、批判，大部分人被打成右派分子。

总之，自向苏联学习，受斯大林教条主义的影响后，学习中出现的教条主义现象，毛泽东总结苏联建设社会主义中出现的错误，带头批判苏联的教条主义现象，提出以苏为鉴，走自己的路方针，以后提“双百方针”，号召知识分子鸣放，知识分子响应号召，给教条主义现象提意见，向教条主义冲击，结果，风头一转，从批教条主义转向批修正主义，实为向所谓的右派发起进攻。当时响应毛泽东号召给教条主义提意见、提建议的包括知名学者、专家在内的知识分子，反而以反苏、反马克思主义（实为反教条主义）的罪名被打成为右派分子。这样，摆脱斯大林教条主义的影响，反对教条主义学习苏联，冲破教条主义的束缚却成为右派分子的一大罪状，同时，也成为毛泽东及支持者犯反右派斗争严重错误的一个重要外部根源。

三、受封建主义的影响

中国自周秦以来，长达二千多年的封建专制主义社会，政治上皇帝至高无上，实行绝对专制统治，臣民绝对顺从和服从皇帝的意志，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朕即国家”的一人的天下，或家天下。在经济上小农占主导地位，造就家长制作风。在思想文化上实行愚民政策，大兴文字狱，以皇帝的是非为是非。进入近代以来，由于救亡压倒启蒙，封建专制主义并没有得到彻底地清算，反而根深蒂固的保存下来，并进入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社会。封建专制主义、封建宗法意识、小农意识仍然在社会生活中产生影响。

小生产者意识的影响。建国前后，中国社会的经济是小农经济，

¹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23—424页

它的基本结构是农业、家庭手工业和家庭畜牧业结合在一起的经济结构，其基本特征：主要是在一位有经验的家长主持下，使用自己的生产资料、生活资料，进行生产，达到自给自足，只有很少资料在狭小范围内进行产品交换，或少量商品交换，交换的目的只是满足生产、生活的直接需要。这样与家长制分不开的经济结构，反映在小生产者的头脑里，就形成他们的保守性、封闭性等观念，由此派生出狭隘性、宗派性等劣根性。由于小农经济长期存在，长期运行，反映它的一套观念长期不断积累，沉淀，形成一种习惯势力，一旦形成习惯势力，就成为一种可怕的势力，要想克服、改变是很不容易的，它是根深蒂固的。

众所周知，中国民主革命的主力军，主要是来自农民、小生产者。由于历史原因，他们在建设祖国方面，还要有一个适应过程，正像毛泽东在建国前夕，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指出：“严重的经济建设任务摆在我们面前。我们熟悉的东西有些快要闲起来了，我们不熟悉的东西正在强迫我们去做。”“我们必须学会自己不懂的东西。我们必须向一切内行的人们（不管什么人）学经济工作。”“不懂就是不懂，不要装懂。不要摆官僚架子。”¹这个指示绝大多数工农兵干部都认真执行。但是，由于革命的性质、任务，规定选择干部大都从工人、农民中选拔、任免，新老干部中，工农出身的干部占干部比重高于非工农出身干部比重，就是说干部结构中，工农干部比例较大。新中国成立后，大多数工农出身的干部，在知识分子面前，既自卑又不服气，表现上是自贬，实际上是自傲，自认为“天下是老子打下来的”，用你们这些知识分子，不过是坐享现成罢了。工农干部对知识分子的一些习惯、语言、作风都看不惯，感觉知识分子是异己力量。而知识分子在共产党面前有“自愧不如”的情绪，有自卑感的心理，对共产党的那大套理论方针、政策往往觉得不习惯，不适应。后来革命形势不断变化，革命的对象逐步转向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从批电影《武训传》到反右派斗争等思想政治运动，其对象都是知识分子或知识分子出身的党政干部，由于历史原因，形成了工农兵干部与知识分子的矛盾，在反右派斗争中，对抓党内外知识分子，在毛泽东指示深入挖掘、反对右倾情绪、反右补课等措施下，各级组织和工农干部就层层加温、加码，对反右派斗争犯严重错误起到了重大作用。

¹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85页

所以，小生产者的观点：主观性、保守性、封闭性、狭隘性、宗派性、知识贫乏性、报复性等再现在工农干部中，而且非常牢固和执着，加上工农兵出身的干部一般说来，特权思想严重，民主法制观念淡薄，文化素质比较低下，影响他们正确执行党的方针政策。而反右派斗争的一系列方针政策是在毛泽东错误地估计客观形势情况下制定的错误政策，同工农干部的偏见和错误的反右政策相结合，必然要犯严重错误，可见，小生产者的落后意识同毛泽东错误的反右派政策相结合成了反右派斗争所犯严重错误的一个重要根源。

封建专制主义残余的影响。自秦始皇建立中央高度集权的专制制度，延续到中华民国。新成立的联合政府是仿照革命根据地建立小块政权的经验和按照苏联模式建立起来的。苏联模式：政治上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体制，实质上是一个中央高度集权的沙皇政治体制，斯大林专制统治近三十年；经济上是全民所有制、集体所有制的单一公有制和无所不包的、高度的计划经济，国家掌握经济命脉；文化思想上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不容许非无产阶级思想存在。而这种苏联模式对中国当时的政治构架产生重要影响。1954年宪法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国家。”这个国家在共产党领导下，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取得胜利。与此同时，也逐渐暴露出这个体制不完善的地方和某些弊端。

1956年，在《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中，毛泽东承认了在上层建筑存在某些弊端。他说：“我们党和国家的工作人员，由于受到官僚主义的多方面的袭击，就面临到有可能利用国家机关独断独行、脱离群众、脱离集体领导，实行命令主义，破坏党和国家的民主制度的这样一个很大的危险性。”¹1957年2月，毛泽东在《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进一步承认：“国家机构中某些官僚主义作风的存在，国家制度中某些环节上缺陷的存在，又是和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相矛盾的。”²

上述引文说明，毛泽东承认国家机构中存在着官僚主义和国家制度中存在某些环节上的缺陷。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和广大知识分子（包括大学生）沿着毛泽东承认的某些弊端作进一步探讨，他们提出，像高度集权是危险的：“三害”的根源存在于社会主义制

¹ 《人民日报》1956年4月5日

²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74页

度中的某些环节，与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有关，国家权力的高度集中是斯大林犯错误的根源等等，这类意见实际上是起到揭露封建专制思想，是新时期反封建专制主义的表现。而这些意见被当局认为是反社会主义、反党、反人民、反斯大林、反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表现，因而将提出意见的人打成右派分子。领导人的这种行为，至少在客观上保护或维护“三害”的根源即封建专制思想和斯大林的专制独裁行为，同时说明了领导者是有意识或无意识的忽视、放弃肃清封建专制主义遗毒的表现。由此看出，党的领导人和各级工作人员都深受封建专制思想的影响。

关于封建专制主义遗毒问题，在改革开放的80年代，李维汉有个谈话，他建议邓小平肃清封建遗毒：“这个封建主义的问题，包括它的思想体系、风俗习惯流毒这样深远，影响这样严重，这是有历史原因的。因为我们总是打仗……一直就是不断的战争，革命就是这个事情。而这些战争基本上都是带农民性的，所以毛泽东很熟悉农民，熟悉战争。从客观上讲，来不及做清算封建遗毒这个事。从主观上讲，毛泽东没有完全意识到这个事情。……但是封建主义还很多，毛主席没有来得及做这个事，就是打仗。我们所谓反封建就是做了两件事，一是改变了封建的生产关系，二是把它上层建筑打掉了。但是这个根本的东西——理论上、思想上的封建遗毒还没有来得及清算。少奇也没有认识到这个问题。恩来也没有做这件事。毛、刘、周都没有注意这个事情。”

李维汉又说：“我正式向您（邓小平）建议，我认为由您出来补这一课比较适当。”“邓小平接受李维汉建议后，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思考和部署……8月18日，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关于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重要讲话，其中第三、四两个部分对封建主义思想影响问题作了全面的分析和充分的论述，提出了反对资产阶级思想侵蚀和肃清政治上的封建遗毒的历史性任务。”¹

1980年6月19日，李维汉接受人民日报采访时说：“我认为反封建的问题是党和国家带根本性的问题。”“为什么毛主席到晚年会造成这样大的悲剧，走向自己的反面？”“还有，周总理也是悲剧呀！他在文化大革命中说，他只能‘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自己说这个话，他作了斗争，对林彪、‘四人帮’进行了批判，使

¹ 摘自《百年潮》1999年第5期

党和国家没有完蛋，他有功劳。但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有两方面，一方面是他进行了抵制、斗争；另一方面，用一句不好听的话，又是他效愚忠。”“我们的民主革命是要反帝反封建，反对帝国主义做得比较彻底，而反封建却只做一半，而且是比较容易的一半。”“毛主席接触了封建主义没有？接触了。在毛选四卷中他个别地零星地把问题提出来了。可是又放下了。”“毛主席在农民运动中提到要反对四权——政权、族权、神权、夫权，但他提过后也丢开了。”“在民主革命阶段对他提出过分的要求是不对的，但后来的发展就不同了。”

李维汉又说：“少奇同志也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周总理也没有解决这个问题，最后产生悲剧。”“总之，从历史上说留下了这么大问题，是不是？”“现在看，是不是家长制、等级制，等级很严，真是严得很。”“还有终身制。”“家长制很厉害，还有特权、特殊化、派性。”“派性”“那是封建宗法性的，是流氓无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闹事，自己称王称霸，农民起义，最后想自己做皇帝，洪秀全是这样，陈胜吴广，推翻了一个皇帝，自己做皇帝，朱元璋也是这样”。李维汉还说：“还有个人崇拜。”“毛主席自己也反对过个人崇拜，一论、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中不是写上了的吗？可是后来自己也搞了。搞家长制，对人家的一点不同意见都不能容忍，发展到这样的悲剧。把那么多人关起来，毛主席不点头能行吗？”“周总理就是个人崇拜的典型，发展到知道是错误也跟。”

李维汉最后说，“我和小平同志谈的就是这些，我连提纲都没有写，想到什么就说什么。”“我还要给小平、耀邦同志写信，既然你们赞成我的意见，就希望小平同志出来说话。”¹

现在摘录邓小平谈话的关于肃清封建遗毒的问题：

邓小平首先谈到权力过分集中以及如何形成问题：“权力不宜过分集中。权力过分集中，妨碍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和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实行，妨碍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妨碍集体智慧的发挥，容易造成个人专断，破坏集体领导，也是在新的条件下产生官僚主义的一个重要原因。”“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就是在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的口号下，不适当地、不加分析地把一切权力集中于党委，党委的权力又往往集中于几个书记，特别是集中于第一书记，什么事

¹ 摘自《炎黄春秋》2003年第3期，第2—5页

都要第一书记挂帅、拍板。党的一元化领导，往往因此而变成了个人领导。全国各级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这个问题。权力过分集中于个人或少数人手里，多数办事的人无权决定，少数有权的人负担过重，必然造成官僚主义，必然要犯各种错误，必然要损害各级党和政府的民主生活、集体领导、民主集中制、个人分工负责制等等。这种现象，同我国历史上封建专制主义的影响有关，也同共产国际时期实行的各国党的工作中领导者个人高度集权的传统有关。”权力高度集中的特征：第一，权力机构并非选举产生，即使选举产生也是形式主义的选举；第二，行政、立法不可分割，由统一的权力机构所领导；第三，最高权力机构不能转让、不能轮换，实行事实上的终身制；第四，最高权力机构不受任何机构制约和监督。这样的权力高度集中的体制本质上是不民主的，甚至是反民主的。

接着谈到官僚主义以及如何形成的问题：“官僚主义现象是我们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广泛存在的一个大问题。它的主要表现和危害是：高高在上，滥用权力，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好摆门面，好说空话，思想僵化，墨守成规，机构臃肿，人浮于事，办事拖拉，不讲效率，不负责任，不守信用，公文旅行，互相推诿，以至官气十足，动辄训人，打击报复，压制民主，欺上瞒下，专横跋扈，徇私行贿，贪赃枉法，等等。”“官僚主义是一种长期存在的、复杂的历史现象。我们现在的官僚主义现象，除了同历史上的官僚主义有共同点以外，还有自己的特点，……它同我们长期认为社会主义制度和计划管理制度必须对经济、政治、文化、社会都实行中央高度集权的管理体制有密切关系。”

再谈到家长制作风等问题：“革命队伍内的家长制作风，除了使个人高度集权以外，还使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组织成为个人的工具。家长制是历史非常悠久的一种陈旧社会现象，它的影响在党的历史上产生过很大危害。陈独秀、王明、张国焘等人都是搞家长制的。从遵义会议到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一直比较注意实行集体领导，实行民主集中制，党内民主生活比较正常。可惜，这些好的传统没有坚持下来，也没有形成严格的完善的制度。例如，党内讨论重大问题，不少时候发扬民主、充分酝酿不够，由个人或少数人匆忙做出决定，很少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实行投票表决，这表明民主集中制还没有成为严格的制度。从一九五八年批评反冒进……以来，党和国家的民主生活逐渐不正常，一言堂、个人决定重大问题、个人崇拜、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一类家长制现

象，不断滋长。”

“不少地方和单位，都有家长式的人物，他们的权力不受限制，别人都要唯命是从，甚至形成对他们的人身依附关系。我们的组织原则中有一条，就是下级服从上级，说的是对于上级的决定、指示，下级必须执行，但是不能因此否定党内同志之间的平等关系。不论是担负领导工作的党员，或者是普通党员，都应以平等态度互相对待，都平等地享有一切应当享有的权利，履行一切应当履行的义务。上级对下级不能颐指气使，尤其不能让下级办违反党章国法的事情；下级也不应当对上级阿谀奉承，无原则地服从，‘尽忠’。不应当把上下级之间的关系搞成……猫鼠关系，搞成旧社会那种君臣父子关系或帮派关系。一些同志犯严重错误，同这种家长制作风有关……也同残存在党内的这种家长制作风分不开。”

“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现象的形成，同封建主义的影响有一定关系”。“搞特权，这是封建主义残余影响尚未肃清的表现。旧中国留给我们的，封建专制传统比较多，民主法制传统很少。”

最后，谈到毛泽东也受封建遗毒的影响，邓小平说：“即使像毛泽东同志这样伟大的人物，也受到一些不好的制度的严重影响，以至对党对国家对他个人都造成了很大的不幸。”¹

李维汉提出并建议邓小平出来补肃清封建主义这一课，虽然是80年代提出的，但对毛泽东在1957年反右派斗争中放弃或忽视了对封建专制主义遗毒和封建宗法思想的批判起到了积极的反思作用，同时，也揭示毛泽东在反右派斗争中所犯严重错误的最深层次根源，而且是揭示比较深刻、客观、切中要害，更具有权威性。可是，邓小平虽然讲了肃清封建专制主义遗毒，但没有有力的组织措施，在实际中，没有执行，这从另一方面说明封建专制主义是根深蒂固的，凡是受封建专制主义遗毒较深的领导人或集团是不可能担当起肃清封建专制主义遗毒这一历史重任的，肃清它需要有一个长期的过程。

受封建文化的影响。帝王思想：党内喊“万岁”，据黎澍说，“恐怕还是从王明喊‘斯大林万岁’开始的，党内喊万岁开始并不习惯，延安的时候有人在会上提出来过。”²据李普说，“抗日战争时期我在重庆《新华日报》工作，那是我们党在国民党政府的战时

¹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21-333页

² 《晚年毛泽东》肖延中编：春秋出版社1989年版，第271页

首都出版的机关报。‘毛主席万岁’这个词是从延安传来的，后来也在《新华日报》出现了。”¹

丁玲回忆毛泽东的帝王思想：在延安时候，我经常去毛主席住处，有一次，毛主席突然问我：“丁玲，你看现在咱们的延安不像一个偏安的小朝廷？”我知道他是在开玩笑，就回答他：“我看不像，没有文武百官嘛！”“这还不简单呀！”主席马上把笔和纸推到我的面前说：“你先开个名单，再由我封文武百官就是了。”我没有开名单，只是报人名，毛主席一边写名字，一边在这些人的名字下面写官职，这个是御史大夫，那个是吏部尚书、兵部尚书什么的，还有丞相、太傅等等。他突然又对我说：“丁玲，现在文武百官都有了。既然是朝廷，那就无论大小，都得有三宫六院呀！来，来，你再报些名字，我来赐就是了。”

另外一次，我去毛主席住处，他怀里抱个男孩，小孩撒了一泡尿，毛主席高兴地对我说，“丁玲，你说说，这是不是太子尿呢？”说完，用一支手把纸铺开，竟填起歌颂太子的词来了。这首词我一点儿也记不起来了。²在这里，毛泽东的帝王思想暴露得淋漓尽致。

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居高临下，游行群众高呼“毛主席万岁”，毛泽东回敬群众“同志们万岁”，当是“万岁”声此起彼伏，响破耳鼓。众所周知，“万岁”只能用之于皇帝，皇帝的俗称就是“万岁爷”，对于任何个人喊“万岁”，实质上是农民的东西，是一种感恩思想，是农民对偶像崇拜的表现。就是这种落后，糟粕的东西，共产党的领袖也欣然接受，可见，毛泽东深受封建文化习俗的影响。

1945年，毛泽东反对过人家喊他万岁，他说：“人家喊万岁，我说我52岁。当然不可能有不应该有什么万岁。”³可是，毛泽东反对喊他万岁，但他没有坚持下去，从新中国成立后，喊毛泽东万岁声不断，毛泽东并没有制止群众喊万岁，倒是把人民群众喊“朱德万岁”的口号制止了，“万岁”只属于毛泽东个人，别人不能分享。到了1957年，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党员李德齐对喊“毛主席万岁”提出看法，《人民日报》于1957年8月3日报道说：“他诬

¹ 肖蔚彬、黄伟经主编《告别“万岁”》广东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353页

² 参见杨桂欣《“我丁玲就是丁玲”》、《炎黄春秋》1993年第16期，第43页

³ 《红旗》1981年，第14期7-8页

蔑毛主席，反对人民群众喊毛主席万岁和报上登载人民群众向毛主席欢呼的照片。”¹这是李德齐被打成“右派分子”的罪状之一。1957年鸣放期间，北京大学学生的大字报中呼“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的只有极少数人，绝大多数是高呼“社会主义公有制万岁！”“社会主义民主万岁！”“思想大解放万岁！”“真理和正义万岁！”“民主、自由和人道主义万岁！”“人民万岁！”“理性的原则万岁！”“民主自由万岁！”“社会主义的法制万岁！”²

反对喊“毛主席万岁”、或用“民主、自由、理性、人道主义万岁”替代呼“毛主席万岁”看出，是主张告别个人呼万岁，可是以后，呼“毛主席万岁”更加增多，以至到了疯狂的地步，而毛泽东不但不制止，而更加欣赏。

“拒谏”思想，“拒谏”的“谏”这个字，意思是指规劝君主、帝王改正错误。1953年，梁漱溟向毛泽东提出建议说：“工人在九天之上，农民在九地之下。”毛泽东对梁的建议接受不了，毛泽东批评梁说，“是不是拒谏饰非呢？如果梁先生的这类意见也可以称作‘谏’，我声明：确是‘拒谏’。饰非则不是。”³在这里，毛泽东俨然以君主自居，帝王思想表露无遗了。

毛泽东欣赏群众呼他“万岁”，拒绝下面对他的批评叫“拒谏”，把自己当作君主或皇帝。君主、皇帝都有个人专断、独裁的作风。

个人崇拜思想。个人崇拜，或个人迷信，把领袖神化到盲目崇拜的一种社会现象。个人崇拜是以“天才论”为依据的英雄史观的一种表现，是封建社会普遍存在的一种现象。即使社会主义社会也出现个人崇拜的现象，中国也不例外。它的滋生和蔓延的环境有：第一，新中国是从半封建、半殖民地旧中国而来，深受封建专制主义和小生产者的习惯势力的影响；第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无论是地下斗争，还是武装斗争，都是生死残酷的斗争，客观上要求权力高度集中，集中到最有威望的领导人物；第三，中国共产党执政后，掌握政权、实行民主集中制，权力高度集中现象有增无减，随着胜利一个接着一个，权力高度集中现象与日俱增，个人崇拜思

¹ 《人民日报》1957年8月3日

² 参见牛汉、邓九平主编《原上草》经济日报出版社1998年版

³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114-115页

想变成个崇拜的实践，走向个人专断。

毛泽东是反对个人崇拜的，1948年8月15日，毛泽东给吴玉章回信说：“现在没有什么毛泽东主义，因此不能说毛泽东主义。不是什么主要的要学习毛泽东主义，而是必须号召学生们学习马恩列斯的理论和中国共产党人（毛泽东也在内）根据马恩列斯理论所写的某些小册子及党中央各项规定路线和政策的文件在内。另外，有些同志在刊物上将我的名字和马恩列斯并列，说成什么‘马恩列斯毛’，也是错误的，必须坚决反对这样说。”¹1949年3月，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指出，“力戒骄傲。这对领导者是一个原则问题，也是保持团结的一个重要条件。就是没有犯过大错误，而且工作有了很大成绩的人，也不要骄傲。禁止给党的领导者祝寿，禁止用党的领导者的名字作地名、街名和企业的名字，保持艰苦的作风，制止歌功颂德现象。”²

1950年5月，沈阳各界人民代表大会为纪念新中国成立，决定在市中心修建开国纪念塔，塔上铸毛泽东铜像。毛泽东电文批示：“铸铜像影响不好”，“只有讽刺意义”。1953年8月12日，毛泽东在《反对党内资产阶级思想》讲话中对个人崇拜问题提出六条规定，一曰不作寿。二曰不送礼。三曰少敬酒。四曰少拍掌。五曰不要把中国同志和马、恩、列、斯平行。³1954年党的七届四中全会上通过《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指出：“反对把个人放在组织之上，反对不适当地过分强调个人的作用，反对骄傲情绪和个人崇拜。”⁴

1956年4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根据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由《人民日报》编辑部写成的《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总结了斯大林在个人崇拜问题上所犯的重大错误，指出了我党应当汲取的教训。文章说：“个人崇拜是过去人类长时期历史所留下的一种腐朽的遗产。个人崇拜只在剥削阶级中间有它的基础，也在小生产者中间有它的基础……个人崇拜也就是千百万人的一种习惯势力。这种习惯势力竟然在社会中还存在着，也就有可能给予许多国家工作人员以影响。”“对于我们必须警惕

¹ 《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303页

²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43页

³ 参见《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97页

⁴ 《中共中央文件选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第79页。

的，就是：有些人当他们因为党和国家有了很多工作成绩，取得人民群众的高度信任的时候，便有可能利用这种群众的信任去滥用权威，做出一些错事来。”“有些人就很容易犯出狂妄自大，迷信自己，或者盲目崇拜别人的错误。因此，反对脱离群众的个人突出和个人英雄主义，反对个人崇拜，是应该经常加以注意的问题。”“我们需要建立一定的制度来保证群众路线和集体领导的贯彻实施，而避免脱离群众的个人突出和个人英雄主义，减少我们工作中的脱离客观实际情况的主观主义和片面性”“我们也还必须从苏联共产党反对个人崇拜的斗争中吸取教训，继续展开反对教条主义的斗争。”¹由此可见《一论》是反对个人崇拜，《再论》中不提反对个人崇拜。这篇文章的基调是为斯大林的错误作辩护的，看来，对反对个人崇拜开始动摇了。

党中央、毛泽东在1957年前，对防止和反对个人崇拜作出规定，采取许多措施，但在实际过程中并没有认真执行和贯彻，至少毛泽东例外。反右派斗争接近尾声的1958年3月，毛泽东对反对个人崇拜已经动摇了，他在成都会议讲话中指出：“有些人对反对个人崇拜很感兴趣，个人崇拜有两种：一种是正确的，如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正确的东西，我们必须崇拜，永远崇拜……另一种是不正确的崇拜，不加分析，盲目服从，这就不对了。反对个人崇拜的目的也有两种：一种是反对不正确的崇拜，一种是反对崇拜别人，要求崇拜自己，问题不在于个人崇拜而在于是否是真理。”²在这里，毛泽东把真理与个人崇拜混为一谈。

毛泽东为什么动摇了反对个人崇拜的原则呢？最根本原因在于：“1956年，斯大林接受批判，我们一则以喜，一则以惧。揭掉盖子，破除迷信，去掉压力，解放思想，完全必要。但一棍子打死，我们不赞成，他们不挂像，我们挂像。”³在这里，毛泽东怕身后有人重演对待斯大林那样对待他。所以，毛泽东对反对个人崇拜的原则转向对个人崇拜提出正确的个人崇拜和不正确的个人崇拜的观点。这种观点一启动，逐步走向欣赏和接受个人崇拜的腐朽思想，以后更加发展，更加严重。著名诗人张光年谈到个人崇拜为什么有市场时，说，“这几乎成了老一代革命干部的通病，是当代和今后

¹ 《人民日报》1956年4月5日

² 《毛泽东思想万岁》1958-1961卷，第33页

³ 《毛泽东思想万岁》1958-1961卷，第34页

的年轻人难以理解的。年轻人会说，你们的知识和经验不算少，讲起话来一套一套的，为什么对毛主席还那么迷信呢？别人的体会我不敢说，要让我来说，除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不深不透而外，还因为，我们是从苦难深重的、地狱般的旧中国、旧社会奋斗出来的。我们跟广大群众一起经受了‘三座大山’下数说不尽的痛苦，……自己也在白色恐怖下颠沛流离，九死一生。我们把以毛泽东为首的党的领导集体与毛泽东个人等同起来，这似乎是可以理解的吧？再加上我们党是在半封建的旧基础上创建起来，在长期战争环境中发展起来的。封建遗毒浸染了革命机体，长时间不自觉。党内民主不发达，长期来习以为常，这些都助长了个人迷信的讳疾忌医。教训够惨痛了，以后决不可重犯！”¹

特权现象。所谓特权，即特殊权利。搞特权，就是在政治上和物质生活上去谋求法律和制度之外的权利。邓小平说：“搞特权，这是封建主义残余影响尚未肃清的表现。旧中国留给我们的，封建专制传统比较多，民主法制传统很少。”²1957年鸣放期间，对特权现象和搞特权的人提了不少的意见和建议。比如，有些党员干部既无德，又无才，却身居要职，做不好工作。有的党员的作风恶劣，文化程度很低，工作能力差，但仍然让他任科长。³有单位的非党员几年前是科员、科长，现在还是科员，科长。而当时入党的科员科长，现在有的当了科长，有的还当了处长。⁴党员与非党员在物质待遇上也存在特殊的现象，一般非党员干部，他说他家10口人，住33平方米的房子，而与他同级的党员干部则住在院子里最好的房子里。一等科员的党员干部坐转椅，非党干部坐硬板凳，一样的科员，但屁股不一样。⁵还存在封建等级现象，有的处长一人一间办公室，有电扇，一般干部挤在一间小屋，热得很也没有电扇。什么样的干部，他的子女就可入什么样的学校，子女靠爸爸之福，这真像封建社会中的爵位世袭权。⁶人有提出，“全国人民也可以分为四等，第一等最高贵的人是共产党员，第二等是共青团员，第三等是民主党

¹ 胡平，晓山编《名人与冤案》二，群众出版社1998年版，第355、356页

²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32页

³ 参见《人民日报》1957年5月15日

⁴ 参见《人民日报》1957年5月19日

⁵ 参见《人民日报》1957年5月17日

⁶ 转引朱地著《1957年：大转弯弯谜·整风反右实录》山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52页

派，第四等是群众。国家机关、学校、企业的首长，也是多设副职。正的总是由党员担任，副的偶有民主人士，但民主人士多是有职无权。……这种政权制度，应该叫它个什么名字，我不知道。”¹

以上所探索犯反右派斗争严重错误的这些原因和根源中，其中最经常最主要最根本起作用的，是封建专制主义遗毒和国内外教条主义影响所产生的现存制度中的某些弊端和个人专断。其他的原因和根源都是服从于、服务于个人专断的，都大小不同程度起到推波助澜、火上浇油的作用。

总之，上述各种原因和根源综合交织在一起，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相互渗透，就形成了领袖和各级领导干部“个人专断”、“一言堂”的“人治”局面。上从党中央主席，下至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直到每个部门、单位的大小头头和一把手，都可以定夺知识分子的命运，定夺右派分子的命运。可见，反右派斗争所犯严重错误的是层层“个人专断”和一言堂的结果。

¹ 《人民日报》1957年6月15日

结束语

1949年民主革命胜利前夕，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民主革命要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转变后的国内主要矛盾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从这时起，资产阶级成为社会主义革命的对象，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成为社会主义改造的对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的主要任务是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遗留下的任务，同时要进社会主义革命的各项准备工作。1952年，毛泽东酝酿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征求斯大林同意后，1953年6月，毛泽东在党的会议上提出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同时批评了离开总路线的“右”的、“左”的观点，主要是批评了党内的“右倾”观点。这时，一方面提出向苏联学习，另一方面肃清西方资产阶级影响。过渡时期总路线公布后的实施过程中与这些相适应。毛泽东发动理论界、学术界批判资产阶级腐朽思想，亲自批判对总路线有意见的民主人士的所谓反动思想，还发动学术界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在毛泽东领导下，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农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提前完成了，提前12年就“让资本主义绝种，让小生产绝种”，但遗留问题不少。批判资产阶级各种思想负面作用太大。客观地说，从1953年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开始，就放弃了新民主主义社会，过早过急进入社会主义（实际上是空想社会主义）。从这时起，党的指导思想向“左”的方面转变。这一重大转变导致了一系列“左”的倾向和“左”倾错误，这种“左”倾错误是以“左”倾教条主义和“左”倾空想社会主义形式出现的。这一重大转变是以后犯“左”倾错误的总根源、总源头。

1956年2月，苏共二十大的召开，提出改革思想，斯大林的罪行被揭发，引起波匈事件的发生，这些都对中国知识分子产生影响，对毛泽东产生震动。因而毛泽东领头极力为斯大林，为苏联社会主义进行辩护，认为斯大林是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是功大于过的一生，认为苏共二十大的“秘密报告”捅了漏子。毛泽东还认为匈牙利事件是反革命暴乱，要求苏联出兵镇压。毛泽东从两方面吸取教训，一方面片面地强调要抓好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另一方面，对社会主义进行新的探索，惟有如此，才能维护斯大林的形象，坚持十月革命道路和社会主义制度。由此看来，毛泽东等人深受斯大林教条主义的影响。斯大林统治苏联的三十多年，是俄国沙皇专制政体的继续和延长。历史证明，斯大林是过大于功的一生，

而毛泽东维护斯大林，尽管从大局出发，即从社会主义阵营出发，从国际共运团结出发，从中苏友谊出发等等，但在一定意义上也是在维护毛泽东自己。要求苏联军队出兵镇压匈牙利暴乱，暗示中国如果出现类似的匈牙利暴乱，也要进行无产阶级专政。在反右派运动中出现的“汉阳事件”（上级领导定性为“小匈牙利事件”）就进行了无产阶级专政。反右派斗争结束，对右派的处理、改造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具体表现。

建国以来，国内频繁地思想政治批判运动虽有成效，但副作用不小，后遗症太多，还制造一起冤案。至于社会主义三大改造，“让资本主义绝种，让小生产绝种”即过早过快过纯地改变了生产资料所有制问题，因而引发社员闹退社，工人闹罢工，学生闹罢课，工商业、民主党派和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心中有怨气或不满等。毛泽东认为出现上述那些问题主要是领导上的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等作风造成的，是制度和体制中某些弊端造成的。毛泽东只从作风上出发，提出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的整风措施来纠正、克服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整风运动是发扬民主，广开言路的开明、开放的一次思想解放运动，同时毛泽东承认党内存在骄傲自满情绪，为此，他在党的会议上带头批评党内存在的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现象，以后还主动邀请党外人士帮助党整风，预先给党内各级领导干部打招呼，虚心听取和接受党外人士的意见和批评，指示中央国务院等单位召开各种形式的座谈会，记者采访等，让党外人士鸣放出气。当座谈会上放出大量极为正确有益有利于党改进工作作风，改革不合理的制度等意见，也放出了领袖认为超出整风范围的观点，像罗隆基说：“无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就领导不了他这个小资产阶级的大知识分子。”¹储平安等给毛泽东提意见等时，毛泽东就坐不住了，于5月中旬写了《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准备下决心反击右派。当北京大学学生于5月19日贴出大字报参加整风，要求继承发扬科学和民主的五四传统精神，要求在社会主义前提下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等。毛泽东担心“民主个人主义者”拾起第三条道路与共产党争权，鉴于担忧“匈牙利事件”在中国重演等心态，未经中共中央政治局全体会议讨论通过，就改变了整风主题，用“引蛇出洞”的策略，于6月18日发动了一场反击右派的运动，将斗争

¹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84页

的主要矛头对准“章罗同盟”等“右派老祖宗”及其骨干，对准广大知识分子。发动了反右派斗争，也就中断了刚刚起步的民主自由、改革开放环境，打击了民主自由进步的势力，堵塞了中国通向科学社会主义的道路。

毛泽东在反右派斗争中继承、发展了建国以来历次思想政治批判运动中的“左”的错误作法。首先制定了用来对付敌人的“诱敌深入、聚而歼之”、“引蛇出洞”的策略来对付手无寸铁的广大知识分子，使用了“无情打击，残酷斗争”对付敌人的手段来对付人民群众，采用“无中生有”、“张冠李戴”、“指鹿为马”、“无限上纲”、“宁左勿右”宁肯错抓近百万，决不漏网一人的主观随意性的办法，迟迟下达极为抽象，灵活，难于掌握，“宁左勿右”的划右标准，结果抓了五十五万多右派分子，揪出了二十多个“反党集团”，补抓了三十多万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对他们采取不合法法律程序和手续，过严、过重处分的弹性标准，将绝大多数右派分子遣送到劳动基地、劳改部门、边远艰苦农村、农场、山区去无限期的劳动、劳教和劳改，这相当于给这些右派分子判了无期徒刑，剩下的右派分子留在单位当作反面教员。这种长期戴帽子的办法，把人民内部矛盾人为的当作敌人处理的办法，既是毛泽东学习苏联斯大林清洗运动的产物，也是毛泽东的一个“独创”、一项“发明”。

总之，毛泽东在反右派斗争中制定所有的政策、策略，发出的指示，撰写的文章，社论，下达右派标准和处理右派的建议和原则，对右派采用的手段、方式、方法以及劳动、劳教、劳改、戴帽、摘帽标准，下令不准对右派甄别，还重新戴帽等等，都是人为制造的阶级斗争产物，都是“左”倾教条主义的表现，都是大大小小独断专行、个人迷信的结果，在正常民主法制社会里是绝对不会出现的，只有在刚刚摆脱封建专制主义、宗法思想相当深厚、相当根深蒂固，但又没有来得及或者忽视批判的中国才可能发生。反右派斗争即毛泽东等人犯反右派斗争错误，说到底是在党内“左”倾教条主义思想对坚持新民主主义思想的专政，是执政党内的僵化保守势力对具有改革开放进步势力的镇压，是掌握国家机器的统治者对手无寸铁的被统治者彻底清算，无情打击。从反右派斗争过程来看，反右派斗争没有值得肯定的东西。

反右派斗争严重违背了党的八大所确定的发展经济、发展和提高生产力的工作重点，完全改变了党的八大所提出的主要矛盾——

先进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反右派斗争结束后，倒退到以阶级斗争为重点的老路上去，恢复到以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为主要矛盾。同时，毛泽东抛弃了在1956年知识分子会上提出的“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的论断，也抛弃了自己在1957年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提出的知识分子“是脑力劳动的工人”，“是用脑子的工人”的论断¹，把所有知识分子重新定性定位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种违背、改变，抛弃不仅遏制、摧残中华民族的精英分子和生产力中的先进因素，直接、间接地减缓阻碍国家现实的经济发展和生产力提高及社会进步的步伐，而且更严重限制、堵塞了本来就少得可怜的一点恩赐的有限的民主自由，还严重地破坏了中国共产党同非党人士的联盟和多党合作的政治制度，严重地削弱了实事求是优良传统，更加助长了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泛滥。整风目的不但没有达到，使整风成为一次不成功的、中途夭折的运动。反右派斗争后，民主、进步势力遭受严重打击，到了被全部歼灭的地步，党外形成万马齐喑的局面，而专制独裁、个人迷信进一步发展为直接通向“大跃进”敞开大门，为以后“反右倾”、“文化大革命”提供理论武器，提供大批批判的理论骨干和冲锋陷阵的勇士。所以说，反右派斗争是这些思想政治批判运动的直接或间接的起因和序幕。

右派分子经过二十多年的劳动，劳教和劳改，经历了“大跃进”、“人民公社化”、“反右倾”、“三年灾害”、批三风（“黑暗风”、“单干风”、“翻案风”）“四清”直到“文化大革命”等思想政治批判运动，右派们在这些运动中总是挨批、挨斗，与地、富、反、坏并列为五类分子。在五类分子基础上加上走资派、叛徒、特务、臭老九（知识分子）构成为九种人。在九种人基础上再加上十二种人，构成为二十一种人。右派分子构成为五类分子之一，九种被专政的对象之一，二十一种被专政的对象之一。这二十一种人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这种无产阶级专政铁拳的打击给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带来不幸，给右派分子带来痛苦和灾难。同时给知识分子政策带来严重的干扰和破坏，极大的影响知识分子的聪明才智的充分发挥，给民族、国家带来无可挽回的损失，使中国经济文化科学与周边国家拉大了距离，使中国失去了二十多年发展的大好机会。这些不幸、灾难、干扰、损失不仅影响伤害知识分子、右派分子这

¹ 《党的文献》2002年第5期，第34页

一代人，而且还殃及他们的亲属、下一代和下几代人，真是改变了几代人的命运。这种负面影响至今还在起作用，现在还有些右派分子(本人已改正)的亲属及其子女承受着反右派斗争带来的恶果，恶果已造成，永远无法挽回，使活着的右派本人感到愧疚，而逝去的右派难以瞑目。所以说，反右派斗争，“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构成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建国后的三大灾难之一，邓小平说：“到了1957年我们又犯错误了，反右扩大化。1958年要求过急，搞‘大跃进’搞人民公社，不对头了，给我们带来很大灾难。”¹

反右斗争所犯错误的原因和根源，最主要是受封建主义、国内外教条主义影响和过早地抛弃了新民主主义社会，没能让其中有利于国计民生的资本主义适当地发展15—20年，而是过急过快让资本主义绝种，让小生产也绝种。这种人为地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人为地改变社会主要矛盾，提出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就成为社会主义革命的对象。当时党外知名人士向毛泽东写信，不让资本主义发展一个时期是违背共同纲领的，毛泽东根本不予理睬。独断专行，发动反右派斗争，党内外许多知名人士向毛泽东建议，不必发动全国大规模的反右派运动，当局根本听不进去，不予考虑，结果犯了“左”倾错误。

经过二十多年实践证明，党中央从毛泽东“左”倾错误中吸取教训，顺应国际潮流，结合中国实际，把我国社会主义定性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质上是与新民主主义社会类似)，由此出发，把工作重点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以发展经济，发展生产力为中心工作上，其他一切都应该围绕着以服从和服务于发展生产力这个中心展开工作，这就必然要重视和发挥生产力中最主要最先进的因素，即肯定重视和发挥知识分子的地位和作用。所以党中央首先处理文化大革命中遗留下来的问题，平反历史上的冤假错案，改正右派分子，摒弃知识分子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论断，重申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进一步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样就正确地解决了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正确地解决了知识分子对发展生产力，提高综合国力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

遗憾的是在右派分子的改正过程中，虽然改正了五十四万多右派分子，但还留下三千多名右派分子没有改正²，又说是五千多名，

¹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34页

² 《当代中国史研究》1997年，第6期

总之还留下三至四千名右派分子没有得到改正。甚至连没有实质性右派言行的右派领袖人物，毛泽东称之“右派老祖宗”的章伯钧也没有得到改正。究其原因，首先，受当时坚决执行、积极支持反右派斗争的“某些领导人”、积极分子和既得利益者严重阻碍与干扰以及坚决反对；其次深受“左”倾统治二十多年和小生产者的顽固、僵化、保守习惯势力的影响，致使反右积极分子、打手对右派改正一时难以转变，思想不通，行动迟缓，甚至还上书给新中央，指责中央领导人右倾，为右派翻案；第三，改正是在肯定反右派斗争的正确、必要的前提下进行的，是妥协的产物，如果右派全部改正，那不就证明毛泽东发动反右派斗争，邓小平积极指挥都全部错了吗？这都有损于毛泽东的尊严、邓小平的面子，还不利于他们伟大、光荣、正确的形象。所以，留下几千名右派分子只摘帽子不改正，以此证明反右派斗争的必要正确。须知，反右派斗争中划了五十五万多右派分子，已经改正了五十四万多人，没有改正的是三至五千人，（其他抓的反社会主义分子三十多万不包括在内），反右派斗争时错抓、错划、错定右派分子达到百分之九十九点以上，剩下不改正的右派人数只占抓右派分子总数的百分之零点几左右，这个百分之零点几左右的正确性，必要性的程度，含金量比例实在少得可怜。一个运动有百分之九十九点多是错误的，难道一个百分之零点几的正确应该肯定吗？肯定了岂不荒唐吗？按正常思维，应该否定才是。

留下一些右派分子不改正，特别是留下根本没有实质性右派言行的章伯钧的真正意图，可能是，第一，向毛泽东及其支持者表明，邓小平还是高举毛泽东反右派斗争正确必要的旗帜，并没有全盘否定反右派斗争。邓小平面临否定反右派斗争的声音，曾经多次声称，反右派斗争本身没有错，问题是扩大化。邓小平出于其某种政治需要，顽固地坚持他的观点。第二，邓小平为首的中央及其某些领导人为以后反右派，抓右派，批右派提供依据，留下空间，企图证明中国的右派还没有绝种，如果有必要，还可以以各种形式，以各种名义来抓右派、批右派。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就是这样干的。众所周知，邓小平吃过“左”倾错误的苦头，挨过毛泽东的整，所以承诺：“我们今后不搞反右派运动，但是对于各种错误倾向不能不进行严肃的批评。”¹后来告诫新的领导人：“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

¹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90页，第3卷375页

止‘左’。¹这就是说反右反左都要继续进行下去，这也是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一大特色。

众所周知，在民主法制社会里就不存在什么反右反左的问题。要想根除产生反右反“左”的根源，只有到了科学的社会主义社会才能实现。现在我国已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目前正奔向小康社会的目标前进。只要党坚持改革开放，坚持不懈的发展经济和高新技术产业，坚定不移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努力实现科教兴国，便能达到科学社会主义的目标。到那时，反右反“左”产生的根子就会全部铲除。1957年的右派分子为走上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付出了二十多青春年华，甚至献出了鲜血和生命。如果当时统治者对他们(实为代表民主进步的改革派)不镇压，不扼杀，采纳他们提出的改革建议，中国可能会抓住二十多年大好时机来实行民主，广开言路，发展经济，振兴科学，繁荣文化艺术，培养人才。可惜呀，历史不可能有如果。在1957年下半年残酷打击镇压下的中国只有走毛泽东所指定的“左”倾教条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的弯路，这使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推迟了整整二十多年。这个惨痛教训，望全体中国人民永远牢记。

¹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5页

后记

我195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同年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从事科研工作，1956年所领导派我去北京俄语学院进修，1957年8月在进修期间被哲学研究所召回参加整风反右，在整风中向所领导汇报自己的思想，后来被打成右派分子，受处分后，于1961年发送到辽宁鞍山，先后在北京、河北、山东、辽宁等地历经22年监督劳动改造，1978年12月26日右派分子得到改正，由于“左”的思想干扰，又延误了两年，直到1980年8月才被安置到武汉大学哲学系任教。刚从事哲学专业教学、科研、翻译工作十年，1990年已到60岁。退休后，系里返聘我办成人高等教育，同时，我考虑自己读书18年，学术成果未尽人意，贡献微薄，愧对家国。我反复考虑，我是亲身经历建国以来历次思想政治运动的人，特别是在1957年夏季的反右派斗争中，而我也被打成右派分子。那么为什么中国会发生反右派斗争那样的政治思想运动？它的来龙去脉应值得研究和反思，于是我就以反右派斗争这一重大历史事件为探索课题，围绕这一主题，从1995年开始就回忆、阅读、收集、整理有关1957年反右派斗争的相关资料，天天上武汉大学图书馆、报刊资料阅览室、文史哲图书资料室、社会科学港台图书资料阅览室、校档案馆；经常跑新、旧书店；还就近访朋问友。伏案8年艰辛劳动，经过反复多次修改，才写出《反右派斗争的回顾与反思》一书。

该书系退休后个人写作，一切费用开支均由自己承担。而我从大学毕业刚步入工作岗位，28岁被打成右派分子受监督劳动长达22年，回到哲学专业，仅仅工作十年就退休了，工薪收入微薄，不大可能购买大批图书资料，身处退休教师地位，也无经费外出采访，更不可能阅读党内有关反右决策文件和资料。这些就限制了我只能凭记忆回忆，就亲身经历的事与人、就公开出版的图书与资料力求做到客观、公允、理性、尽量避免主观、片面、情绪化来分析探讨。

在该书写作过程中，我衷心感谢北京大学哲学系同班老同学、长期遭受株连之害、备受歧视之痛、深受颠沛流离之苦、50年来患难与共的妻子程静宇，她从精神上、物质上、时空上、资料回忆与收集中、写作策划与文章修改等给予积极支持、全力相助与多方鼓励。她为我写作本书题诗一首：

一枝秃笔写沧桑，暮暮朝朝牵肚肠。
豪气已随冤屈尽，忧思偏到暮年长。
激情时也歌新政，呼痛皆因触旧伤。
恩怨于我何足计，事关家国怎能忘。

在写作过程中，深深感谢我的老师、朋友和学生，他们都非常关心并积极支持、帮助与鼓励。特别是北大老同学、老朋友、老同事、错划右派的张守正于1998年4月临终前对我说：“我不行了，不能写了，你一定要把反右派斗争这个课题写好，很有意义。”遗憾的是，由于我的根底不深，写作水平有限，尽管做了最大的努力，写的尚未尽人意，有的在读者看来写得还不到位，有的在一些人们的眼里可能还有些过头出格之嫌，对于书中不足之处，存在的问题，敬请读者、专家赐教。

我还向本书所引用资料、观点的作者与武汉大学图书资料档案部门的管理、服务人员表示深切的谢意！

最后，在本书出版之际，我诚恳感谢香港国际学术文化资讯出版公司和张克伟先生鼎力相助，该书才得以与读者见面。该书的出版兴许为党史、国史的读者、研究者、评论者提供一点史料、一家之言，也许为反右派斗争的冤屈者、受害者及其亲属想表达而又不便表达的意愿与心声。

汪国训

2004年10月17日

于武汉大学北三区寓所

勘误表

页	行	字位	误	正	增	删
1	17	4			主义	
2	13	6	庄	起		
26	20	19	与	予		
27	12	23	完全	基本		
32	7	2	义	学		
63	29	19	乐	东		
67	23	10				想
70	7	19	唯	违		
72	20	19	的	和		
72	21	10				学
72	26	7				上
76 ₂	27	11	面	而		
76	29	8	了	着		
80	22	9	党	革命		
82	29	1				对
84	18	2	现	面		
84	25	13	滑	没有		
89	3	5			被	
89	27	1			援	
96	7	23			专政	
116	12	17			脱	
129	34	26	150	149		
130	34	26			152、157	
217	20	28	于	或		
219	26	25	漱	漱		
221	22	18	漱	漱		
229	1	27	官僚	社会		
251	28	26	到	道		
284	12	20			的	
287	18	30			式	

页	行	字位	误	正	增	删
303	10	14	刊	报		
330	11	27	是	的		
333	21	12				打
340	3	2	选	造		
368	30	10	结	洁		
377	10	6			的爱人	
396	18	20			起	
400	32	18			《中共党史资料》第八卷	
423	15	1	藉	借		
438	13	28			是	
438	14	14			是	
460	34	12			年	
484	20	7				形
489	5	22	的	以		
531	18	1				这是很好的现象
531	23	28	演	党		
541	20	7	疾	急		
543	13	1				1、
573	32	5	待	待		
576	13	27	产	本		
588	5	5	阶级	剥削		
591	10	22	木	产		
630	14	1			干	
636	18	29			不以人名作地名六曰	
637	24	13				接
641	33	12	18	8		
642	22	14			划	
645	31	23			决	
645	33	17				第3卷第375页
646	1	13	左	“左”		
末页	4	4	我	吾		